


一战与中国

一战百年会议论文集

魏格林 朱嘉明 主编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淘宝店铺热搜：东方出版社<http://dfyxcbs.tmall.com>

微信、微博、博客热搜：东方时政观察

上架建议 历史

ISBN 978-7-5060-8797-1




9 787506 087971 >

定价：56.00元

一战与中国

一战百年会议论文集

魏格林 朱嘉明 主编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战与中国：一战百年会议论文集 / 魏格林, 朱嘉明 主编.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060-8797-1

I. ①—… II. ①魏… ②朱… III.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文集 ②中国历史—近现代—文集
IV. ①K143-53 ②K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3501 号

一战与中国：一战百年会议论文集

(YIZHAN YU ZHONGGUO: YIZHAN BAINIAN HUIYI LUNWENJI)

主 编：魏格林 朱嘉明

责任编辑：郭 国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开 本：71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37

字 数：476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8797-1

定 价：56.00 元

发行电话：(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4258029

欧洲各国关于一战的叙事、记忆和争议

魏格林*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讨论在 2014 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全世界各地的出版社，出版了数不清的相关著作。欧洲各国成立纪念一战 100 周年顾问委员会，为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做准备。最引人注意的著作是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梦游者》^①，原因在于其内在的政治见解。克拉克在他的书里对德国是一战的发源地和罪魁祸首这一曾经被公认的事实给予了不是绝对的认定，而是有所相对化，甚至于，他否定了 1919 年《凡尔赛条约》第 231 条给德国在一战中所做的定位。同时，他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当时的处境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使得德国读者感到很意外，有的欢迎，有的存疑。但不管怎么样，这本书在德国的销量高达每周 2 万本，全欧洲都在看这本书，全欧洲都在讨论这本书。但如果仔细看克拉克的书，就会发现它的 800 多页只写了战争的开端，没有写战争的全部。它的着重点在于叙述

* 魏格林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历史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

①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梦游者——1914 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原版为：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London: Harper, 2012.

欧洲战前的局面以及欧洲所谓 1914 年的“7 月危机”，即 6 月 28 日斐迪南大公遇刺案发生后所采取的避免战争和发动战争的措施，以及最后走向战争的前前后后。广大读者对这本书的兴趣当然出于作者对大量的历史资料的掌握，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他的叙述方式。虽然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一般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也觉得看起来非常有意思。不过，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另外一个，那就是这本书内在的政治含义。所有的读者，不管是反对者还是赞同者，都会感觉到，克拉克所描写的局面跟欧洲当前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欧洲的读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德国在欧洲扮演什么角色？而德国应该在欧洲扮演什么角色？欧洲在希腊危机还没有到顶点之前已经通过纪念一战在探讨这个问题。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最近也提到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希腊的政策是建立在她对克拉克这本书的理解的基础之上。意大利有评论家说一战是德国第一次给欧洲带来大灾难，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德国又强起来了，而又有可能通过其希腊政策第三次给欧洲带来灾难。^①可见，各国读者对克拉克的书的反应以及各国所进行的纪念活动都是有关一战话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英国共识：现代史上最大的一个错误

2014 年剑桥大学从历史系教授中选拔一位皇家历史教授。选拔是通过投票进行的，结果跟 2009 年一样，又是一位德国史专家。但这一次的专家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就是《梦游者》这本全欧洲正在讨论的书的作者克里斯托弗·克拉克。^②应该说，这本书能够在原来跟德国打过两次大战的英

① <http://www.welt.de/geschichte/article124427367/Wie-sich-Frankreich-des-Ersten-Weltkriegs-bedient.html>,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② Patrick Bahners: *Ein Ritter mit Fremdsprachenkenntnis*. Hurratrioten und Europäer: Weshalb England den Historiker Christopher Clark ehr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Nr. 140, 2015. 6. 20, p. 12.

国出现并且受到这样的重视与承认，是剑桥大学在很不利的政治经济条件之下依然坚持它的学术传统而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影响的一个表现，令人钦佩。据说，2015年英国又要给克拉克增加荣誉。英国国王要晋封他为骑士。^①这是英国能够没有约束地讨论一战，接纳克拉克直接冲击有关一战主流思想的书的一个很突出的表现。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很例外的现象。但仔细分析英国有关一战的公开讨论，就会发现，除了上面提到的学术自由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就是英国人在对一战进行评价之后所达到的社会共识。阿德李安·古格里（Adrian Gregory）这样总结英国人所达到的共识：“通过一个很缓慢的、迟缓的过程，英国人终于否定了这一次战争。并且他们今天还在否定它。民间几乎一致地持这种否定立场。大家认为这场战争是愚蠢的，是悲剧性的，是没有意义的。”^②这个态度肯定是克拉克在英国可以得到承认的一个有利条件。但也并不是说，他的书在英国没有遭到批判，特别是研究军队史的历史学家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们觉得如果减少德国的责任，主张欧洲所有参战国都得面对战争责任，势必会损害英国军队的英雄历史。他们希望能够加强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不要过分突出英国在一战的责任。但也有人认为这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宣传二战来达到。古格里说：“有关一战的记忆是有关二战记忆的对立面。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反面物来对待，那么就更有可能是来神化二战。”^③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曾经在他有关一战的书中写道，一战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个错误。^④ 英国是一战的胜利者之一，在战场上失去自己生

① Patrick Bahners: *Ein Ritter mit Fremdsprachenkenntnis*. Hurratrioten und Europäer: Weshalb England den Historiker Christopher Clark ehr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Nr. 140, 2015. 6. 20, p. 12.

② Adrian Gregory: *The Last Great War. British Society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Introduction.

③ 同上。

④ Niall Ferguson: *The Pity of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8.

命的人，从人口的百分比看，没有比法国少。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对一战持有这样批评的态度，很难做得到。

法国纪念碑：“记忆的环球”

2014年11月11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和德国国防部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参加了所谓“记忆的环球”纪念碑的开幕式。这个纪念碑位于法国北部，它纪念的是在这个地区580000名阵亡士兵。这些士兵来自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刻在石头上的名字，没有按国籍来分，而是按拉丁字母的顺序排列。这是全世界拥有最多人名的纪念碑，^①它的目的在于超越国籍，超越民族主义和历史的对立，承认战争对所有参加者——无论胜利者，还是战败者，都是一场灾难。因此，在开幕式上，各国中学生做了一些士兵的遭遇以及他们的家庭情况报告。组织者试图通过这样的活动，把有关战争的记忆去民族主义化，突出个人的遭遇，缓和记忆上还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这是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历史意识演变的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冷战的不可调和的对立结束，大家都希望能够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矛盾通过互相原谅的方式达成一种新的和解。因为这个和解符合欧盟统一的目标，所以欧洲各国领导层积极支持上述活动。不过，不完全赞成欧盟进一步发展的国家，则并不积极参与这样的活动。据说，英国政府起初不同意出资支持建立“记忆的环球”。直到女王表态，政府才同意提供一部分经费。但是，最终政府首脑也未出席开幕式。^②

即使法国有这样的纪念碑，也不能说明大家都接受其背后的想法。因此，法国总统参加“记忆的环球”开幕式之前的那个上午，在巴黎凯旋门

① <http://www.dw.com/de/denkmal-zum-ersten-weltkrieg-in-frankreich-eingeweiht/a-18057162>, 2015年7月22日。

②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der-erste-weltkrieg/gedenken-an-ersten-weltkrieg-ein-mahnmal-fuer-alle-gefallenen-13260375.html>, 2015年7月22日。

举行了一年一度庆祝法国一战胜利的传统纪念仪式。德国国防部部长没有参加。一战是法国的胜利战争，因集体记忆舍不得这个胜利，所以有人不支持像“记忆的环球”那样的纪念形式。

知识界对将一战的德国罪责进行相对化处理也有不同看法。比如，对克拉克的书众说纷纭。有的认可克拉克所呈现的大量历史资料，但还是强调德国是一战罪魁祸首，批评克拉克过分偏袒德国。^①在老百姓当中有关一战的记忆也不完全符合纪念碑的意图。退伍军人协会的一些成员不接受政府这样的举动。一个老兵说：“我父亲曾在这里参战 11 个月。我怎么能来此纪念他？我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一种背叛。当然德法友谊是重要的……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忘记所有当时牺牲自己生命的人。”^②这些话是 2008 年说的。当时的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提出把纪念一战结束的 11 月 11 日改称纪念德法友谊的一个节日。他的建议一直没有得到实现，但是从 2012 年开始，法国法律上规定 11 月 11 日为纪念法国一切战争死亡者的节日，不仅仅是纪念一战阵亡士兵的节日了。^③

法国为纪念一战做了大量准备，从 2014 年开始一直到 2018 年战争结束 100 周年都有大量活动安排。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奥芬斯塔特 (Nicolas Offenstadt) 是一战 100 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委员。他认为法国还是离不开历来对“伟大战争”的叙述。这个叙述的特点在于过分强调爱国主义，把战争的苦难作为叙述重点，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欧洲需要和

① <http://www.welt.de/geschichte/article124427367/Wie-sich-Frankreich-des-Ersten-Weltkriegs-bedient.html>, 2015 年 7 月 22 日; http://www.lemonde.fr/livres/article/2013/09/26/reinventer-la-grande-guerre_3485282_3260.html, 2015 年 7 月 22 日; http://www.lemonde.fr/livres/article/2013/09/26/14-avant-14_3485283_3260.html#1GgYKa21BQPtX60R.99,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② http://www.deutschlandfunk.de/frankreich-und-der-11-november.795.de.html?dram:article_id=118416,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③ http://www.lemonde.fr/livres/article/2013/09/26/remi-dalissou-l-histoire-du-11-novembre-continue_3485284_3260.html#CoESrL1tfOSkmviK.99, 2015 年 7 月 22 日。

平，再也不要打仗。^① 他同时指出，欧洲其他国家，有的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记忆政治，再也不将一战回忆作为宣扬民族神话的主要由头。很多国家提倡多元叙事，容许从各个层面理解战争的复杂局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提醒大家，不要重复一战的错误。^② 在他 2010 年出版的有关法国记忆政治^③ 的书中，他分析说，法国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一战不在乎，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庞大和苦难的历史事实引起了对一战经验的忘却”^④。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如果注意到各个地方对一战的记忆政治，所设立的纪念碑等，就会发现，一战从来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念对象和法国人集体认同感的一个组成部分。几乎每一个家庭的历史跟一战的历史都紧密相连，所以有必要把一战的遭遇纳入到家庭史里面去。很多一战的战场到现在为止依然留有战争的痕迹，因此有必要把战争的历史跟地方史联系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一战对于法国来说是一个胜利的历史，它是法国军队的一个里程碑，所以一战历史应该写成军队史。也就是说，即使法国再想强调超越民族国家来回忆一战历史，但是它的军队、地方政府和社会舆论还是坚持它历来的民族神话。^⑤

法国史学界就类似的记忆政治持批评态度。因此，2014 年出版的有关一战的书籍特别强调士兵的视角、个人与家庭的遭遇以及知识分子作为战

① <http://www.welt.de/geschichte/article124427367/Wie-sich-Frankreich-des-Ersten-Weltkriegs-bedient.html>,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② <http://www.welt.de/geschichte/article124427367/Wie-sich-Frankreich-des-Ersten-Weltkriegs-bedient.html>,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③ Richard Ned Lebow, Wulf Kansteiner, Claudio Fogu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④ Nicolas Offenstadt: *14 - 18. Aujourd'hui. La Grande Guerre dans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Paris: Odile Jacobs, 2010, p. 2.

⑤ 同上。

争参与者的反映。^① 同时不少学者也在分析法国的记忆政治，强烈要求就关于怎样回忆战争的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②

德国的学术争论：战争责任

在这场纪念活动中，德国人有些尴尬，所以政府没有安排很多纪念活动。加之，在德国的集体记忆中显然二战居首位。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德国人对一战的历史好像没特别注意。跟法国、比利时来比，一战虽然对德国人也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但这个战争的主要战场不在德国，没有像在法国、比利时留下这么多痕迹。同时，由于《凡尔赛条约》对后来德国的发展比战争本身还重要，所以一战是德国 20 世纪苦难历史的开端，但不是其最主要的阶段。^③ 虽然如此，跟法国等很多参战国一样，德国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纪念一战阵亡士兵的纪念碑，并且德国历史学界也没有完全忘记一战的重要性。

德国史学界 20 世纪 60 年代第一次很激烈地讨论一战问题。当时讨论的重点是所谓战争罪责的问题。西德著名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在他 1961 年出版的《德国有做世界强国的意图》^④ 一书中，承认

① Stéphane Audouin-Rouzeau: *Quelle histoire. Un récit de filiation (1914-2014)*. Paris: EHESS/Gallimard/Seuil, 2015; Nicolas Mariot: *Tous unis dans la tranchée? 1914-1918, les intellectuels à l'encontre du peuple*. Paris: Seuil, 2014; Benjamin Gilles: *Lectures de poilus. 1914-1918*. Paris: Edition Autrement, 2013.

② Rémi Dalisson: *Les Guerres et la Mémoire*. Paris: CNRS éditions, 2013; Rémi Dalisson: *11 novembre. Du souvenir à la mémoire*. Paris: Armand Collin, 2013.

③ <http://www.dw.com/de/der-erste-weltkrieg-in-deutschland-vergessen/a-17457890>,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④ Fritz Fischer: *Deutschlands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8*. Düsseldorf: Droste, 2013. (第一版: 1961 年, 修订版: 1964。)

德国要单独担负起一战爆发的责任，说：“德国当时确实希望奥地利跟塞尔维亚打起来。她不仅仅有这样的愿望，同时也积极包庇奥地利，最后，因为她相信自己军事上的优势，所以有意识地跟法国、俄国发生冲突。这说明，当时德意志帝国的领导者对全面战争的爆发负有最大的责任。”^① 费舍尔的这个说法被当时大部分读者理解为德国负有全部责任。因此就引起了德国史学界，甚至于全欧洲史学界一场 20 年不停的争论。费舍尔当时提出的观点跟二战后德国历史学界的共识完全相反。以格哈特·瑞特（Gerhard Ritter）为代表的德国史学界当时认为一战的爆发是悲惨的结果，绝不能要求德国单独担负起责任。一战与二战从领导层的策略设想来讲没有连续性，但费舍尔的根据很多，其中最起作用的是战前德国总理的所谓“9 月计划”和德国在以上提到的“7 月危机”中的表现。今天大部分德国史学家承认费舍尔的贡献。2003 年德国著名历史学教授尤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指出有关一战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支持费舍尔的观点，但是今天的史学界不再对费舍尔提出的问题感兴趣了。德国对战争的罪责问题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再也不能引起有关德国 20 世纪历史研究的注意。^② 可以看出，连尤尔根·科卡都没预测到像克拉克的《梦游者》这样的书会重新提出德国对一战爆发的罪责问题，他更没有料到这个问题是 2014 年全欧盟都在讨论的一个焦点。

克拉克的书在德国一上市，马上就引起了媒体注意。接着，德国政界、知识界就开始讨论，并且跟以上所提到的尤尔根·科卡的预测正相反，讨论

① Fritz Fischer: *Deutschlands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8*. Düsseldorf: Droste, 2013. (第一版: 1961 年, 修订版: 1964。) 另参见 <http://de.wikipedia.org/wiki/Fischer-Kontroverse>,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② Jürgen Kocka: *Entfernung und Einsicht. Weltkriegsforschung im Wandel*. In: AKM Newsletter, Jg. 8 (2004), Nr. 1, pp. 7-11, 电子版为: http://portal.akmilitaergeschichte.de/sites/akm/nlarchiv/NL_22.pdf, 2015 年 7 月 22 日。

的焦点就是德国的罪责问题。德国驻法国、美国、英国等大使馆都组织了跟克拉克的会谈，请当地著名人士跟克拉克讨论他的著作的主要观点。^①同时德国史学界也开始提出自己的观点。其中，最有地位和权威的历史学家对克拉克的“修正主义历史观”^②批评得最为激烈。他们把克拉克的观点跟德国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讨论结合在一起指出，如果回到当时的观点就会引起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③德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界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在想办法遏止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再发生。因此，德国史学界的老一辈对克拉克的书反应特别激烈。

非常有趣的是，对德国与奥匈帝国的战争责任进行相对化处理不是德国人首先提出来的。实际上它是 1919 年参加《凡尔赛条约》谈判的英国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 (David Lloyd George, 1863—1945) 首先提出来的。他在 90 多年前就认为一战爆发不是由德国一个国家引起的，实际上是全欧洲“滑入”了战争。^④除了他之外，还有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南非总理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 (Jan Christian Smuts, 1870—1950)、英国在凡尔赛会议上的代表凌瀚

① 有关克拉克在德国驻英国大使馆见：<http://www.spiegel.de/karriere/ausland/erster-weltkrieg-peter-littger-ueber-das-deutsch-englische-gedenken-a-945005.html>；德国驻法国大使馆见：<http://www.welt.de/geschichte/article124427367/Wie-sich-Frankreich-des-Ersten-Weltkriegs-bedient.html>；德国驻美国大使馆见：http://www.germany.info/Vertretung/usa/de/newsletter/2014/09-Newsletter/DN_ _140915.html，2015 年 7 月 22 日。

② Patrick Bahners: *Geopolitischer Fatalismus überall*.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Nr. 222, 2014. 9. 24, p. N3.

③ 同上。

④ <http://www.zeit.de/2014/03/politisches-buch-erster-weltkrieg>，2015 年 7 月 22 日。参见德尔克·科尔比威特撰写，吴学丽编译：“德国学界：战争的罪责谁来承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 7 月 28 日。<http://www.shekebao.com.cn/shekebao/2012skb/hwdt/u1ai7800.html>，2015 年 7 月 28 日。

桑^①等，都认为如果是德国代表的话，不会在这个条约上面签字。^② 德国议会最后以大多数接受《凡尔赛条约》，但强调指出不能接受条约的 227 至 231 条所包含的有关德国罪责的内容。^③ 加上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样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对条约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并且预测它会给欧洲带来很大的灾难。^④ 这就说明反对《凡尔赛条约》，对它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不能说只是出于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不少有经验的外交人士、学者一直持这样的态度。虽然如此，德国最有权威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尔（Heinrich August Winkler）批评说克拉克的书只能引起德国人的共鸣，因为他强调一战前的欧洲国际关系本身包含一战最后爆发的原因，这样就减轻了德国人的责任。他还说：“谁看不到 1914 年前德国精英拒绝民主与一战爆发的内在联系，谁就会按传统习惯把《凡尔赛条约》当作后来灾难的开始。如果德国只对二战有罪责，而对一战没有，那么这就离从这儿到希特勒上台只是历史的一个事故的说法不远。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修正主义者’敢这样说，但所谓‘克拉克效果’为什么能够起作用，就是因为很多德国人都有肯定自己民族历史的愿望。”^⑤ 根据温克勒尔的观点，如果容许说德国对于一战只负有相对责任，那么，就有可能消灭德国二战结束以来一切反省的积极成果。因此，他对每一本最近在德语地区出版的有关一战的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的书都进行

① 凌瀚桑曾在回忆录中提出他的看法。Harold Nicolson: *Peacemaking 1919*.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33.

② Hans Fenske: *Der Anfang vom Ende des alten Europa*. München: Olzog, 2013, pp. 103–104.

③ 同上, p. 105.

④ <http://www.nytimes.com/2002/12/01/books/we-ll-always-have-paris.html>,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⑤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Und erlöse uns von der Kriegsschuld*. In: DIE ZEIT N° 32/2014, 2014 年 8 月 20 日, 电子版: <http://www.zeit.de/2014/32/erster-weltkrieg-christopher-clark>, 2015 年 7 月 22 日。

了很严格的批评。连像柏林洪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赫弗里德·蒙克勒 (Herfried Muenkler) 这样在媒体上有影响的人士也成为温克勒尔批评的对象。他在 2013 年出版的《大战——世界的局面 1914 至 1918》^① 虽然表面上把一战作为世界战争来分析，但实际上是从德国作为一战中心的角度来写的。应该注意到，蒙克勒是一个政治学教授，他不属于德国历史学界。他写这本厚厚的书，主要是为了从一战的历史经验中学习怎么样避免导致战争的政治错误。因此，他很直接地提出德国在现在的欧洲国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他说：“德国威廉式社会跟当前联邦德国的一部分政治派别一样，都相当天真，不敢正视政治上的自相矛盾。当时跟现在一样，这些人把思想的纯粹、诚恳、好意当作采取正确的政治措施的一把钥匙。同时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从可能的结果着想。一战确实可以理解为一连串的错误判断、错误措施，幻想与出于善意的失误。”^② 蒙克勒认为德国分析一战的历史情况，一般来说，都是历史学家。而英国、美国正相反，大部分研究一战的学者都是以政治学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做分析的。他们对一战的兴趣就在于可以观察到一个国际关系的体制的运作，从中得出这个制度下一次发生冲突时，怎样通过了解它的内在规律去利用它的结论。^③ 如果这样看问题，就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让我们学到这么多东西。它是一本有关一切皆可质疑、皆可挑战的教科书。^④

以上所提到的当前德国政客的天真表现在哪儿？蒙克勒在接受德国《南方报》采访时很直接地回答说：“因为我们德国人历史上背负罪责，所以在外交政策上没有必要，也不容许我们参加。我们宁愿花钱解决欧洲边

① Herfried Muenkler: *Der große Krieg. Die Welt 1914–1918*. Berlin: Rowohlt, 2013.

②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der-erste-weltkrieg/herfried-muenkler-ueber-den-ersten-weltkrieg-zeitraffer-eines-jahrhunderts-12766254.html>, 2015 年 7 月 22 日。

③ Herfried Muenkler: *Der große Krieg. Die Welt 1914–1918*. Berlin: Rowohlt, 2013, p. 779.

④ 同上, p. 776.

缘地区的各种各样问题，而不去插手别国事务。”^① 这就是说，很多国外观察家赞扬德国的反省态度，现在成为欧洲一个不可忽略的难点，同时也提供一个新的机会：告别冲突，机会就在于积极参与统一欧洲、发展欧洲、强化欧洲。像蒙克勒这样的政治学家提出德国在欧洲现有的条件下一定要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来参与很多到现在为止还是地方性的冲突的解决，但德国史学家，一部分政治人物与老百姓害怕迈出这一步。历史学界的老一辈代表了这种害怕情绪，因为他们认为德国 20 世纪的历史让人害怕德国精英阶层会再一次犯像一战、二战这样的错误。而蒙克勒恰恰认为如果德国不正视过去，克服犯罪感所引起的外交方面的无为态度，欧洲边缘地区的很多冲突是没法调和的，就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蒙克勒甚至说，正因为德国是一个有罪恶感的大国，所以欧洲其他国家才能够接受她的大国地位。她如果从一战的经验当中学会如何恰当地担负起这个责任，那将对欧洲和全世界的未来非常有利。^②

东欧的集体记忆：东西分裂

一般来说，东欧对一战的兴趣没有西欧那么大。同样，西欧历史学界对一战东欧战场的兴趣也不大。这种记忆的分裂使无论东欧还是西欧，对一战东欧战场都知之甚少。学者往往把这个现象叫做“被忘却的战线”^③。实际上，这个战线对整个战争起的作用非常大，甚至可以说，其残酷性超

① 根据温克勒尔在以上文章中引的话，见 <http://www.zeit.de/2014/32/erster-weltkrieg-christopher-clark>，2015 年 7 月 22 日。

② Herfried Münkler: *Macht in der Mitte*. Die neuen Aufgaben Deutschlands in Europa. Hamburg: Edition Körber-Stiftung, 2015.

③ 同上，p. 756.

过西方战场，死者数量也超过西方。^① 但因为东欧战场的局面以及一战在东欧的结果很复杂，所以对一战的回忆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东、西之分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东欧不同国家对一战的不同叙述是记忆分裂的另一个层面。可以说，东欧，包括东南欧，有三种不同情况。因为俄国十月革命跟一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沙俄帝国的崩溃也是跟一战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很多原来属于沙俄帝国的地区由于一战和沙俄帝国的崩溃，碰到了可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机会。^② 一战开始时，这些地区的男人参加的军队或者是沙俄帝国的，或者是奥匈帝国的。战争结束的时候，两个帝国不存在了，而他们一下子成了波兰、捷克、乌克兰等新建立国家的国民。因此，战争的开始没有像战争的结束那么重要。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一战的结束往往是这些国家过渡时期的开始，和平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这个过渡时期能不能以成功地建立民族国家为结束，是他们记忆当中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因此，有关一战的回忆是次要的。^③ 这是为什么这些国家有关一战的集体记忆跟俄国不一样。如果说俄国的一战经验产生了一种类型的记忆，那么原来属于沙俄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地区产生了第二种类型的记忆，而东南欧代表第三种类型的回忆。

乌克兰是第二种类型记忆的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一战开始时，乌克兰作为一个单独的政体还不存在。在今天的乌克兰地区当时的居民有一部分属于奥匈帝国，又有一部分属于沙俄帝国。而乌克兰现在所在

① Jay Winter: *Remembering War. The Great War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82.

② Krzysztof Ruchniewicz: *Der "Große Krieg" in Ostmitteleuropa*. In: Felix Hett, Reinhard Krumm (eds.): *Geteilte Erinnerung. Der 1. Weltkrieg in Mittel-und Osteuropa*. Perspektive 2014, pp. 6-8. 电子版为: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d-moe/10874.pdf>, 2015年7月22日, 也见: Herfried Münkler: *Der große Krieg. Die Welt 1914-1918*. Berlin: Rowohlt 2013, pp. 753-758.

③ Herfried Münkler: *Der große Krieg. Die Welt 1914-1918*. Berlin: Rowohlt 2013, p. 7.

的地区当时很快就成为一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到战争结束之时，乌克兰产生了一个要求国家独立的政治运动。从1917年至1921年连续打了四年内战，最后以失败结束。在这个过程中，1918年1月12日乌克兰宣称独立，27日向德国和奥匈帝国要求单独谈判和平协议。因为德、奥想利用乌克兰来遏制十月革命的扩展，所以不仅仅在物资方面支持乌克兰，同时也派军队占领这个地区。不过，德、奥军队1918年年底就离开了乌克兰，使得当地政府没法维持。接着，1918年12月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没有成功。由于这个原因，乌克兰一战的经验是一个失败的经验。^①

东南欧第三种类型的记忆以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为例。它们是一战的胜利者，因此在一战和二战之间很重视对一战的纪念和参加一战的士兵的英雄塑造。^②后来因为属于以苏联为主导的记忆地区，所以降低了一战的重要性。此次纪念一战100周年是重新统一对一战的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机会，并且克拉克的《梦游者》是公开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对象。塞尔维亚对克拉克的观点批评最为激烈。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塞尔维亚当然是一战的一个战场，但是跟一战的爆发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大家都知道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大公遇刺案曾经发生在塞尔维亚的萨拉热窝。奥匈帝国在暗杀发生之后提出了要对塞尔维亚进行紧密的检查。对此，塞尔维亚不合作。因此，奥匈帝国于7月23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政府在48小时内容许奥匈帝国官员进行检查。这个对一战爆发特别重要的事件，最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塞尔维亚政府知道有

① Guido Hausmann: *Die Kultur der Niederlage. Der erste Weltkrieg in der ukrainischen Erinnerung*. http://www.gce.unisg.ch/~media/internet/content/dateien/instituteund-centers/gce/oe_2_4_2014_hausmann.pdf, 2015年7月22日。

② Krzysztof Ruchniewicz: *Der "Große Krieg" in Ostmitteleuropa*. In: Felix Hett, Reinhard Krumm (eds.): *Geteilte Erinnerung. Der 1. Weltkrieg in Mittel-und Osteuropa. Perspektive 2014*, p. 7. 电子版为: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d-moe/10874.pdf>, 2015年7月22日。

人准备对斐迪南大公行刺，但是没有阻止预谋者，只是提醒奥匈政府。^①因此可以说，因为塞尔维亚政府没有采取措施阻止刺杀的发生，所以对一战的爆发有一定的责任。克拉克在他的书中援引当时塞尔维亚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斯巴莱考维克（Spalajkovic）的话来说明塞尔维亚政客当中最后占主导的观点：“我认为这（即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译者加的话）就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利用这个事情达到所有塞尔维亚人的统一。因此我们应该欢迎奥匈帝国来攻击我们。”^②但今天的塞尔维亚政府和塞尔维亚史学界的一部分人士认为克拉克这样提出他的观点是出于反对塞尔维亚的阴谋。塞尔维亚总统因为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坚持跟俄罗斯合作，所以感觉到欧盟对它的巨大压力。^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克拉克的书指出塞尔维亚政府对一战爆发负有比以前想象的更大的责任，损害了塞尔维亚在国际上的声誉。但谁想塞尔维亚政府会尽量想办法去驱散克拉克的书造成的不良影响，谁就会吃惊地看到当时的暗杀者最近怎么样被欢庆。^④同时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强调指出，一战在遇刺发生之前一年已由奥匈政府准备好了。因此，塞尔维亚不可能像克拉克写的那样因为知道如果跟奥地利打仗，俄国会支持她而积极参与战争的爆发。塞尔维亚的主流史学界认为克拉克的书是西方通过改写历史来攻击塞尔维亚的一场宣传运动，企图把塞尔维亚妖魔化，目的在于通过把一战的责任加在俄国和塞尔维亚的身上

① Herfried Münkler: *Der große Krieg. Die Welt 1914–1918*. Berlin: Rowohlt 2013, pp. 28–40.

② 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London: Penguin 2013, p. 468.

③ <http://derstandard.at/2000002014214/Vucic-wittert-westliche-Verschwoerung>, 2015年7月22日。

④ <http://www.sueddeutsche.de/politik/jahre-erster-weltkrieg-geschichtsbuch-treibt-serbiens-elite-um-1.1869422>, 2015年7月22日。

而把欧盟的成员国进一步团结起来。^① 这个解释很有趣，因为它好像是跟克拉克分析“7月危机”当中的塞尔维亚有很多相似之处。克拉克说：“帕希奇一直认为塞尔维亚人的统一不可能在和平条件下完成，只有通过一次大战和以大国来支持才能够最后得到实现。这当然不是一个具体的计划。这个想法是一种有关未来的幻想，并且这个幻想看起来一下子碰到了可以实现的机会。到了战争真正开始，当时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但爆发战争的道路已经可以看得到了。对塞尔维亚来说，这已经不是回头的时候了。”^②

东欧的第三种类型的集体记忆以俄国为例。如果看俄国讨论一战的情况，可以很快发现，虽然一战的历史跟俄国十月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一战在俄国集体记忆中到现在为止不占有重要地位，有关一战的集体记忆完全被十月革命之后的内战与后来的二战记忆所掩盖。因此，跟其他参战国不一样，到现在为止俄国还没有公布有关一战的档案资料^③，也没有以自己有关一战的叙述来参与对一战做评价的国际竞争。到2012年以前，俄国没有一个专门纪念一战牺牲的士兵的纪念日。只是从2012年开始，政府才把每年的8月1日定为纪念一战阵亡士兵的节日。^④ 俄国历史学家伊莲娜·辛雅斯卡亚（Jelena Sinjawskaia）解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俄国的革命动荡，并且引导了沙俄帝国的崩溃和紧接而来的内战。到今天为止，虽然俄国属于一战胜利国的联盟，这个战争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没成功的，甚至可以说失败的一场战争。没有成功的战争在公共记忆中没有

① <http://www.sueddeutsche.de/politik/jahre-erster-weltkrieg-geschichtsbuch-treibt-serbiens-elite-um-1.1869422>, 2015年7月22日。

② 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London: Penguin 2013, p. 469.

③ 同上, pp. xxiii-xxiv.

④ http://www.deutschlandfunk.de/100-jahre-erster-weltkrieg-russlands-vergessener-krieg-795.de.html?dram:article_id=280611, 2015年7月22日。

空间。因此，我们几乎没有一个可纪念的一战英雄。”^①不过，俄国的历史学界开始讨论对一战的评价问题。比较主流的学者从一战的经验当中所得出的教训主要是强调俄国必须是统一的，应该有一个很强的领导核心，不管俄国是统一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下，如果是统一的，就是战无不胜的。非主流的学者则认为自从十月革命发生之后，俄国社会一直是分裂的。这个分裂是今天回忆一战的最大障碍。但如果俄国社会要实现统一的话，不可避免地要在怎么样回忆一战和怎么样回忆十月革命的问题上确立共识。^②他们显然认为，回忆一战与十月革命是统一的前提，而主流学者认为统一是回忆的前提。据报道，最近在俄罗斯出版了不少其他国家作者写的有关一战的书，组织了很多国际研讨会来讨论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内在联系。^③

结论：为什么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世界性战争

克拉克是一个澳大利亚人。记者曾经问过他，他对一战的兴趣是否跟他是澳大利亚人有关系。克拉克回答说：“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来说，一战是一个初上火线的事件，因为这是澳大利亚第一次作为独立的国家参战。虽然当时还是英国的伙伴，但这一次参加是属于自己的决策。如果跟其他参战国来比，澳大利亚的死亡率当然特别高。因此，在两战之间和二战之后，记忆文化庞大起来了。我在上学期间参加过很多纪念大会，每次演出都有‘归营号’歌，听过有关战争爆发的很多演讲，听他们讲战

① http://www.deutschlandfunk.de/100-jahre-erster-weltkrieg-russlands-vergessener-krieg-795.de.html?dram:article_id=280611, 2015年7月22日。

② 同上。

③ <http://www.nzz.ch/feuilleton/verloren-und-vergessen-1.18321629>, 2015年7月22日。

士的英勇豪气、他们的光荣……这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① 克拉克这样解释他对一战的兴趣，但没有提到他作为澳大利亚人对一战的观点是否跟英国人不一样。有趣的是，英国还有一个来自大英帝国所属国家的历史学家在写有关一战的书。她就是麦克米伦教授（Margaret MacMillan），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已经写过不少有关一战的书。她原来是加拿大人。记者问她怎么看英国纪念一战的活动，她回答说：“作为加拿大人，我觉得所有的纪念活动有一点小心眼儿的样子。在英国，纪念活动或多或少也涉及帝国所属国家，但不太多。你想想吧，帝国对战争贡献那么大，有 100 万印度人，60 万加拿大人，33 万澳大利亚人参军，加上大量的经费与物质方面的支持。我希望纪念活动也要涉及这一点。”但反过来讲，因为麦克米伦教授是加拿大人，所以她觉得做一战研究可以做得更自由一点。“我没有必要来磨斧。如果作为英国人来写一战爆发，我可能得对英国当时所作所为作出有偏向的表态；如果作为德国人来写，或多或少地要攻击德国，或者为德国包庇。但作为加拿大人，大家都会认为我是一个说话说得很直接的人。所以我怎么说，都无所谓。”^② 两个学者解释他们国家参与战争的经验与战后对此产生的记忆文化给我们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欧洲人，不管他们本国有什么样的有关一战的记忆文化，都把世界大战当作欧洲战争来回忆、讨论、解释。对他们来说，这完完全全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解决欧洲问题的战争。同时他们的记忆以今天所存在的民族国家为出发点。这样他们把战争的两个不可忽略的层面给忘记了，即战争

① http://www.deutschlandfunk.de/interview-mit-christopher-clark-dieser-krieg-hat-das-ganze-724.de.html?dram:article_id=275077，2015 年 7 月 22 日。

②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4/jul/25/margaret-macmillan-just-dont-ask-me-who-started-war>，2015 年 7 月 22 日。

的世界性与战争跟四大帝国的崩溃的关系^①。实际上英国、法国、德国有关一战的纪念活动、集体记忆和学术讨论对沙俄、奥匈与奥斯曼帝国都不太注意，并且东欧战场基本上也引不起西欧的兴趣。但东欧战场是四个大帝国的互相对抗，最后都以崩溃告终的战场，同时是民族国家的概念与组织形式往东欧扩展的所在地。西欧战场是现在欧盟的核心国家之间的较量。东欧战场是帝国崩溃，新的民族国家产生的战场。如果这样子看问题，很快就可以发现，冷战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一战后的局面。这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一战兴趣那么大的原因所在。如果说一个地区需要以处理好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来把自己组织起来的话，那么今天的欧洲像一战前一样没有一个中心。冷战结束之前，欧洲以美苏的对立被控制，因此不需要本地区的一个国家来起中心的作用。冷战结束之后，苏联崩溃，使得一战以后兴起的、很长时间以来在苏联的指导之下没有独立的国家，重新独立起来了。像一战之后，西欧的民主民族国家设法把自己的治理方式和经济体制出口到东欧。因为忘记了一战的经验，所以碰到了看起来不可预测的，但实际上根据一战的经验可以预测得到的困难与障碍。因为集体记忆与学术讨论基本上忽略了东欧战场与西欧战场的区别，没有注意到一战引起帝国崩溃的重要性，所以失去了从一战的经验当中得出教训来认识 and 解决当前的问题。

一战的世界性应该进一步去探讨。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一战不仅仅引起了沙俄、奥匈、奥斯曼以及德意志帝国的崩溃，而且企图把东欧和中欧的帝国治理法改成民族国家治理法，而且又是大英帝国崩溃的第一步。它就是一战很多自相矛盾现象当中很突出的一个。虽然英国显然是战争的胜利国之一，但在战争结束之时，它的世界性强国地位没有像战前那么不

^① 蒙克勒在他的书里面提到帝国的崩溃作为一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见第 759~776 页），也尽量想办法把一战的历史写成世界战争的历史，但实际上他的书以德国为中心来探讨欧洲的局面。因此，这本书的名字，即《大战——世界的局面 1914 至 1918》，不完全符合这本书的内容。

可动摇。其中需要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大英帝国所属国参与战争的形式与他们把自己作为独立国家放在世界的范围之内。但也要注意一战引导的近、中东形势的改变以及新国家的产生。这等于是说，一战不仅仅改变了欧洲的全貌，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其中在欧洲集体记忆当中最被忘记的帝国的崩溃又是重要的一个因素。从这个意义来讲，虽然欧洲集体记忆中的一战是欧洲战争，但是如果看到它对全世界的影响，就应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确实是世界性战争。欧洲回忆一战一定要学会怎样创造超越民族国家、超越东西两个战场，而又内在联结的一战叙述，同时也要学习怎样去理解一战的世界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中国现代化进程

朱嘉明*

2014年，世界很多地方用各种方式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2014年7月3日至5日，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召开的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影响”的学术研讨会，充分体现了国际性、开放性和学术性。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旁听者约100人聚集于此，回顾和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20世纪前半叶及后来走向的深刻和持续影响。此次研讨会对历史事件影响的研究有三种模式：其一，用新的思想架构或理论范式重新分析、解读一战前后的历史；其二，发掘和探讨一战改变中国历史格局和走向的历史逻辑；其三，以该事件史实为重心，补充新的史料。

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上，有30位学者发表论文。本书即以会议论文为基础，择选23篇，集结而成。

为什么要召开这样的研讨会？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罗曼诺夫的沙皇俄国、哈布斯堡的奥匈帝国、霍亨索伦的普鲁士帝国终结，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包括埃及、叙利亚、土耳其、印度在内的民族建国和民族革命席

* 经济学家，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卷欧亚大陆。这种迅速改变的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对中国当代历史的进程和选择影响甚大。然而，长期以来，中外学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当代中国历史影响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且主要集中在北洋政府参战的决策、赴欧参战的十余万中国劳工的历史地位、《凡尔赛条约》和五四运动关系、二十一条和日本占领山东、一战期间的中国经济发展等具体课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当代中国历史影响远非如此。如果说，辛亥革命解决的是结束一个旧时代，那么，几年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是造成中国向现代主权国家演变、中国共产党崛起、中国革命模式改变、中日战争渊源、中国传统社会解构的重要原因。

此次研讨会集中探讨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四个方面的影响：

(1) 政治影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立即组织数量可观的在俄华工参加保卫新政权的战争，在华工中培养送往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十月革命的干部；而且在留俄华工联合会基础上成立了俄共中国党员组织局。与此同时，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通过区别于列强的对华政策，满足了迅速兴起的民族主义诉求，获得了中国知识精英的好感，直接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进而影响和推动孙中山实行“新三民主义”。中国走上了与印度和土耳其完全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得以成长壮大，最终成为改变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因素。

(2) 思想和文化影响。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却没有在巴黎和会上得到公平对待，引发了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大量西方思想文化元素进入中国，特别是共产主义左倾思潮得以传播。自此，中国文化体系断裂，与中国文化体系紧密联系的知识分子的组成和功能，几乎是同步变动，中国思想界和知识分子发生分化和分裂。

(3) 国际关系影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中国对于国际事务建立了

主动反应方式，开始主动调整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选择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中国的方式与世界“融合”，迅速成长为现代主权国家。从此，离开世界的大背景，就不足以，甚至几乎不能解释中国国内的历史演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亚太地区政治版图，日本成为最大受益国。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的机会，先攫取青岛，进而是山东，奠定了后来20世纪30年代全面侵华战争的基础。中日战争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

(4) 经济影响。因为西方国家陷入战争而无暇顾及在华经济利益，中国民族资本获得较大发展空间，改变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主导中国的经济发展轨迹的局面。但是，因为一战影响了世界货币体系的变迁，美国成为兼工业、金融、贸易和科学为一体的强国，终究对中国经济继续产生影响，加深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存程度。

会议的论文、发言和讨论，涉及问题广泛：北洋政府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应；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贡献；巴黎和会和中国现代外交奠定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及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思想界的冲击，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苏维埃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德战争和日本攫取山东；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主要历史人物，等等。

任何一次关于历史问题的学术讨论会，追求的不是某种结论，而是探讨历史的逻辑以及对历史史料的拓展和重新解读。1914年的中国，距离甲午战争20年，戊戌变法16年，义和团运动14年，而距离武昌起义不过3年，北洋政府的建立不过2年左右的时间。北洋政府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从“中立国”到“协约国”的转变，并成为“战胜国”，绝非易事。在当时，中国的精英骄傲过、兴奋过，也失望过，但是却无法预见到这场以欧洲为主的战争，且起因与中国完全无关的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最

终超过了发生在中国境内的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中国全方位地纳入了世界体系，那种纯粹的中国本土“内生变量”开始急剧弱化，于是，中国偏离了自“洋务运动”以来的现代化轨迹，各式各样的“革命”主导了历史走向。几乎所有改变20世纪中国的思想、政治派别、领袖人物都是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的。所以，在历史面前除了谦卑，还需要有耐心。很多历史脉络的清晰化，需要经过两三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此次研讨会选址维也纳大学校园之内，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意义。维也纳作为历史上奥匈帝国的首都，与一战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奥地利，或者奥匈帝国无疑是一战的主要推手，那场“吞噬欧洲和世界的大火，就是在那里点燃，然后往四面八方扩散”。^① 成立于1365年的维也纳大学，长期秉承“自由研究和以研究为基础的教育”（Freedom of Research and Research-Based Education）信仰，是世界大战的见证者，在相关历史研究方面有不可替代的地位。100年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聚集于此举办学术论坛，深入回顾和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20世纪前半叶及后来走向的深刻和持续影响，无疑是超越时空的一次学术思想聚会。

一个好的会议，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课题，此次会议希望为一战和中国的相关研究开辟更广阔空间，期待更丰富的史料和更扎实的论证涌现。一个好的会议，需要经历时间的验证，希望时间证明这个会议和这本书的历史及学术价值。

2015年10月5日

^① 乔福瑞·瓦夫罗著：《哈布斯堡的灭亡》，台湾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4年，第14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之大转变 / 徐国琦 / 1

WWI and China's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 Xu Guo Qi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现代性 / 丘为君 / 27

WWI and China's Modernity / Eugene W. Chiu

北京政府筹备参加欧战和会研究 / 罗毅、金光耀 / 39

The Prepara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Circles for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 Luo Yi & Jin Guang Yao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训令问题研究 / 唐启华 / 67

Studying the Government Instructions for the Chinese Delegation to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 Tang Chi-hua

为什么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具有重要作用 / Daniel Marc Segesser / 81

Why (not only) China Matters in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 I / Daniel Marc Segesser

一战与“新儒家”的源起：以“科玄之争”为中心 / 雷颐 / 107

The Rise of "New Confucianism" and World War I: A Close Look Back at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 Lei Yi

一战前后“日本式自由主义”与“俄国式社会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 秦晖 / 125

The Impacts of Japanese Liberalism and Russian Socialism o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WWI / Qin Hui

中共建党历史背景再探讨——兼析李大钊等人对一战与俄国革命认识的演变 / 章百家 / 169

Rethink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An Analysis of Li Dazhao's Changing Views on World War I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 Zhang Bai Jia

天演与自由——试论严复自由主义思想中的难局 / 王远义 / 189

Evolution and Liberalism: Yen Fu's Criticism in WWI and a Trend of Thought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Wang Yuan Yi

民初五四运动时代“赛先生”的根源、性质及后续转折 / 徐振国 / 223

The Source, Nature and Limitations of Mr. Science: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Science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 Hsu Chen-kuo

民本主义与近代日本国家构想——以吉野作造对山东问题的立场为中心 / 朱坤容 / 259

The Japa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Imperialist Expansion: The Shandong Question fro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erspective / Zhu Kun Rong

一战爆发后中国之中立——以日本对德宣战前为主的考察 / 侯中军 / 279

The Neutrality Choice of China at the Early State of WWI: An Investigation Focused on Japan's Declaration of War on Germany / Hou Zhong Jun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方战败的原因与俄国“土改” / 金雁 / 307

The Reason of Russia's Defeat During WWI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Land Reform / Jin Yan

中国财政与一战纾困 (1895—1918): 庚子赔款、外债和国内公债 / 张志云 / 327

World War I and China's Indemnities and Foreign Loans / Chang Chi Yun

新契机与新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亚洲协会”的中国评论 / 吴翎君 / 349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During WWI: The Case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 Wu Lin-chun

“二十一条要求”和中日关系 / 川岛真 / 367

The Japanese Twenty-One Demand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 Kawashima Shin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资本品短缺、货币紧缩与总产出下降 / 刘巍 / 389

Shortage of Capital Goods, Monetary Squeeze and Decrease of China's Aggregate Supply (1914-1918) / Liu Wei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北洋政府时期经济的影响 / 朱嘉明 / 409

The Impact of WWI on China's Economy During Beiyang Government / Zhu Jia Ming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国华工：战争的另类受害者 /

Olga V. Alexeeva / 451

Chinese Workers in Russia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Another Kind of Victims / Olga V. Alexeeva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华工：一段被忽视的插曲，中国外交政策与现代劳工史的演变 / Paul J Bailey / 477

Chinese Contract Workers in WWI France: An Overlooked Episode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of Modern Chinese Labour History / Paul J Bailey

一战期间中国对德奥船舰的处置 / 王文隆 / 495

China's Seizure of War Booty Ships in WWI / Wang Wen Long

青岛之役（1914年9月2日—1914年11月7日）回顾 / 王玉麒 / 519

Qingdao Battle (2. 9. 1914-7. 11. 1914) / Wang Yue-che

一战对中国妇女运动国际化的影响 / Astrid Lipinsky / 529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Women's Activism in China and the Impact of WWI / Astrid Lipinsky

附录 会议议程 / 543

Appendix Conference Program

人名索引 / 547

Name Index

后记 / 559

Postscript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之大转变

徐国琦*

国际学术界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可谓卷帙浩繁，但有关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对一战的贡献方面却很少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本文将集中讨论以下三个议题：大战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在大战中的作用，以及中国人如何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建立一段共有的历史。

一、大战与大机遇

历史学家詹姆斯·乔尔（James Joll，1918—1994）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①这个论点也适用于中国。广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时间上恰逢中国国内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旧的儒家文明开始崩溃，中国力争成为民族国家，并寻求与西方世界的平等关系。战争预示着既有国际体系的崩溃，以及新世界秩序可能来临，这个明显的趋势正迎合了中国要改变其国际地位的期望和想象。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打造中国社会、政治、外交关系，以及民众对身为

* 香港大学教授。

① James Jol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1984, 1.

中国人的认知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是开启中国社会和政治精英的想象与激情的第一个国际大事件。中国人对于世界的看法的改变，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推动力，都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设立了舞台，尽管有人也许认为战争似乎对中国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虽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频频败于西方列强手下，但是只有1894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才真正促使中国人开始认真思考他们的命运以及中国文明的价值。这一新的现实，标志着19、20世纪之交中国人在对世界事务的态度上所发生的深刻乃至革命性的转变。不论中国的精英们对中国传统及文明的态度如何，他们都一致认为中国若要生存，必须做出改革。在20世纪初，以平等身份加入全世界民族国家大家庭甚至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着迷般的追求。学者可以从任何角度以任何方式来书写中国历史，但是这种万众一心的执着，确确实实是了解现代中国的一把钥匙。要求确立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需要从根本上界定中国对自身、对世界，以及外交关系和国家认同的认知。从某种程度上，大战为中国人提供了第一个举足轻重的动力和机遇，让中国人把一致愿望变成反映他们对中国与世界重大外交政策上的新思维的倡议。如果说1894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为中国其后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日本。日本从来没有忘记德国在1895年迫使日本放弃在中国的那些战争的所作所为。日本一直等待着向德国报仇的机会，而大战的爆发恰好提供了这个机会。

在1895年至1919年间，中国人饱受政治动乱、经济衰败和社会不安的煎熬，但这也是一个充满兴奋、希望、高度期望、乐观和新梦想的时期，可与战国时代相比拟，即各种不同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在一个政权分立的时代蓬勃兴起；也可以与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所描述的欧洲革命时期相比拟：“这是最好的时代，也

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昧的时代。”^① 各种思想意识、政治理论的冲突，以及对于国家认同的不同认知，为中国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学术创造力提供了强烈刺激，激起了人们要求变革的坚强决心。1912年，中国摆脱长久以来的王朝统治而成为共和国，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政策的主导力量，民族主义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认同。1911年的辛亥革命有一个特点很少被学者们所提起，那就是当这一革命以摧毁旧中国为目标的时候，它也意味着要挑战甚至摧毁既有世界秩序的正当性。虽然革命并未达成其全部目标，但是它所指出的方向将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发展。我们可以说，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已成为国际体系内的“革命国家”，成为一个决心动摇现存国际秩序并重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国家。撇开所有的缺陷不计，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中国的更新和加入国际社会打开了局面。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出现同中国社会公共舆论的兴起有直接的联系。从19、20世纪之交起，可以明显地看到公共舆论在外交事务上的影响愈来愈重要。中国精英们借由报纸、杂志、传单、演讲以及其他种种媒体论坛，向同胞们宣扬他们的意见、理念和要求。由于广泛接触到有关国内外事务的新信息，一些中国人开始对外交政策显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忱，他们成为可以被称为真正的“外交政策公共群体”的一群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报纸、杂志、出版社和新式教育，在中国人中为新的观念意识、乃至新的历史概念的形成，找到了在欧洲发生的这场大战这样一个精神食粮和原动力。新型政治理念（民族主义而非儒家思想，民族国家取代文化主义），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留学生归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活跃（而非旧式士绅和传统官僚），公共领域和现代印刷媒介的兴起，以及最重要的，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秩序的变更，所有这一切全都将中国推向痛苦但又无法

^① Charles Dickens: *A Tale of Two Cities* (《双城记》),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

避免的自我更新之路。有着广泛基础的公共舆论和社会、知识各界，在打造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方向之中有史以来第一次发挥了重大作用。全国各地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全都沉浸在对国际事务的关注中，并且要求，甚至主动提出新的外交政策，目的在于国家的更新，以及为以平等身份进入世界舞台做准备。重要的是我们也应当记住，作为外交政策公共群体中的部分，中国的劳动者阶层也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制定。借用历史学者托马斯·贝利（Thomas Bailey）的话，中国的“市井小民”开始接手外交事务^①，他们的武器是拒绝购买外国商品或在其受雇的外国公司开展罢工活动。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中国，广大的精英与非精英阶层参与外交政策制定的条件已经成熟。不论中国的外交政策公众群体多么幼稚，它的存在大大影响了中国政府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持的态度和政策。战争期间，公共舆论的交流非常普遍，有时成为社会精英和政府所共同参与的活动。外交政策公共群体的出现使得像梁启超（1873—1929）、陈独秀（1879—1942）等意见领袖成为套用 C. 莱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 1916—1962）的著名词语所说的全国性的“权力精英”（Power Elite）^②。这些意见领袖同政府官员一道，为中国对欧战的响应定下基调和步骤，并密切关注大战的进展。现代中国史上从来没有像这段时期一样，公共舆论如此高涨，社会和知识界在打造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方向中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同时又激励着中国人对国家认同的追求。此前中国人也从来没有对国际事务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兴趣，更不用说以恢复国家主权为目的，为以平等地位进入国际舞台而主动提出新的外交政策。不幸的是，大战期间，中国在外交关系上受到列强因循惯例和旧有的对待，所有那些激动、活力和热情便统统消失了。

① Thomas Bailey: *The Man in the Street*,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②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随着外交政策公共群体和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出现，中国的外交政策也相应作出根本性的调整。人们惯常认为中国没有能力从事有效的外交，或缺乏改变其地位的动机。其实人们似乎忘了，当强大的列强通常依赖非外交手段的时候，弱小国家则特别注重外交手段，因为这或许是促进或保护其国家利益的唯一途径，有些时候是出于弱小而非强大才更能促成杰出的外交表现。拿破仑战败之后，塔列朗（Charles - Maurice de Talleyrand, 1754—1838）的法国就是最佳实例。拜塔列朗老练的外交折冲之赐，新败的法国不仅保住了其领土的完整，更重要的是，甚至还被允许加入世界头等大国之列。当欧洲大战爆发时，如同罗伯特·沃尔（Robert Wohl）在《1914年的一代》中所言，这时的中国人在欧洲正在挣扎求存的国家中显然是一股新的力量。他们同欧洲人一道，怀有对于命运、危机以及责任的共同意识。可是，和欧洲的那一代人不同，中国精英不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流浪者”，他们决心从旧中国之中打造出一个新中国。他们向“旧”权威——旧文化、旧传统和旧认同——发出文化意义上的宣战。他们集体扮演文化和政治变革的先锋，发动全面性的大变革。对这些中国人而言，中国不是“废墟”，而是实验场、希望之地和产生新的自我意识的沃土。认为中国与基本上是发生在欧洲战争毫不相干的传统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有德国、英国等许多国家在其中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势必会被以某种方式卷入这场战争。因此对这个国家而言，采取主动才是上策，故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认识到会不自主地卷入战争的危险，因为交战国家全都在中国领土上占有势力范围。不论中国的意向如何，德国在山东省内的势力范围必将成为战场。更进一步说，随着旧有国际体系的瓦解，中国将很容易受到日本欺负。毕竟，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宣布，“日本必须把握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亚洲建立自己的权力和利益”。^①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决策者普

^① Ikuhiko Hata: “Continental Expansion, 1905–1941”, in John W. Ha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Cambridge, Brita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6: 279.

遍将其视为日本在中国重建民族荣耀的大好时机。

尽管存在危险，但是一些中国精英坚持认为欧战提供了不容错失的机会。战争将改变国际体系，允许中国加入国际社会。中国或许甚至可以在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中注入自己的思想。受此影响，中国总统袁世凯 1914 年 8 月告诉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 1852—1925），中国愿意提供五万人的部队与英军联手夺回青岛——即自 1898 年起就被德国所控制的中国领土。中国当然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单独攻打德国，尤其是日本正虎视眈眈觊觎这一地区，中国需要有个盟国支持。当时朱尔典甚至都没有和法国或俄罗斯使节商量便立即拒绝了 this 提议，很显然他认定不需要中方的合作。^①但是，初试受挫并没有阻止中国政府再次的努力，尤其是在 1915 年初接到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之后。1915 年 1 月 1 日，日本已经从德国手中抢下了对山东的控制权，它又不顾外交惯例，通过其驻华公使直接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日本的要求分五大项、共二十一条。这些要求极其苛刻，以至于总统顾问莫里循（George E. Morrison, 1862—1920）^②称它们“比一个胜利者向被他击败的敌人提出的许多条件还要糟”。^③显然，日本打算趁欧洲列强忙于欧洲战事之机，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庸。如果说日本在 1895 年击败中国导致中国产生国家认同危机，那么它在 1915 年提出的《二十一条》，则不仅激发起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也促成中国认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作出反应的首要明确目标：参加战后和平会议。^④

① Morrison to Mrs. Moberly Bell, May 8, 1916; Morrison to L. G. Fraser, Beijing, October 12, 1916; Lo Hui - Min,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2: 515-516, 559; 朱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3：131-136。

② 莫里循曾任伦敦《泰晤士报》（TIMES）驻华记者。

③ Cyril Pearl: *Morrison of Peking*,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67, 307. 中译本：西里尔·柏尔：《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年。

④ Stephen G. Graft: “Angling for an Invitation to Paris: China’s Entry into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Review* 16, No. 1 (1994).

虽然中国早先表示过有意参战，但是只有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后政府才集中起足够的力量，用行动来实现其几乎不可遏止的出席战后和平会议的愿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北京政府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公共群体立志将中国的命运寄托于战后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力求获得国际社会的善意支持，以赢回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失去的尊严、主权和声誉。到了1915年，政府关于出席战后和平会议的新目标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精英的普遍支持。现在的挑战是如何赢得出席会议的席位。

在战后和平会议要赢得一席之地，最好的方法当然是直接参战。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威胁和死对头，那么为什么中国要加入日本所在的同一个战争阵营呢？这是出于战略的考虑——中国必须站在战胜国一方才能出席战后和平会议，才能以最有利的地位代表中国利益。中国人一心要在世界建立起自己的国际地位，这个执着追求是了解这一看来自相矛盾的举措的关键。从这个意义来讲，所谓中国对德国“宣战”是假的，因为两国根本没有交战，德国也不是中国心目中的敌人。德国在中国的整体战略中可以说成为了一个牺牲品——抑或是一个媒介。德国事实上是一个伪装了的朋友，因为它充当了帮助中国进入世界舞台的跳板。主要出于日本的反对，中国直到1917年8月14日才对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有趣的是，中国宣战的日子，正是义和团运动期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18周年纪念日。这种巧合尤其令人惊诧，因为德国在八国联军远征中扮演了领头角色。

二、西线战场陌生客：大战中的华工

为了把中国的命运和协约国的战争目标联系在一起，中国变得富于创意和想象力。派遣劳工来代替士兵是其中绝妙的一步。早在1915年，当中国是否能正式参战仍属未定之数时，中国为了同协约国的战争事业联系在一起制订出了一个以工代兵的策略。这一策略的首创者是中国人而非协约

国。派遣劳工支持协约国作战的构想出自于当时一位很有影响又有权势的政治家梁士诒（1869—1933），他将其称之为“以工代兵”策略。^① 中国决定派遣“劳工以代替士兵”既是基于权宜之计，也是出于深远的战略考虑。这项前所未有的举措是年轻的中华民国前瞻政策的结果。许多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把“以工代兵”策略同他们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愿景，以及以平等身份跻身国际社会的目标直接联系在一起。打从一开始，中国精英，不论是政府官员、独立思想家或教育家，都从深远的角度来看待派遣华工赴欧的构想。首先，劳工是使中国以平等身份加入国际社会的大计划之决定性而又顺理成章的组成部分。人们认为，华工在法国与西方人并肩工作，可以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建立起关键性的联系，并且随时提醒全世界中国的“以工代兵”方案与大战的战略关联性。了解中国对欧战的兴趣之所以如此强烈的关键在于，中国人可以借此在国内推动国际化，并在国外重新打造国家新的形象。

到了1915年夏天，即欧战进入第二个年头，能否获得新的人力资源成为法国取得战争胜负的关键。法国政府意识到它的人力资源可能很快就将耗尽，因为它根本没有足够的男丁替补战场上的阵亡者和伤员。法国因此立刻接受中国的提议，于1915年底开始招募华工。起初，英国并不怎么愿意接受中国的帮助。1916年夏，英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英国明显需要外援，哪怕是来自中国这样的国家。1916年7月24日，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在英国下议院就寻求劳力资源发表的讲话中指出，英国应该雇用华工。“为了保证战争继续下去，我在‘中国人’这个词面前是不会退缩的。现在是我们最不应该顾及人们偏见的时候。”^② 为了支持英国驻法部队的需要，从1916年夏天起，英国政府也跟法国人所

① 凤岗及其弟子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1：310。

② 英国议会辩论（British Parliamentary Debates），*Commons*（84）（《下议院》）（July 10-31）：1379。

做的一样，开始招募华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4万名华工（大多数是文盲农民）前往欧洲，其中英国雇用了约10万人，其余由法国人雇用。这些劳工由法国和英国政府招募，以协助两国在大战中对抗德国；后来，美国参战，美国也同样利用了这一人力资源，向法国政府借用了约1万名华工。南非、印度、越南和其他许多国家都在战时派工人前往法国支持英国与法国。他们前来是因为他们来自殖民地国家，必须响应宗主国的召唤。但中国不是任何国家的殖民地，却派出数量最多的劳力，而且华工在欧洲工作的时间也最长。^①华工都是自愿前往，他们的贡献也最为卓著。中国人是这场战事中的重要成员。对英国政府而言，劳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士兵履行劳动性工作使其可以去战斗”，以及“协助服务性机构和部门执行其任务”^②。基督教青年会（YMCA）一份文件指出，华工的工作如同战壕里的士兵一样举足轻重，因为在现代战争中体力劳动也是战争机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们包括修筑公路、兴建铁路、清理营房和机场、装卸补给品，以及在军火工厂工作。^③法国将军福煦（Ferdinand Foch, 1851—1929）称赞华人是“第一流的工人，可以培训成优秀的军人，在现代炮火下堪为楷模”。^④那些在大战期间在欧洲战壕、工厂和港口工作的华人，在受雇到法国之前，大多连自己的村庄都没踏出过。现在他们来到欧洲，所谓西方文明的中

① 印度向法国派出5万劳工，支持英国战争。Gordon Corrigan: *Sepoys in the Trenches: The Indian Corps on the Western Front, 1914-1915*, Kent, England: Spellmount, 1999.

② Controller of Labour to the Quartermaster General, Report of Labour with the BEF during the war, November 14, 1919, Appendix C: Notes for Guidance of Officers of Labour Corps in France, September 1918, National Archives, Kew, United Kingdom, WO 107/37, 4.

③ G. H. Cole: "With the Chinese in France," Kautz Family YMCA Archiv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Libraries, Minneapolis, Minnesota (hereafter quoted as YMCA Archives), box 204, folder: Chinese laborers in France reports, 1918-1919.

④ 福煦将军给首相的秘密报告, August 11, 1917, Service Historique de l' Armée de Terre, Château de Vincennes, 16N 2450/GQG/6498.

心。但是文明的西方已深陷在可怕的战乱中，它无法炫耀其和平时期的所有的文化、学术或政治盛况，事实上它所暴露的只有其最丑陋、最野蛮的一面：彻底的相互毁灭和疯狂残暴。诚如基督教青年会记录所报告的：“把东方带来与西方文明接触，是这场世界争战中最了不起的组成部分之一。”^① 大战期间及结束之际，华工发现欧洲并非天堂，而是废墟。根据基督教青年会一份机密报告说：“当然，在这些非官方（中国）代表眼中，白人的虚情假意和所谓的基督文明正被一层层剥去，他们站在昏暗的灯光下乏善可陈。”^②

对于来到欧洲的华工而言，东方和西方不只是接触了，而且是广泛全面地接触。最有意思的是，东、西方交会汇是透过这批为数甚多的文盲来进行的，当他们被挑选踏上征途时，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国际关系。即使他们经常被西方人蔑称为“苦力”、“中国佬”或“支那佬”，这些中国人不仅对盟国的作战有重大贡献，也在中西文明之间承担了重要的信使角色。通过检视华工的工作和经历，我们可能对东西文明之间的差异和融合取得新的认识，对战争及随后在中国及世界各国的发展有更深刻的了解。此外，在大战期间华工不仅亲眼目睹了一场文明战争，他们也积极参与其中。尽管如此重要，这段故事却罕为人知。^③ 法国一位基督教青年会官员宣称：“中国苦力为赢得这场文明之战的胜利所作的贡献，从来没有得到全

①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Summary of World War Work of the American YMCA*, 59.

② “The Chinese Laborers in France in Relation to the Work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Re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 of Special Mission of Dwight W. Edwards in France April 13-May 11, 1918,” YMCA Archives, box 204, folder report 1919.

③ Philip A. Kuhn, a prominent Harvard China historian, has recently published his exhaustive study of Chinese emigration titled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However, Kuhn surprisingly did not mention the Chinese laborers in Europe during the Great War at all.

世界的公正评价。”^①

虽然绝大部分华工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在被挑选送往欧洲时对中国或世界都没有清晰的概念，但是他们在中国新的国家认同的发展中、在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欧洲的个人经历，以及与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及其他国家工人每日并肩工作，使得华工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大家庭之一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透过他们自身的体验，以及从与他们相处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们和其他中国精英那里学习到的知识，华工们最终成为中国和世界的新公民，对于中国及其在世界的地位形成新的理解和认知。在相当大程度上，华工的欧洲之旅实质上导引了中国成为国际政治新体系主要成员之旅。这些劳工为帮助中国改变其在国内及国际间的形象作出了直接的贡献。他们的新的跨国角色重新塑造了国家认同以及中国的国际化，进而塑造了新兴的全球体系。华工们在法国度过的大战岁月，代表着第一次有如此众多的中国老百姓与西方直接接触。毫无疑问，这一经历不仅为他们观察和体验在另一文明中的人生生活提供了机会，而且也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提供了机会。当他们回国时，他们带回了新观念、新思想和变革的启示与鼓舞。换句话说，前往欧洲拯救协约国的劳工不仅仅是被雇用的劳力，他们是参与世界事务的第一拨新华人，对建立新的国家认同作出了贡献。

在通常情况下，中国精英与这些劳工的生活轨迹从来不可能交汇。在平凡的年代，中国社会最高阶层的成员和劳工之间不会有任何场合和原因这样直接交往。但这不是平凡的年代，中国精英和劳工的确在西方交汇，并且在大战期间的法国共有同一种经历。通过以基督教青年会秘书或教师的身份与欧洲华工共事，未来的中国领袖们——如晏阳初、蒋廷黻、林语堂、蔡元培和汪精卫等人——相信中国总有一天将崛起成为强大的国家。

^① YMCA Archives, box 204, folder: Chinese laborers in France.

在所有人都担心中国的未来悬于一线之际，这些年轻人是前途无量的中国才俊。他们怀抱深刻的信念而不是为了个人前途或发财致富来到法国。他们因为受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1856—1924）建立世界新秩序呼吁的感召和建立有益于中国的更好的国际体系的承诺来到欧洲。他们想要运用他们的知识、精力和经验帮助这一世界新秩序早日来临，可是他们的世界观和对中国的了解与劳工们大不相同。他们帮劳工写信、教他们识字和了解世界及中国形势；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决心让工人成为中国及世界的合格公民。这些精英学者和留学生帮助他们建立对于中国劳动阶级的新认识、激发他们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找出路，并且改变他们对中国及其未来的认知。为华工服务也增强了中国留学生的领导技能，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他们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用餐室、活动棚、缓和西方人同劳工的关系包括平息罢工和暴乱，以及在战争条件下推广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他们与劳工的共事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实验场，他们得以在其中有足够的机会展现和发展他们的领袖才能。

我们也可以说劳工们在打造或重塑中国精英对中国的认知，在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华工对这些中国干事们在工作、生活及思想上的影响，甚至比他们对华工的服务所带来的影响更加深远。他们从为平民的服务中找到了人生意义与快乐。一位青年会干事表示他过去从来没想到“我们学生对劳动阶级负有直接责任。我们必须回中国，为大众继续我们的服务”。^① 在教学相长，既是老师又是学生的最著名故事就是晏阳初（1890—1990）的故事。晏阳初这样回忆：“大战前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同劳工联系在一起……自认为我们知识分子阶层与他们毫无干系。但是在法国我有幸与他们朝夕相处，像朋友那样了解他们。我发现这些人和我一样出色，他们也发现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我们之间唯一的

^① YMCA report, February 25, 1919, YMCA Archives, box 204, folder: Chinese laborers in France reports, 1918-1919.

差别是我出身优越而他们不是。”^①

晏阳初在法国与劳工相处的经验教导他：这些人聪明、善良、渴望学习，他们所缺乏的就是读书的机会。^② 晏阳初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些劳工对中国及世界的思考非常深刻；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③ 他因此得出结论：虽然他们只是劳工，但觉醒了的劳工有着巨大的力量。外国人称他们“苦力”，在中文中，这个词包括了“苦难”和“力量”两种含义。晏阳初立志用他的毕生精力去帮助他们免除其“苦”和发挥其“力”。^④ 是劳工教他认识了真实的中国。他如此解释自己的觉醒：“战争期间在法国，表面上我是华工的老师，实际上是他们教育了我。”由于他的经历是如此令人激动和宝贵，还在法国的时候，他就宣布他已经彻底地改变了自己，以前的“小我”死了。^⑤ 通过为在法华工服务，晏阳初找到解决中国问题和国家认同危机的解决之道；更重要的是，他确定了自己的终身事业：平民教育。他意识到唯有实行乡村教育，并从社会基层开始改革，中国才有机会复兴，才有资格成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⑥ “平民教育运动”的目标通过“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清楚地显示出来。^⑦ 20世纪20年代，平民教育遍布中国各省数以千计的村落。只要是关系到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哪一个军阀部队的士兵都一样。他们全都是农民，迫切需要他

① Grace Overmyer: "Jimmy Yen," *Century* (April 1929): 719.

② 晏鸿国：《晏阳初传略》，成都，天地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③ 同上，第55~56页。

④ 同上，第59页。

⑤ 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2：178。

⑥ The best book on this subject is Charles Hayford's *To the People: 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⑦ The slogan can be found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mass education movement letter to Ray Lyman Wilbur, November 14, 1927,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IRR Collection, box one, Yen's letter report, November 14, 1927.

的帮助。事实上，许多敌对的军阀在平民教育运动中却能够合作，允许教师开班授课，甚至为之提供经费。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始之后，各阶层官员蜂拥支持，有位省长甚至还发布公告，规定在某某期限之后，若有人还不认识课本上的一千个汉字，就必须交一笔“文盲税”。^① 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他的 30 万大军学习晏阳初的识字课程。^②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甚至成为其他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榜样。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内政部长雷·莱曼·威尔伯（Ray Lyman Wilbur）在宣布美国政府将开展一场大众扫盲运动时补充说，这项计划与晏阳初在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没有不同。《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称晏阳初教导群众读书写字的方法可作为“美国的卓越模范”。^③ 后来，联合国也敦促晏阳初把他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推广到全世界。晏阳初的国际版计划宗旨变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

此外，华工的法国之旅也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未来产生了深刻影响。众所周知日后的中共领导人如邓小平（1904—1997）、周恩来（1898—1976）等，都在战后前往欧洲考察西方文明的中心。沿着华工的脚步肯定影响到他们的思想和政治抱负的形成。1919 年 1 月，新设立的“勤工俭学”计划开始在中国人中引起广泛注意，并促成很多未来的领袖出国学习。^④ 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 1921 年公开承认，在法华工是勤工俭学计

① Clark Brockman: "The Greatest Volunteer Educational Movement in History," 1924, 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Dwight W. Edwards papers, record group 12, box 12, folder 135: Chinese laborers in France, 1918.

② Eugene E. Barnett: "A Crusade in China's Renaissance: Brief Glimpse of a Romantic Career," YMCA Archives, Biographical records: James Yen, box 233.

③ Nathaniel Peffer: "Yale's Yen Charts a Course for China,"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February 1, 1931), 7.

④ 最好的原始文献是《旅欧周刊》，它是由旅欧华人团体主办的刊物，1919 年 11 月 15 日创刊，由周太玄主编。参见陈三井主编：《留欧教育运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划的先驱。他相信虽然某些人认为劳工无知、政治上短视，实际上他们在中国的改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指出，如果劳工办得到，中国受过教育的青年人通过勤工俭学计划也能办到。^①

华工回到中国后，有些人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开路先锋力量。1919年9月，从法国归来的华工在上海组成他们自己的工会，每周集会一次讨论如何保护自身权益。^② 这个工会以组织劳资谈判、定期聚会以增进共同知识，促进友善和跨党派的友谊为宗旨。工会成员誓言不酗酒、不嫖妓、不赌博、不吸鸦片。“归国华工工会”（The Returned Labors Union）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初期会员有1600名刚从法国回来的工人。^③ 中国劳工明白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目标奋斗、自己来拯救自己的命运。所有这些发展都或多或少得自于他们在欧洲的经历。据当时的中国评论员刁敏谦（Tyau Min-Chien）的观察，归国华工带回来一种新精神。“这些归国华工无疑找到了一片播撒他们所信奉的新思想种子的沃土。”这些人的确是变革中国的强大力量。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劳工经常发动罢工，而“从充满矛盾冲突的欧洲归国的劳工可谓中国劳工界暴风雨中的海燕”。在一些政府部门，归国华工甚至被称作危险的布尔什维克潜藏分子。^④ 周策纵（1916—2007）在他关于五四运动的权威性研究中指出，在五四运动时期，这些工人在欧洲的经历有助于他们在上海工会的组织化及其活动的开展。他们“有力地促使五四运动在20年代早期向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极端方向发展”。^⑤

① 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之大波澜》，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1：5。

② 《旅欧周刊》（May 1, 1920）：3。

③ Min-ch'ien Tuk Zung Tyau, *China Awakened 1922*,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231.

④ 同上，240。

⑤ 见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Harvard East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40. 中译本，周策纵：《五四运动》，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有意思的是，五四运动时期流行的两个口号——“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与旅法华工有直接关联。^① 大战之后，中国的劳工阶级和精英阶层都体认到劳工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在打造新中国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华工奔赴欧洲以及他们为大战所做出的牺牲，帮助了中国在战后和平会议取得一席之地，他们进而在把中国和世界带到一起的过程中担当起了中间人和使者的责任。

三、透过大战建立起的一段共有历史

至今为止，欧战时期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中国全方位地接受西方价值观，把自己的命运与凸显的世界新秩序相联系，并积极参与这一新秩序的建立。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兴奋地拥抱威尔逊（Thomaw Woodrow Wilson, 1856—1924）的世界新秩序蓝图。日后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的蒋廷黻声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相信威尔逊总统吐出的每一个字”。^② 威尔逊的主张最能吸引中国人之处在于他的世界新秩序理念，尤其是他建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计划和民族自决权原则。^③ 中国或许是唯一一个对国际联盟信心最强、全力推动其建立的国家。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中国人成立了各种团体研究这个议题、支持这一倡议。1919年1月25日，正当讨论成立委员会研究筹组国际联盟时，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1871—1949）宣布中国“鼎力”支持国际联盟

① 李永昌：《觉醒前的狂热：论“公理战胜强权”和“劳工神圣”两个口号》，《近代史研究》，No. 4（1996）。

② Min-Chien T. Z. Tyau: *China Awakened 1922*, 268.

③ 新近关于中国与国际联盟的研究，参见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张力：“国际合作在中国：国际联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83（1999）。

的成立。^① 顾维钧（1888—1985）也在会议上说：“正如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中国人更渴望见到国际联盟的成立，也没有人比我们更乐于见到国际联盟委员会踏出实质性进展的一步。”^② 因此，处于对威尔逊的信赖，对国际联盟和世界新秩序构想的迷恋，中国人对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持极高的希望，特别是当威尔逊总统本人将亲自出席巴黎和会的新闻传来的时候。中国希望利用战后和平会议让全世界听到它的声音和抱负，以及收复中国过去所丧失的主权、要求以平等身份加入国际社会的决心。

中国的精英及政治家们提出了许多建议和主张。例如，梁启超宣称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应该实现两个目标：一、废除势力范围制度，以免中国成为“未来战争的催化剂”；二、“中国要获得自我发展的权利”。^③ 要达成这些目标，梁启超写道：“我们怀着真诚而有建设性的方案来到这个崭新的世界。我们需要现代外交的必备技能，有责任感的政治家的智慧，工业和财政领导的才干；我们特别呼吁我们的强邻日本要明白，中日两国在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上是一致的。”^④ 梁启超还认为巴黎和会应给予中国下列具体救济措施：修改不平等条约、完全取缔庚子赔款、关税自主。^⑤ 中国人不仅为了自身权益要求修正不平等的对外关系，他们也采取主动试图打造国际社会、假定作为其中一员获得完全的权益。毕竟中国的命运与公平的世

①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巴黎和会 1919》（*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1：186。

② Koo and others: *China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London: G. Allen & Unwin Ltd., 1919, 3-5. 顾维钧等：中国与国际联盟。

③ 梁启超：“莅国际税法平等会演说”，《梁启超演说集》，上海，上海国民书局，1925年，第57页。

④ Liang Qichao: *China and World Peace*（梁启超：《中国与世界和平》），Paris, Vincennes, 802N/ 1604/19 - 20, see also Quai d'Orsay, Seire A, Paix (Nov. 1918 - Avr. 1919), 29: 1001-13.

⑤ Hollington Tong: "What Can President Wilson Do for China," *Millard's Review*, 6, No. 11 (November 16, 1918), pp. 431-434.

界秩序息息相关。

出于对威尔逊及战后和平会议的热切期望，许多中国一时之选的才智之士纷纷以官方代表团团员或私人或半官方的身份在1919年上半年前往巴黎，冀以在和会上推动中国目标的实现。参加这场历史盛会的中国官方代表团成员有60多人。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和魏宸祖是代表团全权代表。除了正式代表团之外，社会贤达亦以私人或半官方身份前往巴黎。他们之中包括梁启超及其友人一行，他们到巴黎是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①汪精卫、李石曾、叶恭绰、陈友仁等人亦前往巴黎见证此一重大历史事件，并且在和会上做中国的外交后援。^②

不幸的是，中国的崇高期望遭遇到所谓的“大背叛”。中国没有收回山东。要求平等待遇、恢复丧失的主权的要求遭到的是充耳不闻。中国人当然对结果深感受挫和失望。中国收复山东要求的失败导致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国人对美国和威尔逊愤怒的爆发。这个痛苦事实也迫使中国认识到强权依然胜过正义与公理。毛泽东在大战时期曾一度梦想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对巴黎和会充满希望。在凡尔赛和约的出卖之后，毛泽东对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高度期望化为失望。他的结论是，“如外交上各种‘同盟’‘协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唯有革命才能矫正这个既不理性又不公平的国际体系。^③在陈独秀心目中，威尔逊现在已成为“空头大炮”，他的原则“一文不值”。^④全国各地的学生公开表示他们对威尔逊主义失败的失

①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Recollections of My Journey in Europe*），《饮冰室合集》，23：38。

② 关于叶荒绰的欧洲之旅，见遐庵年谱汇稿编印会编：《叶遐庵先生年谱》（上海：遐庵年谱编印会，1946年），第63~69页。

③ Mao Zedong: *The 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July 21, 1919. Stuart R. Schram, ed.: *Mao's Road to Power*, Vol. 1, 378-381。

④ 《每周评论》，No. 20 (May 4, 1919)。

望。北京大学学生讽刺威尔逊为他理想中的威尔逊式世界秩序发明了一个新方程式：“14=0”。^①

中国在巴黎遇挫，在相当大程度上造成威尔逊在其国内的最终失败。即便是美国派去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成员在山东问题上也不赞成威尔逊的做法。兰辛（Robert Lansing）和亨利·怀特（Henry White）都支持塔斯克·布利斯（Tasker Bliss）——他们都是美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成员——批评威尔逊牺牲中国的利益是错误的：“即使为了和平，做错误的事也是不对的。和平固然可贵，但还有比和平更可贵的东西——那就是正义与自由。”^②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1869—1923）甚至以辞职抗议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问题的妥协。^③ 威尔逊为挽救他所珍视的世界新秩序计划而在山东问题上妥协；然而，他对山东问题的做法反而成为他在美国国会及其他方面的政敌攻击整个和约的有力武器，并最终否决该条约。德国和中国一样，也对《凡尔赛条约》深感失望。由于中国拒绝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让步，并且拒绝在巴黎《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中国成功地迫使全世界关注中国局势，也为1921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奠定了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顾维钧日后写道，中国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对于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外交进步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④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虽然没签署《凡尔赛条约》，却借由和奥地利签订和约，设法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国成员。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Recollection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222。

② T. H. Bliss to Wilson: April 29, 1919, *The Paper of Bliss*, Folder 247/W. Wilson/April 1919, Library of Congress, Manuscript Division; see also Jin: *China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26.

③ See 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Garden City, N. Y., Toronto: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22), 364-382. 中译本：保罗·S.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④ 顾维钧：“巴黎和会的回忆”，《传记文学》，7，No. 6（1965）。

即使在未能夺回山东之后中国仍然一心要加入国际联盟，这种执着显示出中国走向国际化的强烈愿望和坚定决心。更重要的是，透过拒绝与德国签署《凡尔赛条约》，中国其后设法与一个西方大国签署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大约两年后的1921年5月20日，中国和德国签署和约，它保证双方关系“必须依照国际公法的准则，务必彻底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德国“同意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放弃德国政府在华所拥有的一切特殊权利”。^① 签署了这样的条约，中国可谓设法获得了外交上的成功。《中德新约》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与强国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国和德国都对《凡尔赛条约》及所谓世界新秩序极度失望，同病相怜，因此决定在1921年以后的双边关系上开启新篇章。在相当大程度上，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在20世纪20及30年代与中国关系良好的原因。^②

巴黎和会对中国造成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西方的印象与魅力严重受损。“凡尔赛的背叛”促使许多中国精英人士质疑西方的价值观，怀疑中国认同西方的可能性。在中国寻求国家认同和国际化的进程中，西方价值观念无论在道德上和实务上的吸引力都在许多有影响力的中国精英心目中失去了分量。严复是以翻译许多西方著作著称的学者，他认为西方在1919年的行为表明“西方三百年的文明发展最后只归结为四句话：自私、杀戮、无耻和堕落”。^③ 更有人下定论，认为巴黎和约证明“威尔逊主义之中挫，帝国主义之制胜可也”。以压制德国和中国为基础的世界新体系撑不了太

①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ed., *Shantung: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ashington, D. C.: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21), 116-117.

② 关于这一时期中德关系的最好研究见 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德国和中华民国》),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③ James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439.

久。^①还有人甚至警告说，国际联盟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中国必须依靠自己。^②

中国在巴黎所蒙受的屈辱为中国寻求西方模式的国家认同泼了一盆冷水。巴黎和会的结果在相当大程度上疏远了中国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转而相信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等人所提出的西方衰落论的理论。梁启超在欧洲经过几个月的观察，认为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有各自的问题。他认为撷取两者之长、创造新文明，才是上上之策，并鼓励中国人运用他们高度的精神文明以拯救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③在极大程度上，五四运动就是中国遭到双重背叛的结果，清楚地暴露出认同追求中的巨大真空危机。起先摒弃自己的传统和文明，许多中国人发现他们的强烈愿望在巴黎和会上被西方所扼杀。中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在根基，又乏外来援助的国家。这种双重背叛的挫折感迫使中国人正视许多挑战性的问题：身为中国人的意义是什么？中国往何处去？中国政府应采纳什么样的价值观？简而言之，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认同。因此，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再造文明”。^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在巴黎和会遭到“大背叛”之前，怀着对民族复兴以及中国在世界新秩序中地位的极高期望，中国经历了民族主义的高潮。现在，五四运动促使中国人在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寻找第三条路。这一背景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人会在对西方的幻想破裂之后，对俄国外交上采取主动，作出热切响应。经历了巴黎和会的创痛之后，许多

① *Pacific* 2, No. 1, 9.

② *Pacific* 2, No. 2, 2-4.

③ 李华兴和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31~734页。

④ 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载《少年中国》（*Young China*）2, No. 2, 另见 Lucian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8.

中国人将布尔什维克革命当作是立国的唯一成功模式，并且苏俄（布尔什维克俄国）是唯一一个对中国追求新的国家认同表示同情的国家。中国人敬佩苏俄，不仅是因为它决定放弃对中国的不平等权利，更重要的是，有别于西方的强权政治，俄国人表现出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① 俄国对于帝国主义和秘密外交的谴责深深打动了中国人的内心。对许多中国精英而言，俄国主动提出的外交倡议远远胜过西方的空洞承诺。中国共产党旋即在俄国人指导下于1921年成立，孙中山（1866—1925）的国民党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与俄国合作。^② 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解释道：“荒谬的是，人们可以确认马列主义对少年中国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它激起全民族的愤恨。列宁的民族主义理论为中国何以在世界上争取公正平等地位遭到失败提供了颇为合理的解释。”^③ 但是，社会主义和俄国模式依然是西方的产物。换句话说，即使完全拒绝追随西方，转而追寻新的方向和新的国家认同，中国仍然受到它强烈的国际化意识的驱动。

此外，中国的欧战经验比起对五四运动的直接冲击有着更长远的意义。虽然中国要恢复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的整体要求在战后和平会议上被列强当作与商讨议题无关而遭到排斥，但是中国在巴黎和会的表现展现出它力求国际化和追寻新的国家认同的动力。透过参加这场历史性会议，中国让全世界注意到它的声音、抱负和以平等地位加入世界的愿望。如果没有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新外交举措，战后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局势

① 《少年中国》2，No. 2，2。

② 20世纪20年代的中俄关系，见入江昭（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帝国主义之后：寻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Chicago: Imprint Publications, Inc., 1990.

③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载 John Fairbank 编：*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转型中国的外交关系》），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86.

将会更糟。比如，日本可能在1915年因“二十一条要求”得到更多利益。若非派遣华工到欧洲并且最终参战，中国恐怕更难受邀出席战后和平会议，因而也没有机会在全世界面前表达它的立场。若非出席战后和平会议，并且透过会议让全世界注意到中国的新的要求，中国不会在旋即于1921至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收复山东。

中国参与大战是中国得以变革、复兴和转变的跳板。参战兴趣是从受害意识发展而来。羞辱及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也激励了中国。中国想要采用帝国主义的动机和意识来击败帝国主义，想要加入世界、成为现代民族的、强大的国家。新的民族主义意识推动了中国革命、内部更新以及改造，也压制了标志中国文明的传统价值观，损害了它的独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时代的变动反映在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时政治上运用民族主义、文化上破除偶像，以及外交上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之中。即便如此，中国仍然同其他国家一样，充满与战争相联系的谬误和矛盾。例如，美国以打一场“终止所有战争的战争”之名义参战，拿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恐怖和悲剧反观，这种立场过于天真，必定得到痛苦的失望。虽然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世界新秩序和国际联盟幕后的最大推手，然而造化弄人，由于美国并不认同威尔逊的决定而否决了和约，致使美国未能加入国际联盟。

四、大战与大遗产

中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史及世界史上都是相当独特的一章。中国参战使这场战争真正成为一场世界大战，也改变了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含义和影响，并且为战后和平会议及新兴的世界秩序注入了新内容和新视角。中国参战也把中国带回到20世纪更大的世界历史舞台之中。不论我们如何评估中国对大战的贡献和努力，借由对中国及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我们至少可以在对战争、人类悲剧及其意义的集体记忆中，增添全面乃至崭新的范围和尺度。更进一步说，研究中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1911年（有希望的年代）和1919年（反省、新思维及重新出发的年代）之间的中国现代史提供了重大但是缺失的联结。参战及战后历史为我们审视国家建设和新的国家意识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窗口。

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一战的参与被摒弃在集体记忆之外。可以说中国的20世纪开始于广义上的大战时期。中国和这场战争之间的全面交汇象征着中国走向国际化、把中国带进世界，并且使战争成为中国自身历史的重要部分这一漫长旅程的开始。透过大战，中国踏上一个新旅程，也就是走上国际化和民族复兴的道路。有位中国作家在1918年底发表的文章中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大战即将结束，它将以19世纪文明的崩溃为终结。而20世纪的文明即将开始。换句话说，世界已经迈入新的时代。”他鼓励中国人了解时代更迭和文明转换的重要性，把握变革所带来的契机。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人不能“大觉悟”并做好准备的话，“中国将被（新时代）所抛弃”。^①

大战期间，中国在现代史上第一次明确表示以平等地位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并为之积极采取行动。中国试图借此努力改正它在18、19世纪由于拒绝接受新的国际秩序、拒不承认西方强国所犯下的近乎致命的错误。这一次却是西方拒绝接受中国，但是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他们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这象征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挺起腰杆面对西方。在某个程度上，一些中国人在巴黎和会之后产生的对西方的痛恨，使他们对和平、发展、安全以及西方本身的认识有了一些偏差。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中国追求国家认同及努力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那么通过建立中国人对世界秩序和西方的认知，这场

^① 以芬：“欧战杂感”（6），《晨报》（1918年12月23日），2。

大战也留下一份经久不息的遗产。无论何时中国受到列强欺负，中国人对战后和平会议所造成的不公之痛恨就会被重新点燃。因此大战及其战后的一切都应被视为中国人塑造现代中国历史意识和维系民族感情的决定性关键因素。

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中国是一个天真的年代。追寻自身认同本身就是天真的表征。中国想要得到其他国家承认和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渴望，因积贫积弱而受到列强欺压所感受到的愤怒、对帮助的呼求以及急于效仿，所有这些都显出其不成熟和天真。换句话说，国家认同不只是关于我们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关于我们想要成为什么。以中国来说，现实与渴望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追寻国家认同类似一种浪漫：追求的人把中国应该是什么，以及他要效仿什么统统理想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精英试图在中国文化和传统之外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他们试图摆脱自身的文明和经验重新界定中国的国家认同。自由主义和军阀主义并存是个奇怪的组合，使得中国看上去如同一只双头怪兽，每个头面向不同的方向。事实上，这段期间中国存在双重决策过程：一边是富有现代意识和前瞻思维的官僚和社会精英，努力要把中国推进国际体系；另一边则是军阀和极端保守派，他们只希望让时钟停摆，为其自身利益不惜以中国的前途为赌注。这种决策过程所产生的紧张制造了尖锐的两难困局，陷国家认同的追求于险境，也使中国进入国际体系之路迂回曲折，遭遇重重阻碍。

新中国的天真恰巧也与自 1890 年至 1920 年之间成长起来的一代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并且为这一代人所加强。中国对世界事务的总体反应、尤其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应，必须从这段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之抱负这个角度去看才能够理解。^① 天真的国家同其天真的一代在中国对大战的

^① Jon L. Saari: *Legacies of Childhood: Growing up Chinese in a Time of Crisis, 1890-192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反应中共同打造出天真的年代。1919年的五四运动象征着天真年代的结束，因为它出自于某些中国精英对西方列强幻想的破灭，以及他们对自己和国际问题的痛苦认识。1919年处于欧战之后的中国，与1914年的中国彻底不同——不论是在社会上、知识上、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都不相同。在相当大程度上，由于大战和中国之间强烈的互动和滚雪球效应，已然发生的巨大变化已经向深广无边蔓延开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现代性

丘为君*

现代性 (modernity) 与现代化 (modernization)、现代主义 (modernism) 或者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宏大观念一样,众声喧哗之余,也在定义上产生了诸多歧异。其中最重要的歧异之一,莫过于普遍主义 (universal modernity) 与多元主义 (multiple modernities) 的争论。就普遍主义而言,现代性指向科学、自由民主 (liberal democracy)、进步观 (idea of progress)、创新 (Innovation)、工业化 (industrialization)、世俗化 (secularization)、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 与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等等内涵。多元现代性则批判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普遍主义现代性观点,转而从“比较文化” (comparative cultures) 的立场,强调非西方的现代性发展经验:穆斯林现代性、亚洲的现代性,甚至是中国现代性、日本现代性,与印度现代性等等。多元现代性 (或另类现代性) 的基本立场是“去中心化”的,它在不同程度上强调“文化本位主义”,认为不可能将西方发展经验的普遍主义现代性,毫无保留地横向移植到非西方世界。

在现代性上做这种普遍主义与多元主义的二元区分时,我们不免要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普遍主义现代性与多元主义现代性之间是否必然存在着

* 台湾东海大学教授。

不可克服的冲突？其次，与此一问题紧密关联的：承认多元现代性是否必然反对普遍主义现代性的基本认知或价值？或者这么说，我们能否避开、无视或越过普遍主义现代性的历史事实，而径自展开多元现代性？

本文拟借“欧战”（1914—1918）对中国的影响，重新检讨以《东方杂志》和《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民初中国思想界对现代性的两概观点，以及此一对立论述在思想史上的主要意义。

“欧战”在中国

“欧战”对中国有两层意义。首先，自与西方接触半个多世纪来，中国视“国富兵强”的西方列强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典范，是处于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状态的东方古国学习效法的对象。中国政府以及知识界，几乎是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去面对这场世界战争。因此，对此一以欧陆为主要战场的西方强权大战，基本上是抱持着不涉入的中立立场。除了此一战争的起因与中国无关涉外，更重要的因素是，晚清以来的历史经验清楚地说明中国与西方列强在国力上的悬殊。其次，吊诡的是，中立立场并没有使中国免于“欧战”炮火的波及。“欧战”竟然在中国境内上演，中国被动地卷入“欧战”。

关于第一点，从1914年7月28日“欧战”爆发至1918年11月11日大战终了的整整四个年头里，中国作为一个战争观察者，基本上经历了一次独特但影响深远的经验，在“文本”（text）的意义上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当“欧战”爆发后，虽然中国并未派军直接参战，但欧洲战事的发展，在中国新兴媒体如报纸与杂志等连续而大量报道下，成了这个亚洲新共和国大众知识生活中的主要议题。先前，中国新闻媒体一向注重东亚新闻，对欧洲消息只是做填充篇幅的陪衬而已。“欧战”爆发后，因为事关重大，中国无从置身事外，上海的报馆于是开始购买路透公司（路透

社)的电报,作为快速取得“欧战”消息的手段,以飨各界。

“欧战”爆发使欧洲新闻由以往的配角,跃升为新闻版面的主角。就影响而言,大量有关“欧战”的报道,使近代中国对令人敬畏却又带有神秘气息的西方文明,产生前所未有的亲近性。不论是战争的实际进度、战争期间欧陆庶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军国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运作,以及西方物质文明的内容等等,无一不获得大量的报道。这种拜报纸与杂志等新兴传播媒体之赐所产生的对西方文明的亲近性,改变了晚清以来中国认识西方的途径与方式,即由“菁英式启蒙”转为“大众式启蒙”。

关于第二点,中国政府在“欧战”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是抱持着中立的态度。的确,就语意学而言,“欧战”对中国来说隐然意味着“事不关己”。不过,这种“中立原则”并未使中国免于炮火的侵扰:“欧战”爆发不久,英日联军便攻打青岛的德军,“欧战”在中国本土以奇特的方式上演,中国在被动与无辜的意义上被卷入了“欧战”。

青岛早在1897年“胶州湾事件”后便落入德国手中。立足青岛的德国势力,对东亚任何有实权的国家来说都不是友善的象征。对1895年以后崛起的东亚“小巨人”日本而言,青岛的德国势力更是如同芒刺在背。日本自从1895年遭受德国羞辱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后,一直对之耿耿于怀;19年后,日本认为报复的时机已到。“欧战”的爆发,为东方这个黠武穷兵的新兴军国主义国家提供了绝佳的出手机会。因此当英国在1914年8月3日对德国宣战后,东京便迫不及待地于8月15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方必须在一个月内,即9月15日以前,将胶州湾交给日本。

日本的最后通牒没有获得德国的回应,日本于是在23日向德国宣战,开始进行封锁青岛海面的行动。日军于1914年9月26日展开对德军事攻击,并于10月底左右,包围德军的总督府。于是,欧陆霸权德意志帝国在东方的重要据点,便于1914年11月7日,由第四任总督华德克(Alfred Meyer Waldeck, 1864—1928)和4715名德国俘虏,向日军司令神尾光臣

(1855—1927) 投降。如此，青岛便落入曾“以德为师”的日本手中达八年之久。

“欧战”的爆发，中国未蒙其利反而先受其害，日本的山东战役，使中国的“欧战”经验显然不再是在虚拟（virtual）的“文本”上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在真实（real）的情境里体验到炮火的滋味。

现代性的黑暗面：《东方杂志》派

民国初年的报纸，根据 1916 年底的调查，约有 289 种，其中不乏具政党背景者。就影响力而言，这当中能客观地报道、分析与评论“欧战”的发生、进展与意义，无疑以《东方杂志》最具代表性。由商务印书馆所办理的销售量高达一万五千份左右的《东方杂志》（1904—1949）月刊（后来改为半月刊），是近代中国出版发行时间最长的杂志。赋予这个杂志新灵魂的关键性人物是杜亚泉（1873—1933）。于 1911 年至 1920 年间出任《东方杂志》九年主编的杜氏，将原本以传达官方理念为主的保守刊物，转化为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评论性杂志。这个自 1911 年 3 月 25 日八卷一号起改版的刊物，从世界的视野，以民间而不是官方的身份，意见独立而不是带有政党意识形态的特质，在“欧战”爆发前的民初社会里，建立了一个具有思想深度形象的领导性媒体品牌。是以这样的风格，《东方杂志》带领了与封建主义做最后战斗的民初中国，全程观察、报道与分析“欧战”爆发的背景、发展与影响，可以说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提供了有关“欧战”最具公信力、迅速、翔实而深入的信息。因此，它的观点与论点，相当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想法。

根据《东方杂志》报道，大战爆发一年后，“欧战”死亡人数总数为 222.83 万人，必须指出的是，过世的人口当中，多为青壮之年，是社会的中坚分子。就数目而言，这的确是骇人的现象，但这不过是伤亡的开端而

已。根据美国学术界的统计，至1918年11月大战结束为止，这场战争的参与国家达28国之多，其中不计算重伤的630万人与轻伤的1400万人，总共交战双方阵营约有1000万个生命牺牲。

除了死伤人数，这场战争的费用更是惊人：英国本国损失为320亿美元，英国殖民地约45亿美元，法国258亿美元，美国320亿美元，俄国225亿美元，德国401亿美元，奥国206亿美元，土耳其与保加利亚22亿美元；总计两个阵营，共耗费1863亿多美元。

对欧陆这个物质上的大破坏、近千万生灵遭到残害的景象，中国知识分子是感到十分困惑的。这个曾经是中国上下所崇拜与模仿对象的欧陆文明，如今从《东方杂志》上所看到的景象，却是人间净土成了血流成河的杀戮战场，文明富强之域成了炮火蹂躏的人间地狱。这么强烈的对比与巨大的变化，对关注中国前途的知识分子来说，心里不可能不感到震撼：究竟，造成此一西方文明危机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在《东方杂志》看来，西洋现代文明的危机主要在经济与道德两个层面，而就危机的发生而言，这两者又以科学作为联结。杜亚泉宣称，此时此刻的西洋现代文明，已属于一种“病态的文明”。西方这种“病态文明”有其重要特征，就其展现在经济层面而言，是以欲望为前提的“特殊导向”而非充足生活必需之“一般导向”。所谓经济活动的“特殊导向”与“一般导向”，是从比较文明的角度获得的。在《东方杂志》看来，东方（尤指中国）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一般导向”的，其特征是：人类经济活动乃在求人类生活中的必须数据充足无缺。

对照东方经济的“一般导向”特征，西方经济活动则是“特殊导向”的。所谓“特殊导向”，是指西方社会里的经济活动，主要在诉诸“局部之发达”而非“全部之发达”；即西洋社会的经济活动主要不在谋求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资源，而是在满足其生活中各式各样的欲望。用比较强烈的语言来说，东方社会是“全体的贫血症”，而西方社会则是“局部的充

血症”。

当今欧战的爆发，在杜亚泉的认识里，便是源于国家民族间的经济冲突。对此一问题，杜亚泉从唯心论的立场解释道，西方社会里的“局部充血症”经济现象，乃由于其文明是一个道德被淘空的“欲望文明”，道德向物质投降。道德为何会向物质投降呢？这位《东方杂志》主编控诉道，西方近代文明里的道德之所以向物质投降，其关键恐怕在科学。

科学为何要被批判？杜亚泉从两个角度回答此一问题：一、科学与经济之间的手段与目的关系；二、科学加深社会阶级对立。关于前者，杜亚泉认为，科学的确能提振文明，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但它也带来破坏，摧毁人类的生活条件。战争里形形色色的杀人武器，个个制作精良，取人性命无数，破坏家庭难估，这不都是当代科学的杰作吗？因此，当科学作为发达经济的手段，若目的已经错误，则手段愈高，危险愈甚。

其次是关于科学与社会阶级的问题。杜亚泉指出，科学扩大而不是缩小人类的物质欲望；而扩大了欲望则导致社会阶级的对立。杜氏批判道：从经济生活的角度来看，科学仅是做满足生活欲望的帮凶而已。拜科学发达之赐，社会里生产了诸多非生活所需的精巧工艺品。由于生产过剩，西方国家遂不得不将其推销至世界各地。这种功利主义的经济活动，其实无助于在世界上占多数的、需要“一般导向”经济的区域。就这点而言，科学是在扩大而不是缩小社会里的阶级。

在说明了经济与科学的关联后，杜亚泉接下来反省道德以及科学与道德之间的关联问题。在他看来，科学不仅扭曲经济，也扭曲了道德。杜亚泉从比较文明的角度指出，在道德层面上，对照东洋社会的精神薄弱与麻痹状态，西洋社会则是“精神错乱”与“狂躁状态”。

当今西洋社会在道德上的“精神错乱”与“狂躁状态”，在杜亚泉看来，是因为道德观念变成权力本位、意志本位，权力（意志）决定道德，或者是，权力（意志）本身就是道德。时下的西洋文明之所以面临危机，

杜亚泉说，是因为根本没人在乎道德不道德，行事依乎“力”而不是“理”。弱者劣者不在道德的意义下受到社会的同情，而是被视为人类进步的绊脚石、人类罪恶的渊藪。同样，战争的责任，很少被归咎于强国的欺凌，而倒是常怪罪于各弱国的存在。

杜亚泉深信，这次大战虽起因于国家民族间的经济竞争，但事实上欧洲社会的经济生活里，早已因科学的勃兴而衍生出一种新阶级。在这一发展下，欧陆各国的经济势力，实际上全操纵在这些少数阶级手里；国家民族间的竞争，不过是少数阶级间的经济竞争罢了。因此他警告说，近年来中国大力输入科学思想，但往往“眩其利而忘其害，齐其末而舍其本，受物质上之刺戟，欲日盛而望日奢”，在此世界思潮逆转的时刻，作为东洋社会代表的中国，实在不可不有所自觉与自信。

现代性的光明面：《新青年》杂志派

对照本土里所酝酿蓄积的这种具文化保守主义特征的“西方文明悲观论”现象，则是“输入型”意义的、具有战斗意味、以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动力的“西方文明乐观论”思潮。

随着欧美政府在“大战”上的动员，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1915年初的《二十一条》尤为指标），中国海外留学生不少人因此陆续束装返国。在日本的留学生由于距离中国本土较近，对日方蛮横无理的“二十一条要求”刺激尤大，反应动作也特别激烈；研究指出，约有4000名愤慨的中国学生因此在日本集体退学，返国加入抗议行列。在这批“留学生返国风潮”中，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陈独秀（1879—1942），也踏上归国之途。1915年，36岁的陈独秀结束为时一载、生涯中的第五次留日学习，于6月中旬抵达上海；三个月后，即1915年9月15日，他所主持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正式创刊，进行“终止政

治革命，展开思想革命”的旅程。

在《新青年》看来，《东方杂志》所批判的进化论不仅不是西方文明的“原罪”，反而是“动力”。陈独秀在《新青年》（当时仍名《青年杂志》）一卷一号创刊号（1915年9月15日）那篇为世人所传诵的《敬告青年》里指出，亘古以来，天地万物之间无日不在演化之途，保持现状，即意味着要落伍、被淘汰；中国古代贤人所说的“不进则退”，实为至理名言。陈独秀肯定严复（1854—1921）对西方“富强之秘”的掌握，即近代西方的崛起，主要是以一种基于“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意义的宰制自然与社会的强大精力（energy）与力量（power）。在“转型期中国”里，西方这种宰制自然与社会的精力与力量，主要是被文化菁英们以“动力”或“动”的概念来理解。在陈独秀这里，西方“富强之秘”则是以“进步”与“进取”等观念来联结的演化论；接受与适应演化论的文明将昌盛；反之，若是排斥这些观念，那就意味着等待死亡。在他看来，东洋文明何以日渐颓唐，西洋文明何以勇猛精进，关键在于前者以“退隐精神”为美德，而后者则以“进取精神”为基调。

同《东方杂志》一样，《新青年》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它每号约100页，六号为一期。两者不同的是，前者是以新闻媒体自居，以报道和评论为职志；后者则是具有教育理想的启蒙性刊物，以改造青年思想为使命。

从这个思想根本改造而非世局现实关注的角度出发，《新青年》看到中西文明的重大差异。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1卷4号，1915年12月15日）一文里，陈独秀认为东西民族至少有三大差异。首先是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陈独秀指出，中国的传统，即便是较具积极性格的儒家，也一向“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至于偏向消极的道家也是如此。这位思想革命家指出，不论是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说”、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说”，或印度民族“安息于涅槃说”，总是

以教人平和为目标。反过来看西洋各民族，无不是好战健斗。自古以来，他们经历过宗教之战、政治之战，与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西洋民族这种好战斗的性格，造就了他们日后的成功：英国人以鲜血取得世界霸权，德国人以鲜血造成当今的荣誉。至于“欧战”中“以小抗大”的比利时、塞尔维亚等，用鲜血去争自由，在陈独秀看来，“其人之国终不沦亡”。

东西民族第二个重大差异是：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当今西方文明昌盛的重要指标，无疑是自由与人权，但如果进一步追问，自由与人权的基础是什么？陈独秀认为答案就在个人主义这个关键议题上。在陈独秀看来，西方社会国家的发展，皆以促进个人幸福为最后目标。只有认清这个事实，才能深刻理解西方文明强大的理由。

对照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则是以“家族”为本位。陈独秀认为，东洋民族从“游牧社会”进化为“宗法社会”后，便再也没有经历过任何的发展；从“酋长政治”阶段进化到“封建政治”阶段后，便再也没有经历过任何的改变。他指出，在宗法社会里，由于以家族为本位，所以无个人权利可言。而宗法社会尊家长、重阶级，所以强调忠孝观念。东方社会里的这种宗法制度造成四种影响深远的恶果：损坏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以及最后，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

东西民族第三个重大差异是：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陈独秀认为，西洋民族对“人治”不信赖，因此凡事讲“法”；而东洋民族则正好相反，视“法”为虚文，凡事讲“情”。他指出，西洋民族不仅在国家大政上讲究法治，连社会家庭也不例外。父子兄弟彼此间若有借贷关系，锱铢必较；亲戚交游，也不会以感情做出违法损利的事。即便至亲如夫妇，也是“爱情为一事，夫妇又别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之共性；及至夫妇关系，乃法律关

系，权利关系，非纯然爱情关系也”。西方这种凡事讲“法”的现象，是因为当国家已经发展成一个讲究“权利义务”的法治国家时，在国家下的家庭组织，遂不得不进化为法治家庭。对照西方讲究独立生活，东方则强调“累代同居”的美德。在陈独秀看来，这种大家族主义的弊端在于因“依赖成性”而造成经济效益上的“生产日微”结果，另一面影响更深远的，则是使人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性格。

与《东方杂志》透过“欧战”看到西方文明之限制不同的是，《新青年》看到了，也更关心所身处的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危机的本质。在陈独秀看来，当前的中国危机，充其量这些只是中国文明危机的结果而非起因；要从根本上解除中国文明这个深刻的危机，其实并无他法，只有以“全盘性反传统”（totalistic iconoclasm）的途径，引进西方文明的进化经验，来驱逐中国传统里的毒素。此时此刻，陈独秀深信，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不仅没有悲观排斥的理由，更要乐观地恭敬迎接。

结语

借由将“西方”视为一个“巨大的他者”，近代中国在认知主体上起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主要意义在于中国透过“西方”这个“巨大的他者”，强迫重新自我定义。就这点而言，这个“巨大的他者”对中国有两层深意：首先，中国在被动的意义上被迫正视、理解，甚至接受“巨大的他者”所定义的大部分国际游戏规则。与此相对照的，则是中国在屈辱的前提下重新理解、认识自我究竟为何？因此，近代中国在认知主体上所起的变化，与认知客体（西方现代性）是一体的两面。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对这一问题的反省，是以“体用”这个悠久但具有思想文化厚度的概念来进行。

从体用论的角度来看，《新青年》杂志为“西体中用”论的典型，而

《东方杂志》则为“中西调和”论的代表。《新青年》的两位重要旗手陈独秀与胡适，都是进化论的积极拥护者。在崇奉进化论的前提下，激进的“西体中用论”至少具有下列四种重要内涵：一、高举科学主义（scientism）的旗帜；二、与进步观（idea of progress）相联结；三、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主张；四、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呼吁。

“西体中用论”的核心价值在进化论，而这点正是“中西调和论”的支持者所批判的。“中西调和论”一般被视为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在这一方面，《东方杂志》派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归纳而言，《东方杂志》派的“中西调和论”，批判西方现代性的三种主要内涵：进化论、科学主义与物质主义。

欧战结束，普遍主义现代性在西方逐渐褪色，而在被西方帝国主义长期霸凌的中国，则获得了近乎全面性的胜利。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发展经验下，以“救亡”作为护身符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往往以其“创新”的形象被礼赞为先知；而以“调和主义”作为文化策略的“保守派”，则常被当作复古反动来鄙视排斥。低调的《东方杂志》与高调的《新青年》各自留下了历史遗产；激进的《新青年》留下了时代的惊叹号，“保守的”《东方杂志》则被当成时代的句号。

北京政府筹备参加欧战和会研究

罗毅、金光耀*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关系，学界过去讨论最多的是中国对巴黎和会的参与，特别是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①近年来，亦有学者关注中国参战问题。^②然而，中国如何筹备参加战后和会这一重要问题，迄今却鲜有专题研究。^③事实上，北京政府对参加和会的筹备很

* 罗毅，上海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金光耀，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 ① 相关研究有俞辛焯：《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邓野：《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张春兰：《顾维钧的和会外交：以收回山东主权问题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4年第23期下册；周建超：《顾维钧与巴黎和会》，《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廖敏淑：《顾维钧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石建国：《陆征祥与巴黎和会》，《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等。
- ② 如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美]徐国琦著，马建标译：《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Xu Guoqi: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③ 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三卷（1916—1920）有一节“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准备”，叙述即始于一战停战后的1918年12月，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卷（1916—1920），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47页。就笔者所见，只有廖敏淑的论文《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较多地谈到这个问题，但仍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有待揭示。见廖敏淑：《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台湾中兴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1998年。

早，且未曾间断，并随战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有过各种应对方案。这些筹备工作折射出民初外交的一些特点，并对此后的民国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藏于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的《外交档案》为基本史料，以外交部和驻外使节为主要对象，考察北京政府筹备参加欧战和会的进程，以期对民国外交尤其是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争取以中立国身份加入和会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对于时人称之为“欧战”的这场战争，北京政府一开始采取了避而远之的态度。8月6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声称“我国与各国均系友邦，不幸奥、塞失和，此外欧洲各国亦多以兵戎相见，深为惋惜。……本大总统欲维持远东之平和，与我国人民所享受之安宁幸福，对于此次欧洲各国战事，决意严守中立。”^①表达了拒战祸于国门之外的意愿。然而，对中国的东邻日本来说，这场战争是它在远东扩张势力的良机。8月23日，日本借日英同盟的名义对德国宣战，随即向山东境内的德军发起进攻，欧战的硝烟由此波及中国。至11月初，日军攻占青岛，控制了胶济铁路，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日本在山东的军事行动不但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而且造成日本势力在中国的急剧膨胀——清末形成的列强在华力量相对均衡的格局受到冲击。而这种“均势”，本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借以自保的重要条件。还在日军进攻青岛前夕，北京政府参谋部就曾提出一份说帖，一针见血地指出：“彼一占领青岛，则可以满洲及青岛两地为根据，以封锁中国北部而夹击

^① 《大总统袁世凯关于严守中立令》（1914年8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3页。

京师，故占青岛可为占据中国北部势力之起端。”^① 交通总长梁敦彦也明确告诉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马慕瑞，中国人把日本占领青岛视为对中国独立的威胁。^② 因此，日本出兵山东非仅关乎山东一省，而是关系到中国国家安全和全局利益。作为熟悉外交事务、擅长处理对外关系的政治领袖，袁世凯对山东问题的利害关系十分明白。^③ 10月2日，他对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表示，日本人“企图通过对港口和铁路的占领而控制山东，作为控制中国的基石”，日本对山东的控制“将使日本军队进入中国的心脏地带”。^④

有鉴于此，北京政府在日本入侵山东后不久即筹划解决山东问题的办法。10月7日，外交总长孙宝琦在会见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时，对日军侵占胶济铁路一事，表示“本政府因免起衅端，只好默允，然始终抗议违犯中立，俟战事平息，再为提议，以凭公断”。芮恩施认为中国此举“颇为得计”，并推测“大战后凡与有关系之国，必有大会议，于彼时必有公断，

① 《参谋部报告日本对华方策及结局说帖》（1914年8月19日），张黎辉等编辑：《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第7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② The Chargé d' Affaires in China (Mac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0, 1914,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4, Supplement: The World War*,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8, p. 174.

③ 颜惠庆、顾维钧早年均曾在袁世凯身边任职，对袁的外交才干印象深刻。颜惠庆在自传中写道：“如果说中国当时的政治家中有谁能认识到外交事务的举足轻重，那一定是袁世凯。”见颜惠庆著，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3页。顾维钧则称：“在民国的各位元首中，袁世凯可谓是例外，此人对处理对外关系颇有经验，当他任总统时，实际上同时又是外交总长。”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72页。

④ [美] 保罗·S. 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译，游燮庭校：《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9~100页。

中国不致吃亏，若现在与日本决断，会议时恐无挽回机会。”^① 对话中提到的“大会议”即指战后和会。言下之意，中国虽是中立国，但属与欧战有关系之国，故届时可将山东问题提交和会公断。这是中国外交高层对和会问题的最早关注。11月18日，北京外交部致电中国驻巴西公使刘式训，明确表示“现青岛虽下，所有关于我国各项问题，须俟议和大会解决，政府亦拟派专使前往与会”。^② 北京政府显然接受了芮恩施的看法，认为山东问题系由欧战引起，是一个同欧战相连的国际性问题，它的最终结局应该由战后召开的和平会议来决定。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谋求加入战后和会便成为北京政府解决山东问题的首选途径。不久，北京政府又安排刘式训“往欧筹备加入大会事宜”。^③ 刘在动身前，电请外交部将“历来所有关于胶事重要文件”寄往中国驻荷兰使馆，以便参考。^④

不过，此时欧战结局尚未可知，而中国作为中立国而非交战国，终究不是与欧战发生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能否出席和会更难确定。12月12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收到政事堂参事伍朝枢撰写的一份说帖，建议中国与美国联合调停欧战，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争取加入和会。该说帖指出，“欧洲战事告终，各种问题待决者甚多，而与我国最有密切关系者，则为青岛、胶济铁路及日人在鲁破坏中立诸问题是也。此项问题之解决，最忌由中日两国单独交涉，最好由国际议和大会公共解决。”在这里，伍朝枢点出了中国借和会解决山东问题的实质，即借助他国力量制衡日本。伍朝枢预料日本必百般阻挠中国参加和会，他为此提出的办法是：“我国若更加以和解或调处者之资格以入会，则反对者亦无所施其术矣。”伍朝枢还断言：“将

① 《总长会晤美公使芮恩施问答》（1914年10月7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2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720页。

② 《发驻巴西刘公使电》（1914年11月1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档案》，03-37-001-01-001。

③ 《发驻巴西刘公使电》（1914年11月28日），《外交档案》，03-37-001-01-002。

④ 《收驻巴西刘公使电》（1914年11月30日），《外交档案》，03-37-001-01-004。

来倡议讲和，出而调停者，当可推定其为美国。”因此，中国应该“联合美国同出调停”，这样“不惟可达到加入大会之目的，且能调停世界亘古未有之战争，亦为千载奇遇，于国体最有光辉，会议时我代表发言当更有力量也”。^①该说帖的主旨是，争取与同为中立国的美国联袂充当欧战调停者的角色，以确保中国出席和会，并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份说帖立意深远，显然考虑到了美国调停日俄战争的先例，希冀在当时大战还没出现一方全胜一方全败的前景下，充分发挥调停者的作用，但它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能够扮演的角色显然过于乐观。这份说帖对北京政府的决策者产生了触动。12月14日，北京外交部致电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执事前此本有联美调停战局之言，后因时机未至，暂行取消。此后晤美外部，似应便中不时提及，以为将来中美联合调处地步。”^②夏立即以此意面告美国国务卿。但美方对此态度消极，表示“调停尚非机会，至加入议和会，中国有密切关系，即不正式忝列，亦当派代表到会陈说”。^③由于美国此时尚不欲调停欧战，伍朝枢的想法立意虽好，却无法付诸实施。

12月24日，中国驻巴西公使刘式训乘船赴欧，于1915年1月9日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④在欧洲各国活动数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他认为，同盟国与协约国何方能赢得战争尚是未知数，中国目前“只宜预定宗旨，待时而动”。^⑤刘式训因病返国后，北京政府又派外交部参事夏诒霆赴欧。^⑥对刘、夏二人的欧洲之行，中国驻欧公使中，不少人颇有微词。驻比利时公使汪荣宝认为，刘式训在欧洲的活动“毫无目的”，“只能引起欧洲列强的疑虑”；驻德国公使颜惠庆则讥讽刘是在做“公费旅游”；驻荷

① 《收政事堂交说帖》（1914年12月12日），《外交档案》，03-37-001-01-008。

② 《发驻美夏公使电》（1914年12月14日），《外交档案》，03-37-001-01-009。

③ 《收驻美夏公使电》（1914年12月19日），《外交档案》，03-37-001-01-014。

④ 《收驻巴西刘公使函》（1915年2月27日），《外交档案》，03-37-001-02-008。

⑤ 《收驻巴西刘公使函》（1915年5月21日），《外交档案》，03-37-001-02-021。

⑥ 《收驻和唐公使函》（1915年12月14日），《外交档案》，03-37-001-03-027。

兰公使唐在复表示“不知道夏出行的目的何在”。^①显然，他们都觉得，在国际局势远未明朗之时，匆忙派人赴海外活动，不但有无的放矢之虞，还可能因泄露计划而招致不利后果。在这方面，北京政府与部分驻外使节看法不一。山东问题带给中国巨大压力，北京政府首当其冲，倍感焦灼，急欲寻找解决之道；而驻使们远在海外，对于驻在国情形及整个国际局势了解更为真切，倾向于采取更加审慎和稳妥的步骤。

为了确保中国能在战后以中立国的身份加入和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还致函中国驻欧美各公使，要他们设法调查国际关系史上中立国参加和会的先例：“查欧洲媾和会议，以维也纳、巴黎、柏林三大会议为最著。此三大会议时，柏林会议曾因革雷岛为土耳其领土一节，与希腊有利害关系，曾许希腊参与会议，不知关于当时希腊加入柏林大会各国外交来往文件，此时能否设法搜觅，其维也纳、巴黎两会有无相同事实。”^②由于事涉各国政府档案，这项工作进行起来十分困难，只能探寻到大致状况。驻荷兰公使唐在复函复外交部称：“闻柏林大会许希腊之参与会议，系由英国介绍。若援用此项先例，在我似应先与一强有力之国接洽在前，则临时方有门径。”^③北京政府还注意了解其他中立国家筹备议和的情况，以资借鉴。外交部为此专门发函给驻俄公使刘镜人、驻奥公使沈瑞麟：“此次巴尔干中立各国如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受欧战影响为最巨，其各该国对于战事媾和公会如何办法，有无筹备，希就近密为探询，随时报部为荷。”^④沈瑞麟调查所得结果是，巴尔干各国“对于媾和办法，就麟见闻所及，尚无

① 颜惠庆著，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1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第249、180、286页。

② 《发驻英、法、德、俄、奥、义、美和各公使函》（1915年7月3日），《外交档案》，03-37-001-03-001。

③ 《收驻和国唐公使函》（1915年10月6日），《外交档案》，03-37-001-03-014。

④ 《发驻俄刘、奥沈公使函》（1915年9月21日），《外交档案》，03-37-001-03-011。

明了之筹备”。^①

1915年夏，欧战爆发一年之际，传来罗马教廷和永久中立国瑞士将居间调解战事的消息。^② 8月25日，驻奥公使沈瑞麟致电北京外交部：“近日各界议论，咸谓日后和会主动不外教皇，地点当在瑞士。……我国期在参与和议，而与教廷、瑞士均少往来，似宜从事联络，以达加入之目的。”^③ 沈的意见引起北京政府的高度重视。8月30日，外交部复电表示赞同，并计划以沈瑞麟兼任驻瑞士公使，驻法公使胡惟德兼任驻教廷公使。^④ 北京政府对此事虽积极性甚高，但中国同瑞士和教廷之间的邦交问题却无进展，两者的调停更无踪影。^⑤

至1916年，国际上再次出现调停活动。3月23日，驻美公使顾维钧致电北京外交部：“昨见各报纷载德首相与驻德美使晤谈，有议和意，拟请美国出为调停等语。”^⑥ 顾维钧对美国的外交动向始终高度关注，将美国视为中国在外交上最为重要的依靠对象。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时任外交部参事的顾维钧就曾向总统袁世凯建议实行“联美制日”之策。^⑦ 1916年12月12日，顾氏在给外交部的电报中，通报了德国政府正式请求美国、西班牙、瑞士三中立国居间调和的消息。^⑧

① 《收驻奥沈公使函》（1915年12月25日），《外交档案》，03-37-001-03-031。

② 《发驻义高公使电》（1915年6月28日），《外交档案》，03-37-001-02-026。

③ 《收驻奥沈公使电》（1915年8月27日），《外交档案》，03-37-001-03-004。

④ 《发驻奥沈公使电》（1915年8月30日），《外交档案》，03-37-001-03-005。

⑤ 中国和瑞士直至1918年下半年欧战快结束时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而中、梵通使遭遇的难题更多，一直到1943年，中国才向梵蒂冈派出了第一位常任使节。分别参见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1页；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71页。

⑥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6年3月25日），《外交档案》，03-37-001-04-003。

⑦ 参见金光耀：《顾维钧与中美关于〈二十一条〉的外交活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第55~59页。

⑧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6年12月14日），《外交档案》，03-37-001-04-012。

此时袁世凯已因洪宪帝制而败亡，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临时约法和民初选出的旧国会也皆得以恢复。12月19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和平调解欧洲战局并以此议正式通知北京政府时，段祺瑞内阁表示愿与美国合作，并声明中国受欧战影响较任何中立国为烈，中国深知山东问题若欲获圆满解决，必须参与战后和会。^① 12月22日，外交总长伍廷芳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晤面，询问美国是否打算出席未来的和会，芮恩施答称：“和议时，其所议者，当为赔款、划分国境等问题，各战争国所自行会议者也。和议之后，当再有国际会议，以议决海上行用权、世界和平之保证等问题，美国拟于此时方行与会也，中国亦可加入。”伍廷芳当即表示中国将“步贵国之后尘”。^② 流露出追随美国参加和会的强烈愿望。稍后，芮恩施在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谈到，北京政府大多数官员都认为中国应该派代表出席和会，虽然他们担心交战国在和会上拿中国做交易，但更担心如果中国缺席和会，结局会对中国更为不利；另一方面，日本早已暗示，它乐于在和会上代表中国的利益，甚至可以接纳中国派随员加入日本代表团，这自然是中国最不希望见到的前景。^③ 由于美国与中国同属中立国阵营，以伍廷芳、伍朝枢父子和顾维钧为代表的部分外交官认为，联美是中国加入和会的最佳途径，并为此积极努力。然而，美国主导的调停无果而终。欧战爆发已逾两年，和会对中国来说仍遥不可及。

① 张忠绶：《中华民国外交史》，正中书局，1945年（上海书局《民国丛书》重印本），第207页。

② 《伍总长会晤美芮使问答》（1916年12月22日），《外交档案》，03-37-001-04-024。

③ The Minister in China (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0, 1917,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7, Supplement 1: The World War*,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1, p. 405.

二、参战后驻外使节提出各种方案

1917年初，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水艇战，美国对德断交，这是美国参加欧战的前奏，从而触发了中国国内关于参战问题的激烈争论。^①北京政府内部对此分歧甚大，段祺瑞内阁是主张参战的中坚力量，而总统黎元洪则担心参战会为皖系扩张势力创造条件，国会方面因不满段氏的跋扈而采取不合作态度，由此引起府院双方决裂和立法、行政两权冲突。冲突各方在中国是否要派员出席战后和会这一点上并无太大分歧，支持参战者固然坚信出席和会对中国十分必要，反对参战者也不反对中国参加和会。如部分反对中国参战的国会议员就表示，因山东问题牵涉中国利益，中国“已有列席与议之权。然列席与实力为二事，无实力，无以贯彻自己之主张。若图一方战国之助，预为加入，希冀均沾议和利益，窃恐战胜之利，未必归我。而战败结果，将处分我国权利为赔偿资料，此则可以豫虑及之也”。^②显然，他们认为参战并非参与议和的必要条件，中国即使不参战，也能参与议和，而中国在和会上能取得多大成果，从根本上说不取决于中国参战与否，而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实力。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这场争论发生之时，北京政府已回归临时约法体制，国会内党派林立，府院间亦相互牴牾，不似袁世凯执政时权力统于中枢。段祺瑞内阁也是由于国会因张勋复辟被再度解散，黎元洪脱离政治舞台，才得以绕开反对者，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国宣战。从此，中国成为协约国集团的一员。不管国内政坛在参战问题上曾经如何纷争，从中立国到参战国的转

^① 关于中国参战决策的详细经过，见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31页。

^② 《唐宝锜等对德抗议质问书》（1917年3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59页。

变，毕竟为中国参加战后和会提供了重要保障，北京政府的参会筹备由是进入新的阶段。1918年1月4日，北京外交部致电中国驻外各公使：“探闻各国均有委员在瑞士讨论和议，希密探如何进行，随时电部。又执事对于中国将来在和会应发表何种意见，提何种条款，并希详切直陈，以备研究。”^①恰在此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

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宣布了美政府拟定的议和条件十四款，主要涉及和平、贸易、领土三项议题，并提出了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制订的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蓝图，即：国际联盟、贸易自由和民族自决。“十四点计划”立即吸引了中国外交界的关注。驻美公使顾维钧首先做出反应，致电外交部，就其内容分析道：“与我国相关最切者即第五款，谓解决各属地问题，须以开诚公道为重，使属地人民之利益与要索政府之权利相提并重，及第十四条，谓组织万国公团，各国彼此担保政治独立与领土完全，不分大小，一体待遇云云。”^②第五条显然与外国在华各租借地有关，其中当然包括前属德国、现为日本所占的胶州湾租借地。第十四条即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构想，更是引起顾氏极大兴趣，专门为此在驻美使馆内成立一研究小组。^③

1月16日，驻英公使施肇基也就此致电外交部，建议中国将来在和会提案“应根据美十四条，其中一、四、五、六、十四诸条，皆与我有关，尤以五、六、十四三条为甚”。除与顾维钧同样提到第五和第十四条外，施肇基还注意到第一、四、六条，这三条分别是关于杜绝秘密外交、裁减各国军备和外国军队撤出俄国领土的提议。第一、四两条均对中国有利，容易理解，至于第六条与中国的关系，施肇基解释说：“俄失之地，英相宣布听俄自理，美则主持归还，我当与美一致，盖俄地不返，必谋东渐。”

① 《发驻英、法、日本、比、俄、美、丹和各使电》（1918年1月4日），《外交档案》，03-37-002-01-003。

② 《收驻美顾公使电》（1918年1月11日），《外交档案》，03-37-002-01-007。

③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53~154页。

主张对美国应该“益加欢联”，特别是要“怂恿美国并主张推及亚洲，于我日后振新有裨”。^① 其将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应用于中国的意图至为明显。

1月25日，驻法公使胡惟德致电外交部，就中国将来议和方案提出四点意见：“一、修改商约，废除片务条款，应先加入巴黎经济同盟，冀得协约国相助。二、领事裁判权，土耳其业于加入战局后撤去，我应照约改良司法，公布新律，实行废去。三、旅、大、威、胶、广等租地应商议收回，以杜远东争端，而符联军希望永远平和之宗旨。四、请联军各国减让辛丑赔款，仿美成案，专为派遣游学经费，不作他用。”并建议“以上似宜密商美总统主持公道，从中相助。”^② 这四点意见涵盖了取消关税协定和片面最惠国待遇、撤销领事裁判权、收回租借地、减免战争赔款等内容，可视同为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胡的主张显然受到了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的影响。虽然从清末开始，中国就有修约的思想和实践，但只涉及个别条约中的某些条款，属于局部修约性质。^③ 而“十四点计划”许诺要建立迥异于殖民主义体系的国际新秩序，因此在国人中激发出全面取消外国在华特权的念头。不过，此时将“十四点计划”与中国的和会提案联系起来还只是部分驻外使节的建议，尚未成为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

4月下旬，北京政府外交部成立议和筹备处。这是自欧战爆发以来，北京政府设立的第一个专司研究和会问题的机构。参与讨论议事的有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陈篆等十余人。从4月下旬到7月中旬，议和筹备处共开会15次。在讨论中涉及中国应向和会提出的要求有胶州问题、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和《辛丑条约》等。显然，山东问题不是受到重视的

① 《收驻英施公使电》（1918年1月18日），《外交档案》，03-37-002-01-023。

② 《收驻法胡公使电》（1918年1月27日），《外交档案》，03-37-002-01-029。

③ 关于清末修约的大致情况，见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第17~48页；另见[日]川岛真著，田建国译，田建华校：《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8~216页。

唯一议题。这反映出在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的激发下，北京政府对议和筹备事项的关注面有所扩大。当然，讨论中也有人提出：“此次战事直接与我国发生关系者，惟胶州问题最为重要也。”仍视山东问题为重中之重。^①

与此同时，5月4日，北京外交部再次致电驻外公使，进一步征求对议和筹备工作的意见。电文称：“研究和议事，已详一月支电。现距和局虽远，亦应及早筹备。如各国对华政治倾向及政治中心人物对华态度及议论，并我国应与何国提携，从何入手等事，均与我国参预和会有密切关系，希派员专司调查，随时电部，并望发表卓见，以备参考。”^②

这封电报明确提出了中国外交“应与何国提携”的问题。对此，驻外公使中可分为亲英美派（其中又有倾向英与倾向美之分）和亲日派。驻荷兰公使唐在复认为，战后中国在国际商贸中的地位将益形重要，正可借此联络向来重视商务的英国，“先与协定战后商务方针，予以切实表示，同时与之密商政务方肴（略），应提事项预得彼中同意，则大会时方有把握”。^③唐在复是把英国视为对中国头等重要的国家，主张以商业利益为饵，实行联英外交。驻西班牙公使戴陈霖提出，中国应同时联合英、美两国以对抗日本：“英欲保持远东势力，美则最忌日本，乘机结纳，堪以利用。”^④驻丹麦公使颜惠庆较为老成持重，认为世界局势险恶，“国际提携不易言也”，不过他仍主张联络英、美，因“其政治、道德程度较高，且与我关系密切，借以牵制日本国”，但对日本应该“敷衍”，以维持协约国统一战线。^⑤颜惠庆可说是亲英美派中的稳健派。驻美公使顾维钧则一如既往地持联美

① 《议和筹备处会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1039~1373页。该《会议录》无第一次会议记录，第二次会议于4月26日上午召开，所存最后一次会议记录为7月15日召开的第十五次会议。引文中内容为6月14日第十次会议中提出。

② 《发驻英、法、日本、意、比、美、丹和各使电》（1918年5月4日），《外交档案》，03-37-002-01-044。

③ 《收驻和唐公使电》（1918年5月10日），《外交档案》，03-37-002-01-050。

④ 《收驻日戴公使电》（1918年8月10日），《外交档案》，03-37-002-01-066。

⑤ 《收驻丹颜公使电》（1918年5月12日），《外交档案》，03-37-002-01-051。

立场，他认为“欧战发生，均势破坏，其方有余力且素主开放门户等主义足为我助者，厥惟美国”。^① 在驻外公使当中，也有主张对日本“一边倒”的。驻比利时公使汪荣宝认为：“欧战延长，两方疲敝已极，即和局告成，必无余力东顾，英美援击，均不可恃。将来中国命运，全视对日外交，此时惟有力谋中日提携，尚可稍减危险。”^② 汪荣宝主张“力谋中日提携”，这一亲日的态度乃是基于对欧美各国“不可恃”的判断，其出发点是现实主义的。从事后的发展来看，这一判断无疑是过于悲观了。就驻外使节的复电来看，主张亲英美的占据优势。

关于中国在和会提案，驻美公使顾维钧阐述了他的意见。他认为，中国将来主动向和会提出的议案应包括“我国由欧战直接发生各问题”和“我国所希望解决各问题”两大类，前者如山东问题、中德关系问题，后者则指修改不平等条约及取消外国在华种种特权。对于前者，顾氏断定“日、德调查必详，研究必细，事论驳诘，必以我国为鹄的”，提醒北京政府应对此做好充分准备。对于后者，顾氏明白表示应将其作为一种希望条件：“能办到一分，即是挽回权利一分，若有预备，届时可相机提议。”^③ 这样，继胡惟德之后，顾维钧又提出了全面修约的建议。顾氏早年在美留学时，就对此问题倾注了极大的心力。^④ 正如顾氏在回忆录中所说：“我把即将召开的和会视为中国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正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⑤

但并非所有驻外使节都主张将修约问题纳入和会提案。驻日本公使章

① 《函外交部》（1918年5月21日），《外交档案》，03-12-008-02-012。

② 《收驻比汪公使电》（1918年6月2日），《外交档案》，03-37-002-01-056。

③ 《致外交部报告研究议和情形函》（1918年5月4日以后），《外交档案》，03-12-008-02-011。

④ 顾维钧的博士论文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研究中外不平等条约问题的专著，见 Vi Kyuin Wellington Koo: *The Status of Aliens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12.

⑤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55页。

宗祥就向外交部建议：“纯属中国问题，如各国在华利权关系，与此次战争无直接关系者，中国当认为不应在此会提议，以杜各国共同处分中国问题之渐。”^①按章宗祥的理解，取消外国在华特权的问题不属于和会讨论范围，贸然提出必无结果，反会使因欧战而分裂的列强对华统一阵线再度形成，毕竟，他们在此问题上有共同利害关系。平心而论，章宗祥的顾虑并非全无道理，但未免过于保守。而顾维钧的见解既体现出进取的精神，又不失审慎的态度：他主张就修约问题预先进行准备，时机到来时不妨一试，但并不期其必成，更不期毕其功于一役。

山东问题本是北京政府最初考虑和会时的主要关注点，但自1915年以来，此问题出现了新的因素。一是日本为了将对山东的侵略合法化，并扩大其在华权益，于1915年1月18日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北京政府经过同日本的艰难交涉后，在日方最后通牒的胁迫下，于5月9日被迫接受《二十一条》中大多数条款，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该约规定：“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②从而为日本在战后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提供了某种形式的条约依据。二是在欧战接近尾声时，皖系主导的北京政府又与日本达成了关于山东问题的另一协定。1918年9月24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相后藤新平换文山东问题互换，在日本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确定了胶济铁路将来由中日两国合办。^③对此，章宗祥后来辩解道，“换文用意，中国当局认为有利于国家”，因当时“欧战未停”，山东问题“将来中国亦无十分

① 《收驻日本章公使电》（1918年10月31日），《外交档案》，03-37-002-02-067。

②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112页。

③ 日本做出的让步包括：从胶济铁路沿线撤走大部日军；胶济铁路由中国负责警备；胶济铁路从业员中应采用中国人；撤销日本在当地建立的民政署等。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165~167页。

把握”，万一以后和会决定将胶济铁路所有权归诸日本，“则合办预约在先，亦可收回一半权利”。^①这番话虽是自辩之辞，但置于历史场景中考察，亦有其自身的逻辑。

段祺瑞内阁本主联美参战，但美国参战后在远东对日本实行退让，与之订立了《兰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这被中国官员普遍认为是“给予日本以干涉中国事务的行动自由”；^②而日本寺内内阁则于此际大力推行新的对华政策，通过“怀柔”手段和输出资本来扩大在华利权。^③在此背景下，皖系遂转向亲日，向日本大举借款，开展中日军事合作，并就山东问题与日本达成协议。中日山东问题换文是由曹汝霖执掌的交通部直接指示驻日公使章宗祥在东京办理，事后仅由章宗祥建议将其“抄送外交部备案”。^④曹、章二人充当了皖系亲日外交的台柱。不管怎样看待这一妥协，它本身已经背离欧战之初北京政府对待山东问题的初衷。

《中日民四条约》和山东问题换文的缔结，无异于中日两国对山东问题的战后解决提前做了安排，由此增添了山东问题的复杂性。究竟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在驻外公使中出现了分歧。驻美公使顾维钧极力主张将山东问题提交和会。从日本出兵青岛到《二十一条》交涉，顾氏一直亲历其事；从这些经历中，他逐渐形成了一种认知：中国的最大威胁来自日本，

①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38号，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0、52页。

② The Minister in China (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30, 1918,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8,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0, pp93.

③ [日] 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19页。

④ 《交通部抄送中日两国交换解决山东问题文件密咨》（1918年10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06页。

只有收回山东主权，才能遏制日本侵华的势头。^① 因此，他敦劝北京政府，中国应该在和会上理直气壮地提出山东问题，不必顾虑被迫签订的中日条约。因为中日间围绕山东问题的一切条约、换文都是欧战的产物，理应交由和会来作最终裁决。^② 这与驻日公使章宗祥的观点适成鲜明对比。作为中日山东问题换文的经手人，章宗祥给外交部的建议是：“青岛问题，与日本之关系最切，应事先径与接洽。”^③ 与顾维钧的主张不同，章宗祥是赞成与日本直接交涉的。

三、北京政府确定参会方针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并任命钱能训为国务总理。这是欧战结束前夕北京政局发生的一大变化。此时直、皖间矛盾日趋尖锐，皖系控制下的安福国会于9月初投票选举两派皆能接受的徐世昌为新总统。身为北洋元老的徐世昌极具政治声望，时人评论道，“其在北派，实兼为官僚、军人两派之领袖。世凯死，足统辖北洋文武者，徐氏一人而已”。^④ 然而他毕竟是手无一兵一卒的文人总统，缺乏实力基础；段祺瑞虽已下台，但皖系在京中的势力仍不容小觑。徐世昌欲巩固和加强自身地

① 顾氏极不信任日本的对华政策，他曾在1917年致电北京政府，表示：“日本经国大政，在谋操纵中国，欧战实其千载良机。大隈迫胁于先，寺内甘诱以继，凡我有所主张，无论其先反对或即赞成，而均有利用之手续在。”见《1917年驻美公使顾维钧电》（1917年4月12日），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3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第155页。此外，顾氏在回忆录中亦坦承：“我一直对日本的最终目的怀有戒心，因而我被认为是死硬反日派。”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27页。

②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156页。

③ 《收驻日本章公使电》（1918年10月31日），《外交档案》，03-37-002-02-067。

④ 沃丘仲子：《徐世昌》，上海，崇文书局，1918年，第107~108页。

位，以避免受人摆布，欧战和会无疑是其必须抓住的机会。徐氏本人拥有多年处理对外事务的实际经验。就职当日他就通电全国，称：“内政之设施，尚可视国内之能力以为缓急之序，其最有重要关系而为世界所注目者，则为欧战后国际上之问题。”^① 显示出对外交问题的强烈兴趣和高度关注。加之新总理钱能训为其亲信，府院一致，尤有助于徐世昌在外交方面贯彻自己的意志。徐的故旧、北洋派谋士杨士骢也在此时写信给他，指出“此后外交实力全在美国”^②，鼓动他采取联美政策。这些因素对于北京政府参会方针的最终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北京政府首先训令驻美公使顾维钧，要其全力争取美国支持。10月23日，顾维钧造访美国国务卿兰辛，奉命告以北京政府加入和会的宗旨，请美方在和会上协助中国，并称“我国拟提各问题，容于开会前随时密告接洽”。兰辛表示“美政府政策素主助华，此次和会贵国既定以威总统历次演说要旨为根据，尤愿力助”。^③ 11月2日，外交总长陆征祥电告顾维钧，中国愿提问题可分三类，“一关于土地之完全，二关于主权之恢复，三关于经济之自由；三者缺一则政治之自由与国家之独立皆属空言，即威总统所谓以政治独立与领土完全之保证给予世界大小各国之目的亦不能达”，要顾氏据此同美方秘密接洽。^④ 此三点不仅表达了全面修约的意愿，且主动与威尔逊“十四点计划”挂起钩来。北京外交部还将此信息通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征求其看法。芮恩施对中国的愿望表示理解和同情，不反对将其提交和会，但认为这应该是下一步的事，和会本身首在解决与战事相

① 贺培新辑：《徐世昌年谱·卷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70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1页。

② 《杨士骢陈述对外重交美国对内先谋北系统一致徐世昌函》（1918年9月），林开明等编辑：《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第8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64页。

③ 《电陆总长》（1918年10月23日），《外交档案》，03-12-008-02-014。

④ 《陆总长来电》（1918年11月3日），《外交档案》，03-12-008-02-016。

关的问题，中国宜先致力于此。^① 北京政府还拟聘请美国政治学家韦罗璧 (W. F. Willoughby) 为总统顾问，协助中国准备和会提案。^②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对美外交已成为北京政府考虑中国参会方针及提案的重要因素。

11月11日，持续四年的欧战终于结束，中国期待已久的和会召开在即。11月14日，驻美公使顾维钧致电外交部：“风闻和会地点大约在巴黎，计年内、年初可开会。”^③ 这样，中国议和代表的选派就被迅速提上日程。还在5月间，驻法公使胡惟德就曾致电北京政府，建议组成一个以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包括曹汝霖、刘式训、沈瑞麟、章宗祥、颜惠庆、顾维钧等在内的代表团，出席战后和会。^④ 在胡惟德开列的这份代表名单中，有包括总理、外交总长和交通总长在内的政府高官，也有数位驻外使节。其中，驻丹麦公使颜惠庆和驻美公使顾维钧是留美学生，在外交上同美国亲近；而驻日公使章宗祥和交通总长曹汝霖曾留学日本，是皖系亲日外交的主要推手。10月13日，胡惟德再次致电北京，强调刘式训、顾维钧、章宗祥三人“尤必须莅席，以应时宜”。^⑤ 很明显，胡惟德是希望中国的和会外交在美、日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同时鉴于和会

① The Minister in China (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23, 1918,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9,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Volume I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2, pp. 491-492.

② The Minister in China (Reinsc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16, 1918,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9,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Volume 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2, pp. 241. 因威尔逊不希望美国公民以官方形式介入他国议和事务，此事未能实现，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ister in China (Reinsch), November 18, 1918,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9,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Volume I*, pp. 242.

③ 《驻美顾公使电》(1918年11月14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辑：《秘笈录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9页。

④ 《收驻法胡公使电》(1918年5月23日)，《外交档案》，03-37-002-01-055。

⑤ 《收驻法胡公使电》(1918年10月15日)，《外交档案》，03-37-002-02-031。

将讨论山东问题，让曹汝霖或章宗祥这样的“日本通”充任代表是很有必要的。

但北京政府最终没有采纳胡惟德的意见。11月27日，外交总长陆征祥致电驻美公使顾维钧，告诉他“政府业经决定，派祥与施、胡二使为大使，另派执事与魏注使为大使兼专门委员，参列议席”。^①即由外交总长陆征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五人出任议和全权代表。除陆征祥外，其余四人均系驻欧美国家的外交使节。而驻日公使章宗祥却被排除在外。在驻外使节这个群体中，驻日公使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加之中国在和会上肯定要面临与日本有关的问题，让章宗祥出席和会应是顺理成章的，胡惟德也一再强调章氏与会的必要性，而章氏最终仍不获膺选。这表明在即将开幕的和会上，北京政府不愿与日本进行直接的沟通或采取妥协的立场。为了在巴黎和会上显示南北一致对外，稍后北京政府又将驻法公使胡惟德换成了来自南方护法军政府的王正廷。这样，在五位代表中，留美学生出身的占到了三位之多（施、顾、王），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浓厚亲美色彩的议和代表团。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联美意向。

驻美公使顾维钧尤受西方在华舆论界关注。欧战刚结束，《大陆报》创办人密勒就断言，“顾在华盛顿有名望，很受重视”，一旦被任命为全权代表，“必定能以这种身份发挥重要作用”。^②北京政府也格外看重顾维钧。在正式决定与会代表前，陆征祥就致电顾维钧，要他“先赴欧洲，与协商各国政府接洽，并布置一切报界舆论”，并称这是阁议一致通过的决定。^③11月25日，在赴欧之前，顾维钧向美国国务卿兰辛递交了一份非正式的

① 《陆总长来电》（1918年11月28日），《外交档案》，03-12-008-02-081。

② 《汤·弗·密勒来函》（1918年11月11日），[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卷，1912—1920，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769页。

③ 《陆总长来电》（1918年11月16日），《外交档案》，03-12-008-02-040。

备忘录，依据陆征祥 11 月 3 日来电阐述了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的基本要求将基于三大原则，即领土完整、维护中国主权和经济财政独立。^① 次日，顾维钧前往白宫向威尔逊总统辞行。顾氏表示“我国人民深望十四条大纲施诸全球，庶远东亦受其益”，对此威尔逊答道“施诸远东，不免较难，但本总统决不以难而置之”。^② 表明美国将在和会上尽力帮助中国。

11 月 20 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在对众议院质询政府如何筹备参与欧战和议的答复中，仅泛泛而言“现德国兵败，乞和已成事实，我国因在协商方面，现正筹备派使赴欧参加和会”。^③ 对于联络美国，一字未提，显然是不欲外界尤其是安福系主导的国会知悉此事。12 月间，总统府设立外交委员会，以汪大燮为委员长，熊希龄等十四人为委员，负责“调查审议对外事项”。^④ 该会是梁启超、林长民二人向徐世昌建议设置的。^⑤ 汪、熊、梁、林皆为研究系要人。与此同时，梁启超以个人身份赴欧游历之前，到京与徐世昌接洽数次。^⑥ 此时研究系在政治上已与皖系渐行渐远。徐世昌以研究系人士组织外交委员会，并与梁启超数度商谈，显示出其外交考量中对皖系及其亲日外交的排斥。

巴黎和会的首要任务是处置战败国。因此，如何处理中德、中奥关系便成为北京政府首先需要决定的问题。12 月 3 日，驻丹麦公使颜惠庆致电外交部，认为德国在军事上已被彻底击败，“易于就范”，但中国对德条件

① Informal Memorandum by Koo, Nov. 25, 1918, *Koo Papers* (《顾维钧文件》), 第一盒,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藏。

② 《电外交部》(1918 年 11 月 26 日),《外交档案》, 03-12-008-02-074。

③ 《发国务院秘书厅函》(1918 年 11 月 20 日),《外交档案》, 03-37-002-03-060。

④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 第 16 卷第 1 号, 第 219 页。

⑤ 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 2 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144~145 页。

⑥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873 页。

不宜过苛，应与德国订立平等新约，这样“不但得以收回已失利权，即将来与各国修改条约，有此先例，亦易着手”。^① 驻比利时公使汪荣宝也提议，“开战以前中德所订种种不平等之条约永远取消，将来如果两国重修和好，另订平等国普通条约，德不能与其他各国利益均沾”。^② 12月13日，外交部复电颜惠庆，表示：“此次陆专使赴欧，政府颁给训条中，关于恢复德、奥国交，开有三项：一、旧约一律撤废；二、损失补偿当与各国一律办理；三、此后订约立于平等地位。”^③ 接受了颜、汪的建议。北京政府欲与德、奥建立平等国家关系无疑是明智之策。废除中德、中奥间旧约，代之以平等新约，这就在整个不平等条约体系上打开一个口子。正如颜惠庆所考虑的那样，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地清理战败国在华旧的条约权益，并与之建立和发展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那么对于中国与其他列强的条约关系势必产生积极的影响。可见，北京政府考虑对德、奥问题的出发点不在惩罚和削弱战败国，而在追求平等的国家地位。

关于全面修改不平等条约、取消外国在华特权的问题，北京政府最终决定将其列入中国的和会提案。1919年1月8日，国务院致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列出五项内容：第一，修改中外条约中涉及的排他性独占利益的条款；第二，在中国司法改革取得显著进步的情况下，撤销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第三，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并在恢复关税自主之前，提高洋货进口税税率；第四，取消《辛丑条约》规定的外国在华驻兵权，分期撤军，其余外国在华军、警部队即行撤去；第五，取消庚子赔款，改为教育和实业专款，由海关存储。“以上五项，皆举国国民所切望，并期解除远东将来国际和平之障碍，应即与各国代表切实接洽，提出大会。”^④

如前所述，对于究竟应否在和会上提出修约问题，在驻外公使中间是

① 《收驻丹、瑞颜公使电》（1918年12月5日），《外交档案》，03-37-002-04-008。

② 《收驻比汪公使咨呈》（1918年12月7日），《外交档案》，03-37-002-04-011。

③ 《发驻丹颜公使电》（1918年12月13日），《外交档案》，03-37-002-04-023。

④ 《收国务院函》（1919年2月18日），《外交档案》，03-37-003-02-013。

存在分歧的。从表面来看，修约问题并非欧战所引起，似乎不应提出和会讨论。但不容忽视的是，欧战已经造成世界格局的大变动：德、奥在战争中被击败，英、法也遭到削弱，要像战前那样肆行其炮舰政策已力有不逮；与此同时，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对外标榜反帝论，这是对传统帝国主义势力的又一打击；在此情况下，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欲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从另一个方向动摇着旧式的帝国主义统治。可见，欧战后的国际新形势对中国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争取国家独立自主是有利的。修约问题虽说与和会无直接关系，但和会本身却是欧战结束后规模空前的国际盛会，选择在这样一个场合正式、公开地表达中国的国家意志，是切合时宜的。

仔细分析这五项内容，可以看出，北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经过精心考虑的。第一项显然是为了利用各国在华利益的相互竞争以达修约目的，防止列强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第二、三、四、五项均为有条件的、渐进的修约，这是为了减少修约的阻力。诚然，全面修约仍是一种改良主义的主张，并不具有革命性。不过，若把这一主张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审视，它却是一个激进而非保守的提议，突破了清末的局部修约，转而要求国际社会对不平等条约问题做一揽子解决，相当于要求列强集体承认中国为完全独立自主之国，这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封电报标志着全面修约业已成为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

山东问题在北京政府的和会外交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本来，北京政府筹备加入欧战和会的初衷，就是为了要将山东问题交付和会审议，避免中日直接交涉。但如前所述，由于日本的威逼利诱，在欧战结束之前，中国已与日本就山东问题达成了预先安排。11月24日，山东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闻政府将派代表赴欧参与和议，所有青岛问题以及附属此项问题之权利，自应乘此提交列国平和会议，解除前约，要求付还。”^①接着，顺

^① 《收山东省议会电》（1918年11月25日），《外交档案》，03-37-002-03-074。

直、江苏、安徽等省议会也有类似的表示。^① 12月21日，国会部分参议员提出议案，请将山东问题提请和会“劝日本为无条件之交还”，同时取消与山东问题有连带关系的《中日民四条约》。^② 中国国内出现了要求推翻中日成约、收回山东权益的强大声浪。

12月3日，驻丹麦公使颜惠庆致电外交部，建议由德国在和会上“承认日本国将胶州湾交还中国之宣言为正当，特对中国剖切声明，愿听日本国折衷处置，俾日本国得践其交还之约”，同时“山东路矿由中国备价收回”。^③ 颜惠庆的这一建议有在山东问题上与日本妥协之意，反映出他一贯谨小慎微的作风。12月13日，外交部复电颜惠庆，称他的意见“与政府宗旨稍有出入，盖我国此次加入和会，对于远东问题，当以免去一二国之独断为第一要义”，如果“由德国承认日本宣言为正当，适足杜各国执言而启日本独断之渐，其山东路矿现归日人占据，若不将主权先行确定，即备价收回，仍不能打消日人势力，恐徒糜巨款，是此节尚待研究”。^④ 外交部的复电清楚无误地表明，北京政府并不打算遵守中日之间围绕山东问题已经达成的安排，而是希望借巴黎和会确定山东的主权归属。

虽然北京政府对山东问题已有决断，但在给其他驻外使节的函电中却是相当谨慎，步步为营。12月27日，驻美公使顾维钧在巴黎与美国代表团某成员会晤时，被问及中国对山东等问题所持宗旨，顾氏答道“此次和会，我国首重保障领土完全之原则，所询各端正在筹商之中，陆总长抵法

① 《收国务院交顺直省议会快邮代电》（1918年12月11日），《外交档案》，03-37-002-04-020；《收国务院交抄南京省议会电》（1918年12月12日），《外交档案》，03-37-002-04-022；《收国务院交安徽省议会快邮代电》（1918年12月28日），《外交档案》，03-37-002-04-037。

② 《收国务院来咨》（1918年12月28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第17页。

③ 《收驻丹、瑞颜公使电》（1918年12月5日），《外交档案》，03-37-002-04-008。

④ 《发驻丹颜公使电》（1918年12月13日），《外交档案》，03-37-002-04-023。

后，可望商定”。次日，顾维钧致电外交部，询问北京政府对山东等问题“抱何方针”。^① 希望北京政府在山东问题上有更明确的指示。1919年1月5日，国务院和外交部在复电中称，“山东系中国腹地，尤不愿他国有特殊势力”，对于山东等问题“自以保障领土完全为原则，已与陆专使详洽，陆到时，请与商定”。^② 仍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这是鉴于山东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而有意运用的策略。山东问题对外牵涉到与日本的关系，对内影响及于皖系的政治地位。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前景如何尚难预料，而皖系在北京仍然拥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面对此种复杂情形，北京政府有意使用迂回战术，避免公开宣示联美制日的外交方针。因此，北京政府不予明确指示，而是用暗示的手法，给中国代表团如何在和会应对山东问题留出了很大的空间，也给自己依形势变化而调整对策留下了余地。

四、结论

综上所述，北京政府筹备参加欧战和会的经过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中国参战前，争取以中立国的身份加入和会，为此进行了种种尝试，不放过任何可能的机会；中国参战后，获得了出席和会的可靠保障，议和筹备工作趋于具体化，提出了各种方案和建议；欧战停战前后，和会召开在即，由于前期准备充分，北京政府迅即敲定参会方针。

由此可见，北京政府对和会的关注不但为时甚早，而且为此持续不断地做了许多工作。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送交的四份说帖，均基于议和筹

① 《收驻美顾公使由法京来电》（1918年12月30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4~25页。

② 《发驻美顾公使电》（1919年1月5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第25页。

备而提出。^①北京政府与驻外使节、中国代表团之间函电交驰，密切注视国际情势的演变，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争取最大利益而努力不懈。掌控北京政府的北洋集团承继晚清李鸿章洋务集团，深谙外交事务的重要性。从袁世凯到徐世昌，均明了欧战和会关系中国国运至巨，故对此极为留意，绝非漫不经心；而北京政府外交官群体亦对与此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情势有相当充分的理解。

在北京政府内部，外交部始终是议和筹备工作的主要担当者；虽政局时有动荡，但筹备工作却从未中辍，表明此时中央政务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已相当高。其间，北京政府的政体架构几经变迁，仅国会就召开过两届，而无国会状态达三年之久，故国会对此事虽有介入，但影响时断时续。而府院关系及执掌中枢者的能力对筹备工作的影响不可忽视：当总统由熟谙外交且强势干练之人担任，而府院又能一致时，常能有效推进外交政策。

在筹备参加欧战和会的过程中，北京政府的决策者和外交官们所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利用和会来使中国摆脱困境——既要摆脱这次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特殊困境，也要摆脱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长期面临的国际困境。正因为如此，北京政府的议和筹备工作对民国外交产生了若干具有全局意义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由于国力的孱弱，“以夷制夷”是一种惯用的外交手法。如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利用俄、日两国在远东的利益冲突，寻求同俄国结盟以制衡日本。但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在外交上中国并无一定的依靠对象。自欧战爆发以来，中国始则与同为中立国的美国努力接近，以争取加入和会，继则将中国的长远国家目标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相挂

^① 这四份说帖分别是“山东问题说帖”、“德奥和约中应列条件说帖”、“希望条件说帖”、“废除一九一五年中日协定说帖”，见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辑：《秘笈录存》，第93~104页、第109~114页、第153~181页、第181~198页。

钩，以求在和会上取得尽可能有利于己的结果。这样，联美外交就具有了战略上的意义，并在北京政府垮台之后，为后来的国民政府所继承而成为国策。当然，对大国的过分依赖，是民国外交的一种局限，而这一局限是由时代本身造成的。

北京政府的议和筹备工作对此后中日关系的走向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谋求加入欧战和会的初衷，是要借和会来解决山东问题。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由于中日之间实力悬殊，如由两国直接交涉，中国难免吃亏。虽然在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没能按照中国的意愿予以解决，但舆论仍然反对中日直接交涉，主张将山东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寻求公断。后来，华盛顿会议以“边缘会谈”的方式，达成了有利于中国的结果，这就强化了政府和民间依赖国际会议处理中日争端的想法。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拒绝同日本直接交涉，将东北问题提交国联；七七事变后，又企图通过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来遏制日本侵略。凡此种种，皆是此种做法的延续。不过，这一做法在民国外交史上成效究竟如何，仍有待评估。

在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中，北京政府的议和筹备工作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欧战是西方文明内部危机的深刻表露，它催生了列宁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前者是要脱离西方文明另谋他途，后者则是要通过改革挽救西方文明，但这两者都从不同的方向冲击、瓦解着旧的殖民统治秩序。北京政府力图成为以西方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因此，在对待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北京政府拒斥激进的革命论，而选择了威尔逊主义，这是修约外交的重要思想资源。修约外交是与当时中国贫弱的国力相适应的，并为国民政府所承袭，成为民国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一块基石。

在北京政府筹备参加欧战和会的过程中，驻外使节尤其是主张联美的那些使节扮演了异乎寻常的重要角色。他们虽然不是最终决策者，却是北京政府外交决策的主要“智库”，他们所提的政策建议成为北京政府最终

形成的参会方针的基本依据。这印证了顾维钧在回忆录中的说法：“遇有问题，……北京政府总要发通电给各使馆，在一些未设使馆的国家，则发电给总领事馆，要求就当地舆论和对华态度，以及对北京政府最终将做出的决定可能有何反应提出报告，而且要在收到国外报告之后，方做最后决定。”^① 欧战和会是直到那时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外交活动。很自然地，这项筹备工作为顾维钧、颜惠庆、施肇基等一批具有留美背景的职业外交官发挥他们的专长提供了机会，并为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创造了条件。此后多年，这批人在民国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其基础正是在此时奠定的。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75页。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训令问题研究

唐启华*

一、前言

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过去学术研究不多，而早有定论：北洋政府亲日卖国，对日借款缔约换文，自甘丧权，种下外交失败的根源；担任代表团团长的陆征祥对和会没有准备，对外懦弱，又无力整饬代表团秩序；虽有顾维钧、王正廷等外交官的优异表现，但和会仍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权利交给日本，而北洋政府居然还训令代表签约；好在国内爆发五四运动，人民坚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促使三个亲日卖国贼辞职下台，也让代表团拒签和约，得以稍挽国权。

过去这种历史叙事结构中，民族主义及革命史观色彩太重，遮蔽了许多史实。^① 百年来国人的印象就是：凡主张签约的就是亲日卖国，主张拒

* 台湾东海大学教授。

① 例如袁成毅就指出：长期以来，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被简单认定代表的是反动的北京政府，其外交不可能有爱国可言，否定他们为争取国家和民族利益所做出的积极努力；此外，将拒绝签约的原因归结为国内人民的压力和其他外部因素，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争取和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成员也往往能以民族利益为重，做一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见袁成毅：《重评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第68页。

签的就是爱国，基本上无法对巴黎和会中国外交进行客观学术研究。

笔者认为评价中国外交成败，应看当时北京政府对和会的目标是什么而定。过去学界对于代表团训令所知甚少，最常被引用的是1919年1月8日国务院的五项提议，或是依据代表团在和会提出之四份说帖，推断中国在和会之目标。

本文依据近年公开的外交档案，重建北京外交部筹备和会以及拟定训令的过程。发现训令形成最后阶段曾与美国密切接洽，最后于1918年11月28日电达巴黎，分为普通原则、希望条件及对德奥条件三大项。次年1月8日的训令是经“外交委员会”对希望条件部分的修订。

透过对训令问题的研究，可以帮助学界更加了解中国对和会的态度，纠正过去的许多误解。

二、和会训令过去的研究成果

巴黎和会中，日本的方针和训令很明确。欧战爆发后，日本乘天佑之机对德宣战，出兵山东攻陷青岛，占领胶济铁路沿线，进而在《二十一条》交涉中，迫使袁世凯让步，取得山东及南满东蒙利权。1915年5月25日签署之《关于山东之条约》第一条即规定：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议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于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①

中国在袁世凯帝制失败后，强人消逝，段祺瑞寻求日本财政支持，以巩固北洋势力，进而试图武力统一全国；日本乘机对华贷款，强化在华优越地位，并促欧美逐渐承认日本在华优势，确立日本对东洋霸权地位，奠定国家永久之基础。1918年9月中日签署山东两铁路合同及换文，日本取

^① 王铁崖：《中国旧约章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二版，第1112页。

得在法理上对山东权利进一步的保障。

此外，日本在1917年2月与英国换文：对于在和会之际，日本提出对德国在山东省的诸权利和德属赤道以北诸岛屿的要求时，英国保证支持；日本则支持英国取得赤道以南德属诸岛屿。^① 法国于3月1日、俄国于3月5日、意大利于3月28日，做了同样保证。日本又于11月2日与美国签署《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于中国有特殊之利益，两国政府声明，在中国经常支持门户开放与工商机会均等主义。^② 就山东问题而言，日本在事实及法理上的立场十分坚定。

欧战结束，日本对和会之宗旨为：获致对该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的承认；就日本对中国独特的关系，取得西方列强承认。^③ 1918年12月26日，内田外相将原敬首相承认之《讲和三大方针》传送给牧野全权及珍田驻英大使：（1）对日本单独具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全权代表的使命是：要求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及财产，并领有德国占领的赤道以北的南洋群岛。（2）关于与日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问题，除非特殊必要，日本概不干预。（3）关于与协约国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尽量采取与各国协同步调的方针。^④

原敬内阁采对英协调，继承旧德权益为主，其他问题顺应大势之方针；后来又加上：取得西方各国对种族平等原则的无保留的承认，并将这个原则列入国际联盟盟约。

就山东问题而言，日本欲在和会取得胶州湾租借地及胶济铁路的自由

①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644~660页。

②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813~817页。

③ H. B. Morse & H. F. MacNair,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1. [美]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574~575页。

④ 服部龙二：《东アジア国际环境の变动と日本外交 1918—1931》，东京，有斐阁，2001年，第35页。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47页。

处分权；日本认为这纯粹是日德之间的问题，不认为与中国主权有关。潜在的威胁是美国宣称不承认 1915 及 1918 年的中日协议，及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尤其是其中对于秘密外交的抨击以及对民族自决的主张。

至于北京政府对巴黎和会代表团的训令，过去一直不甚清楚，学界多依据马士（H. B. Morse）之说：中国代表只有一个直接的宗旨和一个目标：保护中国不受日本的侵害，并为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物权；此外，中国希望取消对其主权的一切限制，一如中国代表提出的《希望条件之说帖》中所表示的那样。^① 或波赖（Robert Pollard）及张忠绂之说：受威尔逊十四款影响，中国代表团对于和会颇具奢望，欲一举而除去一切束缚，使中国进入自由平等之地位。中国出席巴黎会议代表团之具体目的有四：（1）收回战前德人在山东省内之一切利益，该种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2）取消民四条约之全部或一部。（3）取消外人在中国享有之一切特殊利益，例如领事裁判权、外人在华之势力范围等。（4）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家在华之政治与经济利益。^②

事实上，这是依据中国代表团在和会提出的四份说帖而来的，有倒果为因之嫌。另外，也常被引用的说法是《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所云：

出发前总统召集会议，商订应付方针，有关当局与段参战督办均列席，余亦列席。合肥发言，以此次参战，宣布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在中国之权益法权外，拟提议撤销庚子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

① H. B. Morse & H. F. MacNair: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1. [美]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第 575 页。

② Robert T. Pollar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1917-1931*, New York, 1933. 波赖著，曹明道译：《最近中国外交关系》，南京，正中书局，1935 年 2 月，第 44 页。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北平，北京大学出版部，1936 年，第 257 页。

不致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没有确定。众无异议，就此决定。^①

三、北京政府训令的形成经过

如上所述，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北京政府训令的研究相当不完整。本文依据《外交档案》，^②还原中国代表团训令的形成经过大致如下。1914年日军攻占胶州湾占领胶济铁路沿线后，“保和会准备会”受命研究中国如何加入和会，以及如何收回胶州湾租借地及胶济铁路，并向日本要求损失赔偿。但在1915年《民四条约》，及1918年9月山东两条铁路合同及换文，日本取得法理坚强地位，中国只能依赖日本多次宣言将会把胶州湾归还中国之善意。

1918年1月美国宣布十四点和平原则（Fourteen Points）后，中国朝野大受鼓舞，外交部“议和筹备处”讨论如何援引威尔逊原则，公理战胜

①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46页。

② 《外交档案》藏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其中03-37《巴黎和会》是与和会相关的文件，但该档案主要只有代表团会议录、和会期间在巴黎收到各国外文公文部分（这一份应是原件，有陆征祥、王正廷等人的阅后签字），其他都是杂件，缺少最重要的收发电。反倒是在03-13《驻比使馆保存档案》中有1918年10月—1919年3月外交部及陆征祥的收发电，应系和会期间外交部与代表团之收发电档，但是并不完全。近年《外交档案》03-13《驻比使馆保存档案》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1983年3月台北外交部将驻比利时使馆档案141卷共37函，转移给近史所档案馆，经该馆整编扫描后，于2007年末提供在线影像阅览。这一批新档案包括许多与巴黎和会及陆征祥相关的机密档案，其中03-13-067~069《陆总长在和会专电》，应是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发电原件，许多收电后有阅看者（如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等）签字，少部分有陆征祥的批示，及秘书之处理状况记录，十分珍贵。03-13-071-01《总长室和议事收发电》，是1919年1—12月北京外交部代理总长陈篆的收发电，即外交部和会收发电。这两个近年开放的珍贵档案，相当完整地呈现了巴黎和会当时的外交情境。

强权之主旨，在和会提出摆脱条约束缚之希望条件，以及收回胶州湾的可能。8月中旬，该处拟定第一份中国提出和会问题草案，包括：（1）修改1901《辛丑条约》；（2）收回前德、奥租界；（3）废除治外法权；（4）收回胶澳。^①基本上就是对德奥条件、希望条件及收回胶澳三大项。

10月中旬起，外交部指示驻美公使顾维钧试探联美，得到美国善意回应，并要中国将希望提出和会之提问题先期见告。北京政府于11月初将中国准备提出和会条件三类：一、关于土地之完全，二、关于主权之恢复，三、关于经济之自由，请顾使与美秘密接洽。^②这个草案范围相当广泛，主要是：收回租界租借地、取消驻兵权、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退还庚款等。^③美国对中国的试探，响应积极迅速而明确，并极力助中国参列和会，愿助安排陆征祥赴欧船只等，北京政府大受鼓舞，21日国务会议之后外交总长陆征祥电顾维钧，中国与美国一致行动，依恃为唯一援手，并陈述苦衷，要求协助废除《辛丑条约》。^④事实上，中国对欧战贡献很有限，而拟在和会提案的范围却很广泛，固然展现中国朝野对追求平等自由国际地位之愿望，但牵涉到太多战胜国在华之特权，相当不切实际。

11月中旬，陆征祥受命担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24日陆征祥出发前一周，告知英、美公使中国对于德奥之条件。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报告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称内容如下：（1）和约中应落实对德奥宣战时废除中德、奥条约，尤其与永久废除1901《辛丑条约》及租界；（2）有关损失与伤害，中国代表团追随协约国原则；

① CA 1039-373-2《中德宣战紧要文及议和筹备处第一至第十五次会议记录》附件，原件藏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本文引自Zhang Yongjin: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18-1920*, p. 44.

② 《陆总长2日来电》（1918年11月3日），《外交档案》03-12-008-02-016。

③ Zhang Yongjin: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18-1920*, p. 45. *FRUS*, PPC, Vol. II, pp. 509-510.

④ 《陆总长21日电》（1918年11月21日），《外交档案》03-12-008-02-053。

(3) 最终与德奥议定新约时，必须基于国际权利平等互惠之原则。

陆征祥并表达北京政府之愿望：相信友邦在和会以符合新的友好国际关系新精神之下，会安排有效保障中国之完整与独立，结束列强在华之利益与影响。^①

26日顾维钧电告外交部，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对中国预备在会提出之三大纲，表示愿意协助。^② 威尔逊对自己的理想主义外交信念十分坚定，对中国表达过多的善意，致使北京政府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只要依赖美国的善意与支持，就可以达成愿望。

同日，在巴黎之中国代表团成员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电告北京，和会随时会召开，请外交部指示提出会议各款。^③ 28日，外交部将“议和筹备处”拟定之议和宗旨，^④ 电告驻巴黎使馆，训令代表团执行：我国将来列席大会，所抱定之普通原则如下：

1. 保持与世界各国平等之地位。
2. 美总统历次宣言，其关于维持公理人道，及将来国际联合诸要端，我政府以及人民久经表示赞同，即应始终一致，力与提携，以期见诸实行。
3. 欧洲问题，或解决多年之纠纷，或恢复旧邦之独立，或各殖民地之分配，但求能做和平之保障，当以协商国多数意见为从违。

① Jordan to Curzon, Nov. 25, 1918, FO371/3693. See also Reinsch to Lansing, Nov. 24, 1918, FRUS, PPC, Vol. II, p. 507. Zhang Yongjin: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18-1920*, p. 46. 陆征祥所称，即给代表团训令中对德奥部分。

② 《电外交部》（1918年11月2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外交档案》03-12-008-02-074。

③ 《收驻英施法胡公使26日电》（1918年11月27日），《外交档案》03-13-067-01-001。

④ 《143-1收国务院函——附件一外交委员会呈》（1919年4月26日到），林明德主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中华民国七年至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第94页。

至于我国希望在大会提出问题，屡经该会讨论，兹可分为三项：一是关于土地之完全；二是关于主权之恢复；三是关于经济之自由。三者缺一则政治之自由与国家之独立皆属空言，即威总统所谓以政治独立与领土完全之保证，给予世界大小各国之目的亦不能达，恐世界终无宁岁也。

所谓土地之完全：例如各处租界及租借地、胶洲湾等处是也。租界主权名属中国，其实无异外国之土地，日清之役上海宣布中立，即明证也。其土地为一国立国之要素，今谬托租界之名以行其破坏土地完全之实，其不公平孰甚于此。至于租借地如胶洲湾、旅顺、威海卫、广洲湾等，皆昔日借口于教案或均势之说而为之，其实无异于割让。法因战败失爱、罗二省，犹四十年不忘此耻，致有今日战祸，况无故割取，不平孰甚。青岛之役，我国人民受其荼害，不知凡几，当时日本曾有宣言应归还我国；即因攻击青岛而日军占据之胶济铁路，亦应交还我国，或有相当之解决，以昭公平。

所谓主权之恢复：例如《辛丑条约》之永久驻兵于京师、领事裁判之破坏我国法权，此其最著者也。民国以来，情势变迁，人民有普通智识，断不致再有仇外之举，且欧战发生以后，各国驻兵，亦曾先后撤回，足见通海道无外兵保守之必要，事实昭然。至领事裁判一项，现在我国司法改良，法典灿备，警察监狱亦已一律改良，治外法权之收回，当可为世界所公认。

所谓经济之自由：一国经济之发达，多赖关税为之保障，吾国关税既由外人办理，条约之拘束綦严，甚至条约许可之切实值百抽五，亦不能实行，经济既无由整顿，政治之改良自成绝望。余如辛丑赔款，美国久已退还一部分，日本亦有内定退还之密告，现在协商中之主持公道者，想亦能则而效之。

除以上三端外，尚有要点如下：对于德奥如何恢复国交，自应与各国取一致态度，唯我国别有宜注意者三事：（1）我国与彼从前所订条约，于

宣战照会中曾已声言一律废止，此次会议当再申明此节。(2) 我国因战事所受损失，应如何补偿，当与各国一律办理。(3) 此后彼此订约，当依据公法原则立于平等地位。

以上前后各节，均为我国所最希望，但此次欧战他国中，有以我未能竭尽实力为言，自应审度外论，酌量进止。三公于开会列席前后，务恳加意酌夺，相机办理，总以能留伸缩余地为得体。至与此电中所述各项问题有直接间接关系之内政，如军政、财政、法律、审判、警察等，现已极力筹划进行，一并附闻。^①

这是第一份全面的和会训令，过去被学界引用过，主要分普通原则、希望条件及对德奥条件三部分。整体观之，训令的基本原则是：追求平等国际地位、与美国保持一致。平等国际地位包含：对日平等、对列强平等（如希望条件各款）及对德奥平等（如德奥条件各款）。与美国保持一致则是当时中国外交主要策略，然而这个策略要付出与日本对抗的代价。训令中并没有要在和会中针对胶州湾及《民四条约》提案，可见当时北京政府在山东问题上，打算依据中日成议解决，更没有废除《民四条约》的想法。^②

可以推断当时北京政府希望能依赖日本善意，收回胶州湾；依赖美国善意，提出希望条件并废除《辛丑条约》。然而，美国真正想做的是利用中国钳制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挑战它不承认的《民四条约》及日本在山东及中国的影响力；对于中国的希望条件，充其量只是同情，却又不允许中国脚踏两条船。陆征祥在启程前夕被迫做出抉择，只能“联美制日”，一步步走上中日对抗的道路。

12月11日，施肇基、顾维钧抵巴黎，^③ 会合胡惟德，组成中国代表团

① 《发法京中国使馆电》（1918年11月28日），《外交档案》03-13-067-01-001。

② 中日《民四条约》即一般通称之《二十一条》。

③ 《顾公使19日来电》（1918年12月19日），《外交档案》03-12-008-03-027。

之先遣部队。20日，施、胡、顾三使对训令提出意见称：

承示我国对于和会所抱之普通原则与希望，及对德奥恢复国交办法，……其中希望各端虽非直接由欧战发生，且系牵动联邦利益者为多，在会提议或有不便，然与我国前途及东亚永久和平，关系均巨，自当悉心研究，协力进行。此外，对日胶州山东各问题，暨民国四年五月与日所订各种条约换文，均系由欧战发生，损我主权领土尤多，届时并相机提出，是否，祈核示。^①

指出训令中希望条件与和会无直接关系，不易成功，另建议应提出山东问题及中日《民四条约》问题。

四、新训令的性质

12月中旬北京大总统徐世昌设立“外交委员会”，该会领导汪大燮、熊希龄等即提案讨论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主张之备案。^② 1919年1月8日，国务院将该会拟定之希望条件，做成五项详细的提议，电达巴黎云：

奉大总统谕，各国会议我国主张要旨前经面交陆使，并经陆使于出发前电达各使在案。美总统暨英首相迭次宣言，依其主义我国自应力求国际平等，兹更详定五项提议如下：

1. 凡中国政府与各国政府或私人所订条约或合同，有许一国或一国以上或私人之特别利益、特别专享之权利，以及各种势力范围，而为他最惠国所不能享者，提议修改之：

(1) 中国领土曾经租借与他国者，应归还中国或改为各国公共居留地，但租借地内之军港，应先一律划还中国。(2) 专管租界改为各国公共

^① 《法馆20日电》(1918年12月29日)，《外交档案》03-13-067-02-001。

^② 风冈及门弟子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92页。

居留地，德奥租界已收归中国管理，不在此内。(3) 凡以外资外债建造已成或未成或已订合同而尚未开工之各铁路，概统一之，其资本及债务合为一总债，以各路为共同抵押品，由中国政府延用外国专家，辅助中国人员经理之，俟中国还清该总债之日为止；各路行政及运输事宜，仍须遵守中国法律，概由交通部指挥之。(4) 凡与各国订立关系铁路之合同中，有许与铁路附属地及类似附属地之一切权利，概废止之。(5) 凡矿权及农工业权已订立契约，与某一国之政府或私人而于某区域内有垄断性质，并有妨中国主权或门户开放主义者，一并取消之。(6) 各国在中国所设邮电机关，有碍中国主权及邮电统一者，概撤废之。

2. 领事裁判权照下列条件撤废之：

(1) 审判制度完全成立。(2) 民刑商及诉讼各法典完全公布实行。右二款详定按年筹备进行清单，以若干年为完成年限。

3. 关税税则应比照各国商约互惠主义，由中国自由规定，但未实行之前，现照下列各款办理：

(1) 中国应行撤废厘金制度。(2) 洋货进口税寻常品值百抽十二五，奢侈品值百抽二十五至四十。(3) 设立估价委员会。(4) 土货出口税酌量减免。

4. 《辛丑条约》所规定驻扎中国境内之军队，定期若干年撤去之；此外各国在中国境内之军队警察厅，即行撤去之。

5. 《辛丑条约》所定分年应交之各国赔款，此后概请停止；唯该款仍由中国海关专款存储，以为振兴教育实业之用。

以上五项，皆举国国民所切望并期解除远东将来国际和平之障碍，应即与各国代表切实接洽，提出大会，如何情形随时电京为要。^①

这个新提案，基本上是针对1918年11月28日旧提案的希望条件部分做修正，更具体化，成为日后《希望条件说帖》的蓝本。此外，新提案的

^① 《收国务院8日来电》(1919年1月12日)，《外交档案》03-13-006-01-001。

“研究系”色彩浓厚，与英美密切合作，尤其在（一）之（丙）铁路统一案上，与亲日的新、旧交通系针锋相对，可以说新提案比旧提案在“联美制日”上更进了一步。^①

然而，新提案仍然没有训令代表团在和会提出山东问题及废除《民四条约》两案，中国代表团之决定提山东问题，应该是1919年1月11日陆征祥抵达巴黎以后，到18日和会开幕之间决定的。至于决定提出废除《民四条约》，可能还要更晚些，过程更复杂与隐晦。

五、结语

今日评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成败，应打破过去成见。由《驻比使馆档》还原北京政府训令形成过程，及1918年11月28日旧训令的发现，学界对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可以有一些新的认识。

1918年11月28日的旧训令是北京外交部长长期筹备和会拟定出来的，反映的是段祺瑞掌权时期的外交方针，基本上是“亲日联美”，其中三个重点：基本方针——争取平等国际地位、希望条件、德奥条件。最重要的是基本方针——争取平等国际地位，此为理解北洋外交的基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巴黎和会中中国代表团提出之“山东问题”及“废除民四条约”两说帖，是旧训令中所没有的。显示在1918年11月底之前，北京政府并未准备在和会中提出这两件事，山东问题基本上要依据中日成约办理，不提出和会，对《民四条约》则根本没有要废除的意思。但在11月底到12月初，北京政府外交政策有大转变，由原来之“亲日联美”转为“联美制日”，接受美国观点，对抗日本。1919年1月12日陆征祥抵达巴黎之后，决定在和会提出“山东问题”及“废除民四条约”两案。

^① 外交委员会具有浓厚的“研究系”色彩，支持徐世昌，对抗段祺瑞及支持段氏之安福系与新、旧交通系。

1919年1月8日的新训令是对旧训令中的《希望条件》一项做补充，并非全面的新训令，主要增加了铁路统一问题。这反映了徐世昌设立“外交委员会”执行“联美制日”方针，打击段系亲日力量的意图，“研究系”与“交通系”并为此问题，不断交锋，最后在五四运动中，“新交通系”之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被“研究系”攻击为亲日派，要为山东问题之“外交失败”负责。三人遂被学生与群众指为卖国贼而下台。

北京政府之注重《希望条件》，受美国影响颇大，而美国当局也承诺会在和会支持中国，达成追求平等国际地位之目标。但事与愿违，最后《希望条件》被推诿给国际联盟，而美国没有加入国联，中国希望完全落空。事实上，美国也有其控制中国的野心，北京政府训令形成过程中，不断咨询美国意见，并受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原则强烈之影响。今日可平心检讨当时“联美制日”方针的成败，美国对中国做出许多承诺，却食言而肥。“山东问题”及“废除民四条约”两案，可说是“联美制日”的直接后果，造成中日关系紧张，北京政府内争，中国反日民族主义大兴，五四运动爆发与亲日派下台。

为什么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具有重要作用

Daniel Marc Segesser*

“感谢上帝，这是大战！”^① 1914年7月31日，奥地利将军维克多·丹克（Viktor Dankl）在他的作战日记中写下这几个字。他很自豪，俄罗斯既已下达全面动员令，他终于可以一展身手，证明自己是法兰兹·约瑟夫皇帝（Emperor Franz Joseph）麾下的优秀军官。两天之后，即使英国还未参战，法国，还有更小的瑞士宣布动员，加上德国对俄罗斯宣战，已经足够让丹克兴奋地大呼“世界大战爆发了”。^② 然而，丹克并不是第一个表达世界大战已经爆发的人。在战争爆发之前，已经有些德国军官明确表示，大英帝国势必介入，这场战争将演变为世界大战。^③ 不过，在1914年，即使很多人预期英、法殖民地可能对母国助战，但是，并没有真正明白这场即将开始的战争会扩及全球。人们更多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 任教于瑞士伯尔尼大学（University of Bern）。

① Austrian State Archives-War Archives (ÖSta-KA): Dankl Papers: B/3/5: War Diary, Vol. 1 (31/7-20/9/1914), p. 1 (31/1/1914).

② ÖSta-KA: Dankl Papers: B/3/5: War Diary, Vol. 1 (31/7-20/9/1914), p. 4 (2/8/1914).

③ Stig Förster: *The First World War: Global Dimensions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 1775-1815*, in Roger Chickering and Stig Förster (eds.): *War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1775-1815*, Cambridge 2010, pp. 101-115, here pp. 102.

以及这场战争将极具历史意义。^① 在 1914 年，或许只有极少数人体会到这场战争的全球性质，其中之一就是维克多·丹克。他除了在日记中记载他的军事活动外，还仔细观察世界上哪些地方受到战争波及。巴尔干各国首先闪过他的头脑，但是，他很早就深信奥斯曼帝国，甚至日本都可能卷入战火。^② 另一位是巴塞尔-宣教会（Basel-Mission）会长亨利克·狄培尔（Heinrich Dipper）。他向遍布全球各地，包括中国的教会发出一封信，指出这场冲突虽然集中在欧洲，却会造成无法再派传教士到各地的后果，也会迫使宣教会要尽力节约开支。^③ 对于为什么丹克预见这场战争会漫延全世界，我们不易解释。^④ 而对于基督教宣教会会长成为首先意识到战争将是全球规模的人士之一，则并不意外，因为早在 1914 年以前，他们已经在全球各地建立了自己的系统。即便如此，维克多·丹克和亨利克·狄培尔恐怕也会惊讶，全球各地士兵及工人竟然会被动员，卷入这场“大战”、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们而言，这场冲突仍然是欧洲事务。因此，奥利佛·詹士（Oliver Janz）的说法或许是对的。他说，使用“世界大战”这个词语最初是指这场战争将与全世界的历史发生关联，这个事实许多历史学者长久以来已经认同。然而，这场冲突波及全球层面，包括中国的参

① Oliver Janz: *Der Grosse Krieg*, Frankfurt am Main 2013, p. 134.

② ÖSta-KA: Dankl Papers: B/3/5: War Diary, Vol. 1 (31/7-20/9/1914), pp. 9-11 (4/8 and 5/8/1914).

③ BM Archives, Basel: *Annual Report of Basel - Mission: Letter by Heinrich Dipper, Director of the Basel-Mission, to his missionaries in India, China, the Gold Coast, Togo and Cameroon on August 10th, 1914.*

④ 根据丹克的传记和文件看得出来为什么他会有如此全球性的视角，不过，他的生平事迹到目前为止并未被详尽研究。参见 Dankl von Krasnik, Viktor, Graf, in *Österreichisches Biographisches Lexikon* 13 Vols., Vienna 1957 - 2010, Vol. 1, 1957, p. 169.

与，直到近年来才受到注意。^①

因此，这篇论文将从全球层面，审视这场战争的跨国和全球联系。首先讨论如何了解“世界大战”这个字词的含义，试图探究在什么程度下，对全球史的认识能有助于了解是什么使得这场“大战”变成真正的世界战争。其次，焦点转向欧洲之外的战场，主要看在太平洋以及中国的战事，将它们与非洲战场做比较。此外，本文试图从战争期间，非欧洲国家动员士兵、工人及粮食的脉络，展现这场全球冲突过程中的世界性“纠缠”（entanglements）。因此，中国涉入这场全球冲突也应该被放进此一全球脉络去观察。简言之，本文将用更宽广的全球视角，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建构起中国的努力与“纠缠”（entanglements），提出若干结语。

一、全球历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7月，全欧洲政治人物和公众无不把视线投向柏林，尤其是维也纳，关注奥匈帝国王室对法兰兹·斐迪南大公爵（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于6月28日在塞尔维亚遇刺事件所要做出的反应。^②该事件遍布全球报章。

但是，在欧洲之外的政治人物和公众，与欧洲情况差别很大。以澳大利亚为例，从7月初起，澳大利亚网球冠军诺曼·布洛克（Norman

① Oliver Janz: *Der Erste Weltkrieg in globaler Perspektive*, in *Geschichte and Gesellschaft* 40, 2014, pp. 147-159, here p. 147. 《关于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体关系》，参见 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2005.

② 关于7月危机有好几种叙述，但它们的评估都不同。参见 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London 2012, pp. 367-562, Sean McMeekin: *July 1914: Countdown to War*, New York 2013, pp. 21-381 and Gerd Krumeich: *Juli 1914: Eine Bilanz*, Paderborn 2014, pp. 60-182. 可是，它对全球的影响还未受到详尽分析。

Brooks) 在温布尔登 (Wimbledon) 力挫德国对手奥图·佛洛茨海姆 (Otto Froitzheim)、小麦地带干旱, 以及即将举行的选举, 占据了新闻主要版面。直到七月底, 尤其是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 澳大利亚才警觉到战争的危险, 澳大利亚政客开始保证, 若是战争爆发, 澳大利亚将支持英国。^① 部分阵营的政客找到机会, 不仅可以证明他们效忠大英帝国, 也发现可以根据战前与新西兰订立的协议, 派兵到欧洲, 对英国的参战做出重大贡献。^② 澳大利亚政府更进而采取行动, 派兵部署到德国殖民地新几内亚, 以及保护邻近海域不要遭受到青岛的德国舰队可能之攻击。在这个脉络下, 1911年之后皇家澳大利亚海军的建立, 其重要性非比寻常, 因为“澳大利亚号巡洋舰”(HMAS Australia) 是大英帝国在太平洋唯一一艘战舰, 其威力远胜过德国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巡洋舰”(SMS Scharnhorst) 和“格奈泽瑙号巡洋舰”(Gneisenau)。^③ 虽然大不列颠国家元首乔治五世国王发布宣战, 但是, 英国的各个领地, 像澳大利亚等如何卷入战火, 怎样贡献, 则决定于墨尔本 (Melbourne), 威灵顿 (Wellington)、渥太华 (Ottawa)、普瑞托里亚或圣约翰 (Pretoria or St. John's)。尤根·欧斯特汉姆尔 (Jurgen Osterhammel) 的结论说: “这场战争早在美国参战之前, 就已经是全球战争, 因为英国已在其跨洲帝国的每一处实施了战争动员。”^④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洲可以避免战争的经济后果。^⑤

① Ernest Scott: *Australia during the War* (Official History of Australia in the War of 1914-1918, Vol. 11), St. Lucia 1989, pp. 1-15. 1936年出版第1版。

② 关于战前的这方面所做准备, 参见 Daniel Marc Segesser: *Empire und Totaler Krieg: Australien 1905-1918*, Paderborn 2002, pp. 300-304.

③ 关于成立皇家澳大利亚海军的经过及其重要性, 参见 Bob Nicholls: *Statesmen & Sailors: Australian Maritime Defence 1870-1920*, Balmain 1995, pp. 40-224 and Segesser: *Empire*, pp. 254-279 & 340-342.

④ Jürgen Osterhammel: *In Search of a Nineteenth Century*, in GHI Bulletin, Washington D. C. 32, 2003, pp. 9-28, quotation p. 13.

⑤ 关于大战的经济后果, 参见 Adam Tooze and Ted Fertik: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Great War*,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40, 2014, pp. 214-238.

就中国而言，情形又与英国的领地和邻近的日本不同。中国不是英国领地，不是任何世界帝国的一部分。中国也和日本不同，没有和一个欧洲主要交战国签订同盟条约。^①中国也没有对如何参与一场世界规模战争和做出军事贡献进行准备。然而，徐国琦（Xu Guoqi）提出，在1894年至1895年中日战争的历史脉络下，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国国内的国际主义已经形成和兴起。中国政府及国内公众认为，这场世界性战争是中国重新伸张完全主权，并成为国际政治、外交和经济体系完整成员的机会。另一方面，同一批人也意识到，因为所有交战国在中国都有势力范围，欧洲战争可能导致中国变成交战区。他们更害怕的是，如果欧洲列强集中精神在欧洲作战，可能允许日本在东亚放手扩张。所以，虽然中国官方一度选择中立立场，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中国从一开始，就不会、也不愿袖手旁观这场全球性冲突。^②

尽管如此，是否可以将这场造成全球冲突、涉及许多国家的战争，称之为世界大战呢？仍然没有定论。2003年，李察·汉弥尔顿（Richard Hamilton）和霍尔格·赫伟各（Holger Herwig）提出一个相当简单的定义：如果一场战争涉及五个以上的大国，军事作战跨越两个洲以上，就可以称之为世界大战。^③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和麦可·霍华德（Michael Howard）也遵循相似的思路，宣称早先西班牙和荷兰的七年战争

① 关于英日同盟，参见 Ian Nish: *Anglo-Japanese Alliance: The Diplomacy of 2 Islands Empires 1894-1907*, London 1966, and id.: *Alliance in Decline: A Study of Anglo-Japanese Relations, 1908-1923*, London 1972.

② Xu Guoqi: “论及中国国际主义的兴起”，pp. 49-77 和 “论及中国对战争爆发的反应”，pp. 81-84。

③ Richard F. Hamilton and Holger H. Herwig, *World Wars: Definition and Causes*, in Richard F. Hamilton and Holger H. Herwig (eds.),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Cambridge 2003, pp. 1-44, here p. 2.

为第一次世界大战。^①还有，史提格·佛斯特（Stig Förster）承认 18 世纪末的一些战争可谓全球战局的战争，但是，他强调一个判据：只有在一场全球规模的战争中，非欧洲国家扮演主要角色，为本国利益而战，才能称得上世界大战，在大战之中各式各样的地方性、区域性冲突汇合成交战国纠集同盟的全面战争。根据佛斯特理论，1792 年至 1815 年的法兰西战争构成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②

然而，从一般的全球史观点看，这些似乎还不够。对一场战争属性的判断，以全球视角看其交战过程，国与国之间如何交流是重点。^③ 1914 至 1918 年大战，各国之间相互交织的深度，甚于以往历史上的战争。一个欧洲国家的决定，不仅影响自身或所处的洲，也扩及其他洲和国家，并对世界构成重大影响。进入 19 世纪，交通运输，运送人员和货品，以及通讯等体系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使全球整合成为可能。^④ 从而使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战场交织在一起，甚至非欧洲国家的士兵和劳工也可以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争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全球的粮食贸易，是 19 世纪全球整合的产物，在大战期间受到严重影响和改变。自此，全球经济和社会交织在一起，使得非欧洲国家的决策者，自 1914 年 7、8 月间全球战火开始，不

① Michael Howard: *Der Erste Weltkrieg-eine Neubetrachtung*, in: Jay Winter, Geoffrey Parker and Mary R. Habeck (eds.): *Der Erste Weltkrieg und das 20. Jahrhundert*. Hamburg 2002, pp. 19 - 33, here p. 19; Geoffrey Parker: *Spain and the Netherlands, 1559-1569*, London 1979, pp. 62-63.

② Förster: *First World War*, pp. 102-103.

③ Sebastian Conrad: *Globalgeschichte: Eine Einführung*. München 2013, pp. 7-28. 另参见 Jay Winter's *Comments on a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Santanu Das, Gerhard Hirschfeld, Heather Jones, Jennifer Keene, Boris Kolonitskii, Jay Wint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World War I: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in: *Zeithistorische Forschungen* 1/2014, 电子版为: <http://www.zeithistorische-forschungen.de/1-2014/id=5009> (October 23, 2014).

④ Dieter Langewiesche: *Das Jahrhundert Europas: Eine Annäherung in globalhistorischer Perspektive*,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013, pp. 29-48.

得不扮演积极角色。

二、欧洲以外的战场

宣战之前，英属黄金海岸^①和德国殖民地多哥（Togo）之间的边界就爆发军事作战。1914年7月31日，英属黄金海岸驻军代理指挥官布莱安（F. C. Bryant）上尉已经在动员其部队，比英国对大英帝国部队下达总动员令、向德国宣战，提早了四天。^②8月5日，布莱安率军从库马希（Kumasi）和阿达（Ada）开始进犯多哥，主要目标是抢在法国从达荷美（Dahomey）^③发动攻势之前占领多哥。多哥副总督汉斯·乔治·冯·杜尔宁（Hans George von Doering）少校提议这个德国殖民地中立，英方不接受，德军在1914年8月25日投降。^④

确切地说，大英帝国开的第一枪发生在澳大利亚的女王崖（Queens cliff），时间距英国宣战仅有几个小时。^⑤下达开枪命令的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爱德华·米连（Edward Millen），意在制止德国蒸汽货轮“普法尔茨号”（Pfalz）离开墨尔本港口。^⑥这件事也显示：和欧洲、非洲的军事作战不

① 黄金海岸（British Gold Coast），1957年独立后，更名迦纳（Ghana）。

② 英国部队动员令于1914年8月4日下午4时下达，对德宣战是下午11时。参见 John M. Bourne: *Britain and the Great War 1914-1918*, London 1989, p. 17 and John Connor: *Anzac and Empire: George Foster Pearc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ustralian Defence*, Cambridge 2011, p. 45.

③ 今名贝南（Benin）或法属西非（French West Africa）。

④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Africa*, Oxford 2004, pp. 13-18.

⑤ 由于时差的关系，英国在1914年8月4日宣战，在澳大利亚东部已是1914年8月5日上午9时，参见 Connor: *Anzac*, p. 45. 第一枪在中午过后不久开出，也就是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914年8月5日上午2时刚过不久。

⑥ Scott: *Australia*, pp. 35-37.

同，亚洲及太平洋的作战发生在海上、而非陆地。^①“中央列强”在欧洲之外及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德国海军中将马克西米连·葛拉福·冯·史毕（Maximilian Graf von Spee）所率领的巡洋舰队，基地是中国的青岛。但是，在法兰兹·斐迪南大公爵于塞尔维亚遇刺之前八天，这支巡洋舰队已经离开青岛基地。战争一爆发，青岛的德国当局立刻征用两艘辅助巡洋舰，由史毕中将原先留下的军舰“埃姆登号”（Emden）以及一支补给船和运煤船（colliers）组成的船队陪同出海，便在太平洋有所动作，避免被困于青岛海军基地。船队于8月12日在马里亚纳群岛与史毕中将会合。此时，史毕中将运用它的舰队在太平洋进行巡弋作战，阻扰协约国，主要是英国在本地区的生意。史毕将军明白，只要中国，尤其是日本保持中立，情势对德国有利。但是，一旦日本宣战，后果危险。然而，日本终于在8月23日对德宣战，并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将它在中国的租界移交给日本。德国未予答复，日本遂对德国宣战。当时，史毕中将知道他的唯一生机是离开太平洋，但是，他却决定尽其所能扰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的军事作战，并炮轰法国在太平洋区域的主要港口帕皮提（Papeete），即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首府。史毕中将舰队是强大的，不会轻易被锁定在某一地方；在日本海军真正部署到太平洋之前，协约国军舰唯一堪可和它的巡洋舰匹敌的只有“澳大利亚号”。因此，史毕中将舰队驶往马歇尔群岛，后来又到达德国殖民地萨摩亚。但是，该岛稍早已经被新西兰部队占领，这一占领借助了皇家澳大利亚海军的掩护。同时，史毕中将派巡洋舰

^① 关于欧洲的作战，参见 Lawrence Sondhaus: *World War One: The Global Revolution*, Cambridge 2011, pp. 63-97. 非洲的海战仅只是占领喀麦隆（Cameroon）的杜阿拉（Douala）和摧毁三兰港（Dar-es-Salaam），即东非塔尚尼亚港口的无线电台，参见 Daniel Marc Segesser: *Der Erste Weltkrieg in globaler Perspektive*, Wiesbaden 2010, pp. 112-113 & 116.

“埃姆登号”前往印度洋，以扰乱英国在该地区的商业。^①

史毕中将在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首都阿皮亚（Apia），该国最大港口城市海域，并没看到英国或澳大利亚船只的踪影，便放弃对这个港口的炮轰，以节省弹药。之后，他决定离开萨摩亚，向西北方出发。新西兰军方注意到德国海军动向，紧急向威灵顿报告。这个警报与来自澳大利亚总督隆纳·穆洛-佛格森（Ronald Munro-Ferguson）的警告相似，新西兰总督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下令载运新西兰远征军的船队立刻回防，他不清楚史毕中将军的舰队是否要开进塔斯曼海（Tasman Sea）。英国海军部当然不乐见这样的决定，终究还是向新西兰政客的要求让步，同意派英、澳及日本舰队陪伴运兵船队跨渡塔斯曼海。显而易见，史毕中将军成功地让英国人认为他们会继续待在南太平洋，进而诱使英国海军进入这片海域。9月22日，史毕中将军炮轰帕皮提（Papeete），英方才意识到史毕中将军舰队打算离开太平洋。即使如此，英方还是不清楚，究竟有多少艘德国船舰真正和这位德国海军中将军一起退出。那时，德国“埃姆登号”在印度洋、“莱比锡号”在美国西海洋，其扰乱太平洋贸易的政策还未终止。后者显示仅仅凭借一艘巡洋舰，就有能力建立保罗·哈尔彭（Paul Halpern）所谓的“虚拟封锁”（virtual blockade），扰乱太平洋沿岸许多美国、墨西哥和亚洲港口的贸易。直到10月份，“莱比锡号”奉命到复活岛与史毕中将会合，太平洋的贸易环境开始恢复正常。11月9日，“埃姆登号”在科科斯群岛（Cocos Islands）被击沉，最终恢复正常。^②事实上，在整个大战期间，太平洋海上商务一直都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安全感。这是因为，从战前就一直谣传，德国商船将会改成辅助巡洋舰，并会扰乱协约国的商业。当时已经

① Sondhaus: *World War*, pp. 100-103; Paul Halpern: *A Nav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 London 1994, pp. 71-76.

② Halpern: *Naval History*, pp. 74-80; Segesser: *Empire*, pp. 346-347 & 374-376; Sondhaus: *World War*, pp. 103-104.

有些船只沉没，可是原因不明，使得谣言平添不少力量。^① 虽然，就军事而言，在亚洲、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战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这些海战还是延迟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进驻欧洲，而且对相关国家，包括中国产生了严重的短期经济后果。

史毕中将的行动阻滞了协约国占领太平洋的德国殖民地。比起澳大利亚要占领新几内亚的部队，新西兰要占领萨摩亚的部队准备在先。这不是因为澳大利亚政府没把占领新几内亚置于优先位置，而是英国海军部决定利用皇家澳大利亚海军的船只先载运部队。因此，直到9月11日，澳大利亚部队才到达拉包尔（Rabaul），即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港市，不到一个星期之后，终于迫使德军投降。虽然英国政府明确表示，占领太平洋这些德国殖民地，并不等同于将它们兼并，澳大利亚政治及经济领导人却一致认为在战争结束时将它们归还是不能接受的。^② 新几内亚的澳大利亚当局以为，除了萨摩亚之外，德国投降指的是德国在太平洋殖民地统统投降。对于日本对德宣战，他们起先也没有那么在意。英国主管殖民地事务的国务大臣在8月11日告诉澳大利亚政府说，“日本的行动不会扩张到超出中国海的太平洋，也不会超出到中国海以西的亚洲水域或任何其他外国领土，德国在东亚大陆所占领的领土则例外”。^③ 两个星期后，写这封信的同一人士另写两封信予以确认。同一时间，英国政府恳求澳大利亚不要对这

① 大部分船只是因撞上德国商船布放水雷而沉没。参见 Nicholls: *Statesmen & Sailors*, pp. 247-248; Segesser: *Empire*, p. 397.

② Segesser: *Empire*, pp. 344-346.

③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Canberra (NAA (ACT)): CP 317/6 Bundle 1: Copy of Cablegram received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ated London, 11th August, 1914, 6.15 p. m. 关于澳大利亚做出的德国投降假定，参见 Arthur W. Jose: *The Royal Australian Navy (Official History of Australia in the War of 1914-1918, Vol. 11)*, St. Lucia 1987, p. 99. 第1版1928年出版。

个议题发表任何公开声明。^① 基于这个假设，澳大利亚政府直到十月才开始准备真正占领马里亚纳群岛和卡罗来纳群岛。然而，这时候日军已经开始进入这些群岛，并且在英国政府保持缄默下，后续部队登陆赤道以北几乎所有岛屿。澳大利亚当局因而完全白费力气，最后只得接受在这些岛屿中，只有诺鲁（Nauru）由澳方占领。^② 1914年12月6日，英国殖民地事务国务大臣刘易斯·哈寇德（Lewis Harcourt）私底下、秘密地告诉澳大利亚总督穆洛-佛格森，英国政府没有办法，只能接受日本协助找出史毕中将巡洋舰队的下落；为此，日本得到的报酬不只是在中国可以自由行动，还有权占领赤道以北的德国殖民地。哈寇德要求穆洛-佛格森，澳大利亚政府要有思想准备，大战结束时，日本会力争保有这些领土。^③ 所以，大战期间的日本和澳、新关系一直紧绷，不足为奇。大战期间，发现日本海军访问萨摩亚、诺鲁或新几内亚时，搜集这些德国殖民地在澳、新占领下的军事和经济情报。^④ 虽然，中国及其当局没有涉及太平洋战事，但是，东亚和太平洋战场息息相关，太平洋局势强烈影响整个东亚，反之亦然。在这个时期，澳、新当局都没有和中国政府直接接触，固然因为外交政策在当时属于母国的特权，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流行的种族歧视，阻碍了太

① NAA (ACT): CP 317/6 Bundle 1: Copy of Cable se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ated 24th August, 1914 and De-cypher of cab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ated London, 25th August, 1914, 1.30 p. m.

② Hermann Joseph Hiery: *The Neglected War: The German South Pacific and the Influence of World War I*, Honolulu 1995, pp. 27-29.

③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NLA): Novar Papers: MS 696/1306-1309: *Private and Secret Letter b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Lewis Harcourt, to Governor-General Ronald Munro Ferguson, December 6, 1914.*

④ Hiery: *Neglected War*, pp. 29-30.

平洋地区英国殖民地把中国视为可能与日本发生冲突时一个潜在盟友的想法。^①

除了德国东亚舰队的活动之外，中国山东半岛的军事作战是东亚及太平洋最重要的战事。虽然德国在萨摩亚和新几内亚的殖民地很快就投降，但是，它在胶州的租借地则没那么轻易就范。在“埃姆登号”率队离开青岛之后，中央列强其余海军人员，包括奥匈帝国巡洋舰“伊丽莎白女王号”（Kaiserin Elisabeth）官兵仍留在青岛。他们奉命上岸和支持艾佛瑞德·梅耶-瓦德克（Alfred Meyer-Waldeck）总督的守军，后来成为青岛守军占三分之二的兵力。^② 虽然中国在8月3日宣告中立，要求交战国不在中国领土交战，也促请英国公使探明日本的意向，但是中国没有能力制止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中方与德国，以及与英、美外交官就德国将租界返还中国一事进行谈判，也没有结果。^③ 六万名日军，加上英国从租借地威海卫派出的一支后援部队，完全可以轻易攻克青岛德国守军。但是，他们决定在重炮炮火支持下小心翼翼推进，这样做，固然降低日、英士兵牺牲，却给青岛造成惨重损害。11月7日，梅耶-瓦德克弹尽援绝，下令凿沉所有军舰之后投降。^④ 将近四千六百名守军，成为日军在整个大战期间俘虏的最大的一群战俘。虽然他们得到合理的对待，却没有在1920年前被

① David Lowe: *Australia in the world*, in Joan Beaumont (ed.): *Australia's War 1914-18*, St. Leonards NSW 1995, pp. 125-148, pp. 127-131. 关于中国（金矿）工人对白澳政策源起的重要性，以及澳大利亚种族及文化霸权乃是它对中国及华人歧视的根源，参见 Eric Richards: *Migrations: The Career of British White Australia*, in Deryck M. Schreuder and Stuart Ward (eds.): *Australia's Empire*, Oxford 2008, pp. 163-185, pp. 167-168.

② Sondhaus: *World War*, p. 101.

③ Xu Guoqi: *China*, pp. 87-90. 另参见侯中军对此的贡献。

④ Sondhaus: *World War*, pp. 101-103. *On the naval encounte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battle of Qingdao* cf. 另参见李杨对此的贡献。

遣还德国和奥地利。^① 不少人也向保护国，即 1917 年以前是美国，然后是瑞士，以及国际红十字总会抱怨，他们明明是平民，却被当作战俘关在青岛。^②

与亚太地区其他相比，青岛遭到的破坏尤其惨重。但是，和欧洲，或者是与喀麦隆和东非相比，则相形见绌。德国在喀麦隆的部队人数不多，但是，直到 1916 年他们能够控制住喀麦隆中部、北部广大地区。尤其是在雅温德 (Yaounde) 和加鲁阿 (Garua) 地区，他们持续抵抗英、法部队从海上或从中非的进击。^③ 不仅因为雨季，也因为没有太多路或铁道，迟滞了作战，负伤和热带疫疾造成许多人死亡。最后，在 1916 年初，德军 (主要是非洲佣兵) 不是投降，就是越过边界进入西班牙殖民地布兰科河 (Rio Muni)，最终被送进集中营。^④

在德属东非，战争比欧洲打得更久。即使在德国驻防部队 (Schutztruppe) 司令官保罗·冯·莱托-福尔贝克 (Paul von Lettow-Vorbeck) 逃出这个殖民地，以免被追个不停的南非部队抓到的情况下，还是坚持不放

① 关于德、奥战俘在日本的情况，参见 Gerhard Krebs: *Die etwas andere Kriegsgefangenschaft: Die Kämpfer von Tsingtau in japanischen Lagern 1914 - 1920*, in Rüdiger Overmans (ed.): *In der Hand des Feindes: Kriegsgefangenschaft von der Antike bis zum Zweiten Weltkrieg*, Cologne 1999, pp. 323-337, Ulrike Klein: *Deutsche Kriegsgefangene in japanischem Gewahrsam 1914-1920: Ein Sonderfall*, Dissertation an der Albert-Ludwigs-Universität zu Freiburg i. Br. 1993, pp. 48 - 273 and Charles Burdick and Ursula Moessner: *The German Prisoners - of - War in Japan, 1914 - 1920*, New York 1984, pp. 7-59.

② *Archiv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Geneva: C G1 A 19-29: *Correspondence of Dr. Fritz Paravicini in regard to his visit of prisoner-of-war Camps in Japan in 1918*.

③ 尼日利亚一地区名。

④ Stig Förster: *Der globalisierte Krieg: Der Erste Weltkrieg war nicht nur eine europäische Katastrophe*, in Stephan Burgdorff and Klaus Wiegrefe (eds.): *Der Erste Weltkrieg: Die Ur - Katastrophe des 20. Jahrhunderts*, München 2004, pp. 198 - 210, p. 201 and Strachan: *First World War in Africa*, pp. 19-60.

弃抵抗。早在1914年，保罗·冯·莱托-福尔贝克就宣示决不会投降。当时，英国舰队杀向三兰港，他的长官亨利克·席尼（Heinrich Schnee）总督命令他退出三兰港，他抗命不从。皇家印度陆军一支部队作为大部队的先锋试图登陆，预备占领此一德国殖民地。他成功地守住了唐哥（Tango）。1914年11月，捷报迭传，造就他的骁将名望。起先站在谨慎的总督一边的许多屯垦者，现在公开宣布支持保罗·冯·莱托-福尔贝克，因而可以迫使席尼接受在沿海、在内陆全面防守的作法。^①英国和印度军事当局对于战争一开始的失利，没有其他备案。直到1916年，指挥权交给詹·克里斯提安·史茂茨（Jan Christiaan Smuts）和雅可布·范·狄芬特（Jacob van Deventer）这两位南非将官后，战事重启。在中间那段期间，这个德国殖民地的政治和军事当局，开始动员黑人劳工及经济资源，特别是征集挑夫替军方服务，以及补给资源，这些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正在这个历史脉络下，历史学家塔尼亚·布赫（Tanja Bühler）讨论了德属东非洲的经济和劳工总动员的状况。^②纵使如此，即使在殖民地区的战争所需要的物品，并不是都可以在境内生产，还是需要依赖战利品和突破封锁而得以补充。^③

1916年3月，南非部队和刚果公共武装力量（Congolese Force Publique）从北方及西方入侵这个德国殖民地，并占领它所有大城市，南非司令官的目标是占领此一德国殖民地。他们希望能以德属东非洲的领土

① Tanja Bühler: *Die Kaiserliche Schutztruppe für Deutsch-Ostafrika: Koloniale Sicherheitspolitik und transkulturelle Kriegführung 1885-1918*, Munich 2011, pp. 401-431; Strachan: *First World War in Africa*, pp. 93-129.

② 塔尼亚布赫博士（Dr. Tanja Bühler），罗斯托克大学历史学院（Historisches Institut der Universität Rostock）

③ Bill Nasson: *Africa*, in Jay Win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3 Vols, Cambridge 2014, Vol. 1, pp. 433-458, 438-440; Bühler: *Kaiserliche Schutztruppe*, pp. 446-452, 关于全面动员, p. 450; Strachan: *First World War in Africa*, pp. 132-133.

拿来和南边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的领土做交易，因为南非政客和军官覬覦莫桑比克已经很久了。虽然史莫茨试图逼迫保罗·冯·莱托-福尔贝克进行决战，保罗·冯·莱托-福尔贝克却避免固守一地、一再撤退，而又拒绝投降。他宁愿以游击队领袖之姿继续战斗下去。为此，他的驻防部队需要经常用武力招募挑夫和采购粮食。结果造成许多非洲百姓躲进树林，这下子殖民地内许多地方农作荒芜、无人打理。发生疫疾蔓延，行政管理瓦解，最终造成殖民地完全崩溃。^① 在这个时期，虽然军事行动受害者人数不算太高，只有约一万五千名军人（欧洲人及非洲人）阵亡，牺牲最惨重的是非洲挑夫，死亡人数在十万至三十万之间。后来，在战争末期，西班牙流行感冒和一场饥荒造成更多非洲人丧生。我们没有确切的数字，大多数人估计有六十五万人丧生，占人口十分之一左右。^② 这个数字远超过亚洲或太平洋的牺牲人数。为了从全球层面认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球范围缠战，超越欧洲或亚太战场，把焦点放在中国，或者说主要是山东省，以为那里是1914年的一个主要战场，那是不够的。东非战事显示，其持续时间贯穿于整个战争，而在中国境内的战事在1914年底已经停止。

三、世界大战中来自非欧洲国家的士兵、工人和粮食

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战，不仅在全球层面及战场纠缠的方式与从前战争不同，而且在派遣澳、新、日本军队入太平洋，甚至日军进入中国方面，或是印度和南非部队到东非作战，也与从前大不相同。尤其是在英国自治领地和印度，以及西非和中非，也征募部队到欧洲作战。第一批到达

① Bühner: *Kaiserliche Schutztruppe*, pp. 453-473; Janz: 14, pp. 161-163; Strachan: *First World War in Africa*, pp. 131-184 (on the guerilla leader style of Lettow-Vorbeck p. 177).

② Janz: 14, pp. 164-165; Nasson: *Africa*, pp. 441-442; Michael Pesek: *Das Ende eines Kolonialreiches: Ostafrika im Ersten Weltkrieg*, Frankfurt/Main 2010, p. 123.

的非洲部队在战争初期对法国民心士气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非洲和印度部队抵达法国，并参加了马恩河（Marne）战役，被视为“全世界”都支持法国对抗“残暴侵略者”的表征。^① 也就是，在法国陷入“最黑暗的时刻”，来自世界各地的种族（在整个大战期间一直是个重要因素）参加保卫法国，且扮演相当不重要的角色^②。虽然卡通和明信片的宣传必须列入考虑，有两张明信片却显示至少在这个背景下，非白人的支持颇受重视。有一张明信片印了卡通图案，显示一个黑人非洲士兵向德军战俘解释，法国有黑人子女，也有白人子女，所有子女都来保卫母亲（法国）。^③ 另一张明信片可能是画来提振士气，它显示锡克族（Sikh）士兵在法国举着招牌：“前进的印度绅士惩罚德国流氓”。^④ 整体而言，被动员、派到欧洲之内及之外战场的士兵，计约印度一百四十万人，加拿大六十万人，法属北、中、西非殖民地四十四万人，澳大利亚三十三万人，南非十四万四千人，新西兰以及法属亚洲、太平洋和东非殖民地各约十万人，另有纽芬兰一万人。虽然和欧洲主要交战国相比，这些人数并不多，可是若以它们、尤其是英国各自治领地的适龄青壮男子人数而论则是相当可观。^⑤

① Jacques Frémeaux: *Les Colonies dans la Grande Guerre: Combat et Épreuves des Peuples d' Outre-Mer*, Paris 2006, pp. 116-118.

② The contributions to Santanu Das (ed.): *Race, Empire and First World War Writing*, Cambridge 2011.

③ 这张明信片刊印在 Marc Michel: *Les Africains et la Grande Guerre: L' appel à l' Afrique*, Paris 2003, 在 p. 127 和 p. 131 中间.

④ National Army Museum, Chelsea: Image Number 1007142, 电子版 <http://www.nam.ac.uk/online-collection/detail.php?acc=1983-10-275-1> (October 15th, 2014).

⑤ 关于法国的人数，参见 Frémeaux: *Colonies*, p. 63, 关于印度的人数，参见 Santanu Das: *Indians at home, Mesopotamia and France 1914-1918: towards an intimate history*, in Das (ed.): *Race*, pp. 70 - 89, p. 70, 关于各自治领的人数参见 Gerhard Hirschfeld, Gerd Krumeich and Irina Renz (eds.): *Enzyklopädie Erster Weltkrieg*, Paderborn 2003. 所收各条之人数。

纵使如此，这是一场不仅仅只是士兵的战争。动员也扩及经济、而且规模之大史无前例，它可以称得上“总体战”（total war）。^① 2000年，历史学教授凯斯·格里弗斯（Keith Grieves）宣称：至少“在大战的最后一年……因为伦敦斯坦波尼区的制绳工人在战争中的贡献，使得他们获得了与战壕士兵的平等待遇地位”。^② 从欧洲之外动员的经济和劳力资源，即在1918年以前，已经在协约国的作战上扮演相当分量的角色。^③ 从另一方面而言，中央列强没有这种资源可用，因此它们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向受占领

① 关于总体战的概念，参见 Stig Förster: *Das Zeitalter des totalen Krieges, 1861–1945: Konzeptionelle Überlegungen für einen historischen Strukturvergleich*, in *Mittelweg* 36, 8, 1999, 12–29, Daniel Marc Segesser: *Der Erste Weltkrieg: Ein totaler Krieg in globaler Perspektive?* In Stefan Karner and Philipp Lesiak (eds.): *Erster Weltkrieg: Globaler Konflikt-lokale Folgen: Neue Perspektiven*, Innsbruck 2014, pp. 23–41, and id.: *Controversy Total War*, in Ute Daniel, Peter Gatrell, Oliver Janz, Heather Jones, Jennifer Keene, Alan Kramer, and Bill Nasson (eds.): *1914–1918–onlin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ssued by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2014–10–08. DOI 10.15463/ie1418.10315, last modified 2014–10–05, 电子版 http://encyclopedia.1914-1918-online.net/article/Controversy-Total_War (October 15th, 2014).

② Keith Grieves: *Lloyd George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British War Economy*, in Roger Chickering and Stig Förster (eds.): *Great War, Total War: Combat and Mobilization on the Western Front*, Cambridge 2000, pp. 369–387, p. 384.

③ Frémeaux: *Colonies*, pp. 72–93; Michel Africains, pp. 131–170; Segesser: *Empire*, pp. 437–494; Xu Guoqi: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MA 2011. Kimloan Hill: *Indochinese Workers in France (Indochina)*, in Ute Daniel, Peter Gatrell, Oliver Janz, Heather Jones, Jennifer Keene, Alan Kramer, and Bill Nasson (eds.): *1914–1918–onlin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ssued by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2014–10–08. DOI 10.15463/ie1418.10373, last modified 2014–10–05, 电子版 [http://encyclopedia.1914-1918-online.net/article/Indochinese_Workers_in_France_\(Indochina\)](http://encyclopedia.1914-1918-online.net/article/Indochinese_Workers_in_France_(Indochina)) (October 23rd, 2014) 另参见 Olga Alexeeva 和 Paul Bailey 的论文。

国家征集资源和人力，甚至要利用战俘。^① 因为在欧洲作战缺乏资源、人力短缺，成为导致动员非欧洲世界的经济资源和劳力背后的主因。不过，从非欧洲世界征集劳工，动员原料、粮食和工业产品，固然对欧洲重要，但是，也为欧洲之外的参与者加以改造，以在很大程度上更符合非欧洲世界的利益。

1914年大战开始时，澳大利亚已经采取措施武装其部队，预备派到大英帝国有需要的任何地方。1901年，国协（Commonwealth）成立后头几年，澳大利亚政府和军方已经集中力量建立军队。同年，爱德华·贺顿（Edward Hutton）少将在澳大利亚防务的备忘录中指出：澳大利亚需要成立自己的轻武器弹药工厂、轻武器制造工厂，以及枪炮锻造厂。身为军官，他知道储藏设施要比生产武器和弹药来得重要。^② 1905年，殖民地防务委员会表示，澳大利亚“还力有未逮，不足以承担某些部会所筹划的重大责任”，它也指出即使“日本人口四千四百万，直到四年前都还没有政府公营钢铁厂，它借重进口枪炮和中国打一场不小的战争”。^③ 尤其是澳大利亚劳工党政客力促成立公营军火工厂，他们的国防事务发言人、1911年至1913年担任国防部长的乔治·佛斯特·皮尔斯（George Foster Pearce）认为在需要时刻、民间部门不会优先受理政府委办合同。^④ 战争开打后，

① 参见 Uta Hinz: *Gefangen im grossen Krieg: Kriegsgefangenschaft in Deutschland, 1914–1921*, Essen 2006, pp. 278–304; Jens Thiel: *Menschenbassin Belgien: Anwerbung, Deportation und Zwangsarbeit im Ersten Weltkrieg*, Essen 2007; Christian Westerhoff: *Zwangsarbeit im Ersten Weltkrieg: Deutsche Arbeitskräftepolitik im besetzten Polen und Litauen 1914–1918*, Paderborn 2012.

②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Papers: 1901–2 Session, Vol. II, A 36, Military Forces of the Commonwealth – Minute upon the Defence of Australia*, by Major-General Hutton, Commandant, pp. 6–7.

③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TNA): CAB 8/4: No. 332 M: *Australia-Military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s*.

④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 Session 1910, Vol. 57, columns 2888–2889 (September 9, 1910)*. On the context cf. Segesser: *Empire*, pp. 115–119.

国防部起先必须确保要派赴欧洲和中东的大量部队，能及时装备妥当。这使得国防部长及其幕僚（当时人数仍很少）忙得不可开交。1913年至1914年，国防部长是自由党员，皮尔斯在1914年9月回国担任国防部长。1915年中，他被报界批评在生产弹药上表现不力，无法有效援助英国作战。这项批评并不公道，因为皮尔斯的确很努力要让澳大利亚公、民营工厂增产，不仅要生产轻武器及相关弹药，也要产制十八磅重炮及炮弹。他之所以不成功，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缺乏这方面的专业技术。^① 英国国立物理学实验室冶金部主任华德·罗申海恩（Walter Rosenhain）博士，战前曾经就学于墨尔本，他和澳大利亚政客和官员讨论这个问题，在很早就认识到澳大利亚很难在战时扩张其军火工业。可是，皮尔斯和他的参谋总长詹姆斯·戈登·莱格（James Gordon Legge）都听不进这番话。^② 一直等到亨利·巴拉克劳夫（Henry E. Barraclough）少校前往英国讨论在澳大利亚扩大军火产制技术细节之后提出报告，他们才死了心，接受大战期间国内无法生产军火的现实。^③ 巴拉克劳夫和同僚阿瑟·艾德加·雷登（Arthur Edgar Leighton）被说服，对澳大利亚最有利的上上之计是选派合格工人到英国学习英国军火公司生产方式，以便在大战结束后将知识带回国内。这些专业知识对于澳大利亚军火工业未来的扩张会有极大的价值。巴拉克劳夫认为派人到英国学习及参与制造军火，对大战也会有所贡献：“工业人才的积累，如同用于打仗的人的储备，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资产之一。毫无疑问，每一千人工作于英国军需，对赢得现阶段战争，比相应的一个步

① Connor: *Anzac*, pp. 69-70.

②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Melbourne (NAA, Vic.): MP 956/2 14: Typewritten, but undated Memoirs by John K. Jensen, pp. 41-44. Jensen 在大战初期是国防部书记官，后来成为政客，并于 William Morris Hughes 政府担任部长。

③ Henry E. Barraclough: *Report o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Munitions Question*, Melbourne 1916, p. 27.

兵营作用更大。”^① 1916 年中期，第一批军火生产工人终于从澳大利亚出发，在英国受到和军人同样的欢迎，被誉为“合作生产军火”的 Anzacs。^② 这些工人人数六千，若与中国的十五万工人、法属殖民地的十八万工人相比，小巫见大巫。除了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之外，这是人数最少的一支外国工人。^③ 然而，他们的贡献极受英国政客和官员的重视，认为这些工人有效地提升军火的生产^④，也把英国军需部与澳大利亚官员合作愉快归功于“这些工人杰出的优异表现”。^⑤

来自中国的工人人数最多。英国和法国教会（主要在山东省）招募了约十五万人。^⑥ 俄罗斯也从满洲动员了许多工人，以便填补男丁抽调入伍从军后俄罗斯经济留下的空隙。^⑦ 这些工人有很大一部分被送到前线附近从事下列工作，如挖战壕、运木材、扛煤块、装运弹药、修理铁路、为火

① Henry E. Barraclough: *Report o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Munitions Question*, Melbourne 1916, p. 27.

② Anzacs 是当时对来自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士兵的统称。The Times: July 11th, 1916, p. 3.

③ Frémeaux: *Colonies*, p. 73; Segesser: *Empire*, p. 493.

④ NAA (Vic.): A1952 536/1/3605: *Copy of a letter by the British Ministry of Munitions to Colonel Henry E. Barraclough*, February, 1917.

⑤ NAA (Vic.): A1952 536/1/3605: *Copy of a letter to Colonial Office from Sir Stephenson Kent, Controller-General of Labour*, Ministry of Munitions of March 14th, 1919.

⑥ Xu Quoqi: *Strangers*, pp. 38-51; Li Ma: *La «Mission Trupitel» et les travailleurs chinois en France*, in Li Ma (ed.): *Le travailleurs chinois en France dans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aris 2012, pp. 52 - 90 ; Paul Bailey: *An army of workers: Chinese indentured labour in First World War France*, in Das (ed.): *Race*, pp. 35-52. 另参见 Olga Alexeeva 和 Paul Bailey 的论文。

⑦ Olga Alexeeva: *Les engagés chinois en Russie, avant, pendant et après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in Éric Guerassimoff and Issiaka Mandé (eds.): *L'émigration contractuelle pendant la période de la seconde colonisation (1850-1950)*, Paris in print.

车上下货、清理和组装坦克、清理战场或掩埋死者。^① 因此他们经常被称为“苦力”，有如战前在英、法殖民地工作的中国劳工。然而，尤其是法国教会，也招募了人数有限的技术工人到军火业工作。虽然中国官员如梁士诒、叶恭绰等人也有心将中国带回国际舞台，尤其是在未来的和平会议，以及争取恢复中国对胶州的德国租界之完全主权；中国派遣工人到欧洲的政策还有另一个目标，用中国驻法国公使胡惟德的话：“最优秀的人……或许可以学会法国工厂的管理，日后回国（或许）可以成为优秀的经理人。”^② 当然，绝大多数中国工人就和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或印度支那的工人一样，并没有涉及技术工作，但是其人数仍然远远超过澳大利亚的军火工人，光是在图卢兹（Toulouse）附近一家军火工厂工作就有约六千人。^③ 即使如此，许多中国人在欧洲遭遇到恶劣的种族歧视待遇，尤其是战争结束后选择留在西法兰德斯（Flanders）前交战区的中国人。^④ 不过，他们遭遇的种族歧视还没有南非来的黑人严重。某些中国人得以娶法国女子为妻、且在战后与家人留在法国，即是例证。^⑤

①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The Pictorial Chronicle of Chinese Laborer Corps in the Great War* (《万里赴戎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华工纪实》), 山东画报出版社, 威海, 2009年, pp. 76-91.

② 胡惟德 (Hu Weide) 的话收录在 Xu Guoqi: *Strangers*, p. 33, 不幸的是, 书上除了指出他应北京政府之邀就中国 Huimin 公司和法国 Truption mission 签订合同发表谈话之外, 没有其他细节。

③ Frémeaux: *Colonies*, pp. 75-78. 关于印度支那工人在法国的情况, 参见 Hill: *Indochinese Workers*. Hill 说, 法国总督的目的之一是“让非技术工人取得一些专业训练。他也希望这些‘志愿者’(回国后)……促进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

④ Dominiek Dendooven: *Les Tchings: mythe et réalité à propos du Chinese Labour Corps dans la région du front en Flandre occidentale*, in Li Ma (ed.) *Les travailleurs chinois*, pp. 459-474; Bailey: *An army of workers*, pp. 40-43.

⑤ Xu Guoqi: *Convergence de deux Civilisations: Recherche sur les travailleurs chinois en France pendant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Beijing 2007, pp. 119 - 121; id.: *Strangers*, pp. 101-102. 然而, 要到 1988 年才得到正式承认。参见 Bailey: *An army of workers*, pp. 47-48.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遭受种族歧视的莫过于“南非原住民工人大队”（South African Native Labor Contingent，SANLC）的工人。这个组织成立于1916年，旨在组织南非黑人参加战争，但是，同时拒绝招募黑人加入英国或南非的武装部队。不少黑人，尤其是在英国教会学校念过书的黑人，愿意对协约国的作战有所贡献，一方面是为了表示对大英帝国的效忠，因为他们对帝国有一份归属感；另一方面是希望他们的努力能改善状况，或许来日可以改变黑人在南非的状况。自我提升及受教育也是加入“南非原住民工人大队”的动机之一。甚且，借由支持招募活动，黑人菁英可以向白人当局证明本身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最后，直到1918年1月，大约2.1万名南非黑人受招募加入南非“南非原住民工人大队”，到欧洲从事非战斗工作。为了达成南非政府向英方承诺的人数，其中存在一部分被迫加入的工人。不过，因为南非当局将“南非原住民工人大队”所负担的薪资压得很低，不足以吸引更多的南非人加入；南非雇主因为担心可能出现工人短缺，也不鼓励属下工人加入“南非原住民工人大队”，其手段提高工资，成本势必上升；不信任白人地方官，构成“南非原住民工人大队”人数并不充足的基本原因。^①

“南非原住民工人大队”工人一到欧洲，主要从事车船卸货上货、兴建道路或是在码头、森林工作。该队的南非白人官员喜欢让“南非原住民工人大队”承接这些工作，是因为这些工作环境易于把黑人和本地人，或来自其他国家的工人隔离。以在欧洲可以继续维持在南非的黑白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白人官员主张南非黑人必须“受到保护”，以免“遭到污染”，其实就是严防他们接触“集会结社”思想，有朝一日组织起来挑战在南非的工作条件，甚至挑战白人的政治主导地位的更糟情况。对南非白人来说，还有进一步的打算：借对“南非原住民工人大队”环境的严密控制，

^① B. P. Willan: *The South African Native Labour Contingent, 1916-1918*,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9, 1978, pp. 61-86, 61-70.

测试对人数有限的黑人和白人试行某些隔离作法，以便日后在南非境内使用。可是，整个计划并没有按照原住民事务部（Native Affairs Department）及其主持人普理查德上校（Colonel Pritchard）的构想发展。1916年12月，英国陆军部内设置劳工处（Directorate of Labor），以便协调对既有的劳工，包含华人劳工的分配。英国陆军部内设置劳工处降低了南非白人官员对其“南非原住民工人大队”单位的控制程度，主要通过将工人划分为更小、更容易控制的工作组，分解“南非原住民工人大队”，加之没有建造专门营区安置所有南非原住民工人，最终使得“南非原住民工人大队”的白人官员在营区测试对人数有限的黑人和白人试行隔离的计划化为幻影。简言之，当时的军事考虑和劳工处的要求优先于南非原住民事务部的构想，到后来，出现与他们原本规划适得其反的结果。巴纳德中校（Lt. Colonel Barnard）在其结案报告中甚至提出：种族混合有好处，因为工人更容易管理，不同族群之间友善的竞争会产生成绩。^①无论如何，因为“南非原住民工人大队”的白人官员，甚至英国官员不能适应前线服务和企图维持种族隔离政策而被替换，他们屈从于英国压力加入前线部队。英国人控制之下的中国工人，引发黑人工人的不满^②。再加上法国国会黑人议员布莱西·戴格尼（Blaise Diagne）的到访，以及途中遇见来自狮子山（Sierra Leone）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还有中国工人案例等种种经验，他们不禁忖想有朝一日在南非是否也可能出现同样的改变。没有证据显示，欧洲经验是使南非黑人在回国后成为擅长组织活动的起始点。大战结束时，南非固然发生多起罢工，但是，那是因为战时通货膨胀，以及国内对黑人劳工需求增加所引起，而不是因为“南非原住民工人大队”成员回国所引起。不过，此后的“南非原住民工人大队”成员在工会运动相当活跃，而且南非原住民国

① TNA: WO 107/37: *History of the South African Native Labour Contingent*, p. 7. It was written by Lt. Colonel Barnard as appendix F of the Report on the Work of Labour with the B. E. F: *during the war*. 参见 Willan: *South African Native Labour Contingent*, p. 75.

② Xu Guoqi: *Strangers*, pp. 113-122.

民会议 (South African Native National Congress) 甚至以南非黑人在战时卓有贡献为由, 向英王乔治五世陈情, 在这场争自由的大战之后赐予黑人在南非的政治代表权。然而, 他们的诉求并没有成功。种族歧视的障碍仍然十分强大。^①

除了工人之外, 粮食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动员资源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前线和后方的军人需要粮食, 工人以及国内的一般民众也不能饿肚子。1914年大战爆发之前, 粮食生产就是19世纪、20世纪初期愈来愈大规模的全球整合过程受到影响的重要领域。海外的新社会, 如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智利、印度、澳大利亚或新西兰, 以及欧陆大国俄罗斯、罗马尼亚, 都精通供应谷物 (尤其是小麦)、肉、糖、肥料及其他初级商品给欧洲。西欧协约国国家、中央列强, 甚至比利时、荷兰、瑞士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中立欧洲国家, 都依赖进口粮食。^② 战争一爆发, 切断了攸关粮食贸易的通讯及运输路线。奥斯曼帝国一参战, 俄罗斯再也沒辦法出口其大量谷物。另一方面, 这代表俄罗斯农民——特别是乌克兰顿巴斯 (Donbass) 地区农民——开始降低小麦的生产和销售, 改为生产更多伏特加酒。^③ 另一方面, 英国、法国、瑞士和比利时等国家愈来愈仰赖从北美洲和阿根廷进口粮食, 中央列强则需要靠自力生产或透过中立国进口。可

① Willan: *South African Native Labour Contingent*, pp. 80–85.

② G. Freytag's *Welt - Handels - und Verkehrskarte: Karte der Eisenbahn -, Dampfer u. Telegraphenlinien mit Kennzeichnung der Produktionsgebiete der wichtigsten Handelsartikel*, Vienna 1909. 另参见 Avner Offer: *The First World War: An Agrarian Interpretation*, Oxford 1989, p. 1.

③ Gerd Hardach: *The First World War 1914–1918*, Berkeley 1977, pp. 123–124 & 131–135; Peter Holquist: *Making War, Forging Revolution: Russia's Continuum of Crisis, 1914–1921*, Cambridge MA 2002, pp. 31–32.

是随着战局拖下去，后面这条路愈来愈困难。^①

1915年至1916年，中央列强形势越来越吃紧，而以占哈布斯堡王朝一半的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a），即奥地利部分尤其严重。^②到了1916年底，协约国也碰上大问题，欧洲和美洲出现大旱、植物病害和气候恶劣，谷物产量下降，全球粮食大为不足。唯一例外是遥远的澳大利亚^③，而这时候航运非常不便。^④粮价攀升，必须发动节省食物运动。连巴西这样的国家都必须增加耕地面积种植，以防粮食不足。1918年，日本也爆发了稻米爆动。^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粮食部门没有遭遇到全面功能失调的冲击，主要原因是占其经济极大比重的农业表现不差，粮食进出口问题则没有其他国家那么严重，从南亚及东南亚进口稻米在整个大战期间没有太多阻挠。不过中国后来也开始相当关注粮食问题。^⑥

① Alan Kramer: *Blockade and economic warfare*, in Jay Winter (ed): *Cambridge History*, Vol. 2, pp. 460–489, here pp. 466–470; Daniel Marc Segesser: *Zwischen Weiji und dem Tod von Marie Ankenhafen: Zur globalen Verflechtung von Chancen, Herausforderungen und Krisen im Ersten Weltkrieg*, in Daniel Krämer, Christian Pfister, Daniel Marc Segesser (eds.): *Woche für Woche neue Preisaufschläge: Energie- und Ressourcenkonflikte in der Schweiz des Ersten Weltkrieges*, Basel in print.

② Cisleithania（德语是Cisleithanien）是对奥匈帝国北部和西部的普遍的非官方的称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莱塔河以东称外莱塔尼亚，即奥匈帝国的匈牙利王国部分。

③ Scott: *Australia*, pp. 530–531.

④ Segesser: *Weiji*.

⑤ Inoue Kiyoshi（井上清 1913–2001）: *Geschichte Japans*, Frankfurt Main 1993, pp. 518–520 & 526–535.

⑥ Joseph C. H. Chai: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heltenham 2011, pp. 13–25; G. Freytag's *Welt-Handels-und Verkehrskarte*. 不幸的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粮食供应的影响。

四、结论

1914—1918年的大战不仅是一场全球战争，更是历史上全球性纠缠的战争，除了欧洲国家之外，很多非欧洲国家，例如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还有新发现大陆的南非或者美国，因为其自身的原因和利益，为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参战。长期以来，欧洲之外的战场并没有进入历史学家的关注中心。但是，欧洲之外的战场很重要。^①例如，在东非和喀麦隆，还有，很小的青岛战役。关于中国提供工人数量是最大的，即使参与军工厂的工人也大于澳大利亚。然而，在战后的澳大利亚工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们所创造的军事工业，中国无法比拟。原因在于，澳大利亚政府从一开始，派遣工人去欧洲，不仅为了支持战争，而且为了学习技术，使得澳大利亚在战后受益。白人工人，例如澳大利亚工人被送往英国，不会成为种族主义对象，而非洲人、中国人、印度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却是。只是不同地方，种族主义程度会有所不同。至少在战争期间，与英国和南非比较，在法国和比利时，白人对中国人和南非黑人工人的种族主义，不那么严重。1918年之后，因为政治性原因，很多人返回非欧洲地区，但是，并非是跨越民族的和全球规模。虽然存在不同团体中间的接触，但是，并不属于反对歧视的跨民族的或者全球性同盟，或者开发光明未来。因此，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的编纂，应该叙述和讨论关于跨民族的全球性纠缠。对中国的叙述和讨论，为的是诠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历史，但是，其他国家也需要有全球视野。

^① 在这个研究领域走在最前面的是 Michael S. Neiberg: *Fighting the Great War: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MA 2005。不过，这本书有一个缺点。见 Alan Kramer; *Recent Historiograph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Part II)*, in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2, 2014, pp. 155-174, 有关 Neiberg 的书见 p. 155。

一战与“新儒家”的源起： 以“科玄之争”为中心

雷颐*

自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遇到中国“顽固派”的强烈反对。这些顽固派掌握了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以儒学的名义反对任何来自西方的新事物。但是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顽固派以儒学为理据对“西学”的反对渐渐式微，在思想界，“新学”/“西学”渐渐占主导地位。事实上，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思想界对“新学”/“西学”的认识主要是自然科学，辛亥革命时宋教仁将其概括为“人道主义与科学”，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将其概括为“民主与科学”。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使中国接受“新学”/“西学”的思想界发生分裂。到欧洲考察一战后情况的梁启超提出“科学破产”，随梁同到欧洲考察的张君勱提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的论点，从而引发了1923年中国思想界的“科玄之争”。这场论战的意义在于，反对“科学”并提倡中国传统者并非几十年前对“新学”/“西学”完全不知的顽固派，而是对西方思想有相当了解的张君勱等，他们主要是以西方生命哲学来对科学质疑、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辩护与梳理。30余年后，张君勱成为“新儒家”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可以追溯到20年代的“科玄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科玄论战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是后来“新儒家”兴起的原点。本文即从这个角度论述一战对中国思想界的长远影响。

—

自西方古典哲学解体之后，其哲学思潮演变成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流派。这两种哲学有着不同的研究领域，彼此独立地探讨不同的问题。而且，在研究中他们使用不同的方法、概念，即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因而彼此很难对话、论争。但饶有趣味的是，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思潮却在20世纪20年代初急切汲取西方思想营养的中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锋，掀起了“科学”与“玄学”^①论战的轩然大波。中国思想界的著名人物几乎都卷入到这场论战中去，他们急切地阐述、宣传自己的观点，严厉地驳斥、批判不同意见。但是，“科玄之争”并不仅仅是两种欧洲思潮在中国的交火，不是单纯的哲学论争，而是中国思想界对“西学东渐”80年的全面反思，是对中国哲学意识未来形态进行自主选择的尝试。

一般地说，可将文化分为器物、制度、心理三个层次。器物是文化的物质凝结，是文化中最直观、最易感受的层次；典章制度则是文化的社会表现，较为抽象；而文化心理则处于文化结构的最深层，因而最抽象也最难变易。所以，当两种异质文化相交时，器物层次的交流最易也往往最先，典章制度的模仿也相对容易，而文化心理的沟通则最难，因而往往最后。

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也大体遵循这一规律。

近代“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首先发现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因而提

^① 玄学 (metaphysics)，今译形而上学，但此处不是指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而是指一种对超验对象的思考和陈述。本文根据行文需要采用“玄学”或“形而上学”的两种用法，但意义相同。

出要“师夷长技”，学习制船造炮之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是这种认识的最高理论概括。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对西方认识的加深，有识之士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虽然维新运动很快归于失败，但却标志着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学习由器物层次深入到制度层次。

民国成立后令人沮丧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仅有制度的模仿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于是，一场旨在触及精神深处以改造中国人“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便应时发轫了。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弘扬“民主与科学”作为批判传统、破坏偶像、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的武器和工具。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性精神是西方强盛的基础，也是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培养独立人格的法宝，是判断是非曲直的客观依据和标准，是改变中国人那种对事务偏重笼统的整体直观把握、轻于明确的具体逻辑分析的思维习惯的有效方法。所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语重心长地“敬告青年”：观察事物应当“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① 吴稚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青年与工具》和《再论工具》两篇文章，力劝青年抛弃“形下之器”的传统观念，掌握制造工具之术。他还撰文论证《机器促进大同说》，在对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作了详细描绘之后，他热情地讴歌说：“这并不是‘乌托邦’的理想，凡有今时机器较精良之国，差不多有几分已经实现，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见《独秀文存》，第8、9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这明明白白是机器的效力。”^① 这种想法几近天真，却反映了对“科学万能”的信仰。

可以看出，在80年的时间里，中国思想界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发生了从“师夷长技”到以科学理性重铸民族精神素质的深化，经历了从器物文化认同到心理文化认同的精神历程。的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们力图把科学作为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输入中国，取代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希望科学精神渗透到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所以，陈独秀1916年在《当代两大科学家之思想》一文中认为“科学之功用，自伦理上观之，亦自伟大”。^② 实际上，他已提出了科学与伦理的关系这一几年后“科玄之争”的中心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五四”先进们认为“科学精神”是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核心，所以在他们的语汇中，“科学精神”与“西方文明”几乎是同义的。他们认为落后的“东方”应该而且能够全面汲取先进的“西方”文化。“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致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③ 虽然新文化运动宣扬者本人在潜意识层次上也无法摆脱、摒弃长期浸润其中的传统文化，但这果决的言辞毕竟反映了他们自觉摆脱旧传统、热忱拥抱新文明的决心和勇气。

历史的讽刺有时近于残酷。正当“五四”思想家们全身心地拥抱西方文明的时候，西方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对自身的文明疑窦顿生，忧心忡忡。

实际上，19世纪末德国的痴狂哲人尼采就敏锐地觉察到西方文明的危

① 《新青年》第2卷2号、3号，第5卷2号。

② 《独秀文存》，第59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③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载《新青年》第5卷1号。

机，提出要重新估计一切传统价值，喊出“上帝已死”这惊世骇俗的激愤之声。但尼采的声音在当时被认为是痴人呓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上帝已死”的观念在欧洲化成一种普遍的情绪，人们对西方文明疑惑、彷徨、沮丧、失望……终于，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写出了闻名遐迩的《西方的没落》这部煌煌巨著，表达出一种沉重的失落感。法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伯格森的生命冲动理论风行一时，一些知识分子反而转向东方的思想和宗教，企图在“东方神秘主义”中寻找内在的平衡、心灵的和谐与精神的慰藉。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当年以力主“采西学”、宣传新思想著称的梁启超率张君劢、丁文江等人于1919年踏上了满目疮痍的欧洲大陆。他马上被弥漫欧陆的那种低沉、颓唐的“世纪末”情绪紧紧缠裹。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造成的物质破坏使他惊讶万分，而人们精神上的深创剧痛更使他惊心动魄。终于，这位维新运动的健将一反以往，对西方文明大失所望。1920年，他在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中惊呼：“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怀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① 他同样认为科学精神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所以“西方的没落”就是“科学的破产”。这样，对科学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态度的冲突、论战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提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②的论点，从而挑起了这场大战。

张君劢，原名嘉森，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早年留学日本，后又赴德国学哲学，受被称为“生命哲学”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奥伊肯

^① 《饮冰室专集》二十三，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② 张君劢：《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上），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Rudolf Eucken, 1846—1926) 的影响极深。奥伊肯的哲学与同时的伯格森的“生命哲学”大致相似，他称自己的哲学为“精神生活哲学”。他的哲学轻视自然科学，认为科学不能解决宇宙观，尤其是人生观的全部问题。他认为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是使人自由，而是给人套上枷锁，扼杀了人的创造精神和自由意志。而人类因为依赖精神体系，生活才超越了“自然生活”。因此，他主张在承认“自然”的权利下，把精神生活放在“自然”之上，而精神生活的全体在本质上是伦理的。^①在这场“科玄之争”中，以张君勱为代表的“玄学派”便是以奥伊肯、伯格森等人的理论为基础，杂糅中国的宋明理学、心学，向“科学派”挑战的。

张君勱在演讲中论述了科学与人生观的几点不同，认为“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因此，“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他还谈起了中国文明是侧重内心修养、“向内”的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侧重征服自然、“向外”的物质文明的论调，并发出“欧战终后，有结算二百年之总账者，对于物质文明，不胜物外逐物之感”的喟叹。并进一步认为“思潮之变迁，即人生观之变迁也”，“方今国中竞言新文化，而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吾有吾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②从科学与伦理的关系这一较为抽象的哲学探讨转向东西文化的具体比较，也颇能说明这次论战的真正关注所在。

张君勱的演讲立即引起了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的反击。丁文

^① 《鲁多夫·奥伊肯》，见《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续集），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

^② 张君勱：《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上），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玄学与科学——评君劭的〈人生观〉》一文，激烈批驳张君劭，指责其为“玄学鬼”。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1904年由日本转去英国留学，曾入剑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与地质学，回国后曾在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工作。他的哲学思想受英美经验主义传统及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和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实证主义影响至深。在这次论战中，他正是以这些哲学家的思想作为和“玄学派”交锋的武器的。

丁文发表后，张君劭立即写了《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一文，洋洋万言，旁征博引，以承继伯格森、奥伊肯哲学为荣，与丁文江针锋相对。

丁、张的论战引起了思想界的激烈反应。梁启超首先以“局外中立人”的身份制定《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稍后又写了《人生观与科学》一文参加论战，支持张君劭。^①此时远在杭州养病的胡适也写了《孙行者与张君劭》一文，认为张君劭像想跳出如来佛手心的孙行者一样想跳出逻辑的网罗，其实根本办不到。^②胡适在此隐约表露了逻辑包含一切的泛逻辑主义。化学家任鸿隽、心理学家唐钺等人的论调与丁文江如出一辙，认为“科学万能”。吴稚晖也不甘寂寞，写了长文《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强调“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学解说。^③

林宰平、张东荪、瞿菊农、屠孝实等则著文为张君劭辩护。虽然他们的观点互有差异，但基本与张相同。张东荪承认，支持“玄学”的文章比支持“科学”的少得多。^④

① 张东荪：《科学与人生观》（上），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② 胡适：《孙行者与张君劭》，《科学与人生观》（上），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③ 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下），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④ 张东荪：《科学与人生观》（下），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二

尽管参加论战的人数、派别颇多，观点各异，讨论的范围亦极广，涉及古今中外诸多思想流派，但讨论的焦点还是集中于科学是什么与科学的功能（即科学与人生观及中国文化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上。如果说“科学派”与“玄学派”对“科学是什么”的理解在本质上有某种相同之处的话，那么他们对科学的功能，即“科学与人生观”、与道德意识、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看法，就水火不相容了。而且正是此点触发了这场大论战。

概言之，“玄学派”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他们强调中国传统的修身养性之学，认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皆有益于世道人心，而且也只有“内省”“反求诸己”这种内向的精神生活修养才能增强道德意识。

而“科学派”则立于另一极端，认为只有用科学（实际是物理科学）的方法才能解决人类道德问题。丁文江引用胡适的一段话作为结论：“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① 王星拱则武断地说：凡用以研究无机物质的物理化学，“也可以应用于人生问题”。^② 他们实际上是从心理学、生理学的意义来谈论人类意识、道德精神的，并进而把心理还原成物理。

虽然论战双方观点截然相反，实质上却有共同的哲学根源，即在社会领域都是以心物分离的二元论为基础的。二元论认为，人类意识与躯体，即心与物，是分离的。尽管意识、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被包容于身体内，但二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内在联系，而是相互平行的。基于此，“玄学派”认为可以离开人的身体活动（行），完全通过内省自身的纯意识活动来达到

① 丁文江：《科学与玄学》，《科学与人生观》（上），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② 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下），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正心诚意”的道德目的。他们抽去了人的社会性，把人类的社会实践分解为行动者个人的行为和意识。而“科学派”的观点实际上却是完全否定了意识的个性与主体性，力图从社会科学中摒除意识概念，认为不需要引入社会活动者的观念就能解释社会。从生理结构和心理机制的角度来谈论人类意识就必然会把社会看作是个人活动的机械累积，同样否认了社会实践。简言之，“玄学派”把社会化说成个人的意识和行动，“科学派”则把社会结构说成是与社会成员的个人意识和行为几乎无关的客观实在，进而取消了社会实践者的个人意识和主体性。可以说，二者在此只是对心身分离的二元论哲学的不同反应。“玄学派”力主以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和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来提高道德水平；而“科学派”则力图把道德等同于自然科学，希望通过自然科学纯逻辑的推理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

在此，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思潮中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分裂。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宇宙是作为一个整体被直观把握的，因而“天人合一”便是长久的信仰。所谓“格物致知”的理论，是通过“格物”来通晓事理，增强人的道德意识。这里所谓“格物”，不是以征服自然为目的，它与现代科学精神完全不同，但却反映了一种心物相通、浑然一体的哲学理论。应该承认，较之传统哲学直观模糊的心物一体、天人合一的理论，现代思潮中心物的明确分离是思维精确化的标志，是近代自然科学传入中国的结果。这种分裂使“玄学派”与“科学派”未能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新的整合。有人正确指出，张君勱无视引起社会巨大变革的科学对人类道德的作用，必然使自己置于易受攻击的位置。^①但是，丁文江、胡适等人认为“科学万能”，把道德意识的增强和提高等同于一种纯逻辑的发展，也不正确。

实际上，科学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意识和道

^① [美]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142页，耶鲁大学出版社，1965年。

德的发展有着无可否认的重大影响和作用。但科学也并不是是一种完全价值中立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道德伦理问题。科学本身的进步也并不是是一种纯逻辑的发展，不是知识的直线积累，而是充满质变的“革命”。以美国现代科学哲学家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的进步并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理论体系，即有不同的“范式”（Paradigm），科学的进步就是“范式”的更迭。而旧“范式”的衰亡与新“范式”的涌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心理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这就说明，科学的进步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而是与社会实践紧密相关的开放系统。可以说，科学对社会有巨大的影响，但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则更大。时代所限，“玄学派”仅仅是论争科学的限度，而未敢言非科学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和作用。而“科学派”坚持“科学万能”的泛逻辑主义，表明了中国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忽视逻辑推理这一弱点的矫枉过正。

但是，重要的不是他们对道德本质的看法正确与否，而是这种争论本身表现了现代中国思想界对重建中国价值体系的上下求索。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道德取向，道德的尽善尽美是个人及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这种不倦的追求之中。所以“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道德取向源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宇宙论。《易》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天”象征着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令，“天子”便是位于天人之间“替天行道”的中介，由“内圣”而“外王”。道德实践成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但近代西学的东渐和帝制的被推翻，使传统的宇宙论受到根本动摇。^① 这样，安身立命的根本何在？我们从何而来？到哪里去？这些问题一直困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从提出“中体西用”到声张民主与科学、激烈反传统的“全盘西化”的主张，都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但是，这都是在民族危亡时刻的

^①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一种被迫的回答，因而必然带有救亡图存的功利性色彩。作为救亡之道而引入中国的自然科学理论、进化论及边沁、穆勒等人的功利主义道德论，与中国传统宇宙论及非功利主义道德论明显矛盾。对此，“中体西用”论者采取的是消极防御的姿态，力图把“西学”局限于与价值体系无关的范围之中。此时的“玄学派”从本质上说仍属“中体西用”论，固守原来的价值体系，只是引入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当然，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胜于当年张之洞等，因而对“戏谑”的批判也更尖锐有力。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观点更为敏锐地表现了某种对当代工业社会对人的物化的感叹。反之，“科学派”却致力于克服“西学”与中国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探索二者结合的途径。丁文江在此次论战中引用他在12年前所写的生物学教科书，以蚁群为例来说明人及所有生物都有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他说：“合至愚之蚁为群，而蚁之种乃优胜。若是者何哉？曰牺牲个体之利益以图一群之智力也，牺牲一群一时之利益以图一种万世之利益也。言群学者可以鉴矣。”他极力把“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解释成一种促进道德的规则，“综观动物生活之景象以及天演施行之方法，而知所谓优劣成败者，不关于个体而关于全种；不关于一时而关于万世。然个体一时之利害，往往与全种万世之利害相冲突，故天演之结果，凡各动物皆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意识之天性，盖不如是不足以生存也”。“所以我的宗教定义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是人类同动物所公有的。”^①把人类道德与动物的“道德”等同，就把道德的缘起归结于“天择”，旨在重建一种“天人关系”。而且这样还可以强调把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方法引入道德实践领域。“惟有科学方法，在自然界内小试其技，已经有伟大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求把他的势力范围，推广扩充，使他做人类宗教性的明灯；使人类不但有求真的诚心而且有求真的工具，不但有为善

^①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劭》，《科学与人生观》（上），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的意向而且有为善的技能!”^① 胡适则把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加以发挥,以各门自然科学为基础,建构了“科学的人生观”体系。其中心思想是用自然科学的知识破除“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的观念,“根据生物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的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② 他们力图从生物性角度来说明人的道德本质,在道德与自然之间搭桥。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理想的最高道德仍是为“大我”而牺牲“小我”,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并不违背于以集体为本位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就此而言,他们并未完全抛弃传统,而从中倒可窥见他们企图将西方科学理论与中国价值体系融合的良好用心。

三

一种思潮的勃兴与发展不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而且与先前的思想有无法割裂的联系。科学思潮在中国的流行,不仅与当时救亡图存、希望“科技救国”的形势有关,且得益于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尤其是19世纪中叶兴起的实证主义哲学。

从古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思潮中就有注重科学的传统;工业革命之后,科学主义思潮更加强劲。孔德、斯宾塞、穆勒等则更为激进、更有系

^①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劭》,《科学与人生观》(上),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②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统地以传统哲学的彻底否定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否定哲学站在科学之外、高居科学之上的观点，反对以往哲学关于世界本质最终体系的构造。他们认为传统哲学研究世界的本源问题，如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等，都是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玄学），毫无意义，必须拒斥。他们认为哲学只是科学本身的自然延续，主张把科学的实证方法应用于哲学之中。这样，他们就否定了原来意义上的哲学。孔德把人类思想发展史分为神权时代、哲学时代和科学时代三个阶段。神权时代，人们迷信宗教；哲学时代，人们信仰形而上学；科学时代，人们崇尚实证科学。穆勒则认为：“只有把物理学的方法适当地推广、普遍地运用到道德科学之中，才能改变道德科学的落后状况。”^①

这种实证主义思潮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思想界，从这次论战的文章中便可看出，丁文江、唐钺、胡适等人的观点几乎是孔德、穆勒等人思想的中文版，甚至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也用孔德的三阶段论解释历史的发展：“孔德分人类社会为三时代，我们还在宗教迷信时代”，“现在由迷信时代进步到科学时代，自然要经过玄学先生的狂吠；这种社会的实际现象，想无人能够否认。倘不能否认，便不能不承认孔德三时代说是社会科学上一种定律。这个定律便可以说明许多时代许多社会许多个人的人生观之所以不同”。^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科学派”仅停留在对19世纪实证主义的复述和应用阶段，而无进一步的提高发展。实际上，20世纪初实证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分析哲学运动。它把与传统逻辑形式完全不同的数理逻辑这一现代科学工具引入哲学研究之中，并认为哲学的全部问题是语言问题，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或语义分析，以此排除“形而上学”，取消传统哲学。他们的努力极大地提高了哲学的精确性和严密性，成为现代哲学中一个强劲流派，对现代思想有着

① [英] 穆勒：《逻辑系统》，第10页，伦敦，1868年英文版。

②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见《科学与人生观》（上），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深刻的影响。有趣的是，就在“科玄之争”爆发的1923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一些对哲学感兴趣的科学家和对科学感兴趣的哲学家开始形成“维也纳学派”。他们把经验主义哲学和数理逻辑及现代物理学结合起来，力图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来克服形而上学，因此被称为逻辑经验主义。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学派一直在西方科学哲学界居统治地位，对澄清一些混乱、对科学概念的精确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作了极有影响的贡献。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着重研究知识论问题，专注于科学语言的句法分析，否定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哲学意义。他们认为，传统哲学用构造绝对知识的方法建立道德指令、确定道德规范，而“科学的哲学”则不应涉及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意志问题而不是认识问题。分析哲学的创立者之一罗素说道：“科学能告诉我们许多实现欲望的方法，但它却不能断定一个欲望比另一个欲望更为可取”，因而“科学能够探讨欲望的各种起因和实现这些欲望的方法，但它不可能包含任何真正的伦理句”。^① 逻辑经验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赖欣巴哈批判了传统哲学家把伦理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的努力，并认为伦理道德只是一种指令、一种“意志伦理”。因此，他认为：“想寻求伦理规条的人必定不可以模仿科学方法。科学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应是什么。”^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这种观点与中国“玄学派”的思想更为接近。西方现代致力于哲学科学化、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对科学的谨慎态度与中国“科学派”认为“科学万能”、完全可以解决人类道德问题的果断宣言适成鲜明对照。

实际上，中国的“科学派”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哲学的科学化，而是要把科学作为一种启蒙救亡的工具，因而极力强调其重要性。与西方哲学、科学传统中超功利的“为知识而求知识”“为真理而求真理”的精神相反，中国学术传统中一直有着学以致用、强调“治国平天下”、“救世济时”的

① [英] 罗素：《宗教与科学》，第91、1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② [德] 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第2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经世思想。而近代中国濒于危亡的客观环境更强化了这种传统。的确，中国的“科学派”很难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像他们的西方同行那样，埋头于与现实几乎毫无关系的句法分析、语义分析之中。客观社会环境使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完全集中于救亡图存的“经世致用”之中。与科学主义针锋相对的是，现代欧洲产生了非理性主义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肇始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早确立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是叔本华创立的唯意志论。受其影响，尼采的权力意志论以及德国和法国兴起的生命哲学思潮成为19世纪后半期非理性主义的重要思想流派。现代非理性主义在哲学中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在本体论上，现代非理性主义主要表现为寻求某种非理性来取代理性的中心地位，以之作为世界的本体，并把它建构和发展为对抗理性主义的一种“主义”。如叔本华、尼采找到了作为世界本体的“意志”，并发展为意志主义；弗洛伊德找到了“无意识”，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柏格森找到了“生命冲动”，创建了生命哲学等。他们普遍推崇非理性相对于理性的先在性、本质性和优越性，以此来实现对理性主义的反叛。在认识论上，现代非理性主义普遍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反对理性主义依靠抽象的逻辑推理和二元对立的知性思维来把握世界，宣扬只有依靠体验、直觉、情感等非理性的认识方法，才能认识世界；在人性论问题上，现代非理性主义反对把人抽象化、理性化，主张非理性的因素才是人性的本质，把非理性看成是人进行自我选择、自我生成以及实现人的绝对自由的根本动力；在价值观上，现代非理性主义拒斥绝对主义的价值理想，反叛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秩序，试图戳穿理性主义的虚妄性，颠覆既有的伦理道德，张扬反传统的价值观，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相对主义的价值信念，甚至走向虚无主义；在历史观上，现代非理性主义往往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认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并不是理性完全支配下的单一机械的过程，而是受人的主观

愿望和各种非理性因素制约的无内在秩序可循的过程。^① 张君勱的思想来源主要是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但非常重要的不同是，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主要是通过解构理性、批判科学来解构、否定文化、文明、传统、道德，而张却通过以非理性主义哲学解构理性、质疑科学的功用而重构文化、文明、传统、道德。

这次“科玄之争”的双方实际上是在充满感情地宣传自己的救时之方、治国之道，而不是在进行冷静的哲学研究和探讨。“科学派”认为东西文化是时间性的，在他们的心目中，科学是超越的，因而西方文化也具有超越性。所以，不论后来提出的“全盘西化”还是“充分的世界化”，都是旨在用科学精神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玄学派”认为东西文化是空间性的，因而“东西不可易位”，并引出了后来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更引出了“新儒学”。

从思想史的角度说，这次论战无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都“误读”了自己引以为据、极力宣扬的西方思想。“科学派”认为道德要以科学为依据，甚至要建立“科学的道德”，然而，西方以逻辑实证主义为重要代表的科学主义哲学潮流恰认为科学与伦理道德无关。“玄学派”以西方的非理性思潮来强调坚持传统、重建道德，然而，正是以尼采等为代表的西方非理性思潮对“传统”、道德作了最猛烈的抨击和解构。

这种“误读”在思想史上屡见不鲜，什么样的思想被引进、如何引进、在具体的语境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往往与“被引进”的思潮的“本来意义”大相径庭。“科玄之争”说明，思想史研究必须将“思想”与“语境”紧密联接。要研究一个思想的“原本”意义，但更要研究这种思想在历史、社会的脉络中是如何被“使用”的。

^① 韩秋红：“西方哲学现代转向的五重路径”，《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四

尽管这次“科玄之争”并未得出，也不可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但这次震撼思想界的大论战本身却极有意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是近代中国最富哲学色彩的一场论战，探讨了心物关系、实证哲学与人本哲学、理学与汉学等多方面问题；但从纯哲学角度来看，这场论战又过于贴近现实，涉猎虽多，却都浅尝辄止，语焉不详，缺乏哲学的严谨和深度。从中国哲学发展角度来看，这次论战意义有二：其一，意味着中国实证哲学流派的形成，突破了传统直观把握的宇宙观，标志着中国一个新哲学流派的真正开端。其二，开启了数十年之后“新儒家”的思想之源。

1958年元月，香港的《民主评论》和台湾的《再生》杂志同时发表了张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四人联署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标志着现代新儒家“经过历史的巨大转折，抚今追昔，用心反思，重新奠定了自己的哲学和文化立场，而再度活跃于中国现代思想舞台上；同时它也反映了现代新儒学力图走向世界的努力和雄心”。^①

此“宣言”由居港的唐君毅起草，却是1957年由居住美国的张君勱向此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唐提议发起的。获唐同意后，张向居住台湾的牟宗三、徐复观去信，征求意见，反复商讨。“宣言”的中心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有生命力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道德中并不缺少宗教性的超越情感或宗教精神。承认中华传统缺乏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与科学技术，但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潜藏着民主的种子、与自由民主宪政是相容的，并且是不反科学的。

对此“宣言”，有儒家学者批评其仍是盲目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维，要求全盘西化，西方式的民主是建立在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之上的，因

^①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中），《南开学报》，1990年第5期。

此不适应中国的历史和文化。^① 这种批评很可能不准确，但从一个方面说明，“新儒家”之新，无论从思想资源还是现实政治标准，都渗透了“西方”元素。本文不具体分析张、唐、牟、徐四人的思想观点差异，其共同点却是，都非完全不懂“西学”、完全反对“西学”。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是对“西学”几乎毫无所知的“儒生”反对西学、维护中国传统。但从上世纪20年代起，维护中国文化传统的改由熟知西方思想的一些思想家，通过对西方某种思想的阐释“援西入儒”，构建了“新儒学”。从思想史发展角度看，“科玄论战”是“新儒学”起源的重要标志；而“科玄论战”，则是直接由“一战”引发的。

^① 参见蒋庆：《政治儒学》，三联书店，2003年。

一战前后“日本式自由主义”与 “俄国式社会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秦晖*

从“救亡压倒启蒙”谈起

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国人在历经磨难中对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为主要内容的近现代化模式出现了认同趋势，无论这一认同初期是多么肤浅，无论把这一模式看成历史进化论意义上的一个“社会阶段”（“资本主义”），还是看成文化类型学意义上的一个“他者横移”（所谓“西化”），也无论实现这一认同是要通过渐变改良还是激进革命的方式，这个趋势似乎是明显的。

但是，在一战期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却出现了一大变数：一方面，新文化运动似乎是上述趋势的新高潮，它不仅对中国“传统”的激进批判前所未有，而且对“西学”的认识明显深化，从几十年前先觉者泛泛地“叹羨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郭嵩焘）、“推举之法，天下为公”（徐继畲）、“礼义富足”（洪仁玕）、“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张树声），发展到细究“群己权界”，对“法意”、“自繇”、“民权”、“个人”等概念有了切实的领会，并且使法治、自由、人权和个性解放等成为流行话语；从过去笼

* 清华大学教授。

统的“西学”，发展到西方有左中右，有多少思潮多少派，中国本土也有左中右，有多少思潮多少派，“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都曾大行其道。从这方面看，新文化运动确实是一场大“启蒙”。但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后来的走向却越来越与“启蒙”的初衷相悖，以致几十年后在“彻底反传统”的礼崩乐坏之中，中国不但没有学到“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反而出现了一面“打倒孔老二”，一面又呈“东风压倒西风”之局，儒道沦丧的同时西学几绝，一度造成“浩劫”悲剧中的文化荒漠。

这是为什么？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就在不断反思，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归咎于“激进”和“革命”，二者又皆因“启蒙”过了头。典型的说法是：“夭折的宪政”应该怪“倒退的五四”。^①另一说则相反，责怪“救亡压倒启蒙”，民族主义大潮使得“新文化”功亏一篑，该启的蒙没能启成。

这两种说法都看到了一些现象，逻辑上却难以自圆。20世纪80年代倡言“救亡压倒启蒙”之说的李泽厚先生，到了20世纪90年代又成为“告别革命”论的巨擘，同时他却又不肯放弃前说，是这种矛盾的典型代表。^②这就像一个法国人既惋惜卢梭学说之被“压倒”，又痛骂大革命之鸱张。但大革命难道不正是卢梭学说的实践吗？如果大革命应该否定，卢梭学说不正应该被“压倒”吗？又何惋惜之有？

当然，如果所说的法国启蒙只指伏尔泰、狄德罗一支而排除卢梭于启蒙之外，这矛盾似乎就可缓和。换言之，“启蒙”包含庞杂的内容，“激进”

① 2013年《东方历史评论》创刊礼适逢五四纪念日，活动主题就是“夭折的宪政，倒退的五四”。会上对前一命题设问道：“倒退的五四”是说后来人从五四的立场上倒退了呢，还是五四本身就是倒退？演讲者答曰：“我会选择第二个（理解），……五四本身是一个大倒退。”见 <http://cul.qq.com/a/20130514/010336.htm>。

② 最早提出救亡与启蒙之矛盾的似乎是美国学者舒衡哲（薇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英文版发表于1984年），但李泽厚的“压倒”说更加形象而尖锐，故不胫而走。

亦有不同的方向。如果说法国伏尔泰、狄德罗式的启蒙还不够，而卢梭式的启蒙却“过分”了，导致后来出现卢梭式的革命，却缺乏伏尔泰式的理性，这样解释庶几可以自圆其说。但是，法国的历史绝非就可以如此简单地解释。

以“激进”和“保守”而言，如果只讲所谓“传统”与“西化”这个维度，那么显然胡适与陈独秀尽管后来“主义”不同，都是“反传统”倡“西化”的激进派。而“新儒家”、“最后一个士大夫”梁漱溟、冯友兰则是这个意义上的保守派。但是对于中国后来走向，胡适固然是典型的反对者，陈独秀其实也很早就下了车，临终时实际也是反对的。而梁漱溟冯友兰则上了车，后者还一直紧跟着走到“浩劫”年代结束。显然，尽管“文革”似乎激进到在曲阜把孔子的墓都刨了，但把从五四到“文革”的历史简单地用“激进”或“保守”、“传统”或“西化”来理解，还是不行的。

实际上，“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倒是认识到“启蒙”的复杂性。谁都知道，所谓被“压倒”的启蒙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那恰恰是从五四起成为大潮的），而“救亡”如果是指民族主义，那应该说从晚清起它本身也是启蒙的内容之一，甚至是“西化”的内容之一。众所周知，以德国、意大利、波兰及土耳其为话题的西方式民族主义话语资源自晚清被引进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和运动前后都很风行，无论对辛亥前“兴汉反满”的汉民族主义，还是后来“反帝爱国”的中华民族主义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说穿了，“救亡压倒启蒙”实际上指的是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列宁主义的崛起。这与所谓“小五四”（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学生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压倒“大五四”（通常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起点标志而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呼应，并与几十年来关于“五四精神”的内涵是“民主与科学”还是“爱

国与进步”之争相表里。其实，不要说“爱国与进步”，就是“民主与科学”，也曾被一些人认为是过于民粹而忽视了自由主义。以至于后来被称为“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甘阳，都曾一度批评五四只讲“民主与科学”，而无视“自由与秩序”。^①

“压倒启蒙”的是“救亡”吗

如果说五四使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并帮助了列宁主义的崛起，那么民族主义如果与自由主义冲突，它怎么又会与列宁主义结合？众所周知，尽管列宁主义在后来的岁月里的确演变成了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但在“十月革命”之初即新文化运动引进它之时，却是以极度排斥民族主义著称的。在1917年的列宁那里，“爱国主义”、“护国主义”，甚至“革命护国主义”都是反动派的代名词。在一战时期的欧洲和俄国，一般左派反战运动只是主张和平，列宁却主张“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政府战败”，在很多俄国人看来没有比这种主张更“卖国”的了。虽然掌权后的列宁又一转而变为极端地扩张苏俄势力，但也不是在“爱国”或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而是继承马克思“工人没有祖国”的传统，在“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的旗号下实行此一转变的。

同样，尽管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几十年后也日益变成了“中国崛起”、“中国梦”式的民族主义，但是当初它在中国激起的与其说是民族主义，不如说是打着“国际主义”旗号的亲苏情绪。当时的亲苏者尤其是其中坚，主要并不是把苏联视为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合纵连横的助力，而是把苏联的制度视为比自由主义更“进步”的人类理想，因此而亲苏信苏的。这就不难理解在后来的30年里，当中苏主权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总

^① 甘阳：《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二十一世纪》总第3期，1991年2月号。

是向苏联“一面倒”，甚至在苏联大举入侵中国的中东路事件中还打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旗号。

过去人们经常强调“一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导致民族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占了上风。这似乎符合表象层面的舆论分析。金观涛、刘青峰先生运用数据库分析以数值证明：在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新青年》全部存在时期提到的国内外大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战”、“世界大战”、“欧洲战争”）遥占首位，共被提及448次，而十月革命只被提及287次，国内事件被提及最多的两次帝制企图（张勋复辟和洪宪帝制）只有133次，其他如义和团、辛亥革命等提及就更少了。而在《新青年》的一战评论中，前期并无明显倾向，一战后期的评论则明显强调协约国是正义的一方，其战争目的是“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对中国参战后能够得到“公理”之助、享受战胜国待遇、改变晚清以来被列强欺负的状态抱有期待。但巴黎和会后国人大失所望，主流评论又变为此战无正义可言，甚至越来越接受列宁的“帝国主义战争”之说。^①

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又使人觉得这因果关系不那么简单。上述数据库还显示：巴黎和会在1919年“小五四”当时虽为社会热点，但以思想文化评论而非新闻报道定位的《新青年》当年其实没怎么提及此事。^②直到1921年后，即陈独秀等《新青年》主持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才大量提及巴黎和会。金观涛等据此分析曰：巴黎和会虽是五四当天游行的直接原因，但从观念史上看“它还不能被视为推动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

^①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98~402页。

^② 和会发生当年的第七卷（1919.12—1920.5）只提及1次，第八卷（1920.9—1921.4）甚至根本没提。中共成立时的第九卷（1921.5—1922.7）才重新提及，后来几年提及越来越频繁，最后不定期刊的一年多（1925.4—1926.7，此时该刊已基本在中共影响下）就提到了60次。

不断被加强、深化的”。^①

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并愿申而论之：在巴黎和会上美国的立场是比较接近于中国的。由于美日国家利益的竞争，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坚持门户开放、列强均势而反对日本独霸中国的“海约翰主义”与日本侵华意图的冲突，不可否认也由于此时美国外交思想中“威尔逊主义”而非“汉密尔顿主义”正居主流。^②中国的拒签和美国的拒批，使得亚太的战后“国际秩序”在巴黎和会后仍然悬而未决。在“小五四”中体现的中国人民的愤怒，以及“海约翰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下美国的不满，加上战后英日同盟的解体、英国更愿意附和美国，都使纠正巴黎和会的不公有了可能。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在美国倡议下召开的解决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中，中国据理力争，西方列强在维护自己在华权益的前提下也对日本形成很大压力，最终使《凡尔赛条约》惹怒中国的主要错误得以纠正，并“将日本之对华进展给以强制之清算”。^③中国不仅成功收回了山东的权益，《二十一条》和《民四条约》实际上被废除，而且开启了对战胜国列强改约维权之路，在关税自主、撤退外邮、收回租借

①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99页。

② 美国外交思想史上向有“威尔逊主义”（国际道义至上）、“汉密尔顿主义”（经济利益至上）、“杰斐逊主义”（国内自由优先而怀疑强国政策，主张孤立主义外交）、“杰克逊主义”（民粹主义和实力至上的国际干预）四大传统之说，参见：Walter Russell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Routledge: 2002。实际上，任何国家尤其是有历史影响的大国，外交动机都是“私利”与“公义”兼有，权重或因时而异，但纯私利与纯公义的动机至少是很罕见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的美国都是这样。区别只在于不同体制下定义国家“私利”的机制：民主国家的对外“私利”接近于其国民利益，而专制国家则接近于朝廷或皇上的利益；不同意识形态的“公义”也有区别：有的乐于输出“民主”，有的乐于输出“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可能乐于输出基督教，有的则乐于输出伊斯兰，等等。

③ 李祥麟：《门户开放与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04~205页。

地、限制乃至分步骤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上都取得了进展。^① 华盛顿会议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缓慢回升”，国人在会议上“得到了大体可接受的结果，与巴黎和会的空手而归形成了对比”，因此对华盛顿会议的成果“应给予一定的积极评价”。^②

如今国际上通常把由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形成的一战后远东格局称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由于“凡尔赛”的不公在“华盛顿”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所得不仅是“大体可接受的”，而且就中国当时的实际实力地位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很大的成功。只要看看以当时中国经济与军事的孱弱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却能在此后几年里先后收回青岛、胶济路、威海卫和原则上收回广州湾，而1949年后在大陆统一和国力相对明显提高的条件下却用了6年才收回旅顺、48年才收回香港、50年后才收回澳门，就能理解华盛顿会议的意义。再考虑中国到一战晚期才参战，而且只派出了华工，并未实际参与作战，相比二战中中国“提前”抗日和举国大规模殊死战所付惨重代价而言，一战后中国的所得应该说是很可观了。

但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其激进一翼对此却完全没有反应。由于从新文化运动中后来发展出来的国共两党势力都全盘否定当时的政府，对这个政府的外交成就基本上没有给予“民族主义”的评价。

这是因为对华盛顿会议的批评是逐渐显露激进民族主义色彩的。像陈独秀这样的新文化运动激进派（陈当时已领导初创的中共）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只是提醒国人求人不如求己，不要忘记巴黎和会的教训，对列强的“慈悲心”抱过多幻想。^③ 后来激进派的批判则越来越激烈，甚至说华盛顿

① 中国参加“一战”时已经废除了与德奥等敌国（后来的战败国）的不平等条约。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汪朝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7~302页。

③ 陈独秀：《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

会议对中国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反倒加深了。如果说类似这种指责还可以说是“激进民族主义”对北京政府的民族主义过于温和的不满，那么真正耐人寻味的却是：连这样的指责其实也不是很多。新文化运动对华盛顿会议的真正主流态度与其说是批判，毋宁说是“无视”。

上述数据库分析表明，《新青年》对华盛顿会议的提及（61次）不仅少于巴黎和会（87次），而且绝大多数提及都是在会议期间的“新闻性”关注（50次左右），会议结束后基本就不怎么置理了。而对巴黎和会则截然相反，如前所述在1919年《新青年》对巴黎和会的提及其实并不多，但华盛顿会议后，对巴黎和会的“思想性”关注度却随着时过境迁反倒急剧上升。在1923—1924年间，刚结束不久的华盛顿会议仅被提到4次，而5年前的巴黎和会却被提到12次，到1925—1926年间（此时《新青年》基本已经成为共产主义刊物），两者的差距更是达到1次与60次的悬殊程度。^① 已经被华盛顿会议纠正的巴黎和会随时间推移被越炒越热，而纠正巴黎和会的华盛顿会议却很快被“忘记”，不仅没有赞扬，连批评也几乎没有了。这种奇怪的态度难道是“民族主义”能够解释的吗？

当然人们可以说，华盛顿会议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对外积弱之局，以后更有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危机，“救亡”仍然是头等大事。但是，那个时代中国救亡与对外学习、自我改造（所谓启蒙）事实上一直是并行的。如前所述，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其实指的是启蒙的学习对象由学欧美变成了学苏俄。这能用“救亡”解释吗？即便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迁就日本，拒绝支持同为协约国盟友的中国，确实严重地伤了中国人的心，说国人因此愤然改换“老师”似乎还说得通，而华盛顿会议上既然西方已经改变了巴黎和会时的态度，此后中国再受的侵略基本都是来自日、俄（苏），何

^①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98~400页。

以学习俄国而不再学习西方的“救亡压倒启蒙”却仍然在继续发展？

一战期间发生的俄国革命对中国无疑有巨大影响，毛泽东对此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言。数据库的分析却表明，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期间不仅十月革命的影响远没有“欧战”大（《新青年》提及前者的全部次数只有后者的64%），而且与巴黎和会类似，在十月革命的当时乃至以后几年，这一革命被提及的次数也很少，1919年至1920年间更是明显下降，只是在1920年下半年开始重被注意，尤其在1921年（中共成立之年）后对十月革命的提及才出现爆炸式增长。金观涛等对此评述说：《新青年》知识群体在头几年对十月革命“并不特别关心”，因此与其说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国人知道了社会主义，毋宁说是接受社会主义才使国人听进去了俄国的这“一声炮响”，在知识分子越来越认同“社会革命”，乃至接受社会主义后，“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①

联想到前述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影响就更有意思。按后来流行的说法，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没有主持公道使国人心寒，而十月革命初期苏俄对华的高调“平等”姿态赢得国人好感。问题在于，这两个因素都是在这两件事刚发生时最明显。后来就越来越走向反面：华盛顿会议后巴黎和会的恶果基本消除，而苏俄的对华“平等”不久就显示出口惠而实不至，甚至欺华比沙俄时还变本加厉。但是，偏偏在巴黎和会与十月革命后的初期，这两件事对国人的影响很小。事情走向反面以后，这两件事才被越炒越热，这时对两件事作出上述“民族主义”的解释应该越来越困难、越来越牵强。那么，这两件事的影响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显然，国人“无视”华盛顿会议并不是因为列强没有让步，而是因为国人（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精英及其后续的国共两党）不喜欢的北京政府

^①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99~400页。

(贬义说法是“北洋军阀”政府)。国人在列宁上台四五年后“才对十月革命愈来愈有兴趣”也并不是因为这几年之后苏俄对华外交越来越友善和平等，而是因为上述国人对苏俄的社会改造和新社会模式越来越看好。换言之，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启蒙”本身，而不是来自“救亡”。不是因为西方对中国的威胁变得更大导致中国的学习对象从西方转向更为友好的苏俄，进而学习目标也从西方式的自由主义转向了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而是相反，由于国人启蒙兴趣转向“社会革命”，导致国人、主要是新文化精英的“救亡”抗争对象从俄国人那里移除，而集中对准了“西方”。^①

但是，这个时期“启蒙”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其动力又何在？所谓“压倒启蒙”如果说是压倒了自由主义的启蒙，难道巴黎和会前后国人真的出现了追求民主、平等、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而不再追求“自由”的转变？

这自然涉及什么叫“争取自由”。典型西方自由主义所讲的自由不同于“多数决定”的民主，也不同于“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这类“集体自由”概念，而是与个人主义、个体权利、个性解放相联系的个人自由概念。革命尘埃落定后中国建立的苏联式体制确实极度压抑这些东西。但是要说新文化运动，包括巴黎和会以后“向左转”的新文化运动不包括这些东西，也不是事实。尽管陈独秀的“德先生”“赛先生”之说脍炙人口，使得五四运动追求“民主与科学”成为习语，但是如果以为五四运动，包括其中的左翼就回避个人自由，或者把个人自由看得很次要，甚或像甘阳那样断言五四只讲民主不讲自由，那就大错了。

^① 众所周知期间有个聚焦于抗日的时期，那是日本侵华战争逼迫的。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历史来看，由当初学习西方到后来仇视西方显然是主流，而且主要不是在国际政治、而是在思想文化层面出现的这种变化——明显的事实是：新文化运动中曾经的“西化”激进派并不放弃针对西方列强的维权，而毛泽东晚年对美的外交政策也没有改变他与西方相反的意识形态。

根据大规模近代语料数据库进行的词频分析，“自由”、“个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个性”等概念其实都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不久才引入中国、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大兴其道的。而“民主共和”传入中国则要早得多。从鸦片战争后不久徐继畲就称道美国的“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①薛福成说西方“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②张树声极言西人“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也”；^③郭嵩焘赞叹英国“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④洪仁玕盛称美国“凡官民有仁智者，写票公举，置于柜内，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⑤直到谭嗣同说“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⑥总之，西方的统治者是选举产生，议会掌权，君主虚位，民权强大，令苦于专制的国人羡慕。这已然久矣。

按此说来，“个人”的概念是20世纪初传入的，而且初时很受抵制。正是新文化运动改变了这一局面。所以，后来新文化精英们常以个人解放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首要特征和主要贡献。后来对五四运动不以为然的批评者，也把“个人主义”当作五四的主要过失，如“新国家主义”者陈启天说：“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之最大特征为个人主义之昌行，……吾人不可不明辨之而加以修正也。”^⑦

可以说，“民主”与“共和”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成大潮（标志就是

① 徐继畲：《瀛环志略》。

② 《薛福成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712页。

③ 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卷八。

④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⑤ 洪仁玕：《资政新篇》。

⑥ 谭嗣同：《仁学》。

⑦ 陈启天：《新国家主义与中国前途》，《少年中国》，第4卷9期，1924年1月。

辛亥革命)，而个人自由正是因新文化运动才形成大潮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五四（指“大五四”）倡导“民主”，实不如说五四倡导“自由”尤以个人自由意义上的“自由”更准确。

“启蒙”之前的革命与革命之前的启蒙：民主共和，“天下为公”？何以如此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回答：晚清中国人为何想到要学习西方？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学习西方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初期的原因就是西方列强打败了中国，挨打就证明落后，于是去学习西方列强。实际上，这个说法既不能解释历史也不能解释当时。

不能解释历史，是因为历史上中原汉族国家被“夷狄”打败，乃至被彻底亡国也不只一次，何以那时汉族不认为挨打就是落后，而抛弃传统去“胡化”，反而常常是打胜仗的夷狄走向“汉化”？而且，晚清所谓被打败，其实主要是丢失一些藩属和边地，比起西晋、北宋的怀愍徽钦之祸，南宋、南明之覆巢毁卵、军事上彻底败亡皆不可同日而语，晋人宋人明人没有因此抛弃道统而学习夷狄，何以晚清那么点失败人们就会因此自认落后，要去学习对方？

再说不能解释当时。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放弃学习西方，是因为“先生欺负学生”。但是如果说过去学习西方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那不就是学习“打”了我们，亦即欺负了我们的人吗？如果那时我们知道“师夷之长”与“制夷”并不矛盾，没有因为“先生欺负学生”而拒绝学习，如今何以就相反？何况，晚清西方欺负中国，是几度打上门来，兵戎相见，中国战败求和，割地赔款，虽然不比宋、明之亡国，但与巴黎和会上西方只是没有主持公道助我拒日相比，晚清那种欺负还是严重多了，更何况如前所述，巴黎和会的错误不久还得到了弥补。晚清那样的欺负都没有妨碍我们学习，怎么巴黎和会就会妨碍？

其实，说巴黎和会让中国人对西方失望并不假。但这种说法本身却会

带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在和会前会对西方充满希望？鸦片战争让国人对“英夷”失望了吗？火烧圆明园让国人对“英法二夷”失望了吗？没有，因为那时一般国人对“夷狄”本无好感，谈不上希望，自然也无所谓失望。但是到巴黎和会前就不同了，那时国人曾相信协约国列强的胜利意味着“公理胜过强权”，换言之，国人觉得西方列强不仅强大，而且代表正义。后来发现未必如此，所以才会失望。

指望列强在国际关系中总讲正义，确实难免会失望。但是，之所以会有这种指望，却是因为那时国人在很大程度上相信了西方列强内政方面的“仁义”，至少比“我大清”来得“仁义”。先觉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并不是因为他们改信了基督教或接受了“西方价值观”，恰恰相反，他们那时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具体说就是从“孔孟之道”出发，对比了中西现实后，发出了中国早已礼崩乐坏，而“三代圣贤之世”却见于西土的感叹。

因此，学习西方的动力就在中国内部。一个奇怪的情况是：人们都知道西方的思想启蒙是在政治革命之前，无论法国的启蒙运动与后来的大革命，还是英国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与后来的“光荣革命”，都是思想变化在先，然后革命才有了精神动力。但是论及中国近代，被当成“中国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却是在辛亥的政治革命之后才发生，这是怎么回事？

应当承认，中国的思想启蒙早在辛亥前几十年就已经出现，并且不断发展，否则根本不会有辛亥革命。只是相对于中国过去的“儒表法里”而言，中国那时的启蒙主要是冲着“法里”，而不是冲着“儒表”的，甚至“儒表”被激活了古代的崇周仇秦情绪后，还成了呼应“西学”的启蒙动力。只是后人由于种种阴差阳错把“启蒙”与“反儒”画了等号，才忽视了这“第一次启蒙”的存在。其实正是由于这第一次启蒙的推动，中国才有了冲着“秦制”、而不是冲着“孔教”来的辛亥革命。而革命后发生的

“新文化运动”已经是第二次启蒙，但它一方面是第一次启蒙的深化，另一方面却也是对上一次启蒙方向的偏移，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后来还偏移得越来越厉害。

追溯源头，在晚清之变前两千多年，中国曾经历了另一次深刻变化，即“周秦之变”，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小共同体本位的、温情脉脉的“周制”被依靠暴力与强权统治陌生人社会的“秦制”所取代。希望挽救周制的儒家和全力推行秦制的法家成为那个大转型时代“百家争鸣”最主要对手。儒家崇周仇秦，怀念“三代”，认定今不如昔；法家则不择手段无条件维护专制，“以古非今者族”，终于建立了“焚书坑儒”的帝国。尽管“暴秦”的极端残酷导致其短命并使法家声名狼藉，但儒家“三代盛世”温情脉脉的乌托邦也无法恢复，最终在从秦皇到汉武的多次反复后，“汉承秦制”的制度基础上嫁接了经过“法家化”改造的、识时务的儒家（笔者谓之“法儒”），这就是所谓的儒表法里或“儒的吏化”。

尽管汉武帝以后法家的制度与儒家的话语似乎都被定于一尊不容置疑，毛泽东所谓的“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之说在多数时段也只是“秦制”极端维护者的神经过敏。秦制的积弊毕竟无法消弭不满，“儒表法里”体制的表里冲突明显存在，古儒崇周仇秦传统的不绝如缕，也非“法儒”所能完全切断。在秦制下真正的儒者历来是不满现实的。“反法之儒”思潮虽未必像如今一些拔高之论所说有什么“古典的宪政民主思想”，但“从道不从君”的古儒之风、以“民本”反极权、以“封建”反帝制、以士大夫的尊严和人格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确实给走出“秦制”的近代中国提供了思想动力，并为接轨“西学”提供了本土资源。过去他们的理想不是远溯三代，就是编出个子虚乌有的桃花源，或者缩小到某个“义门”之家，在大尺度上找不到一个现实的支点。到了晚清，尽管西人打开国门用的是坚船利炮，但当中国那些儒者透过这个窗口开眼去看西方社会时，最令他们震撼的并不是什么船坚炮利，而是如王韬所言西洋

“以礼义为教”，“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①

他们民主国家对自己的公民，就比大清对草民仁慈；他们的社会关系，就比大清道德；他们的法治，就是比大清讲理；他们的吏治，就是比大清明……这是很多以儒家眼光观察西方的人那时都有的感慨。比较之下他们猛然发现，中国固然曾有伟大的文明，但已经“礼崩乐坏”了两千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②

西方搞的其实就是中国三代“有德者天下共举之”的“公天下”，可是我们自秦以下却堕落成“家天下”，甚至“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今日之土番野蛮者。”用谭嗣同的话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③

什么叫“乡愿”？那是古儒最讨厌的一种人，就是墙头草，随风倒，趋炎附势，谁掌权就跟谁。“乡愿”的对立面就是古儒所谓的“乡绅”，今人或把乡绅解释为“地主”。但古时所谓“绅”指的是儒者特有的一种服装，“乡”意指“乡举里选”的小共同体代表，据说“乡绅”的职责就是维护公理，独立于权势，“从道不从君”。在晚清这些“反法之儒”看来，秦制下这样的“乡绅”已经绝迹，秦以后就只有“乡愿”了；到了清朝，更是“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④那么“乡绅”哪里去了？在西方。西方的议会、特别是完全民选的议会下院，晚清时最早就被译作“乡绅房”，“聚乡绅于公会”^⑤的民主制度“欧罗巴诸国皆从

① 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第66~70页。

②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③ 谭嗣同：《仁学》之二十九。

④ 谭嗣同：《仁学》之十九。

⑤ 徐继畲：《瀛寰志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道光30年福州版，卷四。

同”^①。据说那里的国政就靠这批不听皇上、只认公理的议员（“议绅”），成天忙于替天行道、为民请命呢。

无怪乎郭嵩焘“每叹羨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而薛福成、陈兰彬、黎庶昌等凡是出过洋的均有同感，“皆谓其说不诬”。^② 更早的徐继畲说那里“治国崇让善俗”。洪仁玕说那里“礼义富足”、“诚实宽广，有古人遗风焉”。^③ 郭嵩焘等都是清朝官员，洪仁玕则是反清的“粤匪”，他们对西方的看法却差不多！

当然那时朝堂上这种说法是犯大忌的，郭嵩焘徐继畲都为此受了处分，有人更专以打小报告整他们为晋身之道。但有趣的是，这些所谓的极端守旧派只要出过洋的如刘锡鸿、陈兰彬之流，朝堂上抨击别人称道夷狄的异端邪说，私下里“叹羨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却比郭嵩焘等还高调。还有的官场油子如张树声，平时大言我朝“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不必效法西人”而官运亨通，临终不再顾忌官运了，却上遗折恳请朝廷“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比后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都激进许多。^④

这一切都是鸦片战争后、戊戌变法前即新文化运动之前几十年的事。郭嵩焘这些人当然不懂什么“新文化”，他们其实还是传统儒者，西方更未必真与“三代”相似，但是一经与西方比较，古儒心底潜藏的对“秦制”的不满就冒了出来。而崇信人性恶的法家拜服的是铁腕赏罚、顺昌逆亡的皇权，对皇上本人谈不上真正的忠诚，无权的“虚君”难免墙倒众人推。这就是中国没有搞成君主立宪、却在“公天下”推倒“家天下”的革命中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文化原因。这时并没有什么“西学”与儒家的冲突，相反，人们看到的是“反法之儒”开创“学西”之风，在民

① 徐继畲：《瀛寰志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道光30年福州版，卷七。

② 《薛福成日记》，第538页。“黎莼斋”原作“黎莼窄”，误。

③ 洪仁玕：《资政新篇》。

④ 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卷八。

主共和、天下为公的旗号下实现西儒合力推倒法家秦制的图景。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先进者把古儒“官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的“民本思想”与西学中民权优先、国权服务于民权的民主观念结合起来，明确提出改革的目的是为老百姓的幸福和权益，“富国强兵”只是顺带的目标，甚至明言不能善待百姓、提高百姓地位的“强国”很可怕，这显然也与历史上法家的“强秦”、“暴秦”图景与他们眼中的“洋三代”的对比有关。

如郭嵩焘就说：“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①谭嗣同甚至认为，专制的国家强大了反而是祸害，还不如不强大。^②慷慨为变法捐躯的壮士谭复生当然不是不爱国，也不是不希望中国强大，只是把百姓的福祉、民众的权利看得更重，主张“先民主，后强国”。这应该算是“人权高于主权”在本土思想中最早、恐怕也是最极端的表述了。谭嗣同这种思想显然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但他并未称引西哲，这完全是从孔孟的说法中推出的。而这与“救亡压倒启蒙”、“挨打证明落后”显然毫不相干。

日本式自由主义：“个人独立”如何接轨于“军国主义”

甲午以后直到一战开打，上述局面逐渐改变，新文化运动就是集这些改变之大成。

改变的原因当然很多：西学进来多了，人们逐渐明白西方与“三代”还是不同的。庚子“拳乱”的刺激，除了朝廷的昏庸人们更痛感国民的愚昧。辛亥后的失望，推翻了“秦制”国家还是没起色。当然也有“救亡”

^① 《郭嵩焘诗文集》，杨坚点校，岳麓书社，1984年，第255页。

^② 谭嗣同：《仁学》之三十五。

的影响，今人强调鸦片战争带来危机意识。当时国人对这沿海的失利多不太重视，反思多限于用错了人（误用琦善错贬林则徐）而已。重视船坚炮利也是20年以后的事，远比徐继畲叹羨洋人“推举之法”更晚。但甲午就不同，中华文化的学生“小日本”居然把自认为已经学会船坚炮利的老师打得如此惨败，还首次割走了一个省，不但使人真正产生亡国之忧，也带来“文化”上的巨大冲击。

然而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往很少被提及的，那就是个人自由观念的引入，尤其是转经日本引入的这种观念，与欧美的“原版”个人自由思想又有微妙的、但却是重要的不同。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后几十年间，并没有什么“西儒对立”，反倒是流行从法家秦制的压迫下“引西救儒”的想法，而且引的还不是“西用”（船坚炮利之类）“西末”（办公司做生意之学），许多人直接就是称道“西体”“西本”（“推举之法”、“乡绅房”、“民贵君轻”、“论政于议院”等“天下为公”的“国政”或“洋三代”之制）。

专制者基于既得利益反民主，清朝帝王与路易十六查理一世皆然，清朝权贵与西方权贵也大都皆然，这并不是“文化”问题。只读诗书不出国门、完全不懂“夷情”的冬烘先生以至文盲草民“盲目排外”，其实是信息缺乏的问题，也不是“文化”问题。至于反侵略与“师夷之长”本不矛盾，更不是“文化”问题。但凡知晓夷情的儒者大都“叹羨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区别只在于少数人在朝堂上说，多数人只在私下说，甚至有人朝上是揭批“叹羨”者的“极端守旧派”，私下却“叹羨”得更厉害；有人为做官从来不说真话，临终的“遗折”才表明心迹而已。这才是当时真正的“文化”现象，也是辛亥之变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西学（指自由主义）和儒学（反法之儒）在反对“秦制”这点上是共同的。古儒本来不满现实，认为三代乃至更早的“禅让制”比“家天下”高尚，把民主共和理解为“天下为公”并不困难。哪怕西学中的宪政

民主其实不同于古儒的“三代封建”，至少西方中世纪的“封建”也的确比“秦制”更接近于“周制”，而近代西方离“封建”只二百年左右，中国废“周制”却已两千多年了，说近代西方更多“三代遗意”也合乎逻辑。西方宪政与“封建”时的“大宪章”也确有某种联系。^① 儒者因喜欢“封建”、反感帝制而接受宪政、“叹羨”西方并不奇怪。

但是，个人自由观念引入后就不同了。古儒在权利观念上主张小共同体本位，“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法家则正相反，主张君权至上，大共同体本位，“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两者对立是明显的。董仲舒们在皇权威慑下捏着鼻子做“法儒”，其实不大甘心，看到西方的“洋三代”，他们是很“叹羨”的。但是个人自由意味着权利观念上的个人本位，无论法家的大共同体本位还是儒家的小共同体本位对此都是格格不入的。借《六德篇》的用语说，那就不是“为父绝君”抑或“为君绝父”的问题，似乎是为“我”可以既绝君也绝父了。

反过来讲，持个人自由观念者对古儒也会产生隔膜。这种个人自由观念是英美近现代那种模式，也未必会把儒家当作主要对手。这是因为：第一，现代个人自由观念既不接受父权至上更不接受君权至上，既不是小共同体本位也不是大共同体本位，所以持这种观念的人们对儒家如果说持异议，却不可能对法家更有好感。而且在儒表法里的旧制下，真正扼杀个性和个人权利的是法家体制（法里）而不是儒家话语（儒表），在逻辑上他们也应该把法家与秦制作为主要障碍。第二，自汉武帝以后儒家已经从一个思想流派，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文明识别的符号体系，就像欧洲的基督教。无论古罗马还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都不见得有个人的自由观念，

^① 尽管我反对时下那种极度强调这种联系的流行观点，更反对直接把宪政与“封建”画等号。至于秋风先生那种认为汉武帝不是继承秦制而是恢复了“封建”、“封建”又等于宪政，因此汉武帝以来中国就有宪政的论证，从史实到逻辑都是不能成立的。本文提到的晚清儒者不满时制而“叹羨”西方的事实，也说明清朝没有宪政也不是“封建”，否则郭嵩焘们还“叹羨”什么呢？

甚至这两个时期的基督教各支教会都曾经以不宽容、搞异端审判和圣战著称。自由主义和个人自由观念必须消除不宽容等，却未必要取缔基督教，事实上消除这些东西后个人自由完全可以在基督教文明中实现，并且和教会共存。同样，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国，自由主义要消除的是“罢黜百家”之“独尊”，而不是“儒术”，消除这些弊病后个人自由也完全可以在儒家文明中实现，并且和儒学共存。

但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引入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影响大增的个人自由观念却不是这种模式，而是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值得注意的是，甲午以后，尤其是庚子以后，一方面学习西方的必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另一方面日本被认为是学习西方成功的典型，国人多以日本为学西的中介。加上文化与地理更近，留学成本更低，留日大潮兴起，规模远非此前之留学欧美可比。后来中国的维新派在戊戌失败后，革命派在辛亥胜利前，也以日本作为主要流亡地，自然也受到日本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传回国内。

在一战期间欧洲兵燹连年，出国留学几乎都往日本。而这个时期恰恰是个人自由观念大举进入中国之时。从初期倡导个人自由最力的章太炎及“章门弟子”鲁迅、周作人、许寿裳^①，到后来成为共产党缔造者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文化姿态更激进的那几位：主张废除汉字的钱玄同、直接点名批孔的易白沙、吴虞等人，都是留日出生，且他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个人自由思想之形成都与其留日经历密切相关。

当时日本的个人自由思想虽也是受“西学”影响，但却更受到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独特的问题意识所培育。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是，日本明治时代的近代化不是一个走出“秦制”的过程，却更像是一个走出“周制”的过程。明治以前的日本是一种诸藩林立、天皇虚位的“封建”状态，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国的“周制”，而维新就是要“大政奉还”（诸侯向天皇交还

^① 卢毅：《章门弟子与近代个性解放思潮》，《北方论丛》，2006年第2期。

权力)、“废藩置县”。如维新先驱吉田松阴所言：“天下为天皇一人之天下，而并非为幕府之天下”，力倡“一君亿兆臣民”。^①而按木户孝允的说法，明治变法“三百诸侯举而其土地人民还纳，不然一新之名义不知在何”。^②显然这位明治元勋心目中的“一新”就是实现了周秦之变式的大一统，而只字不提宪政民主。

中日双方都有不少人把日本的变革比之为“西化”版的“周秦之变”。^③与中国周秦时期的“儒法斗争”类似，日本在明治时代“脱亚入欧”之前也经历过一场“脱儒入法”的江户时代“新法家运动”。^④而明治时期的反儒学西虽然引进了一些宪政成分，却主要是用它消除“藩权”，而非消除皇权。^⑤藩权消除后皇权反倒坐大，并经其后的发展，在军部专权和北一辉的“皇道社会主义”推动下湮灭了宪政，短暂的“大正民主”成为小插曲，由明治到昭和的主流使日本走上军部鸱张、天皇独断、以举国体制穷兵黩武造就“虎狼之师”的军国主义之路。

“军国”和“军国主义”这类词在后来抗日时期的中国成为严重的贬义词，但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文化运动期间，它不仅没有贬义，而且明显是一个褒义词。早在20世纪初，严复就把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描述为“宗法社会”变成“军国社会”的过程，在他看来“周秦之变”就把这一过程完成了一半，现在要完成另一半。^⑥当时的革命派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等与他辩论，但辩的主要是“排满”革命

① 吉田松阴：《将及私言》，转引自冯天瑜：《“封建”考论》（电子版）。

② 木户孝允：《版籍奉还建言书案》，《木户孝允文书》八，日本史籍协会，第25~26页。转引自冯天瑜：《“封建”考论》（电子版）。

③ 冯天瑜：《“封建”考论》多引此类材料，可参。

④ 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

⑤ 论者认为“日本式立宪”之不同于“英国式立宪”，就在于后者裁抑君权，前者却捍卫君权，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7页。

⑥ 严复：《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245页。

并非出于“宗法”偏见，也无碍于乃至有助于追求“军国主义”。^① 换言之，在“军国主义”值得追求这一点上，双方并无异见。

而追求“军国主义”就必须实行一种独特的“个人解放”，即严复所谓“言军国主义，期人人自立”。^② 何以说是“独特的”？那是因为当时风行的这种个人解放实际强调的是个人对于家庭、家族、乡里、采邑等依附性亲缘社会、熟人社会或笔者定义的“小共同体”的独立，而非个人对民族、国家、“人民”以及自命为代表这些“大共同体”的“组织上”的独立。甚至，把个人从家庭、家族、宗藩中解放出来，就是为的让其能为“国家”或“组织上”的伟大事业所用，成为这些大共同体的工具，而不是让其成为真正自主的、无论对大小共同体均拥有充分权利的现代公民。

1905年至1907年间的争论主要关键词还是“军国主义”而不是“人人自立”，到了新文化运动中，“个人”就越来越成为“关键词”了。

实际上，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周秦之变中，法家抨击儒家时就倡导过这种“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的“伪个人主义”。大共同体本位的强化需要直接对个人进行控制，为此就不能容忍小共同体梗在其间，这就是韩非所谓的“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③ 因此在小共同体内提倡“各顾各”以瓦解其“聚”，就成了秦制的一大特色。法家提倡“性恶”，奖励“告亲”，禁止“容隐”，强制分家，“不得族居”，规定父子夫妻各有其财，鼓励做“君之直臣，父之暴子”，而反对做“父之孝子，君之背臣”，甚至造成一种六亲不认的世风。^④ 而日本在明治前的“脱儒入法”也具有类似的特点。

① 罗福惠、袁咏红：《一百年前由译介西书产生的一场歧见——关于严复译〈社会通论〉所引发的〈民报〉上的批评》，《学术月刊》，2005年第10期。

② 严复译、甄克思著：《社会通论》，见《严复合集》第12册，台北，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年，第145~146页。

③ 《韩非子·扬权》。

④ 贾谊：《过秦论》。

明治维新时，这种“日本式自由主义”达到高潮。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式启蒙思想家，一方面鼓吹子女独立于父母、家臣独立于藩主、个人独立于群体，“一身独立，一家独立，天下国家亦独立”。“独立即自己支配自己的身体，无依赖他人之心。”“‘独立自主’的根本意义恰恰在于主张个人的自主性”。^①但另一方面，福泽谕吉又宣传无条件忠于天皇，并且为此抨击儒家妨碍“忠君”。继明治前夜吉田松阴抨击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不忠”之后，福泽谕吉更提出反“儒权”而扬皇权。福泽谕吉宣称：中国文人“深受儒权主义的教养，脑中充满骄矜自夸的虚文”，头脑比较复杂，难于唯君主之命是从。而“日本的‘武家’大都无知，不懂学问”，“只以武士道精神而重报国之大义，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犹如水之趋下一般自然”。^②

于是福泽谕吉的“自由”与“个人独立”，其具体含义就变成独立于藩主，而效忠于国家；独立于本家族，而效忠于天皇；独立于小共同体，而依附于大共同体。后之流风所及，连所谓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等，也都是叫人从“父母的人”变成“天皇的人”，而非真正成为独立的人。甚至养儿不尽孝而去当“神风队”，养女不事夫而去做慰安妇。女子可以不从父母，不守妇道，私奔苟合不以为意，但国家或天皇一旦召唤，她们就应该“报国奉仕”去供人蹂躏！日本式的“个人自由”就这样与“军国主义”成为二位一体的怪胎。

随着军国主义在福泽谕吉身后的继续发展，强大起来的日本从学习西方变成了对抗西方，福泽谕吉时代的“脱亚入欧”也变成了皇道派敌视欧美的“大东亚主义”。但是，“脱儒入法”式的“日本传统批判”却在军国主义狂潮中继续发展。一些狂人在敌视西方的同时也不满意日本过去沾染上的“儒家劣根性”，他们除了崇奉被认为日本国粹的神道外，仍然佩服

^① 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全集》第三卷，岩波书店，1958年，第57、71、77页。

^② 福泽谕吉：《西洋事情》。

中国的法家，以为后者的“大陆精神”可以治疗日本的“岛国病”。

明治后日本之走向军国主义，几乎是“脱儒入法”的逻辑延伸。佐藤清胜于侵华战争期间、太平洋战争前夕的1939年出版两卷本大部头的《大日本政治思想史》，书中极力贬低儒学对日本的影响，他认为儒家在日本的影响只是从大化改新到桓武天皇这一时期（即相当于我国唐朝的奈良时期）与日本原有的“神治”与“祷治”混合运行，形成所谓“神德两治”与“德祷两治”。而桓武以后就衰亡了。到江户时代出现以法家来改造儒家的所谓“武德两治时代”，其进一步的发展便形成了明治的“法治时代”，照他的说法，这时出现的明治维新更是以法代儒，犹如近代版的周秦之变。

不同于明治时期日本的“欧风美雨”，这时随着“大和魂”、“武士道”的膨胀，以佐藤清胜为代表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显然已是敌视西方、蔑视中国，但耐人寻味的是他仍崇尚韩非式的所谓“法治”。^① 尤为有趣的是此人还热衷于批判日本人的“劣根性”。当时就有中国学者指出：佐藤清胜“为敌国‘弄笔’军人中之自厌色彩最浓者。……又高唱日本人应摆脱岛国性，求为‘大陆人’以开创新历史之说。彼之《满蒙问题与大陆政策》一书，骂政府、骂国民，怨天恨地，以日本甘于岛国性之桎梏为不当，甚至诟东京为‘笼城’，迹其跳踉叫嚣之目的，无非以整个吞噬中国为制就日本人为‘大陆人’之基础而已。彼有一幻想，即使日本国都向大陆迁移，其计划之第一步迁东京政府于朝鲜，第二步迁于‘满洲’，第三步迁何处，彼未言，以意测之，殆北京、南京乎？佐藤因素持迁都大陆论，战前对其本国之诸多建设皆表不满，甚至架铁路、装电线、浚河川，彼皆以‘不必要’一词而否定之，其自厌程度之深，可想见矣！”^②

① 佐藤清胜：《大日本政治思想史》，东京，大日本政治思想史刊行会，昭和14年，上卷，第46~219页；下卷，第86~253页。

② 张慧剑：《辰子说林》《中华历代笔记全集·民国》本，其中提到的佐藤清胜著作即《满蒙问题と我大陆政策》，春秋社昭和6年版。

这个佐藤清胜可算是“脱儒入法但不入欧”的代表、既反“西方”也反儒的“国民性批判”之典型了。

新文化运动中的“个性解放”与“社会主义”

中国的现代化就目标与日本乃至其他国家本无不同。然而为达到这一目标所要走的路，则因两国“前近代”社会结构的大异其趣而本应有所不同，“走出秦制”的中国如果在这方面仿效“走出周制”的日本，会导致严重的“问题错位”，确实可以通过新文化运动予以证明。

如前所述，主要由留日出身的学者为主力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大力倡导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这一诉求在思想层面主要以反儒家、反宗法“礼教”、而不是反法家为特色，在社会层面则主要以反家庭、家族和家长制，而不是反“秦制”反极权为特色。这样的“自由”诉求不仅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甚至在其后的左派文化运动中仍然高涨。1920年，已经在筹建共产党的陈独秀仍然为“个人主义”辩护：“我以为戕贼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个人主义，中国人底个人权利和社会公益，都做了家庭底牺牲品。”^①但在1921年，他却又大骂起“个人主义”来：“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②金观涛对此评论说：一年之内陈对“个人主义”的看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③

这个“大转弯”其实未必存在：针对家庭、家族等小共同体的“个人主义”直到后来的左翼文化乃至共产主义革命文化中仍然受到“辩护”，

①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5号，1920年4月1日，第5页。

② 陈独秀：《卑之无甚高论》，《新青年》，第9卷3号，1921年7月1日，第3页。

③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168页。

甚至还更加被弘扬；而针对大共同体的“个人主义”，早在严复和章太炎等人论战时就不被看好了。

有学者曾指出：在清末民初“这场个性解放运动中，章门弟子异军突起，正式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舞台”，“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最彻底强调个性解放的是章太炎”。^① 1907年，章太炎提出“个体为真，团体为幻”，进而声称：“人本独生，非为他生”，坚决反对“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② 太炎的这种“个人主义”萌于他早年对宋儒的不满，但留日期间受到江户晚期荻生徂徕等“新法家”和明治思想影响更大。太炎出身汉学（古文经学），颇讥宋儒之义理；出道后两度赴日，淹留十年，颇染明治之风，于是进而由汉学而徂徕学，“归宿则在孙（荀）卿、韩非”。^③ 太炎讲了许多“反孔扬秦”的话，“文革”中因此被盛夸为大法家。太炎本与许多汉学一派的学者一样重训诂不重“大义”，“赋性近保守”，接受西学相对较晚。但“一经顿悟，则勇猛精进，有非常人所可几及者”。^④ 因而很快成为以激进革命立场与改良派论战的好手。

不过，太炎的激进与其说在于自由民主，不如说更多地在于其强烈反满的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因此他对黄宗羲激烈反君权的古儒民本言论远不如对其他晚明遗民的兴汉反满言论感兴趣^⑤。

在“欧风美雨”的明治日本，章太炎无疑也接受了许多经日本转手的“西学”中的自由个性之教，他著有《说我》、《明独》等文，鼓吹个性解放和个人意识的觉醒，在这方面也算个启蒙大家，而且相当激进。太炎在

① 卢毅：《章门弟子与近代个性解放思潮》，《北方论丛》，2006年第2期。

② 《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8、444~445页。

③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订年谱》，香港龙门书院，1965年，第6页。

④ 柳亚子：《羿楼日记》，转引自《现代学者演说现场·章太炎卷》（秦燕春考释），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⑤ 《现代学者演说现场·章太炎卷》（秦燕春考释），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7页。

“群（共同体）独（个人）”关系中一面极力弘扬“大独”（激进个人主义），一面却又力挺“大群”（国家至上、军国主义），只用个性解放来摈斥“小群”（在他看来宗族、乡里乃至党派等皆属之）。在这方面，中日两国的“法家”传统都给他以强烈影响。徂徕学、明治维新与中国的“脱儒入法”之一脉相承，可以从太炎此语证之：“孔教是断不可用的。……程朱陆王的哲学，却也无甚关系。……日本今日维新，那物茂卿（按即荻生徂徕）、太宰纯（即太宰春台）辈，还是称颂弗衰，何况我们庄周、荀卿的思想，岂可置之脑后？”^①于是，章太炎得出结论：“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由是言之，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②激进个人主义就这样转化成了激进的国家主义。

王元化先生曾经以章太炎及鲁迅等章门弟子为例，解释“五四运动为什么反儒不反法？”他说：章太炎著的《秦献记》、《秦政记》等，对秦始皇取肯定态度。为了“克服所谓‘一盘散沙’现象”，他把“大独”与“大群”拉到了一起，共同对付“小群”。他反对亲缘宗族的所谓“小群”，这不仅是章太炎一个人的思想，康有为破九界倡大同说，谭嗣同申言“无对待”等，莫不如此。所以这是时代思潮，其产生有具体历史背景。五四时期为什么主张非孝而反对家庭？主张非孝的胡适、鲁迅在行为中却信守孝道。中国旧式家庭也未必像五四时代所讲的那么黑暗。只有梁漱溟对中国的家庭比较肯定，这几乎是唯一的例外。^③

“个人主义”只针对小共同体，不针对大共同体；只针对儒家，不针对法家，这并不始自陈独秀，也不始自新文化运动，早在20世纪初就由章太炎等人倡导了。

①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见《现代学者演说现场·章太炎卷》（秦燕春考释），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6~12页。

② 章太炎：《明独》，《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③ 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http://www.oycf.org/Perspectives/Chinese/Chinese_2_05312001/WangYuanHua.html。

只用大共同体来压制“个人”，不用小共同体来压制“个人”，乃至继续支持针对家庭、家族的“个人主义”，也没有终结于陈独秀，更没有终结于新文化运动。直到后来的左翼文化中，弘扬个性解放，支持“娜拉出走”仍然是热门的主题。尤其是城市里和知识分子中，很多人就是从追求个性解放和个人幸福、摆脱包办婚姻和“旧式”家庭家族，反抗族权父权夫权家长权，抗婚逃婚离家出走，而走向了“革命队伍”的。

不但如此，这股风气还从城里、知识群体里刮向了农村和农民，并与中国传统中本来已有的非礼纵欲现象结合起来。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以称赞的笔调描写“贫农”在性关系方面的“革命”倾向。他指出：农民平素在“性方面也比较的有自由，农村中三角关系及多角关系，在贫民阶级几乎是普遍的”。^① 20世纪30年代中共发动土地革命时，这种“贫农的性自由”更大为发扬，如毛泽东所欣赏的：当时苏区许多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后立即立法“申明禁止捉奸”，以致村子里的青年男女“在山上公然成群的‘自由’起来”，“上述事情之外，有老婆又新找一爱人的差不多每个乡村都有”。^②

启蒙运动真正的大变化发生于新文化运动之前，“日式自由主义”到“俄式社会主义”只是小变化。

要之，中国启蒙运动真正发生的大变化，是从徐继畲、郭嵩焘、谭嗣同时代的“西儒汇融，反对法道互补”、“反法之儒引西斥秦”，转向了章太炎、陈独秀时代的“西儒对立”、“脱儒入法”。这一转变始于甲午、戊戌，和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国人从直接学西改由日本中介有重大关系，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彰显“西方弊病”、而日本思想界及留日学人对中国的影响大增，这一转变遂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更为凸显的

① 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东京，北望社，1972年10卷本，第1卷，237页。这段话出自初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收入国内版《毛泽东选集》时被删。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选》，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8~179页。

反映。

在这以前，国人之先觉者学习西方是为了走出“秦制”，在这以后，学习西方却似乎是如日本人那样走出“周制”，甚至隐隐然是要走向“强秦”。过去的思想者盛称西方如“三代圣世”，而中国之弊则由秦汉始；现在的思想者却厌恶“三代”的“封建”，而视秦汉为西方式的“平等”。最明显的是同为戊戌明星的康有为与谭嗣同，殉难于戊戌的谭嗣同追羨“三代之文化”，而抨击始皇以后“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而康有为活到民国以后，却不以“三代”为然，而夸奖“自秦、汉已废封建，人人平等，……一切皆听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也矣。法国大革命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①

戊戌前后的两代“学西”人，实际上有着两种几乎相反的西洋形象：以前的西洋是：“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郭嵩焘），“西土之桃花源”，“国无苛政，风俗简朴纯良，数百年不见兵革”，“百姓亲附，邻国之民喁喁慕义”^②（徐继畲）。而以后则是：“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建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③（陈独秀）；中西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④（李大钊）。前者羡慕的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儒家化的西洋”，而后者羡慕的则是个杀气腾腾的“法家化的西洋”。

“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之说或许使人想到“救亡压倒启蒙”。的

① 康有为：《中华救国论》，载《不忍》杂志第一册（1913年2月），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708页。

② 徐继畲：《瀛寰志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道光30年福州版，卷五。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97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7页。

确，把“西洋文明”看成铁血文明是与“救亡”意识有关。但重要的显然不在于此，因为这时西洋文明的另一面即所谓“博爱”，陈独秀们也讲了不少，但有趣的是他们对此仍然要从“反儒”方面来解读。陈独秀指出：“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的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为全社会的友爱。”^①耐人寻味的是，这里对孟子“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小共同体本位思想之批判与先秦法家反儒的理由几乎完全一样：“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②不过，正如秦前批判儒家“亲亲”之说并未导致墨家“兼爱”的乌托邦，却导致了法家的“政胜其民”、“国强民弱”一样，陈独秀后来也没有再讲“博爱”，而是变成大讲“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了，这时他怎么就不担心“社会纷争更加厉害”了呢？

总之，从为反“秦制”而学西，到仿效日本为反“周制”而学西，从学西者“反法不反儒”到“反儒不反法”，从萌芽中的市民社会个性因素与传统小共同体自治因素联手先摆脱“秦制”，到集中冲击小共同体的“日本式个性解放”为大共同体的一元化控制开路，中国“启蒙”的变化早在巴黎和会导致救亡呼声之前已经很明显。整个新文化运动其实都是这一变化的产物。正是由于在对宗法礼教发动激进抨击的同时并未对儒表法里的传统作认真的清理，个性解放的新文化在反对宗族主义的旗号下走向了国家主义。尽管我并不认同今天某些“新儒家”的反启蒙之说，也不赞成把五四和后来的“文革”作直接的因果联系，但无可否认，后来在“文革”中发动的“批儒崇法”、反孔扬秦（始皇）运动实际上是把新文化运

①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5~126页。

② 《商君书·开塞》。

动的这一滥觞推到了极端。

当然，所谓反宗族主义不反国家主义，并不是说那时的人们只反族长不反皇帝。新文化运动这场“文化革命”是继承辛亥政治革命、反对帝制复辟的激进运动。许多新文化精英对皇权专制的批判不亚于对宗族桎梏的抨击。章太炎与鲁迅肯定秦始皇只是体现一种“强国”情结，并不妨碍他们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及袁世凯和蒋介石的专制。何况明确肯定秦始皇的也只是章、鲁和毛泽东等人，陈独秀等似无这种言论，而作为新文化精英后来又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翘楚的郭沫若还曾写过《十批判书》骂秦始皇以影射蒋介石。但毛泽东后来说他是反对此书的。

然而，新文化运动“反专制”的主流只是把传统专制当作皇帝个人的或皇帝家族的“家天下”来反，缺乏对大共同体扼杀公民个人权利的批判。换言之，五四式的民主理念固然是既针对父权专制也针对皇权专制，但五四式的自由理念，即“日本式自由主义”，至少在很多人那里，却只针对家族整体主义，不针对“民族”、“国家”、“人民”的整体主义。在中国革命中，针对家庭、宗族等小共同体要求个人自由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当时的个性解放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改革或革命，在这类领域绝没有所谓“民主压倒自由”的问题。

一旦超越比家族、村落更大范围的共同体时，这个原则就消失了。人们在针对家规族法要求解放的时候，反对的不仅是家长本人的独裁，同时也是共同体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在大共同体面前，这种观念似乎就不存在。于是反家长权也反皇权，但对家族可以讲自由，对“民族”却似乎不能讲自由。

已经形成的这一趋势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期确实发生了变化：首先由于世界大战导致国人对西方的仰慕发生改变，即使经过日本中介的“学西”也在降温，与西方对立的苏俄逐渐成为新的“老师”。其次，此期间袁世

凯、张勋两次“帝制复辟”引起国人“民主”、“革命”情绪反弹。^①在大共同体本位的形式上以“国家”利益来打压个人为主逐渐变成以“人民”、“革命”利益来打压为主，形成民粹倾向。第三，如果说章太炎只是主张“大独”不能反对“大群”，那么后来的左翼文化就变成“大群”要压倒“大独”，为“人民”而反对“个人主义”了。这几条都显示“俄式社会主义”的影响占了优势。

即使这种状况下，“大独”反对“小群”（针对家庭家族的个性解放）仍然是受鼓励的。在小共同体层面，婚姻、爱情甚至财产等仍被视为个人权利。这些“个人问题”不仅家长的“专制”权力不能决定，即便家内、族内众人“民主决定”也是不行的。^②在大共同体层面，个人权利或许仍不该屈服于皇上或（革命者所反对的）政府的专制决定，然而如果是“人民”的多数意志，或者代表“人民”的“组织”意志，个人权利就无效了。换言之，小共同体中无论“专制”还是“民主”似乎都不能取消“自由”，但大共同体中皇上似乎不能取消，“人民”或“人民的权力”却是可以取消自由的。

如前所述，那种只对小共同体有效的自由或“个人主义”、即“日式

① 金观涛指出，帝制复辟是《新青年》提到最多的国内事件，也是第三多的国内外事件，它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向激励非常明显。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98页。

②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革命中的土改不仅分掉了富人的私有土地，而且分掉了“族庙公产”（许多地区这类地产甚至比地主私有地更多），传统乡村中自商鞅变法后就不发达的小共同体财产至此完全消灭，农村一时出现了“百分之百的小农私有”。当时消灭“族庙公产”的理由是管理不民主，“公产”实际上控制在家族长手里，所以那是“封建”的。但是后来大共同体的国有财产以及大共同体基层末梢的“集体财产”难道就是民主管理的，就没有被权势者控制？显然，土改建立的这种“私有”只是针对小共同体而言，后来上面一声令下，百分之百的“一小二私”马上变成了百分之百的“一大二公”。笔者曾指出：有村社传统的俄国农民之“被集体化”，要比完全“小私有”的中国农民困难得多。（秦晖：《传统十论》，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241~261页）这才是真正的理由。

的自由主义”，它过去可以和“军国主义”结合，如今也可以和俄式社会主义结合。事实上，到新文化运动发生时，日本已经处在“大正民主”时代，明治宪政一时似乎有向英国式宪政演变的趋势，福泽谕吉式的“日本自由主义”也似乎在向一般自由主义发展。然而，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对中国有影响的已经主要是左派社会主义者，如幸德秋水、河上肇、堺利彦、小林多喜二等，这种日本左派思想的影响已经从属于俄式社会主义，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来源中不占重要地位了。相比之下，日本自由主义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影响更大，而这些影响仍然是明治时代的遗产。

“娜拉出走以后”：从日式自由主义到俄式社会主义

有种说法认为，民国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的毛病是其经济观点带有费边社拉斯基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对自由市场缺少弗里德曼或哈耶克式的彻底信服，这导致了他们后来做了不合适的选择。我理解这种说法的心路，但却不能苟同。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命运归根结底是一场战争决定的，哪怕中国自由主义者个个如哈耶克，对战争结果也未必有什么影响。其次，无论弗里德曼或哈耶克对不对，像他们那种“彻底的”市场观点在西方也并不那么流行。而遑论“带有色彩”，就是拉斯基们完全掌权了的“民主福利国家”哪怕有种种缺点，但都不会给自由带来灭顶之灾。更何况经济观点与政治选择未必有固定的联系，胡适也对市场经济有保留，但他的政治选择并不与罗隆基相同。罗隆基的选择也只是使他作为自由主义者受了迫害，并没有使他变成自由的反对者和扼杀者。

但是“日本式自由主义”则不同，它直接有“暗道”通向反自由的体制，无论是日本式的“军国主义”还是俄式的极权主义。在这方面，新文化运动的最著名代表之一，无论作为“章门弟子”传播自由个性还是后来

走向左翼文化运动都堪称典型的鲁迅可以作为样本。章、鲁也有很不相同之处：太炎行文极尽古奥，鲁迅却不但提倡白话，甚至还想废了汉字改行拉丁拼音。太炎晚年复归于“国学”，鲁迅却由学日而进一步师俄，而他提出的“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著名问题，更是对“日本式自由主义”前景的不详之问。

鲁迅是在新文化运动末期向左翼文化运动转化的1923年年终提出这一问的。娜拉是挪威作家易卜生剧作《玩偶之家》中为追求自由个性而离家出走的女主角，但易卜生本人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或许在挪威的环境下这个问题并不重要。然而鲁迅敏锐地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他认为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出走后的娜拉多半只有两个结局：或者“堕落”，或者“回来”。在鲁迅看来两个结局都很不妙。鲁迅认为这是由于社会经济不平等造成的，他明确地说：“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关于娜拉出走之后的担忧就“当然完全是废话”了。显然，鲁迅的结论是出走以后的娜拉应该投身于变革经济社会制度的事业，亦即投身于“革命”。然而他绝对没有想到，在“日式自由主义”转化成“俄式社会主义”的中国，这样做了之后的娜拉们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问题，甚至比“堕落”与“回来”都尤有过之。

许多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都涉及这类问题。可以举曾异常火爆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例。某英雄团长看上了某文工团女演员，组织上便出面拆散她与原恋人的关系并让后者在前线阵亡。新婚之夜团长坦言：“你是组织上分配给我的。”而上级首长则这样说明这则“组织上包办婚姻”的合理性：“你这样的英雄团长娶不上好媳妇，是我们这支部队的耻辱。”长篇纪实作品《八千湘女上天山》。“历时五载，三易其稿，首次全方位披露进疆湖南女兵多舛命运，先后荣获中国报告文学大奖、昆仑文艺奖”。^①这本由大量采访和历史照片构成的书展示了一场以军事纪律来实

^① 卢一萍：《八千湘女上天山》，昆仑出版社，2006年，封面。

行的超大规模强制“配对”，其中的场景令人想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谈到野蛮时代的话：“军事首领按照他们的军阶依次选择她们中的最美丽者。”^①许多悲剧之惨，让人不忍卒读。^②

从现代观点看，今天没有人会欣赏包办婚姻，但如果包办婚姻不可避免，则父母的包办当然是最“不坏”的。尽管父母认为的幸福未必就是子女感到的幸福，但应当承认两者重合的概率不会小。而权力更大、却谈不上亲情的“组织上”通常只从政治上考虑，由它进行这种包办造成不幸的概率当然要大得多。为追求婚姻自由、个性解放而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中国娜拉们确实取得了摆脱家庭束缚、父母包办的胜利，但在那个“被组织”得天衣无缝的“社会”中，她们的“命运多舛”要远远超过鲁迅当年的设想，由“娜拉”而“湘女”，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

除了婚姻问题，“娜拉”以这种模式出走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被国家大量征发用作重体力劳动。这并非自由职业体制下某些女性挑战极限的个性选择，而是作为“组织分配”的任务，充当“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众所周知，在改革前的中国，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性能做的事女性也能做的“最高指示”下，中国大量女性被军事化地组织起来，不顾女性生理特征而从事诸如拉犁、伐木、土石方施工、井下采矿等重体力活及高空架线之类的危险活。五大三粗的“铁姑娘”被当作政治动员的目标。更有甚者，大跃进时湖南平江等地竟然提出口号：“干群鼓足干劲，男女赤膊上阵！”强迫妇女像男人一样脱光上衣拼命干活，号称“赤膊大跃进”，而且不准请假。女性因生理原因要求休息，会被干部“查例假，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74页。

② 耐人寻味的是，这本书后来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但是主题却由揭示女兵的“多舛命运”变成了弘扬她们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献身精神”的一部“正剧”。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负面事实被漏网拍出，导致了一场风波。（见《〈八千湘女〉剧情遭质疑 主创讲述历史原貌》，<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0月06日11:30 新浪娱乐）。

月经”，百般侮辱。导致当地妇女病蔓延，女性身心饱受摧残。^① 而这样的恶行竟然也是打着“男女平等”，防止妇女成为“家庭的奴隶”，乃至“把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这类“反封建”的“个性解放”的旗号！

从反孔扬秦、个性解放到“马克思加秦始皇”

“日式自由主义”转化成“俄式社会主义”带来的困境不仅是女性遇到，男性同样如此。尤其是到了“文革”中，“封建法西斯专政”的那一套更是登峰造极。来自“西学”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被撕了个净尽，来自古儒的仁义道德被“扫进历史垃圾堆”。^② 在砸烂“封、资、修”、扫除“洋、名、古”的狂潮过后，唯有法家和“秦制”被发扬光大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在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声称：“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杀全家’，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又对林彪插话说的“秦始皇焚书坑儒”驳斥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③

毛泽东1910年17岁时在湘乡县立东山小学时写过一篇据说受到教师大赞的作文《宋襄公论》。^④ 据说其主题就是痛诋“蠢猪式的仁义”，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儒家的鄙视。

① 《那些年：妇女赤膊大跃进 查例假摸月经》，2013-09-23，盛世军事网 <http://www.senszx.com/lishi/lishimiwen/11831.html>。

② 《人民日报》1966年6月4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③ 转引自成林：《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镇压反革命》，人民网刊《大地》，2002年第十五期。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页。

实际上诋儒扬秦之风颇行于当时，毛在该校的国文老师柳潜也是这种“新文化”中人。他在批语中极誉此文“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是有功于社会文字”。作者“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目光如炬，……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一个老师赞叹其学生已经“伟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堪称一绝。但柳潜如无类似思想，也是不可能如此评价的。可见当时法家思想之泛滥。

要之，戊戌之后，新派借日学西潜势已成；庚子惨变，新派痛恨民愚更羨日西，而实际所学对象则更重日本：内则脱儒入法，外则脱亚入欧。当时就是一些所谓的“大儒”，都已经开始“法家化”：内倡“个人主义”、外倡“军国主义”，对古儒视为道德本源的小共同体、既温情脉脉又长幼有序的家庭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如杨度就声称：中国人糟就糟在“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①而康有为的《大同书》更与谭嗣同的《仁学》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谭嗣同戊戌死难，他那本以“引西救儒”为宗旨，以“秦政荀学”为敌的《仁学》写于戊戌前是没有疑义的。而《大同书》就不同，人们知道康南海喜欢制造“历史文献”，如“公车上书”，如“衣带诏”都是其例。《大同书》当然是康有为的重要著作，但是否如其声称写作于戊戌前是大可怀疑的。如今的研究者认为该书实际始撰于1903年赴印度期间，民国初年才发表了头两章，最关键的后8章都是他死后才全文出版的，应该写于民国初年。《大同书》以强烈批评家庭家族为特色，甚至要废除家庭、取消父子关系、实行“子女公有”，根本颠覆儒家伦常，与古儒的“大同”理

^① 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29~533页。

想完全南辕北辙，说是儒家文献，不如说是“乌托邦共产主义”文献。^①联系他此一时期鼓吹秦汉“废封建”已实现自由平等的言论，这个时期的康有为尽管以倡立孔教会而为今天一些“新儒家”朋友捧为圣人，实则当时无论新儒旧儒还是半新不旧儒都有很多人否认与他同道。自认思想处于曾国藩张之洞之间的陈寅恪就把他的祖父、同为维新先哲的陈宝箴与康有为划清了界限，认为他祖父与引西救儒崇周仇秦的郭嵩焘才是一路人。^②其实，戊戌时康有为与谭嗣同陈宝箴们区别并不那么大，但在陈寅恪说这话时，民初康有为确实已经大不同于戊戌了。那时的“激进”思潮与康现实中的“反动”（支持复辟等）并行不悖，按以上的分析也是不难理解的。

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就不难理解青年毛泽东的法家倾向、“个人主义”倾向与“共产主义”倾向之间的关系。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不久，1916年湖南都督、人称“汤屠夫”的袁世凯帐下酷吏汤芑铭在反袁浪潮中被驱逐。今人印象中应该很革命的毛泽东却是拥汤派，对汤被驱逐“愤愤不能平于心”，他认为汤被驱逐是“湘之大不幸”，“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他说汤芑铭去后湖南秩序大乱，暴徒横行，“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

① 古儒论“大同”虽有“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之说，但那是类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式的道德理想，即所谓“泛爱众而亲仁”也。但是这种“泛爱”却与墨家作为制度理想的“兼爱”有根本之别。笔者曾指出儒家的“泛爱”仍要有制度上的长幼秩序而且以小共同体为基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不必从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不得主人之幼。否则“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按孟子的说法就是“禽兽”甚至“率兽食人”了。

②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先祖……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转引自王元化：《清园近作集》，文汇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①所谓“法兰西之祸”指大革命，他主张以“严刑峻法”防止大革命！这时的毛泽东显然成了“反革命”者。联系到几年前他借商鞅话题发挥的蔑视“愚民”崇拜“执政者”之论，倒也是一以贯之的法家思维。

就在这年秋，毛泽东还致信黎锦熙，对其主张小学教育改文言文为白话文不以为然。^②但仅仅一年之后，1917年秋毛泽东就狂热地卷入了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狂热拥护个性解放。他批注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称自己有两个主张，一为个人主义，一切生活动作，一切道德，都是为了成全个人。一为现实主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资者，吾不信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我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他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个人的价值大于宇宙的价值，“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甚至成人之美，舍身救人等，都是为了实现自我，满足个人精神的需要，达到自利之目的。即“精神之个人主义”。^③

毛泽东如此激进的“个人主义”主要针对谁呢？他这时主张实行“家族革命”、“师生革命”，显然还是冲着小共同体。^④当然，这种“日式个性解放”的大共同体本位性质是有个循环的。清末“礼法之争”时，杨度与明治时代日本人一样明言要把人从家之孝子解放成为君之忠臣，毛泽东当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年》，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23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年》，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24 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第 202~206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年》，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28~30 页。

时讲的也是皇上“拏贫息”的那一套。辛亥以后不讲君主本位而讲“国家”本位了，毛泽东于是称赞汤芑铭“以严刑峻法为治”推行国家主义。新文化运动初期个性解放一度在最高潮时出现无政府和民粹倾向，在仍然以向家庭家族闹独立为主的同时也出现个人要独立于“国家”的主张，毛泽东在批注泡尔生时也就认为“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①但这时“国家本位”又变成“人民本位”和“革命本位”，个性可以（并且几乎是必须）对家族讲，有时似乎也可以对“国家”讲，但对“人民”这个整体是不能讲的。由于对家庭、家族整体讲个性，家长也就不能借“家众”压抑个性。

总之，毛泽东确实是在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大增的时代接受了厌恶儒家而崇尚法家的观点，并且成为针对小共同体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后来又经由这种“日式自由主义”走向了“俄式社会主义”，尽管他本人直到打下天下之前既没有到过日本，也没有去过俄国，但他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在章太炎式的，或曰日本明治式的“以大独反小群建大群”思路中，把法家秦制、针对小共同体的“个人主义”和极权主义串了起来。

从“儒表法里”到“马表法里”：历史的循环与启蒙的再出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整整一个世纪，如今反思，令人感慨万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导致民族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占了上风，这是过去人们经常强调的。但是巴黎和会的不公其实在几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基本得到了纠正，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其激进一翼的趋向极权化却没有改变，甚至变本加厉。这是为什么？

比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更为深刻的变化，来自“启蒙”本身。首先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152页。

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明治后日本中转的变异版本。日本式自由主义要求人们从家长和藩主束缚下解放个性，解放的结果是效忠天皇与国家，这种“伪个人主义与军国主义二位一体”的版本一战前即对中国有影响，代表是章太炎，一战后影响更大，代表是鲁迅。而原版的西方自由主义本来影响就弱，一战后受“反资本主义”潮流影响更弱。战后日本对华影响大增，日本式自由主义以鲁迅-巴金式的反家庭反礼教“启蒙”方式不仅没有被“救亡”所“压倒”，反而与救亡相得益彰、互相激励，出现“启蒙呼唤个性，个性背叛家庭，背家投入救国，国家吞噬个性”的悖反现象，而这又与一战后西方社会主义经俄国中转的变异版本一拍即合。

当然，这并不能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大方向。今天的改革也并不是重新要回到“儒表法里”的时代。事实上如果“秦制”不是积弊深重，只靠“尊王攘夷”不可能出现“新文化”。而人类的现代化尽管可以有无数的“特色”，明确“群己权界”、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无疑是个普遍规则。平心而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对实现这些规则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西方，两者只是“群己权界”的界有不同的划定，从而导致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伦理领域的婚姻规范和同性恋权利之类的争论。但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由身份到契约”，以个人同意让渡权利来建立公共领域这些原则是共同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①如果不是作为客观描述而是作为价值诉求，马克思的这个说法其实与自由主义并无二致。当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时，这个问题也摆在了人们面前。

然而无论在东在西，“个人独立性”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西方中世纪是个“小共同体本位”的体制，摆脱小共同体的束缚曾经需要一个“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即霍布斯与博丹的时代。到了“市民”摆脱“封建”，他们就开始与王权斗争、要求摆脱对“大共同体”的依附了。这就是洛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与卢梭的时代。而秦制下的中国恰恰是个“大共同体本位”的体制，不仅压抑个性最严重的是秦制，古儒向往温情脉脉的小共同体，也反感秦制，现代化价值本来与这种“反法之儒”处于类似西方走出中世纪时“市民与王权”那样的联盟状态。而这个时候西方“市民”恰恰又已经摆脱王权，由此形成的反王权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资源本来是国人最能接受的。这就是戊戌前乃至辛亥前的状态。

但是日本则不然，日本近代化要从“走出周制”开始。他们的自由诉求不是冲着王权而是冲着小共同体是很自然的。日本人“脱儒入法但不入欧，而是走向‘大东亚’”，导致明治后日本没有建立宪政民主而是建立了“一君亿兆臣民”的“军国”体制。军国主义的膨胀最终不仅祸害了亚太各国尤其是中国，而且也给日本带来灾难，使明治后得以振兴、一战后进一步崛起的这个“强国”到了二战便化为一片废墟，直到战后才在美国强势影响下摆脱“秦制”而走上宪政民主的轨道，同时由“军国”转向和平发展。但是，如果就日本自身的历史进程看，明治维新的“脱儒入法”、“伪个人主义与军国主义结合”无疑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变革。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津田真道曾宣称“宇内国体数种，概括为君民二政”，亦即君主制和民主制。而“君政其内，唯封建、郡县二体”，前者如明治前日本及先秦中国，后者如秦后之中国。津田承认民主制更“文明”，但现在日本还不够条件，而中国秦制以来的历史表明“封建生于国初草昧之世，郡县形成于稍具文明之秋”，所以后者应该成为日本现时的目标：“天下皆郡县，四海唯一君。陪臣及陪臣的陪臣，皆为朝臣。”以后到“文明”进一步提高时再考虑转向“民政”。^①

尽管后来日本并没有自行完成向“民政文明”的进步，而是军国主义栽了大跟斗后在被占领状态下实现的民主化，但是，日本的现代化确实是从走出“周制”（“封建”）开始的，而明治维新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明

^① 津田真道：《郡县议》，《中外新闻》第六号，1869年3月。

治后日本一度得以“富强”虽未必就是“秦制”之效（战后日本在民主制下的富强无疑远超于战前），但确实是走出“周制”加上学习西方之效。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治天皇不能比之于华盛顿，但比之于彼得大帝、路易十四和威廉一世，还是当得起的。

然而，中国在这方面向日本学习，结果就东施效颦，比日本还不如了。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已经结束了“周制”，而“秦制”之弊则积重难返，儒者既已积郁思变，学西理所宜然。由“反法之儒”承接的“西学东渐”所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实际就是要走出“秦制”。然而日本学西速效，使国人欲循其“捷径”，却从日本那里学来了“走出周制”的药方。结果是中国不但没有学来明治式的“富国强兵”，没有获得走出周制的好处，反倒使“秦制”之弊变本加厉。以儒家而非法家为敌的“日本式自由主义”犹如在日本那样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宪政，却也没有带来日本式的富强，只是使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走向了“伪个人主义破坏小共同体而为军国主义开路”的方向。

但是，“军国主义”并没有像在日本那样解决中国的贫弱问题，一战的灾难和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大萧条又严重地损害了“西学”的影响力。这个时候国人又“顺理成章”地找了第二个老师，那就是苏俄。如果说军国主义膨胀后的日本放弃学西后转向以自产的“武士道”来对抗西方的自由民主，那么远未富强也不那么自信的国人则从俄国拿来“社会主义”以替代“西学”。其实，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本来都是“西学”的左右两翼，前者倡平等，后者争自由，在宪政民主的西方前者衍为福利国家，后者衍为市场竞争。但是经过日俄两国转手后的两种“主义”都已经不是原来“西学”中的样子。

无论中日，近代化中的对外学习始终有个“先生欺负学生”的问题，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也有这个意思。这个问题本来并不那么难解。日本在黑船叩关后一边“攘夷”一边“入欧”，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19世纪

欺负中国的主要是遥远的西方列强，但中国的“反法之儒”在反侵略的同时恰恰最热衷于西学。到了20世纪，西方列强在华实际处于尽量维护既得权益状态，基本没有新的权益扩张，而侵略中国更狠，甚至使中国真正面临“救亡”危机的主要变成了俄日两个强邻。但是恰恰在这时他们取代西方成为我们先后学习的主要对象。这本身也未必就是严重的问题，正如19世纪思想上体制上学习西方与国家利益上抵制西方并不矛盾一样，20世纪对日俄本来也可以如此。思想上深受日本影响的鲁迅在国家利益上并不是所谓的“亲日派”。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时对于中国自身的近代化诉求而言学日学俄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错位，而这又与我们自身深厚的“秦政荀学”传统有关。在这方面，新文化运动和作为其反弹的“反西之儒”使“自由民主”与“福利国家”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有限，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反思中应该要注意的。

中共建党历史背景再探讨——兼析李大钊等人 对一战与俄国革命认识的演变

章百家*

本文的目的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革命浪潮为背景，对中共建党的历史进行再探讨。重点是结合中华民国初年的历史，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来考查李大钊等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的演变。在中共诞生的大背景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战本身的影响虽不那么直接，其渗透在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但大战后果的影响则是直接而巨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共产国际的成立、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这一系列事件导致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和新文化运动的转向。正是在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思想上开始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并于20世纪20年代初携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一、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

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建党背景的追溯基本限定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全球发生了第一次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

世界大战。最初，中国局势的演进与世界局势的演进几乎是两条平行线，只是偶有交集，但到了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却缠绕到一起。笔者对中共建党背景的追溯将循着这两条线索来发展。

1911年10月，中国辛亥革命爆发。虽然这场革命在形式上是温和的，而且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三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但是，这场革命开辟了20世纪伟大中国革命的时代，其所具有的深刻内涵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加彰显。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在中国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中华民族的觉醒，激励起一大批志士仁人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行民主而英勇奋斗，从此反动势力再不能建立起巩固的统治。

辛亥革命未能如其领导者孙中山所期望的，在中国建立西方式议会民主制度，这被看作是这场革命的失败之处。此后十余年中国政坛纷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但是，辛亥革命还是催生了一批新事物，带来了不少新变化，为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准备了物质、思想和人才基础。

民国初年，中国掀起了近代政党政治的第一波浪潮。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登台亮相，过去被专制统治视为洪水猛兽遭到严禁的政党组织竞相成立，各种名目的政纲、宣言遍布报刊，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尽管这时的政党组织五花八门，不少带有会党性质，但中国政党政治的时代毕竟来临了。

民国成立后，大力提倡发展实业，并着手经济法制建设，工商业界颇为兴奋，中国经济出现了一波长达十年之久的快速发展时期。当然，影响因素甚多，诸如欧洲战争的爆发即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中国现代经济水准的提升进而带动了其他方面的变化，如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社会团体的勃兴，市民阶层的发展，等等。社

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稍后能够发生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条件。

新式教育和新闻出版业在民国初年也有较快发展，这使得在清末已形成规模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得到进一步扩大。从总体看，新型知识分子以青年为主，他们知识结构新，思想先进，有强烈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因而也就具有不同于传统士人的思想性格，最突出的是危机忧患意识、爱国救亡思想、变革与革命精神。这群人的选择，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发展方向。

除此之外，辛亥革命还加快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判断、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转变。这一系列转变不仅有利于吸引和动员人们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也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视野。

民国初年的政坛斗争不断。作为革命余波的西式民主只是昙花一现，此后出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及其他派别与北洋军阀集团之间的斗争、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1913 年至 1922 年间，属于这类斗争的重大事件有：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遭到举国反对、清室复辟闹剧、护法战争与南北议和、北洋派系之间的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等等。总的来看，这段时间北洋军阀居于统治地位，但始终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随着孙中山与南方军阀的合作，中国逐渐呈现出南北对峙的格局。

在传统的政坛之外，此时一股新的力量正在聚集。民国成立之后，共和制度的诞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民初的思想界一度颇为活跃，对民主的追求、对制度的设计，均有热烈的讨论。但是，袁世凯当政后，其施政理念趋向于复旧，注重褒扬以礼义廉耻、四维八德、忠孝节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不仅使得共和制渐成泡影，社会面貌亦有回复旧观之征象。然而，经过清末民初的革命激荡与舆论开放，民主的、科学的思想观念已

开始浸润人们的心灵，与封建的、专制的、传统的相联系的事物和做法也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和抵制。这种变化在城市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们中间表现得更为明显。所有这些，都为传播与弘扬新思想、新观念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创造了必要条件。

1914年6月，以英、法、俄等协约国为一方，德、奥等为同盟国一方，打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主要列强均卷入战争，无力他顾，这种形势被日本认为是对华扩张之绝好时机。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即以加入协约国参战之名，行趁火打劫之实。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11月，日军攻占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根据地青岛，占据了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铁路全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基本无关中国的利益，但胶州湾问题牵涉到中国，又使中国不能对这场战争完全置身事外。北京政府于8月6日宣布“决意严守中立”，其后又循日俄战争之前例，将胶州湾附近地区划为战区，听由日、德两军厮杀。日德战事结束后，1915年7月，中国两次照会日本，声明取消战区，要求日军撤离。但日本非但不理睬中国的要求，反而企图压迫中国就范，使其在山东攫取的权益合法化，同时彻底解决满、蒙等悬案，进而为独占中国创造条件。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消息披露后，国内反对的民意沸腾，集会抗议、成立组织、发出通电、抵制日货、征募救国储金等等，反日舆论和行动遍布中国。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政治的第一个交汇点，它刺激了国人的爱国意识，使得随后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渗入了救亡的因素。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般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该杂志的主编陈独秀认为，要改变中国，必须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①唐宝林先生认为：陈独秀的这个思想把人的

^①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1916年。

解放与国家的振兴联系起来，把启蒙与救亡统一起来。^①这个看法颇有见的。一年后，这本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宗旨一目了然。

新文化运动能够蔚成风气，引导潮流，得益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的教育改革。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上任后即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教学方针，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他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这些改革措施培育了北大的一代新风，也为各种新思想传播创造了条件。自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地。随着一批积极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报刊陆继创办，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起来。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这场由中国知识界左翼发起的运动其初衷是探索如何使中国走出辛亥革命失败造成的困境，以便建立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制度。新文化运动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失败，针对群众思想蒙昧落后，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鼓吹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这场运动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文学革命的意义并非仅止于文化方面。如果没有白话文的流行，外国的新概念、新思想便无法比较准确地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并为国人所理解。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得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

二、李大钊对一战和俄国革命的认识及演变

在新文化运动左翼人物的政治理想从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转向学

^①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2页。

习苏俄建立劳农政权的过程中，李大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是在中国最早宣扬俄国革命，并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随后又与陈独秀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生于1889年，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学校，在校期间受同盟会会员影响，参加进步活动。1912年冬加入社会党，任天津支部干事，开始撰写文章揭露袁世凯及军阀政客们的窃权卖国行径。1913年冬去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接触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参加了留学生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1916年5月，弃学回国，在上海、北京创办刊物，发表文章，抨击时弊，探寻救国之道。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任经济学教授，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1920年发起和组织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中共北方地方执行委员会工作，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①

李大钊的经历是有些特殊之处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前辈学者李新、刘桂生指出：在中国早期的那批共产主义者中，没有一个人像李大钊那样曾与中国戊戌以后所兴起的改良主义有那么深的联系，在学理上作过那么严肃认真的追求和探讨；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曾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那么多的、那么经久不懈的探讨和追求，并对封建专制主义深恶痛绝，在理论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另一方面，在中国也没有第二个曾经信奉过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人，像李大钊那样率先信仰马克思主义，率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②

李大钊是学习法律与政治学出身。他早期的文章和评论有许多内容涉及如何建立国家基本制度。例如，《风俗》一文：“哀莫大于心死，痛莫深

①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修订本》第5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第2854页。

② 李新、刘桂生：《序》，见朱成甲著《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于亡群。一群之人心死，则其群必亡。今人但惧亡国之祸至，而不知其群之已亡也。但知亡国之祸烈，而不知亡群之祸更烈于亡国也。群之既亡，国未亡而犹亡，将亡而必亡。”“拯救国群，是在君子。”^①

1915年2月初，李大钊以留日学生总会负责人身份写《警告全国父老书》，警告国人日本乘世界大战之机欲攫取在华特权，欲灭亡中国。^②这是他写的第一篇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的文字。随后，他又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历数“吾国对日关系之痛史”，揭露日本利用欧战之机将德国在山东特权据为己有，并指出中日间存在的其他问题。^③

随着大战的展开，除中日问题外，李大钊的文章中有关大战的内容越来越多。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一战的观察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现实密切联系在一起，他常常借对欧洲形势的评论表达对国内诸般问题的看法。他的思想也渐趋激进，鼓吹革命的倾向十分明显。1916年5月，他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写道：“铁血横飞，天发杀机，人怀痛愤，此真人心世道国命民生之一大转机也。”^④8月，当国内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开始之际，他在《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一文中写道：“大凡一新生命之诞孕，必历一番之辛苦，即必需一番之努力。欧洲战焰之腾，杀人盈野，惨痛万千，此欧人新生命诞孕之辛苦也。而欧人不避此辛苦，勇往奋进以赴之者，则欧人欲得自由之努力矣。西南义师之兴，呜咽叱咤，慷慨悲歌，此民国新生命诞孕之辛苦也。而吾民不避此辛苦，断头流血以从之者，则亦吾民欲得自由之努力矣。”^⑤

在回国加入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之后，李大钊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根据

①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56、161页。原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3号，1914年8月10日。

②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211~220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234~244页，原载《国耻纪念录》，1915年6月。

④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287页，原载《民彝》创刊号，1916年5月15日。

⑤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339页，原载《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

世界潮流的趋势再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他与陈独秀一样，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1916年8月，他在《〈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中写道：“吾尝论之，欧战既起，德意志、勃牙利（保加利亚）亦以崭新之民族爆发于烽火之中。环顾兹世，新民族遂无复存。故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仍旧民族复活之问题也。而是等旧民族之复活，非其民族中老辈之责任，乃其民族中青年之责任也。”^①1917年2月，他又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写道：“吾族少年所当昭示其光华之理想，崇严之精神者，不在断断辩证中华之不死，而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华之再生；不在保持老大中华之苟延残喘，而在促进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盖今日世界之问题，非只国家之问题，乃民族之问题也。而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也。”“嗟乎！民族兴亡，匹夫有责。欧风美雨，咄咄逼人，新中华民族之少年，盖雄飞跃进，以肩兹大任也。”^②

1917年初，中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是否加入世界大战的争论。大战之初，中国即宣布中立，置身战事之外。1917年初，美国因德国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宣布与德国断交，并游说中国采取同样立场。原来反对中国参战的日本，在得知美国的态度后，也主张中国参战，并表示愿以借款方式向中国提供参战经费。此后，美国因担心日本对华影响进一步扩大，又改为不主张中国立即参战。中国参战问题由此演成美、日之间的一场博弈，并直接影响到中国政局。10月14日，中国宣布与德、奥两国断交。宣战后，民国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取消两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收回其天津、汉口的租界，停付庚子赔款，接收或封存其在华财产等。中国没有参加欧洲战争行动，仅给协约国运去大批粮食。此前，中国已向欧洲和中东派出劳工，约17万人。

^①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332页，原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

^②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477、479页，原载《甲寅》日刊，1917年2月19日。

由于中国参战问题的提出，李大钊对这场大战的关注明显增加。二三月间，他连续写了多篇文章，发表在《甲寅》日刊上，讨论与中国参战有关的问题。如：《中国与中立国》、《美德邦交既绝，我国不可不有所表示》、《我国外交之曙光》、《今后国民之责任》、《威尔逊与平和》、《中德邦交绝裂后之种种问题》等。这些文章中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李大钊提出，“此后吾国之外交不在战时而在战后，外交之致胜，不在以其实力与德为敌，而在以其诚心与协商国及中立国为友”^①；二是他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所表示的和平主张寄予极大希望，“然吾人终信平和之曙光，必发于太平洋之东岸，和解之役，必担于威尔逊君之双肩也。今且拭目俟之”。^②这表明李大钊很希望，大战结束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能有所改变。

然而，这时真正引起李大钊极大兴趣的是俄国发生的二月革命，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关注俄国和欧洲局势的演变。从3月中旬到4月下旬，他连续撰写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面包与和平运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大战中之民主主义》、《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等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分析了俄国发生革命的原因、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情况和欧洲政情的变动。

李大钊最关注的是欧洲代表着不同政治制度的势力之间的博弈，他期望从中发现世界历史潮流的趋向。这时，他形成的一个总看法是：“十余年来，世界革命之怒潮，澎湃腾激，无远弗届”；“世界之进化无止境，即世界之革命无已时，帝王之命运，将渐绝于兹世”。^③他提出：“盖前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君主政治、贵族政治而革命；今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官僚政治而革命。”最有意思的是，他认

^①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第457页，原载《甲寅》日刊，1917年2月11日。

^② 同上。

^③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1页，原载《甲寅》日刊，1917年3月19—21日。

为俄国二月革命对于中国政治前途之影响，在于“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他还说：“平心论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①那时，在李大钊眼中，是俄国人正在走中国人的路，而非后来说的那样中国人在走俄国人的路！

李大钊拥护民主主义的政治倾向也表露无遗。在《大战中之民主主义》一文中，他说：“欧战初起，一时民主主义几陷于危，咸谓德之雄强，将使官僚主义对于民主主义大获胜利”；“俄国当交战之初，一般官僚则以开战而谋击破勃兴之民主主义，故官僚之机关报，莫不著论，谓俄国之敌不在德皇，而在其国之自由派及其社会民主党”。“而此大革命之风云遂以激起，卒能推翻多年拔扈之官僚政治，而建立民主主义之基础。此又民主主义有盛无衰之一证也。”“俄国民主主义之光芒，既已照耀于世界，影响所及，德国亦呈不稳之象。”^②

至少到这时，一次大战的发生不仅没有动摇李大钊对民主主义的信仰，甚至还加强了这种信仰。他并没有把这场大战看作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制度危机，而是认为欧洲很可能通过大战找到新出路，由此更加进步；被这场大战证明没有前途的只是专制主义，无论是皇帝的，还是官僚的。李大钊的这种预想，影响了他后来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看法。

对于1917年11月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李大钊最初似未给予注意。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这年冬季，李大钊准备改换工作，准备离开上海；1918年初进入北京大学后又需一段时间适应新的工作和环境，无力他顾。二是俄国在经历了二月革命之后形势并不稳定，继之发生的十月革命究竟是前一场政治地震的余震还是一场新的地震，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作出判断。

①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0页，原载《甲寅》日刊，1917年3月29日。

②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140、142页，原载《甲寅》日刊，1914年4月16日。

李大钊毕竟在政治上是十分敏锐的。1918年7月1日，他写出了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随后又写了另一篇文章《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在前一篇文章中，他指出：“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他还说：“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①在后一篇文章中，他特别强调：“俄则由极端之专制主义，依猛烈之革命，一跃而为社会民主矣。”^②这一点显然使他感到非常振奋。

这年11月，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李大钊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庶民的胜利》。他说：“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他再次强调：“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③12月，他又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说：“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

^①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29页，原载《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②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46页，原载《太平洋》第1卷第10号，1918年7月15日。

^③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57~359页，原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9年1月。

命。”^①这些文章以更加鲜明的态度表明了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赞赏和20世纪人类新式革命的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赞赏是同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待相一致的，他认为俄国革命将如同法国革命，是会影响未来世纪文明的绝大变动，其基本的认识仍然是从民主主义出发的，因为民主与专制是对立的。但他同时认为，这种民主是一种新的发展，是社会民主，未来世界是劳工的世界。李大钊当时用的词汇仍带有不确定性。他讲“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用的是这个词的原意“多数”，而不如同后人以为的那样等同于社会主义。

1919年2月，巴黎和会召开前后，废除秘密外交成为李大钊关心的重点。对于这次会议，他是寄予了期望的。他在会议前夕所写《秘密外交》一文中说：“俄人提倡世界革命，揭出三大纲领：一、不要皇帝；二、不要常备军；三、不要秘密外交。美国威总统提倡国际大同盟，也主张禁止秘密外交……现在战局已终，军事关系已经消灭，中日两国的人民，应该要求两国政府立时将从前所立的密约在和平会议公布废止。不可听两国军阀在那秘密里作鬼，惹起世界的猜疑，留下扰乱和平的种子。”^②然而，这次会议的结果表明，主宰世界的仍是大国的强权政治与秘密外交。中国外交失败之后，五四运动兴起。李大钊又写了一篇文章，谴责巴黎和会与美国总统威尔逊背弃承诺，批判“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③

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于1919年秋冬之际发表了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般认为，这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而事实上，这是对标题的误读。在中国，这篇文

①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367页，原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9年1月。

②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420页，原载《每周评论》第9号，1919年2月16日。

③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457页，原载《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

章的确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文章的内容来看，还不能说李大钊已自认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李大钊是抱着一个严肃学者对于一种自己尚不大懂得的大学的非常谦恭的态度，愿把自己所知拿来与众人分享，共同探讨，而基本没有表明个人是否信仰的态度。该文开头的一段话，便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

“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得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①

该文中的一些评论，如“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显示出李大钊在作客观介绍之余，对马克思主义还是抱着探讨的态度。这一时期，李大钊所写的其他一些文章，如《再论问题与主义》、《知识阶级的胜利》、《欧文底略传和他底新村运动》等，也表明他此时对社会主义各流派之间的分野还不很清楚，而倾向于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都要作介绍。为此，他反复强调知识阶级的作用。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一文中，他说：“‘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穷。

^①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1页，原载《新青年》第6卷第5、6号，1919年9、11月。该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所占的地位，介绍了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资本学说等。

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①

这时的李大钊已对资本主义抱着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强调俄国革命是对资本的胜利。1920年，他与苏俄和共产国际来华代表接触之后，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三、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

李大钊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但他个人的思想转变显然不足以带动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思想界的转向。从整体来看，这个转向是由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和五四运动随之兴起而推动的。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作为战胜国一方，中国人欢喜若狂，政府宣布放假三天，北京、上海等地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人们幻想一个公正和平的时代即将来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处理战后问题的14点建议，被陈独秀誉为“世界第一好人”^②。然而，1919年初举行的巴黎和会却把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乐观情绪和知识阶层对西方文明的浪漫想象一起打碎了。把持和会的英、法、美等列强，不仅拒绝了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正义要求，包括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等，而且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在人民群众中，首先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

^①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221页，原载《新生活》第23期，1920年1月25日。

^② “发刊词”，载《每周评论》创刊号。

余人到天安门前集会，五四运动就此爆发。从5月初到6月初，这场运动以学生为主。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高潮时达到10多万人。上海商人也举行罢市。工人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和100多个城市。^①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使五四爱国运动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6月28日，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下，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经历的外交失败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彻底摧毁了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崇拜。这场运动的倡导者们最初曾鼓吹“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猛醒”，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明显动向是转向社会主义。相当一部分人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怀疑甚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不过，五四时期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等各式各样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思想流派。

当时，绝大多数的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但是，这代人一个可贵的特点是身体力行，勇于尝试新事物。1919年年底，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活动，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过起“共产主义的生活”，并希望把这种做法逐渐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平和的经济革命”。还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0~41页。

国的劳动共产村的做法，进行“新村”实验。^①这些实验自然是昙花一现，但对于参与其中的那批进步青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为他们摈弃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改良主义思想，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国的工具，创造了有利条件。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过程。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曾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但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五四运动发生后，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陡然加速，其影响迅速扩大。此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事实上，那段时间已有一批海外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除李大钊外，还有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等，他们都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起到过重要作用。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许多是马恩著作的节译。这样集中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实属罕见。^②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当中国人对西方列强深感失望之时，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这些承诺后来虽未兑现，但当时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对于扩大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心声。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

① 参见邵维正主编：《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5~72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7页。

的中心。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陈独秀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先进分子建立联系。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除李大钊、陈独秀外，还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还有一批年轻人，如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张闻天、向警予等等。

经过辛亥革命后十年的积淀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中国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政党的条件逐渐形成。恰在此时，共产国际和俄共也准备派遣代表来华，以了解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问题。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成为国际共运的中心。借助一战后欧洲和世界各地出现的革命形势，为改变苏俄政权所处的极其困难的环境，列宁联合30多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于1919年3月发起成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此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共产党纷纷成立。但不久，欧洲的革命浪潮趋于消退。列宁便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向远东和中国，寄希望于那里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中，苏俄和共产国际是推动中共早日成立的一个关键因素。

1920年，苏俄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派遣使者到中国去。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维经斯基。他于四五月间来华，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又经李介绍前往上海与陈独秀见面。通过双方的接触交谈，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俄国革命和苏俄的政策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维经斯基也初步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随后，维经斯基又与上海其他一些进步社团广泛接触，并向陈独秀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建议。^①

^① 参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章第二节。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该组织成立后即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1920年10月，北京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地点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以后又陆续发展了一些党员。到1920年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其成员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随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由于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各地成立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两项工作：一项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已发生分化，出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实业救国等思想的论争。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随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并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采取出版报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利用学校讲坛等多种形式，建立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

另一项是深入到工厂、矿山、码头，开展工人运动。这时，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已达到200万左右，是支撑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1920年春，陈独秀到上海后即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亦积极开展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出版工人刊物，利用“提倡

平民教育”的合法名义创办各种劳动补习学校，结合工人生活和斗争，诉说工人的要求，以通俗的方式传播革命道理。这种尝试使得后来中共成立后，可以采取了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采取过的办法，即深入中国社会底层，与工农结合，发动工农运动。先进的知识精英主动投身和引导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革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经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联系，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此，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天演与自由

——试论严复自由主义思想中的难局

王远义*

序论

严复是现代中国较有系统引介西方自由主义的第一位思想家，影响巨大。中年后的严复亦曾涉足政治、教育事务，亲身参与现代中国富强的事务。严复老年时，目睹辛亥革命及其后中国动荡的政局、欧战史无前例的酷烈残暴，写下许多忧愤深广的思想文字，以此反省西方文化、思想的严重缺失处，以及省思在袁世凯主政与嗣后军阀变局脉络下，中国富强、自由之路，何去何从？在这些关键性的反省中，严复对中国传统思想给予了极正面的肯定，较诸维新、新政时期的见解，不啻今是昨迷，予人重返中国圣贤之道的印象。

拙文试图要探讨的议题是：严复的自由主义见解中，由于存在着某些关键处的不完整、模糊性，这些因素在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重大转变时期，造成严复自由主义中个人自由的价值容易或趋向扭曲、弱化，甚至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国力（state power）的振兴方案，也因上述因素而难以清晰明确被认识理解，并由之产生出各种对他似皆合理的解释。拙文希

* 台湾大学副教授。

望将这些思想上、理论上关键性的模糊与不完整处，扒梳条理，予以较充分、合理的说明，俾以对这长期聚讼论辩的重要议题，提出一种新的、可能的阐释。

关于拙文的兴趣与主旨，自然是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1964年出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for Wealth and Power: Yan Fu and the West*）一书所引出。^① 史华慈在该书中反复说明一个主旨：严复因将个人自由的价值作为获致国力（state power）的手段工具，所以严复的目光与关切并不投射在个人价值本身，而转在个人主义的政治、社会的结果成效上，于是这种概念或原则终导致诸种个人自由价值受到弱化、扭曲、边缘化。嗣后许多中外学者接受史华慈的见解，而严复独特的自由主义遂成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受挫不遂的重要原因之一。

史华慈在书中曾对该中心论题作了很细密的界说与限定，为了方便，拙文采用林同奇对此很精到选出的引述：

什么是西方所有而中国所无呢？中西最关键的不同究竟何在？对这些问题“严复”当然并不是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来探求的，它们是被一种中国国力积弱——即缺乏富强所引起的迫切感和压倒一切的关切猛烈地推向前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严复就没有超越这些眼前关注的展望。如斯宾塞一样，他清楚地看到一个“太平盛世”，那时，一切斗争都将消失。福祉、自由和其他一切价值都将在一种乌托邦式的平衡中取得胜利。

在强调严复持续专注国家富强时，并不意味着严复对诸如科学、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些价值的承诺不是本真的，甚至无需断言将来终有一日这些价值不会被严复作为价值自身来看待，或者说严复就没有人类福祉的最终理想。但是，在他心目中那种占压倒优势的对国家存亡的忧虑仍然占

^①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突出的地位，这些原则可能具有某种抽象的自身固有的价值，但是引起严复最大热情的是它们作为富强之手段的价值。但是从一开始严复就摆脱了19世纪欧洲自由主义中某种比较僵硬的武断的二元对立。恰恰由于他的目光最后不是集中在个人本身而是集中在他认为的个人主义所取得的成果上，因此个人与社会，个人主动性与社会组织等等之间的尖锐的二元对立并没有深入到他的思想核心。^①

林同奇就此指出：在史看来，严复想要解决的中心课题并不是在群（集体）与己（个人）……寻找某种平衡，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这种二元对立的预设。他的中心课题始终是如何充分发挥“作为力量之单位的个人”的潜力，从而导致国家的富强……史认为正是出于这种内心深处并无群己二元对立的看问题的角度，严复才得以敏锐地察知一个事实，即近代西方工业公司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个人主动性的胜利，同时也标志着社会组织的胜利……基于同样理由，在严复看来政府的科层制度和军队的严密组织不仅没有抑制个人能量的发挥，反而把它纳入正轨，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因此，史对严复的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不是针对其中的集体主义，而是针对这种自由主义只把个人看成是力量的单位，把人的价值的大小化约为他所能发挥的能量的多寡。^②

近年来，两岸学者有许多人修正或否定史华慈一书对严复的解释，主要批评史华慈论述的代表类型可见于黄克武与吴展良。前者论证，严复对个人自由的理解，并未受到国力至上这种压倒其他价值考虑的干扰、影响；在黄克武看来，严复的著作清楚明确地显出：严复已“充分认识到个

① 这两段中译文字，请见林同奇：《误读与歧见之间——评黄克武对史华慈严复研究的质疑》，《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第9~10页。

② 林同奇：《误读与歧见之间——评黄克武对史华慈严复研究的质疑》，第11页。

人价值在本质上的意义，他并不是将个人视为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① 吴展良则试图更全面地批判史华慈的见解，他论证严复提倡自由主义，虽然含有追求国力的目标，但是求富求强不足以说明严复核心与终极的关怀：走向一条人类前所未有的理想道路。吴展良甚至坚称严复晚年似已转向批判自由主义，觉悟到中国立国于天演大化中自有根本。^②

拙文无意针对史华慈的论述与后来的批判、修正诸作，予以判定是非、周偏、深浅与离合之论。拙文的图旨有三：

第一，指出严氏在接受、提倡自由主义时，因受到天演论的影响，往往将一国社会、政治演化程度的高低，作为中国（包括其他非西方国家）实行自由主义方案或模式的衡量。如此一来，严复便每倚对历史演变中民质开化程度高低的判断，相应提出自由主义在华实践实施的模式，而非纯就自由主义理论原则与相应制度，反复进行思考、验证。严复这种以历史（即天演）演化考虑落实自由主义的方法，自然面对民德、民智、民力泰半仍属宗法社会程度的中国（人）时，主张人民需得长时期的自为自主，才能符合西方（特别是英国）自由主义的前提条件或准备期。但是，谁来保证、保障人民长期自为自主的可能？以什么方法进行育成工作？此与政治上“训政”的关系是相斥相异的吗？

第二，中国在几千年的演化大流中，积累许多的性习，这些负面的文

①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台北，允晨，1998年。另见 Max Ko-wu Huang: *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8. 亦参阅氏著：《何谓天演？严复“天演之学”的内涵与意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85期，2014年9月，第129~187页。

② 吴展良：《严复〈天演论〉作意与内涵新铨》，《台大历史学报》（台北）第24期，1999年12月，第103~176页；《中西最高学理的综合与冲突：严复“道通为一”说析论》，《台大文史哲学报》（台北）第54期，2001年5月，第305~332页；《严复的“物竞天择”说析论：严复与西方大师的演化观点之比较研究》，《台大文史哲学报》（台北）第56期，2002年5月，第69~94页。

化与传统，势将如何被改造与消除？而严复虽承继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带有决定论的历史观、世界观：世界必将从同遭列国竞争的天择时代，而终走向世界大同。然而，斯宾塞的演化模式或学说，转用到人类的社会变迁时，无论符不符合自然科学，显得松散、疏大，比不上同时代马克思历史变迁理论的决定论、“科学性”、世界性、意识形态性的论述——20世纪的中国现代史事实说明了这个事实与抉择。严复认为天演以千年、万年为期，在列国竞争的天择世局中，严复虽力图以会通中西来历经现代性运会，渡此国难民劫。但是他未能很简洁、清晰说明，中国传统与文化负面的积累，如何移改？与西方民主与自由相“会通”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地质民情迥然相异的国度中，如何进行林毓生所谓有生机的“创造性转化”？^①严复在“会通”中西自由、民主时，几乎是以肯定后的西方思想与价值为衡量，机械式地或自由比附地经由再肯定中国老、庄、墨等思想、价值而谓之“会通”，宣传上、实效上观量，皆太薄弱了，成效不彰。尤其严重的是，当欧战导致严复对西方文化许多基本价值的质疑或拆拒后，而那些原先因严复肯定西方思想、价值而后才被“肯定”的中国传统思想、价值，仿如原倚西岸绳炼的海上之泊舟，断了炼绳，漂零大洋之上，这种危机，后来许多研究者不识，每转视严复回到肯定、弘扬中国传统思想、价值的自觉与省悟上。换言之，假若舍弃倚自由致富强的阶梯，或略过必经的富强的军国社会天演阶段，如何独依儒道高明的思想与教化，在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下，过渡运会已成，“虽圣者亦无他术”的现代世界呢？

第三，在世界天演变化中，严复何以始终坚持君主立宪方才适合中国的问题。严复主张，“立宪非他，即是众治。众治则不得不用从众、代表二

^① 关于“创造性转化”的概念内容，请参阅下列专著：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制，凡此皆相因而生，无由解免……以听也”。^① 严复依天演程度坚信君主立宪乃为中国新的国家形式，在上的君王与在下的众民之间，有依代表、从众成立的议院，沟通上下，并负有扶倾政府的权力。严复依此提出的国家形式中，政府居于在上治者与在下受治者之间，而议院对其间的政府具有正当扶倾的权力、职责。严复提出这种治者、扶持、受治三者关系的治国模式，当然是他长期考虑各国天演程度因不同，发展自由主义的涂术，遂种有不同的考虑与化裁。这种治者放任无为、受治者能自为自主、议院则仅行使扶倾政府的机关权力的见解、设计，使得严复不但不需要、亦忽略了研究完善精密政府论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之对于政府实践自由主义的基本责任、权限几无着墨详论，更遑论对于行政、立法、司法三者间分权、制衡的商量、安排。换言之，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形式中，现代政府的目的与限制的理论与实践，在严复的著作中，显露出薄弱甚或消息至微的事实。

拙文希望经由上述严复思想中三个问题的解释分析，说明下列几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严复的自由主义特性是什么？这个特性何以不易为当时与后来的人所理解？也因此何以严复的自由主义对当时与后来的影响不大。

进一步分析与评论

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将社会（society）比拟类推为一种生物的有机体，当社会演化程度高的时候，斯宾塞认为最大个人自由的政权是可以与社会有机体兼容相契的，此兼容相契的条件亦将成为一国内追求共善（the common good）最合适的供应与贡献。此外，斯宾塞这种社会有机观的主张，所有关于个人主义的社会变迁，由于每一个有机观念的社会皆成长于

^① 严复：《政治讲义》，王庆成等编：《严复合集》第6册，台北，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年，第95页。

一种相应于社会天演阶段的既有社会结构之内，因此个人主义的孕育化育，不仅缓慢地行进，每需历经好几世代的涵养演化，因为同时要克服旧的民质性习，又要培育成长新的人品人质。这种有机社会是一种复合体，它的自然成长，不能为人们精确掌握、控制，也因此超过了任何改革者意图改变社会的设计（human design）能力。斯宾塞于此特别强调，在此种自然天演的社会进程中，为了不干涉干扰社会天演，国家功能的最低限度要求，必须与天演过程同时进行。在同进并行中，公平之自由原则下的个人自然权利的扩充、保障，乃是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基本要素，所以立法（者）唯一的功能在于获取、维护这个原则的正义。换言之，斯宾塞认为，社会有机观的最终见解乃坚持：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演成，以及最小国家自由限度的需要，乃是万事万物自然秩序的表达表露，同时也是相符应于先进社会的唯一可能的社会组织形式。^①

斯宾塞类推出的社会之有机概念，可谓是一种保守主义的理论。它坚持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国家，此两者不仅是天演的自然秩序、工业文明社会唯一得实行的社会组织，同时也是生物学对社会有机体研究得出的科学确信；于是，当宗教信仰不再被视为一种神意天令（a providential ordinance）时，科学的社会有机论可提供动机让人默服默从自然秩序之安排即是如此，从而替代宗教的信念。斯宾塞天演论由于具备上述各种决定论的论题，因此他的理论反对激进地改变社会、政治制度，强烈倾向对既有既存的社会秩序采取一种保守性的维护维持。

斯宾塞的进化论是否来自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的生物学，将它应用到人类的社会，或来自社会达尔文思想抑拉马克理论

① 主要见于氏著下列两书：*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with Six Essays on Government, Society, and Freedom*,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84 以及 *The Study of Sociology*,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24, 特别是前者第 134~135 页，后者第 270~271 页。

(Lamarckian evolution)，目前仍无一个广为学界接受的定论。^① 但是，斯宾塞的群学理论，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古典力学，这门学说理论可能比生物学（或生物有机体论）更是斯宾塞进化观点之基本原则的真正来源。

斯宾塞认为，哲学最初的资料来自下列三者基本真理的组成：物质不灭、运动一贯与力量持续。根据前两项基本真理，质量与运动在宇宙中乃是不变动的，而第三项则认定一定常数数额的能量（energy）乃是有变动的情形。斯宾塞据此见解主张，吾人有关物质与运动的经验，皆能够被化成对力量的经验；于是宇宙中所有的运动皆相互地可以转换。斯宾塞进一步论称，既然宇宙中不同现象都可以被化成力量的情况，因此根据力量持续的法则而言，就数量言之，力量的本身乃是不变更的。

上述三项基本法则规定了物质与运动相伴共存的每一次再重组、划分，此乃是宇宙中一个更为普遍性过程中的要因要素；而支配这个普遍性过程的法则乃代表着人类知识终极的综合——这是斯宾塞所要追求的哲学知识。他相信这种综合的知识，代表着真理的一项声明：物质的集结限定了、需要了运动的分散，相反地说，运动的吸收合并限定了、需要了物质的分散；这种变化的循环乃为每一种生存所经历，它限定、需要运动的耗损及其随之而来的完整合并，然而再历经运动的重行及其随后而来的分解解散。这里，第一次的转变被称为“进化”，第二次则谓之“解散”。换言之，进化的法则乃必然地依照物质不灭、能量不灭的法则而运行。^②

斯宾塞企图以上述法则对宇宙予以一种机械般的解释，其中，每一个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最重要的专著请见：J. W. Burrow: *Evolution and Society: A Study in Victoria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另外，M. W. Taylor: *Men Versus The State: Herbert Spencer and Late Victorian Individu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亦值得参考。

② 此处关于三项基本法则的说明，更详细、有用的讨论，请见 Spencer 下列两本专著：*First Principles*, London: Watts, 1937 以及 *The Principles of Ethics*,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78.

事件、事物都可以依循在难免发生的力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获得解释说明。宇宙无它，乃一众力（forces）的场域，此场域对每一力量起作用与反作用；而生命本身仅仅是一种各种力量（forces）调整的过程。

以古典力学的观点来描述斯宾塞的进化理论，他的进化观可谓是一种全然自足的自然法则（natural law）之主张：它强调宇宙在任何进化阶段所形成的种种特质、样貌，要皆不受进化阶段之外的干涉与引导。这种自然法则在这儿意谓严格地物理性的定律，任何事物将可以依循物质与运动来解释。在这个自然法则下，斯宾塞视进化为一种物质的集中以及随之并发之运动的解散；在进化期间，物质由一种不限定的、无条理的、同种的状态转变到一种限定的、有条理的、异种的状态，而持续被保留的运动则相随这种转变进行平行的转变。简言之，斯宾塞着眼说明这种进化过程无所不在、无所不同；在每一个个别的科学中，没有运作着不同的过程，而所运作的的是一个、单一的、归一的进化过程，其中，不同的科学仅从部分的、个别的观点进行研究。因此，斯宾塞的这种进化论可能不是由生物学理论发展而来，而更可能是斯宾塞运用这种进化理论到他的生物有机体论之个别学科。换言之，进化乃是一种自然法则的事物，而不是根源于生物有机体的一种形上趋向，而是进步趋向；也因此，斯宾塞相信自然界的因果是根本的、基础的，而进化理论则是推论出的、衍生出的。^①

斯宾塞虽然认为宇宙进化中仅有一个单一的形态变化在进展进步中，而不是有许多形态变化同时的、相似的在运行，但他对这种源自古典力学的进化观作了限定：进化的进展进步不是持续的与不间断的，也不是以一直线为其样貌与特征，而更是波浪状的、周期性的现象。因此，在这单一的形态变化的演化途上，任何人的性习与人类的文明、文化之阶段性进展，由于需要力量持续的作用、再作用，每每需要连续好几个世代的时间积累与努力。在这长时期的培养促进人类社会进化之中，如果对于低能、

^① 特别参见 Herbert Spencer: *First Principles*, pp. 396, 544-546, 548.

劣行的人采取同情的政策时，将无法使天演的生存竞争作用发生在不值得帮助的人的身上，此结果必将带给杰出的人与他们的子女更为残酷的生存竞争——他们原本便已在对抗、饱受自然天演中的邪恶与压力。斯宾塞强调，当时的立法者，以及其时社会科学研究经常忽略或无知于这个天演必要的自然淘汰原则，由此造成更大更多的人间灾难，远超过源自自私或阶级利益相乘一起的立法所带来的灾难。^①

斯宾塞理想的社会并非由自私的个人所组成，他相信在数代培养促进出的人格、人性中，人类互助与合作的德行和作为，才是人类社会最佳的形式。换言之，新人身上的利他情操：互助与合作的行为、精神，将会创造出一种自发自愿性的原则，此原则运行在社会各个领域、组织、结社之中，自行调节社会的成长，国家和政府则仅提供慎重的、尽量不干扰的、尽量维持社会自我调节运作的司法与法律协助，例如生命权、财产权与自由的保障。这里，斯宾塞的利他情操确实与生存竞争的天演原则存在着紧张或冲突的关系。此外，斯宾塞由于强调在公正规则的架构中进行生存竞争，因此当下社会的悲惨不幸，主要是来自自然法则的天演结果，而非源自既存不公正的政治或社会制度，由是个人与社会的改进与提升，既无由藉制度的变革而致之，亦不能以人为的设计、理性的张扬、意识强烈的教育导向去完成。换言之，斯宾塞挑战环境可由有意识的人为设计来形塑的观点，并主张环境乃一常数恒量，个人必须使自己适应、配合它。^②

斯宾塞上述人性、人格、性习在进化的自然过程中得经由数十年、百年的磨炼、竞存，主要是他认为人性、人格都是天生的、被决定的，虽然它们具有可塑性，可以被修正导正，但是根据进化的自然法则，个人人

① 详见 Herbert Spencer: *The Man Versus, with Six Essays on Government, Society, and Freedom*, pp. 141-144。

② 这里关于 Spencer 对个人主义与环境双方关系的观点，见 Herbert Spencer: *The Study of Sociology*: 特别是第 120 页；以及 *The Principle of Biolog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c1899。特别是第 497-498 页。

性、人格的改进、提升，如果来自任何国家的介入、道德训诫、社会改革以及改善社会条件等等外在涉力，毕竟无效成空，因为只有个人遭受源自劣习、懒愚、不负责等等结果的处罚与痛苦，才是唯一、更好的道德指引，远胜上述外在的帮助与助力。所以，在斯宾塞的诸作之中，经常出现一个恒常的论题：社会持续的改进仅能经由人性出现了基本的改变而成，而此人性改变并不能经由对社会条件的改进而获致。社会改革可以转变个人所居住生活的环境，但是个人天性的改变与提升，仅能经由个人行为的自然结果之经验经历，始克为之。因而，社会重组并不能依赖哲学、思想，也不能奢望对人经由立法的、教育的改进而重组，而仅能视性习的积累效果对性格、人性的作用、影响而定。^①

总而言之，在宇宙进化的自然法则下，或根据社会的自然法则，由于社会有机体本身缺乏中枢知觉，不克感受到苦乐，因此任何社会有机体或国家所拥有着道德之意味，仅是作为促进它的成员或公民的幸福之一种手段而已。至于唯有社会（有机体）所有个别成员或公民才具备能力去感受苦乐经验，此一事实乃具有重大道德之意味，因此斯宾塞相信，社会（有机体）或国家的福祉，如果离开个人或单位福祉来考虑，将不是一种应该被追求的目的。换言之，社会（有机体）的存在，乃是为了其个别成员或公民的福惠而立存，而其个别成员或公民的存在，则不是为了社会（有机体）的利益而竞存。这是生物有机体与社会有机体间最主要的差别。^② 这种主见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因为它基本上是一种民主的主张。

在严复的译、著中，他并未意识到斯宾塞的进化观究竟主要是源自古典力学还是启自生物学说。然而，严复确如斯宾塞般，将生物有机体与社

① 详见 M. W. Taylor 切题精要的阐释，*Men Versus The State: Herbert Spencer and Late Victorian Individualism*，特别是第 128~130 页。

② 此处 Spencer 的功利论（Utilitarianism）的见解，主要可见氏著 *The Principle of Sociology*，特别是第 478~479、613 页；此外，参考 M. W. Taylor: *Men Versus The State: Herbert Spencer and Late Victorian Individualism*，chap. 6.

会有机体做出明显的区别或差异。而史华慈认为严复并未敏察于斯宾塞对此的区分，似乎缺乏史料文献的证明。^① 然而，严复大体上接受斯宾塞将进化视为一种天然的过程，受到自然法则的主宰支配，以及依循这个自然法则所诱导出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诸理论，特别是个人主义和社会改良、改进的途径。

然而，严复在两个问题上对斯宾塞的学说做了修订。首先，斯宾塞主张最小政府的原则并未为严复严谨地信守，严复将社会的自然法则与自然过程推广适用到全国各地天演的程度、天时、地形和民质的情况，换言之，政府权力、权限的大小，当依历史现实的需要而判准，并不能先订出一死法，严格限定政府的角色与权限。下引严复的长文来说明、证明：

前会曾设问题，问凡有国家，其权限宜立于何地，此无异言国家于何等事宜听其民自由，于何等事则必不可，此是政治学中极大问题。而西国论政诸大家，亦往往有取而考论之者。其意盖谓政府之权，由不得已而后有。论其原理，固有限制，如斯宾塞诸公著述，多取群中事业而分别之？指何者为政府所当干涉，何者为政府所当放任云云。依吾党所从涂术，则欲定未能。何以言之？盖天演涂术，视国家所为，有非人所得主者。内因外缘，合而成局，人群各本自性，结合以求自存，非其能国家也，乃其不能不国家。诸公若问政府权力宜以何为限制，吾便答云，无有限制，但汝此时须有多大权力政府者，其政府自具多大权力。不溢不欠，成于自然，非人力也。

盖诸哲之论政府也，每分何者为政府所应管，何者为其所不应管，由此而政府之权限以立，特吾意不然：但以政府权界广狭，为天演自然之事，视其国所处天时地势，民质何如。当其应广，使为之狭，其国不安。

① 严复对斯宾塞区分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的理解、察觉，见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群学肄言》，严复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年书中的按语；史华慈的论点，请见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特别是第76~78页。

当其应狭，而为之广，其民将怨。必待政权广狭，与其时世相得，而后存立。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试观一人群之合，其外则有寇仇，其内则有奸宄，乃至旱潦雨暑，皆足为患。自政府既立，此患乃轻，其众因以存立。虽然，政府立矣，而物竞天择之行，常有以渐变其形式。治权广狭，随世不同。夫言治权广狭，反观之，即无异言自由之多寡。是故欲以自由多寡分别国家者，不必争政府权限，应立何处，但取事实已见者言之足矣。^①

其次，随诸上述政府权限依循天演、历史判准而来，严复主张18世纪放任无为的“无扰之说”，到了19世纪因各国内政、国防情势不同了，政府干涉放任之事，已不当恪守旧日的“无扰之说”，严复对此有长篇说明：

十八世纪……当此之时，若宗教、若教育、若商政、若政治，诸家之说，往往多同，于是因任自然，无扰无为之义，Laissez-Faire, Laissez Passer 几在学人士人口耳间矣……至今其说，尚为欧洲多数之所持，而十九世纪前半欧洲现象，大抵成于此说。且至于今，大有东渐之势。而将于吾国社会大着果效者也……国众有大小之殊，民智有明暗之异，演进程度，国以不同。故于其中，不得立为死法。即如十八世纪无扰之说，至于近世，其所致之反动力亦多……甚矣，政之不可以一端论也……此之所指，不过见于行法一权而已。而议法之权，所扩充者，尤不胜计。使行法而过于干涉，民尚有执持自由，与为抵抗之意。独至议立新法，则人无异言。故十九世纪之后半，各国议立之法，殆过于旧典之所存者。盖前此律令法典，大抵奉行其旧，而政府以行法为本业，以立法为无干己事也者。主和战、征赋税、恤灾眚，一切皆政府所力行。独至更张法制，则谦让未遑。若谓凡此先祖父之所贻留，吾辈舍率由遵守，无他事也。至十九世纪之季，乃大不然。行法之权，尚有裁者；至于议立法令，损益章程，则责无旁贷。立之可也，废之可也，增之可也，捐之可也，但使国民大众悉表同情。一时国论，有所专主，议院取而扬摧讨论之。无几时，新法立矣。

^① 严复：《政治讲义》，第67页。

故旧日政府所汲汲者，议法事少，行法事多，而近世政府所皇皇者，行法犹寡，立法至众……若近世政府，则直可谓之立法政府 Legislation State 也已……将诸公此后，于自由一名词，无论见于何处，可无疑义。亦见以自由多寡，分别国家，苟从其量为分，则难立别。盖诸种国家所干涉放任之事，国有不同；独取其所最刻意干涉者，则其别可立。^①

斯宾塞的学说主要是针对英国 19 世纪下半叶社会的情况而发，严复将斯宾塞理论视为一种普遍性进化的天演过程的真理，但若运用、适用到天演程度不同的中国，严复自然要就历史实际情形考虑中国的社会与人民，思虑出中国天演中具体的、特别的体制与方法。根据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双重性（duality）考虑，严复在《政治讲义》书中指出，新中国应当采专制立宪或君主立宪的国体，在此国体中，人民自为自主地培育发展民智、民德、民力。在此，特引用他一段文字说明严复所发明的“新知”：

不佞所为诸公辨晰者，固不止于黜旧说，乃在于进新知。旧说谓专制之权，由上及下，众治之权，由下及上。吾所发明，乃谓专制之权，亦系由下而成，使不由下，不能存立。然则旧之界说，不可复用明矣。虽然，专制众治，固自有别，而其异果安在耶？此是八会结穴问题。所谓图穷而匕首见者，不得不为诸公郑重出之。又近者，吾国国家方议立宪，立宪非他，即是众治。众治则不得不用从众、代表二制，凡此皆相因而生，无由解免。故不佞继此，所敬为诸公发明者，乃中国此后国家，与前此数千载国家之区别。不佞郑重以言诸公不可不郑重以听也。^②

严复此就中国当实行君主立宪或专制立宪的政体的主张，主要是《政治讲义》一书八讲的核心要旨，他并在书末做了一种政治要例的总结：

是故有无议院国会，为造立破坏政府之机关。专制、立宪二政府，不同在此。不佞于政治，本非专门。承诸公厚爱，为此七夕讨论。然此中多

^① 严复：《政治讲义》，第 73~75 页。

^② 严复：《政治讲义》，第 95 页。

采近世西儒成说，而为众论所推服者，非敢臆造。所惜八会为时过促，于诸制尚不能详。今请为诸公总前所言，而立政治要例十二条如左：

1. 凡有政府，则有约束。约束必以压力无自由者。
2. 政府以专制为常，以众治为变，如军中惟一主将，法廷惟一士师。
3. 然以一身而御众人，其力当不足者也；故其势不能无待于群扶。
4. 群扶之力，必自靖自献而后可；至其为此之义利公私，乃所不论。
5. 故一国之中，不仅治人、治于人二方面而止，而常有扶持政府者为之居间，成三方面：治者、扶治、受治。
6. 既能扶之，斯能倾之，亦能造之。是故扶持政府之权力，即建造政府之权力，破坏政府之权力也。
7. 但此种权力，常无机关。或有机关矣，而未正名，为扶持政府之用者。如法之路易十四，几为全国民心之所归，然无机关，而达群扶之力。英之克伦谟尔，以兵众自辅，可谓有机关矣，然其名则为他用，不曰扶持克之政府者也。此二现象，见于专制之国最多，于吾中国，正复如是。
8. 政界天演程度既高，则其国不独有扶倾政府之权力也，而又有扶倾政府之机关，以宣达扶倾政府之权力。
9. 机关未具，则扶倾政府之权力，其用事也，常至于横决；此一治一乱之局之所以成，而皇室无不终于倾覆之理。机关既具，前之权力，不但宣达有从，又可测视，得以及时为之剂泄，而乱无由作。此立宪之国，所以无革命，而代表之皇室可不倾也。
10. 立宪之国会，于国事无所不问者也。其实乃无所问，要在建造、扶持、破坏见行之政府，以此为其天职而已。
11. 机关未具，扶倾政府之权力，每患不偏不公，或现或隐。其政府有独治一国之外形，不知其力之起于下也，则转以扶持者为忠顺，破坏者为叛逆，且以其物为天命之所扶，而一切矫诬符命之事起实矣。

12. 如此者，谓之君主，谓之专制；而若前所言者，谓之众治，谓之立宪。^①

严复自信他的主张不仅是“新知”，推翻旧日对专制的陈说误解，提出专制立宪、君主立宪的新义，而且，读者当注意，他的“新知”不源自任何中儒学说，“多采近世西儒成说”。简言之，严复关于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与见解，大体源自近代西方思想、学说；但他同时也考虑西方与中国的现状，不仅未对最小政府原则守一死法定法，也未坚持放任无为原则，反对政府立法、议院议立法令两者角色的增繁加重。在这两问题上，严复未如斯宾塞那样坚守自持。

严复对欧战、民初政局和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一般严复的研究者都认为严氏晚年因受本标题这三个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欧战，思想上起了剧烈的变动。从他早年的全盘西化观、民主立宪、会通中西等重大主张，逐渐转到彻底否定西方文化、君主立宪和回归中儒中学的新见。

拙文想探讨的问题是，晚年严氏思想上确实显现了巨大反背变故，而此激潮流转是否造成严复：告别了对自由主义价值的肯定？扬弃了富国强兵目标的追求？重归孔孟、老庄、墨佛诸价值的托命与保存？

严复始终未放弃对斯宾塞进化观的坚信；自由主义和富强目标，未曾稍改；“执西用中”的进步途径，也与重拾重扬中儒中学不相冲突，两相赞育。

民初军阀政治动荡，人民、社会受扰不安，加上袁世凯专恃武力统治，迷梦帝制，而国民党、进步党也不能胜任稳定政府、挽救国家的责任，严复面对这种政局世局，不仅更强化昔日反民主立宪、反共和体制、

^① 严复：《政治讲义》，第99~100页。

反对以革命为进步手段，同时也对一向主张的君主立宪或专制立宪，都不抱以厚望了。严复对此有谓：

“中国党人，无论帝制、共和两派，蜂起愤争，而迹其行事，诛其居心，要皆以国为戏，以售其权利愤好之私，而为旁睨肘篋之傀儡。以云爱国，逃乎远矣。”夫中国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复萌，谁实为之，至于此极？彼项城固不得为无咎，而所以使项城日趋于专，驯致握此大权者，夫非辛壬党人？参众两院之捣乱，靡所不为，致国民寒心，以为宁设强硬中央，驱除洪猛，而后元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项城不悟，以为天下戴己，遂占亢龙，遽取大物，一着既差，威信扫地。呜呼！亦可谓大哀而已。^①

甚至连复辟运动，也以人才不济不足的共同理由，失望透顶。何去何从呢？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札上，清楚表明“九年鹵莽共和”之后，“大地之上，劫运方殷。复百方思量，总觉二三十年中，无太平希望。羸病余生，旦暮入地，睹兹世运，惟有伤心无穷而已”。^②谁为此果负责呢？严复又说：“洎上自就职以来，于中国根本问题，毫末无所措注……至于财政，则比之清世，尤为放纷，加之影响欧战，民生憔悴极矣……而后顾茫茫，或因此而成乱局，亦吾国运与吾民程度，应历之境界，天实主之，无如何也。”^③次年，1917年，严复流露同悲：“嗟呼！及吾之世，太平富强，固属不可复见矣。而一方稍为安静处所，使我得终余年，不知有否？元遗山句云：‘何处青山隔尘土，一庵吾欲送华颠’，真鄙人今日心绪也。”^④

欧战经年，严复投入大量心力观察、阅读，曾自谓每日投入六小时阅读西报、杂志，并作摘要论述，送公府参考。严复认为，这场史无前例的

① 《与熊纯如书》30（1916年4月4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30~631页。

② 《与熊纯如书》97（1920年7月10日），《严复集》第3册，第708页。

③ 《与熊纯如书》32（1916年5月19日），《严复集》第3册，第638页。

④ 《与熊纯如书》61（1917年），《严复集》第3册，第677页。

战争，影响之深之巨，“不但列国之局，将大变更；乃至哲学、政法、理财、国际、宗教、教育，皆将大受影响”。严复又说：“欧战影响，遍于全球，便无近争，吾民已苦，况又竭泽，以为同室操戈之事。兵祸不解，后此康复，益复无望。吾惟祈死而已，尚何云乎。”^①

首先，严复就德国参战国力的表现，说明以强权强力为特征的新世界的到临。严复这样描述：

故尝谓：国之实力，民之程度，必经苦战，而后可知。设未经是役，则德之强盛，不独吾辈远东之民，不窥其实，即彼与之接壤相靡者（舍三数公外），亦未必知其真际也。使彼知之，则英人征兵之制，必且早行；法之政府于平日军储，必不弛然怠缺如去岁明矣。且由此而知，国之强弱无定形，得能者为之教训生聚组织绸缪，百年之中，由极弱可以为巨霸。

严复总结这个新权力政治的本质：“其国家学说，大抵以‘有强权，无公理’一言蔽之而已。”^②

严复并就德国在欧战中表现出的权力政治之世界趋势，反观反思中国：

盖自德国学者，如尼采，特斯基倡说以来，人知世间一切竞争，不视理而视力，力平而后理申。吾国今日之事，亦视力之何如耳？至于其余，大抵皆装点门面之事，虽史策之上，累幅盈篇，置之不观可耳！故问中华国体，则自以君主为宜。吾侪小民，为其中托庇之一分子，但愿取此大物之家，量力度德，于外则留神邦交，于内则通筹财力，使皆稳固，则权力所在，将即为讴歌所归，历史废兴，云烟代谢，我曹原无所容心于其际也。至于存种救民，自是另为一事。因果所呈，不应专求于上，四百兆之

^① 这两段引文见：《与熊纯如书》20（1915年）、30（1916年4月4日），《严复集》第3册，第619、634页。

^② 这两段引文俱见：《与熊纯如书》25（1915年8月5日），《严复集》第3册，第625页。

民质实共为之。因立果从，莫之为，亦无可避也。悲夫！^①

中国富强之路，既被民初政治、欧战新局冲击得找不到一条明确稳当的前景前路，严复对此绝望又竭力地指出唯一的求生之途：

然今日最难问题，即在何术脱离共和。不佞垂老，百思羌无善术，黎、段二公，道德皆高，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天下惟忘机能息机，此言固也。但立国群强之间，当民心喧嚷之顷，岂是忘机，遂能出险。自吾观之，则今日中国须有秦政、魏武、管仲、商君，及类乎此之政治家，庶几有济。不然，虽季札、子臧，吾辈亦相率为虏。

总之，今日政治惟一要义，其对外能强，其对内能治，所用方法，则皆其次。惜贤弟不能读 Machiavelli（孟迦维黎）与近人 Treitschke（脱雷什奇）两氏之书，如能读之，则议论当少异此耳。夫孟子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此自极端高论，殆非世界所能有。^②

其次，严复对西方文化、科学根本的否定，以及由此而引出他视中儒、中学为“天下潮流之所趋矣”的新机。严氏这种贬西扬中的转变，来自列强间在欧战中的残酷和失道：“欧战英、法、俄、意虽有进步，然德殊不易败，欲睹结局，尚不知当糜几许金钱？当残若干生命？文明科学，终效其于人类如此，故不佞今日回观吾国圣哲教化，未必不早见及此，乃所尚与彼族不同耳。”^③到了1917年，严复用了更具体、沉重的文字批判西方，仿如今是昨非般，他说道：

世变正当法轮大转之秋，凡古人百年数百年之经过，至今可以十年尽之，盖时间无异空间，古之程途，待数年而后达者，今人可以数日至也。故一切学说法理，今日视为玉律金科，转眼已为蓬庐刍狗，成不可重陈之

① 《与熊纯如书》26（1915年9月23日），《严复集》第3册，第627~628页。

② 《与熊纯如书》38（1916年9月10日），《严复集》第3册，第646页。

③ 《与熊纯如书》36（1916年8月21日），《严复集》第3册，第642页。

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乱亡之祸。试观于年来，英、法诸国政府之所为，可以见矣。乃昧者不知，转师其已弃之法，以为至宝，若土耳其、若中国、若俄罗斯，号皆变法进步。然而土已败矣，且将亡矣；中国则已趋败轨；俄罗斯若果用共和，后祸亦将不免，败弱特早暮耳。吾辈生于此日，所得用心，以期得理者，不过古书。而古人陈义，又往往不堪再用如此。虽然，其中有历古不变者焉，有因时利用者焉，使读书者自具法眼，披沙见金，则新旧递嬗之间，转足为原则公例之铁证，此《易》所谓“见其会通，行其典礼”者也。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①

次年，1918年7月，严复又补充说：

“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英前外相葛黎谓：此战若不能产出永远相安之局，十年后必当复战，其烈且必十倍今日，而人种约略尽矣！）英国看护妇迦维勒 Miss Cavell 当正命之顷，明告左右，谓：‘爱国道德为不足称，何则？以其发源于私，而不以天地之心为心故也。’此等醒世名言，必重于后。政如罗兰夫人临刑时对自由神谓：‘几多罪恶假汝而行也。’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学者，亦日益加众，学会书楼不一而足，其宝贵中国美术者，蚁聚蜂屯，价值千百往时，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矣。”隔了一个多月，严复对欧战下了一个中西陵替的根本之评：“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

^① 《与熊纯如书》52（1917年4月26日），《严复集》第3册，第667~668页。

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①

欧战期间，严复还有其他文字论断中西优劣短长之要旨与商量。1916年9月，严复批评康、梁及晚近中国士大夫委西忘本，他说道：

康、梁生长粤东，为中国沾染欧风最早之地，粤人赴美者多，赴欧者少，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其中如洛克、米勒登、鲁索诸公学说，骤然观之，而不细勘以东西历史、人群结合开化之事实，则未有不熏醉颠冥，以其说为人道唯一共遵之途径，仿而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至挽近中国士大夫，其于旧学，除以为门面语外，本无心得，本国伦理政治之根源盛大处，彼亦无有真知，故其对于新说也，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则为逢迎变化之随波。何则？以其中本无所主故也。^②

严复次年再次谴责梁启超“毕生学问皆为纸的”，但与康有为在“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论点相同，严氏举一证在此：

有如英国自十四年军兴以来，内阁实用人才，不拘党系，足徵政党——吾国历史所垂戒者，至于风雨漂摇之际，决不可行，一也；最后则设立战内阁五人，各部长不得列席，此即是前世中书、枢密两府之制，与夫前清之军机处矣，二也；英人动机之后，法、俄、意诸协商国，靡然从之。夫人方日蜕化，以吾制为最便，而吾国则效颦学步，取其所唾弃之乌狗而陈之，此不亦大异也耶？总之，共和国体即在欧美诸邦，亦成于不得已，必因无地求君，乃行此制，而行之亦乱弱其常，治强其偶，墨西哥、南美诸邦，可以鉴矣……（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③

① 这两段引文分见：《与熊纯如书》73（1918年7月11日）、75（1918年8月22日），《严复集》第3册，第690、692页。

② 《与熊纯如书》39（1916年9月22日），《严复集》第3册，第648页。

③ 《与熊纯如书》48（1917年1月24日），《严复集》第3册，第661~662页。

这个例证，也说明了严复在1916年引英使朱尔典的见解肯定旧法可倚可恃的抱守，严氏说：“此番英使朱尔典返国，仆往送之，与为半日晤谈，抚今感昔，不觉老泪如绠，朱见慰曰：‘严君，中国四千余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归于无效，天之待国犹人，眼前颠沛流离，即复甚苦，然放开眼孔看去，未必非所以玉成之也，君其勿悲。’复闻其言，稍为破涕也。”^①1918年，严复再次肯定这个例证的看法：“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足下记吾此言，可待验也。”^②

第三，在民初政局、欧战、新文化运动交乘影响的中国前途上，严复面临一个极为严峻、挫折的现实：中国国家起码的秩序（对外、对内皆然），已不能维持，换言之，中国政治的统一，乃是中国之路急迫得完成的条件。下引严复1912—1916年间的几段文字，以示说明：

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乎？旧清政府，去如刍狗，不足重陈，而应运之才，不知生于何地，以云隐忧，真可忧耳！

中国前途，诚未可知，顾其大患在士习凡猥，而上无循名责实之政。齐之强以管仲，秦之起以商公，其他若申不害、赵奢、李悝、吴起，降而诸葛武侯、王景略，唐之姚崇，明之张太岳，凡为强效，大抵皆任法者也。而中国乃以情胜，驯是不改，岂有豸乎？

是故居今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除却综名核实，岂有他途可行。贤者试观历史，无论中外古今，其稍获强效，何一非任法者耶？管商尚矣；他若赵奢、吴起、王猛、诸葛、汉宣、唐太，皆略知法意而效亦随之；至其他亡弱之君，大抵皆良懦者。

可知邦基隍杞，其能閔济艰难，拨乱世而反之正者，决非仅仅守正高

^① 《与熊纯如书》47（1916年12月25日），《严复集》第3册，第659页。

^② 《与熊纯如书》62（1917年），《严复集》第3册，第678页。

尚，如今人所谓道德者，有以集事。当是之际，能得汉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刘裕、桓宣武、赵匡胤，亦所欢迎。盖当国运漂摇，干犯名义是一事，而功成治定，能以芟夷顽梗，使大多数苍生环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此语若对众宣扬，必为人人所唾骂。然仔细思量，更证以历史之前事，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①

第四，严复多次提到国家统一的紧迫性，意味着唯有不惜一切手段、代价，摒除德治、教化的任何考虑，国家统一才能完成；而中国人民为此必遭受混沌元黄，苦趣重压，代价惨烈，不得宽减。严复并解释此中天谴原因：

此等浩劫，内因外缘两相成就，故其孽果无可解免；使可解免，则吾党事前不必作如许危言笃论矣。顾此等皆天行演（天演行）淘汰之见诸事实者，淘汰已至，而存立之机见焉。故西人谓华种终当强立，而此强立之先，以其有种种恶根性与不宜存之性习在，故须受层层洗伐，而后能至。故纯如欲问中国人当受几许磨灭，但问其恶根性与不宜之性习多寡足矣，二者固刚刚相掩也。然此乃指社会拓都而言，至于小己么匿之祸福，则庄子所谓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矣。^②

第五，欧战中，严复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大体是负面、不信任的。严复根据斯宾塞进化理论，一向不主张大规模、激进的、人为或理性设计的社会变迁计划。对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严复在1918年曾忧虑道：“欧战自俄国革命之后，事势迁流，几于不可究极。诘其影响，已及吾国北陲。”不多日，严复正式对俄革命表态说：“自革命以来，世界日益豪侈，军政两界，皆以攫利为归，百万之室，目为小康，问其所由，大都造业。嗟乎！无天道则亦已耳！如其有之，则往复平陂，特转瞬耳。不见俄国今日社会

① 这四段文字分见：《与熊纯如书》1（1912年3月27日）、20（1915年3月4日）、21（1915年3月31日）、42（1916年12月1日），《严复集》第3册，第603、619、620、652页。

② 《与熊纯如书》8（1912年抄），《严复集》第3册，第608页。

党专与资本家富官僚为仇者乎？”没几天后，严复又说：“欧西决战，乃从来未曾有之激烈……此役解决之余，乃成新式世界。俄之社会主义，能否自成风气，正未可知。而吾国居此潮流之中，受东西迫拶，当成何局，虽有圣者，莫能睹其终也。”^①

如果说严复在上述引文中还对俄国社会主义有些许保守、疑观，1918年5月、1919年严复两处便给十月革命毫不妥协的批判：

俄罗斯一行革命之后，保罗民党（Bolsheviks）最恶军官，且惧其众为主张复辟者之所利用，故其第一义，主于毁军，然自夏连士机 Kerensky 第一命令，许兵卒以平等权之后，国军遂散，即今全国废然，如巨人病风卧地，任人宰割。而国中无论都鄙乡邑，皆劫夺公行，粮草罄竭。据所记载，真令人有天地末日之悲，故中国乱矣，而俄罗斯比之，则加酷焉。

欧东过激党，其宗旨行事，实与百年前革命一派绝然不同，其党极恶平等、自由之说，以为明日黄花过时之物。所绝对把持者，破坏资产之家，与为均贫而已。残虐暴厉，其在鄂得萨所为，报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读，方之德卒入比，所为又有过矣。（其政体属少数政治）足下试思，如此豺狼，岂有终容于光天化日之下者耶？此如中国明季政窳，而有闯、献，斯俄之专制末流，而结此果，真两间劫运之所假手，其不能成事，殆可断言。^②

欧战期间与战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尤其到了1919年五四、六三前后，更形潮流。严复在晚年留下的文字中，对于青年们干政、从政，一如对传统太学生政治活动，皆持负面与反对。对于文学革命新潮，严复在1919年8月表达了著名的批评：“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斡弃周鼎，宝此康匏，正无如退化何耳。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

^① 这三段引文分见：《与熊纯如书》66（1918年）、67（1918年3月18日）、68（1918年3月31日），《严复集》第3册，第681、682~683、683~684页。

^② 这两段文字可见：《与熊纯如书》70（1918年5月17日）、90（1919年11月），《严复集》第3册，第686~687、704页。

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①

大致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两大口号：德先生和赛先生，严复当年在《原强》、《论世变之亟》两文中早已表达相同之意。但是历经民初政局，欧战世局，严复对西方科学、激进自由民主作为普世幸福福惠的价值，已持怀疑甚至濒临否定的立场了。面对五四、六三以来的运动，严复在一封同年8月的家书上道出：“本年真是乱世劫运年。”^②

从更深入的观点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位一体的思想：激烈反传统主义、民族主义狂潮以及社会主义全球新趋势，皆为严复所拒斥。严复以社会有机体的演化见解，主张旧法不可废，且不可不顾历史演进、积累之性习，所以断然拒绝外来新法变革的主张。严复并接受《社会通论》的观点，以民族主义属于人类宗法社会时代之相符事物，并不适合当今列国运会而至的全球现代性世界。

晚年严复仍追求自由、富强吗？是否已去西而就中？

晚年严复虽对西方科学与专讲功利的西学，激烈批评，但他仍不忘人民物质丰用，国家统一强盛的追求，虽多次表达他身没不及睹之悲叹，然而宿志不改。例如，严复分别在1916、1917、1918、1921年提到富强之事：“国民党人勇猛阴鸷，颇似法高山党，而进步因稍稳健，然弛散徘徊，恐异时大波轩然，必先为几郎党之失败，此复所以于梁、蔡、汤、王诸君，往往有微辞也……然于福国利民四字，皆为无望”；“嗟呼！及吾之世，太平富强，固属不可复见矣”；“始知世间一切法，举皆有弊，而福利多寡，仍以民德民智高下为归”；“比来桂、粤、湘、鄂，皆起轩然大波，而尽以

① 《与熊纯如书》83（1919年7月24日，大暑），《严复集》第3册，第699页。

② 《与三子严琥书》3（1919年8月31日），《严复集》第3册，第797页。

自治为帜。顾自不佞观之，要是一时假道，于国利民福，毫不相谋”^①。

谈到严复毫不保留批判西方功利文化、科学，极度肯定中儒中学，至此之境，是否严复放弃了人民自为、自由的追求，全然采取中国圣贤之道，追求一条人类前所未有之理想道路？拙文看法是严复既然未放弃富强、自由的追求，他受斯宾塞社会进化观的影响仍突显在他晚年的文字中：

为今之计，则世局已成，虽圣者亦无他术，亦惟是广交通、平法政、勤教育，以听人人之自谋。盖物竞天择之用，必不可逃。善者因之，而愚者适与之反，优劣之间，必有所死。因天演之利用，则所存者皆优；反之，则所存者皆劣。顾劣者终亦不存，而亡国灭种之终效至矣。虽然，中国根本甚厚，当不至此，特此颠沛流离生于其际者，颇辛苦耳。

宗法之入军国社会，当循途渐进，任天演之自然，不宜以人力强为迁变，如敬宗收族固矣，而不宜使子弟习于倚赖；孝亲敬长固矣，而不宜使耄耋之人，沮子孙之发达。今夫慈善事业，行之不解其道，则济人者或至于害人。西哲如斯宾塞等，论之熟矣，顾今日慈善之事犹不废也。士生蜕化时代，一切事殆莫不然，依乎天理，执西用中，无一定死法，止于至善而已！

辜鸿铭议论稍有惊俗，然亦不无理想，不可抹杀，渠生平极恨西学，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鄙意深以为然。至其訾天演学说，则坐不能平情以听达尔文诸家学说，又不悟如今日，德人所言天演。以攻战为利器之说，其义刚与原书相反。西人如沙立佩等，已详辨之，以此訾达尔文、赫胥黎诸公，诸公所不受也。

日本以岛国，然其变法不学同形之英，而纯以德为师资者，不仅察其

^① 这四处文字可见：《与熊纯如书》43（1916年12月6日）、61（1917年）、65（1918年2月1日）、107（1921年9月3日，白露前五日），《严复集》第3册，第654~655、677、680、715页。

国民程度为此，亦以一学英、法，则难以图强故也。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乃贸然为之，以此争存，吾决其必无幸也。

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百易人，不能治也。

尝谓今日之战，动以国从，故其来也，于人国犹试金之石，不独军政兵谋，关乎胜负；乃至政令人心道德风格，皆倚为衡。俄虽欧之大国……其国半明之民，乘机革命，近且定制共和，虽然，国之治乱强弱，初不系此，盖革命所诛锄者，特贵族耳。而民之愚暗，初不能一蹴而跻休明，而旧法之堤防既隳，忿欲二者必大横决。故法经八十年而始有可循之轨，犹不足以为盛强；最后者俄，其次中国，均不知何日始有向明之机。此时伫苦停辛，所受痛楚，要皆必循之阶级，恐足下终身悲之，尚犹未见其止，此固无可如何者也。

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肆言》继之，意欲锋气者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

始知世间一切法，举皆有弊，而福利多寡，仍以民德民智高下为归。使其德智果高，将不徒新法可行，即旧者亦何尝遂病，想吾国经此番苦痛之后，当亦废然而群知所致力矣。

中华何所有？四千年教化。舟车未大通，指此为诸夏。五千年来交五洲，西通安息非美欧。天心欲启大同世，国以民德分劣优。我曹爱国起求学，德体智育须交修。

嗟夫！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其必假而不复为真，盖无待著察而可决也。^①

如果相对照他 1896 年给梁启超的一札信文中所言，就更清楚见到严复

① 这十段书信引文出处俱见：《与熊纯如书》14、16（1913 年？）、23（1915 年 5 月 6 日）、47（1916 年 12 月 25 日）、52（1917 年 4 月 26 日）、57（1917 年）、63（1918 年 1 月 23 日）、65（1918 年 2 月 1 日）、72（1918 年）、107（1921 年 9 月 3 日，白露前五日），《严复集》第 3 册，第 614、615、623、660、668、674、678、680、689、715 页。

至老始终一贯确信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观：

甲午春半……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盖当日无似不揣浅狭，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故其为论，首明强弱兼并乃天行之必至，而无可逃，次指中国之民智、德、力三者已窳之实迹，夫如是，而使窳与窳遇，则雌雄胜负效不可知，及乎衰与盛邻，则其终必折以入。然则中国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存亡之数，不待再计而可知矣。是以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经，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本既如是，标亦从之。本所以期百年之盛大，标所以救今日之阽危，虽文、周、管、葛生今，欲舍是以术，皆无当也。^①

严复晚年并未变更进化富强的涂术的立场，究竟与他转向极度肯定中儒中学间的关系是什么？两相矛盾吗？还是他自己混淆了？是否他不自觉这两者间存在极大紧张关系？严复有他自己的答案。

严复在1916年12月发表了一篇英文论著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ncient Political Societies in China*，讨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严复其中最重要的论点是：“中国古老的政治思想有很大缺陷，即它从不敢公开地宣扬行政法则（the art of government）与伦理道德（morals）是两码事——就如药物法则的出发点是救死扶伤、导航法则都是为了暴风雨中安全领航一样。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富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成员总体上的道德水平，而我们生活的旧政治秩序失范，国家、社会新问题层出不穷时，当我们竭力解析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时，预测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出现时，当我们系统地解释正在国民生活中产生影响的新社会规则及其表现形式时，一旦政

^① 《与梁启超书》1（1896年10月），《严复集》第3册，第514页。

治和伦理或道德哲学纠缠不清时，就不可能得出一个非常公正的结论。”^①

这里，严复所说政治（politics）与教化（ethics 或 moral philosophy）必须分离而行，也就是指政治属于科学范围，教化则属于人文价值领域，两相分离，不相干涉而自行。因此就政治治理（the art of government）而言，严复主张实行英式君主立宪；至于欧战显示西方伦理教化或德性的危机，他主张实行中国儒家教化、德行挽救中国与世界。严复在早先发表的《政治讲义》书中，便指出：“《论》、《孟》、五经，其中所言，大抵不外德行、政治两事”^②，其来有兹。

此外，严复在英文论著发表的同年，也两度说明了政治与德行分离不相干涉的原因：

黎、段二公，道德皆高，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立国群强之间，……自吾观之，则今日中国须有秦政、魏武、管仲、商君，及类乎此之政治家，庶几有济。

又，再重引前述已征引过之一段要言：

可知邦基隍杞，其能闾济艰难，拨乱世而反之正者，绝非仅仅守正高尚，如今人所谓道德者，有以集事。当是之际，能得汉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刘裕、桓宣武、赵匡胤，亦所欢迎。盖当国运漂摇，干犯名义是一事，而功成治定，能以芟夷顽梗，使大多数苍生环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此语若对众宣扬，必为人人所唾骂。然仔细思

① 见 Yen Fuh（严复）：“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ncient Political Societies in China”，*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I，No. 4（December 1916），pp. 18-23. 今收入王庆成等主编：《严复文集·编年》（四），台北，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年，第994~1001页。王天根的译文见：王天根：《群学探索与严复对近代社会理念的建构》，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189~190页。

② 见严复：《政治讲义》，第1页。

量，更证以历史之前事，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①

拙文此处说明严复力主分离德行、政治两事的主张，目的在于论证严复晚年一方面坚持英式君主宪政、人民自为自由、追求国家统一诸旧见，另一方面归返中儒中学的教化、道德指引之新识，就他个人而言，两相并存，各行其是，不见矛盾，终归向大同究竟。

意义和结语

严复是近现代中国第一位有系统引介西方进化论、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同时他也斟酌参照中国民情、地形、历史演进诸实际条件，“执西用中”，寻求一条既适合全球现代性运会也相契于中国国情的富强之路，提出立国建国的纲领性原则，并参酌天演途上中外各种巨变来修改实践方法。这种思想与做法，容易使得国人困惑于他思想的真义与一致性何在，也往往使研究者得出各种矛盾或不确定的见解。然而，拙文企图说明证明在他一生的富强思想之中，严复确实很自觉、很清楚地表达一些一贯不易的思想与原则。

到了欧战终了，诚如严复在欧战中所言，战后世界一切重大思想、学说、社会形貌皆将巨变，不复如昔。拙文已试图将欧战对严复思想的影响，以及他反省欧战后仍坚守的政治、社会诸旧观，以及在欧战影响下，转变与不易之双方思想的联结与整体，分别给予了解释与描述。这是拙文与历来严复研究不同用心的地方。

欧战后，中国思潮的几股主流，例如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巨流、革命主义明火、激烈反传统思想等等，皆为严复所反对、所不乐见。严复既斥拒中国思潮主流，他的富强天演涂术，也为中国思想界主流漠视或放

^① 此引两处文字可见：《与熊纯如书》38（1918年9月10日）、42（1916年12月1日），《严复集》第3册，第646、652页。

弃。换言之，欧战后，严复富强与大同的追求，表现为一种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两重性的追求之道，已为时代的大潮淹没了。保守主义是因他接受社会有机体论，在演化途中的人民性习，好的有待几代岁月的养成，恶的亦须历经几代岁月的洗伐方尽；因此，任何改革不仅要缓慢、要时间，不能介入太多政治与人为的意志、力量，而且因立基在积累百千年的性习与经验上，传统文化遂得历经天演、人为共同的选择，提供各民族改革的源流与支柱。当严复的富强、自由思想被时潮淹没时，这意味着严复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主张，已不是中国变革的新潮、新动力了。五四后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自然不会选择严复的保守—自由主义；受欧美影响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如胡适、罗隆基、张奚若等人），也受欧战影响，倾向以积极有为政府为杠杆，育民、治民，背向于严复的主张。严复思想的没落失时，不是他个人悲叹而已；它象征着中国将以大规模方式，在极短时间之内，追求社会的重组；它显露着选择符应于天演阶段的传统价值、思想，不被重视；它也说明着一任或尊重人民自为自治而培育出的个人自由质量情操，已被其他方式取代。

拙文着力论述斯宾塞的进化论，主要目的是想从一个思想的侧面观察严复的自由主义。严复接受斯宾塞予民自为、自治的机会以培养人民自由素质之原则，当民德、民智、民力自为演化到一定程度时，国力自然强盛；换言之，严复认为国力强盛，奠基在民德、民智、民力的长期涵育，给予人民平等的机会，给予人民自由去自演自培三者之质量，人民经几代岁月，经由物竞天行，可达自治佳境，然后大同郅治，始有可能。因此，国力强盛，并不仅在于兵强物丰而矣，就严复思想而言，国力强盛不外是人民三者质量皆优良则矣，三者臻此佳境，国力自然强盛。

严复到晚年仍坚信这个富强的涂术，并就中国社会处于七分宗法三分军国阶段的考虑，主张中国当采君主立宪治体，培养人民自由程度与能力。这个自由主义的富强模式，贯穿他一生的富强思想。辛亥残局、民初

政向、欧战反思，确实影响严复很大，他对此不仅更加反对共和，更加提防予民过早、过多的自由，同时也赞成战时得提高政府的集权，然而，他虽始终倡言此一富强模式，但却未曾在原则的问题上做出太多太大的修改。晚清康梁推行变法时，严复亦是以坚持这模式而反对戊戌变法。

拙文关心严复这一自由主义模式所产生的两个问题：

第一，这个模式需要一个能控制全国政局的君主，辛亥后则有待一总统或政治强人，对下能“任法而治”，给予人民一平等机会自为、自由，接受物竞天行。晚清政局，民初内外乱局，这一富强模式的考虑、长处、意义，每每为改革者、革命者所忽视或扬弃，以其无法当下立即产生解决危机的功效；也每为政治上保守者、反动者所拒绝，以其反对天命观的统治正当性，以其予人民自为自治太多自由，不符合统治者治民牧民的权力要求，以及“任法而治”原则阻止了统治集团的专权擅权。这是严复自由主义富强模式未曾受到重用而终为时代大潮淹没的缘由。

第二，严复接受斯宾塞社会理论，坚持人民个人的自由要经数代天择下的自为自治，才得养成，这是列国竞争、社会天演下求存求胜的充分条件。换言之，个人自由历经数代天行下的养成育成，可谓严复追求中国十年百年唯一、真正的目标。欧战的沉思，虽给严复在天演道途中加重对“人为”的肯定，但不因此而修改培育个人自由的涂术。史华慈指出严复不看轻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但因严复国家自由压倒一切的考虑，使得严复个人自由容易被弱化、扭曲、边缘化，未能被当做一价值的本身看待。史华慈虽然同情严复面临时代的困境，但论述中乃明确地指出源于严复的思想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然而，在拙文的论述中，严复对个人自由的重视与培养，始终未屈就于国家自由的要求下；严复富强的自由主义模式，因受斯宾塞影响，本就将个人自由列为优先、首重的社会天演目标，而严复本人始终一贯地坚持这样的目标，唯有完成它，真正国力的追求与提升，自然随之得之。为了完成此一唯一的目标，严复苦心竭虑考虑以君主专制或

君主立宪为中国政体。甚至到了民初与欧战时局，中国统一短期不见希望之时，严复多处提及，分离政治与德行，不计一切手段，师法中国历史上开创基业和法家人物的典型，全力造就出一个起码的统一局面或条件。这种竭力挣扎后的放手一搏，不外是创造起码条件、机会给予富强的根本根基：人民个人自由的育培。史华慈身在自由主义传统已成长多时的西方，观看严复的主张，自然会产生国家自由恐压倒、弱化了个人自由的价值的见解；但身处在自由主义传统仍未生根的中国，严复的著作主张是清楚的，并未见有产生史华慈指出个人自由乃成为国家自由的手段的事实。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很清楚地理解严复的富强涂术与主张，故而不选择、不肯定严复的富强模式，也因此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未能创造出一个重视个人主义自由的传统的事实，转而追求首重国家自由的现实的原因，不在于史华慈所指出的理由，而在于与严复富强涂术、思想不相关的其他原因。

民初五四运动时代“赛先生”的根源、 性质及后续转折

徐振国*

前言

民初五四启蒙运动时代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个深入人心的号召，其根源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 20 世纪初期提倡的 democracy 和 science。这两个概念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美国人的政治信念，尤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的形成和后续发展。本文从政治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状况为依据，以“科学”概念的发展为主题，采取倒叙的途径，先谈当前美国政治“科学”的发展困境，再追溯 20 世纪初期杜威提倡实用主义科学观的形成、主张和影响。以此为参照，从国家结构转型的概念看五四运动时代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背景，讨论胡适从杜威引介的“科学方法”，及其将此方法用之整理国故时产生的科学概念转换。然后，讨论西方知识界的两个重大转变，20 世纪 50 年代从实用主义到实证主义的转折，20 世纪 70 年代从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转向。

* 台湾东吴大学教授。

一、美国政治“科学”的发展困境

政治学的英文学名是 political science, 中文直译是“政治科学”, 在美国茁壮成形, 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重要的一环。然而政治学的“科学”特性一直有所争议, 冷战结束之时尤其暴露了其内在深层的危机。美国政治“科学”的发展困境可以从三个事件来说明。第一件是 1989 年开始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此事来的非常急促, 世人感到既兴奋又茫然, 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一文, 指出俄裔法籍哲学家柯耶夫 (Alexander Kojève)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便按照黑格尔的思想逻辑做出论断, 认为自由的价值终将胜过马克思标榜的平等价值, 欧洲共产世界的瓦解就是印证此一预言。福山的说法是一种政治哲学的现世诠释, 在《关键时刻》上刊出, 故能引领一时风骚。唯此事让正统国际关系学者感到郁闷憔悴。按国关学者原来是以历史叙事的方法谈国际间的权力制衡关系, 其后因应实证主义的趋势, 将古典权力均衡论提升成实证科学理论, 认为具有科学的预测和解释功能。然而对于共产世界崩溃这么庞大的事件, 国关学者竟然无从发言, 因此引发内部的分裂和检讨, 形成所谓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大辩论, 试图为国际关系另辟更宽广的研究空间。^①

美国“政治科学改造运动”(perestroika movement in political science): 按美国主流政治学界一向以“美国政治”和“比较政治”为主要研究范畴, 运用统计调查和博弈理论, 最能呈现实证科学所强调的量化研究特性。然而在 2001 年, 有匿名者借电子邮件发动攻击, 指摘经验调查和理性抉择成为学术“霸权”, 寡占了“美国政治学会”(APSA) 及其直辖属的《美国政治学刊》(APSR), 扭曲了政治科学的健全发展。这封匿名函旋即

^① Francis Fukuyama: *How Academia Failed the Nation: The Decline of Regional Studies*. 见 http://www.sais-jhu.edu/pubaffairs/publications/saisphere_winter04/Fukuyama.html, 2012.

发生了星火燎原的效果，在2001年末的美国政治学年会中引发了一场类似政变的举动，部分政治学者秘密聚集发动攻势，提出和匿名函内容相呼应的改造主张。^①为因应此一压力，APSA在人事和组织上做了一些妥协，由两位改造者愿意接受的政治社会学者担任当届和下一届学会会长，另也增加发行了一份新的学刊 *Perspective*，专门刊登质性研究的论文。改造运动引发了一些后续讨论，批判的部分很精彩，建言的部分很陈旧，未能为他们所标榜的“周全科学政治学”（*For an Ecumenical Science of Politics*）提出令人折服的主张。^②

国参院删除政治学科研经费的争议：按美国政治学者像其他学科一样，可以透过美国政治学会（APSA）申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的研究经费，总额大约1000万美元。然而2013年3月，参院通过该会计年度的科研预算案时，附带了一项参议员 Tom Coburn 所提的决议文，要求 NSF 今后不得接受 APSA 所提政治科学相关的研究案，其理由认为政治科学的研究无益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之需要。依照原案，Coburn 主张将政治科学相关研究的1000万美元全数删除，将之拨交国家健康总署（NIH），以补其可能的缺额。NIH 一向握有美国最大宗的科研经费，其2012年预算高达307亿美元，预估2013年会少16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2012年度预算仅70亿美元，预估2013年会少2亿多美元。政治学门隶属于 NSF，其1000万经费主要用在全国性的选举调查研究和各州政党势力下的学区划分研究。Coburn 认为政治科学界不该使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源，尤其不宜进行国会议员行为和选民态度关联性之类的调查。Coburn 的提案自然引起 APSA 的强烈反对，认为是“政治干预科学的危险举动”，让人觉得“非常凄冷”。所幸在实际拨款程序中，参院

① K. Renwick Monroe ed. : *Perestroika! The Raucous Rebell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9-11.

② Gregory J. Kasza: "Perestroika: For an Ecumenical Science of Politic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34, No. 3 (Sep. 2001), pp. 597-599.

拨款委员会主席 Barbara Mikulski 出面协调，政治学的经费未遭全额删除。然而这次争议背后的问题是，Coburn 和许多支持者怀疑政治学的“科学”性质，认为政治学是假借科学之名，进行非科学性质的研究。^①

事件各有其特定的事故和情境，背后皆蕴藏了长远的政治“科学”争议问题。政治学家 David Ricci 在 1984 年出版《政治科学的悲剧》，刻意借用古希腊文学的“悲剧”概念，表达一种用心经营、却得不到善果的无可奈何，指出美国政治科学在“政治”、“科学”、“学科”三者之间有其内在纠葛。Ricci 认为，此类争议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期杜威主导实用主义之时提出的 science 和 democracy 主张。

二、杜威实用主义科学民主观的形成

Ricci 指出，许多人把杜威哲学说成是“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或“激进的经验主义”，容易引起争议。Ricci 认为，杜威的知识兴趣广泛，涉猎许多不同的领域和课题，故用“杜威主义”（Deweyism）一词来概括杜威哲学最为贴切。^② 本文的重点是探讨科学方法论，故仍愿以实用主义作为杜威的标记，借以和后面要讨论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形成对照。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开启实用主义，有其工业发展的重要背景。基于此，我们要拉长时序，确认一下西方工业革命的起点。过去，一般认为工业革命始于 1776 年，以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及美国独立革命作为最具表征性的三个案例。近二十余年来，经过当代历史社会学家的研究发现，西方现代工业革命是始于 1820 年前后，是以动力机

① Beth Mole: *NSF cancels Political Science Grand Cycle*, Aug 02, 2013. : <http://www.nature.com/news/nsf-cancels-political-science-grant-cycle-1.13501>.

② David M. Ricci: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00-102.

器与工厂制度的推广作为延伸的基础。新的发现还指出，当时新兴的工业革命还是以包工制为基础。资本家握有资金和销售管道，但将商品的制造委托给包工或工头老板。至于工头老板如何管理劳工，甚或如何克扣童工、女工，资本家往往视而不见，他们只管验收商品销售牟利。马克思在世之时看到的便是这样的包工资本主义。^①至19世纪80至90年代，包工资本主义达到饱和，弊端丛生，酿成经济危机，终至瓦解。取而代之的，便是现代企业管理式的资本主义，资本家本身介入生产过程，讲究生产方式和管理制度之改进，造就了大规模生产的现代企业。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20世纪初期看到的便是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他用“企业家”的概念来概括资本家的特性，表示有其开创和统筹运用资源的正面功能。

众所周知，西方工业革命的酝酿和起始阶段是在英国。然而当包工资本主义朝企业资本主义转向之时，工业发展的重镇便逐渐移向美国。美国可以南北战争作为发展的分界点。在此之前，美国还具备浓厚的新兴开发社会特色，像许多老式西部片呈现的场景，在广袤的中西部、西部、加州沿海、南方内陆、德州等地，白人移民展开了一幕又一幕的拓荒历程。那时，议政机构是以城镇会议为主，呈现了直接民主的精神。大学教育还是小规模学院形态，其中不少还保留了神学院的特性，十几位教员带领着几十位或一两百位学生，授课内容主要是一般的伦理和法律课程，很少涉及农工商业的实用技术内容。^②

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一般被认为是一场具有道德和法理概念的解放黑奴之争。然就经济利益而言，美国南北战争也可以看作是南方和北方各州在国家发展方向争议的一次大摊牌。美国南方偏重农业、需要大

① Vivienne Brown: "The Emergence of the Economy" in Stuart Hall and Bram Gieben edited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1997, pp. 128-144.

② David M. Ricci: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30-32.

量蓄奴维持农庄经营，北方偏重工商业、亟需开发新的科技和市场，由此形成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的国家经济进入工业化的高度发展阶段，横跨东西两岸的铁路开通了，各类新兴企业和消费方式启动了，人口开始朝都市集中，纽约、芝加哥、克里夫兰、匹兹堡、旧金山、达拉斯等城市一一崛起，形成明显的都会化景象。至1872年，美国实已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美国经济发展最显著的自身特色是始于20世纪10年代，其中以福特汽车公司采取的活动生产线的生产方式最具代表性。这个发展过程过去都是从企业管理和工业工程的角度来探讨。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探讨当代服务业挂帅的特性，历史社会学家重新了解当初福特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深远价值和影响，由此提升成“福特主义”（Fordism）的总体概念来标示其变革的时代意义。具体而言，福特生产方式有泰勒科学管理的概念，将工作流程分得很细琐，个别工人在生产线中重复同样的工序和动作，工作变得很无聊，故怠工辞职的人很多。福特公司为了挽回工人，提出“五块钱一天”的薪资策略，比原来的日薪高出了一倍，成功地将工人拉回来。然而却产生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后果，领高工资的工人意外地成了量产汽车的主要购买者，让福特大规模生产体制得以运转。这就促成了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相依赖的新型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基础上，美国工商管理蓬勃发达、人才辈出，爱迪生、泰勒、福特、洛克菲勒，摩根斯坦利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开创了划时代科技和管理体制。美国自此开始主导了现代工商社会发展的趋势。^①

伴随着工业经济发展，美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大力扩张，从原来的小型文理学院蜕变成大型的现代综合大学。1862年和1890年先后两次提出摩瑞尔法案（the Morrill Act of 1862和the Morrill Act of 1890）奠定了美国高

^① John Allen: "Fordism and Modern Industry," in John Allen, Peter Braham, and Paul Lewis 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ms of Modernity*, 1992, pp. 232-240.

等教育的立法基础，要求提拨公地和公共财务资助，以利兴办大学。甚至要求一州至少要办立一所像样的州立大学，并不断纳入工商农业等科技课程，以配合社会发展之需要。^①自此，美国便有私立大学和州立大学两个相辅相成的教育系统，为全美各地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绝的人才，其后也终于能摆脱欧洲学术的支配而找到自己独特的学术发展方向。

不过，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美国知识界感到不安，觉得社会弊病丛生。政治学者尤其忧心忡忡，认为政界贪腐现象严重，对于大众民主政治缺乏信心。具体而言，美国当时的文官体制还不健全，现实政治有许多弊病。例如候选人在选举过程中需要一大批抬轿助选人员，当选之后也都要以官职来分赃。又例如各类选区的划分，各政党经常会按照自己的地缘利益，将选区划分得歪七扭八，是所谓“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条款。Ricci指出，美国当时也不像欧洲学界，缺乏像马克思或韦伯那样的学术传统，借以分析社会病象。^②

在上述发展背景中，约翰·杜威（John Dewey）是一位生得其时的哲学家，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为美国开创了本地的学术文化根基。杜威生于1859年，逝于1952年，寿命很长。他的成长期间正好是美国南北战争结之后的快速成长阶段。他长期在大学哲学系任教（1894—1904年在芝加哥大学，1904—192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有良好的环境来开创自己哲学见识，而他著作丰富，涉猎广泛，关切美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问题。杜威年轻求学时便排斥神学，不喜欢康德伦理学，而偏好具有演化性格的黑格尔辩证法。后来，他觉得黑格尔哲学也有所不足，开始注意美国哲学前辈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和詹姆斯（William James）等人的哲学概念，由此找到了美国在地的学术根苗，建构了美国本身的学术思想基

① David M. Ricci: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32-46.

② 同上，p. 100.

基础，开拓了美国的“自由派主体论述”（discourse of liberal matrix）。^① 本文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概念将杜威的科学观整理出下面几项特点。

其一，反对“绝对主义”哲学：杜威认为，基督教和非西方宗教都有一种固定的世界观，先假定有“永恒的真理”的存在，而哲学家的使命便是去探讨这种真理，让人们可以长相持守、安心立命。杜威将这种静态的自然世界观或道德世界观，斥之为绝对主义哲学，指其隐藏了很深的神学思维。Ricci指出，杜威的说法代表了当时很多美国学者的看法，他们正在摆脱具有神学和伦理学的旧式学院教育内涵，而试图开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道德观。^②

其二，借实验认识世界：杜威主张突破柏拉图“理想对真实”的二分框架，而采取“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新方法。在此研究方法中，依然重视西方文明的“理性”（reason）传承，唯强调要多用“数据”来进行佐证，也就是以某种特别而有系统的方法来运用或印证我们的感官。杜威主张，求知之道不在静思默想，而是要采取具体作为进行实验程序，要采取“去推、去拉、去刺、去称、去量等等方法对其所处情境有所作为。”^③ 这样的科学态度，在推论前提上，就会截然不同于老式哲学家。这种踏实的实验工作背后，科学家想象了一个可以改变的世界，可以变换其组成，或调整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参与“转化实存状态的过程”。这样一个能够被转化改变的世界，自然就不能用来维护绝对主义哲学观所设定的永恒不变特性。杜威主张，科学的目的是去彰显一种让人们必须服膺的秩序，而是要不断地重新塑造秩序以切合人们当下的需要。

其三，重视研究方法及其有组织的智能：杜威认为，当代科学的特

① David M. Ricci: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07.

② 同上, p. 102.

③ David M. Ricci: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03.

性，不在于发现任何特定的真理，而在于做研究本身的方法（the manners of doing research itself）。杜威指出，也有所谓绝对主义科学，就像牛顿发明的运动定律，旨在强调永恒定律的发现，而让人们有所遵循服膺。杜威认为这种诉求毫无道理。他认为真科学必须要综合推理和经验，其实验组成必须不断地变动，当科学家进行了新的实验，便增加了科学知识的存量。若此，我们界定科学便不应在其成就，而应着重其特别的研究方法（special mode of inquiry）。杜威因此宣称：“当物理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工艺家，采取了适当的方法，能够胜任于解决呈现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便是进行了科学求知（scientific knowing）。”^① 杜威进一步主张，科学是混合纯粹的沉思以及“直接的观察”，以一套独特的方法，产生一套独特的知识。杜威称此为“有组织的智能”（organized intelligence）。^②

综合上面的几项特性，我认为杜威主义的特性，是在为美国社会凝聚新的世界观和科学观。美国原来是新教徒的社会，有很强的新教信仰和伦理。然而在急速的工业化过程中需要相匹配的新思维。就此而言，杜威必须和他同时代的泰勒（Frederick Taylor）和福特（Henry Ford）并列。泰勒开创了管理学上著名的“泰勒主义”（Taylorism），将由总设计师将工作性质做详细的界定和评估，做成书面的指令，进行细致的分工操作，而由总设计师来统筹整合。福特开启了福特主义（Fordism），将泰勒的科学管理落实在制造业的流程之中，在移动生产在线进行细密的分工和整合。杜威开创的杜威主义（Deweyism）则是在哲学和政治社会的概念上讲究新的科学观和科学方法，借此摆脱神学或伦理学的先验指导原则，而以动态的方式追求推陈出新的最佳科学知识组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杜威的独特处，不仅在讲究科学方法，也是在于

① David M. Ricci: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 同上, p. 104.

借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解说。就哲学概念而言，杜威从反绝对主义哲学顺理成章地走到反绝对主义政治权威。杜威认为，在人类事务中，民主类似于科学，可以称之为“科学方法的大书写”（the scientific method writ large）。^① 具体而言，科学方法在民主政治中彰显了两层意思。其一，民主的本质是“一种政府形式（a mode of government），一套选举官员和管制官员行为的独特实践”。^② 就此而言，民主制度的确可以模拟于科学方法，讲究开放的研究程序，而甚于任何特定的研究后果。其二，假如民主的确是一套开放的制度和程序，借以解决公共事务，那么美国公民便可把自己等同于科学家在做科学工作，民主政治也就可以像科学社群那样地有效运作科学方法。杜威认为，科学社群实已发展出一套“德性”，“包括怀疑、质问、愿意思考新观念、喜欢采信证据而不援用既有的前导概念（preconception）。”^③ 杜威相信，借着这些特性的有效运作，科学家可以彻底了解自然世界。依此，杜威认为自由社会应该为其公民培育相同之德性，借此获得可信赖的政治知识并据以具体实践。杜威指出，“民主的危机是在要求取代这样的智慧，（可幸的是）在科学程序中已经展现的这种智能，现在公共事务中已经广被接受。”^④

杜威认为，就像科学社群中经常出现分裂而矛盾的假设，需要加以分析以及有效的验证，民主国家社会也要协调各不同社会团体和阶级，旨在包容更广阔的社会利益。在此协调整合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没有哪一种科学方法，可以预先决定哪些利益优于另一些利益。我们面临的情境，是一种不断的变迁和演进的社会，而各种新生力量，包括都会农村、种族宗教、贫穷富贵都轮番登上政治舞台，寻求协调和整合。杜威指出，现代社

① David M. Ricci: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04.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会强大而不断涌现的动力，其实是由科学技术的不断变革所驱动，并同时表现成政治面貌的推陈出新。基于此，“不是自由主义在创造需求，而是不断调整的需求来体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地位”。^①

此处，杜威很成功地为美国民主政治增加了新的论述主张和力道，使宪政主义、大众选举、社会政治利益协调等原有的制度性的特性和内涵，切合了科学社群“更新观念”（*exchanging ideas*）的诉求。杜威表示，“初始的民主政治形式，如大众投票和多数表决等等，已经在其实践的作为中达成了。现在更进一步的是要有磋商和讨论，借以发现社会的需求和困难。”^② 换言之，此须“扩大使用民主的方法，采取协商途径，具备说服、协议、沟通和合作的智慧。”^③ 而此皆能从自然科学寻求知识的方式，运用来达成政治社会的后果。

总之，杜威主义和美国社会工业化同步成长，因应了美国宪政主义的传承，增加了新的科学方法概念。杜威活到1952年，而在此前后美国学界的科学哲学观已从实用主义转进到实证主义，此使美国的政治科学产生了重大的实质变化。

三、从国家结构转型看五四运动的特性

相较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中国还是一个传统农商社会，而且正进入重大的国家转型阶段，从两千年的皇权帝制转变为现代主权国家或现代共和体制国家。^④ 国人习惯于说中国传统社会一穷二白、明朝宦官当道，清

① David M. Ricci: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05.

② 同上, p. 208.

③ 同上, p. 175.

④ 徐振国:《中国近现代的“国家”转型和政商关系递变》，台北，韦伯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第75~100页。

朝满酣无能，无法应付西方挑战。然而根据近二十年来的研究发现，明清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那么单薄，有其自成一体的政经文化结构，在传统农商的基础上，却也有过几度重大的经济成长经验和盛衰周期。^① 然而要了解中国近代的政经蜕变的转折，我们必须同样把历史镜头拉到 1820 年的西方工业革命。在此之前，中国一直享有优势的国际贸易条件，出口大批商品，赚进大量白银。大清帝国也一直有能力把西方来的贸易者约束在广州和澳门。唯自 1820 年英国启动工业革命，工业生产力大幅提升，由此建立了新的殖民帝国势力，远远超越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旧式殖民国家。英国挟其新锐的工业生产技术，以铁壳机动炮舰直叩中国门户，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中击败中国，订定南京条约，要求五口通商。不过，英国更庞大的冲击则是扩大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力量，英国开始以鸦片贸易等手段促成了满清大量白银的流出，后来终于突破了独立的中国独立的经贸体制而纳入到主导的金融体系之中。这一连串的金融体系转换重重地打击了一向以白银为交易媒介的大清帝国。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广州通商口岸的商业，引爆金融危机，银楼大量倒闭，社会经济瘫痪。这就促成了洪秀全等人在广西起义，发动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曾经侵犯十七省，攻克六百余座城市。^② 当时太平天国造成的内乱危机远大于英法两国的海上威胁。满清政府借重曾国藩等人兴办团练，打败太平天国，重建大清帝国的政治社会秩序，由此开启了“同治中兴”（1862—1874）以及延续更长的“自强运动”（1860—1895）。

美国历史学家芮马莉（Mary Wright）认为，同治中兴平定了内乱，重建了儒家本位的乡治社会秩序，其成就不下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不同的是，日本的国家转型接近欧洲的经验，从封建国家体制（feudalist state）

①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方骏、王秀丽、罗天佑合译：《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台北，联经，2004 年。

② 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上），台北，远流，2012 年，第 176~273 页。

转型为绝对专制国家 (absolutist state)，也就是现代主权国家 (sovereign state) 的前身。相对于此，中国自秦始皇以后，便朝大一统的皇权帝制发展，自宋代以后更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统治基础。曾国藩等人在同治中兴时代进入权力要津，仍然尊崇“王道”的统治概念，服膺“三纲五常”的基本价值信念。芮马莉因此称曾国藩等人为中国“最后的保守主义者”。“同治中兴”和“自强运动”便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应变局。^①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大败。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刺激，开始怀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方向，展开深刻批评，重点便放在“三纲五常”的皇权意识形态。此一阶段，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主领舆论的人物。他们参与过科考，深通古籍，便借“古文经”对“今文经”展开批判。所谓“今文经”，是经朱熹等宋代名儒校勘、官方采用的儒家经典，以三纲五常为宗旨，使能契合于皇权体制的义理统治基础。古文经则是儒家的原始经典，可以引申出“民贵君轻”的说法。其实，康、梁等人是从当时新近引入的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儒家经典之中引发了一场深层而激烈的文本革命，对于皇权体制根基产生了深刻的颠覆作用。

及至1911年辛亥革命，延绵两千年的皇权帝制瓦解，民国肇始，却还调整不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发展方向。袁世凯称帝失败，确定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帝制。就在此一政局涣散的状态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参与协约国，派遣大批民工参战，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的强权政治却决定将德国占领的青岛权益转让给日本。这倒提供了一道强力的触媒，引爆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将多年积蓄的政经社会文化力量做了一次重大的集结和提升。这可从商会组织改革，民间银行崛起，北京知识精英凝聚，和新文化启蒙运动等几个环节来讨论。

^① Mary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l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先说商会组织改革，中国前现代社会原来就有绵密的行会组织网络。自从与西方国家在通商口岸大规模通商后，工商界人士逐渐学习历练，原来寄托在西方殖民企业中的买办阶级，开始蜕变成民族资本家。^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时，西方商业势力衰退，中国民族企业乘机崛起，日本商业也乘势在华扩张。此时，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很成功地集结出自己的金融体系和工商组织力量，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两方面皆有非常积极的表现，开启了一段难得的“黄金时代”。

满清政府于1902年颁布商会章程，将旧式行会改组而成现代商会组织，实际上换汤不换药，依然由传统商绅主导商会活动。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上海总商会昧于情势，采取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策，公然发布电报，主张将青岛交付日方。此事引起国人公愤，也引起内部的改革要求，正副会长被迫引咎辞职，随即于1920年8月进行董事会改选。原来三十三名董事有三十一名落选，取而代之的，都是上海实业界的后起之秀。著名的棉纺实业家聂云台当选为新会长，钱业公会的秦润卿当选为副会长。上海总商会自此焕然一新，发挥了很大的政治社会影响力^②。

民国肇始以来一直有严重的财政短缺问题。袁世凯当政时期（1912—1916），财政枯竭的状况尤其迫在眉睫。袁曾令中国和交通两家银行超额发行债券，及至发生债务危机，形成挤兑风潮，袁世凯竟然于1916年5月12日发布暂停兑现命令。当时任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宋汉章和副经理张嘉璈意识到，如果遵命执行，中国银行从此将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他们于是联合上海的银行同业，拥戴张謇为会长，组成股东联合会，获得租界当局的配合，继续维持兑现，平息了挤兑风潮。经过此一事端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地位大为提高，1917年改选董事会，全部由民间

① Yen-p'ing Hao: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② 唐力行:《商人于中国近世社会》，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14页。

股东选举，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中国银行。此一举动顿时使中国银行从国家银行转变成私人民间银行。随之，交通银行发生同样的变革。1918年，宋汉章建立了上海银行公会，1920年，张嘉璈发起组织了全国银行总会。自此，上海银行家取得了自主的金融权，并主导全国的金融商业组织力量。^①

总之，袁世凯称帝失败，国家权威瓦解，上海金融界和企业界却借机脱离了国家权力的管束，取得空前未有的独立自主地位，表现了非常积极的政治主导的性格。他们在随后的“五四运动”支持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更积极地支持和指导劳工和市民进行罢工和罢市，抵制日本经济势力的扩张。他们也向上海租界当局争取扩大参与权，争取法权自主（即取消领事裁判权）。他们甚至发展出一套和西方自由主义相近的意识形态，和胡适等新派学者的观点相呼应。^② 这是一种新的政治觉醒，具有一些自由主义特性，然而也诚如法国学者 Eugene Lubot 所说，是一种“在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③ 然而中国工商界力量毕竟局限于沿海地区的大城市，特别是委身于上海的租界区，依托于西方殖民势力的保护。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局限，做了许多超乎他们力量之外的主张和行动。

及至1925年的“五卅”惨案，都市劳工的政治意识也觉醒了，正在萌芽的中国共产党顿时找到了社会力量的动员组织基础，遂以共产主义的理念进行号召，有了更粗犷的集体行动。中国于是进入到更激越的革命洪流，形成上下层社会阶层分裂对峙的态势。自此，上海商界深受威胁，开始从激进转趋保守，必须寻求军事领袖的庇护以自保。

北京大学是五四文化启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核心。然而北大却是从

① 唐力行：《商人于中国近世社会》，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11~312页。

② 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著，张富强、许世芬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9~248页。

③ 同上，p. 248。

1916年蔡元培担任校长时，才成为一所知识精英汇聚、具有庞大社会影响力的大学。北京大学创始于1898年，是戊戌变法下百日维新的产物，由梁启超起草《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高等教育学制纲要。慈禧太后回朝后，保留了京师大学堂的建制。然而在政局动荡的环境中，京师大学堂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机会。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担任首任校长，当时学校资金匮乏，办学艰难，几遭关闭。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采取兼容并包的原则办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校政改革，大举新聘教授，北大才有焕然一新气象。

以西方正规大学的标准而言，北京大学起步太晚，不合常规建制。相对于此，东京大学倒是比较按照西方大学的正规路径发展。东京大学始于1870年，原先是德川家康幕府的官学，承继日本既有的儒学、兰学和药学传统，由此逐步转型为一所现代综合大学。东京大学的师资聘任，也都可以衔接到西方知名大学正规的博士养成教育过程。东京大学和整个日本大学教育之所以能循正规历程发展，主要还是根源于日本的封建体制的政治制度。相对于此，中国是一个皇权一统的帝国，原来也该有一所规模弘远的太学。然而受制于科考制度，官学之间充斥了太多的师生门第关系，缺乏学术独立的气象。具有独立性格的知识传承反而是靠民间书院来进行，然而规模都不大，也摆脱不掉义理之学的范畴。

不论如何，北京大学是在国家和文化发展低迷的状况中，各方知识精英淬励集结而成的一所大学，直接承担了社会文化开创的使命。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陈独秀在1917年应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便将他创办的《新青年》迁至北京，延揽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北大教授参与该刊编辑。其后陈独秀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北大学生创办《新潮》和《国民》等刊物。这些刊物都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使北京大学顿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就特定事件而言，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以学生为前导的政治抗争运动，抗议北洋政府外交代表团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日本。然而在此政治抗争运动发生之前，胡适和陈独秀等人便已在北大开启了文化启蒙运动，其中以推广白话文为核心，并以此作为引介现代西方思潮的媒介。这个文化启蒙运动凌驾在政治抗争运动之上，而使五四运动具有深远的影响。不过，五四运动毕竟也是中国当代意识形态启蒙和分裂的开端。受到苏联共产革命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师法苏联的革命经验。自1920年，李大钊和陈独秀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该年8月，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党小组，10月，李大钊创立北京共产党小组。相对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发展，胡适和傅斯年等人则代表了中国自由主义的立场。

陈独秀和胡适在《新青年》共事之初，曾经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这两个概念原来是胡适从杜威引介而来，陈独秀以其独特的造词能力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个鲜活的译名，各有其重大的变化和影响。

四、胡适对杜威“科学方法”的传承及转换

胡适是第二届庚子赔款的留学生，出国时十七岁，留美时间是1910年到1917年，其中1910—1915年在康乃尔大学、1915—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在康乃尔入学时习农，大一结束后改学哲学。这里要先说一下对他后来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几门副修课以及他参与的课外活动，再谈他主修的哲学。

胡适曾副修经济理论，不得要领，到哥大后代之以政治理论，比较符合他后来发展的需要。胡适在哥大的另一副修是夏德（Frederich Hirth）教授的“汉学”（Sinology）。当时的汉学非常冷门，夏德不易找到学生，主动

邀胡适当他的学生，胡适也正好以此课程延续他自己在少年时代就很有根底的中国学问。此一衔接对于他后来搞白话文运动和考证科学极有帮助。^①

胡适在中国是以宣言自由主义闻名，然而也兼具保守主义的禀赋。这一方面他受到哥大哲学系教授厄德诺（Felix Adler）的影响。厄德诺教授伦理学，是美国“伦理文化学会”（The Society for Ethical Culture）的发起人。按美国进入福特主义大工业社会时，宗教信仰式微，厄德诺等人试图提倡一种世俗化的伦理文化运动。胡适提到，在康乃尔大学就读时有一群犹太同学组织了一个“伦理俱乐部”，曾请厄德诺来演讲，胡适当时在场聆听，“对他以道德为基础的无神宗教十分折服，因为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留学生所承继的中国文明的老传统。”^②

胡适在美国就学时，正是中国发生大革命的时期，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大变化也极感兴趣。胡适经常受邀演讲，练就了他的演讲功力。胡适也经常参加美国的学生会活动，养成了他主持会议和讨论公共议题的能力。^③胡适也很积极地参与中国留学生的活动，白话文学运动便肇始于他和梅光迪、任叔永等人在康乃尔当研究生时的辩论。^④

胡适从康乃尔转学到哥大，师从杜威，自是他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胡适指出，康乃尔哲学系崇尚“新唯心主义”（New Idealism），或可称之为“客观唯心论”（Objective Idealism），是19世纪末期英国思想家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等人从黑格尔哲学中流变而来。康乃尔哲学系教授经常批判“实验主义”，特别是以杜威为对象。胡适聆听课堂上批判杜威的讨论，同时阅读杜威的著作，反而对实证主义产生了

①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译稿之二》，台北，传记文学丛刊之五十八，1983年，第88页。

②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译稿之二》，台北，传记文学丛刊之五十八，1983年，第90页。

③ 同上，pp. 51-74。

④ 胡适：《四十自述》，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78年，第101-135页。

好感，故决心转学至哥大跟杜威学习。胡适转到哥大后，深受杜威的启迪，影响了他“其一生的文化生命”^①，而其中影响最深的，便是研究方法。胡指出，“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②

胡适在研究方法上受到杜威哪些启迪和教化呢？他提到在哥大当研究生时，很喜欢杜威早年的一篇文章《逻辑思考的诸阶段》。该文认为人类和个人思想的发展过程要经历四个阶段：其一，是固定信念阶段，容易由此形成专断的神权统治；其二，是破坏和否定主观思想的阶段，具备怀疑和申辩的性格；其三，是从苏格拉底的法则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之间发展的阶段；第四阶段，也是最后阶段，便是现代的归纳实证和实验逻辑的科学了。胡适指出，其中第三个发展阶段是一重要转折，杜威对苏格拉底对话式的求知态度颇多赞赏，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的逻辑颇有微词。

胡适表示，杜威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之所以能在中古欧洲受到重用，“就是因为教会正需要形式逻辑来支持一种信仰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如无形式逻辑的支持，便要支离破碎，根基动摇。”^③ 依据这样的理解，胡适联想到古印度的“因明学”，具有五个推论前提，对于阐扬佛法大有帮助。他也联想到古代中国的墨子，也有其推理法则，可以称之为“三表法”，对于神鬼存在的论证可以发挥功效。胡适认为，“因明学”、“三表法”也都支持了杜威的理论。“那就是一般人并不需要什么细密的逻辑。这些形式化的推理只有在一个信仰系统受到攻击、推翻至无可立足的情况之下，

①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译稿之二》，台北，传记文学丛刊之五十八，1983年，第92页。

② 同上，p. 94。

③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译稿之二》，台北，传记文学丛刊之五十八，1983年，第94~95页。

才派得上用场。”^①

胡适还非常推崇杜威《思维术》。该书认为人的思考有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思想之前奏（*antecedent*），是一种困惑、疑虑的阶段。第二阶段为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竟在何处。第三阶段（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思想者自己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方法任凭选择。第四阶段，在此阶段中，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第五，也是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求证，把他（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地）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② 在这里，胡适说明了他那句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来源和依据。

胡适接受了杜威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观点，便是重视归纳的逻辑、轻视演绎的逻辑，甚至认为后者可以用来支撑不合理的神权信念。配合杜威归纳逻辑挂帅的思维，胡适迎合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爱好的达尔文的物竞天择演化论，引介了赫胥黎（*Thomas H. Huxley*）治古生物学（*Paleontology*）的法则，称之为“萨迪法则”（*Zadig Method*）。胡适指出，萨迪是（欧洲文艺复兴大师）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小说“萨迪”里的主角。萨迪被描写成一个古巴比伦的哲学家，善用“他的常识去解释沙滩上和岩石上所发现的痕迹，或者林木里枝叶脱落的迹象。观察了这些痕迹之后，他就可推断有跑马或走狗曾途经此地；并可说出狗马的大小。这种循果以推因的办法，便是治古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以及一切历史科学的法则。这就是“萨迪法则”；人类（所发明而专用之）的法则。^③ 借此，胡适进一步指出：

①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译稿之二》，台北，传记文学丛刊之五十八，1983年，第95页。

② 同上，p. 96。

③ 同上，pp. 95-96。

这法则（萨迪法则）也正是杜威所指出的（归纳法）法则；也正是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在19世纪所说的每一个人在每日工作中所应用的法则。推理思想并非科学家在实验室内所专有；那只是人类常识上的法则。科学的法则只是把常识上的法则纪律化而已。近几十年来我总欢喜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双方之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之点，就是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①

胡适认为杜威帮助他确立了中国近千年来，至少是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古典和中国史的治学方法。其实，胡适自己说，在来美之前，便已偏好清季学界的考据之风。现在呼应杜威的科学方法概念，胡适便把“考据学”、“考证学”等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冠以 *evidential investigation* 的英译，呈现其“有证据的探讨”之特性，对“无征不信”的古典说法做了现代科学的诠释。^② 胡适很自傲地说：“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维的理论。”^③

必须重视的是，胡适深受杜威科学方法的影响，却以其自身的学习背景以及中国当时的社会需要，对杜威主义做了一些重大的取舍与转换。这当中自然包括了中美两国当时在发展上的差距。例如杜威讲实验主义，主要还是取法自然科学的实验精神，要采取“去推、去拉、去刺、去称、去量等方法”，旨在改变实验对象的组成，或调整其间的关系。杜威的实证主义呼应了美国当时盛行的科学管理精神。相对于此，中国社会当时还缺

①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译稿之二》，台北，传记文学丛刊之五十八，1983年，第97页。

② 同上，p. 96。

③ 同上。

乏那种科学实验的条件和背景。而胡适本人也具备了厚实的中国国学根基，遂将杜威的科学方法用之于“考据学”传统。对此，胡适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说明：

在我那篇长文《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原名《清代学者治学的科学方法》）里面，我便指出传统的“考据学”、“校勘学”、“音韵学”里面，都有科学的法则存乎其间；它们之间所用的治学法则，都有其相通之处。“考据”或“考证”的意义便是“有证据的探讨”。我说有证据的探讨一直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这也是一切历史科学（所共享）的治学方法，例如研究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物理学等等“所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历史科学 historical sciences 和实证科学 experimental sciences 的不同点，只是历史科学里的“证据”无法复制。历史科学只有去寻找证据；它们不能（用实验方法）来复制或重造证据。在实验科学里科学家们可以“用实验方法”来制因以求果。这种程序来制因以求果。这种程序便叫实验。简单的说来，实验就是制造适当的“因”，去追求想象的“果”。两者的基本法则是相通的——那就是去做有证据的探讨。]^①

依据这种科学考证方法的观点，胡适认为中国传统小说有两种体裁。其一是由历史逐渐演变出来的小说，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对于这一类小说我们就必须尽量搜寻原作者的身世和传记数据，以及作品本身版本的演变及其他方面的有关资料。”其二是创造的小说，例如《红楼梦》。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提到：

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著者”和“本子”）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能搜集的材料，参照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董小宛考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能把将来的

^①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译稿之二》，台北，传记文学丛刊之五十八，1983年，p. 193。

《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①

胡适一再强调科学方法，却无意间跨足到诠释学的领域，采取了文本分析的研究途径。按当代论述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胡适此处采用的其实是一种旧式的文本论述分析，重视“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新式的文本论述分析则是强调“读者”（reader）和“文本”（text）两个问题。在20世纪初期，胡适还无法意识这当中的分际。这要等到现代诠释学和当代语言学全面浮现，特别是文本论述分析等研究方法广泛使用之后，我们才能看到这当中的差异。就此而言，杜威的实用主义可以说是其后续实证主义的一个前奏。胡适在其个人的知识成长历练中，以及在中国的文化启蒙的大转型中，正好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又处于中外衔接之处。他将杜威的科学方法运用在中国古典文献和文学的考证上，不自觉地走上了有别于杜威的实用科学，更有别于后来的实证主义科学，而走上了“诠释科学”（interpretative science）之路。关于这一变化的特性要等到后面讲后实证主义转折之时才能辨明。

五、从实证科学反观杜威实用主义科学方法

胡适在北大任教时曾邀请杜威来中国讲学。杜威于1919年五四前夕来到北京，在中国停留了一年，到北大和中国其他各地大学演讲，深受学界欢迎。翌年，蔡元培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罗素在1920年10月来华，在中国停留了九个月，做过一系列演讲，可能由于题材比较艰疏，学界反应比较不热烈。然而罗素却代表一股欧洲正在崛起的科学哲学趋势。罗素偏重数理逻辑，提拔了一位后来影响更大的奥地利哲学家维根斯坦。他们两位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学者启迪了新的哲学思潮，在20世纪20

^① 胡适：《红楼梦考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

和 30 年代集结成“维也纳学圈”，以逻辑实证论或实证主义为号召，试图开启欧洲自伏尔泰以来的第二度理性主义启蒙运动。

实证主义在二次大战前后进到美国，在当地实用主义的基础上大行其道，使美国政治学走上了更具科学性格的行为主义（behaviouralism of political science）的路径。美国毕竟是从欧洲延伸而来，故重视西方世界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形成及其国际关系，强调西方政治史和政治哲学的传承。沿此脉络，美国也有其自身的独特发展经验。美国在 1776 年独立建国，是第一个成文宪法的国家，至 19 世纪中叶，累积许多宪法判例，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以及实际效用。基于此一传承，美国政治学是以宪法为主轴，然后延及行政法和国际法等领域。这种以国家为主体和以公法为基础的政治学，便形成传统政治学的知识范畴。

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之后，在实证主义或逻辑实证论的基础上，产生了实证科学方法论的觉悟和要求，借此对传统政治学展开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传统政治学专注于法律、制度和历史的研究，而未能深入人们的实际政治行为。行为主义在这一方面的批判的确能打到传统政治学的一些要害，故能形成行为主义革命的气势，开拓了一些新的学术领域，包括选举研究、民意调查、政党政治和利益团体等方面，有其可观的成就。

然而政治学行为主义革命最引以为傲的表现还是在实证科学方法论上的突破。这可从逻辑和实证两个基本原则来说。关于逻辑，政治学方法论兼顾归纳法和演绎法，而以后者为依归，特别是以 Carl Hempel 的“律则涵盖性的解释或预测模型”（nomological model of explanation 或 covering-law model）为圭臬。这个模型的演绎推理结构其实是以古典定言三段论法（syllogism）的演绎推论为骨干，而以“律则”（law）作为演绎推论前提，试图达到有效的解释和预测。

举例来说，逻辑教材中谈到定言三段论法最常举的范例是，苏格拉底为什么会死？其推理大前提是：若是人，则会死；小前提是：苏格拉底是

人；结论是：所以苏格拉底会死。

政治学方法论教材中最常用的律则涵盖性的解释模型的范例是杜瓦杰定律（Duverger's Law）。为什么英国会产生两党制？其作为推论前提的律则为：若采用小选举区则会产生两党制；起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s）为：英国采用小选举区；结论为：所以英国产生两党制。实证主义者强调，律则涵盖性的演绎推理模型是唯一正规的科学解释或科学预测途径。

至于要如何找到涵盖性的“律则”呢？靠归纳法，逻辑实证论者特别强调 E. Nagel 所发展的“实证原则”。假设是未经证实的通则，律则是通过证实的通则。这证实的手段便是归纳逻辑的运用，具体而言便是要采纳证据，以人们直接或间接观察得之的证据来验证假设，经得起实证考验的方能成为律则。实证主义要求证实的手段可以重复出现，A 做的证实过程和方法得到的结论，B 循同样的证实过程和方法也能得到同样的结论。

整体而言，逻辑实证论主要还是从自然科学，特别是从古典物理学，累积出来的科学哲学观和研究方法，抱持着一种典型的笛卡尔式信念，认为有外在客观实存的知识，可从渐进的步骤得到超越时空的“律则”，积累成“有系统”的科学知识。这样的科学哲学观从维也纳学圈开始推广，在二战前后成为西方哲学界的显学。行为主义政治学试图以此作为建构知识的基础，期望建立一种完整的政治科学知识系统。基于此一信念，行为主义政治学在其最盛之时曾经宣告“历史的终结”、“政治思想终结”和“意识形态终结”，期待自己可以像古典物理学那样，建立一种以超乎时空的科学律则为基础的知识体系。

其实，行为主义政治学主领风骚的时间很短，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便开始有后行为主义的革命（post-behaviouralist revolution），对行为主义政治学展开批判，指其偏离现实，不能面对当时层出不穷的国际和国内冲突，例如越战和黑白种族问题等等。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反映了美国学运世代（1968—1975）的观点，要求关怀实际问题，由此产生了公共政策新课

题以及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社会学等一些跨科际的新学科领域。不过，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并未能采用同时期的后实证主义来扩大自己的方法论观点，而仍然依附在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理论基础。自1973年，理性抉择政治学挟理性抉择经济学的声势成为新的显学，以博弈理论作为推理基础，高度发扬了实证主义中的数理形式演绎逻辑，却往往不符实证原则的要求。此就实证主义的严格标准来说，理性抉择可以算是具有启发功能的“科学模型”(model)，借以引发一些大胆假设，却不能算是真正的“科学理论”，因为没有实证基础。至于比较能满足实证原则的统计调查研究，不断地以归纳逻辑采纳证据，在选举和民意等课题中累积成果，却也难以成就严谨的科学律则或科学理论，也无法有效推广至其他研究领域，尤其无法照顾具有宏观发展特性和具有思想意识特质的课题。^①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T. Skocpol等政治社会学者曾经有《把国家找回来》(*Br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呼声，可惜也未能摆脱实证主义的思考模式，而未能在美国开创新局。

至此，美国政治学号称“多元”，却没有共通的学术底盘，而形成一种“分桌吃饭”的格局。^②由于无法在基本范畴中厘清自己“科学”属性，政治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遂在次要范畴中强调“量化/质性”二分法，而以量化来作为体现实证主义的表征。依此，理性抉择偏重博弈数理推论，实证经验研究偏重统计调查，最具科学外貌，相关论文也就特别容易在美国政治学会的旗舰学刊APSA发表。其他研究领域的论文就只能在各自的专业刊物或地区政治学会刊物发表。这就造成了学术信誉的差别待遇，长年酝酿，终于引发了2001年美国政治科学改造运动，对偏重数理形式的领域，特别对理性抉择政治学，展开了强烈的批判。APSA以折中妥

① 徐振国：《政治学改造运动的争议和启发：从“通则”到“脉络”的转向》，《政治社会哲学学报》，2013年第45卷，第26~35页、第46~51页。

② Gabriel Almond: *A Discipline Divided: Schools and Set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0.

协的方式应付挑战，但没有真正解决政治“科学”属性的内在纠结问题。

从政治科学发展的困境，回头看杜威倡导的实用主义科学民主观，有三方面值得检讨。

第一，关于“科学”和“民主”的影响和约束。杜威提倡实用主义的时代，是美国经历了南北战争之后，宪政基础稳固，开始进入大规模生产的企业资本主义和大众民主政治的时代，亟需新的学术理论和价值信念，故凝聚出“科学”和“民主”两项主张，由此奠定了“政治科学”的名目以及发展方向。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国力更是大幅上升，科学和民主两项概念益形巩固，相互加强。自此，民主代表的不仅是美国人的成长经验，也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发展趋势，成为对抗苏联共产集团的意识形态。于是，“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集结成普世价值观。自此，民主和科学成为支配美国政治学发展的核心概念，固然开创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却也严重地限制了政治学的整体均衡发展。例如，美国政治学者偏好探讨“威权转型”和“民主化”等课题，却很少采用英国学者开启的“新国家论”（neo-statism）观点来全盘检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以及探索非西方国家的发展特性。^①而更明显的错失是，美国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未能顺势转进到后实证主义，而一直停留在实证主义的框架中，不断地重复一些对实证主义批判和维护的争议。

第二，关于偏重归纳逻辑或偏重演绎逻辑的问题。如前所述，杜威重归纳逻辑轻演绎逻辑。他欣赏苏格拉底以对话的方式追求知识，不喜欢亚里士多德以“三段论式”的逻辑来定夺知识的特性。照胡适的说法，杜威认为中古欧洲特别喜欢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就是因为教会正需要形式逻辑来支持一种信仰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如无形式逻辑的支持，便要

^① John A. Hall and G. John Ikenberry: *The Stat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徐振国:《中国近现代的“国家”转型和政商关系递变》，台北，韦伯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第213~240页。

支离破碎，根基动摇。”杜威甚至不喜欢牛顿的力学三定律，担心是在延续某种绝对主义的精神，而破坏了实事求是的求知态度。相对于此，实证主义在科学方法论的概念上偏重演绎逻辑，认为律则涵盖性的解释模型是唯一合法的科学解释途径。平心而论，实证主义并无借此建立绝对主义的意图，因为他所强调的“律则”，必须经历不断地“是证”或“否证”的检验。问题在于，这样不断检验的作为，却往往将辛苦求证得来的科学概念和通则暴露在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以政治学的选举研究而言，不断地进行统计调查，却也难归纳出普遍性的科学律则，故难以提升到演绎推论的境界。在此一漂泊不定的状况下，理性抉择政治学遂以营救者的姿态出现，认为自己是“将政治科学这艘将要沉没的破船”带进安全港的一艘拖船。反对者却认为理性抉择是海盗，将政治学挟持到一座荒岛。^① 他们指出，理性抉择政治学的问题是强调了经济学“理性人”的前提设定，过度地运用了数理形式演绎逻辑，无法履行实证科学的实证原则，也扭曲了政治学在理性人之外的广泛特性。

第三，忽略亚里士多德在三段论和修辞学上的均衡发展。政治学者喜欢把亚里士多德当作最早的政治科学家。亚氏搜集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宪法而写出早期政治学的作品，的确有其科学研究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亚氏开启了古典定言三段论法，奠定了形式演绎逻辑的基础，长期影响了西方人的推理思考模式。如上所述，此三段论法的推理模式后来也隐藏在实证科学“律则涵盖性的解释或预测模型”之中。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亚里士多德也同时开启了西方古典修辞学（*rhetoric*）的传统。当代论述语言学者便认为自己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传承。就此根源而言，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及后来的实证主义都有其共同的缺陷，就是以正面或以负面的观点看待三段论法的重要性，却忽略了修辞学的价值。这里必须提醒，修辞学不单

^① Gregory J. Kasza: “Perestroika: For an Ecumenical Science of Politic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34, (2001), p. 595.

纯是文章辞藻的修饰，而是包含了作者和读者之间互动关联，呈现了诠释学或论述语言学的沟通理论，也隐含了辩证法的思考逻辑。而论述语言学再现的意义必须放在后实证主义的发展脉络中来理解。

六、后实证主义与论述语言学的合流： “注疏”和“考证”的新意涵

1970年前后，西方知识界产生了各种名目的“转向”，包括“诠释转向”、“语言学转向”、“修辞转向”、“叙事转向”、“历史转向”、“隐喻转向”、“论证转向”、“文化转向”或“实践转向”等等，^①都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实证主义或逻辑实证论进行批判或修正，而试图移转到新的学术方向。这些转向当然各有其宗旨，相互交错，蔚然成一股新兴的学术趋势。这个新趋势也代表了美国学运时代（1968—1975）的知识兴趣，其后广泛地影响到文史哲艺等各种领域的发展和交融。其实，美国后行为主义政治学革命也是这个新趋势中的一环，由此开展了公共政策的新研究领域，也采纳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素材，包括诠释学、现象学、新左派、后现代主义等等。诠释学派特别有助于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的复苏，却未能取得主流的学术地位。政治学门当时是以理性抉择的数理演绎逻辑来挽救自己实证科学的“科学”地位，受到民主科学观的美国政治经验的限制，而未能跟上20世纪70年代的学术知识转向，因而在政治学方法论的层次上形成停滞落后的状态。

政治学者要化解自身学术发展的危机，就不能一直停留在实证科学和诠释学的对峙的争议之中，而必须借重西方哲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对奥地利哲学家维根斯坦（L. Wittgenstein, 1889—1951）前后期哲学转变的新

^① Dvora Yanow and Schwartz-Shea eds: *Interpretation and Metho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Interpretative Tur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6

认知，来界定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转变的性质，也才能借此理解 20 世纪 70 年代众多“转向”的意义。所谓维氏前期哲学，可以维氏 1914 年出版《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为依据。维氏当时受到罗素的大力提拔，崇尚理性思维，对“维也纳学圈”在逻辑实证论上的开创有重大启迪。维氏后期哲学可以 1958 年英文出版的《哲学调查》(*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为依归，和逻辑实证论分道扬镳，对于科学哲学产生了新的看法。在西方哲学界，维根斯坦和“维也纳学圈”之间的分合是一段非常重大公案，曾引起许多讨论和争议。

维氏前后期科学哲学观点的转变可以引伸出许多哲学专业课题，笔者按照本文的旨趣，依据科学哲学教授苑举正的说法，简化出三个要点。

其一，关于科学范围的问题：维氏前期哲学要求以明确的理论、清晰的语言和切合于实证原则的命题方式来界定科学的范围。维氏后期就不再追求这种为科学设定范围的努力。其二，关于语言的性质和功能：维根斯坦前期重视理论语言，后期则回归到日常语言，试图在那种具体、复杂、多面以及不确定的状态中找到一些可以化解混淆的途径。其三，关于一元和多元的立场：维根斯坦前期采取一元立场，认为只有在严谨的自然科学命题中，可以建立唯一正确而严格的方法。维根斯坦后期则主张要还原语言的复杂现象，要掌握语言游戏中说法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来呈现语言中的事实。维氏甚至认为“我们不应发展任何理论”，“我们无须任何解释，因为仅凭叙事即可取代它的地位”。^①

维根斯坦后期哲学最重大的一个启迪，便是重新认识日常语言，由此开启了当代科学哲学的新视域，可以和当代文史哲艺诸领域展开许多有意义的互动，衍生出许多崭新的知识领域。按实证科学的语言学立场，系采用分析语言学 (*analytical language*) 主张，强调了“定言三段论法”中的

① 苑举正：《维根斯坦哲学对后实证科学哲学》，《东海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 年第 45 卷，第 427~454 页。

“定言”特性，而用“名目定义”(nominal definition)的手段，试图对科学概念进行精确的界定，以便于做实证检验。例如政治学方法论中最常举的范例是 Robert Dahl 对“权力”一词的界定，“A 让 B 做 B 不愿意做的事，便是 A 对 B 有权力”。实证主义采用名目定义的方式界定概念，原来有其良苦用心，旨在超越人们的日常语言之外，建立一套科学专业理论语言。在自然科学界，依循此途径的确可以开创出一个完整的学科专业语言世界。例如中英文日常语言中的“水”或“water”，化学家便是按分子结构而精确界定出 H₂O 的概念。相对于此，政治科学一直无法超越日常政治语言之外，建立一套自己专属的语言系统。

后实证主义偏重日常语言的态度，突破了分析语言和演绎逻辑的藩篱，而能和当代语言学的发展合流，而形成许多新的学术发展趋势。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一位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语言学家，从日常生活语言来了解语言本身的特性，而开启了当代语言学。然而索绪尔的重要性要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之后，也就是和后实证主义的新语言观相契合之后，才获得西方知识界的普遍认识和肯定，由此开展出当代语言学的许多支派。前面提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诸多“转向”，其中“诠释转向”、“语言学转向”、“修辞转向”、“叙事转向”、“隐喻转向”、“论证转向”都和当代语言学的发展有密切关联。

在上述诸多转向之外，还有一种更深层的转向，便是当代语言学和计算机科技结合，衍生出来的计算机语言学或计算语言学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可以称之为语言数字化转向。^①在此，我们先要改变一个常识性概念。一般我们都说计算机是计算器，其实计算机更是一种语言，一种由“0”“1”组成的计算机机械语言。就此而言，比尔·盖茨提供的微软书写

① 徐振国：《内容及文本内容分析》，瞿海源、毕恒达、刘长莹、杨国枢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质化研究法》(第二册)，台北，东华书局，2012年，第272-274页。

系统，就是一座人和计算机之间的语言沟通平台，可以快速传译双方的语言，按照人们的要求来达到书写功能。

计算机是西方国家的产品，善于应用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软件程序中充满了 if-then 的语法，便是要掌握计算机文本中的因果演绎。然而，计算语言学在整体运用上却有深刻的东方思维特性。以《金刚经》为例，经文本本身不长，却有数量庞大的各家注疏，各自因时因地因事来解说《金刚经》的意涵。政治学中的《宪法》，其本身条文也不多，然而在《宪法》的履行中，可以产生很多解释上的争议，往往交付最高法院或宪政法院进行解释，由此可以累积出许多《宪法》判例，不断地扩大了宪法学的内容。这就是诠释学的“诠释循环”特性，其中蕴含了总体和个体的论证循环，呈现了辩证逻辑的性格，而能彰显整体宏观的发展脉络。

《宪法》、《行政法》和《国际法》都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公法，是传统政治学的主要内容。时至今日，依然是政治学系的必修课，却因缺乏方法论的支持，而退居到次要陪衬的地位。其实，各类公法以及相关之实施细则和各类判例，近年来已经集结成大量的公法文献电子文本数据资料库。至于其他历史文献以及重要的报章杂志，也都在不断地累积出大量的电子文本数据库，是研究政策议题和意识形态的好材料。可惜的是，由于过度偏重实证科学方法论的思维，忽略诠释科学方法论的性质和落实基础，而未能充分认识大量电子文本数据库的使用价值。

2014年，黄一农院士将其三十多篇论文集结成《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一书，强调以大数据的方法解《红楼梦》。黄一农是一位天文学家，原来就善于从中国古籍中采集天象资料，作为现代天文科学的用途。时隔大约90年，黄一农从古籍处理的基础转而研究《红楼梦》，和当年胡适的红学研究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对照。他取得新信息科技的优势，采用大数据的研究方法，在70亿字的古典文学检索数据上进行参照比对，故能全面地呈现《红楼梦》故事和清朝历史之间的呼应关系。黄一农指出，“大

数据分析已经广泛运用在商业、工科等研究领域，唯独人文科学尚未普遍。”^①当前大数据分析需要融合数学、统计、软件三方面的专业，信息业界正在全力以赴地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按照实证政治科学过去的发展经验，一再强调“质性/量化”分际、而以量化作为科学化的表征，走向数理为标杆的技术性发展，严重地扭曲了政治学的本性。大数据的研究，应该以后实证主义和论述语言学的脉络之下看“资料科学”（data science）的发展，通过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等层次看待信息科技的进步。在此，重复前面引述过的胡适的一段话：

我说有证据的探讨一直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这也是一切历史科学“所共享”的治学方法，例如研究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物理学等等“所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历史科学 historical sciences 和实证科学 experimental sciences 的不同点，只是历史科学里的“证据”无法复制。历史科学只有去寻找证据；他们不能“用实验方法”来复制或重造证据。在实验科学里科学家们可以“用实验方法”来制因以求果。这种程序来制因以求果。这种程序便叫实验。简单地说来，实验就是制造适当的“因”，去追求想象的“果”。两者的基本法则是相通的——那就是去做有证据的探讨。）

在实证主义巅峰的时期，胡适的这段话是不会被肯定的。然而在后实证主义时代，再加上论述语言学的发展，胡适的这段话便有其超前于时代的意义。就此而言，黄一农的红学考证固然突破了胡适的一些见解，在方法论上却有其继往开来的传承。

^① 徐振国：《内容及文本内容分析》，瞿海源、毕恒达、刘长萱、杨国枢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质化研究法》（第二册），台北，东华书局，2012年，第272~274页。

七、结论

民初五四时代播下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颗种子，对于当代中国的知识发展和政治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以“科学”为主轴，并刻意以美国“政治科学”的发展困境作为参照，借以呈现民初“赛先生”的根源、性质及后续转折。

“德先生”和“赛先生”主要是由胡适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引介而来。杜威时代的实用主义，呼应了美国现代企业资本主义的崛起，也反映了美国大众民主政治发展的需求。自此，美国超越了旧式的新教论理观，而开创出新的科学哲学观与新的政治意识形态。

相对于此，五四时代的中国正经历了空前未有的国家结构转型，从两千年的皇权帝制转变为现代主权国家或现代共和体制国家。“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引进成功地取代了“三纲五常”的旧思维。然而，中国当时正处于文化启蒙的阶段，现代民族企业也正开始要居于主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上苏联共产革命的开启，更是形成了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并提供了政经社会变革的动力。中国现代知识精英在五四时代快速集结，随即发生了重大分裂，形成左右政治势力长期对峙的态势，促成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后来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纯就知识发展的趋势而言，杜威时代的科学概念传承了西方第一次启蒙运动的精神，强调归纳逻辑的科学特性，反对宗教迷信和形上哲学。杜威倡导的实用主义反映了同时期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的工业科学管理的精神内涵。杜威时代的科学观尤其促成了美国“政治科学”的诞生，并以科学概念来批注美国大众民主政治的特性，形成一种多元价值和利益弹性组合的“自由派主体论述”，由此确立了美国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

胡适深受杜威科学方法的影响，服膺归纳逻辑科学特性，担心亚里士

多德式的三段论法隐含了定律式的演绎逻辑推论，容易让人用来支撑宗教和玄学的教条。胡适本人的国学背景，却让他将杜威的科学方法做了重大的转换，用来衔接中国传统学术的“考证”方法，以文献或文本作为科学考证研究的基础。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开始倡导白话文，五四时代扩大为白话文运动，成为新思想和新观念的传递媒介。从现在回头看，胡适偏重史料和考证的用心，实已偏离了实用主义以及后来实证主义的发展路径，而开启了诠释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

至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术界接受了欧洲实证主义观点，企图展开西方的第二次理性主义启蒙运动。政治科学由此提升成行为主义政治科学，重视实证科学方法论，强调逻辑和实证两项诉求。逻辑方面超越了早期理性主义所强调的归纳法，偏重演绎法，而以“律则涵盖性的解释（预测）模型”为主臬，借以达到有效的科学解释和科学预测。归纳逻辑依然有其功能，强调实证原则，举凡科学概念的界定和科学理论的建构皆需经过严谨而可重复的实证检验。实证政治科学仰赖这样的逻辑实证论，其实是以古典物理学为参照的研究方法，期待科学律则的建立与运用，借此可以跨越历史、制度、思想和意识形态等具有规范价值信念的羁绊。然而，杜威时代便建立了科学和民主相依存的思维，二战之后此一思维益形巩固，民主的信念更是扩大为普世价值，遂使美国政治科学偏重选举和民意调查等以个人政治行为为基础之微观研究，而忽略了国家论等宏观研究课题的开发。此外，在实证科学方法论的驱策下，强调质性/量化的二分架构，以量化或数理推论为科学的表征。故弱化了政治学原来以公法文本和公共议题为基础之研究范畴。还有，美国学界实施同侪学科评鉴制度，徒使居于主流的量化研究或博弈数理推论获得更强固的学术优势地位。这就形成 Ricci 所说的，在政治、科学和学科三方面朝不同的需求发展，造成政治学门中难以化解的内在纠结，因而衍生成一场无可奈何的希腊式“悲剧”。

实证政治科学或实证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是在语言的运用上有其严重的自我设限。为了配合演绎逻辑和实证原则的要求，实证政治科学采取名目定义的方式界定专业科学概念，却往往无法超越日常生活语言范畴和特性。哲学家维根斯坦早在逻辑实证论崛起之初便意识到此一问题，故从日常语言的基础上重新建构科学哲学观，而开创了后实证主义的新路径。后实证主义的发展和索绪尔早在20世纪初开启的当代语言学汇合，而形成20世纪70年代以语言学为核心的各类学术知识“转向”。在同一时期，美国政治学界曾经发生后行为主义政治学革命，指摘行为主义不务实际，而强调公共政策的重要。可惜的是，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未能抓住后实证主义的新趋势，故未能建立出符合其本身需要的方法论基础。

其实，后实证主义必须和计算机语言学结合，才能充分展现其为诠释社会科学的特性。后实证主义科学的特性，不再以追求律则为第一要义，而是以周全而细致的描述来呈现事态发展的情境脉络。自计算机语料库和各类电子文本数据库出现后，这样以细致描述为主轴的科学研究方法就获得了具体落实的基础。就此而言，黄一农的红学研究是一重要案例，在实质见解上和胡适固有重大差异，在方法论上却呈现了一脉相承的学术关联，见证了诠释科学方法的可行性。循此途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如能善用蕴藏丰富的公法文本和公共议题文本数据库，便有可能实现美国政治科学改造运动所呼吁的：建立“政治学的周全科学”（For an Ecumenical Science of Politics）。

民本主义与近代日本国家构想

——以吉野作造对山东问题的立场为中心

朱坤容*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状况

大正时代（1912—1926）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个中间时代，前承开启西化的明治时代（1868—1912），后接国家统制的昭和时代（1926—1945）^①，但正是这一中间性的特质，使得近代国家发展也是歧路丛生。在这期间，日本的政党力量在第一次护宪运动（1913）取胜，军部暂时妥协，日本国内开始从藩阀政治走向民主政治；而大正民主运动更是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上一段民主政制的表征。相应地，知识界主流也注重个人发展，强调自我精神与文化教养，提倡扩大民权。在这过程中，宪政学者美浓部达吉（1873—1948）和吉野作造（1878—1933）的政治思想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推动了日本战前宪政体制的发展。具体而言，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美浓部 1912 年在关于宪法的讨论中，认为天皇只是行使

* 任教于中山大学。

① 昭和时代虽然时间跨度上是从 1926 到 1989 年，但因为日本在二战战败后盟军进行民主重建，所以一般都将 1945 年作为历史分界，划分为昭和前期与战后，本文昭和时代指的也是昭和前期。

国家统治权的机关，这一观点通称为“天皇机关说”，这一思想虽然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种种讨论，但最终赢得了国民的认同以及学界的广泛支持，成为了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前半期通行的宪法学说。与之相呼应地，同属一个学部的吉野也积极倡导“民本主义”（democracy），与美浓部的理论一起成为了大正民主理论的重要支柱，共同推动了普选等宪政体制的发展。

既然当时是民主政党政治的发展时期，那为何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整个国家迅速走向举国一致的国家统制道路？知名的大正时代研究学者竹村民郎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和批判：“对于日本此时代的历史研究中，经常可以看到将吉野、美浓部等同于民主主义担当者的评价，这是我无法赞同的——对所谓‘大正民主运动’的过大评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并且，太过于强调‘大正民主运动’的力量，不只是对所谓的‘大正民主运动’的发展，甚至对于1930年看待为何出现国家总动员体制，都将是相当有疑问而无法正确回答的。”^① 这里给予了我们一个提示，吉野与美浓部的理论与现代“民主主义”有区别吗？或者说他们提倡的现代政制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体制？

在官制和帷幄上奏权的庇护下，政治上试图与之抗衡的政党力量无法扼阻军事行为。那么相信民主政党政治的日本知识界是如何看待国权扩张行为呢？一战之后的山东问题，众所周知，军部是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侵华扩张道路的最大推手。对于这一旧世界体系结束，新的国际关系形成的过渡期，日本的知识界立场有不同的声音。与美浓部不同的是，吉野除了作为法学教授在学院内讲授其政治思想外，同时也是一位活跃的著名时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时评和讲演在当时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知识界的代表人物。本论文就以他的立场为中心，考察山东问题

^① 竹村民郎著，林邦由译：《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台北，玉山社，2010年，第218页。

中存在的思想性问题，也就是从思想的角度来讨论日本知识界对于山东问题的认识，从而试图揭示日本近代国家构想中对内民主诉求与对外民族诉求的统一路径。

关于吉野作造^①的研究，目前国内集中于他与中国的关系，比如与李大钊的交往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吉野的近代中国观等等，以民本主义与立宪政治为角度的研究还很不充分。^② 如果以他的民本主义学说为视角，结合其宪政法学者的身份，来说明其对于中国问题的立场，应该会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来理解吉野的中国认识，同时也有利于在具体层面探讨日本近代的国家构想。本论文就试图以这样的角度来探讨吉野在山东问题上的立场，从而对山东在一战之后的命运提供一个思想层面的解读。

二、吉野作造及其对山东问题的立场

吉野作造一生对中国的命运投入了相当大的关注，积极参与实践并给予行动支持，而这与他和中国学界政界要人的交往有着相当大的关系，这从其生涯就可以窥豹一斑。1906年（28岁），他在友人斡旋下担任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1907年开始担任北洋法政学堂的教习，负责政治学和国法学，李大钊是其座下弟子；1914年在日本为革命流亡者所新设的政法学校中担任政治史的教席，戴季陶成为了其好友。此后，他又与国民党的黄兴、张继、廖仲恺等相识，深得革命党人的信赖。作为法学博士的学者吉野在教育领域内对中国革命予以积极支援，通常是以培育政治学和法学的人才或普及政治学基础教育为主。此外，五四运动时期，他积极为

① 文中所引吉野作造的文章都出自《吉野作造选集》，共十五卷，别卷一卷，东京，岩波书店，1995—1997。下面只注明单篇文章名。

② 在讨论中国问题相关的研究中，代表性的研究有黄自进的《吉野作造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与评价 1906—1932》（台湾“中央研究院”，1995）。

营救在东京遭到检举的中国留学生奔走，同时撰写《不要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骚扰事件》等文章，支援北京的学生，呼吁善待参与运动的学生，表现出拥护五四运动的态度。总的来说，吉野对于中国抱着“亲善”友好、日中合作的态度，这在李大钊日后对吉野的信件中可以佐证，而对于日本政府日益暴露的政策侵略性，吉野也是持批判态度。^①

山东问题，虽然同样是他对近代中国命运的一种关切，但因为日本对山东权益的利益需求，使其立场里不可回避地表达了对于近代日本国家的发展道路的忧虑。吉野对于山东问题的评论连载于《大阪每日新闻》(1919.5.20—1919.5.26)^②，就其论及的中心来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山东问题的产生原因。吉野认为，一方面是日本颠倒了处理事件的顺序，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外交上的失误，即要明确“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中是以怎样的形式来被要求的”？

就日本的问题而言，原本的既得权利因为中国的参战而出现了新的情况，由此导致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争执。吉野指出，山东问题上的“利益关系是单纯的，其他的占领地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而山东只有日本的利益关系，其他的利益关系极少。此外，山东问题已经是关系国与关系国之间无异议地予以解决的既定事实”。本来的利益顺序是德国和日本之间首先制定协定，然后获得中国承认，这样日本的权利得到确认，山东成为日本所有。但日本颠倒了顺序，因为离获得与德国之间的协定尚远，以他日

① 例如1919年6月15日李大钊在给吉野的信中请求其为陈独秀的被捕声援，并认为“尊论正大光明，当酌为发布，示之国人”，目的也是希望作为“识者”的吉野能够将五四运动的目的向国人说明，即“反对侵略主义，反对东亚的军阀，对于贵国的公正国民绝无丝毫的恶意。”（《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书信”，人民出版社）再如，从《二十一条》开始，吉野从原来拥护日本政府转为批判的态度。参见黄自进：《为何是吉野作造——近代中日关系史考察》，“なぜ吉野作造なのか——近代日中関係史を考察する上で——”，月报14。

② 本论文“山东问题”引文出自《吉野作造选集》第九卷中的《山东问题》。

能见到与德国的协定为条件要求中国的承认，即山东的日本权利在将来获得德国的承认的话，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承认下得到的认定。但是1917年中国加入了欧战，作为参战的结果，日本的利益情况产生变动。

就中国的失误而言，概括来说，(1) 商讨的对象不对。吉野认为中国如果要求利权的话，不应该与日本进行辩驳，“这完全是走错了地方”；应该与协约国辩驳，即在和会上向英国、法国、美国等申请。因为一战并非只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双方战争，而是一个众多国家都参与的世界性战争，所以山东问题也“不是个别的局部性地主张的问题，必须说是一个普遍问题”。(2) 商讨的方法不对。他认可参战国应该得到一些利益酬劳，“作为其结果一定要日本付出点牺牲的话，对日本首先有这样的要求的话，那是妥当的”；并且作为劝战者的日本“必须负上很大的责任”，所以，“日本如果有道德上的义务的话，那么（中国的主张）也是正确的主张”。但是吉野同时也指出：“对于中国参战，从道德的义务关系出发，要求日本做一些权利的让步的话，那么在巴黎应该不是用这样粗暴的方法而是必须用稍微道德的方法。这是中国外交的失误。”“现在假如我是中国人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应该极为遗憾的地方。”(3) 商讨的理据不对。一是，根据国际法，因为战争而使得所有条约无效，这是错误的。^① 二是，日中之间缔结的条约全是由于日本压迫的结果所以无效，这样也是没道理的。综合日中两个方面，概言之，吉野从战争参与、道德的以及法律的角度来评论，认为中国并非没有理由获得山东权益，但中国外交的方式必须改善，而在商讨的理据上日本劝其参战的道德压力是重要的因素，而非条约本身的无效导致。

我们可以看到吉野的误区在于，将山东问题视为日本与德国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而跳脱了中国的立场，但山东终究是中国的领土，吉野在之

^① 在当时，中国的理由是因为和德国是交战国，之前所缔结的所有条约都无效，基于德国的权利随着条约无效而无效，所以德国权利自然归还中国。

后的叙述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第二，关于山东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一个是权宜之计，一个是根本之道，或者说一种现实的方法，另一种理想的目标。

权宜之计就是把山东问题从单边性变为普遍性，即向国联申请。他认为，战争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个别主义”到后来的“共同主义”。所以之前日德关系中，日本继承德国的权利，和德国商量就可以了。美国是不适合干涉的。现在行不通是因为“战争的精神发生了大改变”。一两年间，变成了囊括性的共同主义，众多国家都参与进来，“这一战争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全体战争”。“最初是为了利益的冲突，现在变成为了主义而战。”山东作为战争的战利品，当事国最好向国联提出既有利权。

就根本之道而言，他提出对世界的支配必须从以武力转为道德法则，法律问题的解决优先于事实问题的解决。因为他认为，利益的调和始终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必然会带有纠纷。如果在处理利害关系时，不去顾虑一个个利害，而是在道德的支配下处理，那么问题应该得到很好地解决。这也是武力与道义两种思潮的反映，吉野认为在巴黎和会上同样存在着这样两种思潮。就一战而言，他认为其无非和之前的战争一样都是为了利益的冲突，但是“一方使另一方屈服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因为战败者会报复”，这个基础上的和平只能是不稳固的，并不是根本的解决。所以“隐约感觉到国际关系是要依照新的道义原则主义来结束的”，要实现威尔逊的“没有胜利的和平”必须是用道德来结束战争。从战争的结果来看，以“世界全体”原则的确立来结束战争，国际关系的大势也从个别主义逐渐变为协同主义。吉野表示赞同世界大势以协同主义为原则，也就是说承认一切战利品都归国联所有的法则。总的来说，吉野认为世界的大势在发生变化，日本不能死守过去一成不变的立场，而应该从大局的角度来提出有理据的主张，不过他遗憾日本政府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在山东问题上，吉野并没有对山东利益的归属做出明确而坚定的表

态，只是指出了日中双方各自的问题，表达的是对中国政府的遗憾和对日本政府的失望心态。因为在他看来，不管归属何家，如果抱着利益之争的念头，不用道德来约束，始终只是暂时的解决。确切地说，他是以世界主义的立场而非民族主义的立场提出了对山东问题的思考。在这一思考上，值得关注的是他的道德为上和法律优先的济世思维，而这一思考则是与他对国家主义的思考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对于像日俄时期国民陶醉于国权扩张的状态，吉野深为不满。他批判在国外，人们倚仗着“这是为了国家”的标语而肆意行事，不符合道德精神；在国内则被教育为了国家的荣耀，国民不得不追随专制的政治思想。虽然他认为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并非全无是处，但他强调，在现实的政治世界中，需要关注到个人自由。在当下的政治社会中，既有国家加强约束力的需要，也有解放个人自由的需要，而作为与国家主义并行的民本主义可以矫正其弊害。

三、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想

民本主义 (democracy, *minponshugi*) 是吉野作造的代表性政治思想，下面通过考察这一思想来阐明其对山东问题立场的实质。

1. “民本主义”一词的产生及其内涵。

“民本主义”是 democracy 在日本的译语，首创者与使用最多的人是 20 世纪 10 年代的时论家茅原华山^①。他在 1912 年“民本主义的解释”（收入氏著《新动静中观》，东亚堂书房，1913）一文中，提出“自由贸易”和“组织内阁”是他所认可的民本主义方式。茅原提出由上而下的民主主义和立宪政治都是虚假的，强调以民为中心，为此他受到了官方的猛烈批判。茅原虽然是译者，但率先使用并使得这一概念深入人心广为人知的是吉野作造的时评，后在第一次护宪运动的影响下，逐渐成为宪政与普选的

^① 吉野作造，《民本主义鼓吹时代的回顾》，卷十二。

基本观念。

事实上，当时作为 democracy 的译语不止一个。“民本主义这样的文字，作为日语来说，是极新的用例”，（《宪政》）而民主主义、民众主义和平民主义这三种译语都有所偏颇和不够適切。比如民主主义的观点在于“国家主权在于人民”，这是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吉野对主权在于君还是民并不是在意；而平民主义则易与反抗贵族阶级这样的思想混合；民众主义则重在民众，吉野认为民本主义并不仅仅如此。最终选择“民本”，其中内含了吉野自己的意图。吉野将民本主义定义为“一种兼以普遍民众的利益幸福及其意志并重的政权实施方针”，作为一种施政方针，可以（1）尊重民众，且可以不问国体。总的来说，作为宪政精神根本的民本主义，其新颖之处正在于它是一种“政治上重视普通民众，不立贵贱上下之别，而且也不问国体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普遍适用的主义”。^①（2）用民本主义这一译语可以表达民主政治中恰切的内涵。吉野提出，在政治法律等学术意义上，democracy 这个词具有两种意义，一是“法理上国家主权在于人民”，二是“政治上国际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在于人民”。民本主义指的是第二种。吉野批评国内不顾日本与西方的区别，在两者意义上一律使用民主主义，不但混淆了观念，甚至还可能会出现“为求民主之名目，而遮蔽民本主义之真意”的情况。所以说，虽然这个“民本主义”是借用的，但吉野在内涵和意义的阐发上关注到了日本自身的独特性。

2. 民本主义的主要内容。

吉野对民本主义的阐发集中于一战时期，正式标明倡导之意的文章是

^① 吉野的思想在后来发生了转变，1920年他用“民主主义”概念将普选置于国民权利的位置上，而值得提出的是，他对民主主义的最初赞同是与中国的五四运动有着一定的联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吉野在日本东京发出对北京学生的声援，并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民本主義·社会主義·过激主義》，赞成社会民主主义。紧接着在《六合杂志》上发表《从帝国主义到国际民主主义》。可以说，五四运动对吉野思想的演变产生过一定的作用。

1916年1月发表在《中央公论》上的《从宪政的本义论其完善之路》（“憲政の本義を説いて其有終の美を済すの途を論ず”，下简称《宪政》），吉野在1928年回顾说这是以鼓吹民本主义为目的的论文。^① 1918年的《倡导民本主义之意义，再论完善宪政之路》（“民本主義の意義を説いて再び憲政有終の美を済むの途を論ず”，下简称《倡导》），对民本主义论进行了修订。这两篇文章引起了当时极大的反响，不但民本主义的观念为思想界关注，而吉野本人也因此声名鹊起，成为了舆论界关注的时论家。

在《宪政》中，吉野列出了民本主义的两项内容，即政治的目的和政策的决定。概言之，在普遍的民意下为普遍的民众服务。“换言之，一是政治行为的目的必须是普遍民众，二是政治行为的基础必须是普遍民众的意志。这实则民本主义要求的两大纲领。”

在此，民众的力量对政治行为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但《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规定的忠于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是必须坚决维护的国家精神，那么吉野是如何调和两者之间存在的冲突的呢？吉野用“皇室”视为国家这一大家庭的“唯一的宗”来化解“天皇”与“国民”在宪政体制中作用的冲突，忠于“皇室”与忠于“国家”渐趋合一，“我相信‘为国家’和‘为人民’是绝不相悖的”。

就第二项纲领而言，存在着民众意志与天皇意志可能的不一致情况。对此，吉野用回避现实程序上对天皇意志的可能“冒犯”，指出“民本主义是政治上的主义而非法律上的说明”，也就是说，主权在君，但主权者如何行使主权，两者并不是同一个现实层面的问题，前者更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一种国民情感统合国民；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立宪国家本身一开始就对君主大权进行的限制也说明了君主的意志并非是有限的。“所谓宪法的各种制度实则不外乎是以限制君主大权为目的的政治装置。只不过这种限制，客观上来看的话的确是限制，但从主观来看可以说是主

^① “民本主義鼓吹時代の回顧”。

权者应采取的‘道’。在这点上，在国体观念上，君主为最高主宰者这一条丝毫无损。”（《宪政》）也就是说，民本主义被视为立宪政治的“道”，君主意志也是被包含“道”中的。

总而言之，在封建时代的儒家伦理道德中，家国并行，忠孝两立，而君主常常以天子或神子的身份成为国家的化身，在明治维新时期重新确立的王政复古更加使得天皇神权的法理性和正统性强化，而宪法的规定则无疑使得这样一种封建君权通过西方政治组织形式元素的加入和改装，从而延续其统治的神性与威权。吉野的民本主义体现的是，将制度让位给道德，用道义取代法政，看似做出了解答，但实则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回答，而是用回避的方式再次确认了民本主义只是一种不妨碍君主制的政治手段，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吉野不但不质疑国体，而且甚感自豪。

3. 民本主义的特征。

（1）与国家主义相并行，相辅相成。这方面一个集中表现就是回避天皇制的主权论。“说到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的民本主义，那是与天皇制共存的。”^①就现代民主的角度而言，与茅原相比，吉野的民本主义的确似乎还退了一步，趋于保守一些。不过其强调的重点无疑在于施政方面打破以往的君主专制，“君主大权是否受到此种限制，实则立宪专制之区别所在”（《宪政》），即君主受限、多数决议。吉野认为，从明治开始确立的“与多数人商谈公平且正当的实施政治”（“广开会议，决万机于公论”）的方针就体现了民本主义的精神，因为君主受限的方式（元老商量决议或者议会的多数党人商量）确立的是多数人咨询的方针。在现实中，正因为与天皇制的国体并不冲突，所以没有遭到太大的批判风浪，反而在现有体制下如何突破民权的关节点上获得了广泛的呼应。从他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和天皇在“民众”为目的的施政纲领中处于并立的立场，即虽然他

^① 竹村民郎著，林邦由译：《大正文化：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台北，玉山社，2010年，第217页。

重在普遍民众，但民众自我觉醒的过程也是在参与国家构建结合在一起的，这与他早期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国家地位的认识有着重要联系。在论文《黑格尔法律哲学的基础》中，他将国家视为“内外一切最高规范的一种团体”，国家通过权力对个人从外部进行统御，从内部的精神上进行发动。他认为，个体不但被动地接受和服从国家精神的统御，而且也自发地参与构建国家魂。这一论点一直延续到此他的第一篇正式评论《本国立宪政治的现状》“本邦立宪政治の現状”（1904年2月，《新人》），而后者正是民本主义的雏形。后人曾评价他的民本主义是为了将“每个个体为创造主体性的‘团体精神’，将其发展为活泼向上并融入了个体性想法的国家魂”，由单个的个体转为国家魂，这是吉野所倡导的民本主义的目标。^①

（2）拒绝过激化的民主主义。吉野认为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相混淆的一个原因正是在革命这一阶段上。一部分人认为民本主义的确立要经过革命的阶段，而革命是基于民主主义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他同意两者在实际运动过程中是相伴而行的。“应该适当地区别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区别，说起来极容易，但在实际运用中要进行严格地区分，不得不说是颇为困难的。在这一点上，一部分有识之士对民本主义传播开来的担忧，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这里的“担忧”，在吉野的分析中，就是指类似法国革命那样的过激行为。他并不否认民本主义会导致某种程度革命的可能，也就是说在某个发展阶段具有过激行动的倾向，而这不是他所提倡的。“风靡世界的过激主义不是社会进化的必然顺序，而是一种反动的产物。”^② 不过，同时他认为起源于革命民主思想的民本主义虽然有一定的危险，但这样的危险并不足惧。他举例就像人从猿猴发展而来仍然具有猿猴的劣性一样，这样的担忧不足为取。对于一些人对民本主义发展上的担忧，吉野认为不能逡巡于这样的“弊害”而裹足不前，而是应该想办法解决。所以，

^① 吉驯明子：“民本主義とキリスト教”，《吉野作造选集》，月报9。

^② “民本主義・社会主義・过激主義”。

强调的是如何在现实中实现宪政，如何消解民本主义内在的“弊害”，而不是追究如何使民本主义纯然化。这也可以说是他为何将民本主义作为 democracy 的第二层内涵的译词。

(3) 与社会主义关系暧昧，若即若离。从 1890 年前后到 1920 年前半期，社会主义与大正民主的关系有三度交错，^① 而民本主义在后半期得到极力倡导和影响也与当时的俄国革命有关，催生了米骚动这样的社会事件。对于当时的这一社会主义倾向，吉野指出新的特权阶层——金权阶级，即资本家给予了社会主义强大的刺激。比如劳工与资本家的抗争中蕴含了社会福利在民众中予以普遍分配的精神，在这点上与民本主义是相通的，但他拒绝社会主义试图对现有的社会组织予以革命性变动。这种新的特权阶级与民本主义接触的时候，将进行怎样的调和，这是吉野“最为忧虑且关注的”。（《宪政》）虽然他承认在初期，宪政思想会被用来作为对抗特权阶级的武器，但他明确表明民本主义的“本意不在于阶级之争，对自由的尊重是民本主义的根本之意”。^② 吉野思想的土壤中与初期社会主义草创期的重合，在他的《民本主义鼓吹时代的回顾》一文中可以见到这一点，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长谷川如是闲也认为他们的 democrat 理论与无产阶级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流的。但吉野不认为“社会组织的解决是社会问题解决的唯一根本的方法”，而是转向了政治学领域的民本主义。有学者认为，俄国革命和米骚动推动了吉野思想底层的对社会主义的关心，从而推动了民本主义论的发展。因为吉野所认为的社会改造的目标是普选，是如何使国民生活安固充实，这被认为是“彻底的民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合作的实现。^③ 这些分析全都基于他对普遍民众的重视。1918 年的米骚动对民本主义者吉野和社会主义者堺利彦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此

① 参考荻野富士夫：“吉野作造と社会主義”，《吉野作造选集》，月报 15。

② “国家中心主義个人中心主義二思潮の対立・冲突・调和”。

③ 荻野富士夫：“吉野作造と社会主義”。

后，吉野止于“合作”，并没有继续和堺合作。在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等人所设立的“人心的改造”、“社会的改造”两个层面，“人心改造”是河上肇基本消除的，但为吉野所重视。^① 他们之间的差异也许就在于“人心”与“社会”孰为先后的问题上。在如何解决山东问题上，提出用道义原则来作根本解决之道的吉野无疑更加倾向于人心改造的理论，所以在政治运动逐渐占据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位置时，选择了拒绝过激主义的革命。^②

综上所述，可以说是民本主义的三个面向。反过来也体现了当时国体和政体上的基本主张给予吉野的影响。在当时，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只是反对现有的社会组织，但并不主张动摇国体的所在。就“主权在民”这一在当时是为有着极端倾向的政治思想而言，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互为转化的可能，由于这个原因，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紧密，而社会主义也有转变为民主主义的倾向。吉野同意民主主义对国体的威胁，对当局对社会主义者政治活动的严加管束也持谅解态度，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些国家里通常表现为伴随着民主共和的危险思想。

4. 民本主义的实质。

正因为吉野对民众力量为基础的社会暴动的警惕，在他的观点里，特权者与少数者并非是必须消除的存在，反而应该得到民众的追随，因为这些少数者是国民精神的指引者，甚至民众与这些特权者的关系是否融洽发展关系到社会健全与否和宪政进步与否。只不过这些少数者首先必须居于国家先觉者的地位，可谓贤人。他归纳“贤人”的特别使命是，在蒙受国家的优厚待遇之下，利用其地位，引导民众，成为民众的模范，同时又怀

① 荻野富士夫：“吉野作造と社会主義”。

② 吉野的观点在左翼运动相当激烈的时期（1925年）曾有所转变。后人回忆吉野曾很认真地谈到，当时的普遍认识是，在立宪制下，也就是与君主制妥协的情况下，逐步实现渐进式的民主主义改革，这样相当花费时间，无法坚持，还是以乘上“社会主义”这一特快列车的方式来解决，不过他始终认为“国民思想的改造”是最为重要的。参见石堂清倫：“吉野先生の思い出”，《吉野作造选集》，月报3。

着谦逊的态度成为民众的朋友和民意的代言人，于公又能守职尽责。（《宪政》）所以他提出，如果少数先觉者的见解固陋，那么即使如何提倡立宪思想普及的必要性，也无法将健全的政治思想传播到国民的心里。在这个基础上，“国民思想的进步与否，实际上决定于先觉者是否对其进行了适当地指导”。他认为多数政治如果是有群氓或愚众来控制政界的话，那么对国家的健全是不利的，必须仰仗贤明的少数有智识阶层的意见。所以虽然是“多数意志”在支配国家，但从精神层面而言是少数贤人在指导国家。

吉野民本主义，用其话来说是“主张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政治主义”，^①实质上是一种“多数人”意志与少数贤人的精神指导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总的来说，与其说他关注是由谁来支配国家，不如说他更在意支配国家者是否是有着现代宪政思想的健全的人。

四、山东问题立场背后的民本主义思想：道德支配与法律优先

对于属于国际现实政治利益争端的山东问题，为何吉野提出用自律的道德和法律学理作为根本的解决方案呢？结合其政治思想民本主义，我们看到吉野在国家构想上，不赞同激进或者过激的社会政治行为，而是以道德支配和法律优先作为处理问题的原则。吉野坚信作为历史传统的国民道德具有一种自然的调和力量，而民众教育^②，尤其是宪政思想培育则是实现现代政治构建的关键。在此基础上，遵循法律优先，解决利益中的纠纷。在这一观念背后，有这样两条信念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1. 对于作为历史产物的国民道德在国民心中的影响力抱有积极的乐观

① “国家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二思潮的对立·冲突·调和”。

② 吉野曾回忆大学时代所听的政治学讲义，当时授课的小野教授将 democracy 译成“众民主义”，且并不把政治作为统治之术，而是作为国民生活的重要的一部分，这令他印象极其深刻。这也可以视为吉野重视国民教育的一个远因。参见“民本主义鼓吹時代の回顧”。

与自信。吉野相信国民的道德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并且能够自动调和现实中的问题。例如出现“国家”与“人民”相悖时，民本主义在主权者的运用方式这一意义上，君主不应无视人民利益的原则依然有效。虽然宪法的起草者井上毅曾提出，“遵循立宪政体主义，君主不能干涉臣民的良心”^①，不过吉野认为用制度来强制有时反而使本来圆满的关系变得淡漠。因为日本的君臣关系是建立在“长期历史熏陶下的国民精神基础”上的，国民有着为陛下赴汤蹈火水火不辞的觉悟，这一点并非法律制度所能勾勒增减。所以如果要在制度上做出国家出现无视人民福祉，人民不可忍受的规定的规定的话，这种想法对忠良国民的精神抱着一种不快的情绪。所以吉野认为应当放任国民的道德判断来决定。“我们的忠良国民绝不会踌躇于为了一身安全之计还是为君国之计。毕竟，忠君思想是建国精神也是国体的精华。”（《宪政》）这一认识并不是孤立的，即便是对天皇地位进行法人化的美浓部也如此褒扬国民道德的内在结构性，“我国国民对皇室有着世界上无以伦比的崇敬忠顺的感情，这是伦理事实”。^② 值得补充的是，吉野的乐观既是对历史传统的自信，同样也与他个人的性情有关，在本质上他并非一个极端的人，而是一个注重“人心改造”力量的温和改良派。作为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③，对于如何构建一个现代的国家，不可否认在吉野的政治诉求中也蕴含着其个人的人道情怀。

2. 坚信在民本主义实现的问题上，要进行渐进的社会改良与普遍的国民宪政教育。“立宪思想的养成在今天仍然是所谓的‘当下之急务’。”吉野认为当时政界和知识界对什么是宪政，什么是立宪思想的理解并不明

① 转引自樋口阳一：《今、“宪法改正”をどう考えるか——“戦後日本”を“保守”することの意味》，岩波书店，2013年，第16页。

② 同上，第25页。

③ 大川周明在申请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时受到帝国大学惯有规则的歧视，只因是民间学者的身份，素未谋面的吉野出于同情积极为他奔走，使后者如愿以偿。参见宫本盛太郎：《吉野作造与大川周明》，月报5。

确。有识之士也好，普通民众也好，都是“不明确、不彻底”的，所以才会在朝野的政客口里出现“与立宪思想完全不相容的专制性议论”。（参见《宪政》）“宪政应是国民的德智到了相当成熟的基础上才被建设起来的政治组织。如果国民的发展程度尚浅的话，那么无外乎满足于委托‘少数贤人’即‘英雄’对管理政治这样的专制政治或者贵族政治。”如果要推动宪政制度的确立就必须让国民有宪政思想的政治认识基础。所以，对大正的教养主义理解上，除了讲爱、认知、自我等人格上的内在道德外，还包括在政治理念上的宪政思想培育。对于像日本这样的东方国家，普遍的宪政文化教养是必须的途径。“完善宪政的根本要件就是尤其要在政治上的后进国中，首先对普通国民进行德智的教养。”（《宪政》）民本主义是“以人民智识见解的相当发达为前提”的，何为“发达”，吉野认为民众只要在国事参与上，能够冷静听取各方意见，进而公平比较双方人物经历声望等等，能够判断出谁最适合奉公之职，谁足以托付大任。这样就足够了。（《宪法本义》）所以这样的国民教养的培育，他认为不仅限于学校，而且也要在社会活动的参与中进行；不仅限于普通民众，也包含上层阶级。

正因为有国民道德的基础与国民教育的需要，吉野深信现代宪政体制的建立对于日本整个国家的发展会有一个根本的促进，而与之相应地在国际上以道义作为解决争端问题的根本之道，从而建立和友邦中国的合作关系，对山东问题之类的权益也自然能有适切的解决。

五、国权主义的制衡：作为国家构想的民本主义

吉野的民本主义虽然在当时是最有影响的政治理论之一，但无疑只是当时知识界对国家制度的设想之一。但占人口总数比例 82% 的地方上，人们采取的思考方式，仍然是“将国家置于优先地位，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

思想、皇室中心主义的历史观”。^① 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那样，“这一‘感情’以不同于议会政治推进的另外一种维度，通过学校教育和兵役这两项义务教育，从而深深地嵌入到臣民的心中”。^② 在这样的国民感情土壤里酝酿的是社会激进分子所奉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国家主义的国家改造构想。一战的爆发所产生的军需使得日本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刺激与发展，但也有人认为社会问题和危机也正是在一战中得到激化。国家改造运动的活跃人物大川周明就在《日本二千六百年史》（1939）中认为一战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急速发展，贫富差距分化，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在不安之中。同为宪法学者的上杉慎吉在天皇主权论的精神指导下积极展开国家主义的社会改造运动，制造恐怖事件的极端团体血盟团正是在其直接影响下组建的。不过尽管处于两大敕语（教育敕语与军人敕语）的遏制下，作为“世界大势”的立宪思想并没有完全在日本消失。在吉野作造和美浓部达吉等宪政学者的努力下，日本近代的政治道路走得颇为动荡和诡谲。吉野批判在宪法里引用的是属于旧有国民道德基础观念的国体观念，而对用西方立宪思想来解释宪法的思潮则试图阻挠。他认为，各国立宪政治共通的精神基础是存在的，那就是民本主义。要之，民本主义是宪政精神的基础。

这是一个多元思潮激荡的时代，战前的左翼、右翼都开始得到发展的力量，而政党力量也终于在米骚动（1918）年之后成立了政党内阁（原敬）。不过，为了防止西方宪政制度在与东方原有的君臣思想发生冲突，日本选择了权力的并行，事实上最后仍然发觉是不可避免、不可调和的，只不过这个觉悟的代价远远超出了当时所有力量的想象。就政治思想角度而言，正如当代著名的宪法学者樋口阳一所指出的，敕语的问题不在于德目的内容，“问题在于作为道德源泉的天皇”，即将天皇作为了忠孝仁义的

^① 竹村民郎，第217页。

^② 转引自樋口阳一，第25页。

源泉。^① 尊皇的理念与对国家的信仰合一化且正统化。

出于对当时的官僚主义、天皇专制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抗衡，吉野积极倡导民本主义。尽管他宣称主张的并非民主主义，但在日本仍被誉为“民主主义之父”。其原因也许正在于他的抗争性与挑战的姿态。democracy原本是 demo 人民 (the people) 与统治 cracy (rule) 的结合，简言之人民的统治。在具体的阐述中，他做了独特的处理。一方面，吉野用 rule for people 取代了 rule of people，化解了总揽一切权力的天皇制度在这方面的矛盾。用政权的目标来克服或搁置主权的实质，可以说是一个很高明的策略，但事实上，在政治的具体实行上，始终无法回避天皇制在其中的决定性，而这样的决定性在消极影响上无疑是军部力量对政府的干涉。后来，他也不得不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性，分别在 1922 年和 1930 年陆续发表了对天皇统帅权和军部帷幄上奏权的质疑与批评。另一方面，吉野对普遍人民的意志即“民意”是否是一个原本实在的东西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以过于专门为由省略了。只是强调民本主义并非是一种以不存在的“民意”假定为前提的荒唐无稽之谈，然而这一民意概念上所体现的普遍性正是民本主义的局限所在。也许正因为此，后世有人将吉野的思想作为国家改造运动（大川周明、北一辉）的一个理论来源，原因在于他们对民众力量的重视一种延续性。思想史的脉络来看的话，吉野与大川、北的关系和大正民主与昭和法西斯·革命的运动有着某种曲折的延续性。^②

从本质上来说，吉野的国家构想是一种以作为先觉者的道德精英带动普遍民众觉醒为前提的施政策略，在军部的强大力量下，无疑是脆弱的，根本原因就是始终被定制在帝国体制的大架构里。所以有学者尖锐地批评，“吉野、美浓部在象牙塔的面具之下，有系统地培养日本帝国的‘一

① 樋口阳一，第 25 页。

② 松本健一：“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昭和ファシズム革命へ”，月报 5。

流’精英官僚，他们的责任绝对是不轻的，不是吗”？^① 但对于这样的立宪政治体制的尝试，也许，在当时的时代下，这已经是迈出的最大一步。

六、小结

综上所述，吉野在山东问题上的态度并非立场鲜明地谈论归属问题，而是重在如何解决的方式上。从道德与法理的视角来说明国际争端，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一种比较温和的观点。这样的态度背后无疑与他对国内政治发展的思考是相一致的，即近代日本要如何形成一个现代国家，如何发挥自己作为“亚洲一员”的这一地位。上文从思想的角度，通过分析民本主义本身探究了其立场背后的可能原因，即他对道德和法律这两种力量的信任，前者与他对历史传统的态度有关，后者可归结于他自身的法学学者的思考立场。

值得思考的是，吉野试图阐明民本主义独特性的用意在于他注意到了“民”字可以演化出其他似是而非的理念，例如民粹（populism）。虽然都以“民”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但各有重点。民粹主义虽然也重在民众力量，但其相对立者是官方，作为近代日本思想的潜流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这有待另文再述。

^① 竹村民郎，第218页。

一战爆发后中国之中立

——以日本对德宣战前为主的考察

侯中军*

1914年8月6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学界对一战初期中国的中立多不持乐观态度，认为系袁世凯应对一战的被动之举。客观而言，中国的中立未能避免战火延及国内，被日本侵占了青岛及胶济铁路。此后限定战区的提议又因日本的反对而未能实现。然而，从一战爆发的7月28日，到8月6日，在这短短的9天里，北京政府是如何决定采取中立态度的，其外交考量如何？^①是北京政府深思熟虑的结果，还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① 涉及战时初期中国中立的论文主要有：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黄嘉谟：《中国对欧战的初步反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Madeleine Chi: *The Chinese Question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Fordham University, Ph. D, 1968) 及其修改后专著 *China Diplomacy 1914-1918* (East Asian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0)，是英美学界利用英国外交档案研究中国与一战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之一，其重点关注英日之间在中国中立问题上的矛盾与合作；张水木的《欧战时期中国对德关系之转变》（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3年6月）以台湾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为主；陈廷湘：《民众情绪变化与抗议〈二十一条〉运动》（《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4期）；石源华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马建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黄嘉谟：《中国对欧战的初步反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

是仓促间的决定？目前对此的研究还是薄弱的。笔者试图对此政策出台的背景及经过加以梳理，并就政策出台过程中政府内部的不同意见加以探讨，以期全面认识该政策的历史意义。

一、北京政府宣布中立的时机选择

关于一战，目前可以看到的有关北京政府关注各国动向的记录，最早的是1914年7月28日外交部的一封电文：“奥塞失和，所驻国对此持何态度，有何举动，确切密探，随时电部。”^①此封电文的传达对象，并未包括中国驻美公使。29日，外交部再电中国驻欧、驻日公使，并将驻美公使纳入询问对象，“奥塞开战，各国守中立如何情形，希速探明电复”。^②外交部前后两次发电，目的明确，希望探听中立情形。7月31日，驻英公使刘玉麟复电：“英现联合德法义俄会商调停办法，德不全认，能否转圜，尚未可期。”^③驻日公使陆宗舆认为，“各国大约用武装的仲裁，约可望和平”。至于外交部所关心的中立一事，陆宗舆的复电是“日本对巴尔干战事，并未宣告也”。^④各使传回外交部的消息，多为推论。在战争爆发初期，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之中，中国从中能得出的预判其实较为有限。

对于远在欧洲的战事，中国将采中立，属于自然得出的逻辑判断，一

① 《发俄、法、英、奥、义、德、日本各驻使（刘镜人、胡惟德、刘玉麟、沈瑞麟、高尔谦、颜惠庆、陆宗舆）电》，1914年7月28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第1页。

② 《发欧洲各使日美驻使电》，1914年7月29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1页。

③ 《收驻英刘公使（玉麟）电》，1914年7月31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1页。

④ 《收驻日本陆公使（宗舆）电》，1914年7月31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1~2页。

般人士皆认为“欧洲将起大战，而中国亦将宣布中立”。^① 对于中国的中立，国人要求政府不要采取“保守中立”，以蹈日俄战争中国之覆辙，希望“陆军部勿仅注意于民间言论而自忘其职守焉”。^② 此时中国的国民，从舆论上看，大体是持局外中立观点的。^③ 一般认为，中国向美国提议限制战区是在8月3日，继而于8月6日同时向日、美两国提出此议。但在兰辛（Lansing）文件中，有更早的记载。在8月1日前后，中国已经向美国国务卿提议此事。中国驻美公使询问美国国务卿，“是否有此种可能，即让交战双方达成协议，以保证远东的中立”。^④ 此次预先探询，夏偕复并未事先征求外交部同意，美国方面亦未给予具体答复。^⑤ 8月2日，日本宣布中立。日本外务省对外发表宣言，一面表示深望欧局早告和平，并确守严正中立之态度；一面却表示“万一时局转变，英国投入战祸，以日英协约目的或濒危境，日本以协约义务，必至执必要之措置”。^⑥ 宣言隐含多层含义，为日本随后的举动预留了各种可能。此举为北京外交部所关注。

8月3日，美国政府通过两个渠道收到了中国希望限制战区的提议，一是中国驻美公使；二是美国驻华代办。是日，北京政府致电驻美公使夏偕复，请其向美探询是否有意限制战区。同日，美国驻华代办马克谟（Macmuray）致电美国政府，建议美国应保全远东地区，“即使所有阻止欧

① 《申报》，1914年8月1日，第三版。

② 《保守中立》，《申报》，1914年8月1日，第三版。

③ 陈廷湘：《民众情绪与抗议〈二十一条〉运动》，《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4期。

④ Memorandum by the Counselor for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n Course to be Pursued to Preserve the “Status Quo” in China. Robert Lansing, Washington, Aug. 7, 1914. Lansing Papers, 1914 - 1920, Volume 1, FRU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39, p. 2

⑤ 黄嘉谟：《中国对欧战的初步反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第5页。

⑥ 《日本外务省关于欧战之最初宣言》，1914年8月2日，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49页。

洲当下战争的手段都归于失效，类似的战争行为也不应该波及远东。美国可以提议各国不要在远东地区采取敌对状态，正如美国于1870年普法战争时所作的那样”。^① 在马克谟致电美国国内前，北京政府曾派代表与其接洽，请美国出面，限制交战国在中国境内作战。马克谟当时未予答复，而是表示将向国务院请示。同日，荷兰公使探询美国外交部，询问“美国是否准备与荷兰一起提议西太平洋的中立”。这些建议均指向由美国倡议的远东中立。也是在同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有关各国，要求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英俄德法日等租借地交战。^②

在8月3日电文中，马克谟细分了中国中立的范围和类别，将租界和租借地区分开来，“中立提议仅指所有的在华外国租界，不包括租借地，在正式向各国进行外交斡旋前，我恳请政府授权我参与外交使团的提议”。美国外交部予以肯定答复：“授权参与中国中立化倡议，但中立地区不包括租借地。”^③

8月3日，外交部致电中国驻俄、德、英、法四国公使，令其探询所在国态度，电文内有两层含义，一是“战区能否限在欧境，在华各租借地，是否注重”；二是“英国能守中立否”。前层含义在于自保，避免战祸延及中国境内，后层表面上是关心英国的中立，实则是担心日本卷入战团。如果联系7月31日陆宗舆的电文，此层意义更加明显。^④ 德国方面对

① The Chinese Legat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August 3, 1914. Lansing Papers, 1914 - 1920, Volume I, FRU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39, p. 1

② 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4年8月3日。

③ Memorandum by the Counselor for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n Course to be Pursued to Preserve the “Status Quo” in China. Robert Lansing, Washington, Aug. 7, 1914. Lansing Papers, 1914 - 1920, Volume I, FRU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39, p. 2; 《驻华代办马克谟致国务卿电》，1914年8月3日，章伯锋、庄建平主编：《北洋军阀》第二卷，第752页。

④ 《发驻俄德英法公使（刘镜人，颜惠庆、刘玉麟、胡惟德）电》，《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2页。

中国的建议反应积极，德国驻华公使电告德国外交部，他将在8月6日的公使团会议上正式提出此议，保持胶州湾和汉口、天津德租界的中立。但出于谨慎，在回复中国政府的建议时却提出，只有在列强均表同意的情形下，德国方能保证中国的中立。^①

英国、日本此时亦曾考虑通过外交途径保持中国中立的问题。虽然德国、美国等提前做了准备，但由于英国已经于8月4日夜间对德宣战，在6日的公使团会议上，交战双方代表互不讲话，并未有人提出有关中国租界中立化问题的议题。公使团会议后，顾维钧往访美国驻华代办马克谟，询问公使团会议的结果，得到的回答是“朱领袖公使屡以有无他项公共问题提议，询诸各使，而彼皆缄默无言”，“对于租界及交民巷，应如何布置，以保中立一层，并未提议”。马克谟告诉顾维钧，他正准备向美国政府发电，转达中国政府的建议，即“在中国及中国领海内，不得有交战行为，以保东亚和平”。^② 马克谟的电文当日下午就已经发出，“中国政府将照我8月3日下午11时电报中所述内容向国务院提出请求。同时也请求日本政府在这件事情上与我国政府合作。中国政府拟于明日把他们的请求直接寄给总统”。电文坦言，外交团在6日的会议上不愿涉及租界中立，但马克谟仍希望美国政府向交战国提出该建议，“这可能是得当的，它即使不能把远东完全置于敌对的战区之外，但交战国仍可指示他们的驻华代表，可在其管辖地区保持中立的原则”。^③ 兰辛在其备忘录中提及此电文，“8月6日，美国驻北京公使陈明，北京公使团不愿提出中国条约口岸的中立化问题，

① Madeleine Chi, *China Diplomacy 1914-1918*, p. 1.

② 《顾参事（维钧）赴美馆会晤马代使问答》，1914年8月6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9页。

③ 《驻华代办马克谟致国务卿电》，美国公使馆，北京1914年8月6日午夜，《北洋军阀》第二卷，第753页。

但美国或许可以向各国倡议保持中国的中立”。^① 8月7日，美国最终同意中国租界和租借地保持中立。^②

在1914年8月5日，即中国宣布中立的前一日，外交部已经确定了中国对此次大战的态度。透过前几日的电文，可以看出大概的端倪。在中国宣布中立前，外交部得到的最新消息是：英国已经派兵赴法，但并未对德宣战。^③ 外交部在观察日本的动向时，其出发点是英日同盟的存在，以英国的态度推测日本的倾向，认为在英国尚未参战的情形下，日本不会宣布参战，“日以英盟，愿为后援，日当局态度静慎”，日本的暂时观望，使得北京政府难以出台相应的对策。^④ 此时宣布中立的欧洲国家中，已有瑞士、瑞典、丹麦、挪威和意大利。各国纷纷中立，无形中促使北京政府考虑早日宣布自身态度。同日，外交部复电湖北将军段芝贵、广东将军龙济光、广东巡按使李国筠，称“初三日电悉，欧洲战局已成，我国中立条件办法现已拟定，不日宣布”。^⑤

确立对一战保持中立政策，并非北京政府内部的一致声音。为防止出现别国在中国领土作战的被动局面，曾有人提出较为积极的主张，张国淦即为其中之一。^⑥ 在中国宣布中立之前，张国淦特访时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提出“因为青岛问题，日本倘借口英日同盟先我而为之，则我即难于

① Memorandum by the Counselor for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n Course to be Pursued to Preserve the “status quo” in China. Robert Lansing, Washington, Aug. 7, 1914. Lansing Papers, 1914 - 1920, Volume I, FRU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39, p. 2.

② 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4年8月7日。

③ 《收驻英刘公使（玉麟）电》，1914年8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4页。

④ 《收驻日本陆公使（宗輿）电》，1914年8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4页。

⑤ 《发湖北将军（段芝贵）电》，1914年8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4页。

⑥ 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3页。

应付，而且日后纠葛更多”，建议中国应该“运动德国自动交还青岛，日本自无所借口，如不行，则我即宣战，亦是与日英共同动作，不使在中国土地上，我守中立，彼来用兵”。段祺瑞表示他本人也赞成宣战，但“奈一般军人，都不赞成”。^①

5日，驻日公使陆宗輿致电外交部，传达以下信息：日本政府表示将确守中立态度，但如战事变化，英国投入战局，“日本以协约义务，必至执必要之措置”。^②已经明确，如英国参战，日本必将参战。此一信息的另外一层含义在于：中国不属于协约国之一，中国不可以仿效日本援引英日同盟之举，参加战局。以英日同盟为自身参战作说辞，并极力避免给中国加入战团的口实，此点至此已经显现出来。

中立既为政府既定方针，何时宣布仍然是一个问题。3日，广东振武将军龙济光、巡按使李国筠致电政事堂，催促政府宣布中立。由于德俄已经宣战，德国军舰青岛号在珠江水域游弋，俄国驻广州领事向广东方面交涉：“想贵国对于此次俄德宣战，似守中立，请将该青岛军舰，从速处理”，由于政府未公开中立，李国筠等予以婉拒。同日，湖北将军段芝贵亦电政事堂，以中国为海牙国际公约缔约国为由，要求政府即刻宣告中立。“奥塞德俄及我国均为缔约国，有遵守及施行正当手段之义务”，于中国实际而言，“奥德俄在各口岸，或有兵舰，或有战斗员，宜规定一种办法”。如果中国未能及时宣布中立，“设有一国，因我未履行此项义务，挟其威力来相诘问，似于独立国主权关系甚大”。由于缺乏中立条规，最坏的局面可能是“既不便以海军监视德舰，亦不能要求俄兵解除武装”。^③这份以国际法

① 许田：《对德奥宣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2号，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51页。

② 《收驻日本公使（陆宗輿）电》，1914年8月6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5页。

③ 《收政事堂交电》，1914年8月6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11页。

立论所发出的电文，可谓中肯。但就在前一天，即8月2日，政事堂在回复段芝贵的电文中认为宣布中立，“现在为时尚早”，应继续观察。^①

8月4日，山东交涉署致函外交部，指出“盖英一开仗，日本必假同盟之义以取青岛”，在此形势下“我国是否严守中立，顷经密电钧部请命，一面函陈将军、巡按使请示大纲预为妥筹”。^② 其他部门传来的消息，亦认为战争不可避免，须防备日本乘机对中国的掠夺，“欧洲各国必将决裂。日本常有野心，恐乘机利用乱党、图我商务”。^③

5日，驻俄公使刘镜人致电外交部，催促中国宣布中立，认为“我国宣布中立似不宜缓”。^④ 5日，处于风口浪尖的山东来电，催问政府态度，山东将军靳云鹏、巡按使蔡儒楷认为“战机逼紧，青岛更加吃重，我国中立如何办法，钧处想已筹定，乞示遵”。^⑤

广东、湖北两地催促中立的电文，由政事堂于宣布中立的当日转交外交部，所以外交部接收电文的日期均为6日。^⑥ 政事堂于8月6日集中将这些催促电文转给外交部，其意图何在？依据一般逻辑，这些电报的集中出现，其目的是解释为何须于6日宣布中立。笔者以为，政事堂将催促政府颁布中立的电文，打包转给外交部，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外交部在何时颁布中立条文方面与政事堂存在分歧。这种分歧程度不得而知，但影响到了

① 《收政事堂交致武昌段上将军电》，1914年8月6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11页。

② 《收山东交涉署函》，1914年8月4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3页。

③ 《收重庆关监督（颜锡庆）电》，1914年8月3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2页。

④ 《收驻俄公使（刘镜人）电》，1914年8月6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11页。

⑤ 《收山东将军（靳云鹏）巡按使（蔡儒楷）电》，1914年8月6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12页。

⑥ 《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编辑例言第一条写道：本书系就外交部交与本所之中日交涉档案编纂而成，表明此部分档案为外交部所藏。

政府的决策，不得不对处于一线外交人员转发国内催促中立的来电。外交部一方面受到来自各地的将军压力；另一方面也收到驻外公使要求尽快中立的建议，两方面情况相考虑，外交部最终同意政府于6日宣布中立。

事实上，政事堂背后的实际主导者是袁世凯，因此政事堂与外交部的分歧，属于袁世凯与外交部的意见分歧。袁世凯视外交为其命根，不容他人插足，“他的经历与他所面临的外交难题，使他有可能，也有能力和必要实施‘元首外交’，亲自主持处理各种外交活动，其事必躬亲的程度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空前的”。^① 何时宣布中立，袁世凯应当参与过决策，并最终做出决定。

外交部与湖北将军段芝贵之间的一封“误会”电报，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了解政事堂与外交部之间对何时宣布中立问题的分歧。外交部曾于8月5日致电湖北将军段芝贵，告知政府已经拟定中立条规，不日将宣布。但收到外交部电文后的段芝贵，却否认曾致电外交部：“哥电诵悉，查敝处近日并无上大部之电，初三日电文不知系何处所发，如何立言，祈查明电复。”^② 该电的出现，说明湖北将军与政事堂及外交部之间的联络并不通畅。段芝贵确曾于8月3日发出江电，催请政府中立，但其发电对象是政事堂，而非外交部。由于政事堂面临各省将军要求宣布中立的压力，于是在宣布中立的8月6日，将若干催促电文一并转发外交部，其中就包括了湖北将军段芝贵的电文。外交部不得已又于7日回电段芝贵，表示“初三日电，系政事堂发交尊处江电之误”。^③

诉诸8月6日前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动，可以认为，外交部希望能在宣

① 石源华：《袁世凯与北洋政府初期的外交》，苏智良、张华腾、邵雍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9页。

② 《收湖北将军电》，1914年8月6日，《欧战档》，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下简称《欧战档》），03-36-009-01-007。

③ 《发湖北将军电》，1914年8月7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16页。

布中立之前，先得到美国的赞同。最理想的结果，莫过于由美国向相关国家建议勿将战局扩至远东，如此一来，中国的中立地位方能得以维持。美国的建议如果发出，显然将在外交上是对中国中立的支持，此点当是北京政府外交部力争的结果。但由于国内各方的压力，政事堂不能无限期等待外交部不能确定结果的对外交涉，尽早宣布中立地位，以便国内从容应对战局的发展，是此时政事堂的最高决策意见。但此时美国传来的消息，仅同意中国租界和租借地保持中立。各国对中国中立地位的确认一直拖到了8月12日。

宣布中立前，外交部关心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日本是否能确守中立。由于英日同盟的存在，日本有无可能因英国参战而加入战团？一旦成为事实，届时日本将侵夺德国原在山东的权益，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虽然中国已经准备好了中立的条文，但如果在英国尚未参战前就贸然宣布中立，对于一直希望借英日同盟加入战团的日本的动向，尚不可完全预料，可能会处于外交上的被动。与外交部不同的是，政事堂考虑的不仅是外交问题，还有国内政治形势，它需要一个通盘的考虑。

综合多方因素的考虑，在未能获得最佳的外交形势下，8月6日，北京政府最终颁布《局外中立条规》，正式昭告中国于此次战争的中立态度。外交部于同日致电各驻外领使，“欧洲战事，政府现已宣布中立，条文另寄”。^①同日，外交部收到驻英公使刘玉麟电报，得悉英国已经于8月4日夜对德宣战，“德侵比国中立、英政府按公约质问，未能照覆，英遂于昨夜宣战”。^②此份迟来的电报，已经无法让中国决策者修改已颁布的中立条规，从而避免中国政府最担心的问题，即日本是否将跟随英国加入战团，从而危及青岛。8月7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照会民国外交部，英国已

^① 《发驻外各领馆电》，1914年8月6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13页。

^② 《收驻英刘公使（玉麟）电》，1914年8月6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6页。

经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①事实上,《局外中立条规》已经做到了尽可能的防范,将战争延及中国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并做出了详尽的规定。已有研究指出,“如果各方行事皆尊重国际法原则,中国的主权是应该得到保护的”,但北京政府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积极寻求外交上的保障。^②

二、保证中立的尝试

北京政府于8月6日宣布中立。此时,北京政府一直努力希望获得的中立保证,大为缩水,美国只是建议各国保证租界和租借地保持中立,而非整个中国及远东地区。由于英国已经对德宣战,因此,原先计划的日本中立已经几不可能。如果日本因此进攻青岛,将使得中国的中立事实上很难真正维持。

中国政府清楚,在日本即将参战的情形下,要真正维持中国的中立,需要联合美国一起行动。宣布中立的同日,外交部致电日本和美国,希望两国共同出面“限制战区,保全东方。劝交战各国,勿及远东”。^③

8月7日,兰辛向美国政府建议:“关于太平洋任何口岸中立化的提议均可能被某一交战国拒绝,因此,目前情形下,以不提出为宜。”美国目前可以做的,一是从交战双方获得一项声明,即尊重中国领土和沿海的中立,但不包括已经租借的地域及沿海;二是所有在华有利益的列强达成一项协议,维持外国在华的特权和利益现状,直至欧洲实现和平。兰辛在其

① 《收英公使(朱尔典)照会》,1914年8月7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13页。

② 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③ 《外交部致陆宗輿电》,1914年8月6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39页。

备忘录中指出，“我深信，维持现状最符合美国的利益”。^① 这里的维持现状，仍然是美国所坚持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延伸。

但远东局势变化很快，英国对德宣战后，日本必将以英日同盟为借口加入战团，美国对此有清楚的认识。8月7日，马克谟在与德国驻华代办会谈后向美国政府报告，“英、日、俄相约在将来的欧战发生后，日本将与英、俄一道在太平洋对德作战，以获得德国在胶州的权利作为补偿”，再次提出日本参战问题。^② 出于对日本即将采取参战行动的预判，兰辛改变了其已经向政府提出的建议，认为暂时应不主动提出中国的中立问题。“在日本正式对德宣战前，如果我们致力于使条约口岸中立化，并保证中国的中立和现状，则需要与日本政府协商，以符合两国1908年的备忘录”，如果美国不如此做，则日本将推迟美国的提议，美国将一无所获；另一方面，如果美国持观望态度，不主动提议中国中立和维持现状，则“在日本对德宣战前，美国不一定成为第一个向日本政府提出这一问题的国家”。兰辛坚持认为，“如果我们一直坚持到日本对德采取决定性行动前，我们会获得外交利益”。^③

8月8日，日本报纸将中国有意联合美国、日本限制战区的提议登诸报端。日本报纸披露的消息，被陆宗輿视为中国外交机密的泄漏，大为不

① Memorandum by the Counselor for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n course to be Pursued to Preserve the “Status Quo” in China. Robert Lansing, Washington, Aug. 7, 1914. Lansing Papers, 1914 - 1920, Volume I, FRU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39, p. 3.

② 《驻华代办马克谟致国务卿电》，美国公使馆北京，1914年8月7日上午，《北洋军阀》第二卷，第754页。

③ The Counselor for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Aug. 14, 1914 Lansing Papers, 1914 - 1920, Volume I, FRU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39, p. 4.

妥。他致电外交部，要求改变电报代码。^① 同日，美国国务卿布赖安（Bryan）将中国的调停建议汇报给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中国的建议是通过调停欧洲战事，以防止其波及远东。布赖安认为，美国可以在兰辛提议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一、由交战双方达成协议，不将战事波及远东；二、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上述协议，鉴于中国的中立现状，应该达成一个关于条约口岸中立化的协定。^②

对于中国联合美国限制战区一事，日本不以为然。大隈告诉陆宗舆，“宣言限制战区，如他国不听，须以兵力干涉，美总统仅以空言宣告，有何效力”。虽然一再向陆宗舆表示日本“必力保东亚和平，且深与中国友好，决无野心”，但又同时表示“德虽与日不表敌意，青岛舰队难免与英法冲突。日以英国同盟关系，如东方有战，日本不能中立”。^③ 大隈此番谈话，进一步验证了中国此前的担心：即日本必将随英国参战，夺取青岛。大隈谈话后，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责难中国政府有联合美国调停之举，“此等关系东方重大事件，中国何径先向美邦提议”。^④ 陆宗舆认为，在日本不愿保证不参与欧战的情况下，仅凭“以联美出面宣言，借兵力则势有为难，空言则徒招嫌而无实效”。^⑤

日本为了稳住北京政府，掩饰其侵占山东之意图，有意通过第三国向中国传达信息。10日，瑞典驻华公使访问外交部，称“日政府对华，纯抱

① 《收驻日本公使（陆宗舆）电》，1914年8月8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17页。

② William Jennings Bryan, Washington, Aug. 8, 1914,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No. 30, 1914, p. 363.

③ 《收驻日本陆公使（宗舆）电》，1914年8月9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19页。

④ 《北京政府外交部致驻日公使陆宗舆电》，1914年8月10日，《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第155页。

⑤ 《收驻日本陆公使（宗舆）电》，1914年8月10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21页。

和平宗旨”。^① 此时距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仅剩 5 天的时间。

在建议美国出面调停一事上，中国并非首倡，更非孤立。拉美各国亦曾向美国提出类似建议，虽然其出发点与中国的建议有区别，但共同之处甚多。兰辛甚至认为：“关于调停可能性的建议实际上来源于欧洲，拉美代表是受到了欧洲某些国家的影响。”兰辛建议美国政府此时不应讨论调停问题，“除非有公开调停的要求，现在讨论该议题实属不宜”。即使美国准备调停，亦应采取“单独调停”，而不是与外国联合调停。但同时兰辛亦承认，“很难拒绝外国联合美国调停的善意，我坚信，他们愿意跟随美国一起调停”。兰辛向威尔逊总统正式提出三个建议，供其提前考虑：1. 一旦有调停可能，美国是否单独调停；2. 如果邀请外国参加，是否应该限于南美的三大共和国，使其成为美洲的调停；3. 是否将欧洲国家列入邀请调停名单。^②

无论如何，美国总统调停战事之举并未取得效果。由于日本反对与美国联合在远东限制战区，北京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原拟联合日、美，日不赞同，出头无益，美国方面，已电令夏使婉词取消六日电意”。^③

英日同盟是日本一战决策的重要出发点之一。现有研究指出，英国并非起初就希望日本以英日同盟的名义加入战团，日本曾两次向英国提出参战要求，均遭到英国谢绝。^④ 1914 年 8 月 1 日，葛雷（E. GREY）在致格林（C. Greene）的电文中说：“我们还未决定自身应采取何种行动，但在一定情形下，如果需要，我们可能会加入战争。一旦我们决定参战，我们将

① 《发驻日本陆公使（宗輿）电》，1914 年 8 月 10 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 22 页。

② Lansing Papers, 1914 - 1920, Volume I, FRUS,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39, p. 9

③ 《发驻日本陆公使（宗輿）电》，1914 年 8 月 11 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 29 页。

④ 见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87 页。

与法、俄站在一起。我不认为英国参战需要以英日同盟的名义，或者出于维护同盟共同利益的原因要求日本参与进来，我看不到这种可能性”，要求将此告诉日本外相。^①

日本政府清楚英国的顾虑，因此力图打消英国对日本参战的担心。8月3日，英国驻日大使格林致电葛雷，“一旦德国进攻香港或采取其他攻击行动，陛下政府可以信赖日本，一旦召唤，即将全力援助盟邦；援助的理由和性质完全由陛下政府决定”。^② 8月4日，葛雷告诉格林，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并未向英国寻求任何帮助，我们应避免将日本牵涉进来，“但如果情势发展至我们需要日本帮助的时候，我乐于寻求帮助，并将对此种帮助心存感激”。^③ 参战后，英国发现，为了摧毁德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日本的合作实有必要。8月7日，英国照会日本，表示仅希望日本舰队消灭德国武装船只，保护远东自由贸易。此时，日本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参加对德作战。^④ 为达参战目的，加藤外相对英日同盟的利用发挥到极致，以“义务”和“情谊”两点解释日本与英日同盟的关系，认为“即使没有发生德国攻击了威海卫或香港这种明确的同盟上的义务，也可以‘情谊’作为对德参战的根据，以确保日本在亚洲的军事行动的自由”。^⑤ 英、日之间总的方针一致，但关于中国中立问题的协商并不顺利，虽然确认中国将接受两国在山东对德的军事行动，但基于各自在华利益，两国之

① Sir Edward Grey to Sir C. Greene. Foreign Office, August 1, 1914.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War, 1898-1914*, VOL XL.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26, P245.

② Sir C. Greene to Sir Edward Grey. Tokyo, August 3, 1914,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War, 1898-1914*, VOL XL. P305.

③ Sir Edward Grey to Sir C. Greene. Foreign Office, August 4, 1914.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War, 1898-1914*, VOL XL. P329.

④ 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4年8月7日。

⑤ 信夫清三郎著：《日本外交史》，第393页。

间的分歧一直存在。^①

在当时，能在远东抗衡日本的唯有美国，非但中国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德国亦明了此点。透过开战以来德国的对美外交，已经可以看出德国有意借助美国。8月7日，德国驻华代办与马克谟谈话，意在提醒美国提防日本。10日，德国驻日大使会晤美国驻日大使格恩里，再次提醒美国，日本即将对德作战，并认为德国不可能在青岛坚守得住。“德国被挤出远东及把它的属地转交给日本，是有损于美国利益的”，希望美国牵制住日本。^② 此时美国的考虑是，维持中国现状。兰辛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太平洋中立化的建议，并以此探听英方的态度。美国从英国得到的消息是，防止战事发生在中国或中国的领海内，以致引起骚乱，此点与美方提出的中立化提议是大致相同的。“葛雷爵士对你的声明极为满意，认为它符合该政府欲维持在华现状的愿望。”^③ 美、英之间达成一致认识后，美国开始试探德国的态度。11日，美国国务卿致电美国驻德大使杰勒德：“小心打听一下德国政府关于限制远东战区及维持该处现状可能性的目的，注意的是，这必须还不能认为是本政府的正式提出，而是普通的询问。”^④ 德国方面的答复如下：德国并不想与日本作战；如果日本请求德国不对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军舰或商业不作任何敌对行动，如果英国愿意，德国也同样愿意；日、英、德三国约定，三国均不攻击其他任何一国在东方的军舰、殖民地、领土或商业。德国的愿望在日本的野心下，已经变得不切实际，战争

① 关于英国基于自身出发与日本的分歧参阅 Madeleine Chi: *China Diplomacy 1914-1918*, East Asian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0 pp. 1-26.

② 《驻日大使格恩里致国务卿电》，美国大使馆，东京1914年8月10日，《北洋军阀》二，第755页。

③ 《美国驻英大使佩奇致国务卿电》，美国大使馆，1914年8月11日，《北洋军阀》二，第756页。

④ 《国务卿致驻德大使杰勒德电》，国务院，华盛顿1914年8月11日，《北洋军阀》二，第757页。

已经不可避免。

美、英关于维持中国现状的外交斡旋，为日本所关注。在获得日本保证尊重中国的中立及领土完整后，英国同意日本加入对德作战。8月11日，英国方面告诉美国，日本将“不能不与德国作战”，“由于英日同盟的约束，双方均尊重它的领土完整”。^① 12日，美国驻日武官致电国内，指出日本海军正在做战争动员，“可能要对德宣战”，这进一步验证了从英国传来的消息。^② 13日前后，北京政府外交部亦收到消息，指出日本随时可能宣战，“探闻日本政府于八月九日议定，按照日英同盟条约，与英国共同从事战斗”，“已传令海军常备之第一、第二、第三舰队准备战斗”。^③ 实际上，在8月8日，日本舰队已经出没于青岛附近。

山东问题是中国中立的核心问题，亦是多方矛盾的焦点。在对外宣布中立的同时，北京政府仍有机会采取外交或武力的手段解决山东问题。针对美、英、德、日主要相关国，有人建议采取秘密外交，分别接触，以达目的。对美积极联络，“要求各国承认凡中国之租借地均不作交战地”；与美国或英国秘密接触，“予以特别利益，使维持东亚平和”；对德接触，“请其相机将胶州湾交还中国，如美国可以依托，并可密托美国劝其实行”；对日办法，同对应英办法，以利益换和平。对德办法并非完全不可行，因此时德国在胶州湾之守兵“不及一团，无论如何精锐，终必不能保守”，届时与其为敌人陷落，“何若以条件交付中国，犹可收原来租借时条约之利

① 《驻英国大使佩奇致国务卿电》，美国大使馆，伦敦1914年8月11日，《北洋军阀》二，第758页。

② 《海军部长丹尼尔斯致国务卿电》，海军部，华盛顿1914年8月12日，《北洋军阀》二，第758页。

③ 《收直隶巡按使（朱家宝）电》，1914年8月13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41页。

益”。上述对策，“恐非大总统亲自裁处难以办到”，建议由袁世凯直接出面。^①亦有人建议外交与武力行动同时进行，采取武力办法，直接解除德国在华武装，收回胶州湾及德国在华利益。梁士诒曾向袁世凯力倡此议，并劝袁世凯对德宣战。^②

面对日本即将出兵青岛的危急情形，处于风口浪尖的山东地方提出应急对策，即先解决最为危急的胶济铁路问题。山东将军认为，青岛由德国交还“固难实行”，但“胜负尚有应付余地”，而胶济铁路因有铁路三十里内可以驻兵的规定，一旦落入敌手，“彼节节驻兵，直贯济南，不但（难）为南满东清之续矣”。提出此时与德国交涉，运用外交手段，从德国手中收回胶济铁路，“德人绝不拒绝”，“一面立一借款合同，一面立一收路契约，即可宣布实行”，其中的关键在于获得英法俄公使的同意，“俄英法虽与德失和，谅不愿日本在中国独享利益，似可望通过”。^③

中国内部的这些建议，并非完全不可实行，但在日本决定参战的背景下，中国的举措显得苍白无力。

三、日本对德最后通牒前后中国的外交努力

8月15日，已经完成各方面准备的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日本要求德国立刻从日本及中国的领海上撤出各种军舰及武装船只，不能撤走的船只立刻解除武装；在9月15日前，无条件交出胶州全部租借地，以便将来归还中国。如果德国未能在1914年8月23日正午前接受上述条件，日本

① 《寿荣拟呈袁世凯中国在欧战中对英、美、日、德之办法及理由书》，1914年8月，陈瑞芳、王会娟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15~1021页。

② 见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6页。

③ 《收山东将军（靳云鹏）、巡按使（蔡儒楷）电》，1914年8月13日，《欧战与山东问题》，第41~42页。

将采取应付局势所必要的行动。日本强调此举是为“保护英日同盟协定中所期待的共同利益”。^① 15日晚上9点，日本加藤外相约见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輿，将对德最后通牒的抄件面交与陆，并希望中国以诚意信任日本，并无从中图利之心。^②

通牒发出后，日本外相向英国驻日大使格林做出解释，“日本目前采取的行动，不是基于任何自私的目的，而是严格履行英日同盟的行动。日本并不追求在中国扩大领土或私利，还将谨慎地尊重中国的一切权利”，以稳住英国。日本同时暗示，中国内乱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主要原因可能是不能完成欧战爆发时进行交涉中的借款，如果能借到经费，内乱的危机将大为减轻。^③ 鉴于日本对德宣战是基于英日同盟而做出，而此前英国已经与美国就维持中国现状有了一致的看法，为解释日本的参战，英国特别向美国提交了一个备忘录，保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不受侵犯”、“日本的行动不会超出中国海以外的太平洋，也不会超出中国海以西的亚细亚水面或任何外国领土”。^④

英国向美国所做出的关于日本军事行动范围的许诺，并非日本的真实愿望。虽然英国最终同意日本出兵攻占青岛，但其戒心不减。当两国决定会攻青岛后，日本提出军事行动不能受限于中国的中立声明，并于8月12日首次向英国驻日大使格林进行试探。稍后，英国驻日大使亦向葛雷提出该问题。葛雷最终同意朱尔典与日本驻华公使之间就此问题共同向中国政府协商，但同时向格林强调：与日本交涉时必须保证英、日联军不损及中

① 《驻日大使格恩里致国务卿电》，美国大使馆，东京1914年8月15日，《北洋军阀》二，第760页；《日本致德国之最后通牒》，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三联书店，1980年，第42页。

② 《收驻日陆公使（宗輿）电》，1914年8月15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50~51页。

③ 《驻日本大使格恩里致国务卿电》，美国大使馆，东京1914年8月15日，《北洋军阀》二，第760页。

④ 《英国代办巴克莱致国务卿电（备忘录）》，《北洋军阀》二，第761页。

国在山东的主权，及战后将胶州湾归还中国。^① 日本不同意英方意见，认为中国并非比利时，国际法对其并不完全适用，拒绝作出战后归还胶州湾的声明及维护中国中立的提议，甚至举出日俄战争的经验加以说明。^② 因日本公使拒绝了共同协商的要求，朱尔典于8月19日要求葛雷授权他以英、日两国的名义单独与中国协商。21日，朱尔典与袁世凯达成意向，大体同意英国的提议。^③

1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陆宗舆，要其向日本政府转达中国对日本对德最后通牒的意见。电文引用了日本所提出“并无占领土地之心，且尊重中国中立”的语句，意在要求日本遵守承诺。至于中国内部发生问题，中国政府自己可以解决，不用日本出兵。^④

8月19日，美国回复日本的外相声明，表示自身将对国际间纠纷严守中立，对于日本与德国之间分歧的是非曲直，“不表示任何意见”，并提醒日本不应违背英日同盟的目的，即“保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及一切国家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如果日本因中国发生内乱而采取行动，必须与美国政府磋商。^⑤ 该声明同时传达到美国驻华使馆。22日夏偕复将美国的态度转达回国内，所述内容与回复日本的声明大致相同，即美国政府知悉日本政府的下列意图：“一、不贪中国土地；二、胶州交还中国；三、如日本国在胶州外另有举动，当先商美国”。在安抚中国的同时，亦在向日本

① Grey to Greene, Aug. 15, 1914, FO39125/23. 引自 Madeleine Chi: *Chinese Ques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p. 49.

② Greene to Gery, Aug. 18, 1914, FO 40579/23. 转引自 Madeleine Chi: *Chinese Ques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pp. 49-50.

③ 具体情形参见 Madeleine Chi: *Chinese Ques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pp. 50-51.

④ 《发驻日本陆公使（宗舆）电》，1914年8月18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57页。

⑤ 《国务卿致驻日本大使格恩里电》，国务院，华盛顿1914年8月19日，《北洋军阀》二，第761页。

施加压力。^①

此时，通过美国阻止日本出兵青岛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理论上，能够阻止日本出兵青岛的可能仅有对德宣战及收回青岛二途。对德宣战，非但中国内部反对声音极大，在外交上也难以获得协约国及美国的一致支持，比较可行的途径就只有直接从德国手中收回青岛了。

德国直接归还胶州湾之交涉。前文述及，中国内部已经有人提议由德国直接将胶澳归还中国，甚至有人建议即使不归还胶澳，亦应归还胶济铁路，以免事情不可收拾。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前，北京政府曾就此问题试探日本的态度。8月13日，外交总长孙宝琦会晤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幡西吉，谈及德国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一事。小幡西吉说：“传闻德国拟将胶州湾交还中国，中国政府不愿收受，此事确否”，探听中国口风。孙回答，“数日前闻有此语，但系一般德国商人之私谈，并非德国政府之言”，并询问小幡“如果真有此事，贵代理公使以为应否收受”。小幡回答以：“如为无条件之交还，可以接受”，但如果是战争期间交还，战争完后仍取回，“万不可接受”。^② 小幡所说的传闻，并非虚言。当时的消息灵通人士似乎多已了解到德国驻北京公使有意交换胶州湾。^③

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日，北京政府派员直接与德国接洽，询问归还青岛的可能性。8月15日，外交部主事王景岐会见德国驻华使馆参赞夏某，探听德国对于交还青岛的态度。德国参赞询问王景岐“闻贵部已发两电，从两路行寄与柏林，述交还青岛，有此事否？”，王景岐答以“予只知部中发电驻丹意两国使馆，问能否与柏林通电而已”，没有正面回答问

① 《收驻美夏公使（偕复）电》，1914年8月23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72页。

② 《总长（孙宝琦）会晤小幡代理公使问答》，1914年8月13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40页。

③ [澳] 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1912—1920），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377页。

题，但却借机询问德皇对于交还青岛一事的态度。夏参赞认为，德皇必加反对，外交部的意见不会被接受。王景岐进一步询问，可否于欧洲君主中寻找到一个能和德皇说上话的人，并提议荷兰女皇，但遭该参赞否定。^①

会谈中，王景岐希望德国能切实向日本声明不侵犯英国商务，换取日本不攻击青岛的许诺。“某国以保护英国远东商务之责为己任，德国不可授以口实”，并建议由德国驻华公使和驻日大使联名发电给德国驻青岛总督，由其出面声明保护远东商务。但该参赞并未对此置答。^②

15日，日本警告中国政府“中国议收回胶湾，此事不向英日咨，直接与德商，必生出日后重大危险。嘱警告政府，速即停止以上之进行”。^③

北京政府外交部已经很清楚，在当时的状况下，日本参战已经不可避免，所做的一切，只是在尽最后的努力。15日，外交总长在会晤丹麦公使时强调，青岛终将发生战事，而且日本确有加入战事的意图。^④同日，顾维钧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会谈，要求英国在决定进攻青岛前能将具体日期告诉中国，目的是向各国声明胶州租借地的范围，以保护中国的相应权利。朱尔典告诉顾维钧，“胶州租借地之界线及周边一百华里地之性质，各交战国均已深悉，贵国在彼所有人民财产，是当格外注意而保护之”，但又劝顾维钧不必要划定战区，因为事实上很难做到。^⑤在此次谈话中，朱尔典告诉顾维钧，日本加入战团，将难以避免。

上述情况表明，北京政府在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日，一方面在尽力希望能直接收回青岛，免去日本开战的借口，另一方面亦在准备应对

① 《王金事（景岐）接见德馆夏参赞问答纪要》，1914年8月15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47页。

② 同上，第48页。

③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六，第41~42页。

④ 《总长会晤丹阿使问答》，1914年8月15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49~50页。

⑤ 《收顾参事（维钧）赴英馆会晤朱使问答》，1914年8月15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51页。

日本可能的军事行动。中德之间关于可能交收青岛的谈判，此时已经远非中、德之间所能决定，英、美等并不欢迎中国此举，这也浇灭了最后维持和平的希望。

18日，外交部致电颜惠庆，探询德国交还胶州湾的可能性，德国外交部拒绝了中国的提议。8月19日，德国外交次长明告颜惠庆，胶州归还中国系“徒自示怯，与主权友邦中德均无利益，且胶州备战，系奉德皇命令，不能挽回”。^①就在同一日，德国驻华使馆面临变换了的局势，却表示愿意归还胶州湾。^②同日，顾维钧会见英国公使朱尔典，谈及胶州归还中国一事，朱尔典谓：“现闻德代使连日谒见孙总长，提议将青岛各租借地直接交还贵国。”顾维钧答以：“前日德马代使见过孙总长，并未闻其正式提议此事。即使有提议，度以本国政府必以现非其时，不愿与商。”朱尔典亦表示，已经太迟。表明自身态度后，顾维钧并未放弃最后的试探，他提出如果德国遵照日本所开的通牒条件，并将青岛各租借地，不附条件、不索赔偿直接交还中国，日本将采会种态度？朱尔典则直接答以唯有开战一途。^③在此次会谈中，顾维钧希望英国调动军队时应人械分离、不穿军服，以便维护中国的中立，而朱尔典建议顾维钧不要再强调中国的中立，因中国实力不济，很难真正实现。

中国政府并未放弃由德国将胶州直接归还中国的可能。20日，驻荷兰公使唐在复建议外交部直接与德国交涉，收回胶澳租借地。^④外交部在收到的各种建议中，其所指多集中于美国。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被牵扯进胶

① 《收驻德颜公使电》，1914年8月22日，《胶澳战事档》，转引自张水木：《欧战时期中国对德关系之转变》，第31页。

② 在此问题上，德国外交部与其驻华使馆之间存有分歧。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4年8月18日、19日。

③ 《顾参事赴英馆会晤朱使问答》，1914年8月19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60~61页。

④ 《收驻和唐公使（在复）电》，1914年8月20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65页。

州问题中，但中国政府并不清楚美国的态度。厦门交涉员陈恩涛仍提出“不如秘密授意美国，使以兹说德国，劝其将胶州直接交还中国”。^①事实上，北京政府的确进行过此方面的试探。20日，交通总长梁敦彦会见美国代办马克谟，劝说美国促成此事，建议美国“向英、德两国提出这个意图，为了避免战争，德国在胶州的权利可先让与美国，再由美国立刻移转给中国”。^②布赖安对于此事予以正式拒绝，认为该办法只能激起战争，而不会避免战争。

22日，夏偕复传达了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不支持中国向德索回胶澳租借地。美国总统在会见夏偕复时称：“闻德使建议中国，自索胶州湾，窃谓中国宜忍耐。”^③

日本对德宣战前，唯一能避免日本出兵山东的举措就是由中、德之间完成胶澳租借地的归还问题，但迫于各方压力，机会根本就没有出现，唯一可见的线索，只是存在于外交人员非正式的交涉中。由于档案材料的缺乏，目前尚不能确定究竟是德国驻华外交人员提出归还胶澳，还是中国主动要求。可以确定的是，在日本对德宣战前，中国内部已经屡有提议，建议由德国直接归还，并设计出由美代为转交的方法。德国方面亦曾考虑此问题，并与中国外交部有过讨论，但该种意见是德国驻华使馆人员的私下意见，并非德国政府的意见。8月19日，德国外交次长明告颜惠庆，谓胶州归还中国系“徒自示怯，与主权友邦中德均无利益，且胶州备战，系奉德皇命令，不能挽回”。^④

① 《收厦门交涉员（陈恩涛）电》，1914年8月20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65页。

② 《驻华代办马克谟致国务卿电》，1914年8月20日，美国公使馆北京，《北洋军阀》二，第763页。

③ 《收驻美夏公使（偕复）电》，1914年8月22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71页。

④ 关于中德之间交还胶澳的论述，参阅张水木：《欧战时期中国对德关系之转变》，第25~33页。

23日，日本对德通牒最后日期已到，德国未做出任何答复，日本天皇正式下诏对德宣战。至此，中国方面经历了17天的中立努力，即将面临挑战。日本宣战诏书仍然强调“为防护同盟协约所预期之全般利益”，将英日同盟视为出兵的正当理由。^① 为了保持中国的中立，并尽可能将日军作战范围限于最小区域，外交部于25日致电陆宗輿，要其向日方提出“行军路线宜限在潍县以东平度一带离华军较远地点。胶济路由中国尽力保全”，日本方面对此不置可否。经数度交涉，北京政府于9月3日照会相关各国：“在龙口莱州及接连胶州湾附近各地方，确实为交战国军队必须行用至少之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此外各处仍悉照业经公布之中立条规完全施行。”^②

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交战双方均要求中国严守中立的同时，却又破坏中国的中立。17日，广东将军、巡按使致电大总统，传达德国领事要求中国严守中立的要求，即不可将米粮等物件售予香港，否则，则属帮助德国的敌国。电文同时指出，如果对香港禁运米粮等物，亦应同时对胶州停运，否则必将引起英国的反对。^③ 8月20日，德国得到消息，日本将从山东沿海登陆进攻青岛，于是照会中国，请中国政府维护中立义务：禁止外国军队经过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复照，表示对于任何违反中国中立的行为，无不随时抗议。同时指出，德国本身在胶澳捕获商船，并在青岛港做种种作战准备，是违反条约规定的，亦属侵犯中国的中立。德国在京津地区通过铁路运输军械、军队，自由行动，各国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责问。中国对德国的行为不能不提出抗议。^④

① 《日本天皇对德宣战诏书》，1914年8月23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4~45页。

② 《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中国大事记”，第12~13页。

③ 《收广东将军（龙济光）巡按使（李国筠）电》，1914年8月17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53页。

④ 《发德马代使照会》，1914年8月23日，《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72页。

在中国在中立问题上，交战双方从自身利益出发，抗议中国未能严守中立义务。中国在发表抗议的同时，亦在向各方指明，在其自身已经触犯中国中立条规的情形下，不应指责中国政府未能维护中立义务。其实，各方的指责只是在为其自身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做的无力的辩护。

四、结论

检视奥塞战事爆发后的中国动向，中立之议已经隐现于外交部的动向之中。随着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最担心的问题在于日本是否会跟随英国而参战。民国政府蠡测日本动向的依据、其对外政策的观察点，在于已经存在的英日同盟。

出于外交的角度，北京政府外交部在宣布中立之前希望能尽可能摸清两个国家的态度：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北京政府分别向美、日致电，请其共同提出限制战区的提议。这里有两点考虑：一是从美国得到外交支持，借以维护自己中立的权威性不受侵犯；二是从日本方面希望得到其保持中立的态度。而对日本态度的推断，是建立在英国不参战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消息的迟滞，8月5日，英国已经对德宣战。

如果能做到上述两点，中国的中立将能得到保证。此两点是中国在宣布中立前的外交考量，并希望能尽力达到该目标。然而，北京政府的外交并不顺利，一方面，从美国并没有得到想要的外交支持；另一方面，日本在不时暗示将依据英日同盟帮助英国。在外交难有成效之际，国内及国际形势都不容中国推迟宣布中立的时间。内外催促之下，政事堂不再等待外交部的外交努力，决定于8月6日宣布中立。北京政府不是在最佳的外交形势下做出了宣布中立的决定，但亦有一点是更为现实的考虑：能不能等来理想中的外交局势？如果推迟宣布中立的时间，等来理想中的外交局面，当为最好，但现实表明，局势走向并不利于中国。

宣布中立后，暂时缓解了广东、湖北、山东等地的催促，但中立前所担忧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英国加入战团，日本必将对德宣战，而美国对中国有限的外交支持，不足以保证日本不侵犯中国的中立。通过外交维持中立已不可能，亦有建议提出对德宣战或直接收回青岛，但迫于现实原因，宣战的可能性此时尚不存在；收回青岛之议，也不为英、美、日等国所接受。面对远东地区的新形势，英、美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一致：维持中国现状，力图限制日本扩大在华权利。对北京政府而言，在各种努力无效后，等来了日本对德宣战的消息。中立之议筹议之初最为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回顾中国宣布中立前后的外交动向，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中立主要是为了防日，但此点显然并未达到目的。

对英日同盟的引论。日本对德宣战及出兵攻占青岛的合理借口是为维护英日盟约，这一点可以从当时众多的外交档案中得出证明，由于英、美在中国问题上已经达成基本一致的共识：维持中国现状，因此日本在英日同盟名义下出兵山东，仍需向美国保证不贪中国领土、战后归还胶澳租借地。日本本身对英日同盟的倚重，并不完全符合日本的战略。在远东地区，英、美、日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日本与英、美的矛盾已经显现。英日同盟对日而言，更多的是希望借助其完成自身称霸东亚的计划，而不是被束缚。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为扩大自身利益，其摆脱英日同盟的愿望逐渐强烈。《二十一条》的提出，是日本试图摆脱英日同盟的一个尝试。当时日本内部对其外交多有不满，尤其是右翼团体，他们认为日本对华外交“总是被动消极、摇摆无常”，“每事必受外国牵制，徒招中国人之轻侮”，并列举对德宣战以来的种种外交失误：对德宣战前未与中国政府协商，而招致中国处处抵制；声明将胶州湾归还中国，是自束自缚；限于英国所划定的海军活动范围，将日本海军限于日本海及中国海之内等等。这些意见的出现，虽不代表日本政府的意见，但不满的声音已经传达至日本决策层，并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提出《二十一条》后的第二个挑战现有东

亚国际秩序的重大举措，就是绕开五国银行团，独自向中国提供借款，即后来的“西原借款”。五国银行团已经决定在对华政治贷款问题上协商一致，但日本认为如果要深入控制中国，增加日本的影响，有必要抛开列强，独自向中国提供贷款。日本对英日同盟随意解释和利用，已经成为日本侵华和争霸远东的工具，已经引起英国的不满。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方战败的原因与俄国“土改”

金雁*

“土地变革”在1861年后是一种民间共识

长期以来，在被奉为“社会主义的圣经”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灌输下，苏联革命史的书籍都在讲述这样一个观点：11月8日夜晚即攻打冬宫胜利后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两项最重要的法令——《和平法令》与《土地法令》，尤其是后者宣布：“立即毫无赔偿的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废除资产阶级、皇室、教堂与教会的土地所有制。土地私有制宣告永远废除，一切土地属于人民的财产，并把土地交给劳动者使用。”这一举措一举解决了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对土地的渴望，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进而导致十月革命的凯歌行进。在遇到敌人反扑时，农民为了捍卫自己的革命成果自愿参加红军，成了革命的坚不可摧的堡垒。

中国人对此很好理解，因为根据正统的解释，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解放区”的土改和“减租减息”获得农民支持，才保证了解放战争胜利。这就使我们感觉到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相同之处。但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吗？中国的革命和土改究竟是怎么回事，姑且不论，仅就俄国而言，这种叙述中有很多含混和有意遮蔽的地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方，难道只有布尔什维克一个党派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吗？是《土地法令》宣布以后农民才获得土地的吗？布尔什维克赢得内战，是因为他们给了农民土地因此受到了农民的拥戴？

实际上，传统时代中俄两国的土地制度就有很大的不同，两国所谓的“地主”也不是一回事。自秦以来，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土地私有，“地主”的主体是富裕的平民，其土地大都来自私有地的购买和继承。而俄国“地主”^①的前身是服役贵族，他们的领地是国家划拨公有土地以及连带上面的劳动力的方式形成的。这些公有土地就是所谓的农村公社（即村社，俄语“米尔”）。在农奴制时代，专制国家把若干村社拨给贵族，作为后者替沙皇打仗的酬劳，但并没有授予这些土地的私有产权。农民们只当是被沙皇派去服伺老爷的，人是老爷的农奴，但地并不是老爷的地，他们也并非老爷的佃户，土地还是农村公社或“农民集体”的。那时贵族自己的私有土地（通过购买而来）不多，也没招致农民的太多反感。

但沙皇在1861年推行农奴解放时，就允许贵族“割占”了村社大量的好地。他们由此从依靠农奴服伺的领主变成了依靠地产收入的“地主”，其土地的主要来源就是这种“割地”。而在农民乃至社会公众看来，这是依仗强权化公为私，其产权是没有公信力的。所以自那时以来，民间对剥夺地主土地的呼声一直就很高。从19世纪70年代民粹派组织的“土地重分派”、“黑分社”这些名称就可以得知当时“分田地”的呼声有多高。1905年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成立时就对农民宣布说，“我们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土地外加自由。”^②他们在国家杜马中呼吁纠正“现存的土地分配不公正性”，要求通过立法无条件、强制性地废除大地产。^③俄国杜

① 俄语“помещик”一词本义只是“主人”之意，在斯托雷平改革以前它主要不是指民间私人地产主，而是指奴役村社农民的贵族。

② 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317页。

③ B. B. 塞洛哈耶夫：《立宪民主党——与1905—1907年革命作斗争的自由资产阶级主要政党》，莫斯科，1983年，第115页。

马中只要稍微带有左派色彩乃至宪政民主色彩的党派，从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民粹派后续组织的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人以及农民党团的“劳动派”，更不要说社会民主政党（即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不把“公平解决土地问题”视为第一大要务。

自1905年俄国出现现代议制杜马，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十几个党派都提出：尽快尽早完成农民多年来的夙愿——“收回割地”，所谓“割地”就是1861年改革中被贵族割占的原公社土地。由于其“强权侵夺公产”的色彩太过明显，把这些土地要回来还给农民，在社会上普遍被视为天经地义。当时就连那些被认为是最保守的右翼党派也不敢坦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只是强调“地主经济商品化程度和经营水平较高”，为保护生产力不要盲目摧毁它，或者主张用社会震荡较小的“赎买”方式来化解这一社会矛盾。这类主张当然是遭到革命政党反对的。也就是说，从1861年以后取消“地主土地”就是一种全民共识的“政治正确”，并不只是布尔什维克一家的主张。

但取消地主后怎么处理这些土地，分歧就多一些，理论上讲无非三种可能：（1）还给农村公社，恢复成定期重分的传统农民“份地”；（2）平分给小农，成为农民私有财产；（3）不分割或不全分，而是把传统的大地产改造成高生产力的近代化大农场。其中（1）是俄国农民传统上熟悉的办法，也是1870年以来民粹派的“原教旨”主张。而斯托雷平时代当局希望的是（2）和（3），即一方面尽可能保住“割地”并使其资本主义化，另一方面尽快把未被割占的公社土地分给农民成为私产，从而打消其借“公社所有制”来收回割地的口实。但这样的设想在斯托雷平改革中受到农民的强烈抵制，不仅保住割地的想法已经恶名昭彰，连小农私有也因斯托雷平的提倡而被“污名化”：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使1/5的农民占有1700万俄亩土地成为“独立农场主”。^① 导致其他农民破产状况严重，俄

^① 金雁：《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96页。

国的土地分配不公问题愈发突出了。多数农民（村社农民）不仅对地主，而且对“独立农民”都产生怨恨。

俄国的平民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希望的是（2），马克思主义者本来也是如此（只是他们还希望小农自由分化会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并创造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这样的“长远打算”自由主义者是不会有的）。但由于斯托雷平不得人心的改革污名化了“独立农民”，到斯托雷平改革破产、沙皇垮台时，这（2）已经不大能说出口，俄国土地朝（1）的方向变革已是大势所趋。政治上非常实用主义的列宁立即掉头承认了（1），亦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原来的想法而接过民粹派的主张。用列宁自己的话说：我们“在土地使用形式的问题上……总的说来接受了民粹派关于分配土地给（村社）农民的假设”，尽管为了抢潮头他显得似乎更激进，为了实现（1）可以不择手段，以致把原来的民粹派都吓坏了，但这个主张显然并不是他首倡，而且正如我们以下所见，也不是经他组织而实现的。

列宁政党在革命前夜并没有讨论分地问题

俄国社民党在1916年2月召开了二月革命前的最后一次关于土地问题的特别代表会议，针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后的形势变化，列宁在会上强调了修改土地纲领的必要性。主要是由于政府推行土地改革，从1906年起俄国的土地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党的现行纲领过时了，已与俄国现行制度不合。据列宁说，俄国的土地问题在最近十年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政府废除村社对土地的使用，出现了大量的独立农庄。村社制度的破产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因缺乏耕作土地所必需的资金而破产，沦为无产者并具有了革命情绪。但是另一方面，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越来越多地变成中等农户和大农户，农业逐步资本化，形成了一个反动的、忠于旧制度的农民阶层，农村中资本和地产正飞速集中。

列宁认为，俄国政府“土地问题尽管解决得合理，但是暂时只解决了一半问题”。政府的土地改革所触动的只是村社占有的土地，至于地主私人的地产、官家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和教会土地依然原封未动，而这是政府改革最薄弱的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注意到这一点。政府如果进一步推行改革，即转让大块的私有土地等等，那就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造就出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农民阶层，这一阶层是现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可靠支柱。政府采取这一措施虽然不会阻止革命的发展，但总能在很大程度上延缓革命运动的发展。

列宁表示，俄国土地问题的变化，迫使党在党纲中规定要没收大块的官家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和教堂土地并将这些土地收归国有。列宁根据上述理由论证了需要修改土地纲领的必要性。^①很显然，在这次会议上仍然像以往党代会的“土地纲领”一样，仅仅局限在理论上分析，既没有提出领导农民土改的问题，也没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可能出现的特殊形势提出指导性的意见，更没有预计到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至于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是包括自由主义在内众多政党都没有异议的一贯观点。

会议虽然注意到了农村分化问题，但是仍然对斯托雷平土地政策实现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并悲观地认为这样发展的趋势将会对革命形势不利。列宁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斯托雷平改革已经把农民分裂成两大对抗的群体”。而且对上次代表会议中反对由公社出面组织“侵犯和分割贵族庄园”的主张并没有加以修改。以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村社”是一种过时的封建宗法组织，由它们主导未来的农村斗争，会使“历史车轮向后倒转”。可见布尔什维克对即将到来的“农民分地”始料未及，自然也就谈不上去领导它了。更何况191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只有4个支部，494名党员，就是在走出地下以后的1917年也只有203个支部，4122

^① 中央编译局主编：《列宁关于修改土地纲领问题发言的记录》，见《列宁研究》，1994年第3期。

个党员，与在农村拥有百万之众的社会革命党根本无法匹敌，所以即便它想去领导农民，也无法与之争夺领导权。

“马后炮”的临时政府土地政策

其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三年，也就是1916年由于俄国在战场上接连失利，民怨沸腾，沙皇权威削弱，沙皇政府不起作用、不能领导国家已经是人所共知的现象。在绝大多数农民眼中，笼罩在沙皇身上浪漫的光环消散了。各地法制松弛，基层逐渐失控，政府忙于调兵筹粮，已无暇顾及农民抢占地主土地的事件了。而俄国传统农村原来就有的村社组织，则对农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地村社已经自发地兴起“收回土地”的运动。如前所述，地主土地多来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中化公为私的“割地”，而私有农民土地则来自斯托雷平“警察式改革”对村社的瓦解，这两次专制制度下的化公为私改革很不得民心，“开倒车”的“反改革”呼声一直就很高。政府权威削弱后自发地就出现了利用传统村社剥夺地主和“富农”（斯托雷平改革中脱离村社的私有农民）的浪潮，而这时地主早已成为“死老虎”，要么把土地交给管家自己逃往城里成为“不在地主”，要么贱卖抛售土地把资金转移到其他领域。

二月革命后首先出来主持临时政府的自由民主派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做的是分给农民土地。这是立宪民主党多年来承诺过的主张！现在轮到自由主义第一次可以大展鸿图圆农民的梦，怎么能轻率行事呢？土地是一定要分的，但是不能在战争状态下毫无规划的“乱分”。前方正在打仗时怎么分？如果在全国丈量、统一规划没有出来之前任由各地村社自作主张分土地，擅自改变土地制度，势必会造成农村和前线的双重紧张和动荡，将直接关乎到战争输赢的结局。

于是新政府要求农民稍作忍耐，等到战争尘埃落定，等到临时政府能

站稳脚跟，就会召开立宪会议，进行全国摸查，那时一定能够完成俄国农民等待了几百年的夙愿。临时政府3月19日发表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中说：“土地问题不能用任何抢占的办法解决，……应当通过人民代表机关制定法律来解决土地问题。”^① 要求农民在法律的框架下有秩序有步骤合理地“分地”。

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人本来是土地问题上的激进派，但他们一是出于“爱国”，不愿前方打仗时后方大乱，二是他们也参加了临时政府，并且继自由民主派失势后成了后期临时政府的主流派，也要维持秩序了。于是他们已停止支持焚烧地主庄园和分地活动，呼吁“不要把土地社会化的伟大事业变成随意私自占有土地”。^② 切尔诺夫说，用非组织手段夺取土地是不幸的，他呼吁农民代表苏维埃有组织地夺取土地。^③ 切尔诺夫反对“自行夺地”，农民对地主、土地所有者的进攻就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称号。^④ 他号召农民耐心等待召开立宪会议。1917年初在第一次全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同意临时政府的主张，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将来立宪会议的事”，自行夺地将会被视为非法行为。只有想乘乱夺权的布尔什维克煽动农民一刻也不要等待，许诺支持立即展开分地运动。

在不同地区已经展开的分地运动中，后来者唯恐叫别人占了先机或者拿到土地者害怕得不到承认，于是发生了农民情绪的激进化的过程。二月革命后的头两个月，农民寄希望于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因害怕影响战争而拖延解决土地问题的态度，使农民把希望转移到社会革命党身上。但是当得知社会革命党要求农民以克制的态度等待立宪会议的召开，就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纷纷指责“自行夺地”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违法行为

① 徐天新选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页。

② 《人民事业报》1917年3月5日，转引自索尔仁尼琴：《红轮》，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538页。

③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6页。

④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时，农民就开始寻找更激进的代言人了。布尔什维克鼓噪农民趁乱分地的宣传这时起到了一定作用，在那些靠近前线和城市的地方，许多人从社会革命党的支持者变为列宁政党的支持者。主张合法分地的党派延误了时机，叫激进的布尔什维克钻了空子。在后者看来，土地运动为革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列宁“照抄”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

列宁在农民风起云涌的分地浪潮中看到了乘乱夺权希望。于是布尔什维克很快调整策略，提出要尽快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土地运动”创造了革命的有利时机，我们要把它变成发动革命的有力杠杆。列宁懂得，提出简单、上口、容易被群众接受的口号是斗争的技巧。那些把临时政府看成是“革命政府”，要求民众服从的党派，被列宁斥责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称他们在压制革命行动。列宁说，人民自己夺取土地，这是长期遭受残酷剥削的劳动人民追求社会公正的自然表现，是被剥削劳动人民反抗精神的迸发，而只有布尔什维克一个党派反映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对群众的革命创造性负责，借助群众的革命创造性根本改变社会制度。

列宁反驳临时政府的说法，“我们要农民连一个月、一个星期、一天也不耽误地立刻得到地主的土地！”^① 布尔什维克为了抢占运动的潮头，把“原来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变成了自己的纲领”，而不顾自己多年来一直强烈批评这种“恢复村社”的纲领具有倒退的性质。列宁把杜马中 242 份农民委托书（其委托的对象原来都是社会革命党人）针对斯托雷平改革的不信任变成了自己的要求，该委托书主要提出三个要求：首先，消灭土地私有制。其次，禁止雇佣劳动。第三，在农民中平均分配所有的土地。在农民看来，1907 年斯托雷平给了俄国“肮脏的自由”，享有这一自由只是那些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0 卷，第 143 页。

权贵和强者，而他们就是要进行一场反对“肮脏自由”的土地革命。

1917年8月底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在土地问题上要承认“农民夺取土地的既成事实”。他们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谁进行阻抗，谁将会丧失群众的支持，“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把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①

不过，尽管列宁的话得到了农民的欢呼。但是该党那时几乎没有农村党员，对农村的影响力微不足道。本来俄国农民有自己的草根组织资源，即传统村社。在当时近乎无政府状态下，各地农民以村社为组织纷纷打家劫舍，自行分配土地。在农民的夺地过程中，除了过火行为造成人员伤亡外，斗争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消灭“阶级敌人”，土地是回归村社，又作为份地分下去了，但农民没有兴趣去划分“阶级”，农村中当时也没有什么“阶级”阵线。

与中国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不同的是，俄国农民“更关心分地”，而且对不同的土地区别对待。在农民看来，俄国私人买卖的土地的合法性要高于继承的土地（按：即1861年以贵族身份获得的“割地”）。人们试图在“继承的土地”和“购买的土地”之间做出区别，他们认为继承的土地的神圣性要低一些，因为土地最初的获得十之八九是一种强力行为，相比之下，个人购买得到的土地是合法的，甚至农民自发产生的“村社大会决议”都同意那些购买获得的土地要得到赔偿。社会革命党的代表认为，让地产主（他们没有劳动经验）遭受贫穷和饥饿是不人道的，因此建议提供一种终身养老金，但是决不能对这一类土地所有权进行赔偿，这个建议得到了社会革命党和农民欢迎。^②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10页。

② 马克斯·韦伯：《论俄国革命》，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12~113页。

给农民土地的既不是临时政府也不是苏维埃， 而是传统村社的自发夺地运动

1916年就已经开始的这一波分地运动中，各地的乡委会要求：地主的、国家的、皇族的、教会的、政府的“全部耕地和牧场转交给乡委员”，并把“地主的所有农具、牲口和财产均应如数交给乡委会支配”。^①皇权松弛后对土地的要求立即显现出来，农民提出的是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和大庄园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有很多贵族自己不住在乡下，而是由管家经营）。最重要的是恢复公社对“斯托雷平农民”（独立农民的另一种称呼）的权威，要求他们乖乖回来，重新确认农村公社。这种战斗精神是农村本身的内部源泉涌现出来的。虽说当时号称“自发夺地斗争”，其实对“贵族庄园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经过农村公社来组织和协调的”^②。

当时由村社代表和乡村知识分子组成的乡委会并不能约束各个村社，村社也不能完全约束农民，因此秩序的确相当乱，农村每天都会发生“农夫对老爷实行暴虐”事件。莫斯科省莫扎尔斯克县的首席贵族瓦尔热涅夫斯基在给他的朋友谢列梅捷夫的通信中描述了二月革命后农村状况，“已经出现了1905—1906年那样的浩劫和恐怖”，“农民又来要土地”，这是他们“考虑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怎样更多地、不受制裁地侵占别人的东西”，“拒绝这样的‘请求’是不可能的”，“父辈和祖辈留给我们的一切，都会被毁掉，被抢光，被剥夺”。^③

农民不经官方许可自己行使革命权力。按苏联时期史学家的描述：86.6%的乡农民执行委员会坚持革命立场，3.6%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

① 徐天新选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页。

② 刘树春等主编：《十月的选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00页。

③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第1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2~101页。

9.8%委员会维护地主的利益，1917年夏天确立的农民机关据说“由贫民和中农组成，他们完成了总数为16298起革命行动中的10210起”。^①俄国的贵族老爷占有的5800万俄亩土地至此已经被瓜分殆尽。前沙皇官吏的土地因其政府倒台而不受保护，都被当地的村社占有，科尔切夫县地方自治局主席柯尔文·里特维茨基的庄园被农民烧毁，他本人因抢救财产也被烧死，森林被伐尽。前内务部长普罗托波波夫的财产被洗劫一空。1918年到来时有36个县的农民已夺得地主86%强的土地、80%的农具和设备，农民占有的可耕地从原来的80%上升到96.8%。

以传统村社为纽带夺取地主土地并打击独立户，是这次“土改”的特点。前述的“乡委会”、“乡农民执行委员会”、“乡土地委员会”基本都是传统“乡会”的复活。这些多由村社权力机构——村会以及各村代表组成的乡会，在许多地方过去随着村社职能的衰亡已长期未开，此时又恢复了活力。到1917年3月21日止，唐波夫省埃拉托姆斯克县26个乡中的19个乡建立了乡会，到6月，维亚特卡省所有的乡都召开了乡会，8月下旬，尼日涅戈罗德省的253个乡中已有220个开了乡会。小共同体的联系纽带成为夺地运动的组织工具。

农民斗争的矛头首先是冲着地主的，其次是对准斯托雷平改革中受益的独立农户——“村社分离者”。萨马拉及萨拉托夫诸省的土地委员会都宣布：“家庭农场与独立农户在经济上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它破坏了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在主要农业区，自发行动起来的农民，实行了强制消灭独立农户制度。如弗拉基米尔的一些乡规定：“所有的独立农庄与单独地段，无论是份地还是买来的地，一律并入村社。今年（1917年）春乡土地委员会已命令：全部独立农庄与单独地段的主任一律迁入村社。秋天后拆除全部建筑物”；在许多地区，独立农民制度几乎全部被消灭，在萨马拉省其

^① A. B. 谢多夫：《1917年的农民委员会》见《历史学博士论文摘要》，1980年，莫斯科，第17页。

比重由 19% 降至 0.1%；在萨拉托夫省由 16.4% 降至 0.01%；在斯塔夫罗波尔省从 24.9% 降至 0.4%；在顿河区由 10.4% 降至 0.6%；在中央黑土区从 4.1%~10% 下降到 0.1%~1.2%；在西部与西北部地区一些农业地位不高的省份仍有一些独立农民，但数量也大为减少。总之，在全俄范围内“独立农庄主开始‘自愿’回到重分公社中，对那些顽固者则采取强制手段，直到收回他们的土地”。

这样当尘埃落定时，由公社夺取的土地有 7000 万俄亩是来自独立农民的，约 4200 万俄亩来自地主，约有 478 万独立农民的土地（约占全俄农民土地的 37%）被村社归并加以重新划分。“土地革命”后来被提到最多的结果是消灭了地主所有制，然而实际上它最显著的后果，还是以村社消灭了独立农民，使斯托雷平改革的成果荡然无存。因为恐怕并不是人人都知道，在土地革命中从农民手中夺地并加以重分要比从大地产中取得的多。第一，俄国的“土地革命”是在村社领导下完成的。第二，农民们对“死老虎”贵族的兴趣不是很大，主要“革”的是独立农民的“命”。

而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 11 月 7 日于首都夺权成功，但初期势力仍限于大城市，1917 年底至 1918 年初的立宪会议选举，农民的选票几乎都投给了社会革命党，农民苏维埃也不在列宁政府的控制下（众所周知，当时作为“苏维埃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是“工兵代表苏维埃”），直到 1918 年夏，列宁政府为了推行余粮收集制在农村组织“贫农委员会”发动乡村的“阶级斗争”，新政权的权威才开始进入农村。苏联时期史学界一直有种流行的说法：1918 年夏前的分地运动是“农村的民主革命”，其性质相当于城里的“二月革命”（即 1917 年春导致临时政府成立的那场变革），而这以后的贫农委员会才是“农村的十月革命”。仅从这一说法就可以看出，此前 1916—1918 年夏的村社分地的整个运动过程中，并没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他们只是乐见其成罢了。

后方分地直接影响战局的输赢

其实，“自发夺地”运动触动最大的是前线的军队。1917年俄国总人口是15360万，在海陆军中服役的人数1100万，占全国人口的7.2%，军队的作用比他们实际占的人口的比重要大得多。军队里面60%~66%是农民，16%~20%是无产者（包括3.5%~6%的工厂工人），10%~20%是城市中间阶层。按人数计，农民是660万~726万，无产者176万~220万（包括工厂工人40万~65万），城市中间阶层110万~220万。从民族成分划分俄罗斯人580万，占总数的53%，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是235万和30.8万，还有60万波兰人，50万~60万鞑靼人，40万犹太人，30万亚美尼亚人，20万格鲁吉亚人，10万摩尔达维亚人，10万波罗的海沿岸各族人，这里面80%以上的人口与土地关系密切。

当时俄国与德、奥、土、保战争正处在炙热阶段，正因为后方的夺地斗争是“自发”的，没有经过政府授权，形成苦乐不均的局面，导致了前方将士的军心涣散。后方的“夺地”消息一传来，部队哗然，士兵们愤慨地说：“我们在前方卖命，后方却在抢夺胜利果实，等战争结束哪里还会有我们的份儿！”由于没人愿意打仗，奥伦堡的机枪团竟然抽签决定哪一个营上前线。

于是，后方的“夺地”与前线的战争形成一种互动，前方打仗后方分地，军心动摇，前线的“厌战反战”情绪大爆发。加之，布尔什维克在军队有强大的渗透力，很多部队连以上单位均有布尔什维克所设的支部，在他们努力“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战败”的口号策动下，在“打倒战争，把刺刀插进地里，各回各家”^①的宣传攻势下。前线与“敌军”的休战、放空枪、联欢等行为十分普遍。布尔什维克鼓励士兵开小差，憎恶纪律，抗命不遵，视长官为敌人，大家散伙回家分土地的宣传是非常成功

^①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卷，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299页。

的，上千万的部队势不可挡地稀里哗啦地垮下来了。可以说，即便没有十月革命，俄军的战败也已成定局，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和农村夺地不无关系。

士兵们说，“他们要打仗，让他们自己来打，干吗要为统治阶级送命，我们可不想死在战壕里，先把我们的土地还给我们，把地主、寺院、皇家的土地夺过来给我们”。谁都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些堆积如山的尸体，到底能为我们换来什么？“我们要回家，要自由和土地，我们为什么要变成残废，打倒军官，砸开连队的钱柜散伙回家。政府说要把战争打到胜利为止，谁需要那些海峡。”^① 俄军开小差的人数达到 200 万人。^②

正是因为“土改”是农民自发的，没有政府的统一安排，没有统一的政策，也不是经过全面丈量后按一定标准进行的分配。所以“一哄而起，见者有份，不在场者没份”是普遍现象。俄国传统村社本来就习惯于维护安土重迁的乡村风俗，视离村外出为弃权，此时又没有政府来维护军人权益，分地时他们不在场就要吃大亏。因此临时政府要求打完仗再分地，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士兵对于后方未经他们参加而重分土地的举动都极端敏感”，它和军人的士气有直接的关系，连俄军的指挥系统都要求或者停止“无序分地”，或者“必须得到下级军官的书面同意，或者由他们亲自参加”，甚至建议为了这个目的，得给士兵四到六个星期的假期让其回乡分地。^③

沙皇政府是如此，自由主义者主导的前期临时政府是如此，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主导的后期临时政府也是如此。联合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孟什维克党人策列铁里在给各省官员的一份通报中说，不是新政权不支持分地，而是擅自夺地行动“将给军队、政府和国家本身带来

① 索尔仁尼琴：《红轮》，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358、3390页。

② 孙成木等：《俄国通史简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8页。

③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下册，三联书店，1978年，第824~825页。

数不清的灾难……”，战争将无法进行。^①可以说，即便没有十月革命，只要后方“夺地、分地运动”不停止，俄军的战败已是板上钉钉的结局了。如果政府做不到平息这个动摇军心的关键环节，就无法制止前线的军队崩溃和士兵大量逃走。一战中俄军的败局是无法挽回的了。

鉴于“十月革命”后再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平均地权”，^②如果把十月革命前的这次大规模的土地调整看作是“土改”的话，我们可以说，俄国的“土改”先于革命，而且它并不是布尔什维克主导的，而是农民自发完成的。这是与中国土改最大的不同，而这一土改也直接导致了俄国的战败。通常人们都说当时俄国是“战争引起革命”，确切地说是战争的失败引起革命，但战争失败本身又几乎可以说是“自发土改”的结果。所以，如果说后来中共“因为搞土改而赢得了战争”之说还有待分析，那么当时的俄国几乎可以说是因为这场土改而失掉了战争。

无论就本来不仅“反地主”而且也“反村社”的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而言，还是就作为一个城市政党、自认的“工人政党”而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是政治侨民-流亡者政党的布尔什维克实际并不从事农村工作而言，列宁的党与当时的俄国“土改”都没有多少关系。但是土改发生时他们的确兴奋不已并无条件地为之叫好。他们天花乱坠地画饼，也让一些农民心驰神往，一下子被认为是最理解农民的政党，但是他们策动革命的宣传目的达到之时，也就是许诺寿终正寝的时刻。就在1918年夏，刚刚完成分地运动的农民，马上就面临着新政权“余粮收集制”的残酷打击，他们这才领略到了列宁党派“支持农民分地运动”背后的政治目的。

① 1917年7月17日《临时政府通报》。

② 各村社内部的土地局部调整一直存在到1929年的斯大林“大转变”时期。

农民自愿参军更是一个神话

1917年3—11月间的俄国政治很不稳定，所谓临时政府实际上换了好几届，11月7日“冬宫之夜”布尔什维克的夺权尽管比前几届的更迭方式更出格，但当时并未引起强烈反应，人们认为这不过也是一届临时政府，他们期待民主大选产生的立宪会议能产生正式的、有公信力的共和国政府。但是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在输掉大选后派兵驱散立宪会议，断送了俄国人对民主的期待。既然不是选举而是抢天下，你能抢我为什么就不能？于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俄国陷入了大规模内战。

1918年1月份列宁政府颁布义务军法令时，几乎没有人响应，直到夏季应征的人数才达到1万人，而且主要是失业工人。1918年3月托洛茨基被任命为军事人民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凭空造就出一支部队来。托洛茨基承认，现在首先要打破自己形成的宣传体系，恢复了强制性征兵，进行强制动员，托洛茨基说：“离开了惩罚就建立不了军队。没有死刑手段就休想让大批人去进行殊死搏斗。”布尔什维克对社会主义的责任就是通过他们掌握的一切手段来保持“钢铁般的专政”和“政治垄断权”。

托洛茨基严厉禁止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沙皇军队中推行的“士兵民主”，他甚至直言不讳：“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实际上，唯一的差别似乎是前者的强制性虽然仿效后者，但比后者更加严厉。布尔什维克用以在城市里发动政变的反战士兵和赤卫队可以驱散冬宫的妇女营和士官生，但真正一打仗就证明那是不管用的。1918年成立的红军一开始就是按沙俄时的强制征兵制组建，而且在内战中几乎全部是由沙俄旧军官指挥一线作战的，1920年时，红军中有7万旧军官在服役。当然，布尔什维克对他们并不信任，于是发明了政委制。这可以说是与旧俄军唯一的不同点。

不过，当时的政委并不是后来描述的那种专职进行正面宣传教育和政治动员的角色，他们实际的身份就是“监军”，即监督那些仍在指挥职位上的旧军官。政委被授权，一旦发现军官有异动即可立即予以处决。同时军官们的亲属也被扣为人质留在后方，一旦有异动，不仅政委会立即枪毙他们，他们的亲属也会在后方死于非命。这样就保证了军官们只能为新政权服务。1919年6月斯大林受国防委员会委托，发表《告彼得格勒的军队》一文，宣布一系列严格的规定，所有投奔白军的人的家属，无论他们居住何处，都应立即逮捕，这些叛徒的土地资产应立即剥夺，永不归还，通令全国将他们就地处决，将叛徒指挥官的家属扣作人质，红军中的人员“即使向白军迈了一步”，他们就要被就地枪决。^①

军官如此，一般战士更不用说。苏俄红军中大量的农民子弟和沙俄士兵一样是强制征招的，这与此前的工人赤卫队和革命时期“士兵民主”之下枪杀了原军官的反战士兵完全不同。

本来根据欧洲左派的意识形态，革命后是要废除常备军，代之以公民持枪权基础上“武装人民”的。恩格斯曾指出：美国“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外没有常备军”^②，并赞赏地说：“如果每个公民家里都有一支枪和50发子弹，还有哪个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③ 所以有人说：马、恩从来没有谈论过“人民武装”，他们谈论的只是“武装的人民”。^④ “十月革命”后正是根据这种观念，苏维埃政权也一度着手解散军队，复员官兵，只保留民兵性质的赤卫队。后来发现“武装的人民”不管用，1918年

① 中央编译局主编：《马恩列斯研究》，1998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中文版第4卷，第413~414页；第3卷，第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95页。

④ 王建民：《马克思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问题——“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思想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4期，第9页。王先生指出：历史表明以武装公民取代军队并不可行也不必要，但那是另一个问题，就思想史而言，当时马克思确实就是这么主张的。

遂颁布了《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该法令仍然把红军定义为临时性军队，并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①而这个原本说是临时性的军队尽管据说“目的”不同，但其“组织原则”正如托洛茨基所说，与沙皇军队并无区别。事实上所谓义务兵役制就是强制征兵制（尽管在和平时期，尤其在种种优惠安排下，强制性并不明显），古罗马时谓之“血税”，即当兵“服役”如同纳税一样本质上并不是一种“自愿的权利”，虽然这种制度并不排除有人自愿从军，但它并不是靠志愿者来打仗的。

而当时的俄国，由于战乱中工厂普遍停工，失业工人自愿从军还是有的。但俄国的人口结构决定了军人主要来自农民。他们基本上是被征服役。而内战时由于实行余粮征集制等原因，苏俄政权与农民的关系紧张。列宁曾说“1921年以前，农民的暴动可以说是普遍现象”。^②这里说的可不是反沙皇或反“白匪”的革命暴动，而是反苏维埃的暴动。以至于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公开宣传是对付“资产阶级”的，内部场合却常常直言“专政”就是对付农民。列宁就曾在一次内部接见中称：“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因为俄国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只是（俄国人中的）少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农民从心理上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首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就在他们当中找到了拥护者”。“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服从我们，或者我们将认为，你们是在宣布要跟我们打一场国内战争，那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将以国内战争作为回报。”^③

这种情况下怎能谈得上农民踊跃参军、自愿为苏维埃而战？相反，由

① 徐天新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80页。

③ 《苏共历史问题》，1964年第11期，第65~67页。

被征从军的农民组成的红军部队哗变、叛乱是那场内战中的常见景观。尤其在内战后期随着前沙俄将领领导的各支反苏维埃军队相继败亡、苏波战争也结束后，内战却又延续了一年之久，这时苏俄军队面对的主要就是农民造反，包括大量的哗变红军在内。

那么苏俄为什么能够取得内战的胜利？原因可以讲出许多。但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很简单：当时的内战并非是所谓“红-白”“双方”的战争，与列宁政权对抗的是很多各自为政而且常常互相敌对的势力。严格地说，1918年的俄国是个四分五裂、群雄割据的状态，新生的苏俄也许面对所有的敌人而言起初并不算强大，但面对每一股敌人而言她从一开始就是最强大的。她的众多对手无法联合行动，是她能够逐一削平群雄的基本条件，而这与农民的支持并没有什么关系。

中国财政与一战纾困（1895—1918）： 庚子赔款、外债和国内公债

张志云*

一、前言

自1895年以降，中国财政一路恶化，甲午战争之外债与赔款以及庚子赔款，造成高达关平银16.5亿两的财政负担。中国穷三代中央政府（清、北洋、民国）之力，从1895至1938年的40多年时间，清偿完毕。1895年到1911年，清政府始终，但到民国肇造，财政恶化至1916年袁世凯过世后到达顶点。至1917年底，中国加入一战，协约国同意暂缓偿付庚款五年，北洋财政部再以此财源发行短期公债，压力缓解。虽然五年后，财政再现危机，此时北洋政府已濒崩溃，再无财政纾困契机，与其说北洋政府亡于国民政府，不如说亡于1895年后的财政问题。

对晚清和北洋时期的内外债和赔款研究的最重要学者，西方与中国学者同时期各有一人，他们两位的研究都大幅超越当时学术界的认识，领先内债赔款研究可能长达一百年，其学术成果或因曲高和寡，使得现代学者或有不知。此二人为海关著名史学家魏尔特（Stanley Wright）和上海银行

*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

公会任职的贾士毅。^①

早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舆论多有误解海关结余和内外债和赔款问题，为澄清误解，总税务司安格联（Francis Aglen）要求总司录事司（Personal Secretary）魏尔特撰写 *The Collection and Disposal of the Maritime and Native Customs Revenue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ith an Account of the Loan Services Administered by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Shanghai: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25）。安格联^②在前言说到：“对我而言，我想要在此付诸文字，也为将来存证，将中国政府批准给我的存放权，从事保管以海关税收作为抵押的国际和国家的债务款项。”^③然而一年多后，安格联决定将此书出版。^④

到了梅乐和任总税务司期间，梅乐和要求魏尔特与和财务科税务司郭本（John Cubbon）增修补订该书。^⑤新编书名是 *China's Customs Revenue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35）中，梅乐和在前言中说道：“本书自第二版发行以来，已有八年时间，现在第二版已经绝版，但是海关和海关税收的管理方法已有重大变革，这是源自中国已在1929年2月完成关税自主，虽然大幅提高关税，但是也导致严重的走私活动。为了保障关税收入和查缉逃漏

① 魏尔特（Stanley Wright），中国海关官员，1859—1939。贾士毅（1887—1965），著名民国财政史学者。

② 安格联（Francis Aglen, 1865—1932），中国海关第三任总税务司，1911—1927。

③ 此书未在市面上流通，但是藏于上海市档案馆，案卷号 Q275-1-2811。

④ 此书代理总税务司易纨士（Arthur Edwards），更进一步命令华籍帮办陶乐均翻译此书，而编成《民国以来关税纪实》（上海：总税务司署造册处，1927年10月）；尔后收录于张妍、孙燕京编，《民国史料丛刊》（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之第410册。

⑤ 梅乐和（Frederick Maze, 1871—1959），中国海关第四任总税务司，1929—1941/1943。郭本（John Gubbon, 生卒年月不详），梅乐和时期的中国海关官员。

税，海关开始执行新的政策。”^① 第三版主要反映关税自主后的新政策与走私的问题。魏尔特在海关任职极久，为个中问题的专家，多有一语带过关键问题之弊，时至今日，已无从梳理来龙去脉。

贾士毅的撰写动机则比较学术，并不具备指责或是自我辩护的目的。贾士毅于1917年完成的《民国财政史》序中道：“士毅涉猎之余，尝感喟乎。斯而年来，于官私簿书、案牘文卷，颇有收集，积储篋笥，与日俱富，微特备考证之资，盖亦虞其散佚也。近时坊间印行财政诸书，大率取材译述于神州之利病得失，语焉莫详，而于国故之迁流，今制之因袭，尤略而不道，每一展卷，辄觉其为用未广，爰特褒集旧所搜采益，以新得董而理之，詮次成书，非敢云补其阙失，聊备一格，以供披览之便。”^②

贾、魏两人著作各有优劣。魏尔特之著作考证仔细，所有文件征引都标明出处，而且精准掌握中外谈判时的外国心理，但是对于中国内政毕竟有理解不足的问题，例如，在1895年之前的中国外债情形，魏尔特的著作就不比贾士毅的分析详尽。贾士毅对于中国内政掌握十分仔细，从自强运动开办以来之内外债开始，一直到各省铁路、矿藏借款，无一不录，可惜的是，贾士毅没有注明征引文件出处。由此可见，两人著作确有截长补短之需要。

二、清末财政问题（1895—1911）

中国财政的三项负担为：内国公债、外债和赔款。甲午战争以前，这三项负担都十分轻微；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由于赔款是由外国银

^① “Preface”, Frederick Maze, Stanley Wright: *China's Customs Revenue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35). 此书也被中国海关翻译，并命名为《关税纪实》，现收录于刘辉编：《中国旧海关稀见文献全编》（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第22和23册。

^② 贾士毅，“序”；贾士毅：《民国财政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

行直接贷出，所以外债负担开始变重；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赔款由中国直接负担，所以赔款负担开始变重；1911年辛亥革命后，内债负担开始变重。^①就外债而言，中国直接向英、法、德、俄四国银行偿付外债；就赔款而言，《辛丑条约》规定中国直接向庚款11国偿付赔款；而就内债而言，中国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国民偿付内债。

清末财政问题，仅有外债和赔款，而各省督抚也向外国银行举借外债，但是金额有限。外债以下列七项大额贷款为主。^②庚款本金为关平银450000000两，合利息后为82238150两。外债本利合为关平银672200000两，共计关平银1654438150两，依1901年关平银兑汇英镑和美金汇率，约为246345840.5英镑。或美金1191195468元。^③换言之，仅仅从1894年至

① 辛亥革命以前，仅有因甲午战争而募资的昭信股票，计一亿两，年息五厘。昭信股票并无政府担保机构或指定财源，故仅可称为中国内国公债之始，但是不具备内国公债之性质。

② 这七项大宗贷款共分：（一）汇丰银款（7% Silver Loan，本金约库平银10000000两，约合1365000英镑）；（二）汇丰金款（6% Sterling Loan，本金3000000英镑）；（三）瑞记洋款（6% Gold Loan或Arnhold-Karberg Loan，本金1000000英镑）；（四）1895年的俄法贷款（4% Gold Loan，本金为400000000法郎，约合15820000英镑）；（五）1895年克萨镑款（6% Gold Loan或Cassel Loan，本金1000000英镑）；（六）1895年的英德贷款（5% Sterling Loan，本金为16000000英镑）和（七）1898年的英德续贷款（4.5% Gold Loan，本金为16000000英镑）。这七项贷款中，只有第四项俄法贷款由四种不同货币（英镑、金卢布、荷兰盾和马克）支付，并固定英镑与其他三种货币的汇率。英镑15820000（500法郎兑19镑15先令6便士）、金卢布100000000（500法郎兑125金卢布）、荷兰盾191200000（500法郎兑239荷兰盾）、马克323200000（500法郎兑404马克）。Wright, *The Collection and Disposal of the Maritime and Native Customs Revenue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66。

③ 英镑在1971年未进行币值十进制之前，一英镑等于20先令，而1先令又等于12便士。英镑、美金和关平银汇率，请见Thomas Banister: "Synopsis of External Trade, 1882-1931",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ed by Foreign Commerce, and on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 1922-1931*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33), Vol. I, 171.

1901年，中国财政恶化之迅速，使得未来的39年，中国每年固定要偿付大约关平银4200万两，导致清、北洋和民国政府穷尽办法，腾挪周转以期按时偿付。^① 庚款外债给近现代中国财政无比压力，但是中国在应付庚款外债时采取的变通方法，也推动了中国经济财政上的重大进程。

虽然“马关赔款”和“庚子赔款”俱为战争赔款，但对中国财政上造成了不一样的问题。就《马关条约》而言，日本政府破产在即，需银孔亟，无法接受中国分期付款，所以中国只能将海关结余作为担保，向汇丰和德华银行贷款英镑后，用英镑购买关平银，一次支付给日本。至此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债务结清，尔后就是中国每半年一次以关平银购买英镑，再将英镑还给汇丰和德华银行。

但是庚子拳乱后，战胜11国求偿关平银4.5亿两，没有外国银行足以承担。所以各国必须与中国协商出分期付款的具体施行细则。这使得“马关赔款”与“庚子赔款”在具体施行细则上，产生三项不同结果：

第一，债主不同。“马关赔款”的债权被转移到汇丰、德华两行成为外债；但是“庚子赔款”的债主是战胜11国，始终是赔款。债权归属于银行时，银行会将中国的债权，转成中国债券，向市场贩卖，但是战胜11国政府无法为之。换言之，中国一旦无法支付外债，银行即无法支付投资者息金，必导致伦敦金融市场投资者对中国债券的信心大跌；而无法支付赔款，只是造成中国对战胜国的外交紧张，虽然也会“间接”造成投资者对中国还款能力有所置疑，进而影响购买中国债券的意愿，但是不会直接导致投资者的损失。

第二，一次性和分期偿付。虽然在三国干涉之下，中国分两次偿付赔款，但是马关赔款仍为一性次偿付。然而庚子赔款是分为39年分期偿还。

^①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ed., *Treaties and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2nd edition, volume I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7), 328-331.

汇丰、德华两行是私人银行，国家无法直接干涉；但是这 39 年间，战胜 11 国时有攻伐，使得中国的庚款，在国际战事中，造成某些国家认定为“资敌”，这就是为何一战爆发后，协约国阵营中的英法美俄同意中国止付德奥庚款之原因。另外，中国将庚款解汇至战胜 11 国指定各自的银行，而各银行再解汇至各国政府指定账户。换言之，这些银行必须在这 39 年间，负担潜在的汇差问题。

第三，偿付货币不同。因为“马关赔款”的债权被转移到汇丰和德华银行，所以只使用英镑作为偿付货币，但是“庚子赔款”事涉 11 国，所以偿付货币共七种：金卢布、马克、法郎、英镑、美元、日元、荷兰盾（以下简称“庚款七币”）。事实上，战胜 11 国为金本位，中国为银钱复本位。1901 年时，对战胜 11 国而言，偿付庚款只是很单纯的金银兑换，因为“庚款七币”对彼此的涨跌，只与各货币内的含金量相关。但是对中国而言，就有一个隐藏的危机，如果就单纯地“国际金银本位货币汇率”进行兑换，若“国际贵金属价格”之银价下跌，会带动关平银对“庚款七币”贬值，这将造成中国损失巨额汇差，因此中国即委托总税务司赫德，想方设法减低关平银和“庚款七币”之可能汇差损失。对战胜 11 国而言，也隐藏另一危机，因为当“庚款七币”中某一币不再与金本位挂钩时，若币值下跌，中国对该国的负担将大幅减低，因此在一战后，法国为保证其庚款价值，而提出“金法郎案”之原因。

赫德与各国公使协议，固定关平银与“庚款七币”之汇率。上述动机就是《辛丑条约》第 6 条的产生背景，该条规定：“4.5 亿两将以黄金作为赔款，债务计算方式是依照以下的关平银与各国金本位国家货币的汇率进行计算。”^① 该条明确注明“庚款七币”对关平银之汇率，依照 1901 年 4

^①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ed., *Treaties and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7, 2nd edition), Vol. I, 307.

月1日的“国际金银本位货币汇率”。^①于是,《辛丑条约》第6条就将各国连本带利的赔款金额规定明确,从表面上来看,这对中国和外国都有利。对战胜国而言,依照“庚款固定汇率”各国可以在《辛丑条约》上载明中国需连本带利付出多少赔款(一般条约只载明赔款本金为何),这使得赔款连本带利的总数和每年赔款的总数,具备国际法律效力,中国完全没有办法赖账。而且,中国政府也希望设计一套稳健的还款计划。而且中国和庚款债权11国都不需要担心“国际金银本位货币汇率”下跌,中国必须多付出关平银,从而导致中国无法偿付庚款。

但是《辛丑条约》第6条的结果却导致中国得益甚大。“庚子赔款”即以“庚款固定汇率”转换成依关平银计价,而中国就可以自由决定以关平银直接支付给上海银行公会,或是依照“国际金银本位货币汇率”兑换成“庚款七币”支付。换言之,中国政府可以自由在“庚款固定汇率”与“国际金银本位货币汇率”中自由选择有利的汇率。

对此议题,魏尔特坚持“交给公使团首席公使手上,《辛丑条约》的赔款金额,毫无疑问地,是以金价赔款,并且以金本位货币偿付,虽然是以关平银计价”。^②但是认为这可能被两项原因“误导”(misled),^③魏尔特认为第一项原因是因为“分期偿还表以关平银计价制成”;^④第二个原因就是直接关系到“庚款固定汇率”与“国际金银本位货币汇率”的汇差问题。魏尔特解释道:“在1902年和1903年间,国际银价持续下跌,这自然代表如果赔款是以金计价,以银两付出的赔款总额将大幅高于预期。这次的银价下跌,事实上,会引起列强的抗议,因为列强只会收到部分赔款,(上海)道台(即苏淞太道台)只支付每月应付(关平银)定额至(上

① Stanley Wright, *China's Customs Revenue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35), 177.

② Wright: *China's Customs Revenue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182.

③ 同上。

④ 同上, 183。

海) 银行公会 (Bankers' Commission), 任由指定存款银行自行分配, 当 (国际金银本位货币) 汇率升高至可支付庚款时, 由公会 (将关平银) 自行兑换各种金本位货币, 如此一来, 公会自然会认为他们的亏损逐年加剧。”^①

从 1901 年到 1902 年的连续两年间, 关平银“国际金银本位货币汇率”之银本位货币汇率连续下跌, 从 1901 年 4 月 1 日之“庚款固定汇率”之关平银 1 两兑 0.15 镑, 至 1902 年底跌至 0.13 镑, 跌幅高达 13.33%。^② 这造成“国际金银本位货币汇率”小于“庚款固定汇率”现象。

以英国作为案例解释具体做法。庚款本利和共关平银 982238150 两, 而英国部分为关平银 110492067.72 两, 占 11.24901%。1902 年至 1910 年, 每年庚款总额 (关平银 18829500 两), 英国占 11.24901%, 所以英国应得关平银 2118132 两, 再依“庚款固定汇率”规定, 关平银两兑 0.15 镑, 即可得出英国每年获得英镑 317720 镑。按“国际金银本位货币汇率”之关平银一两兑 0.13 镑计算, 本来支付英镑 317720 镑需要关平银 2444000 两, 但是因为“庚款固定汇率”的规定, 中国海关只要支付关平银 2118132 两, 确保中国不会蒙受关平银 325868 两的损失。这使得战胜各国损失过巨, 因此造成 1905 年“镑亏求偿案”。^③

反之, 如果出现“庚款固定汇率”小于“国际金银本位货币汇率”现象, 如 1906 年, 关平银上涨为 1 两兑 3 先令 3 便士又 1/2 (或 0.164583 镑), 按“庚款固定汇率”的规定, 中国海关需要支付关平银 2118132 两,

① Wright: *China's Customs Revenue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182-183.

② Banister: "Synopsis of External Trade, 1882-1931", Vol. I, 171.

③ 一般而言, 历史学者对于“镑亏”的解释是, 银价下跌, 使得战胜国损失过巨, 从而要求中国政府用“偿付日期之市价易金交付”。此说大体不错, 但是忽略其中两大重点: 一、“庚款固定汇率”; 二、关平银为虚拟货币。因为有“庚款固定汇率”所以每年中国付出赔款的金额早在 1901 年即固定, 1901 年之后银价下跌才会造成战胜国损失过巨。因为关平银是虚拟货币, 所以在交付赔款时, 必须兑换成指定外币, 方可交付赔款。

但是中国海关可以在市场上自行以关平银 1930455 两兑换成英镑 317720 镑, 偿付给英国, 于是就产生关平银 187677 两的盈余。这导致的结果就是, 1915 年至 1920 年关平银“市场汇率”比“庚款固定汇率”连续上涨, 至 1920 年上涨至 126.39%, 这造成海关结余偿付外债赔款后, 产生大量海关盈余,^① 因此在 1917 年引发孙中山的广东政府向北洋政府要求的“解汇关余案”。^②

从上所述, 中国实得益于“庚款固定汇率”。虽然战胜 11 国无法接受“国际金银本位货币汇率”小于“庚款固定汇率”现象, 对其造成的亏损, 所以产生“镑亏求偿案”; 但是完全接受“庚款固定汇率”小于“国际金银本位货币汇率”现象, 对中国造成的盈余。但是中国的海关盈余的形成之内在成因更为复杂, 因为, 如果战胜国要求中国必须依照“庚款固定汇率”支付关平银, 那么“庚款固定汇率”可以防止中国不致在关平银价下跌时, 造成重大损失(此损失转嫁到战胜国上); 但是无法造成选择“国际金银本位货币汇率”时的海关盈余。

因此, 本文必须解释其中两项关键重点:

第一, 关平银是虚拟货币, 也就是说, 关平银只是赫德在 1875 年创造出的计算单位,^③ 中国自始至终, 从来没有铸造出任何一锭关平银, 这只是在国际贸易收支时, 一种计算单位, 只要中国海关算出关平银对外国货币的汇率, 以及关平银对中国各式银两的汇率, 借由关平银, 中国各式银两就可以与外国货币形成一套间接的兑换系统。换言之, 中国不会铸造出

① 海关结余与海关盈余, 请见: 张志云:《革命时期的财政秩序: 辛亥革命与海关结余存放权之转移》; 唐启华编:《近代中国的中外冲突与肆应》(台北, “国立”政治大学出版社, 2014), 第 146 页。

② 孙中山向安格联要求解汇关余, 请见: Chang: *Government,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in China*, 53-55.

③ 总税务司通令第 1875 年之 5 号, 1875 年 2 月 22 日;《中国近代海关总税务司通令全编》, 第 1 卷, 第 601 页。

关平银 16.5 亿两支付债款，最终偿付时，还是兑换成沪银或“庚款七币”交付债款。

第二，《辛丑条约》第 6 条只规定“庚款固定汇率”是计算债务的方法，而并没有规定中国偿付时，必须依照“庚款固定汇率”支付赔款。

到底上述现象，是不是魏尔特说的“误导”呢？极有可能不是，而是赫德想出的很巧妙的财政策略（或许魏尔特也不想拆穿赫德伎俩）。因为在《辛丑条约》中，“庚款固定汇率”和“分期偿付表”明订在附录中，战胜 11 国都有签署，具有法律地位。虽然战胜 11 国成功地向中国要求关平银 800 万两，补偿 1905 年之前汇差损失，就国际法理上来看，战胜 11 国未必站得住脚。

清末的两项巨额战争赔款，在赫德的设计下平安度过，但是自此之后，因“马关赔款”造成汇丰和德华银行发行的中国债券，缓解本行现金流不足的压力，因此中国财政即与全球股票债券市场紧密连动；而“庚子赔款”造成关平银之解汇时间，必须密切注意“国际金银本位货币汇率”，以免兑换“庚款七币”时之汇差，造成解款不足，因此中国财政再与全球货币贵金属市场连动。自此，中国财政和全球之股票、债券、货币和贵金属完全紧密结合。虽然赫德巧妙地将中国与全球货币市场形成由“庚款固定汇率”的防火墙，但是中国毕竟无法抵抗战胜 11 国的压力，中国在 1905 年之“镑亏求偿案”后，无法再使用“庚款固定汇率”作为防火墙，中国正式进入全球金融体系。

三、北洋财政问题与参战的纾困（1912—1918）

1911 年辛亥革命，原本晚清遗留的外债和赔款问题之外，再加上两大财政负担，就是善后大借款和内国公债。善后大借款属外债，袁世凯以盐税和常关税作为抵押，并以丁恩（Richard Dane）整顿盐税，扩大税基，

故善后大借款，并未造成重大财政困难；而内债的发行，本质又与外债不同，因为内债是由政府直接向人民和国内银行发售，无奈的是，当缺乏外国银行的信用审核与还款协商机制时，就给予政府向人民或国内银行做出高息诱购、强迫购买、以公债代替薪水之类种种的行为。^①而1911年底南京临时政府发行的“军需公债”利息高达8%，且毫无还款计划，如此内债，无视国家财政窘迫，滥行募资，更是加重未来北洋政府整理内债的困难。^②

1914年一战爆发，袁世凯发出“局外中立条规”，以“维持远东之平和与我国人民享受之安宁幸福，对于此次欧洲各国战事，决意严守中立，用特宣布中立条规”。^③此时善后大借款尚未到款，中国陷入财政危机，因为参战各国政府也因各国需钱孔亟，向本国银行举借，使得各行现金短缺，无法向中国付出贷款。曾在1913年至1914年任袁世凯法律顾问之耶鲁大学教授古德诺（Frank Goodnow），在袁世凯身边见证了中国财政的恶化过程。^④他说：“在一战爆发之前，中国已经与外资银行合作，建造了几千里的铁路，不仅仅是从北到南，也从东到西，弥补了水路交通的不足，大战中止了这项计划，也迫使（外资）大企业不再投入资金。”^⑤同时魏尔特也指出：“除了一战之外，当时国民党全力反对袁世凯筹借善后大借款，

① 丁恩（Richard Dane, 1854—1940），中国盐务稽核所总办，1913—1919。

② 贾士毅：《国债与金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第二编、第二章、第一节、第一项（本书无页数）。

③ 大总统申令，1914年8月6日；Stanley Wright ed. :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38) Vol. III, 201。（以下简称 *Documents illustrative*）。

④ 古德诺（Frank Goodnow, 1859—1939），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1914—1929；袁世凯政治顾问，1913—1915。

⑤ Frank Goodnow: *China: An Analysis*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26), 264-265.

所以未来中国借款，也只能从国内下手。”^①

袁世凯发出“局外中立条规”令后 22 日设立内国公债局，发出民国三年内国公债（以下简称民三公债），^② 民三公债与海关的关系极深，因为《民国三年内国公债付息施行细则》规定：“公债局认定左列各机关为经理付息机关：甲、各省县知事公署；乙、各省中国交通两银行；丙、各海关。”^③ 而海关成为付息单位，无疑大增民众购买信心，所以民三公债的发行量十分可观，因此北洋政府于 1915 年发出了民四公债，其办法与民三公债一样。^④

当时的常关税收十分健全，仅 1915 年，即收入关平银 7322249 两，达标率高达 100.26%；就算等到 1916 年洪宪帝制大失人心后，仍有关平银 6674583 两，达标率也高达 95.22%；但是等到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完全涣散，到 1917 年时连估税额也无法估计，实收税额只有关平银 523641 两。^⑤ 由此可见，民三民四公债已在破产边缘。

在此背景下，即可得知中国对德奥宣战之真实目的。1917 年 8 月 16 日，黎元洪发出大总统令：“宣战后，前此与敌国缔结之政治条约及因巩固平和交际而缔结之条约当然消灭，例如同盟约、商约、航约税约等皆是”，因此 1861 年签订的中德天津条约和 1869 年签订的中奥北京条约全部废

① Wright: *China's Customs Revenue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238.

② 税务处饬总税务司署，利字第 423 号，1914 年 8 月 28 日；*Documents Illustrative*, Vol. III, 213.

③ 民国三年内国公债付息施行细则，1915 年 4 月 7 日；*Documents Illustrative*, Vol. III, 245-247.

④ 贾士毅：《国债与金融》，第三编、第二章、第一节、第一项。

⑤ 本数据由 *Assessment and Actual Revenue Collection of Native Customs Establishments not under Maritime Customs Administration*, 16 January 1918; *Documents Illustrative*, Vol. III, 430, 438-439 为第一手史料，重新计算而成。

止。^① 同年9月8日北京公使团就送给中国政府备忘录, 表达允许下列三件事的意愿“(一) 庚款可暂缓五年偿付, 从1917年12月1日至1922年11月30日; (二) 对德奥的庚款可以考虑终止偿付; (三) 进口税可考虑提高5%”。^② 第一条和第二条在未来证明挽救了濒临破产的中国政府。第一条和第二条即归内国公债局管理, 第三条即是成立修改税则委员会商讨。

中国参加一战, 完全没有达到税则修改的目的, 但是有效解决中国政府信用破产的问题。最大的原因就是, 民三民四内国公债, 将于1918年3月1日和届还本日期。^③ 而政府已经无钱可还。因此, “若不设法储集基金, 在政府捉襟见肘, 势必致有失信用, 此后募集公债更难着手”。^④ 民三民四公债都是由50里外的常关税作为抵押, 50里外常关在袁世凯在位时, 财政部积极管理, “常关税收高达700万元”, 但是在袁世凯死后, 中央政府威信尽失, “每有事变税款辄被截提, 事后追索终成亡羊, 在本部综理税政亦宜妥筹维持, 以期补救于将来。兹为巩固公债信用, 并以保存税课起见”。^⑤ 财政总长王克敏提出比较系统建议。^⑥

将征解常税交付税司转解储存, 其距海关较远之内地常关, 即由总税务司派员向关按月提取, 在总税务司只有保管税项之责, 并无经征税收之权, 与海关税之归税务司管者截然不同, 至边远常税各关总税务司不能派员提取, 暨各关向例就地指拨之款, 关监督仍须照常拨付者, 并由本部按

① 总税务司通令, 第2718号, 1917年9月18日; *Documents Illustrative*, Vol. III, 416.

② Wright: *China's Struggle for Tariff Autonomy*, 427.

③ Wright: *China's Struggle for Tariff Autonomy*, 240 & 242.

④ 财政总长王克敏呈大总统文《呈为筹偿内国公债拟以常关税款储作基金委托总税务司保管》, 随财字230号, 1918年1月30日; *Documents Illustrative*, Vol. III, 436.

⑤ 同上。

⑥ 王克敏(1879—1945), 北洋政府时期三次出任财政总长, 两次出任中国银行总裁, 并兼任盐务署督办。1945年因汉奸罪收监, 死于狱中。

数另行筹交总税务司保管。^①

王克敏进一步拟定“筹拟委托总税务司保管五十里外常关及沿江海内地常关税款简章”：（一）民国三四两年内国公债系以海关五十里外之常关与内地常关税款一部分作为担保兹为巩固信用起见，特委托总税务司保管储为还本基金之用。（二）各常关税务仍归监督经征，在五十里外常关由监督按月将应解常税交由本关税务司转解总税务司保管，其内地常关税款得由总税务司派员向关按月提取。（三）总税务司不得因保管常税干涉各关行政事务。^②

虽然王克敏宣称：“总税务司不得因保管常税干涉各关行政事务”和“总税务司只有保管税项之责，并无经征税收之权，与海关税之归税务司管者截然不同”。^③当代史学家蔡维萍认为北洋政府时期总税务司和海关形成相对独立关系。^④蔡维萍认为：“此时，总税务司只收到净税款，但是没有替换常埠的海关监督；换言之，总税务司没有夺取行政权，海关监督仍是50里外常关的主事者。”^⑤笔者见解或有不同，洋常关税款之征收（向商民征收税款）、保管（在当地银行号保管税款）、解汇（由当地银行号汇至中央政府）三事，以解汇最为常关监督中饱私囊的机会。所以王克敏刻意将监督解汇至中央时，要求常关监督解汇税款给海关税务司或总税务司

① 财政总长王克敏呈大总统文《呈为筹偿内国公债拟以常关税款储作基金委托总税务司保管》，随财字230号，1918年1月30日；*Documents Illustrative*, Vol. III, 436.

② 《筹拟委托总税务司保管五十里外常关及沿江海内地常关税款简章》，*Documents Illustrative*, Vol. III, 437-438.

③ 财政总长王克敏呈大总统文《呈为筹偿内国公债拟以常关税款储作基金委托总税务司保管》，随财字230号，1918年1月30日；*Documents Illustrative*, Vol. III, 436.

④ 蔡维萍（Weipin Tsai, 1974—），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哈德威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

⑤ Weipin Tsai: “The Inspector General’s Last Prize: The Chinese Native Customs Service, 1901-31”,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36, 2 (2008): 247.

之程序，实为对常关监督之不信任，及对税务司之充分信任，同时以海关之严谨行政作业，确保常关监督无法中饱私囊。

晚清以来，海关本为估税机构不插手洋关税之征收、保管、解汇事宜，只是在1911年时，清政府担心革命党截留洋关税，所以将征收、保管、解汇三权由海关监督手上，移交由海关处理，但是常关仍由监督管理，而监督仍然保持着与税务司平行且独立之地位；至1918年，由“监督按月将征解常税交付税司转解储存；其距海关较远之内地常关即由总税务司派员向关按月提取”得知，连常关税款都由海关监督解汇给税务司，偏远常关税款，甚至由总税务司派员提取。如此一来，海关监督形同税务司的下属，由此可见，1918年北洋政府的财政惨淡，因为此举彻底违背19世纪中期，赫德和总理衙门联手制定的“共同管理”（synarchy）的制度。

当时，但是安格联已经了解此次权力扩大的复杂性，所以他很谨慎地以机要通令宣布：^①

你们或许已经得知，我受中国政府委托处理民三和民四公债（请见第2345号及2359号通令）。由于政府的财政混乱使得1916年的延期偿付（上述公债利息）问题严重至极，而且事实上，某些税款本来作为上述公债之担保，也以被挪为他用，因此我必须采取措施，保障两项公债可以支付利息，我的措施被证明是充分且有效，内国公债业务也进行顺利，但是我当时无法清偿公债本金……现在由财政府决定将提供一常设基金，以分期清偿两项公债。

政府已经决定，各通约通商口岸和中国内地的50里外常关和内陆常关的净收入将从海关监督手中交给我管理，财政部评估短收的税款，应该有百分之二十，大约每年有（关平银）700万两，但是极有可能更多……

你们可能已观察到，这些常关属于以下三类：（一）在条约口岸建立的常关，虽然在50里之外，但是我们多多少少熟悉而且有联系；（二）在内

^① 海关文件中机要通令的分析，请见张志云：《革命时期的财政秩序》，第159~160页。

陆建立的常关，在条约口岸附近，多多少少容易处理，例如武昌关；（三）在内陆建立的常关，现在无法联系，例如打箭炉、多伦税关等等。在条约口岸邻近的海关监督将把每月的净收入交给海关税务司，在边远地区的海关监督将解汇税款收入至总税务司在上海的户头，或是至最邻近的海关税务司，其作法端视情况方便而定。

政府已经很明确地说明，总税务司将不会管理常关或是干涉海关监督的管理。或许上述事件在未来会发生，但是现在考虑要进行的是，把（各式收费）的收据交给总税务司，而不是交给财政部……未来的发展，极有可能是依盐务稽核所的方式，而不是原有的常关模式。从海关监督手中要求收据，一定会产生很多困难，尤其在政府现在无法控制的常关更为艰困，必须谨慎并有技巧地执行任务。你也将发现，在1917年10月收到的税款有一些遗漏的数据，也是因为上述原因造成。^①

但是无论再怎么谨慎，也无法改变有36个常关税款交给安格联管理的事实。^②但是这36常关税移交给中国海关，确实为中国财政造成极大帮助，因为中国政府终于有多出来的财源偿还民三和民四公债，因此，安格联再度声明：

财政部的随财字230号中附带的大总统令，确定将常关税款交付我手，以成立偿债基金（sinking fund），用以清偿民三和民四公债……

依照现在的准备进程，我现在必须命令各位，所有负责解汇50里外常关税的税务司立即与该管海关监督协商，自该监督上次解汇其该管常关税给财政部之后起算，安排接管未来每月净收入，若有可能，请协商出一确定日期，我建议每月的5日收到上月税款。但是到底是哪一日，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开始就可以建立起常规制度，最好是与海关监督协调

① 总税务司安格联机要通令第21号，1918年1月16日；*Documents Illustrative*, Vol. III, 428.

② *Documents Illustrative*, Vol. III, 430.

出一日，并贯彻之。税款净收入可以用海关监督觉得方便的币种，银两或银元都可，但是如果汇到我的账户，就必须是银元。或许也有必要开设当地银行号的账户，以顾及他们的感受。这些细节，我必须让各税务司自行斟酌，但是如果开设银元账户，你必须谨慎地向他们索取账户内产生的利息。

收到“海关监督”解汇之后，必须立即将款项解汇至上海汇丰银行之“海关总税务司内国公债清偿基金”账户中 (IG of Customs' National Loans Sinking Fund Account)，这是个银元账户，解汇单要用粉红色……造册处税务司会提供给各位必须的标准文件……

就如上一封机要通令指出，要有技巧且审慎地与不在政府控制下的海关监督沟通，此时，不需要太过在意财政府的指示，而且海关监督也极有可能表示，他们将税款解汇至该省省会，到底要如何解决，端视更高层的决定。但是此时，我不希望一开始就面临白纸黑字的拒绝 (point-blank refusal in writing) “解汇税款”，所以最好一开始以私人会晤的方式协商此事。如果争论是必要的，你可主张：这些公债就如果外债一样，是国家的义务，公债持有人遍布中国，且与党派和政治毫无瓜葛，不论现在哪项问题使得国家产生分歧，国家债信必须维持。^①

安格联深谙人情处事，谨慎面对不在北洋政府控制下的常关问题，并虑及税款保管之利息。此办法减低常关税被截留的可能性，而且也使不在北洋政府控制下的常关监督有可能上缴常关税款。因为地方军阀将税款交给海关，海关必定将此款项归还给公债持有人，而不需怀疑北洋政府将此常关税款挪作军费。

但是上述办法仍然无法马上缓解民三民四公债的本息压力，民三民四公债是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出，总额约五千万银元，英法美俄四国暂

^① 总税务司安格联机要通令第 22 号，1918 年 2 月 2 日；*Documents Illustrative*, Vol. III, 431-433.

付五年的庚款，“总数约共银元六千余万元”，“按月分交，每次所交净数折合银元不过 100 万元左右”，但是北洋“政府积欠该两行款项则在 8000 万元以上，若以按期交付之赔款，陆续拨还，两行冀以整理纸币，实属缓不济急”，如此巨大财政问题，“唯有发行短期公债一项，借以救济两行金融公债，总额定为 4800 万银元，全数发交中交两行，由其自行经募所募集之现款，即以归还两行垫欠各款至公债本息，即指定每月延期赔款 100 万元为基金中，以 80 万元还本，以 20 万元付息，并援照（民）三四年公债办法将此项公债基金按月拨交总税务司安格联存储备付”。^①

当财政部确保常关收入在安格联手手中，其偿债基金将如实偿付公债利息后，更重要的是给政府创造更大的财源，所以发出 4800 万银元之五年“民国七年发交国家银行短期公债”，年息 6 厘，半年计息，1922 年 12 月还清。见下表：^②

	本金 (银元)	利息 (银元)		偿付总额 (银元)		剩余 (银元)
		六月	十二月	六月	十二月	
1918	48000000	1440000	1296000	4800000	4800000	38400000
1919	38400000	1152000	1008000	4800000	4800000	28800000
1920	28800000	864000	720000	4800000	4800000	19200000
1921	19200000	576000	432000	4800000	4800000	9600000
1922	9600000	288000	144000	4800000	4800000	0

虽然 1917 年中国参战后，王克敏与安格联以缓（止）付庚款作为民七短债之基金，此实为权宜之计；及 36 常关移交海关外籍税务司管理。对北洋政府而言，此实为自承无能之举。但是考虑当时中国，在袁世凯死后

① 财政部呈大总统文，1918 年 1 月 25 日，*Documents Illustrative*, Vol. III, 441-442.

② 政府归还中国交通两银行欠款短期公债章程，1918 年 1 月 25 日；*Documents Illustrative*, Vol. III, 442-445.

已分崩离析，加上晚清之外债赔款负担，这两条办法，既不加重人民负担，亦不加增行政支出，实为当时政局中最明智的决定。因此，在王克敏和安格联的合作下，中国政府终于暂时从袁世凯死后的财政混乱解脱出来，也给予徐世昌大总统相对充裕的财源和时间足以整顿内政和财政，徐世昌任大总统期间，也是北洋政府自袁世凯死后，南北局势相对平稳且内阁专业人才济济的中兴时期。

四、结论

1895年之后马关赔款与庚款的财政压力，将中国推往全球之股票、债券、货币和贵金属市场。自1905年后，中国完全与全球金融市场结合，不仅要直接承受与全球金融市场连动国际金融震荡，而且中国内政必将被国际金融信用约束。但是清政府深知债信体大，所以在1911年把洋关税款之征收、保管及解汇三事，完全交由海关管理。此举虽然反映了清政府国力脆弱一面，但是以中国海关之国际信誉，加强未来举债之便利性，增强中国对海关的信心。也是1918年移交36常关之税款解汇权给海关的前提。

正如蔡维萍指出：“中国常关制度之研究，不只是关税史，而广泛触及中国史中各层面，包括：关税问题的协商、外债、赔款、外籍税务司和华籍海关监督的斗争，以及华洋关员与列强的互动。”^①常关研究复杂，本文仅围绕中央政府之财政平衡为出发点。史学家关注袁世凯政治、军事及外交层面之功过时，忽略了袁世凯的财政建树。事实上，袁世凯成功地在原有之七项大宗外债上，以开拓盐税作为担保，举借善后大借款；并以整顿常关税，使每年收入高达关平银700万两，并以此为担保，发行民三、民四公债。此为袁世凯整顿财政成功之处，自不应该抹灭。

^① Tsai: "The Inspector General's Last Prize", p. 254.

然而，袁之政治失当，实伤财政至深，就整理内外债而言，债务庞大不足虑，而债务混乱以及担保金枯竭至关重大。清政府之外债赔款高达关平银 16.5 亿两，然规划得宜，虽然有镑亏关平银 800 万两发生，财政问题并未加剧。洪宪帝制导致中国分裂，使常关税款始有不上缴之事，且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威信大失，常关税款动辄被截。1917 年 10 月 31 日，常关税款只收到 50 万两，离民三公债还本日 1918 年 3 月 1 日，只有四个月。在此困难时期，北洋政府已无暇思考参加一战之山东租借问题或是提高税率问题，必须以缓（止）付之庚款，挽救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

袁世凯之后，北洋政府挽救财政的计划不外乎两种：其一，确保担保金供给，因此将 36 常关税款解汇交给海关；其二，以担保结构健全之内债偿过过去滥发之内债，所以再请安格联发出民七短债。以北洋政府的惨淡财政状况来看，以债养债之短期利弊实难估计，但是也正如安格联所说：“不论现在哪项问题使得国家产生分歧，国家债信必须维持。”但就长期利弊来看，自 1905 年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后，中国始终维持债信健全完整，实为国民政府的金融更增弹性，做为 1937 年抗战的健全财政基础。

如果从中国财政史来解读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国财政一片大好；甲午战败之后，外债高筑，但是洋关税款尚可支撑；八国联军战败后，中国财政已告枯竭，庚款 11 债权国与中国，共同开拓 50 里内常关税作为担保财源偿付庚款；1914 年，一战爆发，外债财源枯竭，仅剩内债一途，而内国公债局即以 50 里外常关税作为担保。此时浮现尴尬事实，若 50 里外常关税款为外债担保，各地军阀必不敢随意截留，然为内债担保，就恣意妄为。因此，王克敏的办法就是再度请外籍关员收税，虽然不堪，确为不得不然的办法。

蔡维萍认为 1901 年，总税务司得到“最后大奖”（last prize），但这只是 50 里内常关的估税权，常关之征收、保管和解汇权仍在海关监督手

上。^①事实上, 1918年, 才是真正的“大奖”, 因为中国的常洋关税完全操于海关总税务司之手, 虽然当时国人与现在的史学家相当不满, 由史料观之, 安格联不时在其机要通令中, 流露戒慎恐惧之意, 而且其指示各税务司之处理方式, 亦深体中国官场文化及周全监督体面。因此“太上财政总长”之名, 亦为安格联不可负担之重, 毕竟, 其管辖范围加大加重, 实为挽救中国财政之不得不然之举。

总之, 自1901年后, 每年关平银4200万两的固定支出, 迫使财政走向非常保守短视之路, 但是财政压力如此之大, 也使政府充分授权专业官僚, 此压力之下, 诸如洋关权力加大、常关归洋关管理、聘请外人管理盐税, 甚至指派安格联管理内国公债局, 经理内债基金处等, 都属有效控制债务恶化及健全债信之政策。以财政角度观之, 实为良策; 反而国民政府的建国十年中, 中国财政压力减轻, 反而对专业官僚之授权减低。讽刺的是, 财政压力庞大, 造就中国财政规划健全; 而财政压力减轻, 反而造就中国财政被党政因素干扰。如此现象, 在近现代中国史中屡见不鲜, 或许这就是近现代中国专业官僚的宿命。

^① Tsai: “The Inspector General’s Last Prize”, pp. 243–258.

新契机与新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美国亚洲协会”的中国评论

吴翎君*

一、前言

“美国亚洲协会”创立于1898年6月9日，是美国在远东最大的商业利益团体，总部设于纽约，并于上海、香港和日本横滨、神户等地设立分会，后扩及马尼拉和新加坡等地。成立之初的1898年7月25日，开始发行机关报《美国亚洲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载有美国进出口概况、会务记录、远东各国的商情、贸易政策的评论和主张，而中国问题尤为其所重；这一商人团体的机关报从创刊之初即和美国对华政策互相推涌，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商业期刊。“美国亚洲协会”创建次年(1899)和1900年，美国政府两度发表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列强在中国特殊范围内享有相等的权利和平等开放原则，由此形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政策。虽然在一次大战以前美国对华贸易的比重不大，但作为重要的商人压力团体，其动向反映美商在华利益、经济扩张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之间的互动关联。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美经贸关系上具有枢扭的转折意义。据中国海关

* 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报告“欧洲战争三年以来，举凡秩序，失其作用，……夫全球之扰攘既如此，而国内又有流血之政争，每见繁荣之都，变为蹂躏之地，疮痍满目”。^① 一次大战时期中外贸易俱受其害，而此时中美贸易却大有增长。1914年，不论美货输华或华货输美的价值刚突破4000万海关两，1919年则已突破上亿海关两，说明大战时期中美贸易往来的重大进展。^② 此一现象固然有大战时期的中美两国经济交往的各种内外因素。^③ 作为美国在远东的最大商人团体——从纽约总部到上海分部的“美国亚洲协会”，则无疑是最直接的参与者，而其机关报刊的立论往往是美国决策者、外交官、商人援以支持其对华政策的依据。一次大战对他们拓展中国的商务有何冲击，并以怎样的内容观点来呈现？他们如何塑造中国市场的宏大想象以吸引美商投资？本文探讨一次大战爆发后“美国亚洲协会”的中国评论，借以讨论此一商人团体组织对中美经济和外交关系的作用和意义。

《美国亚洲协会期刊》发行近50年，于1946年国共内战之际停刊。报刊的性质历经演变，由早期的商人团体机关报，到一次战后演变成一份以文化事业自许的报刊，是理解近代中美政治、文化与经济关系的重要材料。1919年11月，编辑部声明“美国亚洲协会”正式退出此一刊物的管理和运作，其编务方向更加独立，不受协会掌控。12月该刊改版并更名为《亚洲：美国杂志在东方》(*Asia: The American Magazine on the Orient*)，封面已不再出现“亚洲协会”名称。改版后此一刊物主要为对中国风俗习惯文化、美国人的中国印象及中国政治事务的观察；原作为美国商人在华商

① “国史馆”编：《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民国7年，台北，“国史馆”，1982年重刊，第19页。

② 1914年美货输华价值为41231654海关两，华货输美为40213065海关两。1919年分别为110236706和101118677海关两。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4号，出版地不详，1931，第118页。

③ 详见吴翎君：《欧战爆发后中美经济交往的关系网》，《“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通过审查，预计于第45期刊载，2015年）。

务信息传播、发声及意见反映的功能，以及美国在华商业利益的意义不再明显。抗日战争时期该刊对战时美国远东政策、国际关系、国民政府的战时动员和国共关系等讯息亦相当留意。宋美龄、林语堂曾在该刊发表文章，向国际宣传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关于“美国亚洲协会”的研究，过去虽有 James John Lorence 的博士论文，但该文为 1970 年之作，有关大战部分该文涉猎不多，且系以美国为中心的观点，^① 与笔者长期关注中美关系之交互作用的视野大有不同。

二、一次大战与中国市场新契机

一战期间原本占有中国进出口贸易大宗的英、法、德等国家卷入战争，欧洲国家对华贸易锐减（特别是 1917 年中国对德宣战中德绝交后，德国在华行号撤退，1918 年尚有 75 间，1919 年仅剩两家），而战争初期处于中立的美国，其对华贸易则有增长，在华行号和人数亦随之快速增加。从 1913 到 1918 年美国在华行号增加 1.7 倍之多，海关登录的居华商人至少有 4300 人以上。^② 个别的美在华跨国大企业更是大有起色，在中国市场呼风唤雨，例如美孚公司、慎昌洋行、英美烟草公司都是在大战时期迅速扩张其在中国分公司和业务。为确保战时中立国家的对外贸易和航海自由，并避免与卷入一次大战的相关国家在华商人组织之利益有所纠葛，1915 年 6 月 19 日，美国在华商人进一步在上海成立“美国中国商会”（A-

① James John Lorence: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1898 - 1925: Organized Business and the Myth of the China Market,"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0.

② 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 143~148 页。大战时期美国“在华行号/人数”如下：1914 年为 136/4365。1915 年为 157/4716。1916 年 187/5580。1917 年为 216/4618。1918 年为 234/4766。

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China, 简称 AmCham)。^① 这些在华商人组织和美国对华贸易商在大战时期的关系愈为紧密,《美国亚洲协会期刊》成为他们的发声喉舌,而“美国亚洲协会”的舵手司戴德(Willard D. Straight, 1880—1918)则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

司戴德于1913年出任“美国亚洲协会”主席之时,适逢威尔逊总统(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 第28任总统1913—1921)上台。有别于塔虎脱总统任内所采取的金元外交攻势,积极参与国际银行团在中国的活动和铁路投资,而富有宗教家精神和标榜道德主义的威尔逊总统上台不久即宣布美国退出国际银行团,威尔逊对商人团体的亚洲协会似并非太在意。因此,出掌协会主席的司戴德的首要任务便是争取威尔逊总统对此一以拓展远东市场为宗旨之组织的重视,而大战的爆发适好提供了此一机会。在出任主席不久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司戴德由于有丰富的远东资历,使他被美国企业界视为开发远东市场的推手,不久又被“美国广益投资公司”延揽为顾问和谈判专家。^②

① *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the Year Ending, Aug. 18, 1916.* pp. 1-2; 52-57.

② 司戴德的个人经历相当特别,他出生于美国,童年在日本度过,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建筑系毕业后即来华,任职于海关。司戴德曾在日俄战争之时跟随日军阵营担任通讯记者,原本是同情日本,但在日俄战后出任美国驻汉城副总领事、驻奉天总领事,眼见到朝鲜亡国和日本在满洲扩张,对日本在东亚的霸权愈来愈到反感。1908年他弃政从商,投靠摩根企业。1908-1912年,代表美国银行团摩根企业(J. P. Morgan & Company)接洽清政府锦璜铁路贷款与币制实业贷款的谈判。一次大战爆发后不久,离开摩根企业,担任美国专为拓展战时海外利益而成立的广益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简称 A. I. C.) 副总裁。1917年4月美国参战后,司戴德加入美国陆军赴法担任联络官。次年12月因感染西班牙流感,不幸于巴黎去世,死时犹未满40岁。《美国亚洲协会期刊》从1920年9月号起连载 Louis Graves 所著《一个美国人在亚洲》(*An American in Asia*), 共9期。后辑为专书,更名为:《司戴德在东方》(*Willard Straight in Orient: with Illustrations from his Sketch Books*) 于1922年由纽约亚洲出版公司(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Company) 出版。详见:吴翎君:《司戴德与清末民初中国》,《辛亥革命暨南临时政府成立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上册,南京大学主办,2011年10月16—17日,第142~155页。

“美国广益投资公司”（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简称 A. I. C.），成立于一次大战爆发之初，由于欧洲政局不稳，许多资本家撤走在欧洲的资金，因美国最初未参加大战，美国资本家酝酿成立借机拓展美国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而中国市场正是他们有意移转部分欧洲资金进入的地区之一。^① 大战初期美国陷入备战（Preparedness Movement）论辩中，司戴德也深深卷入这场论辩，撰有《外交与海外贸易》一文，认为美国资本家更有责任通过财政和贸易的管道参与领导国际事务。^②

为争取威尔逊政府的支持，1914年5月27日“美国对外贸易协会大会”（National Foreign Convention）上，司戴德号召美国制造业输出协会和工商企业界大老向出席的国务卿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反映对华投资与贸易的主张，次日美国总统于白宫接待了一批企业界代表。前“美国亚洲协会”的灵魂人物富尔德则在纽约《商业期刊》披露消息引导公众舆论的瞩目，暗示威尔逊团队的大力支持。^③ 10月“美国亚洲协会”年会上，司戴德在主席致词时提到：由于欧洲主要国家卷入大战，以致日本握有主导中国情势的机会，许多人都在观望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向。尽管当时美国已退出六国银行团，司戴德认为美国银行团仍可以透过各项实业借款参与中国事务。他提到大战对中国铁路事业直接的影响：由于比、法、英等国卷入大战，使得铁路工程势须推迟，其结果可能导致战后“铁路势力范围”的重新分配，此一情势对美国显然有利。^④

① Harry N. Scheiber: “World War I as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Willard Straight and th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pp. 486-511. 关于广益投资公司在中国的活动，参见吴翎君：《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2年，第四章。

② Willard Straight: “Foreign Relations and overseas Trade”, The Southern Commercial Congress, Muskogee, Oklahoma, April 30, 1915, pp. 12, 16-17.

③ James John Lorence: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1898 - 1925: Organized Business and the Myth of the China Market”, pp. 313-316.

④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Nov. , 1914, p. 292.

大战之初，司戴德于《美国亚洲协会期刊》发表《欧战与我们对外贸易的机会》（*The European War and our Opportunity in Foreign Trade*），呼吁一次大战是美国向外拓展市场的大好时机，美国银行家应趁此机会将资金转向南美洲及远东市场促进美国的外贸易。^① 1915年6月，司戴德以摩根公司副总裁兼亚洲协会主席的身份在纽约接待一批上海实业家的访美壮举中发表演说，注重中美应当发展银行业，以促进两国的投资贸易。这批中国游美实业团为响应航运公司大来（Robert Dollar）之邀请所组成，共有华商17人，以张振勋为团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聂云台为副团长，大来偕同乘轮航行，这批访问团经日本、檀香山、美国西岸与东岸，和美国各地商会热络交流，并达成组织中美银行团之计划，为一战初期中美商人团体一次相当成功的交流。^②

1914年11月，《美国亚洲协会期刊》刊出《美国对华商业》（*American Business in Asia*）一文，回顾从1784年美船中国女皇号（*China Empress*）首航中国后，中美经济关系的进展。文中谈及美国巴尔的摩飞剪船与英国商船在亚洲的竞争、美国对日本的贸易，并讨论美国在亚洲市场的最大获利——输出粗棉换取精致的丝品，以及美孚石油公司如何掌控中国石油市场的优势。该文最后论述东方市场带给美国人的异国想象，主张美国应以贸易开发亚洲，扮演拯救“贫穷东方”的要角。^③ 1914年12月，又刊出

① Willard D. Straight: “The European War and our opportunity in Foreign Trade,” 为司戴德于1914年10月27日受芝加哥伊利诺制造协会（Chicago, Illinois Manufacture Association）的邀请所发表的演讲文。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Nov., 1914, pp. 296-299.

② 《东方杂志》曾刊出游美实业团在美之合影。《中国游美实业团在美时之纪念摄影》，《东方杂志》12卷8期（1915年8月），第28957页。《游美实业团之行踪》，《申报》（1915年5月18日），第2张。《发起中美银行之宣言》，《申报》（1915年7月11日），第2张。

③ “American Business in As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Nov, 1914, pp. 310-313.

持相似论调的篇名文章《中国商业的未来》(*The Commercial Future in China*)。^①

1916年11月和12月,《美国亚洲协会期刊》一连刊出两篇关于中国棉业与棉纺工业的系列专题。在11月文章中指出许多人都忽略中国是世界生产棉花量的第三大国,美国产量占世界首位,年约1300万至1400万包,其次为印度,年产量约700万包,而中国居第三,约200万包。作者特别指出:中国粗棉的产量系在未有政府挹注经费于实验农场、种子改良或专家协助等背景下,就达到约美国七分之一;尽管有一批赴美研读农业的留学生返华,从事棉业改革,但为数仍不足。作者认为以近年上海一地棉纺工业的欣欣向荣,中国如能引进现代科技,延聘更多技术专家,上海可望成为“远东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 of the Far East)。^②12月号的专文则从棉花田实验、工人的专业培训和改良种籽的技术层面,屡述未来中国棉纺工业的发展方向。^③

此一时期美国驻华和驻日商务帮办(American Commercial Attach for China and Japan)阿诺德(Julean Arnold, 1875—1946)大力倡导东方和中国贸易重要性之要角,不唯在各种场合一再呼吁美国政府端出更积极的对华商业政策,并在《美国亚洲协会期刊》上撰文,或接受该刊访谈,阐释其见解。他呼吁美国中国商会、美国驻华领事和华府的“国内外贸易发展局”(The Bureau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Commerce)应密切合作,协助美国制造业和商人提供在中国发展商业的便宜措施,而此事不必等到大战结

① “The Commercial Future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Dec. 1914, pp. 335-338.

② “China’s Cotton Industry” from the *N. C. Daily New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Nov, 1916, pp. 304-306.

③ “The manufacture of Cotton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Dec, 1916, pp. 335-340.

束，更要把握当前的大战时机。^① 为说服美国各大商会前来中国投资，阿诺德在美国旧金山等太平洋口岸和美东纽约、波士顿等地到处演讲。1917年3月，《美国亚洲协会期刊》刊出附有阿诺德照片的专题报道，并再度援引前述专文的主要内容，强调目前美国对华贸易仅占中国所有贸易的8%~10%，虽已是自美国内战以来，对华贸易的最高点，但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编辑也以显著的标题指出中国的土地是日本的五十倍大，人口比日本大八倍，并拥有广大天然资源，其发展潜力可以期待。^② 阿诺德在美国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的授意下开始着手主编一本教导美商如何洞悉中国市场现况、分析投资环境、各项商情搜集和理想愿景的教战手册，该书于大战后由美国政府出版，分为上下两大巨册，上册厚达629页，下册有467页。编撰者除中美两国人士之外，尚包括领事馆人员。美国商务部自诩这套书对中国商务概况介绍之详尽为“空前未有”，该书并附有许多照片和地图。^③ 由此可见，一战时期美国驻华商务代表和美国商人团体组织的相互携手，展现对中国市场的宏大企图。

三、《美国亚洲协会》的中国评论

《美国亚洲协会》作为商人利益集团的机关报，在大战时期不仅反映美国资本家对中国市场的旺盛企图心，更对中国的参战问题所牵动的国际关系和远东利益高度关注。大战时期该刊所描绘的中国图像和关注焦点分

① Julean Arnold: "American Trade opportunities in China" Arnol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Dec, 1916, pp. 333-335. 阿诺德于1914—1917年任美国驻华和驻日商务帮办。

② Frank F. Davis: "Broadening Our Chinese Trade", *Asia: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March, 1917, pp. 41-43.

③ Julean Arnold and Various American Consular Officers: *Commercial Handbook of China*, Department of Commerce,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述如下：

（一）“新中国”形象

为游说美国商人把握一次大战契机，“美国亚洲协会”充满了对中国远景的规划，并且宣扬中国人民的良善奋进的国民性。1916年11月，阿诺德所撰《美国在中国的贸易机会》（*American Trade opportunities in China*）发表于《美国亚洲协会期刊》，鼓吹美国大企业将大笔资金转向中国，且大力褒扬中国的国民性。他提及自从大战爆发以来，多数美国制造业关注的仍是前进南美市场，将其视同于美国对外贸易的全部。但大家不了解中国市场是更为巨大、更有潜力。阿诺德主张中国人口比起南美逾十倍之多，中国人又比拉丁美洲人更加勤快、工资便宜，而且国内物矿丰饶。当前亟待发展面粉、棉纺织、榨油、火柴、玻璃等新式工厂的中国，更需要外国的投资和技术引进，而美国银行家和企业家适可扮演此一角色。他同时认为，中国正萌发出一种“国族精神”（*national spirit*）——富有理想，爱好和平，勤快积极，相信数年之间中国可望成为有组织的政府。^①

1917年1月，《美国亚洲协会期刊》刊出《中国——美国沉默的伙伴》（*China, American Silent Partners*）一文，文中分析中国人自陈“中国人尊敬英国，爱好美国，畏惧日本”一说的历史渊源。作者 Jeremiah W. Jenks 缕述自清末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以来的中美传统友谊，认为美国更应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国家，而日本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改革进步，则印证了东方民族是可以改变的。他首先揭示美国人仍停留于“睡狮中国”的看法有误；恰好相反，一股中国民族主义的新精神正弥漫全中国，这股士气远超乎美国人的想象。他主张中国人追求富强和发展实业的企图心非常旺盛，作者甚至以“极度务实的中国人”（*The intensely practical Chinese*）来形容此一动向。这篇文章用词激昂，以美国总统杰斐逊

^① Julean Arnold: “American Trade opportunities in China” Arnol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Dec, 1916, pp. 333-335.

(Thomas Jefferson) 果断买下路易斯安那地区 (Louisiana Purchase), 因而为美国的大西部奠下基础的壮举为例; 此时中国的情况, 正可让美国挟着庞大的动力穿越太平洋, 但美国要的不是领土, 而是商业贸易。他同时提到北京政府有不少诚实、爱国, 且有才干的官员 (并特别推崇财政部长陈锦涛的留美背景), 呼吁美国必须把握机会, 以财政援助中国, 不宜错失大好机会。^①

1918年11月, 该刊有《中国近代工业的努力》(*China's effort in Modern Industry*), 指出中国民间企业和新式工厂正欣欣向荣, 但美国人多关注北京政争的演变, 而忽略了中国这股蓬勃发展的民间力量。该文配有一幅照片, 内容为一群在工厂大门前的中国工人, 照片说明称这些工人工资少、工时长, 但却勤快认真, 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事。文中特别提到中国新式工业的振兴, 上可归功于清末湖北张之洞创办汉阳钢铁厂, 而张謇踵继其后。最后亦提到留美学生引介新式机器的作用、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兴起, 以及中国迫切需要外国的投资来发展实业。^② 这篇文章发布于大战行将结束之际, 不仅贯彻了一战爆发之初该协会鼓吹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更肯定中国振兴工业的不懈努力。

(二) 美日合作开发中国的主张

从《美国亚洲协会期刊》的文章看来, 一战期间在讨论投资中国市场的同时, 美国企业界并不排斥与日本的合作, 甚至也主张与日本合作共同开发中国, 他们事实上是将日本、中国与远东的贸易视为整体来考虑其利益。1917年, 美国纽约 Gaston, Williams & Wigmore 公司的副总裁威廉斯 (Williams H. Williams) 曾亲访问上海 (当时《申报》称威廉斯所属为

① Jeremiah W. Jenks: "China, American Silent Partn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Jan., 1917, pp. 363-367.

② "China's effort in Modern Industry", *Asia: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Nov., 1918, pp. 963-967.

“美兴公司”），并接受“美国亚洲协会”访问，他针对美国在亚洲的宏大商业计划，提出三个主张：一、美国政府应对美商在海外的投资有所承诺和保障，且让美商感觉到有效力的保障；二、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尽速拓展太平洋航线；三、美国可与日本共同合作，日本应会是诚恳的商业合作伙伴。他认为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发展，光靠贸易是不够的，必须有大笔的投资。他表示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就向他提起：美国老是说要投资中国，且夸说美国对中国比其他国家友好，但都是光说不练；美国如果真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光靠商品贸易无法发挥太大作用，美国政府必须强力推进美国大企业到中国来投资。“美国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如果抽掉美孚公司，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一定要有美国政府的推动政策和大企业的进驻投资。”^①

1917年7月《美国亚洲协会期刊》特辟“对华贸易”（*The Trade of China*）专题，包含三篇文章：《在中国投资的利益》（*Profits on Investment in China*）、《大战与远东商业》（*The War and the Commerce of the Far East*）、《学习汉语的商业政策》（*The Business Policy of Learning Chinese*），后两篇由著名记者鲍威尔执笔。《在中国投资的利益》文中提到：中国的工资低廉，约美国的十分之一，而中国的棉花工厂、开矿和建造铁路三种产业具有庞大的投资利润。《大战与远东商业》一文，则提出大战对东亚商业的影响有三：一、日本工业的迅速发展；二、中国相对保守的心态；三、对亚洲市场兴趣的增加和东亚工业的发展。他认为这些商业上的影响，其重要性不亚于政治外交领域。日本受大战的影响对同盟国家的输出也大有增加，1915年有1.56亿美元，1916年约有2.2亿美元。其中有约7000万美元来自俄国的订单，出口至英国亦增加不少，美国则约占日本出口的30%。在

^① “The Trade of Asia, An American-Asiatic Business Programme”, interview with William H. Williams, Vice-President of Gaston, Williams & Wigmore, Inc., *Asia: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April, 1917, pp. 122-124. 《总商会欢宴美国官商》，《申报》（1917年1月15日），第3张。

国际航运方面，日本亦为一战的受惠者，1914年美国进口货物中，由日本轮船载运的仅2.77%，但到1916年，已上升到8.12%。文末强调东亚低工资也使先进工业国家的工资平衡受到威胁，为谋求双方的利益，应在东亚培育技术工人使其得以自制半成品商品，如此将使西方工业国家和落后的廉价劳力国家彼此受惠。《学习汉语的商业政策》则强调美国若要拓展对华投资和扩大商业利益，有必要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以减少误解。通过语言的沟通——不论是上海的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或翻译的普遍化，中美人士双方的鸿沟已愈来愈少。总之，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切入，试图分析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日本工业的快速崛起以及美国在远东的最大商业利益和发展方针。^①

至于如何看待对中国事务具有野心的日本？作为美商团体的机关报，《美国亚洲协会期刊》与美国在华外交官和商务帮办往来密切，基本上呼应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以一战爆发之后最具争议的《二十一条》要求而言，该期刊于1915年7月号即披露《日本最后通牒》（*Japanese Ultimatum*）《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同期另有专文《日本人在中国》（*The Japanese in China*），该文破题即是一战爆发后日本占领青岛问题引起的争议，其次陈述日本吞并朝鲜和日俄战争导致的远东秩序问题，再缕述日本对南满铁路沿线以及中国东北的扩张企图，作者明白表达日本的作为正是趁欧洲等主要国家卷入大战而做出违背门户开放政策的举动，^②可能是出刊之前来不及讨论《二十一条》要求，该文并未讨论《二十一条》。到了10月号刊出标题醒目的《中国的消逝》（*The Passing of China*）和《日本对华之要求》（*Japanese Demand on China*），对美国长期主张维护中国主权完整的门户开

① “Profits on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War and the Commerce of the Far East”, “The Business Policy of Learning Chinese”. July, 1917, *Asia: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pp. 378-386.

② William Blane: “The Japanese in China”, July, 1915,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pp. 171-176.

放政策语带嘲讽，挑明1908年鲁特高平协议的换文可说美国维护中国立场所发出的最具希望的一项“抗议”(protest)，但未能遏止当前的结果，美国外交正处于一种既尴尬又无奈的现状。“美国应同情中国处境，甚至应向日本抗议，但也不必自欺欺人认为美国可以从实质上改变多大的现状”。“我们什么都没做，也不能做什么，但将来如果有人诚实面对美国外交史，我们将感到羞耻”，该文原刊于美国具新锐改革思想的期刊《新共和》(*New Republic*)，司戴德也是此一期刊的创办人之一。^① 这些主张和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同情中国的主张互为呼应。^② 美日微妙的关系也反映在战时美日合作的议题上，从战争初期对日关系有所疑虑，到美国参战后逐渐出现与日本合作共同开发中国的主张，上述提到《美国亚洲协会期刊》1917年4月以后的言论即是呼应了美国外交战略下商业现实利益与国家战略目标的一致关系。可举一例，1915年，被美国人冠以“日本摩根财团”的日本大企业家涩泽荣一(Baron Shibusawa Eiichi, 1840—1931)^③ 提出美日携手合作开发中国的想法，当时美国政府对于日本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有所疑惧，并时而展现与日本竞争的意味。直到1917年4月初美国参战后，因美、日同属协约国盟友，美国对中国外交事务上与日本的合作始趋于明朗：不仅于1917年11月初与日本签署“兰辛石井协议”，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且在中国的投资开发问题上亦倾向合作。^④ 美国参战后，1917年5月《美国亚洲协会期刊》刊出文章《我们亚洲的联盟》(*Our Asiatic Allies*)，强调美国必须在中、日之间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将日本因

① “The Passing of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Oct. 1915, pp. 53-54., *Japanese Demand o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Oct. 1915, pp. 54-55.

② 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译：《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02~118页。

③ 涩泽荣一于1902年访美，被美国媒体称为“日本的摩根”(J. P. Morgan of Japan)，当时他名下已有40余个公司、银行和铁路事业。*New York Times*, June 14, 1902.

④ 吴翎君：《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第164页，第200~201页。

素纳入远东整体利益来考虑，倾向美日合作的态度。^① 但该刊对于中国反日民族主义之情结始终抱以同情，特别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中国反日情绪持续高亢的状况下，该刊曾于1917年6月刊出爱荷华大学商学院的中国留学生 T. L. Li 投书，强烈反对美日合作开发中国，认为以美国在工业技术上的领先，根本不需要与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共同合作来开发中国，指称美国如和日本合作，等同狼狈为奸。^②

（三）中国参战角色与地位

1917年2月，中国宣布与德断交，美国国会于4月初宣布参战。此时中国是否可能随美国参加一战？中国为何参战？为何中国加入日本和协约国一方？以及中国希望得到英国和美国什么样的支持等议题，同样受到“美国亚洲协会”的关注。在《中国为何参战》（*Why China Enters the War*）一文中，就中国政府对德宣战的理由，作者略有保留。因为日本素来对中国的野心和挑衅绝对胜于德国；此外，如以德国采用潜水艇作战以致中国人遇难作为参战理由，亦不具说服力，因为各国都知道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是不力的。这篇文章对中国为何和德国断交，且可能加入协约国一方的发展略有质疑，但也分析中国欲借由参战机会取得若干利益，包括希望获得英美的支持参与国际事务、财政和军事援助以及战后恢复目前被剥夺的权益等多方考虑。他提到尽管日本同意中国参战，但已做好如何保护在中国既有权益的盘算。该文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新式部队的装备，却认为这些部队和装备若由中国军官指挥，将无法发挥作用。^③ 此文大致呼应了美国政府最初对于中国参战态度的疑虑与态度，并不鼓励中国参战，以免中国成为协约国家的包袱。^④

① “Our Asiatic Allies”, *Asia: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May, 1917, p. 163.

② “The Trade of Asia: An Objection to American Cooperation with Japan in China”, *Asia: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June. 1917, pp. 299-300.

③ “Why China Enters the War”, *Asia: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April, 1917, p. 163

④ 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第13~25页。

1917年8月14日中国正式对德、奥宣战后,《美国亚洲协会期刊》刊出“今日中国”(Present Day China)专栏作家哈汀(Gardner L. Harding)所撰之《战时中国的角色》(*China's Part in the War*)。不同于上述中国参战前该刊持论的消极态度,作者提到中国从华工派遣、原料、兵工厂和食物供给均可对协约国家的援助发挥重要的作用,并肯定中国的参战可使远东局势更加稳定,有鼓舞协约国土气的作用;强调日本、中国和美国在同一目标的合作之下,中国将在未来更稳定的远东局势上发挥作用。该文以近两页的篇幅介绍华工在英法华工营的优良表现,就中国人对一次大战的贡献予以正面肯定。文中并提到上海新式工厂的发展,已略现规模,例如Nicholsa Tsu(中文名不详)的机械工厂在中国领班的带领下,已可生产电车、铁路、轮运等钢铁零件,上海新兴的棉纺织工厂和汉阳钢铁厂也略有规模,甚至在西方技术支持下,刚萌芽的军火工业,亦可发挥补给物资的作用。该文最后提到近年中国输出大麦、大豆、冷冻食品和干货等的数量快速增加,这些都是中国对协约国家的具体援助。尽管这些物资的输出是一种获利交易行为,但就其结果仍对战时欧洲民生食物的短缺提供了来源。^①也有数据显示中国于大战期间的1918年输出的火腿肉有400万磅之多,价值60万海关两(约值美金716000元,当时1海关两等于1.193美元),而英国则是中国火腿产品的最大输入国家。这些火腿的产地包括汉口、上海、杭州和云南,特别是云南火腿的口碑甚佳,其次为浙江和湖南。中国东北为大豆和豆油输出中心,以大连为主要输出口岸,1918年输出146186美吨,价值24047036海关两(合28747764美元)。^②

随着1917年4月美国参战,8月中国宣战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海内外美国人愈来愈关注战争议题,关于如何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言论已

① “China's Part in the War”, *Asia: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Oct., 1917, pp. 644-646.

② Julean Arnold; “Chinese Products of Interest to American”, in Julean Arnold ed., *Commercial Handbook of China*, Vol. II, p. 274.

非焦点所在。特别是俄国大革命后的政治动荡，使得《美国亚洲协会期刊》愈来愈关注东方的政治议题。1918年4月，该刊表明自美国参战后他们已是一本“战争杂志”（War Magazine），并认为美国在这次大战的巨大危机中，负有重大责任，宣称“东方的危险即是我们国家（美国）的危险”、“我们已经在战争的中心”。^① 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前夕，该刊为配合战时节约政策，表示为节省刊物印刷经费，仅印行会员纸本，不再于书报摊零售。

大战结束后，《美国亚洲协会期刊》重新审视该刊物的走向和编辑方针，他们意图转型为一本文化期刊，以分享东西文化交流的理想自许，并希望成为欧美国家认识亚洲的一个媒介。1919年11月，编辑部宣布代表商人利益的“美国亚洲协会”组织正式退出该刊的管理和运作，这份刊物不再是该协会的机关报。1917年3月，该刊曾由《美国亚洲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改名为《亚洲：“美国亚洲协会”》（*Asia: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1919年12月，再改为《亚洲：东方议题的美国杂志》（*Asia: The American Magazine on Orient*）。改版后的《亚洲》杂志，封面已不再出现“亚洲协会”名称，其报道内容虽包括远东和中东消息，但中国议题始终占有最多的篇幅。

四、结论

“美国亚洲协会”创办的时间适逢美国酝酿门户开放政策的阶段。从该协会的成立、创办初期到大战阶段，门户开放政策始终是该协会标举的旗帜。作为一个美国商人团体的组织，他们对于门户开放政策和保全中国主权完整的关心，实系出于经济扩张的愿望和理由。一战爆发以前中国市

^① “The Worst disaster of the War”, *Asia: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April, 1918, p. 273.

场对美国确实并不直接重要，但商人团体对中国市场的想象和要求，激发了门户开放政策的主张，而深植美国决策者心中；特别是在大战爆发以后，由于欧洲大国卷入战事无暇顾及远东，而使中立的美国得以盘整其海外市场及远东市场的布局。在“美国亚洲协会”主席司戴德、美国驻华商务帮办阿诺德和美国商界等重要人物的全力鼓吹之下，“美国亚洲协会”所刊出的一篇文章，展现了商人团体对于中国市场的强烈企图心和各种要求。此一时期的中美商人也自觉地将经济与外交联系起来。1917年上海《申报》刊出上海总商会宴请威廉斯的消息，这份报道提到宾客中尚有美驻上海领事等三十余人，由朱葆三致欢迎词，美总领事致答辞，威廉斯发表演说。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期许“东西两大共和国永联为兄弟之邦，商务益臻发达”。威廉斯则鼓励中国商人出外游历，以结识美国商人，“苟敝国人民得能如余多识贵国商人，则将如余之放开眼界，而成热忱赞助贵国之人矣”。威廉斯畅言商人对国际友谊的责任不亚于外交家：“外交家之光阴，其能专注外交者不过四分之一，而商家之光阴，其能从事于国际发生商务上更友好交谊之外交者则占四分之三。”^①从这些言论都可以看出商人组织在经济外交上的作用。

“美国亚洲协会”的言论和主张，推进了一战时期美国政府和民间开拓中国市场的积极作为，而其关注的议题，则涵盖中国社会接纳以美国所代表的西方科学和技术的条件和适应性，期许美国资本家应扮演文明与进步的传播者，引领中国走向工业化的进程。为吸引资本家把握契机到中国投资，该刊除强调中国广大市场的潜力、廉价的劳工和勤勉的个性之外，更塑造清新有活力的中国“新国民”的良好形象，主张美国人应发挥中美友好的传统来协助中国。在中美合作方面，表示中国人亟须美国的技术援助和资金投入，留美归国学人已发挥此一作用，但仍是不足的；呼吁美国人应学习汉语，更加理解中国，从文化方面深入中美两国的相互了解。

^① 《总商会欢宴美国官商》，《申报》（1917年1月15日），第3版。

由《美国亚洲协会期刊》的报道，可看出一战时期该协会对新中国和新市场的期待，不论是大战爆发初期或是战争后期始终一致，该协会认为一股中国民族主义的新精神正弥漫全中国，这股振奋的国民精神在中国参战后更显出一股指日可待的锐气，中国人民和劳工勤奋积极，新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参战后，该刊大力肯定华工对一次大战的贡献。更重要的是，该刊认为一战时期中国向欧洲国家输出大麦、大豆、冷冻食品、干货和火腿等食品，中国虽从中获利，但此举也对深陷战火和物资匮乏的协约国家人民的生活和物资供给做出具体贡献。“美国亚洲协会”不仅从政治层面对中国表示友善，且从中国所提供的经济物资数据说明中国对一次大战的贡献。

就对日关系而言，美国参战前“美国亚洲协会”对日本政府比较有戒心，在美国政府参战后为谋求同为协约国家的日本在远东的合作关系，尽管他们对中国遭受《二十一条》的处境表示同情，标举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原则，但在开发中国的议题上，他们是将亚洲视为一个整体，主张美国可与日本合作共同开发中国。在对日的主张上反映了商人群体的务实投机，并呼应战时美国对远东关系的虚饰暧昧的两手策略，意图将日本纳入商业伙伴关系，但又对日本的政治军事扩张充满疑惧的复杂心态。

“二十一条要求”和中日关系

川岛真*

绪言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了其中一至四号。“二十一条要求”与5月25日签订的相关条约一起，被视作日本对华侵略的象征之一，同时也是中日关系恶化的转折点。在中国外交史上，“二十一条要求”屡屡被视为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象征，其交涉过程也被视作北京政府卖国外交的佐证^①。

在既往研究中，张振鹞曾指出被视为“不平等条约”的“二十一条要求”并不是条约，并反问若称为条约的话，那么其条款又是什么。这一论争并没有改变对“二十一条要求”和袁世凯的否定倾向。^②直到唐启华对这样的研究史提出了疑问。唐氏认为，对“二十一条要求”的诠释始终摆脱不了政治性，使得民国时期北京政府的外交被贴上“卖国外交”的标

* 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副教授。

① “二十一条要求”这一名称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虽然当时已经有“二十一条要求”这样的说法，却没有像今天这样约定俗成。

② 张振鹞：“再说‘二十一条’不是条约——答郑则民先生”，《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签，这也导致了对袁世凯的负面评价。唐还指出，对“二十一条要求”的诠释是国民党政权、共产党政权所逐渐构建出来，评价不是一成不变的。^①譬如，王芸生在1933年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曾对袁世凯政权的交涉做出了肯定评价，而该书的1980年再版和2005年三版却对袁赋予了否定的评价。^②唐本人将“二十一条要求”和1915年5月25日签订的条约内容对比后，对袁世凯政权关于“二十一条要求”所进行的交涉过程持肯定态度。

笔者同意唐的这一看法。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关于“二十一条要求”交涉的相关研究，受到史料的制约而缺乏充分的实证性研究。在中国外交史领域，王芸生使用了目前较难阅览的驻日公使馆档案，是该研究史中的实证研究先行者。其后李毓澍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的外交档案，对王芸生1933年的研究做出了批判，打开了实证研究的新视野。但是，李的研究戛然而止于上卷，这也反映出中方相关档案的情况，留有记录的从1915年1月18日提出“要求”开始，2月初第一次交涉以及到3月9日召开第八次会议，之后的交涉并没有留下充足的交涉记录^③。根据王芸生在1933年对驻日公使馆档案的引用表述来看，1915年3月13日会议后的情形不再以会议记录的形式呈现。史料欠缺的情况同样存在于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相关档案大部分业已丢失，只残存松本记录^④。在这样的史料状况下，中国外交史研究呼唤了实证研究的不断积累。

①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特に第五章“废除《中日民四条约》交涉”）。

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全六卷、大公报社）1933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全六卷、三联书店），1980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全八卷、三联书店）。

③ 王芸生对交涉后期的叙述也不详尽，可推测驻日公使馆的档案出现同样的状况。

④ 日本外务省保存记录中的“松本记录”是已故原众议院议员松本忠熊就任外务参与官以及外务政务次官期间（1933年12月—1939年1月），誊写政治、外交、条约相关的重要资料后收藏之物，战后由其遗属捐赠给日本外务省。

其中，徐国琦的研究可谓从国际关系史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崭新的观点。^①本稿第一课题在于，通过重读既有的中方史料辅以中国以外的史料，试图提出中国外交史上新的见解。

另一方面，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从外交史方面对“二十一条要求”停滞不前。但是，或许因为在中国大陆对外交档案的阅览受限，围绕“二十一条要求”的外交交涉及其性质都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与之相对地，中国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动向则自然成为主流研究课题。这样，对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却有很大进展。

日本近代史领域中则呈现与中国外交史不同的观点，这与彼时中日两国所处的立场不同有关。换言之，彼时日本的对华外交，不仅包括对中国本身的外交，也包括在中国这个舞台上与其他列强之间的外交。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围绕“二十一条要求”的相关研究，可以分为日本内政史，日中关系史，日本与列强外交史这三大类。介绍这一研究动向也是本稿的目的所在。

因此，本稿将先介绍日本方面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研究观点，在此基础上重读中国外交档案，探讨由此可以展开何种论述，以期达成本稿第一课题目标。

日本外交史研究和“二十一条要求”

在日本学界，从中国外交史视角出发研究“二十一条要求”不是主流。虽可举出藤井升三和村田雄二郎的中国外交史视角研究，但两者的研

^① 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研究对象都不是“二十一条要求”交涉本身。^① 日本学界的“二十一条要求”研究主要是在日本外交史领域进行。

而在日本外交史领域，在处理上述课题时，可以考虑从以下几种研究方法入手，这同时也呈现了当时日本对华政策的形态。第一种是从日本内政面看决策过程，即作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二十一条要求”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何种势力的何种意见反映在“二十一条要求”的哪一部分，其中包括对当时舆论的研究。实际上，由临时内阁会议提出，1914年11月11日交给日置公使的训令案为十七条，其中并没有 request 和 demand 之分（后文将论及 request 和 demand），其后，接纳陆军的要求形成第五号后变为二十一条。而中国最后同意的1915年1月26日修正方案，也不是二十一条而是二十四条。^② 第二种是从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领域考察，其中又可以分为中日交涉等中日关系史领域和围绕中国的列强间关系史领域。这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日本的对华政策。换言之，日本的对华政策不仅受到对华外交以及交涉的影响，还受到列强间协调关系的制约，后者形成于《辛丑条约》签订前后，因公使团的存在而变得愈发明朗。^③ 这意味着日本并不能独自实施对华政策，必须与以同盟国英国为首的列强各国协调。虽然，“二十一条要求”被称为日本“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但并不是没有和列强间进行协调，而是与列强的协调失败后让中国吞的苦果。关于这一点，北冈做出了极低的评价，“在日本对列国关系中，没有比《二十一

① 藤井昇三：“二十一条交涉時期の孫文と《中日盟約》”、市古教授退官記念論叢編集委員会：《論集近代中国研究》，山川出版社，1981年；村田雄二郎，“日本の対華二十一条要求と五・四運動”（和田春樹ほか編：《岩波講座 東アジア近現代史第三卷 世界戦争と改造 1910年代》，岩波书店，2010年。

② 奈良岡聰智：“加藤高明と二十一条要求—第五号をめぐる”（小林道彦・中西寛編著：《歴史の桎梏を越えて—20世紀日中関係への新視点》，千仓书房，2010年。

③ 櫻井良樹：《辛亥革命と日本政治の変容一九一四—一六年》，岩波书店，2009年。

条》更失败的了”。^① 奈良冈指出这种失败最显见于第五号。他这样说道：“如果没有第五号，《二十一条》就是‘凝练的帝国主义外交’，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各国也不会有异议。再强调一遍，第五条才是让《二十一条》交涉变得困难的根本问题。”^② 虽然，中国的研究者们或许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但从日本外交史观点来看，“二十一条要求”确实被定义为日本对列强外交的失败，特别是第五号。“二十一条要求”虽是对日本政府各部门要求的汇总，但却没有受到明确的方针引导。^③ 现在清楚知道，成为关键问题的第五号是根据陆军的要求而加入的。从内容来看，堀川武夫做出了这样的整理：(1) 为了保障日本优势地位而保全中国领土（第一号第二条，第四号）；(2) 调整和确保日本既得利益（第二号第一条，第四条，第七条，第三号和第一号前段）；(3) 设定新权益。在这些新的设定中，既有其他列强因最惠国待遇得以利益均沾的（第一号第三条、第四条，第二号第二条、第三条，第五号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七项），也有并非如此的（第二号第五条、第六条，第三号第一条后段、第二条，第五号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④

日本参加一战以图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但因最初就是打着“归还中国”的大义旗号所进行，最终也就将山东权益还给了中国。日本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满洲权益得以延续。具体是指延长旅大的租借期限及满铁吉长铁路的权益期限，确保日本人的内地杂居，在满洲权益的延长。此

① 北岡伸一：“二十一条再考—日米外交の相互作用—”，《年報・近代日本研究 七 日本外交の危機認識》，山川出版社，1985年。

② 奈良岡聰智：“加藤高明と二十一条要求—第五号をめぐって”，小林道彦、中西寛編著：《歴史の桎梏を越えて—20世紀日中関係への新視点》，千仓书房，2010年。

③ 長岡新次郎：“对華二十一条要求条項の決定とその背景”（《日本歴史》，第144页，1960年1月），1960年。

④ 堀川武夫：《极东国际政治史序说》，1958年。

外，关于在“二十一条要求”加了汉冶萍公司的相关要求。白井胜美认为，虽然在第二次西原寺内阁时期就中日合办一度达成了一致，但其后中方改变态度，为了再次促成合办，而将其加入第三号中。^①然而，外相加藤高明留下了太多问题：为何将第五号作为 request 提出？为何只对列强明示第一号至第四号，却藏起第五号？为何在消息泄露后又说明称是 request，而不是 demand？为何一直到4月26日提出最终方案为止，一直坚持第五号？因为第五号招致列强各国的强烈反感，日本研究者的关注点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条。从中国外交史的观点来看，第五号和山东满洲权益同样至关重要，在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领域里第五号成为聚焦点，这同样也反映在研究史中。此外，日本学者还关注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做出最大牵制的美国，堀川武夫就是其中一人，他继续了细谷千博先驱性研究，从关注围绕“二十一条要求”的日美关系出发，指出在美国国务卿布赖恩（Bryan）主管相关事务时，对日本采取的是绥靖政策，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开始参与到该问题后，美国开始对日强硬。^②

北冈着眼于日美关系对第五号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第五号特别是其中第一、三、四项并不是为了让中国照单全收而制定的，而是预料到交涉过程会比较艰难，为了在交涉中有可以交换条件甚至是大幅让步而准备的一个筹码。”这种论点同时包含了因为最后会放弃第五号，所以无需知照其他列强的想法。此外，北冈还批判称王芸生（1933）的研究过分偏信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1922）的言论，强调应该更为正确地探讨日美间的互动。^③北冈认为，问题出在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担任美国驻华公使时期，向美国传达了某种程

① 白井勝美：《日本と中国—大正時代—》，原书房，1972年。

② 堀川武夫：《极东国际政治史序说》，有斐阁。細谷千博（1960）：“‘二一条要求’とアメリカの対応”，《一橋論叢》，43卷1号，1958年。

③ Paul Samuel Reinsch（1922）：《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New York：Doubleday，Page & co. .

度上被夸张了的，或是北京政府所“宣传”出来的效果。确实有不少意见认为，在“二十一条要求”交涉上，源自袁世凯政权向芮恩施泄露了第五号内容，美国开始对日强硬。但实际上，正如北冈所指出的，美国当时在收到芮恩施的报告和已知第五条的情况下，按照布赖恩所见仍然对日表示友好，这一点也出乎日本的意料。然而，美国这样友好的态度反而助长了日本的对华强硬，日本于同年3月开展了军事行动。正因为这样，1915年4月16日，威尔逊做出承诺，宣称“用尽一切努力守护中国”后，日本才开始苦于应对^①。按照北冈的说法，大抵就是日本最初企图利用第五号做谈判筹码，因美国的姑息和中方拒绝谈判没能派上用场，转而利用军事力量对中国施以高压，美国转为对日强硬后又骑虎难下这样一件事吧。^②

岛田洋一对上述北冈的“第五号交换条件”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岛田认为，外相加藤高明并不是将第五号所有的内容作为谈判中的交换条件，至少是想让中国同意其中一部分。譬如，在第五号中，日本最重视的铁路利权。事实上，加藤曾在日俄战争后日清间的满洲条约交涉中，使得清政府同意了一部分隐瞒列强的秘密条款。奈良冈（2010）对上述两位学者的讨论做出如下整理，第五号中既有交换条件，也有希望中国同意的内容，前者譬如中日合办警察机构，后者譬如铁路利权。^③

综上所述，虽然日本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研究，也论及日本的侵略性，但主要以日本内部的决策过程和日美间交涉为研究对象^④。近来，还出现了像奈良冈围绕“二十一条要求”中日交涉和列强间交涉的“情报

① Wilson to Bryan,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 of Woodrow Wilson*, vo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pril 1980), p. 531, 1915.

② 北冈伸一（1985）：“二十一条再考-日米外交の相互作用-”，《年報・近代日本研究 七 日本外交の危機認識》，山川出版社，1985年。

③ 島田洋一国：“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政治经济史学》，第259号、260号，1987年11月、12月，1987。

④ 就日本与其同盟国英国的关系，Peter Lowe（1969）已作出了综合性的探讨，近来奈良冈聪智利用新公开的史料在其基础上做了适当的补充。

战”研究。^①从向芮恩施泄露消息一事的关键性来看，确实存在相关交涉呈现出“情报战”情况，期待该领域的研究有长足进展。另一方面，期待中方从中国研究的视点出发，以作为袁世凯政权对外宣传喉舌的《北平日报》(*Peking Daily News*)和《北平京报》(*Peking Gazette*)为媒介，做出类似面向的考察^②。

本稿将在下一章探讨，对于上述日本的研究动向，利用中方的史料又能得到怎样的见解，这是本稿的第二个课题。

中国外交档案和中日交涉谈判开始前情况

在中国的外交档案中，也留有有关中日间围绕《二十一条》交涉过程的记录。日本的研究一味侧重美英，最近还将德国放入研究视野，但并没有对中国外交档案的内容加以分析。另一方面，王芸生（1933）在进行相关研究时，日本外务省的记录并未公开，李毓澍只利用了《日本外交文书》的一部分，没有利用外务省记录。所以，中方的相关研究也称不上充分了解了日本的研究史。^③

1915年1月18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

① 奈良岡聰智：“第一次世界大戦初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外交世論-参戦と二十一条要求をめぐって”（一）（二），《法学論叢》，174卷5号、6号，2014年2月、3月，2014年。

② 1915年1月28日，上海《申报》在报道中明确提到了“21”这个数字。在2014年6月22日的东亚近代史学会研究大会《第一次世界大戦之东アジア世界の変容—第一次世界大戦勃発100年にあたって—》（於丽泽大学）上，从日本史、中国史、英国史、德国史的角度聚焦21条，展开了多方面的讨论。其中也在侵略、被侵略的逻辑基础上，探讨了以多重视点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可能性。

③ 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8），1966年。

求”，20日正式向外交部递交同案^①。据曹汝霖回忆，1月19日，袁世凯召集外交总长孙宝琦、外交次长曹汝霖、梁士诒商讨（曹汝霖的回忆中将梁士诒称作秘书长有误，此时总统府秘书长是阮忠枢，不是梁士诒。梁士诒时任税务处督办）后，指出第五条“万万不可开议”。^② 不管如何，外交部高官在20日之前的19日就已经知道了《二十一条》的内容。一般认为，日置益直接递交要求给袁世凯而不是外交部，有违常理，但对于当时的外交部中并未被视为问题。媒体报道中称，此种行为有违外交礼仪，1915年2月17日政事堂顾问狄谷（H. de Coudt）和卫罗璧（Willoughby）向外交部提交了表明自己看法的说帖。卫罗璧在说帖中对日本报纸以在中国总统权力最大为由而认同提交给袁世凯一举，做出了反驳。他认为，美国和中华民国同为共和政体采用大总统制，虽然有时允许驻华盛顿的外交官与大总统直接交涉，但是选择权在于美国总统，外交官一方并无权利选择交涉对象是外交部长还是总统，并作结称“日本公使破坏外交习惯之重大，端在于此”^③。1月20日，政事堂和外交部向驻日公使陆宗輿发电报表达了为难之处，“查我政府正极讲亲善之方，不意提出此等严重条件，实使政府为难。现正详加讨论，再期应付”^④。1月21日，陆宗輿在回电中建议，在日本展开军事行动之前，应从中日两国间可以谈判的案件着手交涉^⑤。

“日置所提条件，即所谓根本解决办法，日本蓄意已久，现特乘机而

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二十一条交涉》（中华民国四年至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1]。

②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

③ “中央研究院”，1966[69]；王芸生（2005、78页）根据 Paul Samuel Reinsch (1922),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 的记述，指出日置递交的文书用纸违背外交惯例，认为是“蛮横”之举。

④ “中央研究院”，1966[1]。

⑤ 这一时期，东京流传出中国与德国合作的消息，而驻日公使馆不得不予以辟谣。

发。现即为难，绝非口舌所能解决，容再探意见，面询理由。当此时局，且不预请他国说话，为救危急起见，只有请政府先定何件可让之一款，与彼推诚相商，总令其不先动兵，则所损尚可稍轻。时机危急，请速定方针”^①。

然而，北京政府不是这样判断，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和日本展开情报战^②，诉诸内外舆论，期待其他列强牵制日本，同时拖延谈判进程^③。

从1月18日递交要求到2月2日举行第一次谈判期间，消息已在国内外传开。因日本国内为保密禁止报道，可推想消息只能是中方传出。《（东京、大阪）朝日新闻》驻北京特派员神田正雄传出消息后，《朝日新闻》于1月23日以此作为号外发行，其后被政府取消发行。这也是日本媒体对袁世凯政权在北京放出消息所作的反应。该号外报道了第一号、第二号以及第五号的一部分（一部分有误）。再看中国国内，1月22日《申报》只报道日方提出惊人要求，23日该报引用了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并称要求有二十四条。但《申报》的报道略显混乱，26日报道称要求有二十条，并介绍了内容。28日《申报》第一次报道称有二十一条。在欧美圈，*Washington Post* 和 *New York Times* 27日的报道中都使用了二十一这个数字。奈良冈认为，消息来源都是芮恩施公使。^④ 日本的既往研究大多关注：

① “中央研究院”，1966 [2]。

② 日本方面同样也展开了情报战，1915年2月17日，外交部对在外公馆下令称“近日日人屡译改中报，意在挑拨各国感情。嗣后各处遇有登载中报涉及邦交之件，希注意改查，并随时更正，以免误会为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二十一条交涉》[中华民国四年至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 [70]）。

③ 1月27日将外交总长从孙宝琦换成陆征祥也是拖延谈判的方法。陆于28日上任，29日谒见外交团，30日开始办公。关于孙宝琦的辞任众说纷纭，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8），1966。

④ 奈良岡聰智：“加藤高明と二十一条要求—第五号をめぐる”，小林道彦、中西寛編著：《歴史の桎梏を越えて-20世紀日中関係への新視点》，千倉书房，2010年。

1915年1月22日消息已经“泄露”给美国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 1922），但这一点在外交档案中无法得到确认。正如细谷指出“中国政府为了使威尔逊放弃对日姑息，揣度他的心理特征而做的顽强工作”，日本的学界认为，这是中国敦促美国放弃对日姑息的做法。然而与美国的交涉过程，并没出现在驻美公使夏偕复的一系列报告中。^①

中方的泄密之举屡次被日本视为重大问题。在1915年2月4日第二次会议和2月22日第三次会议，同样提到前次会议内容泄露的问题。日置特别重视的是英文北京日报及北京京报，也就是 *Peking Daily News* 和 *Peking Gazette*。日置指出，英文《北平日报》与外交部关系密切，交涉内容就是从这里被披露，然后中国各家报纸再行转载，要求外交部进行管制。外交总长陆征祥对此回答称“但今日之时代，言论自由与前清时代不同，为贵公使所深知，且贵国报纸往往有不当之言论，甚至有诋毁大总统时之时”。^②

虽然，前文提及在外交档案中无法确认向芮恩施泄密这点，但可以确认的是23日芮恩施向国务卿布赖恩报告了“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然而，正如日本的研究已经阐明，袁世凯政权的情报泄露战略在这一阶段收效甚微。在同盟国英国国内，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至少在2月9日之前都不知道第五号的存在，或是不相信。这是因为直到2月10日加藤高明外相才向《泰晤士报》的中国特派员费雷泽（Fraser）证实了第五号的存在^③。

那么，北京政府本身是如何看待第五号的呢？且看2月2日第一次谈判前袁世凯所发的“声明”。1915年2月1日，大总统府机要局声明（外交部）就“二十一条要求”做出评论称，“日本此次于欧战未结之时，忽

① 细谷千博：“‘二一条要求’とアメリカの対応”，《一橋論叢》43卷1号，1960年。

② 陆宗舆（1925）：《五十自述记》，文楷斋承印，1960年。

③ 奈良岡報告：《第一次世界大戦と東アジア世界の变容—第一次世界大戦勃発100年にあたって—》，2014年6月22日，东亚近代史学会研究大会。

然向我提出侵害主权，攘夺领土之条件，人皆谓此日本曩年对待朝鲜第一步之见端，而余则以为各国今日共分中国已决定之现象”，采用了将中国比作第一次中韩协约时朝鲜的手法。当时的报纸经常采用这一手法。^①

与第五号相关的“秘密交涉”称，“本月二十日日本公使至外交部会晤时，口称此系秘密条件，应秘密磋商。而余则揆情度势，以为日本提出之先，已与英、俄、法三国商定，方正式向我提出，绝非秘密”，认为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前已与英、俄、法进行协商，因此未视为机密，并抱有列强再次联合瓜分中国的危机感。判断日本事前已与英、俄、法协商的证据为“设日本此举不先商同三国，即使各该本国现有战事，而事定以后，三国利害所关，必协力以争，日本即能强取于目前，绝不能保守于异日。日本外交何等灵敏，决不出此，故日使秘密磋商之语，皆其外交阴险恶计，以诱我赶速订约之手段，绝非真相，可断言也”。又如“故目前三国无可如何，只得忍气吞声，表其同意。设我国今日与日本议有头绪，英、法、俄三国即借口保护机会均等之说，先后提出内蒙古至广西一带之种种要求，当可断定”所称，认为与日本的谈判会带给其他列强新利权交涉的借口。正因如此，如“然则日本要求之条件即决，三国效尤之政策亦定，国事其终不可为乎，曰不然。细揣三国之隐衷，其愿赞助中国，但不能形之于言语，只要中国不答应日本，三国求之不得，决不继续要求”所述。中国必须考虑相应对策，既要引起三国的同情，避免连锁反应，它们紧随日本之后也提出权力要求。

与第五号相关的部分如下：“但日本此次提出各条款，意甚坚决，所可磋商者，其中仅有某某等条无关紧要之数处，其列入时，本为预备磋商时作表面上的退步，实无取得必要之思想。其余重要各条，志在必得者，我国如不照允，彼早已预备战事，立刻即可派兵来华。”这里并没有明确锁

^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二十一条交涉》（中华民国四年至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22]。

定第五号，但代表了一种认识，即有几条无关紧要的条文是为了谈判时妥协而制定的，但中国如果拒绝重要条款则有战争之虞。最终，中方拒绝了第五条，答应了第一条和第二条日本关于山东和满洲利权的要求，从这一交涉结果来看，应存在中方认为第五号和其他若干条就是所谓的“无关紧要之数处”的可能性^①。此外，《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中收录有“二十一条要求”的档案，其中存有“宜先将第二号完全解决，再以我出意见议一三号，其第五号始终不议”的批示，尽管该批示是否出自袁世凯之手，若的确为袁世凯其又于何时批示仍有待确认，但显然与中国交涉的方针相符。^②

回顾前文，关于第五号，北冈认为这是一种谈判时用来“交换的条件”。^③ 岛田认为至少希望中国同意其中一部分。^④ 最近涌现的奈良冈的研究认为“搞过头”和“秘密处置”是导致纠纷的原因。^⑤ 而中国至少知道《二十一条》当中是有“交换条件”的。虽然没有明确锁定是第五号，但从拒绝了第五号的结果来看，可以认为中方是将第五号看作“交换条件”的。

① 为了拖延谈判，中国还曾打算提议在东京召开谈判会议，“我国此时见日本公使，当告以贵国此次提出之条件于我大有损害，倘在北京开议，国民必大起反对，尔时我政府无理由折服国民，即使我中央可以磋商，而国民非常反对，必至酿成意外事端，殊非我两政府和衷协商之本意。故现拟将此件移至东京，令本国驻日公使就近与日政府商议，可暂时避去国内之闻见云云”。

② 陈瑞芳、王会娟编：《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1992年，天津古籍出版社。

③ 北冈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北冈伸一：“二十一条再考-日米外交の相互作用-”，《年報・近代日本研究 七 日本外交の危機認識》，山川出版社，1985年。

④ 島田洋一：“对華二十一条要求”，《政治经济史学》第259号、260号，1987年11月、12月，1987年；島田洋一：“对華二十一条要求問題”，大久保利謙ほか編：《第一次世界大戦と政党内閣》，山川出版社，1997年。

⑤ 奈良岡聰智：“第一次世界大戦初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外交世論-参戦と二十一条要求をめぐる”（一）（二），《法学論叢》，174卷5号、6号，2014年2月、3月，2014年。

中国外交档案和中日交涉谈判开始后情况

2月2日第一次谈判开始后，议论聚焦在第一号的山东问题和第二号的满洲问题。经过第一二次的谈判，中国对第一号的若干条文提出疑义，2月9日又提出修正案，试图拖延谈判。在2月22日第三次的谈判中，日本提出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后再还给中国，中国以日德需协商后才能决定为由拒绝。^①

日置云：必将租借地归日本，始能言交还中国。将来日本与德国商议时，若有胶澳外一语，则胶澳仍为德有也。

总长云：贵国政府与德国协议后，始能交还中国，亦系预约之意。因贵国政府将来必定交还中国，故有此理。

日置云：权利不完全，不能言交还，胶澳自德国租地而归为日本租地，然后交还中国，是当然之事。

此外，中方也不愿意接受日方所提出的速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的要求和日本企图在山东半岛新设德国未享有的权益（如铺设铁路等）要求。^②

在第二号上，日本既希望通过此号确保南满权益，又希望将权益扩大到东蒙古。中国在2月4日的第二次会议中对前者响应称“第二号第一款为延长租借地期限事。本国政府多年以来，受租借地之影响很大，方冀期限一满，即行修改此项条约，不再租借于外国。此贵国政府所深知者”，表示很难再延长租借期限，对后者要求答称“东部内蒙古，因与南满洲毫无关系，拟提出另议”，提出将东蒙古与南满洲分开讨论。^③ 第二号第三款如果删掉东蒙古部分则与第二款几乎一样，如果从第四五六款中剔除东蒙

^① “中央研究院”，1966 [89]。

^② “中央研究院”，1966 [101]，“中央研究院”，1966 [112]。

^③ “中央研究院”，1966 [31]。

古部分则有商议的可能，中方表示出比较灵活的态度。2月9日中方提出的修正案中，删掉了东蒙古，只将南满洲列入讨论对象。于是2月25日的第四次会议上，就有了以下对话^①：

日置云：自本国政府观之，东部内蒙古与南满洲在历史上、地理上均有密切关系，贵总长谓为无关系，殊不理解。

总长云：贵国政府以东部内蒙古加入南满问题之中，贵国政府之主义，本国政府不了解。日方的想法是，通过第二号延长日俄战争后从俄国继承的权益，同时将日本在南满和东蒙古享受的现实权益变成白纸黑字^②。但中方只想就日俄战争后日本的既得利益进行讨论。^③这一情形可从第四次会议的下列对话中窥见一斑。^④

总长云：贵国政府此次提出第二号条件，不外根据日俄条约，以延长旅大租借地及南满铁路之期限为目的。

日置云：非专以延期为目的。鉴于南满及东部内蒙古现在状态，系由

① “中央研究院”，1966 [101]。

② 内地杂居等条款意味着，多居住于租借地及满铁附属地的日本人将扩大其活动范围，并不一定只是追认既成事实。中国方面指出，内地杂居与废除治外法权属于一体，如欲内地杂居则要求废除治外法权（“中央研究院”，1966 [130]）。“总长云：照原案有种种为难情形，本国政府系无可设法中提出之修正案。若在内地任便居住，则是内地杂居。内地杂居与领事裁判权最优关系，贵国当日亦有经验。领事裁判权为破坏主权之一端，内地杂居而不服从中国之法律，则各内地之主权均被其破坏矣。中国本欲以此事为收回领事裁判权之张本，有领事裁判权则不能内地杂居，由内地杂居则不应有领事裁判权也。”

③ 围绕日俄战争，中日之间的认识及解释迥然不同。这从松冈洋右和顾维钧在国联的辩论中可知，而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交涉中也可见双方的分歧（“中央研究院”，1966 [101]）。“日置云：南满地方若无日俄战争，十年以前已不为中国所有矣。今仍有完全之主权，而稍与日本人以特别之待遇，亦无足怪事。总长云：当日若无日俄战争，或有危险之情形，然贵国已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及吉长借款铁路，抚顺之炭矿，鸭绿江之森林，所得之权利甚多，是已特别优待。而又欲争此优越地位，万一各国群起要求，亦与贵国政府提出条件所云亲善之旨不相符。至云各国公认，则无明文，只闻有维持现状之语而已。”

④ “中央研究院”，1966 [101]。

事实而发生，欲订立条约以确定也。

此外，中方表示因租借地，南满洲铁路，安奉铁路的期限各不相同，即使延长也只是改换延长时间的组合，试图拖长谈判。此外，在期限的延长上，譬如以延长本来租借期为25年的旅大为例，延长同倍的25年还有可能，99年则不可能。陆征祥在3月3日的第六次谈判中这样说道：^①

总长云：本国政府实在为难，将来第一款宣布之后，国民必起反对，因租借地期限及南满铁路退还期限等，条约上本有一定之范围，如租借地原约为二十五年，仅能再展二十五年，今不愿条约上之期限擅自让步至九十九年，一般国民及外国人均将猜疑，谓何以展至条约以外之期限。故将收买期限照旧，亦可以对付国民。

此处饶有兴味的是对国民视角的关注。以国民的反对为后援进行外交交涉的这一姿态，也正与国内宣传吻合。随后日本决定向中国派兵，3月13日中国在日本宣战的压力下同意延长至99年。3月8日举行的第八次谈判上，陆总长抗议“第二号全号，中国均让步，贵国一步不让乎”，日置则答此乃“本国政府视之最重”。

虽然中国在日本的军事施压下逐渐对极为重要的第一号和第二号做出了让步，但正如细谷（1960）之后的日本研究所指出，1915年4月14日至17日期间美国的态度出现变化，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在4月16日作出承诺后，中国的态度转为强硬。此点在外交档案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除一二号外，如前文所述第五号也是谈判的重点。2月4日的第二次会议中日双方就第五号有以下对话。^②

总长云：贵公使所云第一号、第二号系订定条约，第三号、第四号互换文件，第五号系劝告之意，然乎。

日置云：诚然。第五号虽系劝告，亦必形之文书。

^① “中央研究院”，1966 [122]。

^② “中央研究院”，1966 [31]。

总长云：总之有三种形式，曰条约，曰互换文件，曰劝告。

日置云：但第五号之劝告事件，贵国政府果能实时办理，自无用文书之必要，如将来再行举办，则应有形式上之凭证。

日本所说明的从第一号到第四号是 demands、第五号是 request 这样一种形式，中国起初没能理解，而是通过最终以何种形式来达成妥协这样的方法论来形成理解的。2月4日第二次谈判上，中国明确表示第五号不能商议，并逐条说明了中方观点。^①

总长云：第五号中于本国主权有关系之事件甚多，不能商议。如聘请顾问，置办军火之类，中国政府本可自行斟酌办理，第一次会谈时，业经谈及。

日置云：请逐条发表意见。

总长云：第二条土地所有权为中国领土关系。第三条警察权系一种行政权，为中国之内政关系。第四条军械为一国重要之物，且事实上中国距贵国最近，将来必须购买之时，如果价廉物美，自然向贵国采办。第五条铁路事，多系借款办理，无以建造权许与外国之理。第六条军港船厂，关系最大。第七条布教之事，民国以来人民有信教之自由，贵国教士来华布教，自亦欢迎，然无规定之必要。

陆就第一项表示“第一条聘请顾问之事，中国政府拟自行斟酌办理，不必订约，即于必要之时，随意聘请。如聘请有贺博士为顾问之类”，批评了日本的强迫性要求。此外对中日合办警察机构，中国最为敏感。日方虽响应称中日合办警察仅限满洲，不指全国，但最终也未达成妥协。陆其后这样试探日方的真正意图：^②

总长云：全部不能商议。今第五号之大意业经遵照贵公使之意思，详细告知。贵国政府所注意者，系订立条约一部分之事，本国政府对于条约

① “中央研究院”，1966 [31]。

② “中央研究院”，1966 [31]。

一部分之事提出意见，愿与商议。现拟逐条讨论，以期进行。

由此可见，第五号是交涉的关键。前文曾提到，1915年2月9日加藤高明会见《泰晤士报》的中国特派员费雷泽（Fraser），对其承认了第五号的存在，其后袁世凯将“二十一条要求”的全文译文交给莫理循。确认了第五号存在后的英国改变了态度，要求日本不要做出违背日英同盟宗旨的举动。^① 2月22日举办的第三次谈判中，中国依旧不议第五号。^②

日置云：日来因第五号商议不商议之问题，谈判中止。昨经曹次长说明一切，业已了解，但并非同意将第五号撤回，今于开议之前，先将本国政府不让第五号之意说明。今日可先逐条商议，惟声明第五号不能让步。

总长云：本国政府并非要求撤回第五号，特谓贵国政府体谅本国政府为难情形，彼此让步而已。

从上述对话中可以看出，中方并不是要求完全撤回第五号，但求让步。在4月15日的第23次谈判中，中国首次明确表示如果可以撤回第五号愿意在东蒙古问题上接纳日本的要求。4月16日威尔逊改变立场后，中国随之在17日的第24次会议上改变了立场，然而外交部档案中并未充分反映此点。

从中方来看难以接受的第五号，事实上在商议中就被停滞，4月末的修正案中被删，直到5月7日的最后通牒。可以说中方的交涉正是按照2月1日袁世凯的方针所进行的。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中国在交涉过程中对日本做出让步的同时，要求日本介绍，寻求作为中立国参加战后和会的可能。这与中方认识到和会将会决定山东半岛利权归属的问题有关。以下为第三次谈判中关于此点的内容：^③

① 奈良冈：“加藤高明と二十一条要求—第五号をめぐる”，小林道彦、中西寛编著：《歴史の桎梏を越えて-20世紀日中関係への新視点》，千仓书房，2010年。

② “中央研究院”，1966 [89]。

③ “中央研究院”，1966 [89]。

日置云：中国无加入之望，甚为明了。纵令日本可以介绍，订入此条约之中，亦不相宜，况非交战国，绝不能加入也。

总长云：将来战事完毕，必有大会，从历史上观之，当日柏林会议、维也纳会议，凡间接关系之国均可加入。

日置云：贵总长之研究历史及外交上之阅历，甚微感佩。但万国邮便条约万国电信条约之类，或者由他国介绍可以加入会议，此次系何等重大之问题，以无关系之国加入，必办不到，以必办不到之事订立条约，似为适当。

总长云：中国并非全无关系，青岛战事在中国领土之内，中国为地主之关系也。

日置云：诚然。但交战之结果如何收拾，系交战国之事，未有非交战国而可收拾交战之结果者。

日本对此响应称，“如果有此机会不予反对”，但语气中表示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在其他场合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讨论。譬如1915年3月16日、外交部发给驻德公使颜惠庆的电报中这样说道：^①

此次日攻青岛，系根据英日盟约，与各协约国实有间接关系。若德、日单独议和，在德或有所利，在我颇为不利，中国总愿将青岛问题在战后大会一通解决，届时或有加入大会之希望。晤外部时，勿露我不愿德日先和之意，德日如有先洽情形，亦望随时探明电部。至日本条件，现在磋商，我总力持不与主权、条约、机会均等相抵触，方可定义。除旅大租借期、南满安奉两路展期九十九年已允外，余尚无头绪。山东问题日拟与我预约，将来将德国已得之利益让与日本，我方坚持亦俟战后定议，尚无结果。特电接洽。

3月17日，发给驻法公使胡维德的电报也几乎为同一内容，从中可以

^① “中央研究院”，1966 [160]。

看出中国有意参加战后的和会^①。

4月26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最终修正案，从中删除了第五号。得知日本删除第五号后的英国劝中方接受《二十一条》。^②5月7日中国收到最后通牒，9日决定接受“二十一条要求”。

结论

综上所述，本稿梳理了日本的《二十一条》研究状况及相关的主要论点，并着重阐述了其中的第五号问题，对利用民国外交档案完善上述日本学界论点可能性进行了探讨。中国在已知第五号可能是谈判的交换条件的情况下并没有对此进行讨论。同时，认为第一号和第二号是谈判重点的中国采取了拖延谈判进程，唤起国内舆论，试图以其他列强牵制日本。而在日本研究史中提出的美国在1915年4月16日后的态度转变，并未在中国外交档案中得到充分印证，此点也有待另做探讨。

最后，以接受最后通牒后的外交部于民国4年5月15日发驻外各领馆函作结，这也是北京政府对《二十一条》交涉的总括：

径启者：中日交涉事，自一月十八日日本提出条款二十一款，要求承认，政府以国权所在，权衡轻重，分别与商。至四月二十六日，日本又提出修正案，改为二十四款，声称为最后让步，要求同意。政府虽以和平解决为初心，仍以保全主权领土及各国机会均等为归宿，是以再三审慎，分别准驳，经我提交答复案，日本仍不满意，遂于五月七日三时送交哀得美吨书，限九日下午六钟满足答复，否则取必要手段，同时关东颁布戒严令，准备动员，且于会议期内，奉天、山东增派军队。政府外察大势，内度国力，为维持东亚和平，保全中外人民产业起见，又因日本将第五号中

^① “中央研究院”，1966 [168]。

^② 細谷千博：“‘二一条要求’とアメリカの対応”，《一橋論叢》，43卷1号，1960年。

我政府碍难同意各条，允认脱离此次交涉关系日后协商，以示转圜，是以于八日夜半，答复承诺。现在修正条文，约期签字。此次交涉经百余日之久，正式不正式之会议，不下数十次，此中困难情形，及政府始终维持领土主权之苦衷，应为国内外人民所公谅。除大概情形业已摄要电达外，相应将此次交涉始末情节编印华洋文，连同附件，一并函达冰案。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资本品短缺、货币紧缩与总产出下降

刘巍*

百年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虽远离欧洲战场，亦非完全意义上的交战国，但大战对中国经济也有较大影响。多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多认为欧战对中国经济有利，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①。持此观点的学者之论证路径大同小异，主要的因果关系程式为“因为列强的经济侵略放松，所以，中国民族工业出现黄金时代”。譬如，有的学者认为出现“黄金时代”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战时英、法、德等国对华商品输出下降，减轻了对民族工业产品的排挤和打击；第二，交战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增长，出口市场扩大^②；第三，战时欧洲列强在华投资整体下降，为民族资本的增长创造了空间^③。也有学者认为，史料显示欧战时期帝国主义对华经济控制能力虽无增长，但也未下降，前述观点不能成立，“黄金时代”主要是辛亥革命推动的，因此，民族工业“黄金时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① 何人何时提出“黄金时代”，难以考证，拥护者多用“长期以来学界共识”概而括之。

② 李文一：《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1912—1926年）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杭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马洪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民族工业的发展》，《历史教学》，1980年第5期。

③ 孙长斌：《一战期间中国经济变化与民主革命新因素的成长》，《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代”的起点应该是民国元年^①。当然，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不在战时，而在战后几年，同时，这一发展是空前的，但不是绝后的^②，这一观点事实上认为一战仅仅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起点。

上引文献虽仅为全部文献的一小部分，但基本上概括了近年来有关一战与中国经济研究文献的主要结论。上述文献的结论在逻辑上和方法上均存在着较大问题，本文就此提出以下两个疑问：第一，“黄金时代”的证据是什么？文献几乎都缺乏长时间序列的GDP数据或涵盖全面的工业生产指数，仅以传统史学常用的举例法罗列零散数据，且未做起码的经济逻辑分析，显然不能证明一战期间发生了经济增长。第二，外国商品进口下降、本国商品出口增长、外资不再流入就一定会使近代民族工业增长吗？众所周知，“需求拉动供给”这一逻辑关系的前提假设是“需求约束型经济”，即经济体的潜在产能巨大、产量取决于订单。近代中国的总供求态势可能是这样吗？本文将沿着这两个问题的思路做初步的讨论。

一、近代中国总产出趋势考察：欧战期间是最差的周期

首先，我们观察一下文献对黄金时代的描述。孙长斌用1912和1920两年的中国近代工厂家数、资本量和工人人数等数据做比较，轻率地得出了“一战及战后现代性经济因素迅速成长”的结论。^③在黄苇20多年前的

① 蒋立文：《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走向“黄金时代”的真正动因》，《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范小方：《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张天翼：《中国民族工业出现“黄金时代”的根本原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② 黄苇：《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破产问题》，《学术月刊》，1982年第2期。

③ 孙长斌：《一战期间中国经济变化与民主革命新因素的成长》，《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黄苇：《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破产问题》，《学术月刊》，1982年第2期。

论文中就给出了民国学者杨铨 1923 年发表的一战期间工厂数下降的数据，不知孙长斌是没有看到还是认为杨铨的数据有讹谬，其结论应该修正为“战后现代性经济因素迅速成长”。陈国清^①的论文列举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1979 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中引用的 1913、1917 和 1920 三年的工业投资数据，得出了“一战期间民族工业迅猛发展”的结论。陈国清比孙长斌的数据多了一年，而且大战期间的 1917 年投资额数据确比 1913 年高出两倍有余。但是，费维恺的研究解释了战时“投资额数据”的增长并非实际投资发生：“在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战时军火生产，又因缺乏船只运输，所以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从而为中资工业的扩大提供了机会。虽然购置设备的订单早已发出——生产资料仍主要来自国外——但大多数新工厂的开业不得不等到战争结束和订购的机器运抵中国后才能开工。”^② 费维恺认为，大战确实给中资工业创造了发展的机会，但大战又扼杀了这一机会——机器设备大都是战后运抵中国的，这也可以解释战后民族工业突然爆发的原因。罗斯基教授^③按资本品真实进口的海关数据估计了近代生产性质的投资额（表 1）。数据显示出，欧战期间中国的近代工业投资总体呈下降趋势，关内新增投资下降的趋势更明显，投资大幅增长发生在战后。其次，我们观察到，文献涉及的时段都非常短暂，无法做长期比较分析。诚然，民国流传下来的中国经济统计资料断断续续，且不十分全面，做出长期比较研究确实不容易。

① 陈国清：《简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若干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 年第 1 期。

② [美]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5 页。

③ 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Oxford, 1989.

表 1 中国近代生产性质的投资额^①

单位：1933 年币值百万元

年份	总投资额	关内	东北
1914	267	214	53
1915	183	139	44
1916	243	158	85
1917	210	137	73
1918	223	134	89
1919	422	282	160
1920	476	352	124

上述讨论可以说明，文献并未证明一战期间民族工业进入了黄金时代，同时，文献对黄金时代之概念也缺乏准确的界定。因此，它既缺乏逻辑论证又无足够的的数据支持。本节拟从中国经济的总体趋势角度展开初步分析，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1914—1918 年中国经济是否持续增长？第二，在包括战前战后的一段时间内比较分析，欧战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最高？从表 2 的数据来看，一战期间，实际 GDP 基本呈下降趋势，1917 年负增长最为严重，负率高达两位数。

通过 GDP 指数观察 1887—1936 年中国总产出的走势，比较一战时期在 50 年中的表现。从图 1 可见，一战期间的中国经济表现最差，GDP 指数从战前 1913 年的 60.45 下降到 1918 年的 48.71，降幅接近 20%。近代中国的 50 年可以划分为五个短经济周期：^②

^① 资料来源：Thomas G. Rawski (1989), p. 245, 根据本文需要节录。

^② 周期划分方法详见刘巍、陈昭：《近代中国 50 年 GDP 的估算与经济增长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28~134 页。

表 2 1887—1936 年中国 GDP^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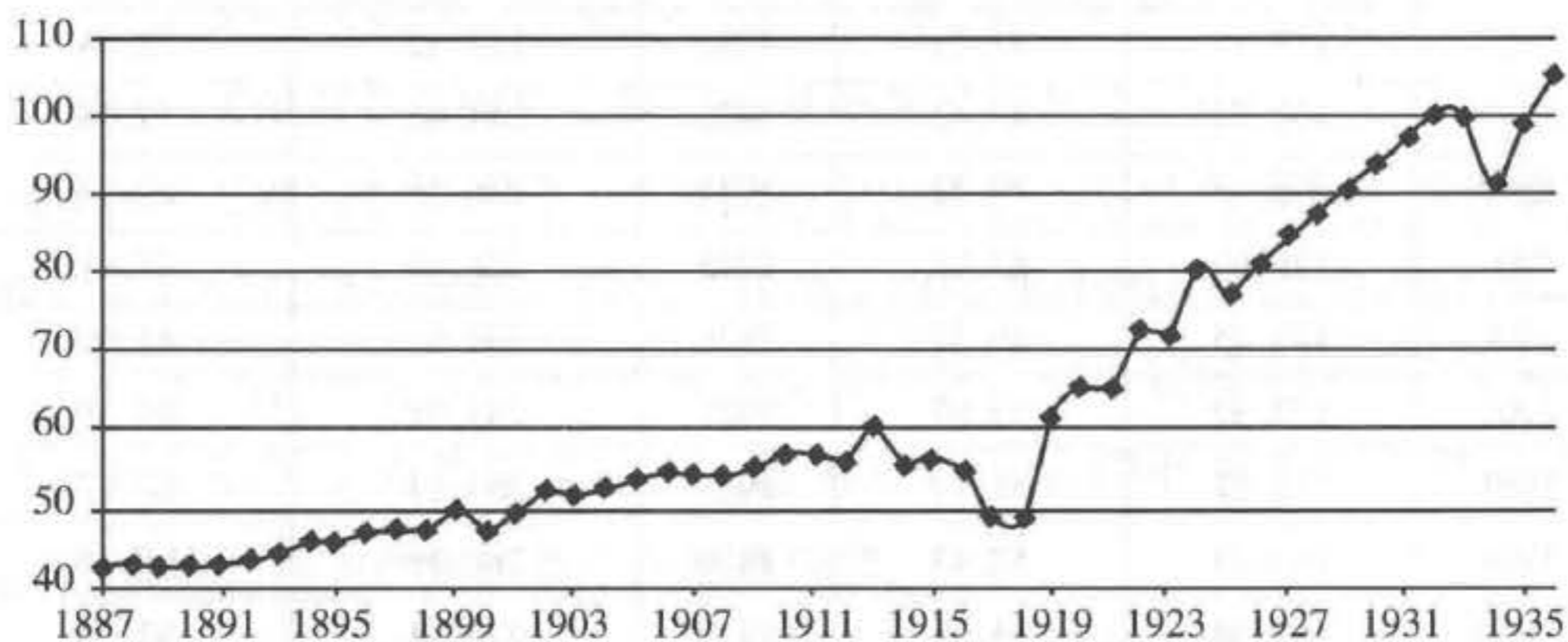
年份	实际 GDP (1933 年亿元)	GDP 指数 (1933 年 = 100)	年份	实际 GDP (1933 年亿元)	年份 GDP 指数 (1933 年 = 100)
1887	124.58	42.29	1912	164.82	55.95
1888	126.52	42.95	1913	178.09	60.45
1889	125.20	42.50	1914	163.39	55.46
1890	124.79	42.36	1915	166.10	56.38
1891	125.89	42.73	1916	160.75	54.56
1892	127.42	43.25	1917	143.97	48.87
1893	130.71	44.37	1918	143.51	48.71
1894	134.80	45.76	1919	180.88	61.40
1895	134.87	45.78	1920	193.02	65.52
1896	138.35	46.96	1921	191.31	64.94
1897	139.13	47.23	1922	213.42	72.44
1898	139.71	47.42	1923	211.45	71.78
1899	146.48	49.72	1924	236.58	80.31
1900	138.60	47.05	1925	226.87	77.01
1901	145.45	49.37	1926	238.63	81.00
1902	153.39	52.07	1927	248.58	84.38
1903	152.52	51.77	1928	257.11	87.27
1904	154.47	52.43	1929	266.26	90.38
1905	157.94	53.61	1930	276.21	93.76
1906	160.06	54.33	1931	285.70	96.98
1907	160.24	54.39	1932	294.70	100.03
1908	159.38	54.10	1933	294.60	100.00
1909	162.33	55.10	1934	269.00	91.31
1910	167.83	56.97	1935	290.90	98.74
1911	167.74	56.94	1936	309.40	105.02

第一个周期是 1887—1913 年，是近代中国经济初步发展的时期，义和

① 资料来源：刘巍、陈昭：《近代中国 50 年 GDP 的估算与经济增长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07~108 页。

团运动时期的1900年GDP有较大程度衰退，增长率也不到6%，宏观经济呈现大体平稳增长的趋势。第二个周期是1913—1918年，是中国经济的下行期或者衰退期，呈连续下降趋势，且衰退程度较深，1917年近11%的负增长率为近代中国50年之最。第三个周期是1918—1933年，是近代中国经济增长既平稳又较快的时期，大体上呈连续增长趋势。第四个周期是1933—1934年，是经济短暂调整期，国际银价下跌引起的白银外流导致了货币紧缩，经济负增长一度达到8.69%，但很快被法币改革政策纠正。第五个周期是1935—1936年，是经济高速增长期，但被日寇入侵打断。

图1 近代中国50年GDP指数(1933年=100)^①



综上所述，从长期来看，一战时期是1887—1936年50年期间最差的一个短周期。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认为：“一次世界大战‘黄金时代’之说，更多是指利润优厚，并非指增长速度。”^② 本文同意这一结论。

① 数据来源：表2。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二卷，第662页。

二、近代中国经济运行逻辑分析：供给约束和资本品缺口

总需求拉动总供给的系统性表述来自凯恩斯经济学——总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是在宏观经济中潜在供给能力发展到较高阶段时，对“需求约束型经济”运行逻辑一定意义上的抽象。从“供给约束型经济”过渡到“需求约束型经济”，英国较早，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就完成了过渡。美国的过渡发生在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日本处在供给约束型经济中。^①日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过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②1913—1936年，中国经济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中。^③内需和外需拉动价格的能力很大，拉动供给的能力很小。^④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需求通过价格释放的信号对中国的供给方不能产生增加供给的大力度刺激呢？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近代中国产出水平低，消费之剩余——储蓄额小，由储蓄转化的投资更小，因此，供给扩张的潜力很小。近代中国被卷入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原始资本积累很不充分。人口众多且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大且增长缓慢。因此，储蓄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是很低的，且由于备受欺凌、割地赔款，储蓄严重流失。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在中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动辄割地赔款。叶孔嘉博士于20世纪70年代估计了几个年份的总需求分类数据。据此，本文计算了同时期的消费和储蓄在GDP中的占比（表3）。

① 刘巍：《大萧条前后日本的进出口结构与总供求态势》，《国际经贸探索》，2011年第4期；张乃丽、刘巍：《从国外部门角度对战前日本总供求态势的研究——基于M-L条件和贸易条件学说的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12年第7期。

② 陈昭：《日本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转变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③ 刘巍：《储蓄不足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近代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研究》，《财经研究》，2010年第2期。

④ 此处省略逻辑模式图以及用几何方法对供给约束型经济所做的机理分析。

表3 1931—1936年中国消费倾向、储蓄倾向^①

单位：1933年价格10亿元

年份	GDP	总消费	年均消费额	年均储蓄额	平均消费倾向	平均储蓄倾向
1931	28.57	27.95				
1932	29.47	28.58				
1933	29.46	28.52	28.37	0.70	97.8%	2.2%
1934	26.90	27.01				
1935	29.09	28.32				
1936	30.94	29.85				

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抗战前，储蓄倾向都如此之低，若倒推至一战时期，就算储蓄倾向不再更低，谅不会高于1931—1936年。因此，从经济总体来说，中国可用于投资的“闲钱”很少，总供给的能力增长就非常缓慢。

第二，从物质属性角度观察，近代中国总供给的“缺口”主要是资本品。崔文生认为，如果事前的总供给缺口得不到有效补充，则事后的产出必定呈现出停滞或下降的趋势，但近代中国的经济实际上是增长的。^②这说明近代中国事前的总供给缺口是得到了有效补充的；再者，如果事前总供给缺口变大并被事后有效补充，则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上升，如果事前总供给缺口变小，则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放缓。崔文生通过HP滤波方法对近代中国的总供给缺口即NX和近代中国的总产出Y进行分解，分离出其各自的长期趋势，发现近代中国总产出的增长趋势和总供给缺口的变动趋势基本趋同，稍有滞后。因此，总供给缺口的补充在物质形态上应该主要是

^① 资料来源：根据 Yeh K. C. : *China's National Income, 1931—1936* 中的数据计算，见《中国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台北，1977年，第128页。

^② 崔文生：《近代中国50年总供给缺口研究（1887—193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进口的资本品，只有进口的资本品才能推动国内投资的增加，进而通过投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

严中平先生研究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选择了十二项主要进出口商品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商品的性质，严先生把它们分别统计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本文据此计算了生产资料占贸易差额的比重，见表4。

表4 进口生产资料占贸易差额的比重^①

年份	贸易差额 (1000 关量)	进口生产资料 (1000 关量)	进口生产资料占比
1893	34740	12666	36%
1903	112387	49154	44%
1910	82132	81481	99%
1920	247618	216852	88%
1930	414912	352806	85%
1936	151350	268723	177%

表4中各年的比例比较稳定且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反映出近代中国生产资料进口占总进口的比例的缓慢上升。进口生产资料占净出口差额的主要部分（1910年之后尤甚），说明近代中国的贸易差额主要是由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资本品和紧缺原料造成的。费维恺（费正清，1994）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他认为，抗战前中国工业的结构模式是消费品生产。基本可以判断近代中国总供给缺口补充的物质形态主要为进口的生产资料。

研究一国经济增长因素的思路主要有两种。其一是从总需求角度入手，基本上遵循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模式。其二是从总供给角度入手，假设经济增长的“瓶颈”在总供给一端，着力研究如何在生产一端投入。

^① 资料来源：贸易差额见郑有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334~337页；进口生产资料见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72~73页。

20 世纪初问世的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就是供给约束型经济大前提之下研究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框架，模型中只有供给方面的变量，不见需求方面的变量。也就是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清晰地告诉我们，只要投入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就会产生一定能卖得出的产品，销售不是问题。如前所述，我们认为民国时期的宏观经济总体上处于供给约束型态势下，总需求数量虽不可观，但相对于数量可怜的供给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吸纳资源瓶颈出现之前的所有资本与劳动组合生产的产品，经济增长的“瓶颈”在于供给潜力不足，宏观经济总体上呈现“短缺”特征。因此，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作为分析民国时期的经济增长逻辑基础。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由美国数学家柯布（Cobb）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Douglas）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共同提出的，其形式为：

$$Y=AL^{\alpha}K^{\beta} \quad (\alpha > 0; \beta > 0) \quad (1)$$

式（1）中， Y 为产出， K 为资本， L 为劳动力；参数 α 和 β 分别为 GDP 对资本的弹性与产出对劳动力的弹性； A 可视为效率参数， A 的大小在 K 与 L 固定的条件下直接影响 GDP。

假定民国时期的劳动力宏观上呈无限供给状态，由于社会教育水平发展迟缓，所以人力资本无显著增长；工艺和管理等效率因素随近代化资本积累程度和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于是，资本的积累就成了民国时期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但由于民国时期资本存量的数据太少，难以展开分析，我们借助于发展水平相近国家的经验做一推测。根据同时代日本的经验，由于资本品生产能力低下，资本形成主要取决于进口和商业银行贷款。进口每变动 1%，资本形成额就同向变动 0.36%；商业银行信贷变化 1%，资本形成额就同向变动 0.98%。^① 如前所述，对于经济发展程度略低于日本的近代中国来说，进口也是近代化产业资本品的主要来源，自给的程度是微不足道的。由于民国时期的资本市场不健全，企业家能不能筹

^① 刘巍、陈昭：《大萧条中的美国、中国、英国和日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年。

集到资金、在第一时间购买外国资本品，除了内源融资渠道之外，很重要的资金来源就是银行贷款。我们曾对民国时期的货币供应量做过考察，1935年法币改革前，中国的银行贷款，乃至货币量都是受白银国际流动和国内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左右。这样，逻辑上的分析就与我们先前所做的经济周期分析之结论一致了。

根据上述讨论，本文认为，在民国时期较长时段内，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资本存量和效率参数可以用近代性质的资本形成额（投资）和货币量替代，^① 供给充裕的劳动力变量可以暂不考虑。修正后的生产函数如下：

$$Y = f(I, M_s) \quad (2)$$

式（2）中， Y 表示产出， I 表示近代性质投资， M_s 表示货币供给量。从逻辑角度预判，两个自变量的一阶偏导数均应大于0，即两个自变量与因变量都是正相关关系。根据前面的讨论，近代中国的资本品大都来自进口，近代性质投资主要受进口因素决定：

$$I = f(IM) \quad (3)$$

式（3）中， IM 表示进口，其他符号意义同前。显然，从逻辑角度预判，进口变量的一阶偏导数均应大于0，自变量与因变量是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进口额的物质属性不都是资本品，实证分析中可能会有其他影响因素进入模型，这里是对主要影响因素的讨论。

联立式（2）和式（3）可得：

$$Y = f(IM, M_s) \quad (4)$$

^① 这里要解释两个问题：第一，由于投资和资本存量有显著的函数关系，用投资替代资本存量是可行的。各国实证研究中也多有这样的案例，不是本文的首创。第二，在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近代中国，在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货币量的增长意味着市场分工扩大、交换规模增长，即生产效率提高，发展经济学已经证明了这个逻辑。

三、中国经济增长与一战期间负增长：实证检验

上节的逻辑分析结论必须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才能成立，否则，只能是一个假说。本节将对中间函数式（2）、式（3）和最终函数式（4）做出相应的实证分析。将相关数据汇总于表5，GDP数据见表2。

表5 1913—1936年中国部分宏观经济数据^①

年份	M_t (百万元)	进口净值 (千海关两)	近代性质投资 (百万元·1933年)	银行存款 (百万元)
1912	1951.0	473097	163	738.6
1913	1976.7	570163	207	738.1
1914	2016.1	569241	267	749.1
1915	2014.0	454476	183	733.2
1916	1973.2	516407	243	711.9
1917	1935.9	549519	210	700.9
1918	2031.0	554893	223	795.4
1919	2203.9	646998	422	950.7
1920	2468.3	762250	476	1114.4
1921	2571.2	906122	560	1155.8
1922	2743.1	945050	639	1268.2
1923	2913.1	923403	486	1398.1
1924	3090.0	1018211	523	1549.0
1925	3364.7	947865	514	1737.1
1926	3616.6	1124221	634	2006.3
1927	3764.8	1012932	590	2005.6

^① 资料来源：货币量数据见刘巍：《对罗斯基估算的1910—1936年中国货币供给量之检讨》，载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近代性质投资和银行存款数据见Thomas G. Rawski (1989), p. 245、p. 394. 进口净值数据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36~337页。

(续表)

年份	M_t (百万元)	进口净值 (千海关两)	近代性质投资 (百万元·1933年)	银行存款 (百万元)
1928	4098.9	1195969	746	2186.2
1929	4560.5	1265779	893	2522.0
1930	5101.8	1309756	848	3059.5
1931	5012.0	1433489	843	3241.7
1932	5000.4	1049246	865	3507.9
1933	4776.0	863650	1034	3897.5
1934	4185.0	660889	1271	4224.7
1935	5050.0	589994	1287	5044.6
1936	6607.8	604329	1398	5957.5

用表 5 的数据，我们做了三个数量方程

$$\ln Y = 1.25 + 0.12 \ln I + 0.42 M_t \quad (5)$$

$$t_1 = 2.71 \quad t_2 = 2.22 \quad t_3 = 4.76$$

$$R^2 = 0.96 \quad F = 171.9 \quad DW = 1.99 \quad ar(1) = 0.44$$

式 (5) 用 1912—1936 年数据证实了函数式 (2) 的显著性，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受资本（投资）和效率（货币量）的显著影响。

$$\ln I = 0.76 \ln IM + 0.56 \ln De + 0.4 \ln I_{t-1} - 0.69 \ln IM_{t-1} \quad (6)$$

$$t_1 = 2.73 \quad t_2 = 3.56 \quad t_3 = 2.23 \quad t_4 = -2.68$$

$$R^2 = 0.94 \quad F = 101.7 \quad DW = 1.70$$

式 (6) 表明，近代性质的投资受进口和银行贷款（用银行贷款数据替代，因为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功能使二者的因果关系相当显著）的影响，用 1914—1936 年的数据证实了式 (3)。同时，模型表明，上年投资和上年进口对当年的投资也有一定影响。

$$\ln Y = 0.586 \ln M_t + 0.049 \ln IM \quad (7)$$

$$s_1 = 0.038 \quad s_2 = 0.022 \quad t_1 = 15.53 \quad t_2 = 2.17$$

$$R^2 = 0.948 \quad DW = 1.34 \quad F = 402.70$$

式(7)是最终方程,各项检验指标都是比较显著的,支持了前面的逻辑分析。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1913—1936年,中国的 M_1 每变动1%,GDP就同向变动0.59%左右;进口净值每变动1%,GDP就同向变动0.05%左右。需要说明的是,由于1932年以后进口数据不包括东北地区,所以对模型会有一些影响,否则,模型效果会更为显著。

限于篇幅,这里只列出最终方程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单位根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差分次数	检验形式 (c, t, k)	DW	ADF	1%	5%	结论
lnY	1	(N, N, 1)	1.94	-4.42	-2.67	-1.96	I(1) *
lnM	1	(N, N, 1)	2.02	-3.59	-1.96	-1.61	I(1) *
lnM ₁	1	(N, N, 1)	1.91	-3.93	-3.83	-3.03	I(1) *

注: *表示变量差分后的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ADF平稳性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根	迹统计量 (P值)	5%临界值	λ -max 统计量 (P值)	5%临界值	原假设
0.623722	28.42 (0.014) *	24.27	21.50 (0.013) *	19.387	0个协整向量
0.258449	6.92 (0.12)	12.32	6.58 (0.29)	12.518	至少有1个协整向量
0.015460	0.34 (0.62)	4.13	0.34 (0.62)	4.13	至少有2个协整向量

注: *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P值为伴随概率。

根据模型（7）给出的数量分析结论，我们再对一战时期的经济运行做些讨论。

1. 进口受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一战期间，无论是外部需求还是内部需求的增长，厂商必先购置资本品，才能向市场供给更多的商品，而资本品和一些关键原材料都需进口才能解决。因此，从向国外厂家谈判订货到出厂、海运、安装、调试是需要较长的时间的，资本品转化为生产能力是有较长时滞的。通俗地说，战争需求上来了，民族资本缺机器少原料，商品供给在短时间内是跟不上的。在近代中国，钢铁和机械、交通器材的进口，常被视为中国国内工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大战中，进口钢铁锐减而出口骤增，竟造成连续出超，对中国工业发展十分不利。机械、交通器材进口的增加主要在战后时期，这是因为大战中列强无力输出和海运困难之故。以民族资本主义最主要的近代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为例，在大战之初并不景气，1914年纱锭反而减少了几千锭，1915年以后才逐渐增加^①。由于棉纺织业的机器设备依赖进口，从订购、安装到开工需一定时间，因此，棉纺织业设备的增长主要是在战后，延续到1922年。在大战期间的多数年份里，棉纺织业的增长速度是低于战前的。

表8 一战期间钢铁、机器设备进口及相关数据^②

年份	钢铁（1000公吨）			机器、车辆、交通电气器材 及工具进口（1000关两）	
	进口	出口	差额	按当年币值	按1913年币值
1913	245	71	-174	16976	16976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二卷，第663页。

② 资料来源：《海关报告》，转引自许涤新、吴承明（2007），第558页。

(续表)

年份	钢铁 (1000 公吨)			机器、车辆、交通电气器材 及工具进口 (1000 关两)	
	进口	出口	差额	按当年币值	按 1913 年币值
1914	230	79	-151	24857	23450
1915	126	104	22	13504	11444
1916	146	156	10	30794	26097
1917	123	164	41	19538	16097
1918	149	190	41	20173	16400
1919	325	168	-160 ^①	44148	36486
1920	367	198	-169	51185	39073

从表 8 观察, 1914—1918 年, 中国主要生产资料钢铁和机器的进口大致是向下的趋势, 这基本上可以解释民族资本的生产能力不可能迅速提升这一事实, 因为当时的国内产业结构决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资本品主要依赖进口。从前引罗斯基教授估计的近代生产性质的投资额 (见表 1) 数据来看, 一战期间中国近代生产性质的投资额是下降的, 关内各省比东北的下降趋势还要显著。战后投资才大幅度增长。一战期间进口之所以下降, 不是因中国进口商不愿进口, 而是由于列强经济服务于战争无暇出口。同时, 战时海运受阻也是远洋贸易停顿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 进口下降 (特别是表 8 所列各科目的商品) 直接抑制了厂商扩大再生产的需求。经济增长函数式 (4) 的一个解释变量呈下行趋势, 经济增长必受负面影响。

综上, 在产能无法迅速扩大的情况下, 战争的物质需求造成了价格上涨, 民族资本的既有生产能力的利润猛增。于是, 订单多、价格涨、获利多, 造成了一种“黄金时代”的感觉。从表 9 的数据来看, 大战期间, 中

① 数据有错误, 但原文如此。该书的几个版本均是如此, 可能是《海关报告》有误。疑为“差额-157”。

国价格总水平不断上涨。由于海运不畅，进口价格上涨得更多。我们找不到大战期间中国工业企业整体盈利状况的数据，仅以纺纱业中的荣氏企业的申新一厂数据为例，从数据中可以看出，除去数据缺失的1914年，在大战期间的后四年中，利润增长幅度是相当可观的。

表9 一战期间中国价格指数与个别行业（企业）利润状况^①

年份	批发价格指数 (1913=100)	工业品价格指数 (1913=100)	进口品价格指数 (1913=100)	申新一厂实际盈利(元)
1913	100	100.0	100.0	Na
1914	106	98.2	108.9	Na
1915	118	101.8	113.0	20000
1916	118	106.3	122.4	110000
1917	122	112.4	131.0	400000
1918	123	121.2	147.0	800000

2. 一战期间货币供给量下降。

观察经济增长函数式(4)中的另一个解释变量——货币供应量。大战期间，国际市场银价上涨，白银随即大量流出中国，基础货币银根紧缩必然导致派生货币的紧缩， M_1 和 M_2 都呈下降趋势。表10数据显示，银币和铜币的存量在战时都在下降，只有银行券在努力弥补着货币量的缺失。但在银本位制下，银行券发行者有义务满足持券者兑换银币的要求，因此不能大量随意发行银行券。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活期存款的下降，因此，活期存款大都是银行贷款转存的，二者的趋势同升同降，银行贷款下降对工业生产的打击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即使是资本品进口非常顺畅的1933—1934年，白银外流导致的货币紧缩也相当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经济，国民政

^① 资料来源：价格指数见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页、78页、90页；利润数据见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65页。

府不得不实施法币制度以挽救危局。

表 10 一战期间中国的货币存量 (年末余额)^①

单位:百万元

年份	银币	铜币	银行券	活期存款	总存款	M_1	M_2
1914	1056	388.5	118.5	453.1	749.1	2016.1	2240.8
1915	1035	382.2	209.7	387.1	733.2	2014.0	2234.0
1916	1006	375.9	232.6	358.7	711.9	1973.2	2186.8
1917	961	369.6	285.8	319.5	700.9	1935.9	2146.2
1918	998	363.3	282.4	387.3	795.4	2031.0	2269.6

四、简单的结论

通过前面的分析和讨论,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一战时期是中国经济的下行期或者衰退期,呈连续下降趋势,且衰退程度较深,1917年近11%的负增长率为1887—1936年之最。从长期来看,是近代中国50年期间最差的一个短周期。一些文献仅以传统史学常用的举例法罗列零散数据,缺乏起码的经济逻辑分析和统计分析,显然不能证明一战期间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

2. 总需求高涨在当今“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在近代中国的“供给约束型经济”中,正常情况下总需求拉动价格的效应远大于拉动产量,切不可生搬硬套。况且,一战期间中国资本品进口严重受阻,近代工业实际到位的投资呈下降趋势,造成总供给曲线无法右移,总供给的“瓶颈”效应愈发严重,经济负增长不可避免。

3. 一战期间,由于国际银价上涨导致的白银外流,造成近代中国经济

^① 资料来源: 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Oxford, 1989. pp. 394-345.

增长函数的另一个正相关解释变量——货币供给——发生了萎缩，雪上加霜，进一步打击了中国经济。在本文的经济增长函数中，我们用货币量代表资本形成与运行的效率因素，若进一步扩展到货币整个功能上，任何时期货币量下降对经济都有负面影响。即使是货币中性论者，也是认为长期内货币增长不能导致产出增长，但也难以否认货币量下降对产出的抑制作用。美国 1930—1933 年、英国 1930—1932 年和中国 1933—1934 年都有过货币量下降的案例，无一例外地都发生了负增长。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市场经济以来的任何国家货币萎缩与经济增长相伴的案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北洋政府时期经济的影响

朱嘉明*

经济史、政治史、战争史之间既相关联也有差异。战争史和政治史的起止时间和长度相对容易确定，而经济史是连续的，其时间界线不那么分明。经济是政治和战争的背景；政治和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则是滞后的。任何蕴含在一个大历史事件之中的经济史、政治史和战争史，在时间上并非彼此全覆盖。所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与经济关系，需要推前经济背景和延后经济后果。至于如何确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时间，则是更为复杂的问题。本文所选择的时间，以1912年年初中华民国建立为起点，以1924年为终点。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中国原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轨迹，加快了制度转型。作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袁世凯看到了一战的爆发，却没有看到一战的结束。本文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构成对中国的重大和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是怎样发生的？

1. 20世纪1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经济比较

中国自19世纪70年代全面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国家行为。从此，

* 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结束被迫向西方国家开放，进入主动与世界互动，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转型。如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欧美工业国家的经济制度为参照系，不难发现中国的制度性时差和错位。

1.1. 西方国家的“自由放任”时代基本完结。进入20世纪的主要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权利、政治、政策和国家主义相互依存的制度结构。哈耶克所推崇的西方国家自由经济时代悄然完结。中国，则依然处于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时代和原本自由经济的惯性之中，即政治和经济分离，民间和朝廷，或者政府二元化。国家并不关心人民的物质福利问题。家庭和行会替代政府职能，实施对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经济活动的监督。经济主体是家庭、家族、基层绅士。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属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放任主义社会。

1.2. 西方国家大体完成工业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主要国家基本奠定了现代工业化基础并构建完成现代货币金融体系和结构。美国崛起为世界工业大国。世界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整合，相互依存程度显著增加，并支撑了以这种依存性为前提的高速经济增长。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能够“以最低代价，最少麻烦，最为方便舒适以及最便利设施的方式”享受远超过其他时代最大钜富及最有权势君主能享受到的物质产品和服务。^① 在中国，虽然发生了洋务运动所推动的工业化，太平天国、小刀会

① 凯恩斯说：“伦敦居民可以在床上享用早餐，订购他认为适当数量的全世界不同的产品，并合理期待及早地运送到他的门口；他可以同时以相同的方式，冒险将他的财富投资在世界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以及新兴企业，无需费力或甚至麻烦，便能分享预期的成果及利益；或是他依据自己所喜或是咨询所提供之建议决定要将自己财富的安全，与任何大洲上有规模城市之市民诚信，结合在一起。假如他要的话，他可以立即借助便宜舒适的交通到任何国家或任何气候去，无需护照或其他形式文件，可以派遣仆人到某家银行的临近分行，取得方便数量的贵金属，然后出国到海外地点，……”“或者可以这样描述伦敦居民：在啜饮早茶时，可以订购卡地夫的一袋煤，巴黎小牛皮手套，古巴哈瓦纳雪茄，苏格兰近猎地的门票，加勒比海客轮船票，任何小说，还可以根据《泰晤士报》的指导投资世界股市。”参见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第二章“战前欧洲”。

和义和团运动，原有的土地制度被动摇，聚族而居的传统格局被解构，有着“三千年以来未有的变局”，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经济停滞”。^① 中国继续深陷“低水平均衡陷阱”。传统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姗姗来迟，耕地面积难以扩展，农业边际效益递减，人口膨胀，最低农产品消费线的平衡点被打破，粮食产出不再可能与人口增长同步。^② 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普遍面临“破产”威胁，自然经济瓦解，开始进入漫长的“二元经济”历史时期。

1.3. 西方国家现代公司制度趋于成熟。自1807年，法、英、德、日等国先后公布工业公司制度的法典和单行法，对公司运作的各方面进行规范、保障，促进公司企业发展。由企业家主导的现代公司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实现持续地“创造性破坏”。^③ 而在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发源于清末，发育于北洋政府，是西方国家输入的结果。北洋政府实施工业救国政策，通过《公司条例》。但是，虽然“引入”了现代企业制度，却没有产生企业家阶层。家庭依然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难以形成“创造性破坏”的社会基础。

1.4. 西方国家普遍实行“金本位”。英国实行金本位制是1717年，确认金本位制则是1819年。从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全世界59个

① “停滞主义”是李嘉图、马尔萨斯和马克思都使用的重要概念，描述前工业社会的相当普遍现象。

② 基于北洋政府时期的邮局、国务院、海关数据，国联公布了1912至1927年中国人口不同统计数字的平均数4.33亿。同时期，中国的耕地不到总面积的25%，则大约每2人有1英亩耕地。张玉法、王树槐：《民国初年的经济》，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第88~89页。

③ 这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年）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一书中的概念。根据“创造性破坏”概念：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其作用在于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不断地从内部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才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经济创新过程就是改变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

国家实行了金本位制，是经典金本位时期。^① 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早期，几乎所有重要国家都参加了“金本位俱乐部”。在这个时期，仍然存在已经设立中央银行，没有实行金本位的国家，或者没有设立中央银行，却实行金本位的国家。^② 世界汇率制度基础稳定。1913年年末，美、英、德、法、俄五国占有世界黄金存量的三分之二。虽然英国黄金储备有限，但是，英镑声誉良好，可以维持来自外部的兑换冲击，伦敦在全球金本位运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③ 在金本位主导世界货币经济体系之后，白银仍旧发挥着货币功能，尚有一些国家实行金银双本位制度，少数国家实施银本位。中国是银本位大国。

1.5. 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中央银行，实施近似的“货币政策”。自19世纪80年代，世界先进工业国家“自由银行时代”完结，并进入创建中央银行的重要时期。^④ 美国是例外。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成立于1913年。^⑤

① 美国在1834年确立了20.67美金等于1盎司黄金的价格，此固定价格一直维系到1933年，前后99年；日本和俄国在1897年确定金本位；意大利在1883—1891年期间成为事实金本位国家；意大利和奥匈帝国成为金本位国家是在1914年。

② 建立中央银行，却没有实行金本位的：西班牙银行、葡萄牙银行、埃及国家银行、奥斯曼帝国银行、摩洛哥国家银行、爪哇银行、罗马尼亚国家银行、保加利亚国家银行、塞尔维亚国家银行。没有设立中央银行，却实行金本位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印度、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有些国家离开金本位制，像阿根廷、葡萄牙、意大利、智利、保加利亚、墨西哥。但是，阿根廷、意大利、保加利亚很快返回。另外，西班牙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流通纸币。

③ 根据凯恩斯分析，英国可以继续金本位，因为英国在国际短期借债市场上是债权人，而其他国家则是债务人。

④ 瑞典中央银行，1668年；英格兰银行，1694年；法国银行，1800年；芬兰银行，1811年；荷兰银行，1814年；挪威银行，1817年；丹麦银行，1818年；比利时银行，1850年；俄国国家银行，1860年；德意志银行，1876年；奥匈银行，1877年；日本银行，1882年；意大利银行，1893年；瑞士银行，1907年；奥地利银行，1817年。

⑤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1791至1837年，美国先后建立了具有中央银行职能的机构美国第一银行和美国第二银行。但是，这两家银行的运营不仅没有带来货币稳定和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相反，却成为了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最终，都寿终正寝。

当1914年10月25日美联储正式开始运作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值得在意的历史“巧合”。在1880—1914年间，各国中央银行在隐形税收下面，以国家的名义凭空创造债券，形成对市场操作的货币政策手段，包括：操纵黄金价格；通过汇率和黄金流动，操作汇率市场；央行之间黄金互借；通过贴现率和信用政策，影响中央银行储备变化，达到国内信用基础的放大；从商业银行和政府拆借黄金，以及海外浮动利率贷款。值得提及的是，俄国中央银行制度服从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成为了政府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也是欧美国家拒绝私人拥有和参与中央银行股权的最后一个重要国家。恰恰因此，伴随沙皇政权颠覆，布尔什维克可以轻易接管沙皇中央银行而为其所用。1905年，清政府设立中央银行，即“户部银行”，1908年，“户部银行”更名大清银行，并公布《大清银行则例》，功能和股权结构仿照英格兰银行，确定该行为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家银行性质。中国第一个中央银行的设计和建立时间，并不落伍。但是，历史没有给大清银行发育和成长的时间。

1.6. 西方国家建立了“金本位游戏规则”。金本位需要以资本不受国界约束地自由流动为前提。资本的自由流动有助于国际资本市场的成长。金本位提供了一种稳定环境，这种环境有助于货币深化和流动的市场发展。它不可避免地与金融国际化紧密连接。在金本位制度下：各国央行可以按各国货币平价规定的金价无限制买卖黄金，刺激黄金的流动性，推动黄金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金本位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中享有较低的利率，较长的债券期限，较大的债券发行规模，较多的公共部门信用，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金本位的信息成本低下，投资者愿意借款给新的以黄金为本位的借贷者；主权出借者与私人投资行为基于金本位的信息成本低下，出借和投资风险小。中国因为不是金本位国家，央行自然被排斥在外，无法运用“金本位游戏规则”。

1.7. 西方国家建立货币联盟。从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

世界范围内，已经建立了拉丁货币联盟（Latin Monetary Union，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瑞士、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Scandinavian Monetary Union，包括丹麦、挪威和瑞典）。货币联盟成员以金本位为基础，彼此接受其货币具有法币功能，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成为货币联盟的受益者。货币联盟，也是这个时期的一种全球化形式，然而，中国人尚不知晓货币联盟为何物。

1.8. 西方国家资本市场充分发育。自1531年比利时首先创建股市，1602年荷兰阿姆斯特丹股市成为发现新世界的财政资源之所在。巴黎、柏林、伦敦也先后创建股市。到了19世纪中叶，伦敦股票市场开始成为英国公共债务筹款和交易的基本工具，政府债券名义价值的70%以上来源于伦敦股票市场。1853—1913年，英国股市的资本规模增长率两倍于GNP的增长率，上市公司的价值增长了十倍，主要金融产品的增长指数从1000到数万。英国的经济优势和在世界的扩张支撑着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而至少从19世纪70年代，大量欧洲资本已经涌入纽约，有效地刺激了纽约的崛起。纽约开始成为全球金融投机的聚集地。中国虽然也建立了股票交易所，在理解和运作方面尚处于幼稚阶段。^①

1.9. 国际债券市场已经成熟。自19世纪中后期，国际债券市场已经高度发达。西方国家发行了数额巨大且有利息的债券。以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为例，1913年与1887年相比，国家成长率分别是39%、-5%、153%和137%，负债占国民生产净值额百分比分别是86.5、37.6、44.4、47.3。^②毋庸置疑，同时期的中国，距离国际债券市场有漫长的道路。

① 最典型的案例是清末“橡胶风潮”。自1908年伦敦橡胶股票行情上涨，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社会各阶层卷入橡胶股票交易。1910年6月，伦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胶股票随之狂泻。中国资本在上海和伦敦两地股市损失约4000万至4500万两白银之间，工商业遭受重创，清政府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其新政成果毁于一旦。次年辛亥革命爆发。

② 尼尔·弗格森：《第一次世界大战》，台湾广场出版，2013年，第186~543页。

总之，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在现代加工工业方面，特别是轻工业，改变了从无到有的局面，但是，在现代货币金融制度、资本市场、企业制度方面，几乎还在有和无之间徘徊。如果说，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主要集中在机器工业及其产品方面，那么，在中华民国建立之时，中国和西方国家在现代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方面的差距，不仅全方位扩大，而且呈现加速趋势。对此，中国官僚系统（阶级）和知识精英缺乏常识性认知。

2.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北洋政府时期的货币金融

北洋政府为在中国建立现代货币金融制度，做出了不可低估的努力。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处于初始阶段的现代货币金融制度，影响深刻而强烈。

2.1. 币制。1914年2月，民国3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和《国币条例施行细则》，正式宣布中国实行银本位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宣布实行银本位制。第一次是宣统二年即1910年颁布的《币制则例》，因为次年清廷被推翻，未来得及实行。根据《国币条例》及相关法令，天津造币厂于1914年和江南造币厂于1915年，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到1915年8月，所铸发的银元已经处于主导地位，政府得以取消龙洋行市。1919年，袁币铸造量很大，至少数亿枚之多，几乎是中国铸币史上唯一获得成功的银币。尽管如此，《国币条例》及其修正草案并未全面落实，袁币没能最终完结“银两制度”。

当时中国朝野上下的主流认识是：以《国币条例》为过渡性质的条例，在采用金本位之前，需要通过银币统一货币，而不是永久银本位，最

终选择是金本位。^① 1915年，财政部所设币制委员会拟定《修正国币条例草案》，增加了关于铸造金币内容，确认将来过渡到金本位制。1917年，北洋政府在宣布“一切税项均应以国币计算税率，即以袁币为税收的本位币”的同时，颁布《金券条例》，准备实施金本位改革。但是，币制改革需要财政支持。主政的段祺瑞计划向日本借款。此计划被过分政治解读，遭遇美、英、法等国的抗议，以及国内舆论反对，终被取消。^②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反帝爱国热潮，严重阻碍和推迟尚有希望的币制改革。只是自此之后，中国和金本位擦肩而过。直到1933年，中国得以“废两改银”，确立银本位制，已经完全没有建立金本位的历史条件。

2.2. 金银比价。在金本位制度下，实行金本位制国家和银本位制国家之间，不存在“固定汇率”，或者“固定平价”，因为白银在国际市场上主要是商品，受制于供求关系。中国以白银为货币，国内流通的主币是银两、银元及以白银为准备金发行的银行兑换券。中国白银产量有限，对世界市场的白银价格影响甚微，所输入的白银，十之八九来自伦敦。相反，白银价格，或者国际汇兑取决于国际市场，主要是伦敦市场。自19世纪中期至1935年11月法币改革以前，中国对金银进出口实施金银自由流动制度，不缴纳任何关税。^③ 所以，国际市场的金银比价，即银价

① 20世纪初，银本位代表人物是张之洞；金本位代表人物是梁启超，梁在《余之币制金融政策》一文中，主张借款6000万英镑，实施金本位。金汇兑本位代表人物是赫德（Robert Hart）和精琦（J. W. Jenks）；金银并行制代表人物有卫斯林（G. Vissering）和刘冕执，卫斯林于1912年7月写了《中国币制改革刍议》。

② 根据《金券条例》：币制局为金券发行银行，金券单位为1金元，含金量是0.752318克，即库平2.01688分；金券在金元已铸之后，可兑换金元；金券与国币（即银元）不定比价，而以牌价为基准。发行的金券的准备金为本国金圆或生金或外国金币。为此，北洋政府计划向朝鲜银行借款8000万元，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所谓“亲日派”的曹汝霖，任财政部长，陆宗輿任币制局局长。资料来源：张家骥著：《中华币制史》，第30~32页。

③ 鉴于白银大量外流，威胁到中国银本位制，中国政府于1935年5月实行禁止黄金出口，开征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

变动，直接影响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即白银的流入和流出。金银比价构成了中国货币汇率的基础。金银波动成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对中国发生影响的最重要方式。

从1661—1870年的200多年间，世界的金银比价一直稳定在1:15左右。所以，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尚不存在汇率问题。这个时期外债，包括两次鸦片战争的赔款以银元和银两为单位，也不存在以外币支付的问题。加之，在1887年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出超状态。但是，自1873年经济危机后，国际银价开始发生不断下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1909年，银价最低，金银比价为1:39。白银价格下跌，对中国经济影响重大。中国巨额外债，名义上以银两为单位，实际上以外币为单位，主要以英镑计算。银价下跌，中国最终以所借年份平均汇价折算逐年偿付外债的白银本息，形成所谓“镑亏”。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改变国际银价40年颓势，银价逐步上涨。金银比价在1915年是39.9151；1918年是19.8264；1919年是16.3466。1919年相比1914年，上涨幅度50%。^①据说，银价上涨的原因之一是德国政府为了削弱英国金融实力地位，散布英印政府没有足够的白银保证货币兑现的谣言，制造白银恐慌，摧毁英国殖民地的战时后援。从1916年到1917年，从中国输送白银到印度成为汇丰银行一大业务。英国政府曾企图在中国发行白银国债，用中国民间白银弥补政府的支出赤字。只是由于汇丰银行不愿意承销，此事才没有做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银价波动，对中国产生双重冲击。一方面，刺激白银大规模外流。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入印度。中国白银大规模出口，包含在国际市场套购黄金的可能性。例如，“1919年白银汇率高涨，1海关两可兑英镑104.72便士，比战前高3倍，因此许多中国人纷纷用银币购买黄金首饰，当年黄金净进口高达41000千海关两，成为中国历史上黄金净进

^① 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8~249页。

口最多的一年”。^① 另一方面，为了支撑经济增长，增加货币供给，需要进口更多白银。所以，以白银为主体的中国货币供给，决定于国际银价变动导致的白银对中国流动，本质上属于不可控“外生变量”。从1918年到1920年，中国进口白银数额庞大，以致推高了1919年的世界白银价格，使之达到1900年至1930年的白银价格最高点，美英控制白银价格在每盎司1美金计划失败。

进入20世纪20年代，金银比价大幅度震荡，上下落差很大。从1921年起，银价下跌成为趋势，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可低估。特别是，中国进口设备需要比过去支付更多的白银，以致亏蚀甚巨。此外，直接冲击国内基础金融市场的银钱比价，导致“银贱钱贵”，提高农产品的销售、购买和纳税成本，损伤农民和市民的利益。

2.3. 货币供给和利率。中国货币经济，自明清至民国初年，基本处于放任自由状态。北洋政府时期，推行的仍是以银元为主、两元（银两、银元）并行、银元铜元和纸币并用的货币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以 M_1 和 M_2 衡量货币供给，1914年至1918年，并没有显著变动。但是，货币供给结构发生改变，虽然银元是主要货币形态，银元的供给没有增加，反而下降，铜币和活期存款也是如此；银行券大幅度增长，从1914年的1.185亿元增长到1918年的2.824亿元。也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开始进入通过扩大纸币供给缓解货币需求压力的历史阶段。战后，狭义货币量持续增长。自1918年，货币供给的总趋势，主要是狭义货币量持续增长。1920年，24.68亿元；1921年，25.71亿元；1922年，27.43亿元；1923年，29.13亿元。^② 这样的货币供给图像，反映的是中国宏观经济景气下的货

^① 贺水金：《论中国近代金银的国际流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罗斯基（Thomas G. Rawski, 1989）：《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Oxford, 1989. pp. 394-345.

币需求扩张。

北洋政府时期的货币供给，还受到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在这个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继续呈现下降趋势，对货币供给总量发生影响。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主要因为国内外白银比价变动，白银存量和流量波动，货币流通速度减缓；商品化程度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新增货币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满足原来并不需要货币的那一部分商品的需要；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导致的被动储蓄的减缓。

发行纸币的主体是外资银行、中国国家银行和地方银行。其中，外国银行钞票的流通始终居于重要地位。究其原因，外资银行具有支付稳定存款利息的优势，存款持续扩张，并以此支持银行券的发行。故外资银行的存款占资本额的比重，以及发行银行券占资本额的比重快速增长。^①这也是外资银行的纸币发行始终高于中国本土银行的重要原因。外资银行的代表是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日本在中国银行的功能，与英、美银行的吸收存款能力差异不大，但是，在发钞上特别活跃。至于中国国家银行，主要是中国、交通两银行，在1913年至1915年之间所发行的纸币都是银行兑换券性质，发行量不能扩大，数额有限，流通情况较好。在地方银行中，有一类地处富裕地区，财政情况尚可，基本没有发生滥发纸币；还有一类所在地区经济落后，财政拮据，纸币发行失控，造成通货膨胀，民众破产，经济恐慌，市面骚动。所以，北洋政府不得不向各省派员监督官银行号，下令“各种纸币，不能再行增发”，禁止新设的商办银行号发行纸币，已发纸币则逐步收回。简言之，北洋政府期间，货币供给量和实际货币余额的持续增长，扩大了资本的存量和流量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产业投资，主要是工业增长，推进现代经济的成长。

^① 民国元年，国内银行纸币发行额 5267.5 万元，外国银行在华纸币发行额只有 4394.8 万元；1921 年，国内纸币发行额 9594.8 万元，外国银行在华纸币发行额则达 2.12 亿元；1925 年，国内银行业纸币发行额 2.05 亿元，外国银行在华纸币发行额则达 3.2 亿元。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利率呈现与货币供给趋势和资本市场供求有着强烈的相关性。银行拆息可以看作当时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基础利率。1873—1936年间，上海的拆息虽然波动较大，其变化趋势完全与货币供给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属于拆息低谷期，大约是0.5厘，1918年之后，利率增长，1921年是回升的高点，大约是2.5厘。^①民国之后的银行利率始终居高不下。以天津、上海、北京三地的国有银行为例，以地契、商铺、定期存折之类的物品做抵押的一年期普通贷款，利息最低10%，高的则在16%以上。加之中国资本整体不足，地区和产业部门发展不均衡，民间高利贷情况严重。^②高利贷的存在，导致公债投机，进而侵蚀产业资本。当然，高利贷与商业资本结合，可以起到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勉强算作其积极意义。

2.4. 物价。北洋政府时期，白银长期入超，甚至发生黄金、白银双双入超，银价呈现贬值趋势，纸币发行增长加快，基础货币供给增大，逻辑上，应该导致全国性的通货膨胀，事实上，物价大体稳定，特别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通货膨胀只发生在部分地区。这说明，这个时期的货币需求足以吸纳货币供给，即使纸币发行量也没有过量。但是，不等于说物价上升停滞。其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生产品批发指数，除了1914年发生显著跌落，自1915年至1919年，持续增长，且明显加快，1919年比之1914年，增长了26.51%。同期的消费品指数，以比较低缓的速度增长，1919年比之1914年，增长了7.95%。如果选择食品、衣服、燃料和住房四项城市生活必需品，且以1930年的消费指数为100作为参照，1913年

① 燕红忠：《货币供给，货币结构与中国经济趋势：1650—1936》，《金融研究》，2011年第7期。

② 民间高利贷利息却比银行还高，月息一般高达8%，如果加上“驴打滚”复利，折成年息在150%以上。

的总指数不足60, 1918年和1919年还有所下降。^① 其中的食品价格指数增长尤其缓慢, 很可能与农业产出有所增加、农产品商品化比重提高、城市农产品供给扩大有关。只是农村所得物价(农民出售各种农产品时所得到的价格)指数既有升高也有跌落的年份, 跌落幅度有限。^② 其主要原因是:(1) 农业供给丰裕。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农产品的需求, 主要通过江南地区实现, 并没有对中国广大腹地农产品的供需结构发生实质性影响。(2) 劳动力供给充足和城市生活物价相对稳定, 制约了工人工资的增长。而工资增长缓慢, 抑制了物价。

2.5. 银行体系。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新式银行体系包括: 国家银行、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是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的前身是大清银行。1913年4月, 北洋政府颁布《中国银行则例》, 明确以中国银行为国家银行, 归财政部直辖。中国银行成立主旨是整理币制, 铸造发行货币, 负募集或偿还公债, 代理国库等特殊业务之责。1917年11月, 北洋政府公布新的《中国银行条例》。最初所设计中国银行为国家和民众共有, 具有相当的历史超前特征。之后, 中国银行以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为参考模式, 采用官股与商股共同参与的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但是, 中国银行与世界上一般中央银行发展的进程相反, 不但没有强化与政府关系, 反而通过商股增加, 使北洋政府相应出让官股。1916年“信用危机”加剧了中国银行的“商业化”选择, 对后来中国金融制度影响至深。这样的改变, 体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民间金融资本的崛起和金融自由化的惯性。

外资银行是中国最初建立的现代商业银行。直至清末, 外资银行数目有限, 不足20家。外资银行的主要功能包括汇兑, 对在华外国企业的投

① 王玉茹著:《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88页。

② 同上, 第18~35页。

资，中外商人的短期融资和企业贷款。1890年以后，外资银行进入房地产业、股票市场。由于中国可以自由输出输入银块和银元，加上辛亥革命中官僚富豪将大量资金存入外国银行，外资银行库存的白银数量巨大，在整个白银库存中的比重长期维持在80%以上。^① 在外资银行中，汇丰银行是成功的代表，维系数十年持续扩张，对上海的外汇、标金和大条银等金融市场，具有重大和直接的影响力。

北洋时期的本国商业银行，可以划分为官僚资本控制和非官僚资本控制的两类商业银行。(1) 官僚资本控制的商业银行。军阀、官僚、买办和地主构成的新资本集团的核心是官僚资本。官僚资本除了购置土地和房地产，主要投资于金融产业，集中在银行业。因为银行定期存款受到工商业兴衰状况影响甚微，可坐食利息。北洋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在国内大量发行公债，官僚资本控制的商业银行经销公债获利丰厚。交通银行是官僚资本控制的重镇，进而形成实力雄厚的“交通系集团”，其势力膨胀到一度左右国家政局的地步。^② (2) 非官僚资本控制的商业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头几年，形成工商业投资高潮，新设中国本土银行数目和资本得以全面扩张。无论在钞票发行、对工商企业融资、对钱庄拆款方面，业已形成了一定规模。中国的本土银行自组织能力也得以发展：1919年全国银行公会联合宣言；1920年27家本土银行组成银行团。当时，著名的“北四行”和“南三行”的创立，反映了在这个时期中国本土银行联

① 例如，1917年7月7日沪埠存银，洋商银行计占82.94%，而华商银行仅占17.06%；1924年9月5日银底总额为3580万两，洋商银行所占的比重仍为82.37%。

② 交通银行是梁士诒等交通系官僚掌握的银行。王克敏、李士伟、周学熙、周自齐、叶恭绰、朱启铃、熊希龄等也是交通系人物。

合和集中的倾向。^①

在北洋政府期间的商业银行中，还要包括中外合资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依然不乏新的中外合资银行开业。例如，1916至1918年间，就有日本兴亚银行成立，中孚银行，中美合办美丰银行（Banking corporation），中法银行（Sino-French bank）和金城银行，日本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入股的中华汇业银行相继开业。在1920至1922年之间，先后又有中美合资的中美懋业银行，中美合作的四川美丰银行（the American Oriental Bank of Szechuan），中国、挪威、丹麦合资银行开办。^②

钱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显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币制紊乱的情况尚未完结，钱庄在各种货币的兑换中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决定钱业市场上以银两表示银元价格的所谓“洋厘”，控制货币拆借市场和反映货币供求关系的“银拆”。更重要的是，以经营抵押放款为主的银行不足以满足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而钱庄以经营信用放款为主，在原本是钱庄的天下，没有现代工业基础的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空间。

简言之，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北洋政府初期的外资银行和本国钱庄“两强称雄”格局，转型到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钱庄和本国资本银行的“三足鼎立”格局。中外银行分享着共同的市场利益，形成互补，是历史主流。

2.6. 金融中心。在晚清很长一段时期中，外国银行比较集中在上海。

^① “北四行”包括1915年成立的盐业银行，1917年成立的金城银行，1919年成立的大陆银行，1921年成立的中南银行。1922年，四行成立联合营业事务所。1923年成立四行准备库，共同发行中南银行纸币。“南三行”包括1907年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1909年成立和1915年改名的浙江地方实业银行，1915年成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② 王方中主编：《中国经济史编年记事（1842—194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6~323页。

但是，那时华资银行尚未兴起，新式工业还刚刚起步，外国银行的业务尚有局限，银行总资本和资金实力也还不够，即使上海也不足以成为“金融中心”。中国的金融中心形成于北洋政府时期。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工业化有可观发展，现代银行体系形成，资本市场出现，初步建立全国性金融网络，出现了两个全国金融中心，即北京和上海。北京作为金融中心的标志是比较明显的，它与中央政府用以控制金融业的中央银行或国家银行的总行所在地是同一的。因为金融中心不仅应以业务量来衡量，而且更应以金融功能来衡量。以后由于北洋政府对金融业的失控和金融业的相对独立，北京这个金融中心消失，只剩下上海一个金融中心，其功能包括了全国性外汇内汇中心、标金市场和白银市场中心、资金周转中心、证券物品交易所中心，以及国内外主要贸易商品集散地。

3.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北洋政府时期的国际收支

中国自进入 20 世纪，无论其自给自足经济以怎样的规模存在，但是，国民经济的走向和演变取决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通过分析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可以深入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经济的直接的、深远的影响。

3.1. 国际收支的基本特征。从 20 世纪初至 20 年代末，中国国际收支所呈现的是国际贸易增长和逆差并存，外债规模扩大，外资规模时有下降，也有反弹的局面。见下表：^①

^①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245～247 页。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1903—1928)

单位：百万海关两

	1903—1913	1914—1919	1920	1925	1928
	收支	收支	收支	收支	收支
贸易收支平衡	104.9	39.0	158.2	81.2	82.9
A 经常性项目平衡	480.2	666.9	805.7	1102.4	1439.6
	568.2	729.1	898.7	1157.0	1399.3
B1 资本项目：外债	46.1	35.7	40.5	7.8	10.7
B2 资本项目：FBI	28.2	15.0	31.0	16.0	64.0
B1+B2	74.3	45.7	71.5	23.8	74.7
A, B 两项合并	554.5	717.6	877.2	1126.2	1514.3
	568.2	729.1	898.7	1157.0	1399.3
C1 金净出入	0.9	5.1	17.5	1.0	6.1
C2 银净出入	3.0	0.9	92.6	62.5	106.4
D 误差与忽略	17.6	15.7	96.6	92.3	2.5
总计	572.1	734.2	991.3	1219.5	1514.3

中国是银本位国家，而世界货币主体是金本位。黄金和白银进出口既与贸易有直接关系，又相对独立。故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特殊之处是建立“黄金净进口额”和“白银净进口额”项目。此外，除了国际贸易、白银和黄金的净出口额、借款和外国投资之外，华侨汇款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地位相当重要。

3.2. 外贸。1864年，中国建立国际贸易的海关统计，从1864年至抗日战争之前的1936年，除1864年和1872至1876年有过贸易顺差，其他各年均为逆差，且越往后逆差额越大。在19世纪，每年贸易逆差的规模约几千海关两，进入20世纪后，每年逆差额增至1亿多海关两。1895—1930年，中国累计的逆差已近30亿海关两白银。^① 中国海关计价单位是海关

^①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8页。吕实强、林满红：“中华民国经济发展的序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第4~6页，第238页。

两。但是，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有两个统计口径，海关两和英镑，或者美元。白银价格下落，意味着海关两对外汇的汇兑价贬值。

自19世纪后期开始，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中国缺乏关税自主权，外贸部门处于从属地位，对定价权没有影响力，不得不接受工业产品和加工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其背后则是中国工业化水平低下，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不可避免的劣势。近代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分量，从来没有达到2%”。按照人均计算，中国不仅与欧洲和北美差距巨大，而且落后于主要亚洲国家。“印度的每人贸易量大于中国每人贸易量的两倍，而日本则大约十倍之多。”^①

在这个时期，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大，并非因为中国自身生产及流通方式的变革和进步，而是因为具有价格决定权的贸易组织，以及贸易结算的国际化的推动，受惠于国际市场扩大。尽管中国国际贸易规模有限，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如此之低，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通讯和交通现代化，现代市场网络和体系，外资企业扩张，买办商人和买办资本崛起，金融货币和资本市场，农业商业化发生了积极和深刻影响，推动形成包括现代乡土工业、现代矿业、能源业、制铁业、纺织业、电灯业、制糖业在内的现代工业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外贸显现如下新特征：(1) 出口增长快于进口增长，贸易逆差继续存在，逆差额缩小，属于进口与出口数目最接近的一段时间。(2) 可以满足参战国对原料（制作油漆的植物油，皮革和羊毛，钨或锑为代表的有色金属）和食品（面粉、鸡蛋和蔬菜，俄国军队消费的各类茶叶）迅速增长的需求。欧美在中国江南原先投放的工业资本转变为供给战争需要的大宗贸易流动资金。中国锑、钨等有色金属，农产品市价全面上升，出口规模扩大，获利倍增。(3) 各个交战国需要白银作为辅币，刺激了中国白银出口，造成白银出超。(4) 因为战时生产减少，各

^① 里默：《中国对外贸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173页。

种物资短缺，加之商船被征用为军事运输服务，商船减少，进口货品运输困难，以致运输费奇昂，转嫁至货品价值的上升，结果货少价贵，进口货价屡创新高，1918年货价达到历年最高。(5) 银价波动和银价预期影响进出口成本。外国资本家和进口商存在银价上涨预期，中国资本家和出口商存在银价下跌预期，博弈结果都会造成拖延设备和原料的进口，甚至出口的规模和时间。(6) 一战之后，世界回归金本位，国际汇率“金贵银贱”刺激外国直接投资，华侨汇款。同时，刺激欧美商人利用世界“金贱银贵”和中国“金贵银贱”差价，获得双重汇兑差额的利润。向中国出口黄金的国家，美国居首，其次是非洲，再次是澳洲。除了合法进口渠道之外，还有走私和其他非法渠道。^① 只有因为中国海关统计不完备，相当多的黄金流入没有记录，所谓出超年份未必是真正出超，因而发生中国存在黄金出超大于黄金存量的情况。

值得强调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民族私营工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因为战争，中国需要进口的机械、机器、五金、水泥、纺织、粮食加工等行业产品数量被迫下降，或者来源遭到切断，中国厂商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短缺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利润空间扩大，刺激了国内工业发展。在战争期间得以发展的新式工厂主要集中在棉纺织业、机制面粉业和油料业以及煤矿、铁矿、化工、机器、水泥、缫丝、制瓷、火柴、搪瓷等行业。大战之后，欧美市场开放，对各种物资的需求都十分紧迫，中国向国外大量出口，获利甚厚。这个时期的中国，机器进口进入最盛时期，工

^① 其他主要渠道：(1) 黄金走私。耿爱德在《中国货币论》(E. Kann: *The currencies of China*, Chapter 1. Gold as currency in China) 中，有明确描述。自1917年之后，日本参与的“有组织之私运进口”。(2) 外国人来华旅历者直接携带黄金。(3) 由黑龙江经沙中冲洗而得的大量沙金，多为俄国人所收购，再流入中国。特别是由美国“邮包”寄至中国的黄金，更有大宗金货来源。这些渠道，都未经海关统计。资料来源：武靖干著：《中国国际贸易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59页。

业化加速。^① 1919年，中国出现了黄金和白银双双入超，折射的是中国货币供给充分。在战后欧美各国萧条尚未恢复，中国国内经济一片繁荣景象。^② 中国外贸增长持续到1929年大萧条的到来。

3.3. 外国直接投资（FDI）。中国自洋务运动，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工业化冲动和资本短缺矛盾日益严重尖锐。造成中国资本短缺的主要原因是：错过了所谓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本土有限的社会剩余的很大部分沉淀为土地资本；民众储蓄水平和国家公债效果低下。因为资本短缺，高利贷普遍，资本成本过大。中国陷入了资本短缺—工业化缓慢—国际贸易落后—国际收支恶化—低收入—低储蓄率—资本短缺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通过自身机制解决，已经不可能。所以，外国资本成为最为重要的“外生变量”。

从洋务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历了四次工业化高潮。每次工业化高潮，都是工业投资增加的结果，而外国资本举足轻重。第一次是19世纪70年代至甲午战争之前，外资企业投资包括航运业、船舶修造业、机器制造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第二次集中在1895年至1911年。1895年开放资本市场，之后是修筑铁路的高峰期，外资企业在华进入大规模投资阶段，如果按照投资比重的高低，分别是运输业，特别是铁路、贸易业、制造业、金融业、矿业、纺织业，以及公共事业和房地产业。第三次发生在1912年至1920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前后，工业年增长率13.4%。现代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都有显著提高。第四次是1928—1936年，即南京政府建立至抗战之前，工业

① 机器进口：1921年全国进口机器达到5894.9万关两的高峰。1925—1929年，趋向低落。1931年回升，增长到4691.2万关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52页。

② 资料来源：1920年上海海关报告，关册，1920年，上海，第49页；徐雪筠等译：《海关十年报告》，第206页。

年增长率 8.4%。^① 在这个历史阶段，虽然发生清代覆灭，建立中华民国，外资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呈现增长和扩张态势。大概念是从 1902—1914 年，外资在华投资增加了一倍多，1914—1931 年，在前阶段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多。^②

支撑外国资本在中国持续投资的基本原因包括：（1）持续开放市场，增设通商口岸，扩大内河航权与开发长江上游，获得铁路修建权，拓展华北市场。（2）电报、邮政、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3）劳工工资水平低下。（4）金银比价处于“金贵银贱”时期，以金折算为银，汇入中国投资十分有利。（5）资本回报率高，利润丰厚。外资企业将投资收益的大部分继续留在中国。外国在华投资的资本大半来自中国。因为银价低落，以银兑换金汇出利润，折损过大。所以，外资企业投资收益由华汇出的数目，占企业投资总值的比重很低。^③（6）中国，特别是上海的投资环境比较安全。

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增加资本供给，降低资本成本；整合本土的生产要素，打破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技术转让，奠定现代产业部门的基础；带动金融、银行、保险、钱庄、律师、洋行等服务行业发展；示范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制度，突破传统行会组织；训练技术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国际贸易，统合国内外市场；拓展开埠口岸城市面积，推进乡村人口迁移和城

① 章长基：“1912—1949 年中国的工业生产”，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311 页。

② 至 1914 年，关于各国在华投资规模中外学者估算有所不同。有一种估计是 9.61 亿美元多。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744 页。

③ 根据雷麦的估计，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回报率高达 100%。1902—1930 年，外国在华企业投资增加了 19.71 亿美元，同时期，从国际收支上看，由国外汇入中国的企业资本有 9.42 亿美元，即占新投资的 47.8%。这就是说，大于 50% 左右的投资来自中国自身的利润积累。

市化，以及城镇的“原工业化”；促进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形成现代商业秩序，引发政治制度变迁和进步。相反，如果没有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仅仅依赖民族资本，势必强化“资源配置危机”，维持落后的技术和管理，拖后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延续发展不均衡等局限性，拖累工业化进程。所谓“过剩资本的输出”的说法过于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外国资本在中国的规模减少，战争结束之后，不仅投资规模回升，而且全面调整投资的部门、区域分布投资模式，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进入新的阶段。

3.4. 外债。中国政府借款开始于清末。直到鸦片战争，清朝政府并没有举借外债。后来即使实施关税制度改革，因为财政状况尚可，没有利用公共信用、外国银行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观念。直到1862年，清朝政府因为镇压太平天国，开向外国银行借款先河。清朝政府大规模举借外债的转折点是甲午战争，外债严重膨胀。即便如此，因为清末政府外债多以基于偿付对外赔款的普通借款为主，清朝政府的外债规模和外债结构，并没有严重超出合理范围。^① 因为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庚子赔款”（Boxer Indemnity），使清朝政府外债突破政府和国民可以承受的限度，^② 所以自1902年至1911年，清朝政府倾全国各类税收资源，各省分摊庚子赔款，并通过庚子赔款债务化，偿还庚子赔款。甲午战争赔款、庚子赔款所引发的借款一般在国外交割，并不对中国产生实际资本收入。清政府从此陷入

① 直到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外债大约25笔，总计不过数千万，借后不久即归还。但是，1894年至1898年的5年间，清朝政府外债总计3.5亿两，超过甲午战争前所借外债总额的6.6倍。甲午战争赔款和赎金高达2.3亿两，年利五厘，3年内交清。那时清政府财政收入每年不过8000余万两。清朝政府唯有寻求外债。其中较有影响的有1895年俄法借款，1896年英德借款与英德续借款两个款项。均以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

② “庚子赔款”条约规定：中国需要对11个列强国家战争赔款4.5亿海关两白银，年利四厘，从1902至1940年，分39年交清。这笔赔款连同利息则是9.8亿海关两，利息超过“本”数。清政府每年需要安排大约2000万两支付“庚子赔款”。

全方位财政危机而不可自拔。所以，清朝亡于义和团而绝非亡于革命党。当然，压倒清朝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确实与外债有关，“川汉铁路”的国有化酿成“保路运动”，诱发辛亥革命。^①

中华民国是在基本没有财政收入的背景下建立的。其财政情况甚至不如清末。^② 南京临时政府在争取收回关税权和以政府名义举借外债的努力，都没有成功。最严重的时候，曾有“金库仅存十洋”的情况。1912年，北洋政府组建，关税收入大幅度下降，其他财政来源枯竭，财政支出浩繁，形成巨额财政赤字。^③ 北洋政府处在濒临财政破产的边缘，只有三种办法：财政制度改革、发行国内公债和举借外债。

北洋政府在财政制度改革方面，整顿田赋和盐税等旧税，引进西方新税制，开办印花税、烟酒公卖并制定所得税、遗产税法。^④ 在国内公债方面，总共发行内债6.18亿元之多。但是，比较财政制度改革和发行国内国债，都需要时间，唯有举借外债具有“立竿见影”效果。所以，北洋政府自始至终外债和内债并重，外债数额小于内债，政府的直接贡献却大于内债。北洋政府每年必须偿还一定数目的外债本息，外债支出成为经常项目。对于北洋政府外债需求，欧美主要工业国家政府和金融界的反映大体积极和正面。这不仅因为这些国家存在资本过剩和资本输出的冲动，中国具有接受资本输出的众多优势条件，中国是银本位国家，金银比价和白银

① 实业借款，如铁路借款和其他交通借款等，资本则会流入中国。1911年5月，清朝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川汉、粤汉铁路借款”的正式合同，借款金额600万镑，折合银4500万两。为此，清朝政府强力实施相关铁路“干路”的产权国有化。

② 清代后期，尽管外国人管理的总税务司主持关税，在偿付赔款或外债后，留下“关余”，构成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

③ 1913年，岁出总额64223.7万元，岁入33366.1万元（不包括外债、内债收入），赤字高达30857.6万元。《熊希龄遗稿》。

④ 曾任北洋政府两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1866—1947）贡献甚大，他二任财长的时期是北洋政府统治的17年中财政状况最好的年份。

汇率有利于实行金本位的借贷国家。最重要的是，通过对中国借款，维持中国政府行政系统运行，避免中国政府财政危机蔓延和社会动乱，推动财政制度改革，有利于中国政府继续承担偿付包括“庚子赔款”在内各类外债的责任，以保障在中国的经济利益。^①此外，普通借款和实业借款，政府和企业不可分割，通过普通借款带动实业借款，有助于外资企业在金融、工业、矿业、通信、交通、基础设施部门的扩张，在欧美国家的借款结构中，实业借款始终排在行政和军需借款之前。简言之，实施对中国政府借款，系西方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

北洋政府的外债基本集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即1912年至1913年间。其中，数额最大的是第一次“善后借款”，故很多史书将“善后借款”称之为“善后大借款”。^②“善后大借款”的英文是“改造借款”（Re-Organization Loan）。其主体是1909年组建的国际借款银行团（International

①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宣布：“革命之前，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北洋政府建立，袁世凯继续承担偿还清代积欠外债的职责。南京政府继北洋政府之后，继续支付“庚子赔款”。直到1939年，因为中日战争，中国政府丧失偿还能力，不得不宣布停止支付“庚子赔款”。至此，中国政府共支付“庚子赔款”长达37年，总额6.5237亿两。如果再扣除美、英等国的退款，中国实际支付5.76亿两，约占“庚子赔款”本息总额的58%。

② 1912年到1913年成交的外债共30余笔，金额达到4亿元。主要外债项目有：1912年善后借款三次垫款共规元银900万两（约合1190万余元）；1912年至1913年英国独立财团克利士公司（Birch Crisp & Co.）借款500万英镑（实收约合银元3834万余元）；1913年的2500万英镑的第一次“善后借款”；1913年德商瑞记洋行的30万英镑借款，奥国公司两笔分别为120万英镑和200万英镑的借款；中央各部的零星借款约有220万元；铁路借款。1912年的《陇海铁路借款》，第一期债票400万英镑；1913年的《同成铁路借款》100万英镑。1913年，与中法实业银行签订借款合同，1.5亿金法郎。王方中主编：《中国经济史编年记事（1842—194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1页。

Banking Consortium for China)。^①自1912年2月至1913年4月，北洋政府经过与银行团漫长而曲折的谈判，最终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签订《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②“善后大借款”金额2500万镑，折合白银2.4亿两，年息五厘，期限47年，以盐税、关税等担保。“善后大借款”的主要用途是裁军、政府行政费用以及整顿盐务等各种支出。^③

如何评价善后借款，事关如何认识北洋政府时期诸多历史事件间的逻辑关系。当时的社会舆论受国民党人影响甚大，普遍认为“善后借款”是丧权辱国，破坏国家主权的行为。其理由是：“善后借款”以盐税、海关税等做抵押，盐务方面的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外国人之手；借款条件过于严格，近乎苛刻；谈判过程不透明，没有经得国会通过，秘密签约；包含用于镇压1913年“二次革命”的预谋。百年之后再看“善后借款”，会有新的解读。如果比较当下国际金融机构的借款条件，很难说过分。欧盟对其成员国希腊的借款条件就是证明。1913年，刚刚获得政权的北洋政府，没有信用积累，用今天的语言是“国家信用评级”过低。所以，“善后借款”

① 建立银行团最初原因是针对中国“以夷制夷”政策，保障列强在中国借款中获得更多特权和更高利润。银行团经历了英、法、德、美四国组合；英、法、德、美、日、俄六国组合；因美国退出之后的五国组合。1920年，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重新组织了银行团。不久以后，中国和国际环境发生大变化，银行团的存在形式终结于1946年。

② 袁世凯先后派唐绍仪、周自齐、熊希龄与四国银行团接洽。1913年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地点在北京东交民巷汇丰银行大楼，北洋政府和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中方代表是财政总长等官吏，包括赵秉钧、陆征祥、周学熙等。

③ “善后借款”贷款额原由五国银行平均分摊，英国占35%，德国占22%，法国占14%，沙俄占8%，日本占7%，美国占2%。换算各国货币是：德国51125万马克，法国63125万法郎，俄国23675万卢布，日本24490万日元。发行价格九扣，利息五厘，实收八四扣。实际借到不过2100万英镑，再扣除偿还已到期各种款项共约570万镑、赔偿各国因中国革命损失200万镑、赎回各省政府所欠五国旧债287万镑、各省军队解散费300万镑等，实得债面的40%。

的47年借款期限和5%利率，不仅正常，甚至优惠。至于“善后借款”没有经过国会，以当时国会中国国民党所占席位和影响，按照法律程序，得以通过的可能性很小。关于“善后借款”的实际支出，确有用于镇压“二次革命”和防止革命党再度起事部分，却不能倒推“善后大借款”包含镇压“二次革命”的预谋。因为，在“善后借款”谈判期间，本不存在“二次革命”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因为“善后借款”彻底缓解了北洋政府的财政危机，避免政府破产。“善后借款”实行以后的1914年和1915年，北洋政府中央财政连续两年好转，政府显现稳定国家财政的能力，出现走出财政危机的态势。北洋政府的运行成为中国向现代国家演变的前提。但是，历史确实是复杂的，“善后借款”成为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索。^①北洋政府为此增大军费开支，使得盐政改革无法按照预期进行，“改造”中国财政计划最终落空。更深层次则是，加剧袁世凯的独裁倾向，逆转了中国共和制度的原本历史进程。

善后借款的第二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外债历史影响重大：因为银价跌落，外债还本付息量增加；中国加入协约国一边，向德国宣战，停止支付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引发了对中国经济、政治和司法制度影响久远的“金法郎事件”。^②最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① 国民党人强烈反对“善后借款”，孙中山以此为借口发动二次革命。直至二次革命失败，“善后借款”终于在国会得以强行通过。

②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通货膨胀，法郎暴跌，法国却要求中国以不存在的金质货币偿付赔款。美、比、意等国也向中国要求按硬金计算赔款。1923年，法国联合《辛丑条约》八国公使向北京要求庚子赔款支付现金，拒不批准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关税条约》，指使总税务司在中国关税、盐税余款内，按金法郎计算，扣留法、比、意、西四国的赔款数。1925年4月，北洋政府与法国签订《金法郎案协定》，法国将部分庚子赔款余额退还中国，作为中法两国有益事业之用，总税务司扣留的中国关盐余款还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赔款余额折成美金支付。国务会议批准“金佛朗案”，后司法机关的介入，京师地方监察厅认定此案使中国损失8000多万，外交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李思浩等构成外患罪，司法总长章士钊也受到检举。

导致所谓的第二次“善后借款”计划流产。^①

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北洋政府时期的外债时，发生在1917年至1918年间日本政府对北洋政府的“西原借款”（Nishihara Loans）的历史地位相当特殊，对后来的中日关系影响深远。^②西原借款前后一共8笔，总额1.45亿日元。按照当时日元和美元汇率，1.45亿日元相当于7225万美元。利息七至八厘。^③史学界关于西原借款初衷之一用于支持北洋政府1916年再次启动建立金本位的币制改革，以及缓和中国精英和民众因为《二十一条》对日本的愤恨，从来争议不大。但是，对于西原借款的五种主要实际运用，即军费和军火费，偿还内外债，行政和国会支用，交通部支用等，始终被强烈批评。这样的支出结构确实反映出当时财政体系的脆弱性。

在中国正统历史上，“西原借款”也被指摘为卖国借款。但是，“西原借款”与历史上其他外债相比较，押品尤为空泛，其中的铁路垫款并没有兴建铁路，其他押品只在借约上空言指定，并没有实行接管。实属是民国

① 此次借款始议于1917年，原意向性借款总额6000万英镑，并承诺如对待帮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中国实施税制币制改革，统一金融管理。1920年10月，新国际银行团正式成立，准备接受“统一的中国政府”借款之请求，未获中国作答。直到1924年，新国际银行团对于币制改革顾问之聘请、烟酒公卖与田租列为抵押、南北统一问题、裁军、立宪、厘金裁废、铁路标准化诸问题，未获结论。其间，国际银行团多次否决中国数项大宗借款，但各国若干独立小财团，却依据“五百万元以外可自由投资”之规定，竞相贷款于北洋政府。

② “西原借款”以西原龟三（Nishihara Shakkan, 1873—1954）命名。西原龟三是寺内正毅莫逆之交，寺内官拜宰相，西原便成为无冕大臣。中国方面8项借款当事人，除后一项是驻日公使章宗祥外，都是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

③ 1917年，美元已成为世界主要货币。1897年明治30年，日本第二次金本位，规定1日元等于750毫克黄金（0.75克），1美元=2.005日元，或者100日元=49.875美元。一直维持到1917年。20年稳定。

以来中国对外借债条件最优厚的一次。^①事实上，段祺瑞政府自始即不打算实施“西原借款”还款，以及其他大历史原因，最终“西原借款”的还款不了了之。^②所以，在日本国内，该借款亦同样蒙受“卖国”之指责。中国的一笔外债，同时被借款国和贷款国认为是“卖国”行为，“西原借款”是唯一的一次。

总之，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中国政府外债的高峰期。^③外债对中国的影响至大至深。历史无法假设，如果假设北洋政府没有外债，例如没有“善后借款”，也许北洋政府真的破产，不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二次革命”，似乎都没有了历史线索。如果北洋政府时期的币制改革得到所需要的外国借款，中国的币制改革会提早10年以上，中国的经济轨迹很可能大不相同。

3.5. 华侨汇款。华侨汇款为无形贸易，属于经常项目收入，且可以抵补外贸逆差。因为华侨汇款多换算成中国的通货白银，成为近现代中国白银内流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对华侨汇款的数额没有确切的统计，主要通过华侨人数进行推算，故出入很大。这个数字大体占当时中国国际经济收

① 王芸生：“自另一种意义言，亦可谓彼等之卖国。盖以二亿巨资，一无切实之抵押，二无高息回扣，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之滥债，无怪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王芸生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

② 关于“西原借款”还款，中国方面在1920年只归还了交通银行的第一次借款，金额为日元500万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宣布“对于贿选总统之下的北京政府所借的外债概不负责偿还”，加之日本作为债权方面对于约定的担保品无法处分，“西原借款”最终变成一笔数额巨大的滥账。资料来源：《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2卷第35辑，第19页。

③ 1894年至1913年，即使不包括1900年庚子赔款转作借款，中国向英、德、法、俄、日、美等六国的外债总计10.9亿万关两白银。从1895年至1930年，中国实收外债13.225亿关两白银，外债还本付息11.767亿关两白银。至1930年，尚结欠各国近20亿关两白银。中国政府外债还有一种计算：1894—1901年，167.2百万元，1902—1913年，1070.3百万元；1914—1930年，1205.6百万元。因为汇兑利率等原因，中国政府实际债务支出远比收入要大。

支的20%左右，足以弥补贸易逆差的80%以上。^① 根据中国银行估计的侨汇数字：1902年至1913年平均每年约1.15亿元，1914年以后每年大体2亿~3.15亿元，1928年为2.51亿元，占中国国际收支经常收入的12.32%，弥补当年贸易逆差额的81.76%。抗日战争之前的1936年，侨汇3.20亿元，同年逆差减少，侨汇弥补了96.97%的贸易。^②

可见，华侨汇款在近代中国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至于影响华侨汇款的因素是：(1) 金银比价。侨汇与白银汇率之间呈反向变动趋势，白银汇率走低，华侨汇款增长；白银汇率走高，华侨汇款则趋于下降。白银汇率持续走低，金贵银贱，加之中国国内的白银购买力平价高于国外，汇款可折合更多的白银，汇款给国内合算，因此华侨汇款的积极性很高，华侨汇款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有些年份银价上升，对华侨汇款影响不会太大。1929—1931年，为世界银价最低时期，华侨汇款达到最高峰。^③ 1932年以后，白银汇率走高，华侨汇款下降。(2) 华侨人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复兴繁荣，国外就业机会较多，海外的华侨人数剧增，华侨收入上升，华侨汇款自然增加。进入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蔓延，经济不景气，华侨回国人数与日俱增，南洋各地限制华侨入境，华侨人数减少，侨汇受到影响。但是，因为早期归国华侨带回大量的积蓄，故国际收支表上的华侨汇款没有立即显现减少。(3) 华侨所在国资本管制程度、各国对华侨政策。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各国普遍对资本进出采取宽松的政策，华侨汇回国内的款项不受任何限制，有利于华侨汇

① 贺水金：“论中国近代金银的国际流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中国银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215页统计表。

③ 1930年银价暴跌，美国华侨将10年到40年的存款汇往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行为。在时间上并不局限于1930年，存在于整个金贵银贱时期，只是在银价暴跌时表现得突出。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38页。

款。1931年9月以后，各国先后放弃金本位，各国纷纷实施严厉的资本管制政策，侨汇为之减少。(4)中国经济形势。1932年，中国在继黄金外流后，因为世界银价高涨，以及国际收支逆差增大，推动白银外流。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侨汇款自然减少。华侨汇款减少，削弱了弥补国际贸易逆差的能力，恶化了国际收支平衡。

4. 1919—1925：过渡性国际经济格局和北洋政府时期经济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战前多年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和秩序尚未重建，世界进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过渡期。英国、美国、日本和俄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构成国际因素中最重要的层面，并对1919—1925年时段的北洋政府的命运，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4.1. 英国：主导回归“金本位制度”。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金本位制度遭到事实上的放弃。战争结束，世界主要国家都面临放弃还是回归金本位选择。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加速了回归金本位进程。1925年4月28日，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丘吉尔在议会宣布恢复金本位制，英镑恢复到战前汇率水平，即1英镑兑换4.86美元。英国的回归，得到了包括美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等中央银行的支持。之后的一年多内，有30多个国家回归金本位。

英国宣布回归金本位时，没有足够多的黄金支撑英镑汇率。如果英镑恢复战前汇率，等于英镑汇率至少高估10%。^①在短期内，英镑的高估可

① 凯恩斯在《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一文中写道：“丘吉尔力图维持的金本位英镑虚高，造成了信用紧缩，而这一现象将财富从一切借入者，即工商业者和农民手里转移到借出者手里，最终结果是使纳税人受到压迫，食利者获得利益。”凯恩斯主义已经显现在该文中。

以刺激资本输出和国内增长。但是，其负面后果接踵而来：商品出口竞争力下降，贸易逆差扩大，高利率，信用紧缩，国内投资萎缩。此外，英镑贬值预期提高，形成对英镑投机压力，英国资本外流。尽管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大量金矿，仍然无法阻止其黄金储备缩减。英镑信誉流失和实体经济萧条，互为因果，国际竞争力削弱，失业率高居不下，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滞。伦敦从资本输出中心转变为借款中心。丘吉尔面对这种经济形势，举措失当，压缩公共开支，开征众多临时性苛捐杂税，加速了国民经济恶性循环。^①

因为欧美主要国家回归金本位，增加了对黄金的需求，减少白银需求，金价上升，银价下降。1920年，金银比价是15.31，基本恢复到1870年水平。从1921年之后，白银价格步入下降通道。1921年金银比价是25.5728，1923年是29.5263，1924年是27.7352。到1929年，银价爆跌至38.70，世界大萧条。^②银价跌落，对中国宏观和微观，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产生全面性影响：（1）国外白银购买力低于中国，刺激世界各产白银国向中国出口白银。呈现白银对中国的单向流动态势。白银存量增加，加剧银价降落，而银价降落，又加剧白银流入。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白银入超量达到最高峰。^③（2）以白银为基础的纸币发行量扩张。1910—1936年间，名义供给量和实际货币余额（M/P）呈现不断增加态

① 丘吉尔因其低劣的国家财务治理能力，而在英国得到了“自罗宾汉时代以来最兴高采烈的征税者”的头衔。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51页。

③ 1928年、1929年中国外贸逆差分别为204614千海关两和250092千海关两，而这两年中国的白银入超创历史最高纪录，分别为106396千海关两和105826千海关两。1930年、1931年外贸入超更高达414912千海关两和524013千海关两，但这两年白银仍大量入超，分别达67006千海关两和45445千海关两。1933年开始贸易逆差较前有所缩小，而黄金、白银却大规模地流往海外。

势。(3) 货币供给加大，打破生活必需品供给需求均衡，推动食品、衣服、燃料和住房等城市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显著上涨，以及工人工资的明显上涨。^① (4) 出口产品价格便宜，进口产品价值增加，外贸规模扩张。但是，出口产品的增长速度快于进口产品增长速度，进出口产品价格失衡。农业产品和加工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加剧。(5) “金贵银贱”，有利于欧美国家债权国地位，降低西方国家在中国投资成本。1923年之后，西方主要国家在大战中所受的创伤得以恢复，加大了在中国的 FDI 规模，与中国民族工业展开竞争加剧，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完结，由盛转衰。英国作为在中国的列强领袖地位，并没有因为英国经济实力的衰退而同步丧失。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英国金融机构，依然对中国金融事业维持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至 20 世纪 20 年代末，英国回归金本位的失败所诱发的紧缩全面蔓延，美国开始的经济萧条通过金本位传导，逐渐蔓延到其他主要西方国家，演变为物价和产出陷入困境且持续下跌，形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最终完结了 100 年之久的金本位制度。世界主要国家发行不兑换的纸币，货币流通和信用制度遭到破坏，实施赤字财政，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不得不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上半期，先后完成从“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到建立法币体系的转变。不久，中日战争爆发，中国经济进入另外的岔口，那是后话。

4.2. 美国：改变列强的“中国游戏规则”。在 20 世纪 10 年代，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1) 贸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虽然 1918 年的中美贸易有所下降，但是，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很快超过英

^① 以 1930 年的消费指数为 100，总指数 1913 年为 59.57，1918 年 57.79，1919 年 52.44，1920 年 67.93，1924 年 84.15，1927 年 87.31。可见，上述生活必需品价格显著上升发生在 1924 年。资料来源：王玉茹著：《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8~35 页。

国，位居日本之后，排名第二。美国输华货物的钢铁、各种机器、铁路货车及客车、汽车等在不断增加，而棉货、棉花、纸张在不断减少。而中国运销美国的货物大都为原料及食品，包括油类、生丝、羊毛、蛋粉、生皮、草帽辫等。(2) 借款。1911年，美国发行过唯一的中国政府债券，即湖广铁路债券。1914—1916年，美国借款给袁世凯政府共5次，计4600万美元。美国对中国资本输出从1918年的0.53亿美元上升到1920年的1.46亿美元。^① (3) 投资。大战时期及大战之后，美国在华投资增长率处于领先地位。^② 大战期间，诸如美孚公司、慎昌洋行、英美烟公司等美国跨国企业的中国分公司和业务，都得以明显扩张。在中国成立的美国公司18家。大战之后，美国派遣顾问官来中国，颁布对华通商条例，对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采取奖励政策，金融、冶金、丝织等商团相继前往中国洽谈投资。^③ 美国在中国投资占外国在中国投资的比重，从一战前的3.1%上升到6.1%。^④ 美国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公司。美国在中国公司数量迅速增长，仅1919年至1920年间，美国在中国成立152家公司。^⑤

但是，美国在中国的地位，并非是若干指数所能反映的。因为美国是注重政府参与对中国经济关系的国家。1917年3月，美国财团代表希望美国政府支持美国财团重回银行团。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

① 1914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获取在陕北延长和承德地区开采石油的权利。1916年，美国托拉斯裕中公司获取在湘、桂、晋、甘等七省内造1500英里（2400公里）铁路的权益。此项协议因袁世凯垮台而未能实行。一战之后，太平洋拓业公司借款、运河整理借款、其他无担保借款、中国政府对美国公司借款、美国所购他处发行的债款，总计4100多万美元。雷麦著：《外国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25页。

② 雷麦著：《外国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32页。

③ 《申报》，1922年5月22日。

④ 雷麦著：《外国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52页。

⑤ 同上，第212页。

Woodrow) 将美国最大的几十家银行组成空前庞大的金融集团。银行家们保证服从国务院的政策，与政府合作。^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19年，战胜国召开巴黎和会，试图构建新的国际秩序。美国提出了处理国际事务的“十四点原则”和建立维系新国际秩序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②但是，巴黎和会没有完全采纳“十四点原则”，主宰国际联盟的是英、法两国。作为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和世界最大债权国的美国，做出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和不参加国际联盟的选择。美国的世界地位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世界主要国家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份额显著增长，超越英镑，迅速演变为世界货币。美元大幅升值。^③纽约因其强劲的股票市场和巨型银行体系，为全球资本提供更高的盈利空间，而变成国际融资中心。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国发起和主导了华盛顿会议（Conference of Washington）。参加会议的国家包括美、英、法、意、日、比、荷、

① 美国政府向英、法、日三国政府提出新银行团方案：新银行团享有对华贷款垄断权，各国财团得到各国政府独享的支持；其业务范围应尽量广泛，包括行政性质和实业贷款等。因为这个计划带有否定日本在《兰辛石井协定》中享有的特权的意思，日本反对，它要求保留其在满蒙的特权。英、法也不同意“独享的支持”的说法。最后，四国达成妥协：各国同意关于独享的支持这一条，在银行团因为获得某项合同遇到竞争时，四国公使给银行团以集体支持。不将日本在满蒙拟办的和已开办的铁路事业包括在银行团业务范围。

② “十四点政治原则”主要内容包括：废除秘密外交；公海航行绝对自由；国际贸易机会均等；削减军备；公正解决殖民地纠纷；组织一个普遍性的国际联合机构，为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相互保证（即建立国际联盟）。威尔逊的国际联盟计划建议所有主要工业化国家以开放性的经济竞争与合作来代替战争和殖民地争夺，保持贸易竞争自由，美国就可以通过这种安排而繁荣昌盛。

③ 这些国家包括欧洲的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挪威、芬兰、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士和亚洲的日本。例如，战前的1914年，奥地利、德国、匈牙利、波兰、俄国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在2.3至5.3之间，1924年，汇率已经是数万、数百万，甚至数十亿、数百亿、数千亿以上。

葡和中国北洋政府等九个国家的代表团。^① 会议期间九国签署的《九国公约》，构建成为“凡尔赛体系”补充的“华盛顿体系”，其核心成果是重建中国游戏规则，确认中国主权完整，是实现贸易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前提，为此，各国需要放弃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扩张，采用国际合作，不仅在外国工业资本投入及流向方面建立契约关系，而且要为中国提供必不可少的财政和经济援助，制约了英国在中国的传统利益，打击了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和霸权势头，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② 华盛顿会议集中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关系的国家意志，对中国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自此，美国开始成为主导新远东和太平洋国际秩序的力量。

还值得提及的是美国 1922 年公布，且经过 1925 年修改的《对华贸易法》(China Trade Act)。该法规定：在中国国内经营商业的美国公司，应向联邦政府注册，且在若干情况下，可以免纳联邦税。在一次大战期间和之后美国联邦税渐趋繁重的背景下，这个法律旨在避免在美国的中国资本支付复税，以鼓励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意义极为特殊。当然，从当时中国政府的立场看，虽然《对华贸易法》有利于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但是存在“治外法权”问题。从 1922 年至 1930 年，核准注册公司总计 100 家，注册资本 2973 万美元。^③ 1930 年，美国在中国直接投资规模约 1.3 亿美元。^④ 如果按照投资领域，分别是进出口业、公用事业、银行与金融业、

① 中国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派出了 130 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以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为正式代表，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收回中国的主权。因不涉及军备问题，中国代表团只参加太平洋远东委员会的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撤废领事裁判权和收回山东主权。

② 1922 年 2 月 4 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胶州德国旧租界地交还中国；日本军队撤出山东；中国赎回胶济铁路。

③ 雷麦著：《外国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62 年，第 242 页。

④ 同上，第 231 页。

制造业、运输业和房地产业。其中，美国银行业扩张显著。1914年至1920年，美国经营海外业务的银行从6家增至12家。大战前，只有花旗银行在中国设行，大战后不久，美丰银行、运通银行、大通银行陆续来中国设行。美国企业的重要特征是：采取金融投资形式，拥有资本规模和技术优势，利润丰厚；投资区域以上海为重心，以江南地区为腹地，填补欧洲各国列强工业资本退缩而留下的空白。

4.3. 日本：中国的最大“债权国”和“投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战争景气”：贸易出口激增，造船工业，包括矿业在内的基础工业，以及各个产业部门都得到扩张和繁荣，黄金储备增长，同时实现了高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以“新财阀”为特征的垄断资本全面左右日本的经济和政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向海外资本扩张最有力的时期，中国则成为日本海外最重要的贸易地区、投资国和债务国。(1) 贸易。大战之前，英国商品输入占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位，日本次之，美国第三。大战爆发后，日本拓展对华贸易规模，至一战中后期，日本对中国贸易占中国国际贸易比重第一，美国次之，英国第三。(2) 借款。1894年至1927年，中国的债权国，英国第一，日本第二。在大战期间和战后繁荣时期，日本对中国实行“无担保借款”数额巨大，数倍于“普通有担保借款”。与其他列强不同，大多日本债含有政治因素和条件。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债权国。(3) 投资。一战期间，日本对华贷款总额达到8100多万日元，其中以交通、铁路、矿山、工厂等部门贷款最多。^① 一战之后，日本以企业直接投资为主导，全面扩张在华投资，在华公司数量迅

^① 还有一种计算：从1916年初到1917年8月，日本向中国输出6400万日元价值的黄金、贷款、投资等。这个数额甚至大于中国贸易逆差。雷麦：《外国在华投资》，第103~104页。

速增长，以棉纺织业、煤铁资源和公用事业方面为重点产业，且参与煤铁资源开发，以上海、青岛、华北和东北为重点地区。在东北投资中又集中在南满铁道公司（满铁）。（4）金融。除原有正金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正隆银行继续在中国开办业务之外，住友银行、三井银行和三菱银行也进入中国，新设中华汇业银行。此外，还有为数可观的规模较小、总行在中国的日资银行。（5）与日中贸易和投资相适应，航运吨位大增。日本进出中国各口岸的外国轮船总吨位比重持续上升。（6）旅华日本侨民的绝对数和占外国侨民的比重，显著增长。

1920—1921年，日本的“战争景气”结束，工业总产值下降、企业倒闭、股价暴跌、银行挤兑、经济萧条。1923年，日本发生里氏7.9级的“关东大地震”。工厂、机关和民房倒塌或者烧毁，金融机构及股票和商品交易陷于瘫痪，本来已经萧条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日本的昭和时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昭和金融危机”从1930年到1932年持续达三年之久，涉及层面广泛，影响深远。期间，遭受自美国开始的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波及，日本经济的金融、工业、贸易、农业等部门陷入连环式危机，沉重打击了它的进出口贸易，其冲击性和破坏力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如果要复兴经济，必须解决工业原料和商品市场。这样，在这场“昭和金融危机”期间，日本确立军国主义立国，先是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然后1937年全面爆发中日战争，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持续到今天。

4.4. 苏俄：双重“对华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对中国政府借款和直接投资规模相当可观。最大项目是中东铁路，达到3.69亿卢

布，相当于1.89亿美元。在当时，是世界级大项目。^①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获得政权。从1917年至1924年之间，尽管苏维埃政府先后两次发表所谓“对华宣言”，但是，并没有与中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②在中国各地的帝俄时期领事官没有放弃领事裁判权，仍在执行公务，管理俄商和俄侨。在这个特殊时期，中国与苏俄维持在俄境白区的贸易。原来俄国的其他企业，有些收缩或出卖，但一些大企业还在扩大经营。而逃亡来华的白俄，凭借带来至少数百万金卢布的财产和金银珠宝，开设了不少工厂和商号，造成哈尔滨的繁荣。虽然苏维埃政府将俄国道胜银行（Russo-Asiatic Bank）收归国有。但是，道胜银行的国外代理银行不承认国有化，在中国照旧营业和执行原来合同，继续对中东铁路和中国政府贷款，并在东北发行钞券。直到1920年以前，中东铁路仍是由帝俄将军霍尔瓦特（Horvath）任督办，拥有帝俄的武装，继续改建和扩建。旅俄华工继续向国内汇款。一直到1930年，俄国私人在中国的投资在扣除转入中国人手中的部分后，依然有1.2亿卢布之多。总之，沙俄时代在中国的财产甚大。因为布尔什维克革命而携带资财在中国经营企业的俄侨，多数没有选择作为苏籍公民，他们的投资自然不被视为苏俄

① 总计5.25亿卢布，相当于2.69亿美元，其中企业投资4.61亿卢布，相当于2.37亿美元，政府借款6400万卢布，相当于3200多万美元。雷麦：《外国在华投资》，第439页。

② 1919年7月，苏俄政府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史称“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日本、协约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帝俄政府在中国东北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1920年9月，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除了重申第一次对华宣言中主要内容外，还建议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和缔结友好条约。当时仅有全俄四分之一版图的苏维埃政府把它不曾拥有的“放弃”和“归还”中国，完全是一种策略和手段。而且当时宣言涉及领土问题的原文，没有说“归还”，只说是“放弃”。

投资。事实上，中国与苏俄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在华的一般俄人已失掉了特权的保护。这些财产的很大部分演变为在中国的永久性投资，不可能再有将利润或红利汇至苏俄的情况。所以，中国成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因为随之而来的革命和内战，沙俄时期在华投资和不得不留在中国的俄侨资产的受益者。

至1920年，俄国布尔什维克赢得内战，基于国家利益，实施双重对华政策。一方面，推动和维系与中国合法政府的外交关系，于1924年5月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宣布放弃沙俄时代在中国划定的租界、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和其他债权，取消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① 根据中苏协定，中国政府负责清理道胜银行在各埠财产。该行所有的中国政府债权，一概取消。但是，中东铁路所有权问题悬而未决。1924年之后，中东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但是，没有确定该路的产权的归属。中东铁路盈利，中国和苏俄两国平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苏俄政府不仅承认伪满洲国，而且将中东铁路北段及附属财产以1.4亿日元的代价卖给了伪满洲国政府。^② 苏俄作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停止资本输出，在1925年和1930年的统计中，苏俄投资不复存在。^③

另一方面，苏俄政府与北洋政府谈判和建立正式关系的同时，向中国全面输出革命：（1）1921年，在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指导和物质保障下，创建中国共产党。此后，“第三国际”长期资助和指导中国共产

① 事实上，在《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中国的一部分，两国疆界将重新划定，以及中东铁路所有权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落实。相反，苏俄不仅没有归还中国领土，而且支持外蒙古于1924年11月独立。关于中东铁路的归属权，只是说一定时间之后（80年或60年），可由中国政府赎回。“九一八”事变后，中东铁路改为“北满铁路”，但俄文名称不变。

② 据百度百科“中东铁路”词条。

③ 1931年，苏俄政府向中国提出：俄国人在中国的一切投资应该视为苏联在中国投资，为中国政府所拒绝。

党。^①(2) 1923年,孙中山和列宁特使越飞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1924年,苏俄帮助组建黄埔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期望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获得国家政权,并企图通过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3) 全方位支持1925年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4) 策划、援助和参与了1926年至1928年间国民党主导的北伐战争。在这个时期,苏俄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支持,是以国家财政为后盾,通过现金和实物的方式实现的。^②

因为苏俄对中国输出革命,导致国民党建立与北京政府对峙的广州国

-
- ① 自1920年秋,《新青年》杂志接受共产国际资助,转变为共产主义刊物。苏俄对中国共产党的资助方式包括派遣信使携带珠宝和现金,售卖钻石,直接汇款等。依据近年来在日本发现的警视厅施存统口供,上海共产党一度每月宣传费用约1000元,干部等亦每人每月30元报酬。包惠僧亦回忆,武汉共产党组织成立时,共产国际每月寄200元活动经费(资料来源:江文君:“中共建党经费来源探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12月28日)。据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共产国际几乎是中央机关开支的唯一来源。另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1922年12月共产国际通过的“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包括:《向导》周报、《工人周刊》、印刷传单和宣传员、汉口、湖南、上海、北京、香港、广州、山东支部的费用,两名中央委员和两名固定宣传演讲员的食宿旅差费,以及意外开支,总计每月支出1000金卢布,全年支出12000金卢布。1924年实际得到活动经费约36000金卢布(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 ② 苏俄对中国输出革命的现金部分,最初包括:270万卢布用于建设黄埔军校;1000万卢布用于创建国民党中央银行;从1924年11月起,每月为国民党提供10万金卢布的党务经费。国民党北伐战争的胜利,主要得益于苏俄的直接军事援助。北伐战争开始之前,广州国民政府累计接受苏联价值约300万金卢布的军火。据现存的《莫斯科关于拨给加伦军事费用协助南北各革命军军械事致苏什赤夫斯基函》的载录:1926年前后,苏联用记账方式分四批援助南方国民革命军的物资有各类枪支、子弹、机枪、大炮、炮弹以及药箱及马具。苏俄的军事顾问和教官作用重大。在苏俄顾问中,首推总顾问布柳赫尔,即加伦将军及其团队。此外,苏俄支持的冯玉祥国民军,成为国民革命军最后完成北伐战争目标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资料来源:维·马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页;卡尔图诺瓦著:《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22~224页。)

民政府，进而发动实为内战的“北伐”，还埋下国共两党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两次内战、共产党获得中国政权的种子。

5. 结语

在19世纪，中国和主要欧美国家都是自由放任经济。所不同的是，中国是农业社会，家庭是经济主体。而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方兴未艾，公司成为经济主体，货币金融市场急剧成熟。进入20世纪，中国与西方工业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进步方面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全方位扩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清朝倾覆，中华民国建立。

中华民国的北洋政府精英主流来自前清精英，基本承袭清朝改革路线，倾向保守主义，拒绝激进主义，有可能走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化”之路。但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彻底纳入急剧演变的世界体系之中。主导中国前途的是来自中国外部的各种外生变量，而不再是自身的内生要素。在经济方面：对世界贸易依存度增长，穷乡僻壤都与世界经济有着直接和间接关系，外国资本直接影响经济结构的演变，财政制度改造，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发育，以及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在政治制度方面：代议制、多党制、新闻自由、现代法律制度，全面移植到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针对日本的崛起和威胁，在继续平衡英国、北美、苏俄和日本关系同时，以威尔逊主义和华盛顿体系为前提，中美关系趋于紧密。在文化方面：从白话文运动，杜威主义到共产主义，激进主义得以压倒保守主义。期间的1919年是历史拐点，这一年出现了20世纪以来和大战之后的全面经济繁荣，却因为“五四运动”，加剧了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精英的分裂，以及政治体系和传统社会全面解构的进程。

在上述历史大转变中，最主要的历史逻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苏

俄布尔什维克获得政权，强势地输出革命，改变了中国政治生态，使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替代北洋政府，国家资本主义兴起，自由经济传统势衰，再经过中日战争，共产党革命，中国的演变彻底脱离了原本的历史轨迹。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国华工： 战争的另类受害者

Olga V. Alexeeva*

中、俄之间有着漫长又复杂的移民历史。两国之间的地理邻近、经济互补及密切政治关系等因素影响了这一历史过程。在 20 世纪之初，中国人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尤其在其远东地区，受雇于当地新兴的各行各业。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罗斯被迫招聘和倚重在俄华工，以弥补大量俄罗斯农民和工人受征召入伍当兵所造成的劳工短缺。因此，华人社区出现在俄罗斯主要城市，甚至远及帝国的欧洲部分。这些被雇用的在俄华工从事兴建铁路、建造军事堡垒、开发原材料矿场、生产制造武器及其他军用品等工作。当俄罗斯爆发内战时，已经在俄罗斯境内数以千计的华工则困顿在俄国各地城镇，处于既无工作也没钱，更没有回国希望的状态。

迄今为止，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尚有少数几个领域没有得到学术界或传记写作的关注。中国人对于上个世纪这场大战的参与，如同中国人对协约国最终胜利所做的贡献，仍被忽视，或是只被某些研究一战的历史学者和分析家简要提及而已。多年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流研究一般专注在欧洲的主要军事力量，忽视了殖民属地及其他非欧洲人民在大

* 任教于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历史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战中的角色。过去几十年，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社会及军事历史的写作与了解，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它不再只局限在西方战场的壕沟，而是逐渐赋予这场全球冲突越来越广泛的方面。尽管如此，不同族裔和少数族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角色和经验，仍然是相关历史冲突研究中相当不足的领域。^① 如果我们认为这场冲突真的是世界大战，那就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参加了这场战争，尽管有些国家的参战与主要交战国家相比是多么地微小。所以，研究被派到欧洲前线去的殖民地军队及劳动力的贡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14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几乎所有的主要西方国家都在中国领土上有着自己的一块势力范围，并在其中享尽各种特权，中国政府对于他们所控制的区域没有行政权，或者只有非常有限的控制。在这种格局下，中国大战初期宣布保持中立，要求卷入大战中的列强不要在中国领土，尤其是在他们的中国租界之内，从事军事行动。然而，这项要求并未受到尊重。西方列强忙着在欧洲战场作战之际，日本政府迅速采取军事行动，填补了亚洲出现的权力真空。日本在加入协约国之后，以和中央列强，即德国交战为借口，迅速占领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所控制的地区。此外，德国在满洲及内蒙古地区的企业，悉数遭到俄罗斯当局查封，德国公民被怀疑会成为间谍，被迫离开。因此，大战爆发后才三个月，德国在东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即被消灭。德国自1898年以来在中国所取得的殖民利益，包括租界、银行、企业和海军势力，几乎全被日本夺走。

中国被迫承认日本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东北及华东有领土及经济方面的特权。1917年8月，北京终于宣布对德国宣战，主要目的是想降低日

^① P. Panayi: *Minorities during the Great War: Global and German Perspectives*, Keynote lecture at the Conference "Minorities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14-15 April, 2014", University of Chester, UK.

本在中国愈来愈大的经济压力、政治影响和驻军后果。中国渴望能在大战结束时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中有一席之地，以平等地位加入世界社区，将中国利益放入世界的舞台，以便讨论其各项主权和领土问题。要取得这一席地位，最佳途径是加入协约国，并对他们在欧洲的战事有所贡献。很不幸的是，中国这个希望没有得到实现。在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中，协约国决定不得罪日本，正式承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取得的殖民权利及特权。

然而，在许多教科书和学术研究中，只有对中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简短记载，却不包括中国对大战所做的重要贡献。事实上，几乎从大战冲突开始，中国就派出了数以千计的劳工到俄罗斯，稍后又派出约十四万劳工到法国，在东线和西线战场后方替协约国效力。^① 这些劳工被派到与欧洲战事相关的各种领域工作：在前线附近建筑军事堡垒、重建道路与铁路、生产炸药和炮弹、从战场清理尸身和伤患等等。许多华工在战场的炮火中丧生或负伤。但是，尽管华工付出辛苦工作和牺牲，他们所参与的欧洲战事，尤其是在东线的俄罗斯战场的贡献，今天大多被历史遗忘。

自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档案开放，唤醒了学界对有关20世纪初在俄华工的历史的兴趣。^② 但是，学术界这些新研究大部分聚焦在华工参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稍后的俄罗斯内战（1917年至1922年）。与

① Xu Guoqi (徐国琦):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② A. G. Larin: *Kitajcyv Rossiivchera i segodnja: istoricheskijocherk* (Chinese in Russia yesterday and today: a historical overview), Moscow, Muravej 2003; Petrov, A. I.: *Kitajskaja istoriografija istorii kitajcev v carskoj Rossii*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ese in the Tsarist Russia), *Rossija i ATR* (Russia and the Pacific region of Asia), 2006, 1, pp. 141-155. 李明欢:《欧洲华侨史》，中国华侨出版社，北京，2002年；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1988年；P. Nyiri: *Chinese i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A middleman minority in a transnational era*, London, Routledge, 2007；邓兰华、张红：“俄罗斯华侨华人与俄联邦的移民政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25~37页。

对中、俄历史发展中那些有着重大影响的悲剧性事件的分析和研究相比较，第一次世界大战通常仅仅被视为一个插曲。因为，在1917年后的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贴上“帝国主义战争”的标签，研究它只是为了揭示沙皇政府的贪腐以及对劳工阶级的压榨。即使1991年以后，这种对于一战的诠释方式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俄罗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相关历史仍然只吸引到学界和公众非常有限的注意。

在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工在俄罗斯的故事，完全被参加苏联红军的中国人的故事所掩盖，后者拥抱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理念，并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所贡献。近年来，伴随大战届满一百年，启发一些研究者重新关注这个主题。^①尽管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雇用华工，以及华工在俄国战事中的角色，仍然是中国、俄罗斯，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研究中被忽视的篇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雇用华工是新战略吗

19世纪末，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亟需大量劳动力，俄国已经开始招募华工。那时，很少有俄罗斯人愿意从俄罗斯帝国的欧洲部分迁徙到远东蛮荒地，其国内移民工无法满足此一需求。此外，把俄罗斯屯垦民众运送到东方领土是非常昂贵、也耗费时间的工作。在跨越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兴建前，如果乘坐马车从莫斯科到海参崴（Vladivostok），需要一

① M. S. Kamenskih: O prichinah volnenij kitajskih rabochih na Urale v period pervoj mirovoj vojny (On the reasons of the rebellions of the Chinese workers in Ural during WWI), *Vestnik Permskogo Universiteta* (Herald of Perm University), 1 (8) 2009, pp. 109–113; V. G. Dacishen: Kitajsky trud na Urale v gody Pervoj mirovoj vojni (Chinese labour in Ural region during WWI), *Ural'skoevostokovedenie* (Oriental Studies in Ural region), 2007, 2, 49–58.

年时间。^① 在这种情况下，雇用住在靠近俄罗斯边境、习惯本地严峻气候和极端的工作及生活环境的华工，乃是解决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劳力不足的办法。

这种情势得到下列事实的支持：与俄国直接毗邻的中国满洲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1904年满洲人口将近一千七百万人。^② 1878年，中国政府为抗衡俄罗斯的东进，将大清王朝（1644—1911）的龙兴之地，原本禁止汉人屯垦的东北地区开放，准许大量移民。因此，关内许多汉人迁徙到东北，满洲人口大增。^③ 到了19世纪末，满洲已经成为重要的劳动力输出地，许多中国人可以从这里出发寻找就业机会。

恰恰在这个时期，俄国启动两大项目：新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和海参崴港。这两个项目吸引和吸纳了大量华工。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1891至1916年间，受雇于这两大项目的华人高达二十万人。^④ 与此同时，俄国的民间企业也遵循国家模式，开始积极招募华工。1910年，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有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五名华工受雇于各种新兴产业，占总劳动力的41%。^⑤ 华工大多受雇于金矿、营建业，以及工业、锯木厂、码头和铁路，也不乏担任农业季节工。就薪资、食宿供应而言，俄国雇主最终发现从满洲雇用

① C. Mossé: *Le Transsibérien: un train dans l'histoire*, Paris, Plon, 2001.

② Ping-ti Ho (何炳棣):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 - 1953*,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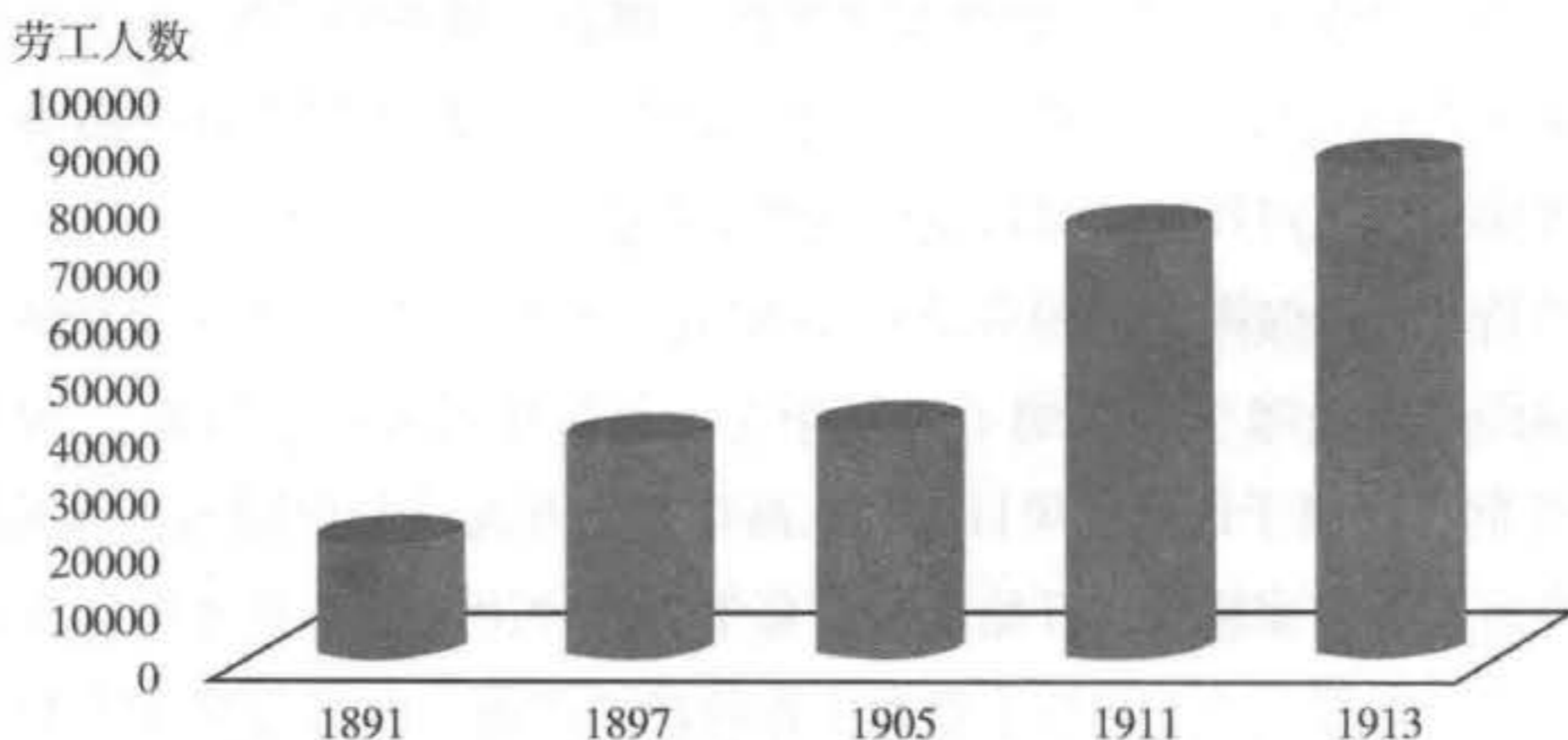
③ 1889年，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直接接壤的中国东北黑龙江省，人口四十万八千人；1895年，由于关内汉人大量移民，人口上升到一百五十万人，见 T. N. Sorokina: *Hozjastvennaja dejatel'nost kitajskikh poddанных na Dal' nem Vostoke Rossii i politika administracii Priamurskogo kraja (konec XIX-nachalo XX vekov)*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Chinese Nationals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the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gion of Priamurye (from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Omsk, State University of Omsk Press, 1999.

④ 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北京，2002年。

⑤ Larin, A. G., *Kitajcyv Rossiivchera i segodnja: istoricheskijocherk* (Chinese in Russia yesterday and today: a historical overview), Moscow, Muravej 2003.

华工比从帝国欧洲地区雇用俄罗斯人既便宜又方便，可以省下不少钱。^①很快，美国、德国、俄罗斯运输公司和中国的职业介绍所就对此一重大的劳力需求有所反应。从中国东北募来的华工，大多由沿着阿姆河营运的轮船运到俄罗斯远东地区，也有一些华工则由定期往来于海参崴和山东省一些港口的船只运送。^②

图1 中国劳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数量 (1891—1913)^③



- ① 例如，在19世纪初，俄罗斯远东地区阿姆河地方的一名俄罗斯工人，平均月薪是68.45卢布，而一名华工是50.17卢布，雇主光在薪资差异上就省了27%。但是真正节省的是工人的每月食宿费用：雇主花在俄罗斯工人身上平均为21.17卢布，而在华工身上只要5.39卢布。见 F. V. Soloviev: *Kitajskoe othodnichestvo na Dal' nem Vostoke Rossii v jepohu kapitalizma, 1861-1917 gody* (Chinese seasonal migration to the Russian Far East during the capitalist period, 1861-1917), Moscow, Nauka, 1989.
- ② T. N. Sorokina: *Hozjastvennaja dejatel'nost' kitajskikh poddannih na Dal' nem Vostoke Rossii i politika administracii Priamurskogo kraja (konec XIX-nachalo XX vekov)*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Chinese Nationals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the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gion of Priamurye (from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Omsk, State University of Omsk Press, 1999; A. G. Larin: *Kitajcyv Rossiivchera isegodnja: istoricheskijocherk* (Chinese in Russia yesterday and today: a historical overview), Moscow, Muravej 2003.
- ③ A. G. Larin: *Kitajcyv Rossiivchera i segodnja: istoricheskijocherk* (Chinese in Russia yesterday and today: a historical overview), Moscow, Muravej 2003.

虽然俄国当局没有对居住及工作在俄国领土的华人进行任何有系统的人口普查，但是，从可以得到的俄国远东地区的官方资料可以发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人移往俄罗斯的程度。俄罗斯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897年，当时在俄华人有五万七千人，大部分是商人和契约工人，其中四万一千人住在俄国远东地区。从19世纪末，中国移民数量迅速增长，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已经有将近十万名华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不过，事实上华工人数估计有二十五万人左右，那是因为许多华工从来不依俄罗斯移民法规定去向俄罗斯当局办登记。^① 来到俄罗斯的华人极大多数是男性，相当年轻，主要来自邻近的满洲城乡，也有些人则来自山东和直隶省。

表1 俄罗斯远东乌苏里江区域中国人在冬季和夏季的人数（1897—1899）^②

	该地区中国人数量		冬季停留在俄国的中国人数量%
	冬季	夏季	
1897	2826	6893	42.4
1898	2828	8224	34.4
1899	3657	13380	27.3

表1表明：因为俄国雇用华工主要从5月到12月，华工移民前往俄罗斯主要集中在夏季。但是，依然大约有30%的华工会在冬季留在俄罗斯。还有一些中国商人，为乌拉山以东地区快速发展的经济机会所吸引，也来到俄国从事贸易或创办小型企业。因此，在19世纪末，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的大城镇开始出现华人社区。这些社区组织一些移民协会，在华

① A. G. Larin: *Kitajcyv Rossiivchera i segodnja: istoricheskijocherk* (Chinese in Russia yesterday and today: a historical overview), Moscow, Muravej 2003.

② F. V. Soloviev: *Kitajskoe othodnichestvo na Dal' nem Vostoke Rossii v jepohu kapitalizma, 1861-1917 gody* (Chinese seasonal migration to the Russian Far East during the capitalist period, 1861-1917), Moscow, Nauka, 1989.

人与地方俄罗斯人当局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其重要功能有：应地方政府要求散发官方资讯，对生病或受伤的华工派送各种援助，也在华工与俄罗斯雇主或地方当局发生冲突时提供翻译服务，声援保护同胞的利益。

由于华人数量日增，这些移民协会甚至会非法地承担起文官政府的功能，担负起行政权力，以及华人社区的法院角色，解决华人社区成员之间所有的商业和民事争端，制定法规以规范华人在俄国的商务活动。俄国地方官员经常把涉及华人的个案委托给华人移民协会去调处，然后也不加查证就把它们的决定记载在俄罗斯官方文件上，因为没有人会翻译它们，或是查证涉及决定的程序是否妥当，或是向移民去查问。^① 逐渐地，雇用华工的俄国公司开始借重地方的华人协会到中国招募工人，并雇用协会在俄国居住若干年的成员担任经理，司职翻译，负责监督新到的华工等。^②

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俄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招募、运送华工到俄国的系统，且运作了许多年。如果说战前，华工只是普遍出现在远东地区及西伯利亚，那么到了1914年，俄国开始在其欧洲地区广泛地使用华工。此时，西伯利亚大铁路及从俄国到中国满洲的铁路支线，大部分兴建完成，从中国将工人运送到俄国的欧洲地区变得容易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决定在后方大量雇用华工似乎不足为奇。这种情况更像在俄国远东地区已经存在多年、且运作成功的既有政策和做法的复制，而不是采行全新的策略。

可是，这样的决定得来不易。俄国政府花费不少时间辩论，究竟是否

① E. I. Nesterova: *Upravlenie kitajskim naseleniem v Priamurskom general'nom gubernatorstve, 1884-1897*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the Priamur region region, 1884-1897), *Vestnik DVO RAN*-Herald of the Far Eastern section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2000, 2, pp. 40-50.

② A. A. Alepko: *Jekonomicheskaja dejatel'nost' v dal'nevostochnom regione Rossii v XIX nachale XX veka* (The economic activ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 region of the Russian Far East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 (Problems of the Russian Far East), 2002, 4, pp. 135-144.

应该允许在帝国的欧洲地区使用华工，尤其是在靠近前线的地区。^① 中国移工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人数大增，已经引起俄罗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焦虑和关切。当时仇外意识极强的“黄祸”这个词相当流行，俄罗斯人民和当局对华人保持负面态度，华人时常遭到歧视和不法攻击。

特别是，华人在人口稀疏的俄罗斯远东地区日益增多，已经被许多俄罗斯官员视为对俄罗斯主权的一大威胁。华人被认为逃避俄罗斯当局的任何控制，而且深受中国政府的影响，从政治、军事和经济角度来看都相当危险。因此，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沿岸（Priamurye）地方总督宫达提（N. L. Gondatti, 1860—1946）上书俄罗斯部长会议表示：

“中国移民拿走国家以及（俄罗斯）人民的资源，除了伤害、什么都没带给我们……从政治角度看这个问题，中国人依然忠于本国文化，从未与祖国失去联系；到了异国，他们仍然是祖国的忠臣、不觉得有必要与本地人（俄罗斯人）融合，因此，从这个观点看，他们（对我们）抱持敌意。”^②

对于是否招募华工到帝国的欧洲地区承担与战争有关的工作，大多的远东地区及西伯利亚各省高级官员持反对立场。他们认为，华工在俄国境内太靠近前线会构成危险，因为华工可能替德国人当间谍，可能破坏俄国的战争工业。由于战争旷日持久，俄国政府内部的“反华派”逐渐落居下风，而以华工补俄罗斯工人之不足的主张受到俄国工商部及农业部的强力支持，地方工商业界要求政府支持他们在俄国的欧洲地区雇用华工。因为这些矿场和工厂的所有者大多是俄罗斯贵族，有些人甚至与沙皇家族关系密切，因此他们的要求和陈情不容忽视。事实上，他们中间的有些人早已

① V. G. Dacishen: *Kitajsky trud na Urale v gody Pervoj mirovoj vojni* (Chinese labour in Ural region during WWI), *Ural'skoevostokovedenie* (Oriental Studies in Ural region), 2007, 2, 49–58.

② *Gosudarstvennyj arhiv Rossijskoj federacii* (GARF) – State archive of Russian Federation: (a) F. 102, Op. 71, D. 56, L. 2.

不顾禁令，在他们位于俄国的欧洲地区的工厂和矿场雇用了华工。^①

同时，俄国同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因为男丁大量动员入伍，而战场伤亡也激增的缘故，国民经济很快就面临人力严重短缺的窘迫。1915年，一战前在工业界任职的俄罗斯人有六成在东线战场作战，某些行业人力短缺超过八成。^②起先，俄罗斯政府决定雇用女子及童工，甚至动用战俘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可是，这些措施很快就证明不足够。^③当俄国参战一踏进第二年，政府就了解到它在人力资源上很快就会破产，因为俄国已经没有足够的男丁补充死伤士兵，更不能满足符合迫切需要的军事设施和武器生产之人力需求。显然，雇用华工是当时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而这个解决办法既廉价又易于执行，因为所有的招募技术和后勤运筹早已建立。因此，1915年4月至7月期间，俄国政府最终做出一系列决定，解除在俄罗斯雇用华工的一切限制，方便既有的雇用程序，准许招募华工到帝国的欧洲地区工厂、矿场和工业基地工作。^④

① *Gosudarstvennyj arhiv Rossijskoj federacii (GARF)* -State archive of Russian Federation; (b) F. 102, Op. 71, D. 159, L. 21-32.

② M. S. Kamenskih: O prichinah volnenij kitajskih rabochih na Urale v period pervoj mirovoj vojny (On the reasons of the rebellions of the Chinese workers in Ural during WWI), *Vestnik Permskogo Universiteta (Herald of Perm University)*, 2009, 1 (8), pp. 109-113.

③ 例如，1915年夏天，西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 (Tobolsk) 地区政府估计，本地农业缺工五万八千人，急迫需人协助收成。农业部仅能送去两万人，他们全是奥匈帝国战俘。见 I. A. Eremin: (2007), *Voennoplennye pervoj mirovoj vojny v zapadnoj Sibiri (Prisoner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the Western Siberia)*, *Izvestija tomskogo politehnicheskogo universiteta (Herald of Tomsk polytechnic university)*, 1, pp. 259-263.

④ *Gosudarstvennyj arhiv Rossijskoj federacii (GARF)* -State archive of Russian Federation; (c) F. 102, Op. 71, D. 159, L. 3, 34.

战时俄罗斯华工：人数与人口特色

究竟俄国在战争期间雇用了多少中国人在俄国本土工作？这个问题不易作答，因为俄国政府和中国当局都没有有系统地登记这些契约工人的来来去去。仅仅根据俄罗斯官方记录，在1915年1月至1917年4月之间，159972名华工经由西伯利亚铁路运送到俄罗斯。^①然而，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坐船运送到俄罗斯的华工，或是在1915年1月以前及1917年4月以后来到俄罗斯的华工。同时，在1915年1月受雇的华工当中，有些只在俄罗斯工作一期（6或9个月），然后就回中国；也有人则续约，再工作第二期甚至第三期。总之，战时在俄华工人数起伏不定。根据中国方面的有关资料，在俄国的华工人数较少。中国驻俄大使馆估计：1916年的华工人数在十万人左右；1917年的中国外交部的文件也出现相同的数字。^②尽管既有的估计和统计数字有出入，这些数字还是让我们对于华工在战时俄罗斯的规模有了大体印象。

俄罗斯所招募的华工，大多数来自中国东北地区，尤其是满洲。这个地区靠近俄罗斯边境，并且已经建立了用来运送劳工的西伯利亚铁路的交通枢纽。另外，俄罗斯人觉得这些地区的男丁比较强壮，也习惯居住、生活在类似俄罗斯的天气和自然环境。有个俄罗斯招募人说：华工“脑子清醒、聪明、工作勤勉，每星期可以工作七天……他们的运输费用很容易借由低工资弥补过来。他们忍耐操劳、苦干实干”。^③

① A. G. Larin; *Kitajskie migranty v Rossii. Istorija i sovremennost'* (Chinese migrants in Russia.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Moscow, Vostochnaja kniga 2009.

② A. G. Larin; *Kitajcyv Rossiivchera i segodnja: istoricheskijocherk* (Chinese in Russia yesterday and today: a historical overview), Moscow, Muravej 2003.

③ V. G. Dacishen; *Kitajsky trud na Urale v gody Pervoj mirovoj vojni* (Chinese labour in Ural region during WWI), *Ural'skoevostokovedenie* (Oriental Studies in Ural region), 2007, 2, 49-58.

中国山东省也是俄国招募华工的一个主要来源。早在19世纪末，山东北部烟台的芝罘就是华人前往俄国寻找工作的主要出发港口。^①华工从芝罘搭汽船前往新盖好的俄罗斯海参崴港，再从海参崴坐马车前往远东地区内的目的地。在20世纪初，尽管新建的远东铁路有效地连接中、俄两国，但是，这条路线的重要地位逐渐降低。因为俄罗斯人把其招募活动延伸到中国其他省份，例如，被雇来在俄罗斯帝国的中亚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rechye）行政区（这块地区今天分属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兴建铁路的华工，即来自中国西北的新疆地区。^②

如果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招募的华工加以描绘，会发现有如下基本特征：男性，年龄在十八岁至四十五岁之间，大部分来自乡下，不识字，只具备基本劳动力条件。^③在华工中，有些是技术工人，如木匠、铁匠、水泥工；也有些曾有矿场或营建工人经验。华工的大多数决定前往俄罗斯，是为了躲避家乡的经济压力，希望挣够了钱回乡改善生计。

招募华工的人员关注的是募足人数，不太注意挑选过程，华工要符合条件并不难。只要应征者愿意到俄国打工，未必做体格检查或背景调查。因此，许多送到工厂和军火工厂工作的华工不具应有的技能或资格，甚至

① T. N. Sorokina: *Hozjastvennaja dejatel'nost' kitajskich poddannih na Dal'nejem Vostoke Rossii i politika administracii Priamurskogo kraja* (konec XIX-nachalo XX vekov)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Chinese Nationals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the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gion of Priamurye (from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Omsk, State University of Omsk Press, 1999.

② A. G. Larin: *Kitajskiemigranty v Rossii. Istorijaisovremennost'* (*Chinese migrants in Russia.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Moscow, Vostochnajkniga, 2009.

③ V. G. Dacishen: *Kitajsky trud na Urale v gody Pervoj mirovoj vojny* (*Chinese labour in Ural region during WWI*), *Ural'skoevostokovedenie* (*Oriental Studies in Ural region*), 2007, 2, 49–58. M. S. Kamenskih: *O prichinah volnenij kitajskih rabochih na Urale v period pervoj mirovoj vojny* (*On the reasons of the rebellions of the Chinese workers in Ural during WWI*), *Vestnik Permskogo Universiteta* (*Herald of Perm University*), 1 (8) 2009, pp. 109–113.

有些人在离开中国时就患有疾病，无法上工，必须遣送回国。最悲惨的是，因为个别华工得了传染病，如登革热或霍乱，会牵连一同来的所有华工接受检疫隔离以免传染。^①

在中国招募：责任和规避

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招募华工，大体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早期，招募过程相当混乱，大多由各式各样的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管理。工人报名、筹划运送等几乎全部由私人公司、贸易代理商、地方商人，甚至投机者处理。例如，替乌拉山地区工厂招募华工的一个主要业者，竟是一个叫卡普兰（N. L. Kaplan）的记者，他原本为在满洲发行的俄文报纸《哈尔滨前锋报》（*Harbinskij vestnik*）撰稿，他在对俄罗斯战时工业状况进行研究时，查核了一些统计资料，发现俄罗斯劳工短缺极为严重，于是产生以华工替代被征召入伍的俄罗斯工人的主意。由于他需要资本，一名成功的俄罗斯生意人狄利金（D. E. Drizin）给以支持。狄利金来自伊尔库茨克（Irkutsk），他经营的磨坊、仓库和分公司遍布满洲、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各地。后来，卡普兰的点子和在中国的人脉关系，加上狄利金的资金和后勤支援，他们成立人力中介公司获得极大成功，招募数以千计的华工，并将他们运送和安置到东西伯利亚的公、民营厂矿工作。^②在这个阶段，招募工作不受任何官方计划或文件的规范管理，既未经中国当局的控制，也不受俄罗斯政府的监督，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弊端和诈欺。

华工要到俄国工作，需要中国当局核发护照，也需要俄罗斯驻华使领

① V. G. Dacishen: *Kitajskij trud na Urale v gody Pervoj mirovoj vojni* (Chinese labour in Ural region during WWI), *Ural'skoevostokovedenie* (Oriental Studies in Ural region), 2007, 2, 49-58.

② 同上。

馆发给入境许可。人力中介公司在中国雇用华工，负责所有的相关行政手续申请，并组织华工前往俄国的交通运输。华工一抵达俄罗斯，必须向地方当局及警察单位办理注册登记。^① 所有这些事情不是由华工亲自办理，而由中介或雇主代表办理。雇主遂扣住华工的护照，直到合约期满。这样一来，华工没有雇主的核准既不能离开俄罗斯，也回不了中国，更不能辞掉现有工作，在俄罗斯其他地方合法就业。

雇用华工需要书面合同。当时并没有经过俄罗斯当局正式核准的标准范本。这些书面合同是在俄国人或者是中国中介人与单个华工之间订立的，其合约的条件并不详细，而且出入极大。例如，狄利金公司替在西部及中部俄罗斯的别洛列茨克（Beloretsk）工厂工作的华工拟订的合约只规定：聘雇期间六个月；每天工资 0.7 卢布；雇主免费提供热、供电的住宿和伙食。^② 合约没有明文规定华工在俄国应得到什么样的食宿待遇，以及发生伤、病时要如何赔偿及诊治。位于卡马河畔、乌拉尔山西麓的彼尔姆（Perm）地区是个小型工业区，在当地的基泽尔煤矿工作的华工，合约就订得比较详细。华工同意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午休一个半小时。下到矿坑的工人日薪 0.7 卢布，没有下坑、只在地面上运煤的工人薪资较低，只有 0.6 卢布。工人免费享有食宿和取暖用的煤炭。若因病必须终止合约，工人可以拿到一张免费车票送到中、俄边界，以及 6 卢布补偿。^③ 事实上，

① E. I. Nesterova: *Upravlenie kitajskim naseleniem v Priamurskom general' nom gubernatorstve, 1884-1897*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the Priamur region region, 1884-1897), *Vestnik DVO RAN-Herald of the Far Eastern section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2000, 2, pp. 40-50.

② M. S. Kamenskih: *O prichinah volnenij kitajskih rabochih na Urale v period pervoj mirovoj vojny* (On the reasons of the rebellions of the Chinese workers in Ural during WWI), *Vestnik Permskogo Universiteta* (Herald of Perm University), 1 (8) 2009, pp. 109-113.

③ *Arhivneshnej politiki Rossijskoj Imperii (AVPRI)* -Archive of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Empire: (a) *Kitajskystol* (Chinese section), Op. 491, D. 3453, appendix.

合约条款未必受到尊重，华工成为各种歧视和苛待的受害人。

就俄国和中国官方立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往俄国的华工，不应该涉入任何与战争有关的工作。因为，直到1917年8月，中国仍是中立国家，如果德国确认中国政府允许俄国招募与军事相关的人员，中国和俄国政府会处于被动和尴尬。所以，中国官方的解释是，俄罗斯招募华工是民间商务行为，且由民间公司招募，并不涉及俄、中政府。但是，因为战争久拖，俄罗斯帝国欧洲地区的劳工短缺已经相当严重，俄罗斯文、武官员开始不再透过中介，而是直接招募华工。俄国军官身穿制服，开始手持上级命令的文件，公开雇用华人前往军事用地工作。^①在这种情势下，俄国政府再也不可能否认或保密其招募华工的计划和事实，被迫正式面对这件事，成立一个跨部会特设委员会，并拟定一整套管理招募程序 and 如何运用华工的规定。自此，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招募华工进入第二阶段。

1916年4月，俄国部长会议通过了第一版的《招募及运送黄种劳工规定》。但是，该版必须在6月修订，以便解决事先不曾考虑到的一些行政和后勤问题。所以，于1916年9月修订通过第二版，规定更加详细。^②这份文件相当大程度限制了民间招募公司及经纪人的活动，将他们的业务视为非法。从此，只能由俄罗斯的国营企业“东清铁路”（Chinese Eastern Railway）统筹管理、负责招募及运送华工到俄罗斯。

1896年，中国政府给予俄国政府兴建特许权，并通过一家俄中合资银行提供融资，兴建东清铁路。该铁路横跨满洲北部，连接东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从赤塔市经哈尔滨、到海参崴港，形成西伯利亚铁路的捷径。而从北边通往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主干线，完全位于俄罗斯境内，

① A. G. Larin: *Kitajskie migranty v Rossii. Istorija i sovremennost'* (Chinese migrants in Russia.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Moscow, Vostochnaja kniga, 2009.

② *Gosudarstvennyj arhiv Rossijskoj federacii (GARF)* –State Archive of Russian Federation: (d) F. 102, Op. 71, D. 159, L. 21–32.

于1916年才竣工，比起横跨满洲的这条“捷径”的兴建还晚了十年。东清铁路建成之后，其行政管理和技术维修等大多由俄罗斯官员和技术人员负责。俄罗斯特派一支部队、近三万官兵，保卫铁路并屯驻沿线主要中心点。东清铁路管理总局设在中国的哈尔滨市，而东清铁路的俄罗斯雇员已经建立一个真正的俄罗斯式的殖民地，拥有自己的银行、商铺、学校、医院、剧场，甚至芭蕾舞团。在俄国政府心目中，东清铁路公司拥有的一切必要的资源和后勤，可以有效地组织和监督在中国招募华工。

根据新规定，华工仅能由东清铁路俄国管理局经纪人招募，他们负责华工前往俄罗斯目的地沿路旅行和食宿。至此，华工招募和运送费用必须由雇主预先支付给东清铁路。民间招募公司或其他任何中介服务一律遭到禁止。行政手续也简化：原本入境许可是发放给个别华工，现在直接发给雇主，核准雇主所引进的华工。所有华工在入境之前，必须由东清铁路医事人员检查，以防入境后在俄罗斯华工圈中传染疾病。^①

此外，根据新规定，不仅俄罗斯远东地区使用华工正式合法化，也准许在贝加尔湖（Baikal Lake）以西所有地区使用华工，只有接近战争前线地区不得使用华工。因此，在书面上，华工仍然不准在接近前线地区工作。然而，最后版本的新规定有意留有空间，准许俄罗斯军事当局避开此禁令，并在主要前线地区雇用华工。规定第一条的附件说：在接近战场地区是否准用“黄种劳工”，权属在总司令部。也就是说，俄国政府变相允许军事当局正式招募华工进行战争相关工作，如在战场挖壕洞、修复道路和铁路，搬运军火弹药到战场，偶尔也协助俄国军队填补战线空虚。所以，政府“基于外交理由”，将这一附带条款列于保密。^②

中国政府方面，试图限制俄国方面这种公开的军事招募，要求俄国政

① *Gosudarstvennyj arhiv Rossijskoj federacii (GARF)* –State Archive of Russian Federation: (e) F. 102, Op. 75, D. 10, L. 50–54.

② 同上。

府在合约条文中加入若干保证。北京要求俄国当局发表正式声明，规定华工不会被用在直接的军事行动，华工会受俄国法律保护，在俄国领土上不会遭受虐待。当俄国政府拒绝这一切要求时，中国决定停发护照给前往俄国做工的国民，企图迫使俄国当局严正考虑中国的要求。而俄国政府把中国政府保护其公民在国外不受虐待和歧视的做法，解读为不合法的威胁，祭出不发签证给中国商人作为反制。俄国驻哈尔滨总领事在向国内外交部的呈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对我们而言，这是种不能接受的情形。我们要求必须自由发放护照，且不得因合约更动问题而受到阻滞。……只是因为我们威胁要停发签证给希望进入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才使得我们得以避免延误（输送华工）。”^①

尽管在行政和外交上发生了上述种种问题，华人在俄国工作的人数依然稳定上升。华人在俄罗斯帝国各地从事各式各样的工作。他们在乌拉山铜矿场和乌克兰的顿涅茨克（Donetsk）煤矿场从事采矿，在波罗的海的彼得格勒（Petrograd）和里加（Riga）港码头装货卸货，在俄罗斯北极地区莫曼斯克（Murmansk）兴建铁路，在西伯利亚针叶树林地带伐木。

华工在俄罗斯的待遇：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

华工在俄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很少符合合约上的规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工历史充满了罢工、争议甚至华工动武反抗雇主、华工反抗华人译员的情况。也因为俄国经理人违反契约条款，不肯付加班费或虐待他们，做出各种反抗。事实是，伴随华工人数在俄罗斯持续增加，对于劳工如此大规模移入又缺乏正式的监督，华工遭受虐待屡见不鲜，尤其

^① *Arhivneshnej politiki Rossijskoj Imperii (AVPRI)* –Archive of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Empire; (b) Kitajsky stol (Chinese section), Op. 491, D. 3486, L. 14.

在俄国军事工业集中的乌拉山地区。在靠近前线的地区亦然，那里的华工经常受到军队式的管理。^①

一般而言，华工以三百至三百五十人为一队被运送到俄罗斯。出发前，每个工人领到一整套中国衣服和一双鞋子，加上旅途所需基本供应（米、泡菜、干鱼、腊肉）。1916年，在采取官方招募及运送华工的新规定之后，东清铁路公司提供所有的华工毛毯、草帽、炒锅炊具和基本家用器皿，以及所需要的一切工具。合约期满，华工应该免费送回中国。不幸的是，这个条件一向不被俄罗斯雇主或中介人遵行，他们不肯支付华工回国旅费，反而转向华工收钱。为了消除这个弊端，雇主被要求在中东铁路公司开立保证金户头，用来支付华工回国时的旅费。^②

在早期，华工标准合约一期订为六个月。在1916年时，合约延长为九个月。每一群华工通常配置一名由招募公司或雇主聘用的华人译员，译员大多是曾在俄罗斯居住一段时间的华人移民，或是在哈尔滨学会俄文的华人。华工直到送抵目的地，一路上都由俄罗斯铁路警察押运，以防他们跳车，留在俄罗斯非法打工。即使如此，虽有守卫押车，还是有些人在旅途中逃跑成功。例如，受雇在彼尔姆（Perm）地区的一个叫阿巴姆雷克·拉扎列夫（Prince Abamelek-Lazarev）的工厂，雇用两千九百名华工，其中的一百五十人逃跑成功。^③

① M. S. Kamenskih: O prichinah volnenij kitajskih rabochih na Urale v period pervoj mirovoj vojny (On the reasons of the rebellions of the Chinese workers in Ural during WWI), *Vestnik Permskogo Universiteta* (Herald of Perm University), 1 (8) 2009, pp. 109–113. A. G. Larin: *Kitajskie migranty v Rossii. Istorija i sovremennost'* (Chinese migrants in Russia.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Moscow, Vostochnaja kniga 2009.

② *Gosudarstvennyj arhiv Rossijskoj federacii* (GARF) –State archive of Russian Federation: (e) F. 102, Op. 75, D. 10, L. 50–54.

③ V. G. Dacishen: Kitajsky trud na Urale v gody Pervoj mirovoj vojni (Chinese labour in Ural region during WWI), *Ural'skoevostokovedenie* (Oriental Studies in Ural region), 2007, 2, 49–58.

大部分逃跑的华工并没有返回中国，而是在当地找到其他工作，在俄国非法居留下来。俄国远东地区及西伯利亚存在一个重要的华侨社群，他们在中、俄国境两边有绵密的关系网，在普遍发生的华工逃逸现象上扮演相当重要角色。侨社的确协助逃逸华工在俄国另找工作，并在他们等候受雇前提供食宿协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华侨社群在帮助华工移民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有些已在俄国远东地区主要城镇站稳脚跟的华人，代表俄罗斯工厂主担任招募中介人。也有些华侨协助俄罗斯雇主，以经理、译员或守卫的身份，组织及监督华工的工作。最后，当地的华人商家和贸易商也因为数以百计的新顾客到来而受惠，因为华工只到华人商铺购买他们在俄罗斯日常生活所需的食品，诸如炒菜油、黄豆等和厚重大衣以及帽子等衣物。^①

华工一到达俄罗斯，立即从事各式各样与战争相关的工作，受到军队般的监管。华工修补道路、兴建铁路、挖地基、挖矿、在火车站及港埠装货卸货，也做各种其他体力粗活。自1916年底，俄罗斯军方也开始雇用华人挖战壕、建造营房和医院，到弹药厂、军火工厂工作，还有许多人在前线运送弹药。华工住在靠近工作地点或在工厂内的简易营房，未经取得地方警察的“路条”不准离开营区。他们不论是在工厂或是在营区，都受到地方民兵或是俄、华人组成的私人卫队的监管。每栋营房，挤满一百名华工，而俄国工人却是五十人住一栋营房。华工每天工作十至十一小时，每周七天，只有中国传统节庆日才休假。在西伯利亚或俄国远东地区的华人的补给品，主要来自中国，或是华人商铺，后者是在19世纪末随着中俄的边界贸易发展而进入俄国。在俄国欧洲地区的华工，则大多分配到俄式食

① V. G. Dacishen: *Kitajsky trud na Urale v gody Pervoj mirovoj vojni* (Chinese labour in Ural region during WWI), *Ural'skoevostokovedenie* (Oriental Studies in Ural region), 2007, 2, 49-58.

物，如黑麦面包、酸高丽菜、盐醃鱼、马铃薯、洋葱等。^① 洋食物和酷寒天气，迫使许多华工生病或逃跑。

华工在工作场合被分成小组，每个小组有自己的华人组长，由他分配薪资、衣物和补给品。这些组长和华人译员未必以同胞利益为重，时常发生侵占补给品和取暖用煤，克扣若干百分比的工资，虐待或羞辱试图抗议的华工的情况。^② 华工造反的形式有，反抗华人监工，拒绝工作，甚至动手殴打虐待他们的人。例如，1915年11月，在位于乌拉尔山脉中段的基泽尔（Kizel）地区的 Polovinsk 矿场，愤怒的华工将一华人译员和一华人守卫打死，另一名华人译员被打成重伤。^③

然而，华工抗议和反抗的对象大多是违背合约的俄罗斯雇主，源于华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过于危险。为了备战动员，俄国政府和工业拥有极大的权力对待其工人。华工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以及薪资、报酬从来就不能与俄罗斯工人平等。一旦华工与俄罗斯资方发生问题纠纷，华工得不到俄国或中国法律的保障。各式各样的虐待、歧视和暴力案件层出不穷。许多华工在合约不受尊重之下，干脆就辞职，转到别处工作或者返回中国。例如，七十四名华工被分配到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的一个

① M. S. Kamenskih: O prichinah volnenij kitajskih rabochih na Urale v period pervoj mirovoj vojny (On the reasons of the rebellions of the Chinese workers in Ural during WWI), *Vestnik Permskogo Universiteta* (Herald of Perm University), 1 (8) 2009, pp. 109–113; V. G. Dacishen: Kitajsky trud na Urale v gody Pervoj mirovoj vojni (Chinese labour in Ural region during WWI), *Ural'skoevostokovedenie* (Oriental Studies in Ural region), 2007, 2, 49–58.

② A. I. Petrov: *Istorijakitajcev v Rossii 1856–1917 god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Russia, 1856–1917), St. Petersburg, Beresta. 2003.

③ M. S. Kamenskih: O prichinah volnenij kitajskih rabochih na Urale v period pervoj mirovoj vojny (On the reasons of the rebellions of the Chinese workers in Ural during WWI), *Vestnik Permskogo Universiteta* (Herald of Perm University), 1 (8) 2009, pp. 109–113.

叫 Nigniy Ufalej 的地方伐木。车里雅宾斯克地处乌拉尔南坡及外乌拉尔，拥有冶金产业。这些华工发现工作环境太艰苦，拒绝继续工作下去，要求遣还中国。^① 在俄罗斯中部及南部地区工作的华工状况比起在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地区的同胞更加复杂，他们无法依赖华侨社群的支持，因为华侨社群还未伸展到此地。辞工不干的华工被迫流落在邻近城镇街头，还得躲避俄罗斯警察缉捕。1917年，这个现象相当普遍，战时的俄罗斯报纸充斥成群的华工沦落为乞丐的报道。^② 有时候，拒绝工作的华工被俄罗斯雇主控告破坏战事生产，这可是相当严重的罪名。华工只好在军法审判和严刑峻法的威胁下被迫恢复工作。

华工在俄国所遭遇的恶劣环境和艰苦待遇，经常成为俄、中外交争议的源头。例如，北京政府要求俄国当局允许中国官方代表陪同华工前往工作地，并且可以留驻，以便在发生劳资争议或违反合约时可以保护华工权益。^③ 但是，俄国政府予以坚拒，认为无法接受这些要求，提出外国官员进驻俄罗斯领土，尤其接近战略工业地区，十分危险。^④ 但是，俄罗斯当局真正惧怕的是，华工会倚仗中国官员在场要求俄方做出更多的让步，甚至组织更多的罢工。

① M. S. Kamenskih: O prichinah volnenij kitajskih rabochih na Urale v period pervoj mirovoj vojny (On the reasons of the rebellions of the Chinese workers in Ural during WWI), *Vestnik Permskogo Universiteta* (Herald of Perm University), 1 (8) 2009, pp. 109-113.

② 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1988年。

③ A. G. Larin: *Kitajskie migranty v Rossii. Istorija i sovremennost'* (Chinese migrants in Russia.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Moscow, Vostochnaja kniga 2009.

④ *Gosudarstvennyj arhiv Rossijskoj federacii* (GARF) - State archive of Russian Federation: (f) F. 102, Op. 71, D. 152, L. 42.

战后遣还问题

1917年2月，俄罗斯王室在第一次俄罗斯革命的怒火下倾覆。在俄罗斯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正式逊位后，俄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应付国内外最重要事务。1917年7月，俄国临时政府决定停止招募华工，并开始将大战期间引进俄国的工人遣送回国。因此，许多华工得以回到中国。^①但是，不到几个月，临时政府也垮台，因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发动第二次革命，俄国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政治主角。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新政府宣布俄罗斯前线停火协议，旋即于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与德国签订和平条约。俄国参加的这场战争结束。但是，另一场战争立刻登场，内战席卷整个俄罗斯。前俄罗斯帝国分裂为几个小国，各有不同政府；铁路网被前线切断，所有的主要经济活动停顿下来。这种情势使得撤出华工几乎无法执行，尤其是俄国在欧洲地区的华工。然而，新的苏维埃当局还是在西伯利亚横贯铁路于1919年5月停摆之前，已经设法遣还三四万名华工。^②后来，西伯利亚遭到反布尔什维克的白军占领，协约国又联手干预俄罗斯内战，这条路线无从运作，苏维埃政府正式筹办的遣还华工作业遂告中止。

于是，困在俄国各地的华工只好绕过交战地区，另寻办法回国。有些华工取道法国、或者加拿大回到中国。^③但是，大多数华工则困顿在俄国各地城镇，既无工作，又身无分文，回国的希望也十分渺茫。根据官方统

① 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1988年。

② A. G. Larin: *Kitajskiemigranty v Rossii. Istorija i sovremennost'* (*Chinese migrants in Russia.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Moscow, Vostochnajkniga. 2009.

③ A. G. Larin: *Kitajcyv Rossiivchera i segodnja: istoricheskijocherk* (*Chinese in Russia yesterday and today: a historical overview*), Moscow, Muravej 2003.

计，在1921年，仍有将近九万名华人困在俄罗斯欧洲地区。^①至于有多少华人在西伯利亚和俄国远东地区只有天晓得。^②在大多数状况下，华工被遗弃在关闭的工厂和矿场无依无靠，听天由命。中国政府也帮不了他们，因为那时的北京政府与苏维埃新政府断绝关系，驻俄外交官设法在黑海俄罗斯各港口搭船前往土耳其；有些官员则与英国干预兵团从俄国北部极圈内重要城市莫曼斯克（Murmansk）和位于北德维纳河河口附近的俄国重要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撤退，先到英国，再将派驻在俄罗斯的外交和贸易代表处统统关闭。

在这种艰辛的环境下，华工势必要另求生存之路。许多华工分别投效各路俄罗斯军队和包括英国、日本列强干预部队，卷入俄国内战，也就不足为奇。然而，大多数的华工选择与布尔什维克党人并肩作战，布尔什维克党似乎比起介入俄境战事的各国部队善待华人。^③例如，在邓尼金将军（A. I. Denikin）领导的白军所控制地区，华人遭到有系统的囚禁、递解出境，甚至被以间谍罪名枪毙。反之，布尔什维克宣称华工是“无产阶级兄弟”，享有和俄罗斯人一样的权利，邀请他们以平等地位加入国际共产主

① A. G. Larin: *Kitajskie migranty v Rossii. Istorija i sovremennost'* (Chinese migrants in Russia.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Moscow, Vostochnajkniga 2009.

② 根据近年某些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居住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有将近六十万华人，其中大多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来到俄罗斯。F. N. Podustov: *Nacional'nye voinskie formirovanija Krasnoj Armii v Sibiri i na Dal'nem Vostoke, 1919-1938 gg.* (National Military Units of Red Army in Siberia and Russian Far East, 1919-1938), *Izvestija tomskogo gosudarstvennogo universiteta* (Herald of Tomsk State University), pp. 165-169).

③ 华人加入红军部队的确切人数不详。俄罗斯历史学者估计人数有三四万人。[A. G. Larin: *Kitajcyv Rossiivchera i segodnja: istoricheskijocherk* (Chinese in Russia Yesterday and Today: a Historical Overview), Moscow, Muravej, 2003.] 可是，中方某些估计则高达十五万至二十万人之间 (P. Nyiri: *Chinese i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A middleman minority in a transnational era*, London, Routledge, 2007)。

义运动。^①

不过，在俄国的大多数华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从军只是不想在异域饥寒交迫而死。他们决定投效红军是出于求生存，不是因为政治和革命意识觉醒。有位华人红军战士李富清（音译，Li Fuqing）说过：

“1917年春天，一群又一群饥饿的华工在乌克兰草原游荡，我和朋友遇上一个俄国人伊凡诺夫（Ivanov）。他对我们说：‘同志们！要活命，你们必须组织起来、开始攻打沙皇部队。在他们的仓库里，有面包，也有衣物。’这时候，我已经略通俄语，我觉得伊凡诺夫对极了。”^②

遵循伊凡诺夫的建议，这一伙中、俄人马开始攻打沙皇部队、抢劫他们的仓库，并且也爆破他们的铁路和弹药库。李富清和他的朋友就不自觉地参加了革命行动和加入红军。事实是，饥寒交迫、沦落异域、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又被中、俄当局弃置不顾，华工的各种选择，其实只是为了在内战的艰困环境中争取活命的机会。^③

内战一结束，苏维埃政府重启遣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来到俄国的华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华工都决定回中国，有些人还是选择留在苏联，到重新开工或新设的工厂、工业区和交通中枢工作，这样的情况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历史材料对于究竟有多少华工实际留在俄国，以及留在

① 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1988年；A. G. Larin: *Kitajskiemigranty v Rossii. Istorijaisovremennost'* (*Chinese Migrants in Russia.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Moscow, Vostochnajakniga. 2003.

② A. G. Larin: *Kitajskie migranty v Rossii. Istorija i sovremennost'* (*Chinese migrants in Russia.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Moscow, Vostochnajakniga 2009.

③ 俄国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的煽动和宣传似乎在华工当中产生相当大的作用，许多华工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理想——因为它承诺在俄罗斯内战结束后要解放中国的无产阶级——遂因信仰而加入红军。即使如此，共产党在俄罗斯华工群的动员，成效相当有限，因为他们后来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和发展中只扮演二手角色（P. Nyiri: *Chinese i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A middleman minority in a transnational era*, London, Routledge. 2007）。

何地，有不同的信息。但是，华工的大多数集中在俄国的远东地区和西西伯利亚的城镇地区，似乎应该没有疑义。

结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法国从它们的殖民地引进数以千计的工人在前线工作。而俄国早在1914年，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即从中国大量招募工人。虽然中国不是俄罗斯殖民地，但是，自19世纪90年代末期，华工已经是俄罗斯快速工业化的主要劳动力来源。雇用华工在俄国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已是常见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同之处是华工大量出现在俄罗斯帝国的欧洲地区，替补俄罗斯人入伍后的劳动力。

理论上，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工也应该在农业及民间工业工作，但是，他们被分派到与战争相关的各种领域工作：在前线附近兴建军用工事、修建道路和铁路、制造炸药，其工作艰苦、重要，有时候相当危险。华工取代俄国人承担后方极其大量的艰苦工作，成为俄国在战争中的相当重要的成员。后来，俄国革命爆发，华工困在异域，陷身于可怕的俄国内战战火之中。于是，华工在间接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得被迫拿起武器打一场跟他们完全不相干的战争。结果是华工无意间在俄罗斯逗留相当长的时间，参与了影响20世纪历史的重大事件，且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外交关系的演进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华工：一段被忽视的插曲， 中国外交政策与现代劳工史的演变

Paul J Bailey*

引言

2010年，中国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播映了六集的纪录片，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英政府至少招募十三万余名华工（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华北——主要是山东的农民），到欧洲参战的故事。^① 当时的法国长期

* 任教于英国杜伦大学历史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Durham University, UK）。

- ① 本文取材自下列著作各章节的主题、细节和概念。张建国主编：《中国华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山东大学出版社，济南，2009年，第3~18页；*An Army of Workers: Chinese Indentured Labour in First World War France*, in S. Das (ed), *Race, Empire and First World War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5-52; *Discipline, Résistance et "Face": le cas des huagong (travailleurs chinois d'outre-mer) durant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in Li Ma (ed), *Les travailleurs chinois en France dans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en France* (Paris: CNRS Editions, 2012), pp. 247-264; *Coolies or Huagong? Conflicting British and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Contract Workers in World War One France*, in R. Bickers & J. Howlett (eds), *Britain and China 1840-1970: Empire, Finance and War* (London: Routledge, forthcoming), 以及拙文 *Chinese Labour in World War One France and the Fluctuations of Historical Memory*,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14.2 (October 2014), 和即将由 Routledge 出版的 *Chinese Overseas Labour in World War One France: Migrant Workers, Globalisation and the Sino-French Connection*.

受制于劳动力不足，而在法国境内的英国码头工人要回国参军，他们亟需被替补。于是，法国招募的华工被派往担负与战争相关的形形色色工作，前线、后方都有，在政府经营的军火工厂和民间的冶金、化学和营造公司工作，其位置大多在法国西北部和中部地区，如布雷斯特（Brest）、勒阿弗尔（Le Havre）、布尔日市（Bourges）、克鲁索（Le Creusot）、圣沙蒙（Saint Chamond）等地。至于受雇于英国的华工，则被分派到相当不同的领域去工作，包括交通运输、机械维护、道路修缮和机场建设等。英国人和法国人雇来的华工还担任法国西北海岸码头卸货工作（某些港口，如迪耶普，几乎所有的起重机都由华工操作）。到了战争结束前，还有许多华工继续做挖掘战壕、掩埋死者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这些华工占英、法政府在战争期间所利用的全体外籍劳工（大部分来自殖民地）相当大比例。英国招募的近九万六千名华工占其外籍劳工约 50%，另外的是四万八千名印度人、两万一千名南非黑人、一万五千名埃及人和八千名西印度群岛人。虽然法国主要从其北非殖民地和印度支那募集工人（七万八千名阿尔及利亚人、四万九千名越南人、三万五千名摩洛哥人和一万八千名突尼西亚人），法国所雇用的三万七千名华工，仍然占相当高比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的外劳主要来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移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首次有如此大量种族不同的外劳入境，意义极不寻常。近年，有位学者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引进大量殖民地及中国工人，以及他们在法国社会所受到的对待，使得法国从“仇外”，即从仇视原来欧洲内部移民，变成“种族歧视”。^①到了 1920 年，英国雇用的华工（合约三年）全都被遣送回国；而受法国雇用的华工（合约五年）被遣送回国的时间则是 1922 年。然而，即使在 1922 年之后，受法国雇用的部分华工（或许多达两千人）

^① T. Stovall; *Color-Blind France? Colonial Worker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Race and Class* 35.2 (1999), pp. 35-55.

仍旧留在法国，其中有些人与本地女子结婚。最长寿的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华工于2002年3月在法国西部海港城市罗谢尔（La Rochelle）去世，享年105岁。^①

上述的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在开头第一集的旁白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华工“与英、法部队并肩”对抗德国军事侵略。整个节目力求描绘：在当前中国“全球化”时代，即1978年至1980年“后毛泽东时代”的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之前，中国早已积极地与世界互动。这个节目也象征着，在中国内部对早已被边缘化或遗忘的一战华工的故事重新恢复兴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的中国官员、外交官和知识分子纷纷称颂华工的历史角色，以及他们对协约国胜利的贡献。例如，1922年，中国派驻国际联盟大会代表团顾问徐世昌（Min Chien T. Z. Tyau）盛赞华工对“自由民主大业”的贡献，坚称协约国及其民众对华工的感激涕零，似乎“世界几乎可说拜倒在华工脚下”。^② 这之前的1920年，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也高度赞扬一战华工的不懈辛勤，是中国劳动阶级勤勉、勇气的典型例子；如同19世纪华工到澳大利亚和北美洲对世界之“开放”贡献卓著一样，一战华工也扮演了同样重要的“国际主义”角色。^③

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华工故事被忽略。官方和学者注意力大多投向华人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历史，也就是1919至1920年间将近一千五百名中国学生到法国半工半读。这是中国亲法知识分子在法国官员和教育界支持下组织的一项计划。由于周恩来、邓小平等许

① Li Ma: *La "Mission Trupitel" et les travailleurs chinois en France*, in Li Ma (ed), *Les travailleurs chinois en France dans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aris: CNRS Editions, 2012), p. 81.

② 徐世昌 (Min Chien T. Z. Tyau): 《日新兹议》 *China Awakened* (New York: Macmillan, 1922), pp. 225-226.

③ 陈独秀：“华工”，《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87年，第596页。

多未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与此有关，所以，成为中国大陆学者关注的焦点。^①

或许更重要的是，1949年之后，在受毛泽东影响的历史学者看来，协约国在一战期间所招募华工的历史是19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压榨中国的长久历史中的可耻一幕。由于这些华工被视为被动、受欺压的受害人，中国的说法是“炮灰与苦力”，为邪恶的、贪婪的帝国主义列强效命。在这样的氛围下，中国学术界已经没有太大兴趣更深入探讨招募华工的政治脉络，以及华工在法国生活和活动的历史。即使到了2002年，对欧洲华人移民史的一项重要研究，也只是用少许文字提到一战华工，继续重复传统观念，形容他们是不幸的、被欺压的受害人、被骗到欧洲“当炮灰”。^②

因此，目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华工的研究兴趣至少反映：毛泽东、列宁视一战为贪婪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两败俱伤战争的历史叙事被否定。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协约国招募华工被赋予比较正面的意义，符合中国官方目前的倡议，即要凸显中国在当今时代的很久之前已经与全球有互惠的互动，进而替中国目前的“和平崛起”定调，指向中国在全球经济日益强大地位的潜在利益。这种称誉一战华工对民主和世界和平有卓著贡献的用语，其实与1922年徐世昌所说并无差异。2008年，山东省威海（当年许多华工由此前往欧洲）档案局主办一场有关英国招募“华工团”的国际会议。^③次年，会议论文集结成册出版，有位中国作者宣称一战召

① 一直到1986年，台湾出版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华工第一部完整的中文研究著作：陈三井：《华工与欧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86年。1997年，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也依据台湾当局档案出版有关一战期间招募华工的文件辑要：《欧战华工史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97年。

② 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北京，2002年，第99页。

③ 我在八年前参访威海档案馆主办的地方史展览，并无一战华工资料。

募华工是人类文明史和东西关系史上重要的篇章。^① 我恐怕要说，这样的说法过于夸张。

实际上，一战时期的法国华工的历史角色早已被遗忘了相当长久。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法国官方和民众对华工的兴趣已开始消退。例如，在 1925 年，成立于 1919 年的法国华工总会（1922 年后，继续代表留在法国的华工之利益）向法国政府陈情，要求树立纪念华工战时贡献纪念碑。法国华工总会还建议为战时及战后初期去世的法国招募华工设立国家公墓。^② 但是，陈情并未被接受。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界对一战的研究，其主流几乎以欧洲为主。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两项对一战劳工的英文研究只字不提华工，实际上他们也完全没提到从殖民地招募（或征调）的外籍劳工。^③ 这个情况近年来才有所转变。^④ 最近，法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才把视角扩大到包含殖民地工人及军队夫役的贡

① 徐国琦 (Xu Guoqi): “序”，张建国主编：《中国劳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山东大学出版社，济南，2009 年，第 2 页。

② *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Paris): E-544-1 (“Chinois en France 1922-1929”), *letter from the Gener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Workers in France to the Foreign Ministry*, 21 April, 1925. 受雇于英国的华工在战时及战后死亡，安葬于国协战争坟地委员会 (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 所管理的公墓。受雇于法国的华工死后 (估计约有一千人) 则安葬于他们受雇地区的市立公墓。

③ J. Horne: *Labour At War: France and Britain 1914-191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J. Horne (ed): *State, Society and Mobilisation in Europe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④ S. Das (ed): *Race, Empire and First World War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R. Gewarth & E. Manela (eds): *Empires at War 1911-192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and J. Win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3 vols), *all of which broaden our horizons on the First World War by exploring how it impacted empires, polities and societies beyond Europe as well as highlighting the lives and roles of non-European participants*. 这些书对我们理解一战对非欧洲帝国、政体和社会的影响以及对我们理解非欧洲参与者的生活与他们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都起到扩大眼界的作用。

献。但是，对于法国政府在战时运用的近十万名越南工人及士兵，仍然没有一篇完整的法文研究。^①

近年来，法国重启对一战华工的兴趣。源于法国政府的一项计划，旨在纪念法国华侨社群（目前法国约有六十万华裔人口）以及其他族群的多元文化的历史贡献。例如，1988年11月，在巴黎第十二区的里昂火车站（Gare de Lyon）和玛丽丹尼斯路（Rue Marie Denis）附近，一块纪念华工对协约国战事贡献的纪念碑正式揭幕。该碑文特别指出战后留在法国的华工是法国第一代华侨的核心。其实这样的说法违背真实历史，因为法国第一代华人移民在19、20世纪之交就来到法国，大多是街头小贩。1997年，法国的“每周三说史”电视节目（Les mercredis de l'histoire）播映了一部有关一战华工的纪录片，包括找来1922年后留在法国的三名华工子女进行专访。政府的用意是提升国人对不同族裔社群对法国社会的贡献的兴趣，凸显移民和族群多元化在法国现代史（以及国家认同的形成）上的重要意义，但是，这项计划也引发了争议。2007年，这项计划达到高潮，政府在巴黎设立“国立移民史中心”，陈列与一战华工有关的文物史料。但是，史料显然相当不足，只有少数几张照片和一份华工合约复印件。在上述背景下，2010年，法国第一次举办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华工学术会议，也就不是偶然。该会议由布洛涅-比扬古（Boulogne）的法国滨海大学（University of Littoral）和比利时的伊普尔（Flanders）弗兰德菲尔德博物馆（Museum in Ypres）共同主办。^②

法国官方对一战华工重启兴趣还有另一个原因，即是促进观光旅游，或者也可说是“地方热情”（local boosterism）。法国西部索姆河（River

① 近年法国出版了一项对一战期间越南劳工及士兵的研究，它是以英文写作。见 K. Vu-Hill: *Coolies Into Rebels: Impact of World War One on French Indochina* (Paris: Les IndesSavantes, 2011)。

② 会议论文集结成为 Li Ma (ed): *Les travailleurs chinois en France dans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aris: CNRS Editions, 2012)。

Somme) 河口的罗也利斯滨海市 (Noyelles Sur Mer), 不仅是英国人经营的最大的华工营区, 也是英国国协战争坟地委员会 (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 管理的华人公墓所在地, 1917 至 1919 年期间, 八百七十七名在法国去世的华工安息于此。2001 年, 罗也利斯滨海市长办公室印行一份小册子招揽海外观光客, 宣扬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景点。从这本观光客手册上, 明显看出来, 有愈来愈多中国观光客到此一游。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勤工俭学学生曾经居留的法国城镇, 巴黎南方的蒙塔日 (Montargis) 也具有这种“地方热情”, 因为此地曾经居住过许多激进的勤工俭学学生, 他们在当时或是后来回国后, 信仰马克思主义, 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党员。蒙塔日市政府努力推广它是观光景点, 宣称它是中国共产主义“诞生之地”, 以便吸引中国游客。^①

一战华工的故事不应该只被官方拿来作公关活动、推动观光旅游, 也不应该用来支持那些宏大叙事下夸张中国的过去及当前全球互动的伟大意义。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有受到忽视或漠视的危险。

中国外交政策新篇章

首先, 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并介入英国和法国在一战期间招募华工, 反映了官方从 19 世纪末以来对海外华工观念的改变达到顶点, 昭显了新的外交政策倾向。如果根据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中国对契约工的标准说法, 协约国一战期间招募华工可以被舆论误导为: 即使受到更严格的监督, 仍旧是恶名昭彰的 19 世纪“苦力交易”的“复活”。^② 这样的误导完全遮蔽

① 最近几年, Montargis 市政府开辟“中国观光客路线”, 吸引那些有兴趣探寻本市与中国共产党形成的因缘之游客。见“‘French town’ lures Chinese tourists to ‘revolution road’”, *China Daily* 21 April, 2011.

② D. Northrup: *Indentured Labour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1834-192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9.

了一战招募华工的一些非常不同的重大改变。在 19 世纪 40 年代至 70 年代，“苦力交易”期间，西方招募了约二十五万名华人契约工，但是，经常是通过暴力或欺骗手段，目的地主要是古巴、秘鲁和英属圭亚那的蔗糖农场，以及英属及法属的印度洋属地毛里求斯（Mauritius）和留尼旺（Reunion）。这种交易是违法的，明朝在 14 世纪和 15 世纪也颁令禁止出海，清朝政府在 1712 年即谕令不准出洋移民。官方禁止人民出海，反映的是长期以来一种阴谋论：即对到海外改善生计（至少在 10 世纪已经出现的现象）、离开中国领土的民众之怀疑，持续担忧这些海外移民（或暂时居留者）回国后可能参与叛乱，或是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海盗活动。最近一项研究还指出，从很早起，中国统治者就认为往海外移民居心叵测。^① 海外移民经常被贬斥为“黄鱼”。

更尖锐的是，西方人在厦门等条约口岸，仗恃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令管辖，并不理睬中国政府禁止出海令、雇用“苦力”。后来在 19 世纪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中国文书里还把华工贬抑为“猪仔”。在香港和澳门英、葡公司设置的检验可能的“苦力”的场所，中文就叫作“猪仔馆”。1873 至 1874 年间，出现一大转折，清政府一再接获报告说这些华工受到非人待遇，故批准派出一个官方代表团到古巴调查“苦力交易”的不公不义情形，并直接从中国“苦力”录取口头证词。后来，清政府与对古巴实行殖民统治者的西班牙签订条约，并于殖民地首府哈瓦那设立中国领事馆，负责监理华人的福祉。后来在美国各地设置领事馆，主要也是基于这个目的。在此之前，中国政府罕有保护海外华侨利益的举措，这种转变代表中国开始实行新的对外政策。还要指出，更早几年，清政府在 1866 年即开始展现对海外契约工人困境的关切，向英、法政府驻华代表提出一系列的管理招募合约之规定，预备限制契约期限为五年，契约期满保证免费送

^① D. Lary: *Chinese Migrations: The Movement of People, Goods and Ideas Over Four Millenni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2), pp. 1-3.

工人回国。但是，那时的英、法政府认为这些限制太严，不肯接受。尽管如此，1904年，英、中这些规定作为基础签订条约，准许将近六万四千名华工受雇前往南非特兰斯瓦尔（Transvaal）金矿工作。这项英、中条约包括了诸多细则。例如，合约文本必须在中文报刊公布，必须订明合约期限、工资和工时，保证工人有免费医疗照护，合约期满免费送回中国。此外，规定中国在出发地和南非可派检查人员。这些条件后来也纳入一战期间英、法招募华工的合约里。

关于中国对海外华人契约工的际遇的关注，还有一个例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向德国交涉受雇到新几内亚（New Guinea），当时名称“西泽威廉之地”（Kaiser Wilhelms Land）和西萨摩亚（West Samoa）德国殖民地烟草农场工作的华工状况。在20世纪初，中国政府（包括清政府和民国初期政府）经常批评德国殖民地当局把中国“苦力”地位置于“原住民”之下的政策。例如，殖民地的农场主对华工施加鞭刑处分，在当地竟然是合法的。还有，德国殖民地当局也不应该禁止西萨摩亚的中国工人向中国官员投书、申告受到不公平待遇。^①就和古巴的情况一样，中国驻柏林公使孙宝琦建议北京在西萨摩亚设立领事馆。1910年，中国设馆，并派两名钦差前往当地检查工作环境，他们的批评报告于1911年刊登在当地中文报纸上。

1912年初，孙中山以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身份指示外交部，新政府必须持续警觉，保护海外华侨权益，并确保不得再发生长期存在的海外华工被不平等对待及受欺压现象。想必孙中山对萨摩亚华工悲惨经历的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孙中山把政府应该关怀，也有责任将照顾

^① A. Steen: "Germany and the Chinese Coolie: Labor, Resistance and the Struggle for Equality 1884-1914", in N. Berman, K. Muhlhahn & P. Nganang (eds): *German Colonialism Revisited: African, Asian and Oceanic Experien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3), pp. 147-160.

华工和“尊重人权”、“保全国体”联结起来。^① 1917年，中国政府批准法国和英国来华招募一战华工之后不久，即在外交部底下设立新机关“侨工事务局”。以当时中国外交总长的话来说，该局当前重要任务是确实保护“我工界旅法同胞”。^②

还有一点很重要，中文版的合同把工人称为“华工”。在19世纪末，这个名词愈来愈被用来称呼到海外工作的华人，明显要与过去所谓的“苦力”做出区隔。^③ 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文版的合同，以及官方所有的英文通信，仍一贯称呼华工为“苦力”。^④ 在英文讲法里，这时候中文“苦力”已经成为廉价、驯服的仆役的象征。而“苦力”（Coolie）这个字却是印度塔米尔语 kuli（原意“工资”）的演化，它原先特指的是19世纪40年代，英国茶园农场主从印度的比哈尔（Bihar）、欧里沙（Orissa）和孟加拉国（Bengal）等地区引进到阿萨姆（Assam）省的契约工人。“苦力”这个字词原本带有种族歧视意味指称一无所有的印度工人，现在也用到中国工人身上，特指他们低贱和从事的是“驼兽”般的

① “大总统令外交部督促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临时公报》43号，1912年3月19日。

② 《欧战华工史料》，第277页，1917年4月20日外交总长致国会函。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福建省政府于1899年成立“保商局”，广州和汕头也成立类似机构以保护移民，海外移民、移工的家属也可以代表他们向这些机关申告在国外受到的委屈。

③ “惠民公司”系中国一家半官方的组织。该公司在1916至1917年间，代表法国政府招募华工。它发行的刊物上，撰稿作者也把他们称为“工人”。见“召工出洋缘起”，《惠民公司》（1916年，日期不详），第1~2页。20世纪初，“工人”一词最初用来称呼受雇到南非特兰斯瓦尔金矿工作的华人契约工。见《东方杂志》（1904年）1卷8期，第56页。

④ 在法文版的合约和法国官方通讯里，中国工人以比较中立色彩的字眼，如 *travailleurs chinois* 或 *main-d'oeuvre chinois* 称呼。不过中国工人的从属地位很清楚，他们和征调来自法国殖民地的夫役归为一类，全部受“殖民地劳工局”（*Service d'organisation des travailleurs coloniaux*, Colonial Labour Service）行政管理。他们有时候也用比较东方式的名词 *main-d'oeuvre exotique* 加以称呼。

工作。之后，它逐渐用来称呼所有的海外华工。即使从技术层面，华人契约工在19世纪只占华人移民相当小的比例。例如，前往东南亚、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大部分的华工并没有签下卖身契，他们属于“借条”制，工人的家属、亲友或其他华人中人代付旅费，工人在抵达目的地后打工，以工资所得偿付借款。^①

就中国外交政策而言，一战期间招募华工最重要的意义或许是把海外华工和国家利益直接挂钩起来。中国政府支持盟国招募华工，明显地意在增强中国在未来和会中的地位。这代表史无前例地从政治上利用海外华工，以推进中国政府争取被国际社会接受为地位平等的成员，促成修订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目标。另外，也涉及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1916年，中国驻法公使胡惟德设想法国华工可以作为未来中国移民潮的前锋，而且他们将使中国商品在欧洲市场日益畅销，创造有价值的市场。^② 用利他主义的角度来说，可以视一战华工为中国致力世界和平的重要表征。1919年，中国官方出席凡尔赛和会代表团的一位团员编了一首歌，把华工描绘成世界和平、和谐的积极的推动者：^③

自从离开了我们的祖国，
我们跨越高山和汪洋。
无论是金属，石头，泥土还是木头，我们都能开采它们。
我们能修补战争后的荒芜。
我们，神圣中华儿女，我们的命运与祖国休戚与共。
尊重农民敬重工匠，从未诉诸武力。

① “苦力”一词带着所有的歧视含义。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也被在华英国人采用，用以指称在中国执行劳力工作的任何中国老百姓。

② 中国驻法公使胡惟德1916年12月28日致中国外交总长函。《欧战华工史料》，第238~239页。

③ *La Politique de Pékin* (22 February, 1920).

前进，前进，一直在前进。

四海之内皆弟兄。

我们是专心致志与劳动的工人大军。

为了将和平与人性修筑与你。

当时中国人对一战华工如此的赞美，其实与毛泽东时期以及中国当前“全球化”阶段的做法很有相似之处。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派出一万五千名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在东非资助及兴建一条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铁路，中国人称之为坦赞铁路、本地人称之为乌胡鲁铁路（Uhuru Railroad），意即自由铁路。^①北京这项戏剧化的国际援助姿态，意在宣扬中国对不结盟国家的政治承诺，尤其彰显所谓的亚非团结。派到非洲去的华工，与一战期间前往法国的华工一样，他们成为中国积极、正面地与世界互动的象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目前出口劳工的论

^① M. Bailey: “Tanzania and China”, *African Affairs* 74. 294 (January 1975), pp. 39–50. 中国在非洲参与兴建铁路，并非史无前例。1898年，中国工人和塞内加尔（Senegal）、达荷美（Dahomey）、黄金海岸（Gold Coast）的工人，一起兴建连接扎伊尔西部港市马塔迪（Matadi）和比属刚果 [当时名称刚果独立邦（Congo Independent State）] 金沙萨（Kinshasha）的一条铁路。P. Manning: *Francophone Sub-Saharan Africa 1880–19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0. 另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北京，1999年，第104~105页。1905至1906年，德国引进一千名中国工人协助兴建坦干伊喀 [Tanganyika，即德属东非洲（German East Africa）] 第一条铁路。更早，法国在1880至1882年，雇用华工在塞内加尔兴建铁路，19世纪90年代亦引进三千名华工到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兴建公路。L. Slawewski: *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in Madagascar* (Hamden, Conn: Shoestring Press, 1971), p. 85. 李安山，第117~123页也指出：1800至1850年间，高达一万七千名华人契约工前往非洲。而在18世纪中叶至1910年这段较长的时期内，共有十四万两千名华人契约工受雇到非洲工作。

述其措词也强调要对“文明”发展做无私的贡献。^① 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起二十年间，中国有四十万人移居俄罗斯、五万人移居东欧和数十万人移居非洲。^② 这些移民大多是工人、小店老板和零售业商人，在中国官方的论述里被称为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先锋，在移居国的现代化上扮演极重要的角色。^③ 一战华工被中国官员视为和平与世界和谐的象征，今天的海外华工也被认为是新中国走向“全球”和造福世界的代表。^④

现代中国劳工史的重要篇章

一战期间招募华工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华工居留法国期间的经验和活动。不论这些原本的华工如何影响到英、法雇主对他们的评价，例如认为华工“驯服”、“稚气”、“听话”或“管理得当”后会很勤勉。但

① P. Nyiri: “The Yellow Man’s Burden: Chinese Migrants on a Civilizing Mission”, *The China Journal* No. 56 (2006), pp. 83–106.

② 从1978年至2009年，中国总共派出四百九十一万名工人到国外工作。2009年底，共有七十七万两千名中国工人在一百九十个国家工作。D. Shambaugh (沈大伟):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79. 奇怪的是，这本书的主题是中国在全球政治、社会、经济的影响力日增，全书却只有这一处提到海外华工。以下两位调查记者对于今天遍布全球的中国移民、创业家和零售业商人的活动和观点，有非常精彩的新研究，可参见 J. Cardenal & H. Araujo: *China’s Silent Army: The Pioneers, Traders, Fixers and Workers Who Are Remaking the World in Beijing’s Image* (London: Penguin, 2014). 关于中国向非洲的移民，也可参见 H. French: *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 (New York: Knopf, 2014).

③ 在有华工的国家及其人民，对中国人涌入的反应其实喜憎交织，见 E. Wong: *China’s Export of Labor Faces Scorn*, *New York Times* (20 December 2009).

④ 中国官方及评论员近来还宣扬中国向海外移民有另一个好处，即它可以协助人口锐减的国家建设开发（譬如有些非洲国家因艾滋病肆虐，人口减少）。D. Lary: *Chinese Migrations: The Movement of People, Goods and Ideas Over Four Millenni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2), p. 194.

是，华工能够决定自己的利益，可以相当主动地响应针对违背合约、工作危险及有时候遭受虐待的抗议活动。^① 在识字和教育方面，华工自行组织自修班。1918至1919年之后，愈来愈多勤工俭学学生来到法国，工人通常组成自修班，邀请学生来教课，这样的华工在法尔尼耶（Fargniers）和皮卡第（Picardy）就有四百人。华工明白通晓中文和法文的重要性，这可以使他们不再事事仰赖多念点书的华人译员，也有助于避免发生在克鲁索（Le Creusot）勃艮第（Burgundy）某位华工身上的误会。这位华工因为不了解发给他的面包配给券的重要性，到本地面包店买面包时没带配给券，店主不卖他，他气得砸了那个店。华工努力进修十分可佩。例如，法国东部的克特多（Côte d'Or）的翁日（Vonges）有一家火柴工厂，雇用了九百三十名华工，在1919年3月时有两成参加自修班；另五成利用工余自学，三成则固定阅读支持勤工俭学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法国编印《华工杂志》。1919年，在蒙塔日（Montargis）附近一家工厂的华工写信给法国陆军部，抱怨他们受到法国领班的虐待。

华工也组织“自治会”作为互助团体，互相砥砺，铲除喝酒、打架、赌博、嫖妓等不良行为。其会员互相监督不乱花钱，彼此提醒节俭、学习是爱国责任。“违规者”会有罚款，这种会员的自我监督，反映出华工自组织能力和自主意识增强，以自主管理和规范本身纪律来防制国内或国外当局的敌意行动，也为了避免当地人对华人的敌视或反感。事实上，华工组织的“自治会”领先“五四运动”时学生们自主管理和规范自身纪律的做法。^②

① 以下有关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的生活与活动之讨论，亦取材自本文首页注①所列示。

② 关于中国20世纪中的学生运动的研究存在这样的现象。J.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这本书强调了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学生企图在政策方面的“创新立异”。

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这个时期的法国华工自认为能够超越同乡、同宗或同省，属于一个更大的社群。实质上，华工显现了初具雏型的国家意识。例如，1919年10月，法国南部卡普德纳克（Capdenac）地方某工厂华工一起编织国旗，庆祝“双十国庆”。1918年上半年，全法国各地数以万计的华工纷纷捐款救助国内河北省洪水受害人。其中，法国东部翁日（Vonges）一千名华工凑足两千多法郎、布洛涅港口（Boulogne）的三十五名华工更捐出八百八十一法郎。根据中文报纸报道，有位23岁的华工向驻巴黎中国大使馆报告，他打算捐款五百五十法郎协助国家偿付外债，为拯救“祖国”贡献绵薄之力。

华工勇于抗议遭遇的不公平待遇。^① 抗议的形式有很多种。例如，1918年3月，在圣路易斯-罗恩（St. Louis-de-Rhone），靠近阿尔勒省（Province Arles）一家弹药工厂的华工逃跑一空，因为他们拿不到加班费，就“放下工具”，步行前往他们在法国上岸的马赛，但是，他们很快就在镇外被地方警察逮捕。1918年5月，卡昂哗吼（Caen）的两百名华工为抗议面包配给减少而罢工，成功地迫使法国雇主放弃以马肉取代牛肉的计划。圣纳泽尔（St. Nazaire）的码头华工拒绝卸煤炭，除了因为他们认为工作危险和“肮脏”以外，更因为它不列在合约里。法国码头经理人为之气愤，经常责备华工“懒惰、惹麻烦”，要求改雇用比较“听话”的殖民地工人。铁路华工也发生罢工事件。例如，1917年2月，一百多名在佩里格（Perigueux）兴建巴黎—奥尔良线的华工，为了工资发动抗议。1917年7月，两名罢工的华工竟然还企图在法国中南部的圣巴尔泰米勒普兰

① 虽然华工受雇到法国原本工资与一般法国工人相同（每天五法郎），但是战时物价大涨，法国工人成功争取调升工资。殖民地工人和华工的工资和生活费津贴从来没有同样得到调升，他们成为法国薪资最低的劳工。这是法国政府尽可能把这些外劳和白人工人隔离开来的主要原因，以免他们受到工会运动者的不良影响，会闹罢工、争取加薪。殖民地工人和华工因此比起欧洲工人，受到更严密的监控（encadrement or regimentation）。不过，前文已述，这挡不了华工的抗议。

(St. Barthelemey-le-Plain) 一带制造火车脱轨事故。

有些个案，争议竟导致暴力相向。这些事件透露华工开始出现团结合作的意识。1916年11月，勒克鲁佐(Le Creuso)的一名华工因为拒绝协助法国工人堆行李车，而被惹恼的法国工人打成了重伤。邻近营地的华工闻讯替他出面报仇。一名法国工人被揍，其他人躲进一家咖啡馆。愤怒的华工包围咖啡馆。根据法国官方报告，华工人数约两百人。咖啡馆老板十分恐惧，开枪打死一名华工，华工怒火中烧，当下就把咖啡馆砸烂。警察介入，并以杀人罪名逮捕咖啡馆主人，暴力才告落幕。不过，那个咖啡馆主人后来旋即获释。1918年3月，在鲁昂(Rouen)，法国士兵和华工打架，有个士兵躲进当地警察局，后来士兵朝攻打警察局的华工开枪。华工抗拒权威的一个实例是1917年，卢瓦尔河(Loire)地区菲尔米尼(Firminy)的五百名华工因为德军炮轰不停，处境太危险，拒绝工作。警方前来维持秩序，却遭遇华工的砖块投掷。根据官方报告说，虽然某些警察朝天开枪，但华工一点都不怕。这跟西方人认为华工是消极、驯服的“苦力”的刻板印象大相径庭。

战后，华工亦受雇到法国北部，参加饱受兵火蹂躏的地区的重建工作。因为法国政府救灾单位“紧急建设工务局”的组织作业能力低下，近五千名华工必须忍受在简易住宿条件，有些人必须睡帐篷，也有人必须在农仓或损毁的楼房栖身。^① 华工不满意这种环境，竟然占住农宅；他们不满意当局未能提供足够的燃料烧饭、取暖，干脆从铁路轨道偷木材，或从铁路仓库偷煤。为此，当地人士十分生气，认为华工危及“公共秩序”，要求将他们撤走。到了1919年底，北非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征调的夫役替代华工，因为这些人比较听话。

^① 关于这一点，见 P. Marcilloux: *Les chinois pillard, voleurs et assassins? ou la grandeur du travailleur colonial 1918 - 1919*, in L. Cesari & D. Varaschin (eds), *Les relations franco-chinoises au vingtième siècle et leurs antécédents* (Artoi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Artois, 2013), pp. 129-156.

结语

2010年5月，由法国北部港市，即滨海市洛涅（Boulogne）的海滨大学和比利时的伊普尔弗兰德菲尔德博物馆共同主办一战华工的国际会议期间，在伊普尔梅农门（Menon Gate in Ypres）放置花圈，用以纪念一战期间死难的华工。自1919年以来，几乎每个星期五，号兵都会在这里吹奏庄严肃穆的“最后岗位”（Last Post），以悼念一战阵亡将士。华工对协约国战事的贡献终于在这一追悼仪式中受到承认。现在到了史学界应该严肃研究这段史实的时候了。在一战期间，中国政府积极支持招募华工，是推动中国外交政策的世界观演进的重要篇章。同时，华工如何抵抗权威、抗议工作环境和待遇低劣，以及维护自身权益，这段史实也可以视为中国20世纪劳工史的重要环节。需要将华工历史放在19世纪以来中国劳工移民史的大脉络下考虑，也应该结合中国国内劳工运动和组织、罢工和民众抗议，以及日益上升的阶级及国家意识的历史中去诠释。

一战期间中国对德奥船舰的处置

王文隆*

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的表现之一，也是中国踏入国际集体安全的重要一步。然而，中国参与一战并非一步到位，而是经过两个不同阶段，一是欧战爆发之后由袁世凯宣布的局外中立，一是段祺瑞积极主张的参与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局外中立期间，对中国政府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在华的各参战国武装在中国境内冲突，又抑或如不能避免发生冲突，中国方面应该如何应对。参战期间，对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课题，转为如何接收、管制同盟国在华的国民、武装与财产。这两者都牵涉管理，但目的不尽相同。前者的目的在于各交战国在华之非武装状态的维持，后者的目的在于没收或代管具有“敌性”之对手国在华的一切。本文标题所谈的处置，实带有管理的意味存在，而管理就必须有一套准则，这一套准则就是当时为国际间依据习惯与惯例汇聚而成的国际法。国际法有平时和战时两种，分别适用于承平与战争状态。

1917年8月，北洋政府在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努力下，经由国会同意，对德、奥宣战，这是中国经历数年中立之后的表态。依据国际法的原则，即是中国不再位处中立，她对德奥在华资产的处理，由平时国际法一转为战时国际法，对于具有“敌性”的人、物得有处置的权力，对于双方曾签

*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署的外交条约也能全数废弃，由是得接收、管理敌产，得驱逐、看管敌侨。德奥两国在欧洲已经陷入泥沼，无力兼顾东亚的变化，也就使得中国自清末以来第一次有机会，成功地以宣战国姿态，接收敌产、敌资以及敌舰，而且在战争结束后还保有这一批船舰。

本文以中国外交档案、日本外交文书为基础，讨论环绕着宣战、接收与战利舰的这一问题，以几个个案为核心，试图讨论中国此时利用国际法的作为与成效。

参战、中立与海战时的权利与义务

国际法是国与国之间互动往来的习惯与前例所累积的，有一些基本的逻辑和原则。就国际社会而论，并非总是承平，难免会有成员剑拔弩张的局面。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行为亦是国际关系、国际冲突中不可避免的一环。国际法惯例中许以两国以上国家，在没有其他转圜余地时，以武力解决彼此争端，是为“诉诸战争权”（*Ius ad bellum*）。^①然因武器越发精良，动员规模越形扩大，战争所带来的影响与破坏越来越大，和平的呼声乃越来越高。

1899年第一次海牙保和会（Hague Peace Conference, or International Peace Conference of the Hague）中所通过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便是在促进和平为目标的前提下，要求冲突各方在选择武力对决前，先试着透过各种协商办法解决争端，而不以战争为唯一手段。但此一公约仅限制各国的“诉诸战争权”，并未剥夺各国选择诉诸武力的可能，为了使各国间关于战争、中立与宣战等情况有一套共识，该次保和会亦通过了《陆战法规及惯例公约》、《关于1864年8月22日日内瓦公约的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作为战争进行的依据。然而相关的规范仍不充足，因此在第二

^① 李广民、欧斌主编：《国际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4~175页。

次海牙保和会召开期间，除修正第一次保和会中的三项条款外，另外通过十项相关的补充或是规范，内容涉及陆战、海战的战争、救护、中立等细项。清帝国仅签署了其中八项约款，分别是《修正和解国际纷争条约》、《限制用兵力催索有契约债务条约》、《战争开始条约》、《陆战时中立国及其人民之权利义务条约》、《战时海军轰击条约》、《修正日来弗（日内瓦）红十字约推行于海战条约》、《海战时中立国及其人民之权利义务条约》与《禁止自气球上放掷炮弹击炸裂物之声明文件》。其中，《修正日来弗（日内瓦）红十字约推行于海战条约》的第21条，与《海战时中立国及其人民之权利义务条约》第14条第2款、第19条第4款及第27条保留。^①与海战相关联的有七项，可见该次会议对海战各项规范的补强具有相当关键的作为。而后，1913年时，牛津出版了《海战法手册》（*The Oxford Manual of the Laws of Naval War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Belligerents*）一书，汇集当时关于海战的相关国际法条规，成为当时普遍使用的参考素材。

由于中国并非一战爆发之始就参与战事，而是先采局外中立，静观局势，直到1917年3月才决定先对德奥绝交，五个月后再投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由是，在整个一战期间，中国依循的相关规范，便区隔为战时中立下处置交战国船只的办法，以及对于宣战后境内敌船的处置两类。战时中立下处置交战国船只的办法，主要遵行《海战时中立国及其人民之权利义务条约》，其核心概念与陆战中立的观念相仿，中立国不得偏袒某一交战国或是介入交战国间的冲突，且需肩负避免交战国在其境内爆发纷争的

^① 这些条规分别为：《修正和解国际纷争条约》、《限制用兵力催索有契约债务条约》、《战争开始条约》、《修正陆战规例》、《陆战时中立国及其人民之权利义务条约》、《战争开始时敌国商船之地位条约》、《商船改充战舰条约》、《敷设机械自动水雷条约》、《战时海军轰击条约》、《修正日来弗（日内瓦）红十字约推行于海战条约》、《海战中限制行使捕获权条约》、《设置国际捕获审检所条约》、《海战时中立国及其人民之权利义务条约》、《禁止自气球上放掷炮弹击炸裂物之声明文件》。详见唐启华：《清末民初中国对“海牙保和会”之参与（1899—1917）》，《政大历史学报》第23期，2005年5月，第63~65页。

责任；交战国也必须尊重中立国的“领土不得侵犯权”，不得在中立国境内启衅。^①

由此，中立国与交战国在海战方面的权利、义务，大抵上有两种概念。

第一是延续“领土不得侵犯”的核心概念，其范围包含领水和领空。交战国应在中立国领土、领水及领空避免违犯中立，亦不得在中立国境内捕获、搜索、居留、设置捕获法庭，或是利用中立国港湾发动攻击、设置无线电供陆地部队使用，如交战国船只遭受破坏，也仅能在有限度的情况下维修，使其恢复航行能力，而不得加强武装，如船只停泊于中立国港湾，除非有特许，也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中立国不得以任何形式协助交战国，且为谋中立的维持，得以武力禁止交战国势力进入中立国范围，而此举不能被视为是对交战国的敌对行为。

第二是关乎财产私有的概念，以私有财产应受尊重不得侵犯为原则。因此，中立国人民财产安全必须受到保障，且交战国在中立国境内的人民、财产也能避免遭到敌国掳捕、攻击。唯若交战国将军火、战略物资，或其他具有“敌性”的物品运入中立国境内，中立国有权加以扣留待战争结束后发还。而交战国遇难船只漂流至中立国海岸，或是由中立国船舰捞救，都必须由中立国加以扣押监管，战争结束后发还。^②

中立国一旦宣战投入某方后，上述原则为之一变，为避免敌对国家的人民、资产、武装或是船舶对己不利，宣战后便有看管、管理敌产、敌资与敌国人民的必要。由是，当中国政府宣战之后，对于盟国在其国内的资产、器械等能立刻恢复自由，但对敌产、敌侨等则加以扣押、收留，直到战争结束方休，这不仅使得中国与德奥的外交关系终止，除了具有私法性

^① 杜蘅之：《国际法大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21~623页。

^② 赵明义：《当代国际法导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454~462页。

质的权力、金钱与领土让予外，相关条约、协议的法律效力也中止。敌国侨民或是战斗兵员必须离境或是投入收容所中，其属财产也多受托管或是征用，直到战后方依照损失情况据以求偿、没入。

基于上述各端概括性的原则与处置方针，本文接着稍述德奥两国在华船舰情况，以及中国中立期间对于德奥船只的处置办法。

局外中立期间对德奥船舰的监管

各国舰艇在华基于不同功能，有两种不同种类。一类归军事管制，作为军舰派驻中国水域的，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庚子义和团运动之后各国在华配有陆海军，甚至设有基地，为国家政府财产；一类归民间所有，作为商船、工具船只在中国水域的活动，这些船只为私有财产。军舰具有“敌性”自无疑义，但因商船在各国海洋相关法规中通常会有战时受国家征用、改装，便于装备武器、载运战略物资的条文，因此，在战时，即便是私有的敌籍民船仍被视为具有“敌性”，在处置上也不得不有所安排。

（一）德奥军舰在华的概况

德舰在华有其历史渊源。1861年，英法联军入侵，普鲁士（1871年之后为德国）结集东亚船舰组建在华常驻海军，该海军曾因德国将注意力转移至非洲，一度解散。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德国重启对远东的兴趣，在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的支持下，德国海军部组织远东舰队，包括一艘SMS Irene巡洋舰和三艘老旧的小型舰艇，由海军少将霍夫曼（Paul Hoffmann）指挥，原无驻地。后因1898年3月，德国与清廷签署《胶澳租借协定》租借胶州湾，始以青岛为基地。至一战爆发之前，德国在华已有名为Scharnhorst（11616吨）与Gneiseman（11616吨）的两艘大巡洋舰，名为Nurnberg（3469吨）、Leipzig（3278吨）与Emden（3664吨）的小巡洋舰，名为Iltis（894吨）、Jaguar（894吨）、Tiger

(894吨)与Luchs(894吨)的炮舰,名为Tsingtau(223吨)、Waterland(223吨)、Ottar(266吨)与S-90的江舰,共计13艘大小船舰。除了驻扎在胶州湾的巡洋舰外,Ottar驻扎重庆,Iltis驻扎宜昌,Luchs巡航鄱阳湖,Tiger驻节长江下游,Tsingtau巡航广东西江。其中,以Scharnhorst为旗舰,司令为斯佩(Maximilian Graf. von Spee)。奥匈帝国在华仅有名为Kaiserin Elisabeth的小巡洋舰一艘,由舰长Richard Makoviz统领。^①

德奥在远东的兵力,远不如英日两国相加,加以距离过远,母国无法自欧洲支持,如能在战端爆发前自远东逃离,保存实力,将会是比较好的选择。恰逢1914年6月,德国远东舰队由旗舰Scharnhorst率领,进行例行性的年度太平洋巡航时,便先预留了两艘船舰在密克罗尼西亚的彭培(Pohnpei)。不久之后,欧洲局势渐趋恶化,德国舰队为免被困在闭锁的胶州湾基地,乃分别于八月初出逃,除了Emdem往印度尼西亚方向逃逸之外,其余巡洋舰都往大洋洲方向前进,有的成功地横渡了太平洋,有的被英军拦截,受损沉没,留在中国水域的军舰,除了几艘仍留驻胶州湾的小型舰艇外,仅剩无法越洋远航的内河江舰与一些小型炮舰。

1914年7月底,在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不到一个月内,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投入了战争,欧战爆发。欧洲母国的宣战号令,溢往其殖民地,迅速地蔓延至全球各角落。相对弱小的中国,在整体局势未明,且考虑欧洲各列强在中国境内有租界、租借地以及驻军的特殊情况下,大总统袁世凯于同年8月6日申令,以奥塞失和,欧洲各国兵戎相见,为维持远东和平与保障国人安宁幸福起见,决定严守中立,颁布中立条规,以1907

^① 《独国东洋舰队并奥匈国在东洋军舰职员表》,日本东京东洋文库藏,馆藏号:8242-008242。另外,关于德国东洋舰队在华的情况能参见大井知範:《第一次世界大戦前の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ドイツ海軍:東洋巡洋艦隊の平時の活動と役割》,《政経論叢》第77卷3~4期,2009年,第347~379页。

年的海战中立条约及陆战中立条约为据，要求国人一体遵行。^① 法规既定，袁世凯政府另立中立办事处，由国务卿徐世昌任主席，专司相关业务。相应地，英国以英日同盟为由，要求日本派兵搜索与调查在中国海面活动的德国船只。^② 日本颇有即将投入战事的态势。

（二）欧战爆发之后的发展

中国自清末以来，各地便有外国驻军、舰艇穿梭的特殊现象。按照中立条规，既然中国为中立国，在欧洲列强交相宣战之后，一则尽量避免偏袒某方，一则避免将战火引入中国，禁阻各国在华驻军直接交火，不得不要求宣战各方在华军队卸除武装。在华军舰的部分亦然，依照中立条规，如宣战国船舰未于24小时内驶出国境，便得要求其卸除武装。^③ 如英国在中国确定中立立场之后，停泊长江三艘兵舰皆卸下武器，先交太古洋行，后在中国官方的要求下，转交中国官方保管。^④ 相对于英国，德国的应变就显得慌乱了些。

（1）德国军舰。Ottar 原泊重庆，1914年8月初经江汉关往长江下游

① 《大总统申令》（1914年8月6日），《政府公报》810号，1914年8月7日，第77页；《敕令第112号：局外中立条规》，《政府公报》810号，1914年8月7日，第78~81页。

② 《英國ヨリ支那近海ニ於ケル独逸仮装巡洋艦搜索及破壊ノ為日本海軍出動要請ノ件》（1914年8月7日），《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三年》，第三册，第102~103页。

③ 《英德舰已卸武装惟意舰尚无动静由》（1914年7月31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5-01-001。

④ 英军确有撤退的准备。参见：“War office to General Officer Commanding, South China”, November 2, 1914, in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I, Series E, Volume 22, p. 12.

移动。^① 后该船与德舰 Vaterland 一同停泊下关幕府山下的草鞋峡。^② 两舰停泊下关不到 24 小时，为谋逃脱，先将船上的军械抛入长江，并即刻转售给北德意志雷特（Norddeutsche Lloyd）轮船公司，分别改名为盖得司华特（Landesvater）及门潜（Munchen），宣称是加入该公司经营的上海到汉口的商轮航线，不再是军舰，企图躲避保管。^③ Vaterland 改悬商船旗欲出口，但未成功，Ottar 亦然，两舰皆由中方派出建安舰与小鱼雷艇紧靠看守，不令行动。^④

虽然属于德军的 Vaterland 与 Ottar 都已经被看管了，但船上还有德国人留驻，加上仍有德国民船在中国境内移动，这触动了英国领事敏感的神经。1914 年 8 月 17 日，英领指控德国美最时洋行所属美大（Meidah）、美利（Meelee）两商船装运战略物资煤炭，要自上海往青岛援助德军，另有汽船着德（Tsingtau）、安平装运战略物资后不知所踪，此外还称 Vaterland 在南京偷拍电报通报军情。这些指控都是向中国官府告的状，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承担作为中立国的责任，禁止交战国船只在中立国境内载运战略物资与利用无线电。然而英国领事或许过疑，经当地官员查报，发现美大、美利两船仅是停泊，没有载运物资，船上除了机器师一名之外，其余德人

① 《德舰下驶等事》（1914 年 8 月 3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5-01-006。

② 《英轮卸武装事》（1914 年 8 月 14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5-01-026；《德轮停泊草鞋峡事》（1914 年 8 月 7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5-01-078。

③ 《南京德舰事》（1914 年 8 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5-01-094。

④ 《下关德舰商允出口事》（1914 年 8 月 7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5-01-075；《德舰已挂商旗由》（1914 年 8 月 7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5-01-076；《草鞋峡德舰事》（1914 年 8 月 14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5-01-080。

不是返国就是前往青岛，英国领事实际上揣测过度。^① 英国这么做大概是出于干扰的目的，不断透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国必须严守中立，质疑德国军舰在南京是否有确实监管，德国军舰是否卸除无线电设施，德国军舰是否私下仍拍发电报等，一再要求中国确认。像是停泊下关之德国兵舰是否有偷拍电报一事，中国官方为扫英领事质疑，乃令江苏交涉员杨晟与建安舰李鼎新出面检查。经报才知，之所以英国领事质疑德国船舰无线电拆卸不全，是因为其拆卸之后并未声明，才会造成误会，之后无线电设备移到领事署中的木箱存置，上盖封条，此事才罢。^② 英国不断催促中国要肩负起中立国的公平责任，经常举发德国可能违犯中立的举措。这使得德国怀疑，中国偏袒英国，才会老是找德国麻烦。

正当英德两方环绕着船舰的枝尾末节争执不休时，日本已悄悄地完成了对德作战的布置。日本以英日同盟为由，先于1914年8月15日对德发出最后通牒，再于同年8月23日对德宣战，两天后对奥宣战，成为第一个参战的非欧洲国家。日本宣战后，派兵自山东龙口登陆，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比照清末日俄战争时期的旧法，划出潍县车站以东为交战区，实行局部中立。^③ 此时，德奥仅剩6艘船舰仍在青岛，分别是 *Iltis*、*Jaguar*、*Tiger*、*Luchs*、*S-90* 与奥匈旗舰。奥匈帝国旗舰在青岛战役中，遭到日军海空联合轰击，于9月3日沉没，其余各舰也分别战毁或是自沉，仅 *S-90* 幸免。

10月18日，*S-90* 号外逃途中，曾发射鱼雷，成功地袭击日舰高千穗，但因遭追捕，转往山东南方的日照后搁浅炸裂，船员全数舍舰逃出。因日照为交战区外地区，这一艘船本应为中国所看管。未料，但却遭尾随

① 《上海德舰事》（1914年8月17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5-01-057。

② 《南京德舰无线电事》（1914年9月21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5-02-013。

③ 《对德最后通牒文》（1914年8月15日），《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三册，第145页。

的日本驱逐舰日千、最上两船兵员，招募中国民工拆卸 S-90 船上枪炮，并悬挂日旗作为战利品。仅船上德籍船员 64 名身免，由中国官方安置于南京。^①

原停泊西江上游的 Tsingtau 舰，在 1914 年 8 月 4 日，搭载德人，离开广东北上青岛，补充兵员，俄法两领事向粤海关抗议，要求中国必须将该船缴械并加看管。^② 两天后该船转停广州，卸除武装，拆除大炮撞针，卸下无线电设备。^③ 依照广州当局指示，停泊黄埔，交海关洋员保管，仅留德人 4 名，华役 10 名。^④ 该轮汽盘心钢轴拆交粤海关保管，每周至少由粤海关黄埔分关总巡洋员登船检查一次。^⑤ 广东德领事承诺，在欧战期间，非经中方许可，该船都不会驶离黄埔。^⑥

日军于同年 11 月 7 日攻下青岛，胶州湾内的德奥船舰全数覆灭。德国留在中国的军舰，此时只剩下长江上游的 Vaterland、Ottar 及在广东的 Tsingtau。由于中国对外宣布中立，因此这些船舰仍得在华停泊，而也因为这三艘船所在位置，都在中国领水之内，受到中国以中立国身份的看管与保护，才得以暂时保存下来。

(2) 德奥民船。欧洲各国交相宣战，德奥政府与商行为避免在远东的资产有被占领或没收的风险，相关脱产的传闻不少，一度传出德国打算将

① 《德水雷艇事》(1914 年 11 月 4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5-04-029。

② 《粤关德兵轮事》(1914 年 8 月 4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5-01-008。

③ 《广东德舰解去武装事》(1914 年 8 月 6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5-01-013。

④ 《扣留德兵轮办结情形由》(1914 年 8 月 9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5-01-024。

⑤ 《咨陈保管德国青岛兵轮情形由》(1914 年 5 月 3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6-02-005。

⑥ 《修理停泊广东德舰事由》(1916 年 4 月 10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6-04-007。

山东利益核心的胶济铁路产权转卖美国，但后来证实消息不确。^① 其他动产与不动产也都有出脱情形，不过，商船的情况较为特殊，并不是仅由简单的买卖交易便能出脱，即便该商船原属民船，仍有因各国多有战时商船得由政府征用、改装的规定，加以商船亦得载运兵员、战略物资，因此海牙保和会中，针对商船安置炮位、运送军需，皆应加以防范。^②

德奥商民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同盟国在华民船确实有遭协约国船舰追捕的可能。如德籍商轮姜维自厦门出口后，遭遇日本舰艇，避回厦门港。后因遇到台风，希望移泊，却被英国领事状告，要求中方查明该船是否移出停泊地，招募华籍船员，甚或是企图施放水雷情事，只好停泊不动。^③ 上海另有奥籍民船三艘，皆为欧战爆发前抵达上海，分别为 Silveria、Bohemia、China，抵达时间分别在 1914 年 7 月 30 日、8 月 4 日与 8 月 5 日，自此滞留。^④

对于德国商人来说，除了担心船只被国家征用外，也担心资产因战祸而损失，或是图免除因战争期间协助德军的责难，最好办法就是改挂其他中立国旗帜持续运行，或是干脆转售出脱。要卖船，还得快，因为德籍船只被视为具有“敌性”，在公海可能会遭英日舰艇追捕，因此为了脱离“敌性”，出售给中立国，改挂中立国船籍确为良方。

但因交战国经常利用此一漏洞，早在 1909 年 2 月 20 日的伦敦条约第 56 条中便称，参战国宣战后，如该国国籍船只之销售是要消灭“敌性”，

① 《山東鐵道米國へ讓渡説ノ信賴性ナキ件》(1914 年 8 月 22 日)，《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三册，第 356 页。

② 《德战船改作商船由》(1914 年 8 月 11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5-01-026。

③ 《德船姜维事由》(1916 年 10 月 13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6-04-028。

④ 《查明奥商船停泊处由》(1916 年 6 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6-04-010。

则买卖无效。因此，当英国探知，在汕头两艘德籍船只名为 Helena 与 Frinmph，透过德商爱礼司洋行居间，欲图售予华商时，立时抗议，并举德船欲出售与美商的前例，认定此举并不能避免该船在公海上被英舰攻击，希望华商不要出面洽购。^① 同样发出警告的，还有俄国、法国、日本与比利时，甚至表明如遭该国船舰劫掠时，不能负责。^② 端看该案与前案，似乎有一个分别。本案不全然是单纯的船只买卖、船籍更改，而是有点像“借壳上市”，透过看似交易的买卖，让该船只有可能安全出港。但在各参战国表明不欲保证已出售、且改挂中立国船籍之前为德奥民船的船只安全后，该议最后只好作罢。^③

德奥船只被看管久了，由于没有运行，多少会有锈蚀、损伤的情况发生。中国中立期间，对于交战国船只，无论是否为兵船抑或只是商船，为免民船随后被改装为军舰，都不加以维修。^④ 但依照一般处理交战国船只的原则，又必须维持船只得以移动的基本能力，因此当 Tsingtau 号以该船船底已有蚌卵，如不添加新油漆，将致损害为由，引第二次保和会中立国于海战与中立义务第 13 条 17 款维修以保存行驶力时，便得奥府同意修缮。^⑤ 待姜维被楚同舰监管后，也为避免船底锈蚀使得船只沉没，乃在海

① 《中国资本团商购汕头德轮船事》(1915 年 11 月 7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6-03-001。

② 《华商购德船事》(1915 年 11 月 9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6-03-003；《华商购德船事》(1915 年 11 月 10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6-03-006。

③ 《华商购德船事》(1915 年 11 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6-03-008。

④ 《暂缓修理德国商船事由》(1916 年 2 月 23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6-04-002。

⑤ 《修理停泊广东德舰事由》(1916 年 4 月 10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6-04-007。

军部的同意下进行修复，由福建督军与省府垫付修缮费用，待战后与德国催纳。^①

然而，山东战役期间，中国虽力图担负中立国的责任，但实际上却较同情协约国，也为了不想屈从于日本，希望能以其他方式参与协约国阵营。^② 这点能从尚未参战，便以“以工代兵”方式，同意法国在华以私营公司为名，招募华人前往法国，填补法国青年人力因参战所遗留的工商产能空缺见得。法国方面由陶履德招工团（The Truutil Mission）等民间组织着手，中方的对口机构为积极推动华工出国的梁士诒与中国实业银行行长王克敏创立的惠民公司。^③ 这项华工计划自1915年12月便开始酝酿。1916年8月24日，由中国出发前往法国的华工到岸，而后陆续透过英法招募的华工，共约10万人前往欧洲。

国内对参战与否意见纷歧，加上日本极力阻挡中国参加协约国，因此在一战初期，中国不仅未能实质参战，即使在法律上也无法对德奥宣战。然而，北洋政府较为同情协约国的基本态度，以派出华工的方式参与战争，的确影响了她想维持中立的表象。

对德绝交后的管收与参战后的没入

德国以无限制潜艇政策作困兽之斗，袭击了美国的露西坦尼亚号（RMS Lusitania），造成船上人员大量死伤，作为中立国的美国对此表达强

① 《德船姜维扫除事希转电该省督军等转飭遵办由》（1917年4月2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1-028；《保管德船姜维号事》（1917年7月30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1-038。

② 关于此点的分析，可参见徐国琦：《一战期间中国的“以工代兵”参战研究》，《21世纪双月刊》，第62期，2000年12月，第53~54页。

③ 陈三井：《华工与欧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

烈不满，促使美国在1917年2月宣布对德绝交。不久后因德国怂恿墨西哥对美国宣战，并许以美国西南回归墨西哥的愿景，美国遂于同年4月对德宣战，拉丁美洲诸国也随之跟进。中国虽未受到无限制潜艇之害，但对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政策同表抗议，于同年3月14日宣布对德绝交。绝交为宣战前的一步。

然而，副总统冯国璋对于绝交到宣战之间的状态，颇表疑义。认为绝交仅是双边关系的中止，条约关系仍能持续，避免因绝交影响中德间长年的友谊。^① 而包括徐树铮、张敬尧、倪嗣冲等北洋官僚、广州政府、亲国民党议员等，对于北洋政府所铺下绝交后即将宣战的规划，都采不同意见，最根源的担忧在于不知鹿死谁手，担心中国因宣战而受到不良影响。^② 简言之，便是应该要把赌注押在哪一边的抉择。因而，宣布绝交之后，中国国内还花了相当大的气力进行意见的整合。

若依段祺瑞原本的计划，绝交之后不久便要宣战，因此当绝交之事已经箭在弦上时，外交部先开始探询其他未于1914年宣战之国家如何处理与德奥间船只。意大利便是未即刻宣战的一例，因此外交部于1917年3月初发电询问驻意大使王广圻。^③ 王广圻复称，意大利于1915年10月对德绝交后，11月11日令准将德船37艘收用，给予价款。^④ 美国断绝与德国国交之后，由菲律宾总督下令没收德国在菲律宾之17艘船，并登记所有德侨

① 《冯国璋拟中德绝交始末及其利害意见书稿》，《中华民国史档案数据汇编》，第三辑，第1170~1171页。

② 张鸣：《共和中的帝制：民国六年中国社会的两难抉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31~34页。

③ 《意德绝交宣战前有无没收在意德船希查复由》（1917年3月2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1-001。

④ 《意德绝交时只将德船收用宣战乃没收由》（1917年3月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1-002。

名录，德领在菲律宾的工作移拨瑞士驻当地领事兼管。^① 巴西的做法相对粗暴，在6月1日宣战之后，所有德国在巴西的商船都被没收，改悬巴西旗帜。^② 美国本土的做法与巴西相类，收用德奥船只后改悬美国国旗。^③ 北洋政府也打算比照办理，收管德奥在华船只。

北洋政府的动作比较特别，它是先行接管民船，接着才是接管军舰。北洋政府在宣布对德绝交前后，开始陆续接管德奥在中国领水停泊的船只。这般做法或许也合理，毕竟与德奥绝交之后，与德奥间的条约关系不存，自然内河航行的权利也不复存在，确有收管的几分道理，但处置上或许操之过急。

北洋政府发出绝交通告的时间为1917年3月14日中午12:00。按理说，发出绝交通告之后，德奥在华军舰或是民船都有24小时内自行离开的权利，且中国应该保留充裕的时间、燃料使其离境。但在实际操作上，北洋官方担心德奥船舰遭到破坏，管收的动作或许急躁了些。在绝交照会正式公告前，当日上午9:00，停泊于上海的四艘德国船舰，名曰阿伯加、西江（Sikiang）、美大（Meidah）、美利（Meelee），在未经知会的情况下，遭到中国海军收管，船上人员全被驱逐。就国际法来说，接管时，中国官方给予德国的绝交照会还没送达，德国与代管德国在华利益的荷兰代表皆未收到正式通知，此举几乎是在中立期间强行接管，因而招致代管德国在华利益的荷兰领事照会抗议。^④ 北洋政府发出绝交通告的三个小时后，江

① 《斐督没收德轮由》（1917年3月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1-003。

② 《呈送巴西公布收用德国商船条规四则事》（1917年9月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2-037。

③ 《复十二日电收用敌船事》（1917年9月15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2-043。

④ 《抗议收管上海德船由》（1917年3月1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1-006。

亨舰驶往厦门，接管停泊于厦门的德国商船姜维。^① 荷兰对于在厦门的姜维号被接管，因未及 24 小时的惯例，也同样表示抗议。^② 除了大船之外，对于小船的接受程序就较无争议，如在九江的德籍趸船，则在 4 月 2 日被当地警察厅派员接收，经警察厅与船主共同列出财产清册后签字确认，因德领已经返国，清册交驻沪荷领存查。^③

接收德奥民船期间，爆发了一段插曲。北洋政府公告与德奥绝交时，南方的广州政权并未随即跟进。德国在广州的领事还在斡旋，希望以提供革命经费为饵，阻挠广州政权对德宣战。作为广州政权领袖的孙中山，面对其治下经费困窘的局面，一度犹疑。然而，依据中立条规被海军管制于黄埔的 Tsingtau 号，却于 3 月 16 日，在留守的德籍人员担心广州政权如跟进绝交，船舰即会被管收的情况下，引爆船上火药，自炸半沉。粤府只好安置德籍人员，由广东省府与督军府出面签收该舰，另指派永翔舰设法拖救。^④ 这一插曲，使得北洋政府海军部振振有词地要求，必须尽快管收德奥船舰，避免德奥人士蓄意破坏。

代管德国在华利益的荷兰，面对北洋当局在各地接管德国船舰一事，屡以未合程序发出抗议。海军部面对荷使贝拉斯（Frans Beelaerts van

① 《接管德船姜维情形由》（1917 年 3 月 15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1-004；《上海厦门收管德船由》（1917 年 3 月 27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1-018。

② 《抗议厦门强收德商德商轮姜维号由》（1917 年 3 月 17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1-009。

③ 《收管九江租界及德国趸船由》（1917 年 6 月 22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1-035。

④ 《抄送本部邓视察聪保暨永翔陈鹏翔等报告 Tsingtau 炸沉情形由》（1917 年 3 月 22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1-015；《查收德舰 Tsingtau 对象抄送中德文列表请备案由》（1917 年 4 月 16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1-024。

Blokland, 1872—1956) 的抗议, 引以 Tsingtau 号的前例, 回复称管收是为安全目的, 预防船舰被德人私自炸毁, 并没有侵夺私产之意, 且事实上确有搜出炸药情事。^① 对此, 荷使表示理解中国正当防卫的用心, 但仍认为应先通知德领, 才是循程序的做法。^② 外交部的国际法顾问狄谷 (De Codt, H.), 针对荷使所发的抗议, 做出意见称, 自德船上搜出炸药为事实, 虽不能确定该等炸药用途, 但炸药本不属于一般货品, 如是在绝交前先与德使沟通, 亦无充足时间能查验, 绝交后更无沟通之可能, 因此能将中国方面的举动视为紧急处置之法。^③ 荷兰公使对于中国方面的辩解并不接受, 复称青岛舰为军舰, 自行炸沉, 所依循的是德国海军部的普通训令, 不应作为中国管收其他德籍民船的理由, 且仍对中国方面在手续上的欠妥表示异议, 要求中国方面除将收缴的器物归还外, 并要求妥为安置德籍船员。^④ 对此, 外交部方面回复称, 因中国有准予其他国家船只内河航行的特权, 又有内河布防军舰的情况, 这些都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因此以海口能许敌国船只先行离开的前例, 在中国并不适用为由回绝, 认为海牙公约在中国并不能适用, 反驳荷使抗议。^⑤

双方在国际法见解的不同, 并没有获得共识, 北洋政府管收德奥船舰的脚步却没有停止。北洋治下区域, 对于军舰的接收时间较晚, 南京下关所停的两艘德舰, 因担心绝交时即行捕撈会发生冲突, 副总统冯国璋表

① 《厦门收管德国商船由》(1917年3月24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北洋政府外交档案, 档案号: 03-36-028-01-016。

② 《上海厦门收管德船事》(1917年3月27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北洋政府外交档案, 档案号: 03-36-028-01-020。

③ 《关于德国商船事件暨中国自卫之方》(1917年4月7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北洋政府外交档案, 档案号: 03-36-028-01-023。

④ 《德船 Tsingtau 事》(1917年4月26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北洋政府外交档案, 档案号: 03-36-028-01-029。

⑤ 《中国收管德奥小轮并未违背国际公法希即酌复和使由》(1917年9月2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北洋政府外交档案, 档案号: 03-36-028-02-050。

示，希望等德领降旗撤馆之后再行动作。^① 由是，海军部启动接管的时间在4月18日，由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饶怀文指挥，交宁德舰执行，经清点船上物品，列具清册，由中德两方代表签字，同样交由驻沪荷领代为查收备案。^②

北洋政府宣战之前，为求掌握德奥在华资产情形，备有敌侨贸易清单，有各商行店名、支店、地址跟营业许可时间。^③ 宣战之后，因德商失去银行、运输与保险的便利，仅能以存款周转、存货销售，因此商贸断绝，商家渐少。^④ 经统计在华德奥船只，德国共有在南京军舰两艘，在广州军舰一艘，在汉口炮艇一艘，在日照有被破坏之鱼雷艇一艘，其他尚有商船，有一艘停泊厦门，五艘停泊上海，两艘停泊汕头，奥国在上海有商船三艘。^⑤ 另还有一些属于船公司的小型趸船。然而，这份统计的报告或许不确，就资料上看来的船只不止此数。镇江地区，登记在美最时洋行（C. Melchers GmbH & Co.）服务之德侨兰枷名下的上海趸船被交通部接管；单锡克原拥瑞亚洋行及利通小轮公司，宣战后公司停顿，所属船只江通小轮及海州拖船被交通部接管。^⑥ 美最时洋行在下关经营大北轮船公司，

① 《德船派员监视事》（1917年3月15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1-021。

② 《海军收管德舰已将物件清册送交驻沪荷领由》（1917年5月14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1-031。

③ 《呈报宣战后敌人在山东贸易状况》（1917年11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19-04-017。

④ 《遵令调查敌人贸易状况列表呈复》（1917年12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19-04-027。

⑤ 《德奥兵舰商船事》（1917年8月1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2-021。

⑥ 《呈报本埠敌人贸易状况事》（1917年11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19-04-010。

一艘所属趸船被海军总司令处收管。^① 江苏另有奥国轮船公司 (Austrian Lloyd), 然所管船只数目就目前资料无法确定。^②

商船虽名目上不能为交战国没收, 仅能于战时管收, 战后是否发还各国情况不一, 然当时该等德奥船只由中国收管, 北洋政府认定有处置之权, 因此由外交部拟定租赁办法为据, 活化这些商船。^③ 所有收管之德奥船只的租赁、交易, 非经中国官府同意, 一概无效。^④ 为了便于管理德奥船只, 还成立内河德奥船只管理局, 局长由津浦铁路管理局总办赵庆华兼任。^⑤ 赵庆华也得到交通部授权, 与其他有意租赁德奥商船与码头的公司接洽, 1917年7月间, 便谈妥了一笔由英国太古洋行租借德国停泊镇江趸船上海号及原属北德公司水面的租借合同, 商订每年8月1日起算租金, 年租金分别为5500银圆与上海规银750两, 太古洋行并愿负担部分保险费用计上海规银450两, 合同以欧战结束为期, 如要提前解约亦能于三个月前知照停止。^⑥ 该批民船, 至少有十艘转由该处管理, 命名起自华甲, 终于华癸。

然而, 代管德国在华利益的荷兰公使代德国提出抗议, 认为北洋政府

① 《遵令调查敌人贸易状况事》(1917年12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北洋政府外交档案, 档案号: 03-36-019-04-024。

② 《遵令调查敌人贸易状况列表呈复》(1917年12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北洋政府外交档案, 档案号: 03-36-019-04-027。

③ 《收管敌商船办法事》(1917年8月17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北洋政府外交档案, 档案号: 03-36-028-02-021; 《处置德奥商船办法》(1917年8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北洋政府外交档案, 档案号: 03-36-028-02-023。

④ 《照复在华德奥船只租买契约非经允准概属无效由》(1917年8月21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北洋政府外交档案, 档案号: 03-36-028-02-028。

⑤ 《咨送内河德奥轮船管理局与太古洋行签订租用德趸船上海号合同由》(1917年7月21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北洋政府外交档案, 档案号: 03-36-028-01-037。

⑥ 同上。

违反了海牙国际公约不得收管民船的惯例，且称如宣战，亦应给予敌国商船离开口岸的机会，而非径予接收。荷兰公使的抗议，并非没有道理，如依照《关于战争开始时敌国商船地位公约》内容，宣战后仍应留予敌国商船合理离境的时间。此外，虽能收管与借用收管敌国商船，但也是以战后归还的前提下收用，如是借用则有赔偿责任。^① 北洋官方在调查了其他国家的做法之后，仍决定收用德奥船舰，唯其手段或有瑕疵。直到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宣战，这一些在无国交状态下被看管的德奥船只，遂被北洋政府全面管收。

战利舰的保留与国际法上的冲突

中国宣战之后，关于德奥船只没入，是否将其改列中国船籍，因无国内的前例可循，只能比照其他国家做法，先设立捕获审检所，以符合程序，避免战争结束之后引发疑义，落德奥口实。^② 然而，在战争结束之前，北洋政府实际上已令德奥船只活化利用，海军部似乎也没打算归还，因此在1917年12月间，拟议要以海上捕获规程为据，全面接收在华德奥船只，不过因为国际法顾问有贺长雄持反对意见，认为内河并非海洋，适法性上可能有疑问，且如不加捕掳，也就没有交付审检之必要。原本，如以第二次保和会陆战条规第53条第2款来说，在内河航行的小汽船并不能没收，但海军部以在华内河航行为特权，在宣战时德奥在华该特权已经消灭，因此内河航行之德奥船只失去享有特权的权利，可以条约消灭为由没收，因此不适用于海上捕获规程。然而，外交部方面则持不同看法，认为依照该

① 《收管敌船事》（1917年9月18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2-047；《关于战争开始时敌国商船地位公约》。

② 《敌船事》（1917年9月29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8-02-055。

条规，只可取消德奥船只内河航行的特权，加以押收、但在战争结束之后必须归还以及决定赔偿。赔偿只有针对该船只的损害进行，对于营业损失则以德奥船只失去内河航行特权为由消灭。另依照当时中国所颁布的条规，德奥船只管收期间中国政府有管理之责，将之出租能收租赁利益填补管理费用，如果不敷则由外交部垫补，于将来要求德奥双方拨还。^①

当战争行将结束，北洋方面虽知依照国际惯例，船舰应该归还或是价购，但已决定不拟交还德奥船只，故特于战争结束前，由外交部致电陆征祥，要其在和会中做此不交还德奥船只的表示。^② 陆征祥复电称，没收之德奥商船与其附属品能作为抵偿赔偿之用，况且其他国家没收更多，中国应有普通办法能加援引，应无问题。^③ 遂以抵偿的方式，将该批德奥船舰收用，将部分船舰编入中国海军行列。

Vaterland 改名为利绥，Ottar 改名为利捷，重新武装，配属长江第二舰队服役，后在 1919 年以江舰形式，为江亨、利川两舰拖带，冒险渡海，经西伯利亚转往哈尔滨，编入东北海军。利捷于中东路事件时，在三江口战役中被俄军摧毁；利绥虽被保全，但在伪满洲国统治期间，被编入伪满洲国海军，直到 1942 年因过于老旧而被废弃。^④ 10 艘被收管出租的德奥商船，挑选其中较为堪用的 5 艘，更名为普安、定安、靖安、华安、克安，编入海军租船监督处为运输舰，另有拖船命名为利通，继续工作。部分船

① 《处置敌国在内地船只案》（1917 年 12 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9-05-019。

② 《没收德奥船拟不交还请在和会提议》（1918 年 3 月 28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9-05-091。

③ 《没收德奥商船拟不交还一案将来自有普通办法可以援照》（1918 年 4 月 11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外交档案，档案号：03-36-029-05-092。

④ 陈悦：《民国海军舰船志（1912—1937）》，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 年，第 38~48 页。

舰在对日战争期间，为了阻挡日本海军沿江进攻，自沉于江中。^①

没收与管理敌国船舰，或是在收管期间略有瑕疵的情况，中国官方的做法并非首例，而是比照其他国家的做法为之。在北洋政府即将做出收管德奥船只前，先行要求各地驻馆搜集相关的做法为参考。意大利在宣战同时，依照其国内法，立刻取消所有敌国商船自由出入港湾的权利，如该商船有改装为军舰可能，得有直接拏捕扣留的权力，敌货则能扣押，于战后交还。扣留之敌国商船，得在该国海军局作临时登录，改挂意大利国旗供航海之用。葡萄牙政府则因其国内船舶不足，运赁腾贵，为顾及国家经济起见并谋当时紧急问题——食料品问题之解决方法，于宣战次日即征用在其国内港湾避难德国船舶六十余艘，将其充公使用，船舶院与其他之官厅均可将该船舶改装供沿岸或外国贸易之用或出租。泰国的做法也与这两个国家相类，因此北洋政府也比照办理。

由是，即便保和会中已经对于敌国商船有明文的处置办法，甚至获得大部分国家签署同意，然而在实际操作时，多仍以各国国内法为据，直接管收敌国船舰，改悬各国旗帜，或是以租用、充公的方式使用。战后北洋政府争取赔偿时，也依照其他国家的做法将收管的敌国船舰作为赔偿抵用，将收管的作为合法化，纳为资产。

结语

中国政府自清末以来，第一次以战胜国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社会，这是中国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从一个三等国家，逐渐步向重要大国历程的起始点，而这也是第一次利用战胜国身份，攫取战利品，拥有分配、接收战败国资产的权力，进而保有战利品的案例。

^① 中国军舰博物馆：<http://60-250-180-26.hinet-ip.hinet.net/ming/2202.html>。

中国在一战初期，一直处于观望状态，不愿贸然投入，仅采中立姿态，这除了难断孰胜孰败之外，更是受限于中国国内的特殊局面使然。中国自庚子以来便有外国军队在华常驻，如贸然投入任一方，难保不会有敌对方在华直接启衅的可能。如彼此间母国宣战，中国在国内政治局势动荡的情况下，虽不易达到国际法中弃予中立国之责任与义务，但仍得尽力为之，而日俄战争期间清室实行中立，或许也是援引的妙方。由是，当中国政府面对举发时，都不得不尽快处置，一则维护作为中立国的平允，一则要显示中国肩负得了应负的国际责任，避免其他国家对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能力的质疑。然在北洋政府决定以先绝交、再宣战的两步骤参战时，在接收德奥滞华船舰时，却显得慌乱而仓促。

中国的目的实际上是想保有这些德奥船舶，因此第一步是要避免这些船舶乘隙脱逃。实际上，这一些德奥船舶在中国中立期间，为避免出海之后遭到英日海军攻击，全都停泊港湾不动。即使北洋政府在绝交时，依照国际法惯例许其 24 小时内离境，也难保不会有遭到袭击可能，但如此则中国没有接收与利用这些船舶的机会。第二步，是要避免德奥船员自沉或毁坏船体，行焦土作为。因此，中国官方在尚未将绝交书送达之前就强行接收，或是绝交书甫经送达便赶紧抢接，虽然都违反了国际法的惯例，而遭到代管德国在华权益之荷兰公使抗议，但也是的确是选无可选的选择，如此方能达到保有船舶的主要目的，到了宣战之后，更能名正言顺地接管与利用该批船舶。

北洋政府接收德奥船舶的瑕疵，在德奥无暇东顾的情况下，虽有国际法上的争执，然因战争由协约国获胜收场，中国比照其他战胜国对德奥资产的处置模式，将这批德奥船舰以抵偿名义收归国有，维持中国对德奥绝交之初，要保有德奥船只的目的，而战败的德奥两国也只能吞忍。国际法虽为国际秩序的根本，然因没有固定的法条，仅有原则、惯例与判例，最后只能是胜者的诠释，而中国正受惠于这胜者的诠释，消弭了当初接收时的瑕疵，最后保住了所有的德奥战利船舶。

青島之役（1914年9月2日— 1914年11月7日）回顧

王玉麒*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Erzherzog Franz Ferdinand）及其妻蘇菲公主（Prinzessin Sophie）遭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分子行刺，双双身亡。一個月後（同年7月28日），奧皇法蘭茲·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簽署了對塞爾維亞的宣戰書。隨後，列強紛紛加入戰團，形成了以德、奧、土耳其、保加利亞組成的“同盟國”（The Central Powers），和以英國、法國、日本、俄國和意大利為主的“協約國”（The Allies，美國和中國加入較晚），第一次世界大戰於焉爆發。

進行了四年多的一戰，參戰國雖遍及全球，主要戰場却在歐洲。其他發生戰事的地方多在非洲和近東地區，基本上是列強爭奪殖民地的性質。而在亞洲，主要的地面和海上戰爭却發生在中國的青島和附近海域，攻防雙方，分別是屬於協約國的日、英和同盟國的德、奧。

中國史書，對一次大戰後凡爾賽合約承認日本接收德國對膠州灣的利益一節，大多記載詳盡，但對日本以戰爭手段，強占德國膠州保護區的事實，却語焉不詳，致使國人对“青島之役”多無所知。

* 旅居奧地利，多年從事現代軍事史研究。

一、日本参战的动机与过程

欧战爆发当时，主要角色都是欧洲列强，战场也在欧洲。远在东亚，从明治维新以来就以普鲁士为师，与德国关系密切的日本，竟会对德、奥宣战，大动干戈。说穿了，就是乘火打劫，以参战手段谋取它自身的国家利益。

甲午战争让日本得到了朝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琉球等殖民地，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不但确立了日本的强权地位，并且让它取代了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的势力，开始向中国东北派遣驻军，进行移民，开发铁路，兴建矿产、实业，有计划地把东北变成它的殖民地。

20世纪初，英国为确保在远东的利益，与日本缔结了同盟。缔约后，英国基本上对在东方的殖民地已无后顾之忧。为应付日渐强大的德国海军，在一次大战之前，英国把配置在远东的海军主力移往欧洲，让日本海军填补了英国在亚洲的角色。

欧战爆发后，英国力邀日本参加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共同攻略德国的胶州保护区。为促使日本参战，除了英国给它提供了一亿日元的金援外（当年日元与美元汇率为1：1，日本1913年全年出口总额六亿三千二百万日元，进口七亿二千九百万日元），协约国并承诺向日本采购军备物资（仅1914年8月至1915年5月间的金额为二亿二千七百万日元）。

日本早思染指山东，从地缘上看，青岛等于是山东的门户。日本势力如能进入山东，等于一把尖刀插入了中国的核心。而就青岛本身价值而言，该地经过德国十六年的建设，已从一个两万人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人口十七万（当时中国第六大城）的繁华港都。它的都市建设都以德国都市为范本，有下水道、自来水厂、发电厂、水电管路、柏油马路、绿地、公园。基本上是个小而美的德国城市，德皇威廉二世也称之为“德国文化模范区”。从1902到1911的十年间，青岛港的货运吞吐量从每年五十万吨成

长到两百万吨。在1913年中，仅仅是悬挂德国旗的商船就有三百一十七艘进出该港，屯积的物资总值达两亿三十万马克。德国为了使货物从港口进入内陆，并运输德国所需要的煤及铁矿，甚至建筑了从青岛到济南，长约四百公里的胶济铁路（德人称为“山东铁路”）。在军事上，青岛是德国海军东亚舰队的主要基地。德国在此建有良好的军港设施，补给系统和相当的舰艇保修能量。

对青岛的作战估算：由于德国在该地军力有限，且孤悬亚东，远离母国，不可能获得奥援，而日本却是占尽了兵力和地缘上的压倒性优势，只须付出极小代价，即能获得从国家战略到经济层面的各种利益。在这样的考虑下，日本决定参战。

二、序幕

英国在1914年8月14日对德、奥宣战。15日，日本就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中、日两国海域的军舰全部解除武装，并限于9月15日前，把胶州德国保护区无条件交付给日本，以便“日后交还中国”。当日，德国驻华代办回复日方：“德国可考虑将青岛交还中国。但日本也应把台湾交还中国。”

被反将了一军的日本，唯恐德国真会这样做，打乱其战略布局，故于8月16日训令其驻华代办小幡西吉警告中国政府：不得擅自由德国手中收回青岛，否则将视中国此举为“破坏中立”。

8月23日，日本以最后通牒时限已到，尚未获得满意答复为由，正式对德宣战。随后，德国驻华代办也照会中国政府，愿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还给中国。但事先受到日本威胁的袁政府不敢接受，反电请亦属中立的美国代为接收，再转交给中国。可是在美国还没有回复前，日本已采取了军事行动。

8月27日，日本第二舰队（司令长官加藤定吉中将）的主力，计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十一艘，以及英国主力舰一艘，驱逐舰一艘，开始对青岛实施海上封锁。序战于焉展开。

三、双方军事序列

1. 德军。

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给青岛的最高指挥官总督麦尔-华德克海军上校（Kapitän zur See Alfred Meyer-Waldeck）下达了“坚守至弹尽援绝”的指令，并将北京与天津的守备部队全数开赴青岛。此时，德军在青岛的总兵力约4700人，其中包括：

1.1. 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下辖四个陆战步兵连，一个野战炮兵连，一个骑兵连，一个工兵连，官兵1400人。

1.2. 海军兵员约3300人，含舰艇：五艘炮艇，一艘鱼雷艇，以及奥匈帝国巡洋舰伊丽莎白皇后号（K. u. K Kaiserin Elisabeth），四个要塞炮兵连及四个机枪连。

青岛的炮兵要塞有五处，均建有钢筋水泥掩体，部分甚至有钢甲炮塔。火炮包括四门28 cm 要塞榴炮，四门24cm、四门21 cm 加农炮，七门15 cm 加农炮，六门12 cm 要塞炮和两门10.5 cm 炮。奥舰伊丽莎白皇后号的八门15 cm 舰炮也被纳入防御系统。

原驻青岛的东亚舰队，含两艘装甲巡洋舰 SMS Scharnhorst、SMS Gneisenau 及三艘轻巡洋舰，在8月10日就离青转往南太平洋及南大西洋作战，因此并未参加青岛保卫战。

2. 日、英联军。

2.1. 日军。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官加藤定吉中将，辖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十一艘，水上机母舰一艘，大小口径舰炮一百门。陆军

第十八（久留米）师团；师团长神尾光臣中将，辖步兵三个旅团（六个联队），各型火炮一百四十二门及工兵与后勤支持单位，总兵力 24500 人。

2.2. 英军。指挥官为巴纳迪斯顿准将（Brig. Nathaniel Walter Barnadiston），辖南韦尔斯边防第一营，第三十六锡克营，兵力 1500 人。海军主力舰凯旋号（HMS Triumph）及驱逐舰 HMS Usk 号受日本第二舰队作战管制。

四、作战经过

8月27日起，日英对青岛一面实施海上封锁，一面积极准备登陆。经过水上机母舰“若宫号”（Wakamiya）舰载机的侦察，发现青岛湾区的德军已有滩头防御部署，因此放弃了在青岛湾登陆的计划。

9月2日，日军在山东龙口—莱州一线登陆。该地区在德国保护区之外，属于中国领土。因此日本此举，已破坏了中国的中立。但此时正值龙口地区水患成灾，故登陆后日军行动甚为迟缓。

9月19日起，日本以二十艘运兵船载运部队 12000 人，在青岛东北崂山仰口湾登陆，占领河东台地，并沿谷地向青岛进击。同时，担任封锁的日英军舰也对青岛外围的德军工事展开岸轰。9月27日起，青岛已被日军四面合围，对外的公路、铁路均中断，邮政、有线电报不通，供水管路也遭日军破坏。这段期间，水上机母舰“若宫号”的四架舰载机也频频轰炸德舰与军事设施，但并未造成重大损失。

其间，青岛港内的奥舰及德国炮艇也配合要塞炮兵，在唯一一架德军侦察机的观测导引下，对日、英舰队进行炮击。英国主力舰凯旋号的装甲甲板曾被击穿，日舰多艘也遭击伤。

9月24日，日军司令官下令自青岛东侧的亨利王子高地向德军的外围要塞攻击，日军的重炮也从该高地以居高临下之势轰击全区的重要目标。

本日的战斗中，奥舰伊丽莎白皇后号和德国炮艇美洲虎号从东侧海湾对进攻的日军实施岸轰，给后者带来了重大的伤亡。

9月28日、29日两日，日军再次攻击，不断缩小了对青岛的包围圈。此后，并持续进行土工作业，把散兵坑和交通壕挖到了青岛市的外围。守军虽对日军展开猛烈炮击，但毕竟寡不敌众，防线一再失守。

10月6日，日军占领济南车站，掠取胶济铁路及沿线各城镇，再度侵犯了中立的中国领土。

10月17日夜晚，德国S-90号鱼雷艇躲过了三艘日本驱逐舰的封锁，突围到了公海。18日1:30，该艇发现了一个双桅、双烟囱的大型目标。在潜行到500米的距离，艇长布鲁纳上尉下令发射鱼雷，三发鱼雷皆命中，敌舰立时爆炸沉没。事后才知道，被击沉的是舰龄三十年，曾在甲午战役立功的巡洋舰高千穗号。

10月28日是日本天皇诞辰。当天日本从地面及海上发动猛烈的炮击，空中也有轰炸。据德军估计，该日单日落弹量即达十万发。德军在良好的地下工事中虽未遭严重损失，但军民的心理都受到重大的震撼。

11月1日凌晨，日军发动了总攻，一夜之间从青岛东侧，对德军左翼阵地发起了四次冲锋。在德军勇猛抵抗下，日军伤亡了约2500人，但阵地仍固若金汤。这次攻击的唯一成就，是把德军侧卫炮兵的弹药消耗殆尽。自此，战斗已进入了寸土必争的白热化阶段。

11月2日，伊丽莎白皇后号和美洲虎号两舰将火炮拆卸，人员、弹药、口粮上岸，编为两个岸炮连后，双双自沉于青岛港东方的入口处。

从11月1日起，日军陆续由本土增援了新锐兵力约10000人。3日，日军摧毁了青岛市的发电厂和无线电站。德奥守军在困守无援的情况下，虽仍具斗志，但弹药却近用完。6日夜间到7日凌晨，日军在炮兵强大火力支持下，对青岛发动正面总攻击。数小时后，德军两翼阵地尽失，主阵地的抵抗，除增加流血以外，于事已无济。因此，德督麦尔-华德克

在7日上午7:30下令各阵地竖起白旗。

当日全天，双方都在做洽降的谈判，最终在19:50签订了降书，青岛之役告终。耐人寻味的是：日军开入青岛时，德奥军在道路两侧正面相待。但英军出现时，德奥军却全体来了个“向后转”。

根据英军司令部的报告，日军在战役中缴获的战利品有：步枪2500支，机枪100挺，堪用火炮1门，煤15000吨，汽车40辆，现款约1200英镑，以及足够供应5000人三个月的粮食。

五、双方损失

1. 德奥。根据德奥官方的资料，战役中守军阵亡者195人，负伤者约500人。自沉舰艇七艘，含奥国巡洋舰伊丽莎白皇后号及五艘德国炮艇，一艘鱼雷艇。被俘者军官201人，士官兵3841人，其中包含奥国海军官兵215人。

2. 日军。有关日军在青岛战役的损失，各方面资料有很大的差异。根据参战德奥官兵的指陈，日军阵亡人数高达11300人，负伤者约4600人。而英美方面的史料则称：日军阵亡者727人，负伤1335人。笔者认为，1916年9月30日，日本驻青岛当局在该地朝日公园（Asahi Park，即德治时期的植物园）内所树战役纪念碑上记载的阵亡人数1014人较为可信（陆军676人，海军338人）。其负伤人数，依经验法则，应是此数的二至三倍，即二至三千余人。舰艇方面，日方被击沉的有巡洋舰高千穗号（Takachito）及一艘驱逐舰，水上机母舰若宫号与七艘辅助舰重伤，水上机一架遭击落。

3. 英军。英军在战役全程，只担任了助攻的角色。其战损也相对地不值一提，计阵亡12人，负伤53人。主力舰凯旋号则受到了中度的战损。

六、日本：一战最大的获利者

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基于国家利益与地缘政治的双重考虑，即使没有英国的怂恿，它也会采取这个步骤。当时，美国仍采取中立，但其他的欧洲列强都陷入了欧洲主战场，亚洲成了势力的真空。有实力，也占地利的日本，借参战来填补空隙是稳操胜券的算计。从事实的发展来看，也是如此。日本在夺取了青岛之后，接着南下进入南太平洋，掠取了德国殖民地玛丽安娜群岛、马歇尔群岛和卡罗琳群岛。大战期间，日本以协同协约国作战的名义，舰队进出太平洋、印度洋，甚至达到地中海，让它的海权发展到了最高峰。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中，国联同意了日本接收德国在中国青岛的权益，并将赤道以北，除关岛以外的德国殖民地（即上述南太平洋诸岛群）交付日本托管。

四年欧战，在欧洲、西亚（土耳其）、近东丧命的军人近一千万人，负伤者两千余万人，平民死伤也达七百余万人。交战双方耗费的战费总额达9560亿金马克（1金马克值0.358423g纯金），其中英国占2080亿，德国1940亿，法国1340亿，美国1290亿，俄国1060亿，奥匈帝国990亿，意大利660亿。这个巨大的战争费用已远超出了欧洲各参战国的生产总值。

战后，欧洲满目疮痍。战胜的英、法、意国力一蹶不振，帝俄发生了革命，肇建了共产苏联；战败的德国发生革命，霍亨索伦王朝垮台，建立了威玛共和，奥匈帝国国内各民族纷纷独立，哈布斯堡皇帝退位，国土缩小为六分之一的奥地利成立了共和国。

日本，无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赢家。整个大战期间，日本阵亡总数是1880人。除青岛战役的1014人外，有805人是因为军舰锅炉爆炸沉没殉职（主力舰Kawachi，1918年7月12日；装甲巡洋舰Tsukuba，1917年1月14日），68人是驱逐舰Sakaki号成员，于1917年6月11日在地中海海域被奥地利潜艇击沉丧生。

上述这些战争代价，相比较日本获得的土地、经济和国际地位上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

放眼1918年的全球，国力与日本能相抗衡的，只剩下了美利坚合众国。而这也埋下了二十多年后，美日在亚太地区斗争的潜因。

七、青岛之役与中国之命运

本次战争中有两个交战方：日、英与德国；另外还有一个中立的旁观者：中国。交战者各争其利，互有损益。但中国这个旁观者却不仅在当时遭到了池鱼之殃，还长久地在国家尊严、主权、领土、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就开始染指中国东北。根据德、奥在一战前的情报资料，日本在取得了原帝俄在“南满”的特权后，就在该地驻留了一个陆军师团和一个具备旅级战力的“满铁守备队”。基本上，东北在一战爆发前就已是日本的势力范围。

在取得青岛，一直到1922年撤出的七年多内，日本透过武力、移民、操纵实业、铁道等巧取豪夺的手段，实际上已控制了山东全境。（甚至到1927年，山东主权已归中国之时，日本为了阻挠中国统一，还曾派兵5000人自青岛登陆山东，以武力干预国民革命军北伐，制造了使中国军民死亡七千余人的“济南惨案”。）

从东北到山东，日本已完成全面侵华、亡华的态势。后来的九一八，第一次沪战，华北自治，迫使中国一步步地退让，直到卢沟桥事变，才忍无可忍地展开了全面抗战。

日本强取了青岛两个多月后，在1915年1月18日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内容分为五大部分，在第一部分里，日本就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原有特权。最后在中国力争下，日本搁置

了危害中国主权最烈的第五部分，但还是逼迫中国政府签下了其中的十二条，是为后人所知的“五九国耻”。

日本对山东的侵略，及其背后的更大野心，引起了两大方面的警觉。一是知识分子，一是南方的革命政府。相对于没有灵魂的北洋政府，南方的国民党人却是“有国家，有主义，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受山东（青岛）问题激发，发起了“五四运动”，也进一步的思考国家的出路。许多青年为救国，投向了南方的革命阵营。

日本的欺凌，造成了中国民族的觉醒，使得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势如破竹，从1926年7月至1928年12月的不及两年半的时间内统一了中国。而后来的“黄金十年”努力建设，更让中国积存了日后对日抗战的本钱，终于在1945年，洗雪了从《马关条约》以来的五十年的国耻。

一战对中国妇女运动国际化的影响

Astrid Lipinsky*

一、20 世纪早期的国际妇女运动及其刊物

20 世纪早期妇女运动的主要关注点在妇女的选举权问题上，换句话说，20 世纪早期的妇女运动即妇女选举权运动。其运动的月刊为 *Ius Suffragii* (拉丁文：选举权)，自 1913 起更名为 *International Woman Suffrage News* (*IWSN*：国际妇女选举权新闻)。*IWSN* 的出版时间为 1913 年至 1920 年间^①，几乎跨越了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英国 *IWSN* 是以英语发表的 (总共出版了 700 份)，日内瓦的 *IWSN* 则是法语版本 (1910 年：总共出版了 200 份)。虽然时值战争时期，但是，超过 30 个国家订阅了 *IWSN*，其中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波西米亚、印度、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及、芬兰、法国、加利西亚 (今天的乌克兰和波兰的一部分)、德国、大不列颠、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菲律宾、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南非、瑞典、西班牙、瑞士、土耳其、乌拉圭以及美国。虽然该杂志的发行量很小，但是女读者们在阅读之后会继续传阅。自 1916

* 任教于维也纳大学汉学系。

① Oldfield, Sybil (2003) (Hrsg.): *Ius Suffragii 1913-1920*, Vol 1, Routledge: London.

年4月1日发行的版次起中国也开始出现在订阅 *IWSN* 杂志的订阅户名单中了。^①

1916年各国订阅 *Ius Suffragii* 杂志的订阅户数量（英语版本）

国 家	<i>Ius Suffragii</i> 杂志的订阅户数量	<i>Ius Suffragii</i> 杂志的名誉会员
澳大利亚	17	2
奥地利	-	3
百慕大群岛	1	-
波西米亚	1	-
保加利亚	1	-
加拿大	14	1
中国	1	-
丹麦	21	2
芬兰	17	1
法国	3	3
德国	8	25
大不列颠	183	137
匈牙利	5	6
印度	1	2
(荷兰属) 印度	2	1
意大利	2	-
荷兰	25	20
新西兰	12	-
挪威	3	-

① *Ius Suffragii* Vol. 10 No. 9 vom 1. April 1916, S. 94. In Oldfield 2003 Seite 288.

(续表)

国 家	<i>Ius Suffragii</i> 杂志的订阅户数量	<i>Ius Suffragii</i> 杂志的名誉会员
波斯	1	-
葡萄牙	1	-
俄罗斯	1	2
南非	17	4
瑞典	32	2
瑞士	11	1
美国	41	44
总计	421	256

Ius Suffragii 杂志在 1913 年布达佩斯会议前后经历过短暂的热销期，之后由于战争的原因其发行数量持续下降。杂志的出版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导致来自世界各地的相关报道紧缺。

如今 *IWSN* 成为展现一战时期妇女运动全球化特征的唯一来源和证据。每一期都有装订成册的 16 页，其中没有广告，但是有照片。特别有价值的是书后详细的目录索引（自 1913 年起），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科学地使用这些目录索引了。

IWSN 杂志首次提及争取选举权的中国妇女是在 1912 年，即 1912 年发生在南京的请愿运动，该运动随后被欧美国家报道并得以传播开来。大多数匿名的文章极有可能出自嘉丽·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n Catt, 1859—1947）之手，她在环游世界的时候亲自了解并认识了中国的现实情况。

二、嘉丽·查普曼·卡特和中国妇女

卡特是 1902 年成立于柏林的国际妇女选举权同盟的创始人，并任第一

届主席（1904—1923）。^① 她曾多次受到抨击，人们指责她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因为她本人从不为美国的黑人妇女争取权益。^② 在卡特看来，虽然妇女选举权和她们的种族有关，但同时她认为目前每一个种族的发展水平都足以为妇女获得选举权提供条件。^③ 就中国而言，其发展水平已远远超过妇女争取选举权所需的前提和基础，完全可以独立实现妇女选举权，因为她视中国属于进步国家之列。她认为一个国家进步的标志为共和主义，而中国的确刚刚成为了共和主义国家。^④

在卡特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超种族的大团结^⑤，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战后中国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已销声匿迹了，其实她们本可以从西方的大团结中获益很多的。

卡特在 1911 年至 1912 年这两年的时间里环游了世界各国，她首先去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访问了南非、菲律宾、日本、香港和中国。^⑥ *Ius Suffragii* 杂志上关于中国的报道极有可能是由卡特撰写的。在中国的广东省议会中还是有妇女参政的，卡特于 1912 年 9 月 12 日到达北京的时候也

① Ellen Carol DuBois: *Woman Suffrage and Women's Right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S. 177.

② Kevin S. Amidon (2007): *Carrie Chapman Catt and the Evolutionary Politics of Sex and Race 1885-1940*,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68 No. 2, pp 305-328, hier: 305.

③ Kevin S. Amidon (2007): *Carrie Chapman Catt and the Evolutionary Politics of Sex and Race 1885-1940*,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68 No. 2, pp 305-328, hier: 309.

④ Kevin S. Amidon (2007): *Carrie Chapman Catt and the Evolutionary Politics of Sex and Race 1885-1940*,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68 No. 2, pp 305-328, hier: S. 316.

⑤ Kevin S. Amidon (2007): *Carrie Chapman Catt and the Evolutionary Politics of Sex and Race 1885-1940*,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68 No. 2, pp 305-328, hier: S. 322.

⑥ Nate Levin (2006): *Carrie Chapman Catt, A Life of Leadership* New Dialogue Press 2006, online: <http://natelevin.tripod.com/>.

受到了当地为争取妇女权利而斗争的妇女代表的热烈欢迎，她还在全中国发表了演讲。在中国停留时期她还结识了唐群英，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于1912年10月12日在北京成立了地方妇女选举权联合会。^①卡特邀请她和所有中国妇女组织去参加拟订于1913年7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大会，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将共同致力于争取妇女选举权，对此她表示很高兴。^②中国妇女组织将此邀请传达给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妇女联合会，这些联合会也表示很乐意前往参加。多个妇女联合会甚至还协商一致，至少承担唐群英前往布达佩斯的一半费用。^③但是最终中国妇女组织未能成行，原因并不明确。

三、中国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和妇女参政

中国的妇女选举权运动以及它对中国妇女的影响在学术界受到了不同的评判和议论。^④ *Ius Suffragii* 中详尽的文献资料以及对对中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追踪报道反驳了有关声称其运动失败的言论^⑤。

（一）省级层面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成功

早在1911年清政府设在广州的广东咨议局因其不作为而被国会取代，国会中有十位由妇女选举出来的女议员代表，其中一位被选代表因出国需要而放弃了她的职位。1911年12月其余的九位女议员代表在国会中表现

① Yuxin Ma (2010): *Women Journalists and Feminism in China, 1898-1937*, Cambria Press: Amherst and London, Seite 124.

② Nate Levin (2006): *Carrie Chapman Catt, A Life of Leadership* New Dialogue Press 2006, online: <http://natelevin.tripod.com/>.

③ Yuxin Ma (2010): *Women Journalists and Feminism in China, 1898-1937*, Cambria Press: Amherst and London, Seite 124.

④ Yuxin Ma (2007): "Women Suffragists and the National Politic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911-1915", *Women's History Review*, 16: 2, Seite 183-201, hier Seite 183.

⑤ Ebd.: so Wang Chia-chien.

积极活跃，她们的事迹还被刊登在了于 1913 年 8 月出版的 *Ius Suffragii* 杂志的扉页上。^① 这九位女议员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中两位是女子学校的校长，其他几位都是富商的太太，她们的身份使得她们在封建社会中免受父权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

Ius Suffragii 杂志曾两次在其扉页中涉及了中国，第二次是对中国寄送到布达佩斯国际会议上的锦旗的报道，其中还附了照片。^②

（二）国家层面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失败

1912 年 1 月初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它是中国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机构。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是提倡男女平等的，在这样一个“妇女友好”的基调下从 1 月至 3 月在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河南省和浙江省等地陆续出现了不少地方性的妇女选举权联合会。^③ 卡特极有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了公开演讲，鼓舞了中国广大的妇女群体，使其大为振奋。^④

中国妇女提出了证明，证实她们有能力使用现代化的参政形式，应该获得投票权。她们于 1912 年 2 月 27 日向南京临时参议院呈递了请愿书，但是 1912 年 3 月 11 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并未规定妇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倒是第 5 条规定了公民一律平等：“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的区别。”^⑤ 对此中国妇女感到震惊且十分失望，她们的请愿书一直未得到回应。她们也曾尝试，希望至少可以争取到在国会中旁听的资格。当她们的愿望被以暴力阻止，也奋起反抗，同样以暴力

① *Ius Suffragii* Vol. 9 No. 1 vom 1. August 1913.

② 具体参见第四节。

③ Fan Hong (1997): *Footbinding, feminism and freedom: the liberation of women's bodies in modern China*. London: Cass, Seite 99.

④ Nate Levin (2006): *Carrie Chapman Catt, A Life of Leadership* New Dialogue Press 2006, online: <http://natelevin.tripod.com/>.

⑤ www.verfassungen.net.

的手段进行了勇敢的回击。她们打碎了窗户，与安保人员殴打。这些“非女性”的行为被国会中的男议员和新闻媒体大肆宣扬、一致抨击。^① 孙中山认为，没有选举权的妇女在国会中旁听应该被允许，于是他于3月21日提出了相应的妥协建议。可惜的是，在中国妇女得到这一权利之前，孙中山先生就于4月1日请辞了。1913年11月袁世凯继任总统，他上台后解散了国家层面和11个地方层面的妇女选举权联合会。卡特已于这段时期来临之前离开了中国。中国妇女从此被禁止参与任何政治性活动，她们只得遵循儒家思想的教义继续扮演母亲和妻子的角色。1913年袁世凯颁布了新的选举法，其中规定选举权只属于男性。^②

四、中国妇女选举权联盟在1913年布达佩斯会议中的锦旗

1914年5月1日发表的 *Ius Suffragii* 杂志刊登了一张照片，是无法亲自前往布达佩斯的中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积极倡导者们委托卡特转送到国际妇女选举权同盟的一面锦旗，锦旗上面红底白字写的是“同心共济”，意为相互支持。*Ius Suffragii* 杂志用了整整一页的篇幅来报道这面锦旗以及中国妇女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报道称，人们在布达佩斯正式举行了接纳中国加入到国际妇女选举权同盟（IWSA）中的仪式。在场的�所有女性——很明显大多数都带有“西方女性”的特征——热烈欢迎中国妇女加入到她们的同盟中来，这个同盟被看做是进步和文明化的表现。在接纳者看来，中国妇女需要获得解放，而这面锦旗正是中国妇女自己也希望得到解放的有力证据。该锦旗不仅可以被看做是对双方增进交流、互通有无的呼吁和号

① Fan Hong (1997): *Footbinding, feminism and freedom: the liberation of women's bodies in modern China*. London: Cass, Seite 100.

② Fan Hong (1997): *Footbinding, feminism and freedom: the liberation of women's bodies in modern China*. London: Cass, Seite 101.

召，更多的也表达了中国妇女希望增多与西方联系的美好愿望。赠送锦旗的中国妇女们被国际妇女选举权同盟称赞为“新中国”的“新女性”。IWSA 同时也回赠给了中国一份礼物，即为中国妇女提供“保护伞”的义务。*Ius Suffragii* 称，中国妇女的地位很低，存在杀害女孩、女童交易的现象，甚至新社会的部分男性仍然主张一夫多妻制。那些希望和西方女性一样获得自由的年轻中国女孩儿不断受到威胁和恐吓。

卡特在中国逗留期间受到了中国妇女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因此她愿意致力于使中国成为 IWSA 的成员。赠送锦旗和申请入会很可能就是她为此努力的表现，而实际上赠送锦旗者并非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妇女选举权组织，对此锦旗上的落款可以证明，即“Mutual Helping Society”（互助合作社），既没有“妇女选举权”，也没有“妇女”的字眼。不清楚赠送锦旗者们是否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亲自去布达佩斯参会，但是明确的一点是，在中国确实有可能发生一场妇女选举权运动。

五、第九卷 *Ius Suffragii* 对中国妇女选举权的支持

1915 年 5 月、6 月出版的 *Ius Suffragii*，刊载了两篇中国妇女选举权倡导者的文章。这个杂志涉及的亚洲其他国家也只有日本和菲律宾了，分别有过一篇报道，但都与妇女选举权无关。有趣的是，对中国妇女的报道竟出自生活在美国的作者之手，这位女作者并未得到证实，是否在中国逗留或者曾经到过中国。

（一）一位中国妇女选举权倡导者

W. K. Chung 女士是女权运动的先驱，她于 1905 年在香港创立了第一所私立女子学校，根据报道称，她是广州国会中十位女议员代表之一。Chung 女士认为，虽然中国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妇女政策不容乐观，出现了明显的后退现象，但是有几项“妇女友好”的法律政策还是保留了下来；

虽然广州国会解散了，许多女子学校被关闭，妇女杂志也被禁止发行，但是她看到，中国也开始有离婚案例了。中国女性应该继续致力于为自身争取更多的权益。Chung 女士自然也是一位妇女选举权倡导者，出于身体状况的原因她不得不短期逗留在美国。^①

（二）中国妇女选举权发展趋势良好

Ius Suffragii 杂志在 1915 年 6 月版中公开了一段和袁世凯的私人秘书的谈话，他的秘书曾在美国读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据他称，美国人对于孙中山和他的政府打算给予妇女选举权这一举措表示十分震惊。他解释说，其实中国的妇女不仅只负责处理家庭琐事，在某些大事上也是要参与决策的，如果没有他祖母的同意他根本不会去美国留学，虽然他之前也和妻子、母亲商量过了。^② 这位秘书（“Mr. Kow”）的观点和今天许多男性的主流想法一样，认为中国妇女虽然表面上不占据领导职位，但实际上是掌握实权的。可是中国妇女却没有像德国、波兰或者奥地利女性一样在战后 1918 年就获得了选举权（美国：1920 年，英国：1928 年），而是直到 1947 年中国妇女拥有选举权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六、国际妇女运动和海牙妇女和平会议

原本德国想邀请国际妇女选举权同盟（IWSA）于 1915 年前往柏林召开两年一度的国际会议（继 1913 年布达佩斯会议之后），由于战争的原因，柏林的妇女拒绝发出该邀请。1915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1 日来自三十多

① *Ius Suffragii* Volume 9 No. 8 vom 1. May 1915, S. 283. Nachgedruckt in Oldfield, Sybil (2003): International Woman Suffrage. *Ius Suffragii* November 1914-September 1916,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S. 109.

② *Ius Suffragii* Volume 9 No. 9 vom 1. June 1915, S. 296. Nachgedruckt in Oldfield, Sybil (2003): International Woman Suffrage. *Ius Suffragii* November 1914-September 1916,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S. 122.

个国家的 1500 多名女性齐聚荷兰中部城市海牙参加“国际妇女大会”，这也并非是原定于在柏林召开的会议的替代。原有 180 位来自英国的女性准备参会，但是英国政府中断了通往荷兰的水上交通，最后只到了 3 个人；在一战中德国和奥地利与以英、美、法为首的协约国成员相对立，即便如此，德国前往荷兰与会的妇女人数多达 28 位，奥地利派遣了 6 位女性代表；加拿大妇女 2 位；尽管从美国到荷兰的路途遥远且不安全，但仍有 47 名美国妇女代表到会；东道主荷兰派出了超过 1000 名妇女参加了会议。^①此外还有来自比利时（5 位）、匈牙利（10 位）、意大利（1 位），尤其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丹麦（12 位）、挪威（12 位）和瑞典（16 位）等国的妇女代表。法国的妇女代表本打算来参加此次会议的，但是此行未获得法国政府的批准。俄罗斯和亚洲国家没有派代表来。

该会议的主题并非是围绕着妇女选举权展开，而是关于世界和平的，就从卡特个人的言论中人们也能明显感觉出来 IWSA 主题的转变。与会代表通过了八项和平决议，在第二项决议中妇女主张所有殖民地人民应该拥有自决权。^②通过该项主张中国本可以期待德国归还山东殖民地上享有的权益，但最终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中国并没有派代表参加此次大会，所以在制定和平决议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东欧国家的殖民地，如波兰，而非先想到中国。

七、第十卷 *Ius Suffragii* 杂志 (1915 年 10 月—1916 年 9 月) 的非国际化

在一战之前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确是呈现国际化趋势的，战争期间人们

①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men, The Hague—April 28th to May 1st 1915, reprint, S. 4.

② “No territory should be transferred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men and women in it; …and the right of conquest should not be recognized.” *Ius Suffragii* Volume 9 No. 9 vom june 1915, S. 301.

关注更多的是西方国家的妇女运动，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第十卷的 *Ius Suffragii* 杂志中就不再有报道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文章了，虽然还有关于南非的报道，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因为南非是英国的殖民地。欧洲和美国的女观察员和女记者们实际上是中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尤其是 *Ius Suffragii* 杂志上的报道为中国妇女运动提供了前提。中国妇女运动的热潮随着战争的结束便也消退了，缺少了国际女访问者的报道和支持、国内政策趋于回归保守的和父权主义观念，因而妇女运动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八、第十一、十二卷 *Ius Suffragii* 杂志 (1916年10月—1918年9月) 中的中国

虽然在第十一卷的 *Ius Suffragii* 杂志中再没有出现一篇与中国相关的报道，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仍旧是存在的。1916年第十一卷的 *Ius Suffragii* 中列举了世界各国发行的有关妇女选举权的杂志，如德国有5种妇女选举权杂志，而在英国发行的竟多达10种（其中也包括 *Ius Suffragii*），美国有8种，俄罗斯有1种。在所列名单中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亚洲国家。^①

（一）中国作为“分支社团”（Affiliated Associations）成员

虽然在 *Ius Suffragii* 杂志的文章中再没有涉及亚洲的内容，但是在“分支社团”中就有中国和（中国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② 总共有23个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分别代表了23个国家，奥地利就不属于其中，而美国是除了加拿大之外唯一在列的美洲国家，中国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个亚洲国家。“分支社团”名单中的国家多数以欧洲国家为主，也包括了许多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匈牙利）。名单中的国家多数是君主

^① *Ius Suffragii*, 11. Jahrgang No. 2 (Oktober 1916), S. 30.

^② *Ius Suffragii*, 11. Jahrgang No. 2 (Oktober 1916), S. 31.

制国家（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德国、英国），他们王室之间相互熟悉且常常有血缘关系。这与冷战截然不同，在冷战时期东欧和西欧之间的合作与联系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各个国家社团会公布其女主席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而中国是一个例外，当时 IWSA 和中国已经没有联系了，中国注册加入“分支社团”时公布的联系单位为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而非某个联络员。

（二）中国作为 *Ius Suffragii* 杂志的订阅户

从 1918 年 3 月起中国开始出现在 *Ius Suffragii* 杂志的订阅户名单上。^① 名单上列举了所有订阅该杂志的读者所处的国家，共有 27 个国家和殖民地。*Ius Suffragii* 杂志总共达到了 716 份的发行量，但对此业绩出版商们还不太满意。他们感到很遗憾，自 1913 年布达佩斯会议之后就再不召开两年一度的国际妇女大会了，不然的话他们还可以在会议上为杂志做宣传。现在宣传的这个任务就属于国家社团了，他们被敦促要为 *Ius Suffragii* 杂志赢得更多的读者。美国的国家社团表明，他们的宣传是有效的，美国已经有 381 位订阅户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只有英国的订阅户数量超过了 100（146 位）。亚洲国家里面中国、日本和菲律宾各有一位订阅户。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国际化至少能够体现在 *Ius Suffragii* 杂志被亚洲读者订阅这件事上。

（三）西方国家殖民地中的华人

来自中国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能够发表在 *Ius Suffragii* 杂志上的新闻，这主要说明了战争期间美国妇女代表和英国妇女代表与中国再无联系。唯一一条和“华人”有关的新闻来自于英国殖民地马来西亚，在那里华人妇女聚集起来，在群众集会上要求进行婚姻法改革。她们为此联名给英国地方

^① *Ius Suffragii*, 12. Jahrgang No. 6 (März 1918), Nachdruck Oldfield 2003, S. 294.

总督写了一份公开信。^① 读者们无法直接从中国获得新闻，只能通过西方殖民国家间接了解中国。

九、结语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00 年以后，一战期间妇女的角色才真正成为人们讨论的主题。直到今天，妇女选举权运动也不能算得上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运动。虽然 *Ius Suffragii* 杂志于 2003 年起又重新出版了，但是其科学价值还有待评估。在本文中 *Ius Suffragii* 杂志的国际化特点从其对中国的报道上体现出来了。一战时期西方和中国的联系被阻断，中国妇女不再成为 *Ius Suffragii* 杂志报道的对象，西方女性也不再继续支持中国的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德国割让山东半岛给日本吸引了国际上各国的关注，取代了妇女运动成为了新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了，直到这个时候中国妇女才真正获得自由和解放。

^① *Ius Suffragii*, 12. Jahrgang No. 12 (September 1918); Oldfield Nachdruck 2003, S. 387.

附录 会议议程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Impact of World War One on China's Modern History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影响研讨会

July 3-5, 2014, University of Vienna, Austria

Conference Program

<p>Thursday, July 3, 2014</p> <p>7: 00-9: 00 PM</p> <p>Opening Event</p> <p>Keynote Lecture:</p> <p>➡ PHILIPP BLOM; <i>The Vertigo Years-Europe 1900-1914</i></p> <p>Discussants:</p> <p>➡ JIN GUANGYAO (金光耀)</p> <p>➡ KAWASHIMA SHIN</p>	<p>Friday, July 4, 2014</p> <p>8: 30-9: 00 AM <i>Registration</i></p> <p>9: 00-10: 00 AM <i>Opening remarks</i></p> <p>10: 00-12: 00 AM PANEL I- "Modernization"</p> <p>➡ XU GUOQI (徐国琦); <i>WWI and China-s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i></p> <p>➡ DANIEL MARC SEGESSER; <i>Why (not only) China matters in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i></p> <p>➡ EUGENE W. CHIU (丘为君); <i>WWI and China-s Modernity</i></p> <p>12: 00 AM-1: 00 PM <i>Lunch</i></p> <p>1: 30-3: 30 PM PANEL II- "Versailles"</p>	<p>Saturday, July 5, 2014</p> <p>9: 00-11: 30 AM PANEL IV- "Revolution"</p> <p>➡ ZHANG BAIJIA (章百家); <i>Rethink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An Analysis of Li Dazhao's Changing Views on World War I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i></p> <p>➡ JIN YAN (金雁); <i>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i></p> <p>➡ QIN HUI (秦晖); <i>The Impacts of "Japanese Liberalism" and "Russian Socialism" o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WWI</i></p> <p>➡ LI HUIBO (李慧波) & ASTRID LIPINSKY; <i>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on State Formation and Women's Liberation in China-The Perspective of Women's Organisations Before and After WWI (1904-1928)</i></p>
---	--	---

<p> ➡ DANIEL MARC SEGESSER ➡ XU GUOQI (徐国琦) ➡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 ZHANG ZHIYUN ZHANG ZHIYUN (张志云) </p>	<p> ➡ JIN GUANGYAO (金光耀): <i>The Prepara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Circles for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i> ➡ XU LAN (徐兰): <i>From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to the Cairo Conference: The Rise of China</i> ➡ TANG CHI-HUA (唐启华): <i>Studying the Government Instruction for the Chinese Delegation to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i> ➡ PAUL BAILEY: <i>Chinese Contract Workers in WWI France. An Overlooked Episode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of Modern China's Labour History</i> ➡ OLGA V. ALEXEEVA: <i>Chinese workers in Russia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Victims of Another War</i> </p> <p> 3: 30-4: 00 PM Coffee Break 4: 00-6: 30 PM PANEL III- "Economy" ➡ LIU WEI (刘巍): <i>The Shortage of Capital Goods, Monetary Squeeze and the Decrease of China's Aggregate Supply (1914-1918) -Research Based on the Premises of Supply-Constrained Economies</i> ➡ JIAN XIAOQING (简小庆): <i>World War I and Its Impact on the Hong Kong-Guangdong Rails</i> ➡ WU LIN-CHUN (吴翎君): <i>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During WW I: The Case of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i> ➡ ZHANG CHIHUN (张志云): <i>World War I and China's Indemnities and Foreign Loans</i> ➡ LIU SUYU (刘苏雨) & JIANG XIAOHUI (蒋晓蕙): <i>The Influence of WW I on China's National Economy-A Case Study of Zhang Jian's Business</i> ➡ ZHU JIAMING (朱嘉明): <i>The Impact of WWI on China's Economy During Beiyang Government</i> </p> <p> 6: 30-7: 30 PM: Dinner </p>	<p> 11: 30 AM-1: 00 PM Lunch 1: 00-3: 30 PM PANEL V-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 LEI YI (雷颐): <i>The Rise of "New Confucianism" and World War I: A Close Look Back at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Metaphysics</i> ➡ ZHU KUNRONG (朱坤容): <i>The Japa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Imperialist Expansion-The Shandong Question fro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erspective</i> ➡ XU ZHIYUAN (许知远): <i>WWI and Liang Qichao</i> ➡ WANG YUAN-YI (王远义): <i>Anti-Capitalist Tendencies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fter WW I-The Case of Hu Shih's Liberalism</i> ➡ HSU CHEN-KUO (徐振国): <i>The Source, Nature and Limitations of "Mr. Science":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Science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i> </p> <p> 3: 30-4: 00 PM Coffee Break 4: 00-6: 00 PM PANEL VI- "Sino-Japanese Relations" ➡ HOU ZHONGJUN (侯中军): <i>The Neutrality Choice of China at the Early Stage of WWI-An Investigation focused on Japan's Declared War on Germany</i> ➡ KAWASHIMA SHIN: <i>The Japanese Twenty-one Demand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China</i> ➡ WANG YUQI (王玉麒): <i>The Jiaozhou Area under Contend of the Great Powers and its Historical Consequences</i> ➡ LI YANG (李洋): <i>The German-Japanese Navy Battle During the Siege of Qingdao in 1914</i> ➡ WANG WENLUNG (王文隆): <i>China's Seizure of "War Booty" Ships in WW I</i> </p>
---	---	---

		<p>➔ PETER HARMSSEN: <i>Fighting the Last War: The 1937 Battle of Shanghai through the Prism of WWI</i></p> <p>6: 00-6: 30 PM <i>Concluding Remarks</i></p> <p>6: 30-7: 30 PM <i>Dinner</i></p>
--	--	---

人名索引

A

Alferd Meyer-Waldeck (艾佛瑞德·梅耶-瓦德克, 1864—1928), 德国人, 1914年任青岛总督。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法兰兹·斐迪南大公, 1863—1914), 奥匈帝国皇储。

Arthur Edgar Leighton (阿瑟·艾德加·雷登, 1873—1961), 英国人, 化学工程师、管理人。

B

Baron Shibusawa Eiichi (涩泽荣一, 1840—1931), 日本企业之父、日本企业创办之王、株式会社创始人。

Benjamin Schwartz (本杰明·史华慈, 1916—1999), 长期担任哈佛大学东亚和中国问题研究方向的学术负责人。

Blaise Diagne (布莱西·戴格尼, 1872—1934), 1914年, 作为塞内加

尔代表当选为法国众议院议员。一战期间，他是法国军队的主要招兵负责人，当时成千上万非洲黑人在法国前线作战。

C

Charles-Mauricede de Tallyrand (塔列朗, 1754—1838), 法国政治家、外交家。

曹汝霖 (1877—1966), 浙江人, 1913 年任北洋政府外交次长, 1915 年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 1917 年任交通总长。

陈独秀 (1879—1942), 安徽人,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 1915 年创立《新青年》。

陈篆 (1877—1939), 福建人, 1912 年任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司长, 后任驻墨西哥公使、外交次长。

陈友仁 (1875—1944), 广东人, 1914 年创办英文《京报》。

D

戴陈霖 (1872—1960), 浙江人, 1913 年驻西班牙公使兼葡萄牙公使, 1918 年兼任驻梵蒂冈公使。

刁敏谦 (Tyau Min Chien, 1888—1970), 广东人, 留学伦敦大学, 法学博士, 1916 年任清华学校教授, 1917 年任《北京论坛》主编。

杜亚泉 (1873—1933), 浙江人, 1911 年至 1920 年兼任《东方杂志》主编。

段祺瑞 (1865—1936), 安徽人, 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E

Edward Francis Hutton (爱德华·贺顿, 1875—1962), 美国金融家。

Edward Millen (爱德华·米连, 1860—1923), 澳大利亚政治家。

Emperor Franz Joseph (法兰兹·约瑟夫皇帝, 1830—1916), 奥匈帝国皇帝。

F

Ferdinand Foch (福煦, 1851—1929), 法国陆军统帅。

Francis Aglen (安格联, 1865—1932), 1911—1927 年任中国海关第三任总税务司。

Frank Goodnow (古德诺, 1859—1939), 美国政治学家、教育家, 1913 年在北京任袁世凯法律顾问。

Frederick Maze (梅乐和, 1871—1959), 英国人, 1929—1941/1943 年任中国海关第四任总税务司。

冯国璋 (1859—1919), 河北人, 直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副总统。

G

Geoffrey Parker (杰弗里·帕克, 1943—), 英国历史学家。

George Ernest Morrison (莫理循, 1862—1920), 曾任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 驻华记者 (1897—1912)、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

顾维钧 (1888—1985), 江苏人, 外交家, 曾为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 联合国首席代表, 驻美大使, 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1919 和 1921 年,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

H

H. de Cody (狄谷, 1865—1925), 曾任外交部国际法顾问。

Heinrich Dipper (亨利克·狄培尔), 巴塞尔宣教会会长。

Heinrich Schnee (亨利克·席尼, 1871—1949), 1912—1919 年任德驻东非总督, 一战时担任军事指挥。

Henry White (亨利·怀特, 1850—1927), 美国外交官, 《凡尔塞条约》签署者之一。

胡惟德 (1863—1933), 浙江人, 1914 年驻法国公使, 1920 年驻日本公使。

J

Jacob van Deventer (雅可布·范·狄芬特, 1874—1922), 曾任南非军队司令官。

James Joll (詹姆斯·乔尔, 1918—1994), 英国历史学家。

James Gordon Legge (詹姆斯·戈登·莱格, 1863—1947), 一战时期澳大利亚军队中将。

Jan Christiaan Smuts (詹·克里斯提安·史茂茨, 1870—1950), 南非将军、政治家。

John Jordan (朱尔典, 1852—1925), 1914 年时任英国驻华公使。

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 (马慕瑞, 1881—1960), 美国外交家。

Julean Arnold (阿诺德, 1875—1946), 美国人, 曾任驻华领事及商务参赞。

贾士毅 (1887—1965), 江苏人, 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任职, 1921 年作为专门委员会委员出席华盛顿会议。

吉野作造（1878—1933），大正年间活跃的政治学者、思想家、明治文化研究家。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发起人。

L

Lewis Harcourt（刘易斯·哈寇德，1863—1922），英国殖民地事务国务大臣。

黎元洪（1864—1928），湖北人，曾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三任副总统。

李鸿章（1823—1901），安徽人，晚清重臣，北洋水师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领导人之一。

李石曾（1881—1973），河北人，早年赴法国，先入农校后入巴黎大学学习生物。1912年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1914年组织留法西南维持会，1915年组织勤工俭学会，1917年北大生物系教授。

梁敦彦（1858—1924），广东人，15岁成为第一批留美幼童，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

梁启超（1873—1929），广东人，公车上书、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曾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梁士诒（1869—1933），广东人，曾为袁世凯帝制复辟效劳，1918年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和安福国会参议院议长，1919年任外交委员会委员，战后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

刘镜人（1866—？），江苏人，曾任北洋政府驻俄国公使。

刘式训（1869—1929），江苏人，中华民国成立后，三度出任外交部次长。

陆征祥（1871—1949），江苏人，1912年任外交总长，一战结束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参加巴黎和会。

M

Maximilian Graf von Spee (马克西姆连·葛拉福·冯·史毕, 1861—1914), 德国海军中将。

Michael Howard (麦可·霍华德, 1922—), 英国军事历史学家, 战争史家。

牡野伸显 (1861—1949), 日本帝国时期政治家, 大正、昭和两朝重臣, 作为次席大使参加巴黎和会。

美浓部达吉 (1873—1948), 日本宪法学、行政法学家。

N

内田康哉 (1865—1936), 日本明治、大正、昭和初期外交官、政治家, 五次出任外长, 代理过首相。

聂云台 (1880—1953), 湖南人, 曾国藩的外孙, 创办第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厂。1915年作为实业团副团长赴美考察, 约请美国棉业专家协助改良中国棉花种植。1917年与黄炎培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O

Oswald Spengler (斯宾格勒, 1880—1936), 德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著有《西方的没落》。

P

Paul Samuel Reinsch (保罗·芮恩施, 1869—1923) 美国政治科学家外交家, 1913—1919 年任美国驻华公使。

Paul von Lettow-Vorbeck (保罗·冯·雷托文-沃尔贝克, 1870—1964),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德属东非部队司令官。

Q

钱能训 (1869—1924), 浙江人, 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国务总理。

R

Ray Lyman Wilbur (雷·莱曼·威尔伯, 1875—1949), 1915 年成为斯坦福大学第三任校长, 1929—1933 年担任美国内政部长。

Richard Dane (丁恩, 1854—1940), 中国盐务稽核所总办 (1913—1919)。

Robert Dollar (大来, 1844—1932), 实业家, 航运公司巨头。

Robert Hart (罗伯特·赫德, 1835—1911), 英国政治家, 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 50 年 (1861—1911)。

Robert Lansing (兰辛, 1864—1928), 1915—1920 年担任美国国务卿。

Robert Wohl (罗伯特·沃尔), 《1914 年的世代》(*The Generation of 1914*) 作者。

Ronald Munro-Ferguson (隆纳·穆洛-佛格森, 1860—1934)。

日置益 (1861—1926), 日本外交官, 驻华公使, 1915 年 1 月 18 日代表日本政府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要求”, 5 月 25 日, 以全权代表身份与

陆征祥签订《二十一条》。

S

Stanley F. Wright (魏尔特), 英国人, 中国海关史家, 著有《赫德与中国海关》。

神尾光臣 (1855—1927), 1914 年青岛战役中, 青岛要塞围攻军司令官。

沈瑞麟 (1874—1945), 浙江人, 曾任驻奥地利公使, 1917 年北京政府对奥宣战后回国, 1918—1920 年任和约研究会副会长, 1921 年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

施肇基 (1877—1958), 浙江人, 康奈尔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曾任驻英全权公使 (1914—1921), 出席 1919 年巴黎和会, 中国五位全权代表之一。

孙宝琦 (1867—1931), 浙江人, 曾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国务总理。

孙中山 (1866—1925), 广东人, 同盟会创始人, 1912 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担任由同盟会改组成的国民党的理事长, 被称为“国父”。

T

Tasker Howard Bliss (霍华德·布利斯, 1853—1930), 第八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1917 年 9 月至 1918 年 5 月, 任美国联军司令。

Thomas Woodrow Wilson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 1856—1924), 曾任美国总统 (1913—1921), 1919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V

Viktor Dankl von Krasnik (维克多·丹克, 1854—1941), 奥匈帝国高级军官。

W

Westel Woodbury Willoughby (韦罗璧, 1867—1945), 美国政治科学家、宪法专家, 1917年, 来中国作为总统宪法和法律顾问, 与 W. F. Willoughby 是双胞胎兄弟。

William Franklin Willoughby (韦罗璧, 1867—1960), 中华民国总统法律顾问 (1914—1916), 与 W. W. Willoughby 是双胞胎兄弟, 两人合著《中华宪法平讲》(中华书局, 1919年)。

Willard Dickerman Straight (司戴德, 1880—1918), 美国投资银行家、外交家, 1913年任美国亚洲协会主席。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 1874—1965), 1911年任英国海军大臣, 1915年辞职并参战, 1918年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 1940和1955年两度担任英国首相。

汪大燮 (1859—1929), 浙江人, 曾任外交总长、国务总理。

汪精卫 (1883—1944), 浙江人, 1919年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任广东省教育会长。

汪容宝 (1878—1933), 北洋政府时期曾出使比利时, 任驻日本公使。

王广圻 (1877—?) 江苏人, 1912年任驻比利时特命全权公使, 1915年任驻意大利特命全权公使。

王克敏 (1879—1945), 北洋政府时期三次出任财政总长, 两次出任中国银行总裁, 兼任盐务署督办。

王正廷（1882—1961），浙江人，耶鲁大学博士，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代理议长、外交总长、代理内阁总理，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1922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伍朝枢（1887—1934），广东人，伍廷芳之子，1911年获伦敦大学法学士学位。后入林肯法律研究院，获大律师资格，1912年返国。1915年任外交部参事，1919年代表广州政府参加巴黎和会。

伍廷芳（1842—1922），广东人，外交家、法学家。辛亥革命后，曾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司法总长。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广东省长。

X

夏偕复（1874—？），浙江人，驻美公使兼古巴全权公使（1913—1915），后入商界成为实业家。

熊希龄（1870—1937），湖南人，曾任北洋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1914年转向慈善和教育。

徐世昌（1855—1939），河南人，前清举人，后中进士，曾任中华民国总统（1918—1922）。

Y

严复（1854—1921），福建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颜惠庆（1877—1950），曾任北洋政府总理，1912年任北洋政府外交次长，1913年任驻德国公使，后任驻丹麦、瑞典公使，1919年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顾问。

晏阳初（1890—1990），四川人，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

叶恭绰（1881—1968），广州人，民初历任路政司司长、交通部长，兼理交通银行、交通大学。

袁世凯（1859—1916），河南人，1913年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5年12月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史称洪宪帝制，引发护国运动。83天后，帝制被取消。

原敬（1856—1921），日本政治家、第19任日本首相（1918—1921），被暗杀身亡。

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人，世界知名国际法学家，1913年担任袁世凯宪法顾问。

Z

张忠绂（1901—1977），湖北人，政治学家、外交家。

章宗祥（1879—1962），浙江人，1914年任司法总长，1916年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1919年代表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

珍田捨巳（1857—1929），1911年任日本驻美全权公使。1920年巴黎和会时，为日本谈判代表。

周策纵（1916—2007），湖南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

张振勋（1841—1916），广东人，华侨资本家。1912年后历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1915年发起组织赴美实业考察团任团长，筹办中美银行。

朱葆三（1848—1926），浙江人，银行保险业资本家。

后 记

在2013年初开始筹备2014年7月在维也纳大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影响研讨会”时，很快就发现国际汉学界对这个题目并不太感兴趣。感兴趣的往往是研究全球史、世界史的国际学者，加上对中国近、现代史做研究的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历史学家。原本想开的一个小型会议一下子变得大起来了；而一个原来看上去相当边缘的题目也变得日益热门。因此，在会议顺利举办之后，我们在与会者论文的基础上，将其集结成书，以提供给对一战，特别是对一战与中国关系问题感兴趣的读者。

在此，首先感谢东道主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所、汉学系以及它所在的语言文化学院。他们不仅尽了地主之谊，而且对会议给予了全方位支持。其次感谢维也纳市政府、蒋经国基金会、公和基金，以及深圳市现代创新发展研究院。这些机构的资助，对于会议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还要感谢“共识网”参与会议的筹备，在中国国内发布会议消息，开展联络工作。与上述这些机构有关的是魏格林教授、朱云汉先生、陈建先生和周志兴先生。

任何会议都有大量的会务工作。为此，要感谢维也纳大学汉学系的Daniel Fuchs同学，他负责与参加会议的西方学者联络、会议文件准备和议程安排工作。汉学系秘书Katinka Kraxner、学生骆志刚、胡雪萌，毕业生

辛扬、Thomas Immervoll，以及长期居住维也纳的王玉麒夫妇，参与邀请函发送、签证申请、国际机票预订、会议录音录像、博物馆参观和机场接送等各类工作。

在本书成书的过程中，台湾吴翎君教授负责台湾学者的联络，保证了台湾学者能够按时完成文章的补充和修改。远流出版社的吴家恒先生邀请林添贵先生对4篇英文文章译成中文。朱嘉明、魏格林、吴翎君对全部译文进行了校对。

当然，最需要感谢的还是东方出版社总编许剑秋先生，他的远见、智慧和热忱是本书出版的关键。出版社经济编辑部的郭国先生，作为本书的编辑和产品经理，承担本书最终与读者见面的各类工作。

还有，感谢柳红女士，她不仅参加了部分文章的最后修订，还参与了图书加工过程的“清样”校对，以及与出版社的沟通。

不少朋友为本书做出了贡献，在此不一一致谢。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论文成书时篇幅过大，在最后编辑阶段，不得不对其某些文章做一些文字性删节。谨此向作者表示抱歉。

朱嘉明

2015年10月8日